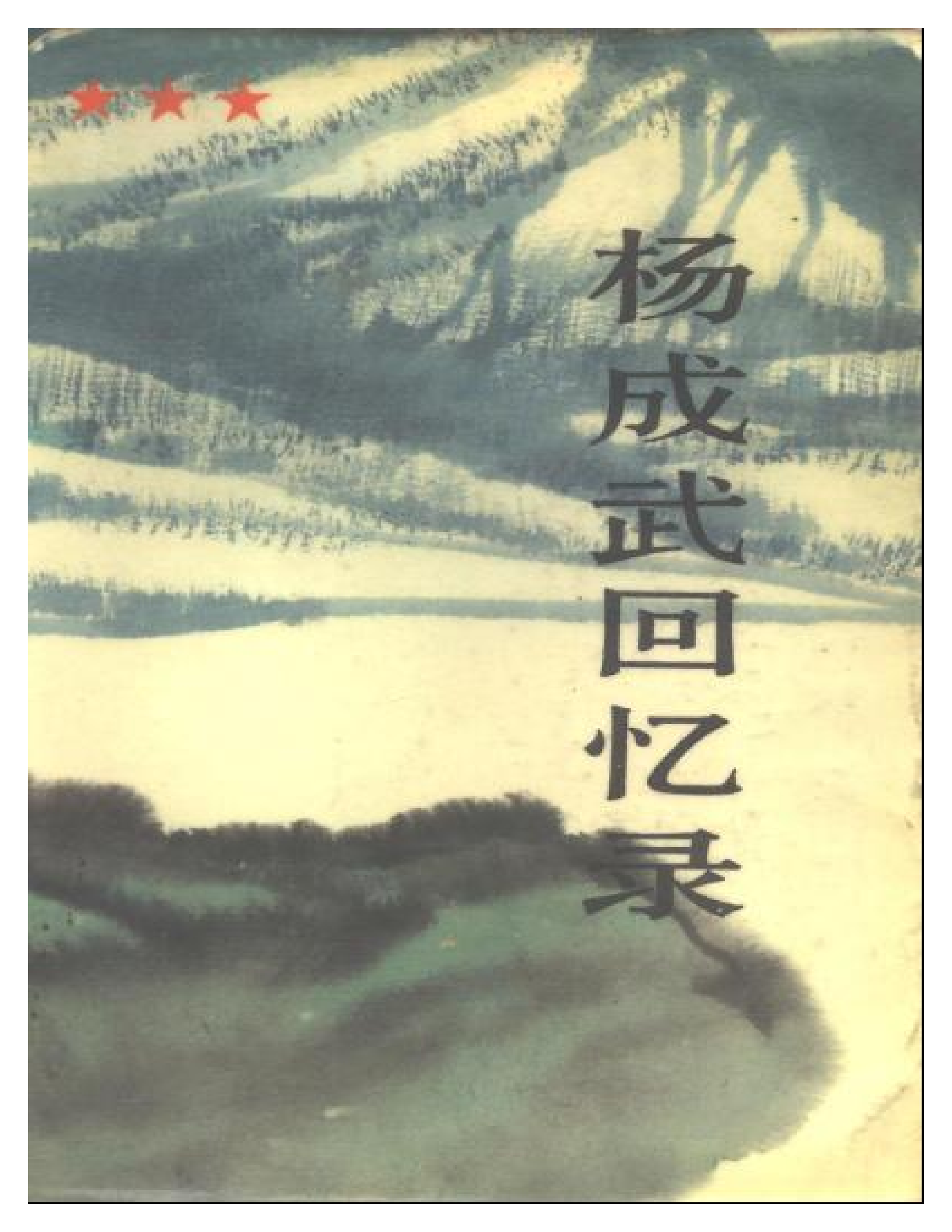




杨成武回忆录

杨成武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26288

1106238

杨成武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6.375印张 181千字
1987年6月第一版 1987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5,000
统一书号: 10185·164 定价: 7.50元



杨成武

赠解放军出版社

为
新
长
征
鼓
与
呼

杨成武
一九五〇年

为解放军出版社的题词

一九三〇年，作者
于江西广昌县留影。



一九三五年，红军
长征到达陕北时的杨成
武。



一九三六年秋，在“红大”和刘亚楼合影。



一九三六年，在“红大”学习期间合影。右起：杨成武、吴富善、彭嘉伦、宋裕和。



一九三七年春，红一师在正宁县团以上干部合影。杨成武（前排左二）。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杨成武支队来到河北、山西、察哈尔三省交界地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杨成武在指挥作战。



一九三八年，杨成武（右）、高鹏（中）、罗元发（左）在前线指挥作战。



一九三九年，杨成武陪同聂荣臻和邓华、孙毅、唐延杰检阅一分区子弟兵。



一九三九年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合影。左起：舒同、聂鹤亭、聂荣臻、杨成武。



一九四〇年与赵志珍合影。



一九四〇年在狼牙山棋盘坨指挥所前合影。右起：赵凡、杨成武、赵志珍、曹凌、高鹏、史进前、黄连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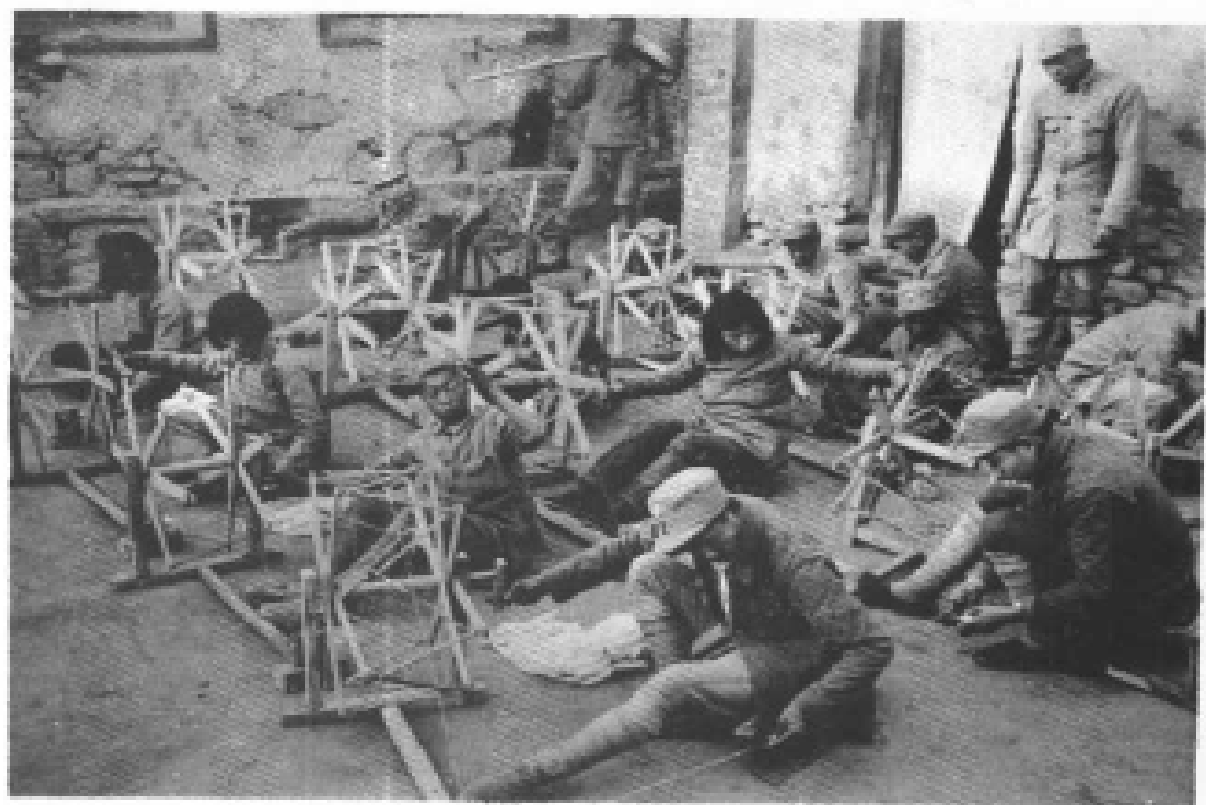
一九四〇年，晋察冀军区的部分领导干部合影。右起：聂鹤亭、聂荣臻、吕正操、杨成武、舒同、赵尔陆、唐延杰、刘道生、刘澜涛、王平、朱良才。



一九四一年，杨成武和国际友人在一起。右起：李效黎、林迈可、杨成武、傅莱、罗元发、唐儒。



一九四一年，杨成武（左五）、罗元发（左九）、陈海涵（左二）和狼牙山五壮士中的宋学义（左三）、葛振林（左七）合影。



一九四二年，一分区政治部与司令部在大生产运动中开展纺织比赛。



一九四二年，杨成武（右二）、高鹏（右五）、王道邦（右一）和被誉为“人民子弟兵老大哥”的崔络唐（右三）在一起。



一九四四年，林铁（左一）、杨成武（左二）、李志民（左三）在白洋淀上。



一九四五年，林铁（右一）、李志民（右二）、周彪（右三）、罗玉川（右四）、杨成武（右五）在冀中。



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阻击阵地之一。



红军突破乌江天险的渡口——江界河。



一九三五年时的泸定桥和泸定城全景。



五座大雪山之一。



水草地。



天險腊子口。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击毙日本侵略军阿部规秀中将的迫击炮。



一九四〇年百团大战第二战役中，歼灭敌人士官大队后，指战员在欢呼胜利。

自序

17/12/25/29

我从一九二九年参加农民暴动后编入中国工农红军，至今近六十个春秋了，也算是一个“革命军中的马前卒”。几十年来，每当想起革命的艰难历程，流血牺牲的战友，如同父母的人民，总有一种内疚感，难以平静。我之所以在晚年孜孜撰写这部长篇回忆录，也完全出自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对党和人民的感激之情，对先烈的缅怀之意。至于我个人在历史上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这部回忆录，分上下两集。上集包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下集包括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写作过程中，尽管我本着严格的求实之心，由于时间跨度较大，疏漏之处难免，诚望我的老首长、老战友以及广大读者教正。

我们国家正处在伟大的变革时期，举国上下同心振兴中华，令人振奋。“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我们这些“老兵”的共同心声。

廖廖数言，权以为序。

杨成武

目 录

开 篇	(1)
第一章 长 征 (上)	(21)
别了，于都河	(21)
战略转移	(31)
夜行军	(38)
进逼道州	(45)
血战湘江	(53)
担架上	(65)
手足情	(72)
强渡乌江	(80)
第二章 长 征 (中)	(99)
伟大转折	(99)
回师遵义	(112)
四渡赤水	(122)
智取三县	(128)
飞夺泸定桥	(138)
神兵天降	(169)
越过夹金山，意外会亲人	(179)

小金川畔.....	(192)
从卓克基到毛儿盖.....	(198)
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	(214)
第三章 长 征 (下)	(241)
白龙江畔.....	(241)
突破天险腊子口.....	(251)
哈达铺整编.....	(269)
六盘山上.....	(279)
连长王友才.....	(287)
英勇捐躯河连湾.....	(294)
长征胜利万岁.....	(299)
恸悼王开湘同志.....	(309)
东征.....	(321)
第四章 挺进敌后	(336)
誓师云阳镇.....	(336)
再度东征.....	(355)
初战.....	(372)
冯家沟伏击.....	(390)
建立抗日根据地.....	(403)
斋堂合编与东、西庄大战.....	(430)
第五章 反“扫荡”(上)	(456)
军事解决“七路军”.....	(456)
改造“十路军”.....	(471)

血战大龙华·····	(499)
“名将之花”命丧太行山·····	(519)
第六章 反“扫荡”(下)·····	(547)
南管头被袭·····	(547)
重返娄山·····	(556)
踏勘狼牙山·····	(568)
敌后的检阅·····	(577)
正太之役与日本孤女·····	(587)
东团堡歼灭战·····	(603)
巧破“铁壁合围”·····	(620)
梯子沟突围·····	(645)
壮士一去兮·····	(663)
第七章 齐心合力渡难关·····	(679)
岁月多艰难·····	(679)
锄奸英雄宁亚川·····	(694)
血洒燕赵地·····	(713)
五峰寨遇险·····	(729)
第八章 攻势作战 日军投降·····	(736)
告别一分区·····	(736)
东进冀中·····	(751)
初到白洋淀·····	(763)
人民——母亲·····	(774)
地道奇观·····	(789)

平原流火·····	(809)
反攻进行曲·····	(827)

开 篇

一九一四年农历九月九日，我出生在闽西长汀县张武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能”字辈份，名曰能俊。祖父杨秀芳，很早就去世了。父亲杨殿华。嫡亲这一支还有母亲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伯父杨棣华那一支还有伯母、两个堂兄弟和一个已经出嫁的堂姐。叔父杨茂华和婶母没有孩子。加上年事已高的祖母，全家共计十三口人。父亲没有上过学，种了一辈子田。伯父和叔父仅读过几年书，后一直做小买卖。十三口之家由祖母维系着。开饭时，祖母带着几个儿子和我们这些小孙孙先吃。我们围坐在一个白茬大方桌旁，满屋是噼里啪啦的碗筷声。伯母、母亲和婶母从来不上桌，总是等我们吃完了再随便吃几口。祖母在三十岁上守寡，就这样拉扯着一家人，艰难地生活着。我投身革命，阔别二十五个春秋后，于一九五四年和妻子赵志珍回乡探亲时祖母还健在，不过她老人家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只是用颤抖的手抚摸着我和赵志珍的脸，默默地掉眼泪。一九五七年，她以九十七岁高龄辞世。

我六岁上学，在村里念私塾，读《论语》、《孟子》、《大

学》和《中庸》等，虽然当时理解不了“子曰”之类的古意，但背诵却是用功的。一间光线暗淡的屋子里，几十个孩子聚在一起，读起古文来朗朗有声。一次，因为顽皮教书先生罚我跪在孔子圣位面前，我不懂为什么硬要这样做。

后来，我的堂姐嫁给教会学校一个姓林的作儿媳，她在婆家读完了中学。在我九岁那年我从私塾转到上杭县回龙镇教会小学。从读《四书》改为学语文、算术、念圣经。和我一起上教会小学的还有两个堂兄弟。教会小学设在一幢四层楼里。我们住第四层，第二层是课堂，第一层是天主教堂，第三层平时空着。

一天，来了几个高个子、黄头发、蓝眼睛、身着白色教士服的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洋人。他们是美国传教士，从广东来，听说要上杭逗留几天，然后转赴上海。他们住在第三层楼上。对他们房子里那雪白的被子、雪白的毛毯、雪白的床单以及可以折叠的行军床，我们都觉得很新鲜。出于好奇，乘他们不在屋时，我和两个堂兄弟溜进去，在行军床上躺了躺。实在不巧，洋人突然进屋。他们说我们把床单弄脏了，罚我们立正站着。站了一会，他们吃饭去了。我不知罚完站以后还有什么样的惩罚，趁他们不在，跑上楼拿了把雨伞，别的什么也没带便逃出了校门。当时，天下着细雨，汀江两岸雨雾蒙蒙。我独自顺着江岸往渡口跑，决心回家去，不在这儿呆了。一路上，我

的心一直不平静，总觉得受了侮辱。我想，我们不过是在床上躺了那么一下，有什么呢，他们就这样无情地惩罚我们。我深深感到，中国人在洋人面前地位低下！

过了几天，堂姐的公公派人叫我回去上学，并解释说：对这些传教士，他也没有办法，只好忍着。还说：求学要紧，不要因为这个就辍学。可是无论来人怎么劝说，我也不肯去了。他后来又派人来过一次，我还是不去。我下决心不沾洋人的边，与教会小学一刀两断。

这时，我的一位远方叔伯哥哥杨能昆，从福州政法大学毕业，回到长汀，在公立师范学校当教育长，于是我就同他的弟弟以及他的一个朋友的儿子一起去长汀上学。

长汀是州府，教育颇发达，有二十多个小学，七八个中学，有女子高中、男子高中，有中等专业学校，商业中学，乡村师范，公立师范，还有英国人办的中西中学，求学之风极盛。开头，我在长汀第一小学读书，毕业后考进福建省立第七中学——现在的长汀一中。

在这里，我接触到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读初一时，五卅惨案、沙基惨案先后发生了，我和同学们一道上街，参加游行示威。后来，国民革命军北伐，第十四军、十七军打到长汀，我们跑到城外去迎接。北伐军攻占了武汉和南昌的时候，我们也都上街游行庆祝。从此我知道了现代史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重大事件。“济南惨案”发生了。日军杀了我国谈判使节和一些外交人员，我们学生又立

即上街举行抗议游行。“四·一二”大屠杀发生后，我们毫不畏惧，全都上街示威。许多老师、同学热血沸腾，忧民忧国，对我影响很大，以致几十年过去了也不能忘怀。英文老师傅维玉，是傅连璋同志的侄女，教我读了三册英文课本，至今还记得几句。她是左派，后来去美国，听说前几年在美国病故。傅连璋是长汀博爱医院院长，当年就相识，后来他也参加了红军，从事医务的领导工作，一道长征。“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迫害至死。童小鹏与我同年，他上的是乡村师范，一九三〇年参加红军，我们一起在红四军工作、战斗。美术老师黄亚光，是日本留学生，解放以后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后回福建省作领导工作，我到福州军区当司令，到职后首先拜望的就是他……

父亲种田，伯父和叔父做小买卖，收入微薄，要应付一家十三口的花销，所以我上学是比较清苦的。一天的饭费也就只一毛多钱，光吃饭，没什么菜。一大家子人为了给我拼凑学费操了不少心。特别是婶母，平日省吃俭用，每年养兔子积攒了一两元钱，自己一点也舍不得花，全都拿给我。她十分疼爱我。把我从小带大，原说要把我过继给他们的。解放后，她还健在，我每次给父亲寄钱，也都同时给她寄上同样的一份。

我刚考进福建省立第七中学时，有一个同乡已在福建省立第四高中即将毕业。他叫张希尧，参加革命后改名张赤男。

我的革命生涯，是与张赤男同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引导我走上了革命的征途。

张赤男是长汀县宣城区长丰乡人。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是世交，有着很深的友谊。他弃学从戎，从第四高中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武汉中央军事学校学习。“四·一二”大屠杀后，他参加了广州和海陆丰暴动，后来负重伤于一九二七年转回闽西，与张鼎丞、邓子恢一起开展闽西农民运动。闽西特委派他到长汀，以教员职业为掩护，领导长汀、上杭、连城、宁化、武平一带的地下革命运动。于是，他成了我们的老师。

那时他和我同住在学校附近的张家祠堂里。他向我们讲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革命实践。他谆谆诱导，娓娓倾谈，经常至深夜方休。在那一闪一闪的油灯下，他向我们描绘共产主义锦绣前程，抒发远大的政治抱负。他在我的心灵里点燃了革命的火焰，进行了重要的革命启迪教育。

当时，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正在重新聚集力量。闽西的共产党在张鼎丞、邓子恢等同志领导下，于龙岩、永定等许多地方发展了秘密党员和农会组织，汀江两岸的农民运动也正在开展。特别是长汀、上杭，地处武夷山下，毗邻江西，依山傍水，是这一带经济文化中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需要尽快发动群众，组织暴动，实行武装割据，把龙岩到长汀的闽西农民运动联成一片，以推动革命形势的

发展。张赤男积极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小小的祠堂天天都有衣衫褴褛的农友来“作客”。他利用节假日下乡串联。一天晚上，在宣城区上畲乡的一个小院落里，他聚集起秘密串联的几十个农友，举行成立农会宣誓，发出“同心同德，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抗捐税，分田地，为穷苦人打天下”的誓言。此后，这里也就成为四县党组织的活动中心了。到一九二八年底，他领导几个村庄的党组织发展了五六百个秘密农会会员，为组织农民暴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一九二九年一月初的一个晚上，张赤男对我们说：“我看你们莫念书了，跟我去闹暴动，缴民团的枪，怎么样？”我们说：“好啊，走！”

暴动首先从古城动手。

古城是从闽西到赣南瑞金的咽喉要地，位于两省三县交界处，山高林密，地势险要，群众基础好。

张赤男同志带我们赶到古城后，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古城党组织的负责人刘同志。紧接着，召集骨干会，研究暴动的具体方案。当时古城的反动民团共有三十多人，二十几条枪。怎么打法？有的主张强攻，有的主张偷袭，张赤男同志要大家讨论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同志们在议论中提到这个民团团团长刘明辉的特点：这个家伙不懂军事，喜欢吹牛，吓唬百姓，实际胆小如鼠，最怕死不过。根据这人特点，张赤男同志决定从他身上作文章，

智取这股民团的武器。一天晚上，我们把这个家伙诱来，向他阐明我党政策，叫他看清形势，晓以利害，同时给他指明了一条出路。这个胆小鬼马上表态，只要能够活命，怎么着都行。当夜，他回到民团团部喳呼：“今夜没事，给大家放假，把枪集中团部，留两个人看守，其他人都回家睡觉。”他把团丁们放了羊，自己便溜之大吉。半夜，张赤男闻讯后，率领几十个农会会员在群众的配合下，冲进民团团部，缴了民团的全部枪支，胜利完成了首次暴动。

从此，长汀的党组织有了武装。天一亮，张赤男又召集群众，开仓分粮，烧毁田契，公审和枪决反动地主，民心大快。紧接着，他率领这支武装，奔袭四都，深夜突袭又消灭了四都民团，缴获了十几条枪，壮大了队伍。

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这两个区的暴动的胜利，给长汀的人民很大鼓舞，许多农会群众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同时，反动派受到很大震动，各乡地主纷纷逃往长汀城。

盘踞在汀州城的地方军阀、混成旅旅长郭凤鸣，亲自带着主力赶至四都“围剿”工农武装。张赤男同志开罢群众大会，分了地主的粮，趁敌人未到前，便带着队伍上了山，在一片绵延的林海里，钻山沟，穿密林，向汀南一带移动。郭凤鸣带着大队人马赶至四都，看到的是被枪决了的反动地主的尸体、随风飘零的契约、帐本的灰烬和被捣毁的民团团部，尽管气得咬牙，可是面对连绵无际的林海，无可奈何。

张赤男同志根据敌人加强联防的新形势，在策略上采取了守势，等待时机。他把人员分成几个小组，分散活动，选择敌人联防薄弱的地方，从森林里突然出击，还打了几个小胜仗。他亲自带领我们十几个人组成的一个小组，住在山里，搭草寮、吃野菜。山下的农会会员偷偷背上粮食、被子，上山寻找我们。这是一段艰苦的日子。闽西大山里，大多是没有开发的原始森林，人走进去，抬头看不到天空，绵密的枝叶稀稀落落地滴着水珠，地上积着腐烂的树叶，陡峭的山坡上留着野猪踏下的蹄印，白天也似黄昏，入夜则蚊虫成阵，虎啸狼嚎。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张赤男同志斗志始终旺盛。针对个别同志的思想苗头，在战斗间隙，他给我们讲列宁怎样领导武装起义，赞扬列宁在革命低潮时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讲毛委员、朱军长在井冈山艰苦奋斗的情景和同敌人斗争的胜利消息；讲共产主义的未来远景。在他的鼓舞下，大家提高了勇气，增强了信心。深夜，伴着风啸林吼，我们透过树叶的点点缝隙，仰望星空，憧憬着未来的美好革命前程。

正当我们处境艰难的时候，喜从天降，三月十一日，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亲自率领红四军攻入长汀，一举消灭郭凤鸣部，击毙匪首郭凤鸣，把他的尸体示众三天。乡亲们从百里之外赶来长汀观看，以致长汀城家家住满亲友，赛过盛大节日。

红军的到来，在闽西的“这堆干柴”上，燃起了熊熊

火焰，使闽西的革命蓬勃发展起来。在红军进入汀州后，张赤男同志带着队伍赶进城，通过长汀城党组织召集了各区乡党组织和农会的骨干、布置任务，要他们在原有农运基础上积极发展，趁热打铁，全面发动：在汀南以涂坊、南阳、张屋铺、水口、四都为中心，在汀东以新桥为中心，在上杭以才溪为中心，在连城以新泉为中心，在武平以桃溪为中心，全面组织农民暴动，以致使几个县的红色区域联成了一片。到处是打土豪、分田地、烧契约、农民大翻身的革命景象。广大群众欢欣鼓舞，到处在欢唱：

三月里来——
气象新，
红军大队——
到长汀，
郭逆风鸣——
不量力，
长岭寨下——
命归阴。

在红军停留的十七天里，不少的区乡迅速建立了苏维埃暴动队、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和妇女会等组织。长汀建立了全省第一个红色政权——县苏维埃政府。

这时，蒋桂战争爆发，毛主席抓住军阀混战的时机，

回师赣南，发展红色区域。离开汀州时，毛主席让红四军留下一批枪支给地方部队发展武装斗争。在闽西特委的统一领导下，张赤男同志利用这批枪支在汀江两岸四个县各建立起一支赤卫队，编为闽西工农红军第四团、第五团，全称闽西红军第三路军。他任总指挥，负责统一指挥。红军走后，军阀、民团反动武装疯狂反扑，张赤男指挥赤卫队上山坚持游击战争，按照毛主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以少胜多，不断打击敌人。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朱德、陈毅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军队建设的经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建国后，有一次，毛主席和我谈起闽西的斗争情况时，问我参加古田会议没有，我说：没有，那时我才是个连级干部。于是，毛主席和我详细谈了古田会议的情况，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一九三〇年初，张赤男指挥的闽西红军一部攻打上杭。军阀卢新铭部和大量民团驻守上杭县城。上杭三面临水，滔滔的汀江水成半月形绕城向东南奔腾而去，只有两面靠着起伏不平的陆地。敌人西边防守严密，东边因有自然屏障，兵力很少。张赤男同志率领四、五团从河东出敌不意地渡过汀江打进城去。当我们攻进街心向前发展时，敌人调整部

署，倾巢反扑，地形和火力对我非常不利，造成背水一战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势，为了歼灭敌人，保存自己，张赤男同志一面指挥战斗，一面指挥转移，亲自指挥一支小分队断后，掩护部队乘船撤往江东。由于只有五六条船，撤退需要时间，敌人向岸边直压过来。张赤男同志沉着指挥，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眼看部队快要撤完，他还巍然不动。直到部队全部撤完，他才乘最后一船离开阵地。他稳若城府，勇冠三军的精神，对这次作战转危为安，保存住这支刚刚组建起来的闽西工农武装，起了重大作用。

五月十九日，毛主席、朱军长利用福建军阀主力到广东参加军阀混战的时机，率领红四军再次入闽，进一步发展了革命根据地，把闽西和赣南、湘东的红色区域联成一片。张赤男同志指挥赤卫队，积极配合红军军事行动。各地纷纷暴动，许多区乡都组织了暴动队、赤卫队，恢复扩大了红色政权，出现了一片革命新形势。人们的情绪，正如一首歌谣所说的那样：

当兵就要当红军，
处处工农来欢迎，
官长士兵都一样，
没有人来压迫人。

陈毅同志曾为这段历史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闽赣路千里，
春花笑吐红，
铁军真是铁，
一鼓下汀东。

一月份组织的四十多人三十几条枪的小分队，到此时，已发展成两千多人一千多条枪的工农武装。这支武装于一九三〇年三月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为第三纵队。

部队编入主力红军的初期，从长汀出发到江西，在吉水、樟树战斗时部队发过“妖风”（即在敌人激烈的枪声中，部队组织纪律性变差，容易离散，不利指挥的表现）。当时有人讥笑过这支刚组建的农民部队说：“走路走不动，打仗发‘妖风’。”但经过一段锻炼，在湖南浏阳文家市消灭戴岳的战斗中，就打了大胜仗，缴了很多枪，抓了很多俘虏。

自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三次反“围剿”，在毛主席的统一指挥下，张赤男和肖克、耿凯、王良同志指挥的这支红军部队每战必捷。第一次反“围剿”，在江西龙岗和兄弟部队一起歼敌一个师，活捉敌师长张辉瓒；第二次反“围剿”，与兄弟部队一起从赣江边横扫五百里，打到福建武夷山下的建宁城；第三次反“围剿”时，和兄弟部队一起参加了在兴国县良村、莲塘的战斗，歼敌两个师和进行了高兴圩激战，取得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我由红十二师^①政治委员办公厅秘书长改任第十一师三十二团政治委员。到职后，部队奉命攻打赣南新城，阻击来自广东增援的余汉某部，掩护红三军团攻打赣州，与余部独立混成旅展开了一场恶战。

战斗发生在一九三一年农历正月初三，激烈的枪炮声代替了节日的鞭炮。整个上午，战场上阴云密布，硝烟弥漫，尘土飞扬。我们把团指挥所设在光溜溜的坟包上，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冲锋。敌人火力很强，部队前赴后继，副团长肖君玉同志牺牲了。

在激战中，师政委张赤男和师长王良同志来到我们团指挥所，卧在我和团长向玉成同志的身边。敌人密集的子弹打在我们四周，封锁住前面的一片开阔地和两个鱼塘之间的唯一的一条通路。这时，战士们正在向前运动，接连倒下了几个。突然一个战士又爬起来跃进。张赤男同志正指挥部队改变进攻路线，看见一个战士暴露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之下，十分危险。他不顾个人安危，猛地站起来大声疾呼：“卧倒！卧倒！”战士在他的召唤下卧倒脱险了，但他却头部中弹，血染疆场，壮烈牺牲。

张赤男同志的不幸牺牲，使我们失去了一个好政委，同志们悲愤填膺，带着满脸泪水奋勇冲杀，击败了敌人，全歼敌混成旅。

战斗胜利结束后，在原来的阵地上，面对烈士的遗体

^① 师长王良，师政治委员张赤男。

三军肃立，哀悼敬爱的首长张赤男同志。师长王良、三十一团团长刘亚楼、三十三团政委刘忠、三十二团团长向玉成和我一起流着眼泪，一锹一锹地铲起染着血迹的黄土，掩埋好烈士的遗体，竖起刻着“张赤男烈士之墓”的石碑。部队指战员望着敬爱的师政委张赤男长眠的地方，热泪滚滚，泣不成声。呜呜的北风卷起阵阵尘沙，绕着坟地呼叫。

张赤男同志牺牲的消息传至汀江两岸时，苏区许多老暴动队员为之下泪。他的家乡宣城区群众一致要求把宣城区改为赤男区，并建立了张赤男烈士纪念碑，在张屋铺召开全区人民追悼张赤男烈士大会，当场有一百多青壮年报名参加红军，宣誓接过张赤男烈士的战旗，紧跟共产党革命到底。张赤男同志的牺牲，对我们部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视察大江南北的途中，和我谈起闽西开辟苏区的斗争时说，你们闽西老百姓真好！你们闽西老百姓就是好！张赤男是个非常好的同志！朱总司令在解放战争初期到晋察冀战场，和我谈到红军入闽时说，张赤男是一个很实在、扎扎实实的好政治委员。罗荣恒同志生前多次对我谈到张赤男同志说，这个同志是我们政治干部中一位优秀的政治委员，是意志坚强的好同志。

一九五四年五月，我从广州回北京的途中特地绕道江西赣南新城，瞻仰张赤男同志的陵墓。我来到章水旁边，寻找二十多年来一直印在我心头的那块土青石的墓碑。我记忆中的墓地周围，章水两侧，是起伏的小丘陵地，那上

面散布着很多坟包。如今，那个荒凉的景象已不复存在了。眼前，章水两岸绿树成荫，象在巨大画卷上绘下的一条嫩绿的彩带。居民点星罗棋布，炊烟袅袅。我一口气寻找了两个多小时，也找不到那块我们亲手竖起来的青石碑。我敬爱的老师和首长安眠的地方到底在哪里？我望着眼前的景象，眼圈湿润了。

新城战斗结束后，部队到长江墟整编，为东征漳州做准备。

在这次整编中，红一军团领导易人：原来毛泽东同志兼一军团政治委员，朱德同志兼军团长，现任命聂荣臻为政治委员，林彪为军团长。此外，还宣布了：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彭枯任副主任，陈奇涵任参谋长。全军团团以上干部集合在一个祠堂里，林彪代表中央军委宣布命令。关于罗、彭、陈三位领导，大家早就认识，没有介绍，只介绍了聂荣臻同志。林彪说：聂荣臻同志过去在总政治部当副主任，现在来当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早年勤工俭学，到过法国、德国、比利时、苏联，学过工，学过军事。回国以后，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曾在黄埔军校当教官，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又参加了广州起义，后来到上海、北方，中央从上海到苏区，他也一起转到苏区。

林彪说完，聂荣臻同志站起来，和大家一一握手。他高高的个子，皮肤白净，英俊、文雅、衣着整洁，咖啡色

的皮夹克很得体。一见之下，我们都暗暗地想：哎哟，这个政委有学问，和教授一样。我们很羡慕，也很佩服：这样一个大知识分子，也来参加革命，不简单啊。

接着，聂荣臻同志讲话。他说：“我来一军团当政委，以后和同志们一起生活、战斗。一军团是个老部队，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赣南闽西起义的部队，是经过锻炼的。我参加过南昌起义，以后，在三河坝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到香港，再回广州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回上海，在军委工作。你们有很多战斗经验。以后，我们共同建设红军，保卫苏区，为共产主义奋斗。”他还说：“我们很年轻，你们比我更年轻，前程远大！”

听完聂政委的讲话，大家都很高兴。同志们纷纷说，这位首长政治上内行，军事上也内行。

第二天，还是在这个祠堂里开团以上干部会，聂政委做东征的动员。他指出：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还没有到来，这是个空隙，我们要利用这个空隙，向福建进军。敌人在龙岩有陈国辉一个旅，在漳州有张贞一个师，那都是敌人的薄弱部位。扩大苏区，最好的方向是漳州一带。

之后，部队东指，途经瑞金时第一次见到刘伯承同志。他当时兼红军学校校长，给我们做了报告，讲了战役、战术问题，至今我还留有深刻的印象。在瑞金稍事停留后，便又继续前进，经长汀，走南阳，一鼓作气攻克龙岩，消灭陈国辉旅，乘胜直取漳州。

当时九龙江发大水，毛主席亲自指挥我们东征，他和林、聂同我们一起行动，从天宝大山上杀下去，和我们一起进的漳州城。

在漳州缴到一架飞机，林、聂都很高兴，在从漳州撤退以前，他们坐上这架飞机，到厦门上空散发传单。驾驶员是临时抓的差，对于飞机的机械性能、维修程度毫无所知。全国解放以后，一次我陪同聂帅下部队视察，谈到这件事，我说：那次飞行是很危险的。他笑道：那时都很年轻啊！

我们攻打漳州时，三军团正在水口与敌人激战。我们打完漳州后，即挥师西向，参加水口战役。聂荣臻此时对部队进行了战斗动员，说：这一仗打好，对守住苏区的南大门，对保卫大庾岭根据地，有着重大的意义。部队在龙岩、漳州连战连捷，士气正盛，经过聂政委的简单动员即与敌人展开了厮杀，配合三军团和五军团把敌人大部击溃，歼灭了几个团。

接着部队继续北上，经于都、兴国，占领宜黄、乐安，在宜黄仙人桥打了一个大仗——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重要战斗。敌人是五十二师、五十九师。我们在仙人桥附近的大山中设下了埋伏，等待敌人的到来。打这样重要的一仗，我真感到我们团领导力量单薄。还是打漳州前，团长向玉成伤口发作，到医院养伤。打完漳州后，上级又任命朱水秋同志担任团长，不几天他负伤住院，主官又只

剩下我自己。也就在这个时候，聂荣臻政委来到我身旁，亲自指导我指挥战斗。他言传身教，使我受益非浅。记得当敌人进入伏击地域时，我有些沉不住气，几次提出出击，但聂政委总是不动声色地说：“不忙，不忙！”直到敌人全部装入“口袋”中，他才要我们发起冲锋。我们与兄弟部队一起，痛快淋漓地把两个师的敌人全歼，并在毛毛细雨、蒙蒙重雾中搜捕敌五十九师师长陈士渠。陈士渠是个麻脸。聂政委亲自下达搜索麻脸的通令，叫部队漫山遍野寻找麻子。这位麻脸师长到处乱钻，也未能逃脱聂政委撒下的天罗地网。

仙人桥一仗，我们还头一次缴到了轻机枪，装备了部队。在这以前，我们红军比较好的武装是所谓“花机枪”——冲锋枪。我们团一下子缴到三十多挺捷克式轻机枪，真是令人兴奋极了。这在当时可是一项了不起的装备呀。全团十几个连，每连都配上一挺，还有近二十挺支援兄弟部队了。在配备这些武器的时候，聂政委还专门给我们作了指示，说：机枪班的班长要选共产党员，最低限度要选共青团员。

聂政委在军团战斗总结中，表扬了我们三十二团，说我们在没有团长的情况下完成任务好，抓的俘虏多，特别是缴了那么多轻机枪，说我是“模范团政治委员”。可是我觉得，这一仗打得好是与聂政委亲临一线指挥，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发起冲锋分不开的。

总结完仙人桥一仗，聂政委接着就进行草台冈战斗动员。

草台冈战斗，主要敌人是陈诚、罗作英部。我在冲锋的时候腿部中弹，这是我头一次负伤。被抬下来后，没有看到林、聂，直接转进了医院。战斗结束后，林、聂派人慰问伤员，专门找到我，转述了聂政委的话：“希望你出院后一定要回原部队，我们都很喜欢你。”那时，一旦出院，凡是在去向问题上没有特殊要求的一般是统一分配。由于首长舍不得我离开，我也舍不得离开首长，伤好后，经过再三要求，医院同意我回原单位。比我早出院的老搭档朱水秋团长专程来接我，我们回到部队，见到陈光师长、刘亚楼政委，大家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不久又见到林、聂。聂政委笑着说：“好哇，好哇，你回来了，这太好了。”

至此，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了。

而后，在滕田进行了统一整编，取消了第三军和第四军的番号，红三军改为一师，红四军改为二师，一军团下辖一师、二师^①。一师下辖一团、二团、三团。第三军七师改为一团，第三军九师改为二团。第十二军三十六师改为三团。二师下辖四、五、六团。第四军十师改为四团。原第四军十一师改为五团。十二军三十四师改为六团。后来，少共国际师^②也归一军团指挥，这个师在遵义会议后

① 一师师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二师师长徐彦刚、政委胡阿林。

② 少共国际师师长吴高群，政委冯文彬。

编入了第一师和第二师。

整编后，一军团六个团在滕田召开了运动大会，六个团争夺军政文体各个方面的优胜。这次比赛，五团第一，四团第二。会上颁发了三面锦旗：“模范工作的红五团”，“英勇冲锋的红四团”，“牺牲决胜的红一团”。

运动大会后，即开始了第五次反“围剿”

开头，一军团在北线，我们四团在吉水以东的乌江，根据上级命令，四团统一指挥六团，消灭了敌人一个旅。然后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北线，后在大雄关战斗，又保卫广昌。在广昌鸡公山战斗中我的腿部又负了伤，这是第二次负伤了。由于每次负伤都伤在腿部，在后来的长征途中聂荣臻政委和我开玩笑说：“看来，你不会利用地形地物啊。”我不服气：“谁说？”聂政委笑了笑：“为什么老是打到腿上呢？那还不是因为你伸起腰板跑吗？”那时战斗激烈、频繁，伤亡很多。我伤愈即返部参加战斗。这时，部队转到东线的福建长汀、连城，在温坊打了一仗。

为了鼓舞士气，温坊战斗后一军团又进行一次运动大会，四团拿了第一。

第 一 章

长 征 （上）

别了，于都河

接到战略转移的命令，部队要撤离苏区了，一夜没有睡好。

清晨，早操活动的时候，我爬上了高高的山坡，只见群峰连绵，望近处，那薄雾荡漾的山腰间，一排排高大的松柏树，挺拔劲直，苍翠欲滴；在它脚下，那蜿蜒千里的于都河，发出“哗哗”的水声；河两岸，漫山遍野的矮草和庄稼沙沙作响，仿佛都在低声叮咛，向我们道别。

是呵，我一想到要走，要离开苏区，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团长耿飏同志是湖南醴陵人，我是福建闽西长汀人，但是我们与千千万万红军战士一样，都对瑞金，对苏区的乡亲，有着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

苏区人民给我们的印象太深刻了。

几年前，当我们的队伍来到于都河畔，我们这些异乡的红军战士，初到江西，人地生疏，可是，这里的乡亲们没有把我们当外人，甚至待我们胜过亲人。

他们宁可自己一家挤在一间小屋子里，也要腾出宽敞的屋子让我们住，他们帮我们补衣裳，教我们打草鞋，象逢年过节迎亲人一样，给我们捧来香喷喷的红薯、红米饭和可口的菜肴，大娘、傣嫂还跑来抢着洗衣服，烧开水，乡苏维埃的同志还捧来铺草……我们一起刷标语，开联欢会，一起演节目，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蒋介石，特别是在打土豪、分田地时，笑声欢语，此起彼落，使我们这些不是江西籍的同志感到不在家乡，又胜似家乡。

我们在这里住下后，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一起战斗，结下了更深厚的情谊，真可以说是同生死、共患难了。无论是谁想要把我们从感情上割开，都是不可能的。

当蒋介石挥舞屠刀，血腥镇压时，他们团结一致，坚信共产主义会胜利，苏维埃的旗帜一定会插遍全中国。为了保卫苏维埃，配合红军战斗，各村各乡都组织了自己的武装，从二十五岁到四十五岁的青壮年，组成了赤卫队，十五岁到二十四岁的青年组成了少年先锋队，这些不脱离生产的群众组织，归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门领导。他们的武器很差，只有极少的步枪，大多数是土枪、鸟枪、梭标、大刀……但是担负着站岗、放哨、查路条、捉土豪、支前、作战的任务。正是由于有了他们这支队伍，加上地方部队

和主力部队，我们才结成了强大的武装力量。

在蒋介石实行经济封锁，我们极度困难的时刻，他们勒紧裤带，节衣缩食，支援部队，成了我们的坚强后盾。那时粮食缺乏，部队定量不断减少，甚至每天只能吃八两至十两。盐更困难，最紧张的阶段，根本吃不到食盐。至于布匹和西药的供应，就更谈不上了。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口号，把自己织的土布，省下来的粮食（他们宁可自己吃红薯、喝菜汤）以及自己熬出来带苦味的硝盐送到部队，正是这些感人的行动，激励着我们在前线浴血奋战，这是战争最大的动力。

不仅如此，他们还坚持生产，坚持支前，始终不渝地为巩固革命根据地尽力。他们都以把自己的亲人送到部队参加红军为光荣。记不清，我看到过多少次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当红军的感人场面，可见扩红运动确实搞得热火朝天。苏区少先队和赤卫队有的整连地参加了红军。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苏区还先后成立了少共国际师，工人师。少共国际师，是由苏区的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的。

苏区是这样的好，苏区的人民是这样的亲。现在，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进行战略转移，我们即将暂时离开这里，离开这熟悉的山山水水，离开这朝夕相处的苏区人民，叫我们怎能不激动？怎能舍得？

子弟兵眷恋老区人民，老区的乡亲也深深地怀念着他们的红军子弟。当我爬上山巅，展望这滔滔的林海，不由

得想起几天前的一件事来。

那天，我们在闽西连城温坊打了一仗，战斗结束后，在回钟屋村的归途中，碰到一位福建长汀同村老乡，他回到长汀后，把这消息告诉了乡亲们，这个消息自然也传到了我的家里。我自一九二九年一月参加革命以后，六年了，没和家里人见过面，音信全无，他们听到我的消息，非常高兴。

村里有人提议说：

“我们的孩子们为了苏维埃，在那里流血、吃苦，我们还不赶去看看他们！”

于是一个完全出于自觉的劳军热潮掀起来了。在我的老家——福建长汀宣城下畚乡张屋铺村上上下下都忙着磨炒米，纳鞋子，凑鸡蛋，装薯干……整整忙了几天。最后，他们推选了十几个代表，满载着乡亲们的情意，不远百里，爬山涉水，越岭过桥，寻找我们这支部队。这里面有我的父亲。还有我远房堂哥杨能梅的妻子。他们大部分是军属，每人挑了一副担子，担子里盛着猪肉和闽西的土特产——笋干、芥菜、菜干、还有鸡蛋、红薯干、豆子、萝卜干、兔子、活鸭、活鸡等，当然少不了一双双刚纳的鞋子……真是应有尽有，五光十色。

那时我们红一军团二师四团驻在钟屋村进行休整，战士们吃过早饭在操课，我和团长耿飏同志正在阅读文件，突然，团部的通信员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

“报告政委，他们来了，挑了许多东西！”

“谁来了？还挑来了东西？”我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

通信员眨眨眼，眉毛一扬说：“乡亲，他们担着不少的慰劳品！”

“是钟屋村的乡亲？”我站起来问。

通信员摇摇头说：“不，我问了，是你老家的。”

我越听越糊涂，正纳闷，耿飏同志拉着我的手，说：

“走，政委，我们去看看！”

当我们急匆匆走到门口时，我怔住了。

果然，门外站着十来个长汀老乡，旁边还放着十来副盛得满满的担子。没待我走到外边，他们便争着叫我的小名：

“能俊！”

我急步上前，高高兴兴地与他们逐一握手，当我与五六个乡亲打完招呼，左右看时，意想不到的的是眼前出现了我的父亲。

此刻他呆呆地站在一边，用热烈而又深沉的眼神看着我，也许是太兴奋了，他站在那里一步也不向前挪动。

我一步跨过去，高声叫着：“爸爸！”

这时，他眼泪止不住地从眼眶里滚了出来，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说：“能俊，你走，怎么也不打一声招呼，把你妈妈和我想得好苦。”

“那时情况实在紧急，再说，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我用手抹去他脸上的泪珠，笑着说。

父亲这时抬起头来看了看我说：“六年了，你一去不回，也不回来看看你妈，谁知你到哪里去了，真把家里人都快急死了！”

一句话，触动了我。可不，远在一九二九年，我弃学到乡下参加了轰轰烈烈的闽西暴动，之后，连父母那里也没有来得及打招呼，便跟随起义队伍（后正式编入红军序列）在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的领导和指挥下，且战且走，来到了江西和湖南革命根据地。一晃已经近六年了。如今，父亲又来到我的面前，我怎能不为此激动。于是我扶着父亲，眼里滚动着泪花，笑了笑说：

“爸爸，你看我身体怎么样？”

父亲也笑了，用手掌拍拍我的胸脯说：“可不，长高了，也长结实了，就是瘦了点，人倒还精神！”

耿飏同志也高兴地插上来说：“老伯，你儿子和我在一起，当团政委。”

我这时向乡亲们介绍说：“这是耿团长，他是湖南人，我们象亲兄弟一样，天天在一起。”

耿飏同志笑了笑，谦逊地说：“乡亲们爬山越岭，从那么远跑来看望我们，我们非常感激，非常高兴！”

在欢快、热烈的气氛中，我们与老乡一起进屋，互叙别后，中午还请来驻地的乡亲，一起会了餐。那顿饭自然

是十分丰盛的，有鸡，有肉，我们都分别尝了尝，与此同时，我们把一部分慰劳品分给师首长和各营，让他们也改善了一下生活。由于蒋介石进行了五次“围剿”，经济上实行封锁，苏区人民已是够困难的了。正如大河干涸，小河没了水，人民群众生活困难，部队就节衣缩食，这也很久了。今天，听说福建长汀的乡亲们爬山越岭，送来了东西，无不感动。我们也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请乡亲们到连队来看看战士，谈谈家乡的情况，讲讲他们对子弟兵的期望，使上上下下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乡亲们住了三天，部队又要开拔，他们不得不走了，分手前，相互道别，互说珍重，彼此依依不舍的那种情感多么真挚啊！当我们把他们送到山边岔路口时，忽地想到乡亲们回去身边没有盘费，是啊，一路上他们要翻山越岭，靠两条腿，走上两三天，身上没一个钱怎么行呢？然而那时我们红军不打土豪就没有钱，家属来队极少，更没有发放路费的规定，至于每个人的积蓄根本谈不上，即使每月分一点伙食尾子，抽烟的，也都化得精光，于是只好临时凑了。我不会抽烟，衣服口袋里还有五角钱，就先把它拿了出来，在场送别的同志都把口袋里的钱倒了出来，总算凑了几块钱，交给乡亲们作了盘缠。

他们要走了。这时忽然听到旁边的一个伙房里的小鬼喊道：“司务长来了！”

我猛回头，可不，我的堂哥杨能梅来了。

原来能梅嫂子和父亲一起来队时，正巧能梅派差出去了。那时节，交通、通信都很不便，他已走了几天，也没法找。本想让能梅嫂多住几天，好让他们夫妻畅叙一番，怎知部队要走了，他们只能都回去。能梅嫂子在村里是个支前积极分子，她自然想得通，当早晨送他们上路，我有意过去打个招呼时，她高高兴兴地说：“莫关系，等革命胜利了，能梅回来，再好好讲讲。”他们上路了，开始，我总为她风尘仆仆，迢迢百里，到此不能见丈夫一面而感到遗憾。现在，能梅来了，我可从心里高兴。

能梅走上了山坡，他首先看到了乡亲，发狂似地奔过来，问长问短，但是当他转过身来发现人群中是他的妻子时，脸刷地变成了块红布似的。

还是嫂子老练，不愧是个妇女干部，她走到能梅跟前，伸出手来说：“能梅，你回来了，刚好我要回去了！”

这时能梅也高兴地伸出了手。

嫂子见他还放不开，就一把握住他的手，摇了摇说：“你不在，同志们都说了，你干得不错，我放心了，家里事你莫操心了，妈由我照顾，好，我走了！”

就这样，这位可敬的嫂子与丈夫匆匆见了一面，又匆匆分手了。

他们走了，走了一小段路，又回过头来，说：“希望你们多打胜仗，等胜利了，回家来看看！”

可是，这一阵子，仗越打，我们越被动，越打根据地

越小，这怎不叫人纳闷。

家乡的亲人盼着我们回去看看他们，可我们越走越远了，而今天我们还要大踏步地西去，不仅离老家远了，离苏区的亲人也远了。

黄昏，当夕阳的余辉，投射到碧波涟漪的于都河上时，我们列队要从这里出发了。虽然这次战略转移，由于时间的仓促，除各部队内部传达动员外，已经没有时间和群众开告别会，但是根据地的群众凭着多年来的斗争经验，还是从我们的行动上感觉出来了。他们悄悄地作了准备，不约而同地聚拢来了。

这是一个永远也不能忘怀的场面。

红旗猎猎，战马嘶鸣，整齐的队伍站在河对面的草坪上。源源不断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汇拢来。他们扶老携幼，来到于都河畔。乡亲们有的把煮熟了的鸡蛋塞到我们手里，有的把一把把炒熟的豆子放到我们的口袋里。有的拉住我们战士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有的止不住地“呜呜”哭了起来。

我正在和一营的几个干部谈着事，突然，人群中钻出我的房东大娘来。

房东大娘今年六十多了，一头白发，他三个儿子都当了红军，两个牺牲了，一个当了干部，显然，她看完儿子，又到我这里来了。

我赶忙迎上去，高兴地叫了声：“大娘！”

大娘把用一块小白布包着的東西遞給我。

我接過它，打開一看，是兩個熱氣騰騰的紅薯。

她說：“孩子，你路上吃！”

我手裡捏著紅薯，眼睛濕潤了。

是的，兩個紅薯倒不是什麼珍貴的東西，可是在蘇區連續遭到破壞，糧食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大娘捧出兩個紅薯來，真是捧出了大娘的一片心啊。

大娘告訴我，地窖裡藏了一筐紅薯，聽說我們要走，選了几个趕忙燒了，他兒子一份，我一份。

此刻，我難以用言語表達我的感激之情，捧著紅薯，又深情地叫了一聲：“大娘！”

聽得我叫大娘，她高興地笑了，拉著我的手說：“好好打仗，大娘等著你們回來！”

我點了點頭。

軍號響了，我們紅四團，邁出了戰略轉移的第一步。這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

我們離開了駐地，穿過一條大路，踏上了寬闊的于都河橋。

橋下的水徐徐流著，我們的隊伍從橋上緩緩地通過，前不見頭，後不見尾，兩旁站了不少的群眾。

夕陽西沉，群山轉暗，隊伍越過一條長長的土路，轉過彎來，向著西南——我們面臨的第一道封鎖線挺進。

向前，向前，迎著蒙蒙的暮靄，聽著那越來越小的水

声，渐渐地，那声音被急行军的脚步声代替了。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于都河畔的乡亲，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战斗、行军一年零两天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始！

战 略 转 移

走了两天，虽还是在苏区行军，但为避开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我们一般都还是夜行晓宿。

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们走了一段路程，趁着月色，又过了大大小小好几道河，翻了好几道山。队伍仍在悄悄地前进，我想，出发前上级交给我们四团的任务是担任前卫，几天来没有发生什么情况，真是令人高兴！不禁又想起了我们红四团的光荣历史：是啊，这是红军中一个老团，它的前身是叶挺的北伐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参加了南昌起义，一九二八年一月在湘南参加了“湘南暴动”，后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司令朱德，党代表陈毅，参谋长王尔琢。一九二八年四月底，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带着这支队伍，开赴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暴动的队伍、井冈山的红军会师。随后经过几次整编，到一九三三年红军在江西永丰县藤田的整编中，这支部队又编为一军团所属的第二师四团。就在这个时候我调到四团担任政治委员，团长是肖桃明同志。肖桃明同

志是湖南来阳人，参加过湘南暴动，打仗非常勇敢，在第五次反“围剿”神岗附近的大雄关战斗中光荣牺牲。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指挥员。他牺牲后，耿飚同志来四团任团长。

此刻，我们正行进在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上，谁也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走着。

前面的队伍突然停住了。通信员跑来报告，说是前面奇形怪状的岩石阻碍着队伍的行进。耿飚同志与我商量后，命令组织小分队排除路障，大部队原地休息。这时，两个江西籍的战士气呼呼地跑来，其中一个说：

“政治委员，我们已经走了两天了，到底要到哪里？要走多久？”

“同志哥，向西南方向行动，冲破南线敌人的封锁。有力地打击敌人，保卫老苏区！”我说。的确，虽然这次重大的行动以前，师部找团以上干部接连开了几次会，但是具体的行动计划、去向、任务，也就是这些。当然习惯在江西苏区战斗、生活的战士，是不容易一下子想通的，尤其江西老俵，他们舍不得离开生他、养他的根据地。我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耐心地告诉他们，这是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是为了粉碎敌人的疯狂“围剿”。我化了很大的力气，总算把两位老俵哥说服了。他们最后高高兴兴地走了。

队伍又前进了。我们踏着月光，通过了苏区的边界——新坡，前面就是白区了。这时传来军团命令：为了进入到

敌人深远的后方，仍需强行军。命令还要求：提高警惕，加强戒备，严防敌人袭击。为了避免敌人发觉我们的行动，部队一律改用代号。

夜，已很深了。秋天山区的夜晚，显得有些凉爽，清澈似水的月光，洒遍了近村远庄。部队找了一个山沟就地宿营。走了几十里路的战士，疲惫得一倒下就睡着了。但是，我和耿飚同志各自躺在门板上，翻来复去都睡不着。我还是在想白天那两位老倭哥的话。

望着这漆黑的屋顶，迎着这窗外射进来的月光，我思绪翻腾。

是的，此时此刻，我的思想象插上了翅膀，飞过了层层的高山，越过了丛丛的林海，来到了闽西老根据地，重又见到了熟悉的乡亲。我想着，想着，又想起了六年前刚刚投身革命的那段艰苦而又难忘的历程……

我家里穷，叔伯凑钱供我上了小学，上了福建省立中学（在长汀）。在中学，我从我的老师张赤男同志那里接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张赤男是一九二七年底到长汀城任教的，和我同住在学校附近的张家祠堂里。他十分健谈，经常同我们谈到深夜。在那一闪一闪的油灯下，他用那朴朴实实而又娓娓动听的言词，向我描绘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前程。

蒋介石叛变后，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正在重新聚集力量。闽西的共产党在张鼎丞、邓子恢等同志的领导下，

于龙岩、永定等许多地方发展了秘密党员和农会，汀江两岸几个县的农民运动也正在发展，特别是长汀，原来是州府，地处武夷山下，毗邻江西，傍山依水，是这一带经济、文化的中心，地理位置很重要，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想法，需要尽快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暴动，实行武装割据，把龙岩至长汀的闽西农民运动联成一片，以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

一九二九年一月初的一天晚上，张赤男同志对我们说：“我看你们别念书了，跟我去闹暴动，缴民团的枪。”闹暴动是我们向往已久的事，这下子可盼到了。我在这股革命浪潮里，投入了红军队伍，从此成为一个红军战士。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暴动的胜利，有两个区开了群众大会，分了地主的粮，随后我们的队伍进了闽西的深山老林。哪知，这里大都是没有开发的原始森林，人走进去，抬头看不到天空，绵密的枝叶疏疏落落地滴着水珠，地上积着腐烂的树叶，到处都留有野牛、野猪的蹄印，白天也似黄昏，入夜蚊虫成群，虎啸狼嚎。我们住在山上，搭草寮，吃野菜，过着艰苦的日子。也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与敌人周旋，任凭困难万千，却斗志旺盛，信心十足。伴着风啸林吼，我们透过树叶的点点缝隙，仰望星空，憧憬着斗争的胜利。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经过两个月的艰苦斗争之后，毛委员、朱总司令亲自率领红四军进入了长汀，在长汀城南

十五华里的长岭寨，消灭了敌人一个旅，而且击毙了国民党旅长郭凤鸣，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他们的到来，犹如在闽西这堆干柴上燃起了熊熊烈火。张赤男同志趁此机会率领我们下山进城，组织了全面的农民暴动，使几个县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到处都打土豪、分田地、烧契约。农民翻了身，全都扬眉吐气了。他们情不自禁地唱出这样的歌：

工农红军到闽西，
砸开穷人枷和锁，
村村高唱暴动歌，
千人唱来万人和。
打土豪，分田禾，
田契债据付把火，
政权归还工农兵，
红旗要插全中国。

在红军停留闽西的这段日子里，不少的区、乡建立了苏维埃、暴动队、赤卫队、儿童团、妇女会等组织，长汀建立了全省第一个红色政权——县苏维埃政府。红军还进行了整编，而且赶制了几千套灰布军装，从此全军有了统一的军服，红军战士容光焕发，欢欣鼓舞。

又过了两个月，毛委员率领红军又一次入闽，扩大了红色政权，那里出现一片崭新形势。正如后来毛主席诗词

所说的那样：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在一九二九年胜利的形势下，张赤男同志领导的四支赤卫队组建成闽西工农红军第三路第四团、第五团……

这时耿飏同志翻了个身。他身下的门板嘎吱响了一下，把我的思绪打断了。他大概也没睡着吧。我没有做声，望着黎明前闪着微光的屋顶，心想：当年在闽西深山里，深夜面对林海，人少力微，四面都是劲敌，但那时，有着井冈山上红旗的指引，我们壮大了，我们胜利了。今天，我们面对着战略转移这个重大行动，又将是怎样一个新的发展形势呢？

这次战略转移，确实来得比较突然。那是九月初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吃饭，通信员给我送来一份《红色中华》^①，报上刊登了洛甫同志^②的一篇文章，文章中透露了中央红军将采取“新战略”的消息。我当即放下手头的饭碗，去找我的上级、二师政委刘亚楼同志。在一间小屋里我找到

① 当时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

② 即张闻天同志。

了他，他也正拿着《红色中华》在看。原来，事前他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我们推测：这决非洛甫同志一个人的意见，是中央的决定。当然，为了实现新战略，暂时离开根据地，打入敌人深远的后方，去消灭敌人，从而粉碎敌人“围剿”，推动抗日斗争，达到保卫苏区的目的，这是可以讲得通的。但是，这个情况来得突然，对如何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提出了一个艰难的课题。

“等着上级部署，自己先把思想搞通！”刘亚楼同志把报纸往桌上一放，笑笑说。

我告辞出来，一路上想着这个“新战略”，盼着具体任务早点下来。

但是一天、两天，仍然没有动静，眼看九月份快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十月份已经过去好几天了，突然，师里通知团长和我去开会。在师部召开的会上，师长陈光 and 政委刘亚楼两同志传达了上级指示精神。他们说苏区处境困难，这是一次战略转移，我们要向西出击，冲破敌人封锁线，到敌人的后方去狠狠打击敌人，以便保卫老根据地，发展新根据地。至于去哪里？多少时间？我们随时听候上级的布置和调动。会后，我们用了更多的时间研究了部队战士补充及装备的补充问题。差不多整整忙了一个星期，我们四团接了不少新兵，每个干部战士都发了一件崭新的灰色棉上衣，除了枪支弹药外，还有二至四个手榴弹，两至三双草鞋，几斤粮食，为了防空袭，背包上头还插了一

束树枝当伪装。

在根据地象这样大量分发枪支弹药和装备器材，以往从来没有过。这使战士既兴奋，又纳闷，为什么一下子发这么多东西？难道有什么新任务？大家纷纷猜测、议论，别说战士，就是团里的领导也只知道要出发，具体的是什么时候，什么任务，也不清楚。这时上级只是不断传来“作好准备，明天行动”的命令，其它一无消息。十月十五日中午，师部又集中团以上干部开会，会上通知明天下午出发，命令我们四团担任前卫。这时，我心上悬着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夜 行 军

深秋的夜风，从闽粤丘陵上缓缓吹来，它带着瑟瑟凉意，吹着夜行军的队伍。

我们在摸黑行军。队伍隐在山影里，看不到一点行迹。偶而能听到草鞋踩在石子路面上发出的“唼唼嗦嗦”的响声，风从林梢上吹过，发出象大海接近平潮时那种节奏缓慢的低喧。远处，瀑布“哗哗”飞溅，四野秋虫唧唧，时而闪亮一丝光，那是伏在草丛里的萤火虫飞起来了。“啪啦”一声，不用问，又是谁跌倒了。

夜行军，许久没有这样连续走了。我们面临的是生疏的地形，漆黑的夜幕，午夜过后紧紧袭来的困倦。可是为

了预防敌机的袭扰，必须夜行军。从离开于都河，我们一连数日，晓宿夜行，把整个作息时间都颠倒了。

走着走着，我不禁想起了往日的行军，那是何等的畅快，何等的气概！活捉张辉瓒，横扫七百里，奔袭漳州城，回师赣南……哪一次不是踩着灿烂的阳光，挥着火红的战旗，浩浩荡荡，一路行军，一路战歌，一天百把十里？！都是豪情满怀，不知不觉地到了目的地。那是多么令人兴奋和值得回顾的啊！

可现在，时间已过半夜，我们还是摸黑在山腰里转，一个紧跟一个，轻轻地、悄悄地直往前走，队伍里一片沉寂。

从前天开始，我的马让给一个病号骑了，马夫老谢，闷着头，牵着缰绳在前面迈着大步走着，年轻的警卫员白玉林则佯闭着眼，缓缓地拽着马尾巴跟着。

走着，走着，突然队伍停住了。

这是常有的事。遇到隘路、小桥，往往行军受阻，前面的放慢了脚步，后边拉不开步子，得稍稍等一等，要是碰上了“拦路虎”，那等的时间更长，得等到前卫开辟好通路，才能让后续部队前进。一晚上，这样走走停停要碰上好几回。

等了好长一段时间，还不见动静。小白抓着马尾巴，已经发出了鼾声。马背上的病号，也沉沉地垂着脑袋进入了梦乡。老谢岁数大些，困意不如这些小青年，蹲在一旁，

拿着旱烟杆“叭嗒、叭嗒”地抽着叶子烟。再看看前面，队伍里的战士都在打盹儿，静悄悄地一个紧挨一个，后面的拉着前面的背包站在长长的羊肠小道上。

“到底怎么回事？前面的障碍排除了没有！”站了好一会儿，我等不及了，朝前走去。

当我来到前面时，几乎愣住了。

哦，原来队伍断“线”了——前面的队伍早已踪影全无。现在原地站着的几十个人，他们一个挨着一个，手拉着前面的背包。仔细一看，最前面那个小战士趴在弯角的地方睡着了，而后面的同志由于黑夜蒙蒙看不清楚，以为又要停住等了，便习惯地站住了，时间一长，也就打起盹来。

这种场面，这种行军途中的立着睡觉，过去有过，但是极少，现在却多了。

于是，我轻轻地拍拍睡在斜坡上那个小战士的肩膀。

他醒了，睁开眼睛来看了看我们，再往前一瞅，吃惊地发现前面的部队早就走了。说实话，我们有些心疼。可不，象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在有钱人家，还在父母身边撒娇呢！可我们的战士，小小年岁就在风里雨里摔打了。我扶了他一把，轻轻地说了一声：

“走罗，前面还有仗打！”

“在哪里？”一听说打仗，他揉了揉眼睛，精神一振地问道。

我笑了，说：“往前走，就是为了打仗，消灭敌人！”

他憨厚地笑笑，然后迈开大步高高兴兴地向前赶去。

他身后的一字长蛇阵又开始动了，于是我们加快了步子，追赶着前面的队伍。然而夜行军，照明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说已影响了我们的行动。怎么办呢？我们觉得，眼下敌人还离得很远，是可以照明行军的，关键是没有照明器材。

近处，传来一声报晓的鸡鸣。

鸡鸣，唤起了战士们愉快的微笑——到宿营地了。

部队宿营了，我和团长耿飚同志商量，如何解决照明问题，并把它交给群众去讨论。

群众里，蕴藏着巨大的智慧。

新的夜行军又来了，面临的是一座更加陡峭的大山。可今天，黑夜难不倒了，你看，一路行军，一路火光。

那是什么样的照明“器材”呀！

有的把圆圆的干竹破成几片，合在一起再一节一节地捆起来点燃，这样既不怕风吹，又很耐燃，一个班一把，简简单单，就照亮了整个行程。如果打土豪搞到一桶两桶洋油，他们就用较大的竹筒，在上面打个洞，然后里面灌上洋油，一个班有一个也就够了。还有一种是松明灯，这是山区老乡常用的。团部通信班、营部、连部都有两三个马灯，过山隘、桥梁，就把马灯集中起来给部队照明。

总之，五花八门，战士们能找到什么就用什么制成照

明器材，越简便越好，有照明器材，走起来就快多了。

这样的夜行军，气氛迥然不同，从下往上看，火把、灯光，蜿蜒曲折，似上云霄；往下看，盘盘弯弯，仿佛是缠住大山的一条火龙，不停地游动着。一会儿，某一段火光隐没了，那是他们走进了密密的树林里。过了一会儿，那火光又从暗处钻了出来，这是他们走出密林的情景……

走着走着，我们这条火龙有时候突然不翼而飞。

“往后传，把火熄灭，不准打电筒，不准大声讲话！”这是离敌人近了。

这时，指战员在行进中虽然失去了照明，但敌情犹如兴奋剂，使他们一扫疲惫，前进的步伐迈得更快了。

我们进入信丰地区，上级传来命令：蒋介石调兵遣将，在江西安远和信丰一线，以五岭山脉作屏障，修筑了许多碉堡，布置了一条封锁线。我们一定要突破这条封锁线！

这些碉堡大都筑在公路的两边，也有傍山依水而筑的，一般用砖石砌成。红军战士戏谑地称它们作“乌龟壳”。蒋介石满以为他们有了“乌龟壳”可以拦住红军，派广东军阀余汉谋死守据点，在信丰至安远一线，放了几个师，怎知红军浩浩荡荡，士气高昂，连续走了几天，正愁见不到敌人，求战心切之下，在古陂、安息打了一天一夜，把敌人打了个稀里哗啦。在古陂我们四团对付一个营，连走带

揍把敌人消灭了，缴获了枪支、弹药、文件等物品。这次战斗结束后，团政治处经上级批准，给大家分发战利品的时候，还给了团长和我每人发了一条薄薄的丝棉被。正因为这是战利品，我觉得是有纪念意义的，所以很珍惜它，长征路上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在雪山、草地就是用它御寒的，至今我还保存着它）。

信丰河边的战斗规模不算太大，总共消灭了敌人一个团，可这是长征以来敌我双方的第一次对阵，而且这一仗打得这么利索，速度之快也是让国民党震惊的。蒋介石吹嘘的铜墙铁壁，结果成了豆腐渣。当我们的战士愉快地唱着战歌，离开信丰河边的新田、古陂圩时，只见背后升起一团团火焰。原来，这里的老乡对“乌龟壳”恨之入骨，他们看到我们红军战士打下了“乌龟壳”，消灭敌人时，在拍手称快之余，用破木板引火，焚烧了“乌龟壳”。

一团团烈火在燃烧。我们在欢声笑语中，满怀胜利的豪情，离开了古陂圩。

但是，战斗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

当我们在信丰河边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敌人又为我们准备了第二个回合。

广东军阀不甘心第一回合的失败，又急急忙忙把主力集中在粤北一带，以图阻止我主力南下广东。

广东军阀陈济棠占领了乐昌，亲自赶到韶关，命令第一军的余汉谋调过头来扼守乌径，张达部固守大庾，他的

独四师和教导师进驻翁源，摆了个一字长蛇阵。我军乘胜前进，选了大庾与乌径之间的粤赣边境作突破口，我们刚一行动，敌人就慌了手脚，传来消息说，湖南军阀又仓皇地在湘粤边境的汝城（属湖南）和城口布下了第二道封锁线。在蒋介石的统一调拨下，湘粤二省军阀第一次貌合神离地携手对付我们。当时的部署是：湘军主力六十二师陶广部，在汝城东南的羊牯、连珠港、天马山、大桥一带布防，粤军李汉魂、叶肇部在城口驻守。可是，由于他们的兵是抓来的，无战斗力，而我军士气高昂，号称十万之众，挥戈挺进，所向披靡。我们红军轻轻一打，便如摧枯拉朽，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敌人第三道封锁线设在粤汉铁路沿湖南、广东一线，这时韶关这一线的铁路虽还没有修通，但由于有公路，敌人调兵非常方便。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湘、粤军阀布置了二十万重兵，企图将我红军消灭在粤汉铁路以东赣江以西，形势非常危急。

在这当口，军团首长命令我们四团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抢占粤汉路边的制高点——九峰山，以防广东军阀先期占领粤汉线上的乐昌，向我发动袭击和堵截，以俾掩护中央纵队和九军团等部队安全通过。

我们漏夜奔袭，一鼓作气抢占九峰山，时适天降暴雨，道路泥泞，行动困难。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同志的牲口掉了队，由于他体胖，徒步行军比较困难，我在雨中给了他

牲口，并派人送他到宿营地。

在九峰山我们激战一天，在完成了掩护中央纵队和九军团的任务后，又赶回军团部，接受新任务。

敌人的幻想没有彻底破灭，他们总是不甘心失败的，象赌徒进了赌场一样，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捞一把，蒋介石连输两盘以后，在湘、粤两侧苦心布置的第三道防线，又给我们红军彻底粉碎了。

进 逼 道 州

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之后，部队进到临武、蓝山一线，继续向西挺进。

我们刚到达祠堂圩不久，就接到师部的命令：

“薛敌^①率五师之众在我野战军后尾追，湘、桂两敌向道县^②、蒋家岭前进，企图配合薛敌截我于天堂圩、道县间。道县无大敌。我野战军为达到迅速先敌占领道县，渡过潇水，转入机动地域，打击敌人的目的。着你部立即由此地出发，经天堂圩，限明日相机占领道州县城，并拒止由零陵向道县前进之湘敌……”

道州，这是红军前进路上的咽喉要地，要占领道州，就必须先过潇水，道州城在潇水的西岸。

① 即薛岳。

② 即道州。

这里到道州，相隔一百几十里，前面有广西军阀的部队，后面有追击红军的部队，由江西而来的周浑元、吴奇伟的纵队到了宁远，都离道州不远，如果我们不能迅速赶到，两敌则可能先我赶到道州。即使我们明天赶到而不能迅速占领，两敌也可很快支援道州，给我们造成被动局面，使战斗成胶着状态。问题非常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迅速集合部队进行了简单的动员。战士们了解自己的任务，情绪很高。有的说：“三道封锁线都突破了，难道一个小小的道州还拿不下来吗！一二百里算什么？”

我们又向先头部队交代，要他们加强火力，加强行军中的侦察、警戒，明确指出，各级指挥员的位置要靠前，以便更迅速地了解敌情，下定决心，投入战斗。

时间是十分紧迫的，我们刚一布置完，队伍就出发了。

走了将近五十里，爬上了一个小山坡，我们突然遇到一群人，他们正从山下走上来，有穿长衫的，有穿短衫的，有挑担的，还有提篮的，看样子是赶集的，我们命令部队就地休息。利用这瞬间，耿团长与我向他们做调查。

他们似乎都有点害怕，耿团长扬扬手，请他们坐下，尔后递上纸烟，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他便问道：“从哪里来？”

坐在我旁边那个穿长衫的人连忙站起来，弯弯腰说：“回长官话，从道州来。”

见他们毕恭毕敬的模样，真有些好笑，我便说：“别这样，我们红军是老百姓的军队，你就坐下来讲。”

他也笑了，在场的人都笑了。于是，他们就消失了惧怕心理，争先恐后地向我们介绍起情况来。

从上级情报部门那里得来的情报和他们提供的零星消息，我们这才知道：

蒋介石自我们离开于都河以来，连输三局，并不服气，这次的赌本更大了。他亲自调动部队，把杂七杂八的军阀部队“统”在一起，又给何键戴了顶高帽子：“追剿总司令”；而且狡猾地表面上下令自己的嫡系薛岳、周浑元部队也统归何键指挥，总之恨不得让他一口吃掉红军。何键受宠若惊，如同获得圣旨，在粤汉路边上窜下跳，声言要在粤汉路、湘桂路一带与红军决一死战，彻底消灭红军于湘江、潇水之间。蒋介石看到何键如此卖命，心中更是高兴，又是电报嘉奖，又是电话鼓励……

随后，我们向群众作了一些宣传，就送他们走了。群众是拥护我们红军的，当他们得知我们是攻打道州的部队时，那两个挑担子的象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走了一段路，放下担子，又折回来，拉着耿团长的手说：

“长官，我还要告诉你一点，道县有一座浮桥，从这里去，进县城非得从桥上过不可。那桥是用船拼起来后用铁链子串起来的。你们要先抢得桥，才能够过去，他们（指敌人）要是知道你们去，会把桥拉过去的。那时，你们可以在晚上派人凫水过去，把桥放过来。”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

送走了群众，我们立即将这个情况告诉尖兵连，并就如何夺取浮桥，作了详细的研究和部署。

部队继续下山，走一段路，进了一条小街，这里街市繁荣，两边站着许多群众。他们看见我们红军，毫不惧怕，三三两两交头接耳，象是在议论什么，有的还提水倒茶，慰问我们。离开苏区一个月了，想不到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见到了群众热烈欢迎我们的场面。大家的情绪越发高涨，一个个昂首挺胸，步子也走得更齐了。

又过了两个山头，我们见到前面有座宝塔，一问，才知道，道州离这里还有一百里。我们一鼓作气，直奔过去，因为谁都知道，我们在和敌人赛时间，我们与薛岳谁快谁慢，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这次战斗的胜负。又走了五十里，全团在一个小树林里休息，我刚坐下，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唤：“卫生员，请你给我点药！”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在离开苏区时问我“到底要到哪里”的那个老倌。夕阳西下，嫣红的阳光照在他脸上，十分好看。本来胖鼓鼓讨人喜欢的脸蛋儿，现在显得格外淳朴、天真，不知是阳光的照射，还是连续行军的剧烈运动，脸色红红的，我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走了过去。

他见我过去，叫着“政委”要撑起身来，我一把将他按住，说：“坐吧，现在休息。”

他乐呵呵地笑了。抬起自己的左脚，象一个得了满分的学生，拿着自己的成绩单炫耀似地说：“看，一、二、三、

四、五——整整五门炮！”

我一看，可不，脚板整整齐齐的排着五个血泡。

“痛不？”我问。

他点点头，但忽然又摇摇头。没待我说，他们连指导员走了过来，说：“同志，走苦了你了，上药后，你跟在后面慢慢过来！”

“不，我能走，放了水，上了药，我还要走在前面！”他坚定地说。

说实话，我打从心里赞许他，我，作为一个团队的政治委员，为有这样坚强的战士而骄傲，忙问：“是党员么？”

小老倭忽地站了起来，两脚稳稳地站住，大声说：“不，政委，是共青团员。入党，我正在争取！”

我高兴地拍拍他的肩膀，说：“你一定会的。”

小老倭高兴地笑了，笑得那样甜，看得出，这是发自心田的欢笑。

当我们离道州还有二十里时，忽然听到“嗡嗡”的响声，抬头一看，几架飞机由后面飞来，耿飚同志一声口令：

“散开，隐蔽！”一刹那间，偌大一个队伍象孙悟空摇身一变，全部就地隐藏起来了，一个也看不见。离我们身边很近的一个战士，蹲在隐蔽处愤愤地说：“娘的！这些开飞机的不去打日本鬼子，单飞来打我们红军，有一天老子捉到，非剥他的皮、抽他的筋不可！”几个战士哄然大笑。

敌机盘旋了一阵，估计什么也没看到，无聊地在前面

的云端里消失了。敌机妄想侦察，扰乱我们的行军队伍，但落了空。

“前进”的号音一响，刹时间象从天上飞下来了神兵，战士们排成一路又飞速前进了。

夕阳西下，黄昏时刻，我们终于结束了一百几十里的急行军，赶到道县城郊。道州城位于潇水河西岸，城墙高，有水壕。我们在郊外，还捉到了敌人一个送信的家伙，他迷迷糊糊地闯进了我们的队伍，以为我们是他们日夜盼望前来支援的中央军，当他知道我们是红军时，口里直唤：

“不可能。”但是，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时，他才如梦初醒，脸色由白变红，由红变白，上下牙齿直打架。原来，住在城里的敌人，确实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只一天工夫，我们飞越二百多里，赶到他们鼻子底下了。

就着落日余辉，我和耿飚同志迅速地赶到潇水河边，拿起望远镜，观察河面和对岸的敌情。

河面上，空空如也，船只全被敌人弄到河那边去了。一眼望去浪花翻滚，一处一处的旋涡飞快地转动。潇水是一条又深又宽的河流。老乡提供的情报多么可贵！

正观察地形，电话铃响了。电话里响着师长陈光同志的湘南口音。他的浓重的湘南话，总是那样缓慢，军情再紧急，也是如此，给人以稳重、沉着的感觉。陈师长说，道州城内敌人只有一个连和几十个民团，无扼守准备，估计他们拂晓前会向蒋家岭逃窜，现已命五团在潇水上游架

桥北渡，你们四团的任务就是立即行动，泅渡过去，夺取浮桥，积极进攻！

部队集合起来了，我们进行了夺船的动员。

“谁会凫水，谁去把船弄过来？”团长耿飏同志站在队前，大声地询问。

“我会！”一个战士跳出来。

“我也去！”又一个战士跳出来。

“我也同去！”另外一个战士也站了起来。

一支夺船队伍组织好了：工兵排长率领工兵一班副班长和两个战士。

深夜十二点，一切准备就绪，全团开始行动了。

工兵排长率领着三个战士，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跳入了潇水河，敌人噼噼啪啪地进行还击，但终于被我们压住了。我们顺利地夺得了船只。天放亮时，在当地船工和老百姓的帮助下，我们架好了三四米宽的大浮桥。于是，突击部队开始过桥，迅速抢占东北两门，冲进城去，占领了天主教堂。这时，五团由潇水上游过来。红军完全控制了道州。当后续友邻部队和师直属队开进道州城时，我们才听到“嗡嗡”的飞机声。原来，蒋介石还不明真相，一个劲儿派飞机来道州侦察。就在他们忽高忽低地侦察时，红军战士的步枪打落了其中一架。两个猎人装束^①的飞行

^① 指穿着飞行服。

员，面如土色，跪在地上磕头、作揖，请求饶命，惹得我们战士哈哈大笑。

红旗飘上了道州城头，群众欢天喜地欢迎我们。街头巷尾，人山人海。他们惊叹着红军的英勇、机智。这时，离我不远有两个老人在议论。

一个摸着胡子有些不解地说：“子弹都不多，真奇怪，怎么总是打胜仗，真有本事！”

另一个很神气地说道：“他们日走一千，夜行八百，刀枪不入，他们还靠子弹打仗？”

.....

说话间，过来一群头发蓬松，衣裳破烂，身上散发着难闻的气味的人——这是刚刚解放的“囚徒”。

有人问：“你们怎么出来了？”

一个“囚徒”回答说：“沾红军的光，把我们放出来了！”

另一个“囚徒”说：“红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队！”

听着这些话，我向城隍庙走去，宣传队正在那里开群众大会，进行演出，给平民百姓散发衣物、粮食……这是我们红军的老传统了。面对着这个场景，我还在想着两个老人的议论。是的，我们是“刀枪不入”，这是由于我们与人民休戚相关，有群众的支援。试想，倘若不是两个挑担的老乡告诉我们关于浮桥的情报，又假如没有群众奋勇支援，为我们搭浮桥，我们就是三头六臂也不能这样快

地占领咽喉要地道州城啊！在老苏区，群众放哨、报信、抬担架、救护伤员已是我们司空见惯了的事。如今在新区道州，又出现了同样的情景，致使人民子弟兵所向无敌，可见井冈山留下来的传统，是多么珍贵！

血 战 湘 江

我们把道州交给一师，继续向西挺进。十一月中旬，我们接到命令，要我们日夜兼程突破湘桂路，占领界首拦阻广西军阀夏威的一个军。

师首长向我们交代任务时指出：第四道封锁线，是敌人经过精心部署的最后一道封锁线。它利用波涛滚滚的湘江水作为一道天然障碍，沿江一侧修筑了一百多个碉堡。

在这道天然屏障面前，蒋介石调集了近四十万大军，拼凑了五路所谓“追剿军”。

这五路的阵容是：

第一路“追剿军司令”何键部刘建绪率四个师与第二路“追剿军司令”薛岳率一个纵队扼守全县，同时急调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部队集中在兴安、灌阳以北，形成一个钳形阵地。

第三路“追剿军司令”周浑元率一个纵队兼程从道县方向奔来，尾追红军。

第四路“追剿军司令”李云杰，第五路“追剿军司令”

李珩率部分头从加禾、临武、蓝山向宁远、江华、永明尾追。

不用说，刘建绪与薛岳担任了这出戏的主角。他们企图利用湘江这一天然障碍，前后夹击，把我红军主力消灭在全县、兴县、灌阳那么一个袋形地域里。为了给刘建绪、薛岳助威，蒋介石还特意派了不少飞机在空中飞来飞去，不停地轰炸、扫射。

白崇禧于十一月十六日就趾高气扬地宣称：“我们能在湘江以东地区把他们消灭。”

当时我红军的情况是：离开瑞金时的八九万红军，由于一个多月的连续行军、战斗，减员很大，加之，当时“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从第五次反“围剿”单纯防御失败以后，仓促地进行战略转移，未能很好精简机构，队伍不精干，带着坛坛罐罐、笨重的物资，使部队行动迟缓。虽然，我们的指战员英勇善战，为了保卫党中央肯于牺牲一切，但是毕竟为部队机动灵活、主动出击、跳出包围圈增加了困难。

情势十分危急！我红军能否突破湘江，冲出敌人的重围，这是生死存亡的一仗！

红四团参加湘江之战，是从界首阻击夏威开始的。

夏威是广西军阀部队的主力，他依仗武器精良，目中无人，不可一世，殊不知他刚踏进界首，就遭到早到一个小时预伏在那里的我们一顿猛揍，把他打了个全线崩溃，

仓皇逃遁。我们正为初战胜利高兴的时候，又接到新的行动命令。

命令说：国民党何键部队先我红五团抢占了全州，五团在全州以南占领了觉山^①一线阵地，命令我团将界首阵地交给三军团六师，尔后连夜奔向觉山，和五团共同阻击向南之敌，掩护我军主力通过湘江和湘桂路。

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天刚蒙蒙亮，按照师部的命令，我团赶到了觉山。我们发现，除五团在公路以东占领了阵地，一师一团也已在公路以西的西半部占领阵地。我们遵照命令进入了公路及其两侧的正面阵地，与一团、五团并肩战斗。正面的敌人是刘建绪的三个师。

这一天清晨，天气晴朗，银霜遍地，秋风萧瑟，寒意袭人，我们站在觉山上，察看了周围的地形。觉山，北距全州三十来华里，它紧靠公路边。南面，离我军控制的湘江渡口五十多里。一条公路与湘江平行走向，公路两侧是起伏不平的丘陵，有几座互相孤立的山岗子，比较难守。连绵起伏的丘陵地上，长着疏密不匀的松树。觉山是扼守这条公路的高地，是敌人进入湘江的咽喉要地。我们要守住的就是这条通道。如今公路旁稻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但树叶还没有脱落；满山的松树和一簇簇的灌木丛，约有一人多深，刚好成了我们的天然隐蔽物。看样子，我们一

^① 即脚山铺。

定要在这片山岭上守住，否则，山后一片平川，无险可守。

天渐渐亮了。团长耿飏同志和我把部队布置好了。他近来由于一直发病打摆子，忽冷忽热，面庞清瘦，身体虚弱。这时，我劝他在后面稍作小憩，我到前面指挥。耿飏同志却说什么也不肯，带着病也要站在自己的指挥位置上。突然，传来了“嗡嗡”的飞机声。我抬头一看，嗬，真不少，少说有十来架。它们穿梭似地俯冲扫射，最后丢下一批炸弹，地上立时掀起冲天的烟尘，震得我们身子直晃。

一批飞走了，一批又来了，这种情况一直伴着整个战斗过程。接着，对面山上的大炮响了，友邻部队和我们的阵地，立刻弥漫在一片火海之中，树林被打得遍体鳞伤，枝叶横飞。

敌人在攻击以前进行炮击，这是常事，但是如此密集、如此猛烈，长征以来还不多见。耿飏同志和我站在阵地上，他指着灰土，诙谐地说：“看，这么轰隆隆一震，把我的烟瘾，也赶跑了！”

“看来是一场恶战！”我说。话音未落，敌人从正面压过来了。

“嗬，还真不少！”李英华参谋长操起短枪跃入指挥岗位。我仔细一看，可不，黑糊糊的一片，象蚂蚁似的，直朝山坡上拥来，几乎把山坡都盖满了。而我们，整个阵地还是一座沉默的大山。我们的弹药非常缺乏，缴获来的尖头子弹，全部集中给机枪使用，步枪则尽量使用自己的土

造子弹。为了节省弹药，战前规定了各种枪的射击距离，现在，不管敌人怎样吼叫，我们还是沉着地等待着。

沉默，在沉默中，时间一分一分地悄然逝去。

沉默，在沉默中，敌人一步一步向我们逼近。

沉默，对我们来说，是短暂的忍耐，出击前力量的积聚；可是，沉默对敌人，却是意外的侥幸；我们片刻的沉默，激起他们百倍的幻想，千倍的疯狂。原来，他们错误地认为，经过飞机轰炸，炮兵轰击，我们的有生力量存在不多了。于是嚎叫着，攻了过来，先是匍匐，以后是弯腰前进，最后干脆直起腰杆子冲来，肆无忌惮地往上攀登。殊不知，我们沉默的枪膛里，都有一颗将置他们于死命的复仇的子弹。

草木纹丝不动，我们的心脏急促地跳动着，敌人完全进入了我们的射击距离。

“砰！”突然一声枪响。

随即，手榴弹、步枪一齐吼叫起来，重机枪“哒哒哒”地发出粗犷的声响，轻机枪也用清脆的嗓音加入了这场雄壮、激烈的大合唱。

敌人象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拚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山动地。我们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可是还不能完全压倒数量上绝对优势的敌人（事后

知道，我们对付的敌人，是何键的十六个团）。他们轮番冲锋，不给我们空隙，整整地激战了一天。敌人死伤无数，我们也减员很大。

夜幕降临了，这对激战的双方，都是一个短暂整体的机会，踏着清冷的月光，我和耿飚同志分别到各连看望战士。

阵地上静极了。只有秋风掠过树梢时发出的轻微的簌簌声，月色笼罩着灌木丛。松树林里，战斗了一天的战士，大都已经睡了，有的还发出轻轻的鼾声。是的，长久以来的战斗生活，我们都习惯了。敌人攻上来，狠狠地打，敌人一退，便倒在工事里睡上一觉，好以饱满的精力，迎接敌人的下一次攻击。

有几个伤员没有睡着，辛勤的卫生员还在给他们上药、换纱布。他们大都是刀伤和手榴弹伤，头部与上肢受伤的较多，而且伤势都很重。他们不哭也不叫，见我过去或点头，或轻轻一笑，没有任何要求，没有任何怨言。突然，我的视线落在其中一个人的身上。

这不是小老俵么？虽然他头上用布缠着，但我还能认清他那胖鼓鼓的脸蛋儿。卫生员告诉我，他除了头上有伤之外，胸部和腹部还负了重伤。我用手电照着他那昏迷的脸，果然，脸象黄表纸一样，鼻孔里的气息也很微弱。我不觉一怔。的确他伤情太重，已经非常危险了。卫生人员正在作最后的抢救。

我弯着腰凑近他，摸了摸他那冰凉的手。

他感到有人摸他，微微睁开眼来，见到前面站的是我，轻轻一笑。

“小老倌，怎么样？”我问。

他无力地摇摇头。然后打起精神，用手抓住我，几次翕动嘴唇想说话，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声音来。

我们望着他，想尽量说些话安慰他，但是说什么好呢？

这时，他终于挣扎着用微微颤抖的喉音，一边喘息着一边说：“政治委员，往前走，打敌人，我——懂——了！”他的声音渐渐微弱，然后，从另一只手里递给我一颗子弹，说了声“打！……”无力地昏过去了。

我一手握着他那递过来的还存留着他的体温的子弹，一手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小老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么？”

他紧紧地闭上双眼，再也没有说什么。我很少流眼泪，可是，这时我的泪水禁不住悄然而下。

红军战士，多么好的红军战士啊，为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前途，英勇无畏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到的都不是自己，而是他信仰的革命事业。他的平凡而崇高的形象，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和团长回到指挥位置上，心情焦急地向右后方望去。漆黑的夜，什么也看不见，惟有遥远天空中缀着几点寒星。

可是，在这墨染一般的夜色中，中央纵队和红军大部队正在绍水和界首日夜不停地抢渡湘江，跨越湘桂公路。而敌人则妄想扑向渡河点，封死湘江，切断湘桂路，实现他们在湘江两岸和湘江与潇水之间彻底消灭我红军的计划。我们决不能叫敌人得逞！想到这里，我们立即通知各营，加强战前的准备工作。

随着太阳升起，我们迎来了又一个激战的黎明。

拂晓，我们正在战壕里吃饭，突然，传来了敌人的炮声。原来，敌人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攻不下我们的阵地，第二天，准备以更优势的兵力再次发起进攻。显然，他们改变了战术，不仅从正面加强了兵力、火力、轮番猛攻，并以大部队迂回我们整个阵地的侧翼，特别是用重兵向五团阵地施加压力。

战斗越来越激烈，情况越来越严重，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我们知道，这不是由于我们战士的不勇敢，有的小山头是我们的战士全部阵亡之后，才落到敌人手里的。

敌人的后续部队源源开来，他们企图加强实力，攻占觉山，封锁湘江。

伤亡在增多，一个个的伤员从我们的面前抬过去。

经过激烈的战斗，传来消息，五团右翼阵地被敌占领。接着，右翼阵地的敌人，便集中主要兵力往我们四团压来，向我们背后迂回。敌人从三面进攻过来，黑压压的一片，我们团的阵地处在万分危急之中。这时，陈光师长从阵地

上传来命令，要四团转移阵地，以运动防御的手段，迟滞敌人的前进，好争取更多的时间。

我们开始边打边撤，尽量地阻挠、迟滞敌人，争取时间。

敌人继续疯狂进攻，最后完全占领了觉山。

我们沿着与湘江平行的湘桂公路往南边转移。

这时，后面不断传来情况：

红星纵队^①正在接近湘江；

红星纵队已经渡过湘江，接近湘桂路；

红星纵队大部越过湘桂路。

几乎每一个消息，都要求我们坚持战斗，把敌人拖住。我们每一个指战员，都深深懂得此时此刻，每拖一分钟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我们边战边退，敌人死命猛追，加上天上的飞机轰炸，我们每走一步，几乎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但是，为了保卫党中央，谁都没有怨言和胆怯。

我们主要的任务，是挡住敌人从公路上压过来的猛烈攻势。一营在公路左边，二营在公路右边，三营在一营阵地之后。

我本来在路右边指挥，但见一营渐渐不支，与敌人打起了交手仗，便想组织二营火力支援一营。这样我就从公

^① 即我中央纵队。

路左侧横越公路，不料刚到路中央，一颗子弹飞来，打中了我的右腿膝下。这时，血流不止，我倒在公路上，根本不能走了。

通信排的一个战士想来救我，但刚上路边，便负了伤。

这时，敌人离我很近，一窝蜂似的向我拥来。他们疯狂地喊着：“抓活的！抓活的！”

五团五连指导员陈坊仁同志带了几个战士，刚好从东边撤下来，见此情景，便奋不顾身地阻击敌人，掩护我。

我团二营副营长兼六连连长黄霖（黄古文）同志这时也带着一个班拚命向敌人射击，同时派出三名同志向我靠拢。

头一个战士跨上公路，中弹倒下了。

第二个战士还没靠上公路，又负了伤。

看着战友们为了抢救我，连续流血牺牲，心里非常难过，我一边挥着手，叫黄霖同志不要上来，一边挣扎着向我方爬。

我心想：不能叫同志们再为我流血牺牲了。

可是，黄霖同志毫不迟疑，低姿匍匐着向我爬了过来。他接近了公路，一梭子子弹打在他的前后左右，溅起一团尘埃。

但他毫不犹豫，还是冒着弹雨朝我这里爬着。

他爬上了公路。

他猛地抓住我的一支胳膊，把我向外拖着。

当他把我拖出公路，他已两眼血红。他把我交给了我的警卫员小白，便抱起机枪，和陈坊仁一起向敌人扫射。复仇的子弹，暂时把敌人压在右前方树林旁的土坎后面。

我问黄霖同志：“团长在什么地方？叫团长不要管我。你们按照团长的指挥办！”

黄霖喊着：“政委快走！快走！小白，把政委架走！”警卫员白玉林和团部书记匡汉谋一左一右地架着我，顺着公路边起伏的丘陵地，向后撤。我的两条腿，在地上拖着。好在这一带地形起伏不平，又有零星松树和坟包，可以凭借地形地物避开敌人火力。警卫员小白由于是个中等身材，架着我非常吃力，呼哧呼哧直喘气。

小白是江西于都人，福建事变时，我们进军福建，支援福建人民政府，住在将乐县城，他是那时经过挑选给我当警卫员的。这小鬼话不多，却非常机灵。每到宿营地，他就悄悄地找一块门板，几块石头或砖头，给我和耿飏同志架好铺位，把我们包着两件衣服的小包袱放在一头，在下面垫两块砖，算是枕头。一会儿，他又端来一盆热水，叫我烫脚。我和团长研究工作时，他悄悄地跑到政治处，看打土豪没收了什么东西，有没有可以改善伙食的，碰上杀猪了，就要猪腰子或一页猪肝给我们吃。几乎每打一仗下来，到了一地，他总是要千方百计买几个鸡蛋，做给我们吃。平时，我们只觉得这小鬼伶俐可爱，想不到在战场上，他简直是一头勇敢的狮子。

他和匡汉谋同志一气拖了我四五里路，突然遇到了担架兵。小白向他们喊了一声：“担架兵！”

正在走着的担架兵站下了，见有伤员，便问道：“你们是哪个团的？”

小白说：“四团的，给我抬上！”

那些担架兵一听不是自己团的，忙说：“我们是五团的，另有任务。”

小白一下子火了，用手往腰里一插道：“不抬？不抬，我枪毙你！”

匡汉谋同志站在一旁指着我说：“这是我们的团政委！”

担架兵迟疑了一下，过来看看，说：“是杨政委，快抬上！快走！”

原来我过去在十一师工作很久，他们都认识我。说实在话，眼下对这几位五团担架兵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五团阵地首先被敌人突破，他们政委易荡平同志身负重伤无法抢下来，为了不让蜂拥而上的敌人抓去当俘虏，掏出枪给自己补了一枪，壮烈牺牲了。这样的恶仗，干部、战士伤亡很大。现在剩下的同志，又正和四团、一团一起，艰苦地战斗着，迟滞敌人，每一分钟都在流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上了担架，心里是非常不安的。

担架往后抬，敌人还在继续追击，飞机还在轰炸，我们很快钻进了绵密的松林里。

战友情，伤口痛，这当然扰动着衷肠。但我一想起在这个严重关头，在我们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我负了重伤，离开战斗岗位，心里就更加难受。所赖者，耿飚同志有丰富的指挥经验。可是，眼下他正患着疟疾，这个病魔已经缠着他很久了。我怎能不惦念着四团的战友呢。

担 架 上

由于伤口一直没来得及包扎，血流不止，我只觉得右腿象泡在水里似的发胀、发痛，伤的准确部位在哪里？伤情究竟怎样？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闭着眼睛，昏昏沉沉地躺在担架上。听着远处激烈的枪声，我的心就象压了一块铅似的，异常沉重。我们何曾打过这样被动的恶仗？人家把口袋张好了，把防线筑成了，我们去钻，去突。一道封锁线，二道封锁线，三道封锁线，四道封锁线！两个多月的时间，步步被动，步步吃紧。什么时候才能打开一个新局面？什么时候才能与二、六军团会师？

担架颠了一下，打断了我的沉思。只听到一个担架兵说：“脚抬高点！”我那负伤的腿猛地一动，警卫员小白赶忙过来扶着我，我知道这是在爬一个小山。从身体的倾斜程度上，我感觉到山还是挺陡的。过一会儿，我身子又反向倾斜——下山了。

这时，思绪又把我带到另一座山上，带到过去打漳州的战斗中去了。可不，那是何等痛快淋漓的战斗啊！

那是闽南有名的天宝大山，莽莽丛丛，巨石如楼，漫山茅草，春意盎然。我们红四军第十师、第十一师打漳州，就是从天宝镇东北发起进攻的。我们带着部队冒着瓢泼大雨，一鼓作气从天宝山冲下来，冲进长着大片大片香蕉、甘蔗的平原。经过一场激战，敌人土崩瓦解了，漳州的屏障被我们打开了。我们消灭了张贞主力，缴获了大量的日式武器，队伍顺着宽阔的龙厦公路，排成四路纵队，浩浩荡荡地乘胜前进。

这时，出现一乘白骑。白马上坐着一个身材高大、目光炯炯的人，他穿着一件大褂，头戴凉盔帽，初看过去象一个书生，但那炯炯有神的目光，那压倒一切的气概，又俨然是个统帅——他就是毛主席。当硝烟似轻云般在香蕉林上空飘荡之际，他飘逸若信步闲庭，根本没把漳州的敌人放在眼里。他缓缓地款着马缰，身下的白马四蹄轻健，细腿龟臀，耳似削竹，毛色如银，显得格外的轻松自如，大有物得其主之概。

毛主席在队伍里与战士们一起向漳州城行进，一边走一边问我说：“你们缴了些什么武器？抓了多少俘虏？”

我兴致勃勃地向毛主席汇报说：“缴了很多外国造的武器，消灭了张贞的主力！”

这时缴到了外国造的武器，是多么令人振奋啊！所有

的指战员，谁不想腰里挎一个二十响呢？战前我就提出了鼓动口号：“把敌人消灭了，谁缴获二十响驳壳枪，归谁用！”现在，真的缴到了，战士们个个兴高采烈，把闪着蓝幽幽光泽的二十响挎在腰里。师里不叫我们全带走，留下一部分，我好不容易才做通了工作。

毛主席听说我们缴的武器全是外国造的，很高兴，表扬我们说：“你们打得好！”

听到毛主席的表扬，我和战士们全都乐了。

这一仗，是一、五军团利用第三和第四次反“围剿”之间的空隙，为了扩大苏区，扩大红军，筹备物资而打的，初战告捷，真是大快人心。

这一仗，占了一大片城镇：南到漳浦、云霄，北至角美、长泰，东临大海，控制一大片崇山峻岭和美丽如画的龙海平原，特别是头一次打下了漳州这样的城市，敌人连飞机都没来得及飞走，就被我们缴获了。我们算是第一次有了飞机。

我们这些从山沟子里出来的土包子，进了大城市，真是眼花缭乱。在漳州也不知出了多少洋相！

初进城，在漳州住了三天，过了江东桥，进驻石美、角美。我们住在一个逃跑了的大地主的宅院里，看到坛子里装着数量不少的似黄菸末子而又不是黄菸末子的东西，大家围着，议论纷纷，谁也闹不清这是什么东西。

王良军长刚好下来了解情况，他到过城市，见识多了，

进入院子看到我们在议论，便问：

“杨政委，你们挤在这里干什么？”

“军长你快来看：象黄菸末子，又不是。”我说。

王良同志分开人群，挤到我身旁，看了一眼高兴地哈哈大笑了。

我指着那东西补充说：“这玩意儿怕有毒不能吃。”

军长笑道：“有多少？你们都收拾收拾，我带走。”

见军长要，再好的东西，我们也肯给。何况这可能就是那没什么用的黄菸末子呢。我要警卫员收拾一下，他整整装了两大包，王良军长回去时我们交给他带走了。过了不久，消息传回来了，说什么军长、政委和军部的同志们都乐坏了。他们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说那叫什么“肉松”！唉，这就是肉松！过去这个名词倒是从书上看到过。但从来名词与东西未对上号，谁知道这东西就叫肉松？我们真土啊，好在王良军长还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分，我们也照样吃了一顿，开了洋荤。

我们十一师三十二团驻在石美，隔海对着厦门，担负警戒任务。

海，多么辽阔呀！我们大部分生在山区，长在山区，参加红军以后又是在山区作战，看惯了红枫绿杉，山径青苔；看惯了山区分散的依山形而筑的土打墙房屋；看惯了“八大干”，即豆腐干、笋干、老鼠干、地瓜干等，而到了这里，一抬头便是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波涛推过来——

哗！喘息之间，又急急忙忙退了回去，无止无休。石美这个炊烟稠密的渔村，到处都散发着盐卤味、鱼腥味，墙边巷尾，堆着小山一般的海蛎壳、蚌壳，而这些蚌壳，在山区，会被孩子们一抢而光的。看那港湾里，桅杆成林，不论闽西的汀江、还是江西的赣江里，都没有这么多船。而这船又是多么奇特——尖底的！到了海滨城镇，真所谓“目不暇给”了！这一切都让我们这些从山沟里出来的人感到新鲜！

更为新鲜，更为好笑的倒是另一件事。那是刚到角美、石美不久，到了夜里，突然一个大光柱子从半空中扫过来，明晃晃的，好象离得很近，有时就象在头顶，象是在隔壁，可是又摸不着。这是什么武器？大家都在猜着。

为了弄清这个谜，我们的一个连长下达了紧急任务：

“马上出动三个排，一个排一路沿着怪光摸过去，同时行动，相互配合，三路一起摸，抓住它，别叫它跑了！”

三个排整整搜了两个晚上，走遍野外和村庄，几乎把可疑的地方都找了，但还未见到踪影，怪光依然在空中乱晃，有时简直就是从身边穿过，叫人恼火极了。正在这时王良军长又来了。他说：

“你们到哪里去抓？”说着，他指着那光柱子又问，“抓这个？”

这个连长认真地点点头，然后指着那正扫来扫去的光柱说：“对，到前面去抓怪光。”

王良同志把大腿一拍，笑着说：“嘻，那是探照灯！是帝国主义从军舰上射过来的，别看在头上晃来晃去，可远哩！”

这时，我恍然大悟地“啊”了一声，记得上中学时书上说过探照灯，可在生活中我实在没见过。

王良军长又说：“那是兵舰上的，怎么抓？”

我们和旁边那个刚刚搜索回来的连长都笑了。我说：“啊，原来从那么远的海上照过来的。”

王良军长说：“远着呢，还在厦门港，隔着十几里地呢。”

我们跟随毛主席打漳州，真是饱了眼福，出了洋相，初到漳州，现在数数有好几个第一：

第一次坐汽车，虽然那是辆摇摇晃晃的大卡车，我们兴致却高极了。

第一次骑上了自行车。在这以前，我只是听人说过有自行车，现在不仅见到了，而且学会骑了。

第一次看到了电影。虽然那是无声的，却也很满足了。

更好笑的是错打了“土豪”。一开始，我们把穿皮鞋的，拿文明棍的、穿长袍的、戴眼镜的、戴礼帽的，都当作土豪抓了起来，前后抓了一百多。毛主席在漳州市立第三高中门前的草坪上开了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会，听了大家的汇报后，笑着对我们说：你们搞错了很多！要搞调查研究，你们回去，要一个一个查清楚。为什么你们会搞错？主要是不懂话，又不做调查研究。越不懂话，越要调查研究嘛！

要知道，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啊！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调查，原来抓的一百多个“土豪”中，只有五六个是真的，叫人哭笑不得，最后只好向被抓错了的人逐个赔礼道歉，一个个都放了……

“政委，给你包上伤口。”警卫员小白的话声，打断了我的回忆。

我睁开眼，这才知道，担架已经放在地上，枪声越来越远，也越来越稀了。咳，小白啊，你为什么要叫我？我真想再静静地沉思一会儿，沉浸在那幸福的回忆之中，可现在毛主席那潇洒的英姿不见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胜利景象不见了，要知道，此时此刻我是多么想念毛主席，怀念毛主席过去率领我们粉碎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引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那些日子啊！毛主席，现在你在哪里？

这时小白告诉我，担架员一口气跑出三十多里，现在已经脱离了危险区。

“谢谢你们。”我吃力地向四个担架员点了点头。

我这条命，倘若没有在公路上伤亡的同志，没有指导员陈坊仁的拼命掩护，没有副营长黄霖同志最后把我抢下公路，没有警卫员小白和团部匡汉谋同志把我架下来，没有这四个担架员，我可能早已见马克思——革命到底了。想到这，我感激地一个一个地看了看担架员，他们正用袖子擦拭脸上的汗水！他们的军装全部被汗浸得象从水里捞

出一般。担架员，比起战斗员，还要辛苦。漫长的征途，他们要走同样的路程，可是，还要抬着伤员。他们默默地为革命担着重担，为不朽的革命事业立下了功勋。

这时，一旁站着军团卫生部长姜齐贤同志和军医主任戴济民同志。戴济民同志留着山羊胡子，由于那胡子太惹人注意了，大家又都喜欢他，便不叫他名字，都亲热地称他为“戴胡子”，他原来在吉安县开私人医院，红军到了他的家乡，他带着他的听诊器，参加了革命。在红军队伍里，懂医道的人不多，象他这样的，更是难得。

原来，担架是在这里碰到他们，才被放下的。

姜齐贤和戴胡子蹲在担架旁，查看着我的伤势。血早已不流了，绑腿裹着的裤子，连同绑腿，全被血浸湿，粘在腿上。子弹是从右小腿中部贴着筋骨打进去的，出口有鸡蛋那样大，肉向外翻着。

姜齐贤和戴胡子检查完伤口，先给了我点水喝和东西吃，然后，用剪刀在膝盖以上转着圈一绞，这只裤腿就成了半截短裤筒了。下面粘得很紧，他们先用盐水浸透，才剥下来。然后他们用盐水洗净伤口，上了云南白药，用绑带包扎好，整整摆弄了一两个钟头。

手 足 情

担架把我送到一军团卫生部医院。在那里住上不久，

我关心的战场上的消息不断传来。

先是得知南线敌人，为我军所阻。北线全州、觉山方面，刘建绪的三个师倾巢出动，我一、二师正节节阻击。

随后又听说四团与兄弟部队撤至瑶子江。已经进入大山，利用险要的隘口进行阻击，挡住了追击我们的敌人，与对方形成对峙，直到天黑了，枪声才渐渐停了下来。可是第二天天一亮，我渡口就被敌人占领了。他们封死了湘江。这时，中央纵队虽已渡过湘江，自永安关、雷公口进入“十万大山”之中，可是，在后面担任掩护任务的三十四师却被敌截断了，以后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湘江一战，损失过半，我们红军受到了严重挫折。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之后，整个红军剩下不到四万人了。而全州战斗，这是我们战略转移以来所经历的最激烈、最紧张、最困难的一次战斗，也是突破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的战斗，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我想，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再这样搞下去，结果会怎么样？胜利总是要胜利的，但要付出的代价是难以估量的。

虽说是在军团卫生部野战医院里，但这段生活，仍是在担架上度过的。几年来，一个战斗接着一个战斗，象这样有整块的时间，安静地躺下，默默地思索，还是没有过的。一副担架，八个担架员分成两组，轮流抬着我。有时担架上山、下山，忽悠忽悠，我就象睡在摇篮里。这时耳

听山泉叮咚，百鸟啼鸣，还有行军的脚步，山石的滚动，松涛的喧哗，这种种声响时时地伴随着我。我仰卧在担架上，白天，看到山峦向我后面移动。夜间，星星向我眨眼。除了大小便，担架便成了我活动的小天地，行军、宿营全在上面。以往，醒着时组织部队行军、打仗，总是紧张紧张的，时间很快地过去；一旦住下，一觉睡过去，什么都忘掉了。而今，无论梦中或是醒来，都是静静地想、想。枪炮声是听不见了，就是飞机的嗡嗡声也少得多了。而我脑子里，却不时地翻腾着过去毛主席领导我们打的那些胜仗。我眼睛一闭，那战斗的场景就一幕幕地映在我的面前：

那是龙冈——头一次反“围剿”的战场，在这里，毛主席领导我们诱敌深入，运用十六字诀^①的军事原则，消灭了敌人一个师，活捉敌人师长张辉瓒。然后挥戈东进，直趋东韶，连战连捷，全歼敌人又一个师的主力。毛主席写下了光辉的诗篇：“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②

那是九层岭，观音岩，——第二次反“围剿”的一仗，我们从富田打起，消灭了七十七师罗霖，二十八师公秉藩的部队，然后横扫七百里，尤其是那广昌一战，我们向敌人第五师发起了冲锋，从树林里，从山背后，从沟沟岔岔，四面八方，拥出红军战士，杀声震天。穷凶极恶的敌人土

① 即敌进我退，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② 引自《毛主席诗词》12页。

崩瓦解了，遍地是俘虏，遍地是敌尸，遍地是敌人丢弃的给养和弹药。一汪血污里，躺着敌师长胡祖钰肥胖的尸体。毛主席率领我们横扫七百里，五战五胜，使我们见到了赣江的流水，建宁的原始森林，布满杜鹃花的山山岭岭，灿烂的日出，瑰丽的晚霞，踏不尽的青山和叮叮咚咚的小溪……大开了眼界。

那是黎川、建宁——第三次反“围剿”我们开始撤退的地方，蒋介石亲自指挥三十万敌军压向苏区，乌云压城城欲摧，三万红军在毛主席指挥下诱敌深入，大踏步后退，在良村、莲塘，一举歼灭敌人韩德勤两个师，化被动为主动，移兵高兴圩、老营盘，赢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

“嗡——”敌人飞机的响声，把我眼前的画面冲散了。

担架员毫不慌张，向附近望了一下，发现近处一棵杂木，便把我抬过去，放在绿茵茵的树冠下。

敌机向远处飞走了。

稍作休息的担架员又把我抬起来。

军团直属部队，从担架旁走过。这是工兵营。在队伍里，走着一个满脸麻子的人。他虽然穿着红军服，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他是第四次反“围剿”时在宜黄县磨罗嶂脚下抓住的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①。他是保定军官学校

① 陈时骥架乌江浮桥时曾积极参加，一直随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又开小差跑掉了。

毕业的，吸收到红军队伍里了。

工兵营唰唰唰地从担架旁过去了，行动迟缓的担架被他们抛在后面。

这个一闪而过的麻脸，使我又想起了一次战斗：

啊，那是在乐安县东南，宜黄县南面磨罗嶂一带的峡谷里，展开的一场伏击围歼战。红军千军万马，都隐蔽在道路两侧的山上，布下一个大的伏击圈，等待着敌人。敌人会来吗？指战员在焦躁之中，忽见路口出现贼头鼠脑的人影，跟着大队人马从仙龙坪方向来了。这下可把我们都乐坏了。瞧，敌人五十二、五十九整整两个师，全都按照我军的“调遣”，钻进了“口袋”。

“打吧！”同志们摸着扳机，急得手发痒。

“等一等，等一等。”军团的聂荣臻政委向我们摆了摆手。我们就耐着性子等呀等呀，等着敌人的主力钻进“口袋”。

“打！”聂政委手一挥。一刹那间，埋伏在两边山上的红十师、十一师和红七师、九师一起出击，枪声大作，整个战场上，都象滚动起沉雷。

号声响了，刺刀如林，杀声震天动地。

一个痛快淋漓的大胜仗！杀得敌人尸横遍野，举枪求饶。

刚刚还耀武扬威的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被我红三军的勇士们击中，负了重伤，奄奄一息。捷报传来，全军欢

腾！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却不见了。俘虏说，他们的师长陈时骥长着一脸大麻子。军团便命令我们团连夜搜山。我们当时向指战员作了动员，要大家特别注意脸上有麻子的人，一定不要让陈时骥逃掉。

山林里黑乎乎的，只听见到处喊着：“敌人师长脸上有麻子，搜哇！”

天，下起毛毛细雨，不一会儿，地上就泥泞难行了。

然而突变的天气，并没有影响战士们搜寻陈麻子的热情，全团战士在大山上整整搜索了一夜。

次日凌晨，这家伙的一脸麻子，到底给暴露了，任凭他机关算尽化装成伙夫，溜到了山脚下，也没有能混过去，被我们军团电台队的同志发现了。他只好乖乖地作了我们的俘虏。

仗打得多干脆，从敌师长到士兵，一网打尽，全部就歼！毛主席率领下的红军，真是雷公打豆腐，“噉里喀嚓”，战无不胜，所击者灭。

可是，第五次反“围剿”我们和敌人打阵地战，“御敌于国门之外”，分兵抵御，短促突击，置十万红军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一片火红的苏区被百万敌军包围起来，苏区日趋缩小，指战员血染沙场，红军以往那种凌厉的攻势不见了，以前我们红军所向披靡，如今却节节败退，以致把苏区全丢了。看来战略方针就是有问题呀，难怪战士们对这次战略转移有看法哩！那个江西小老倌不就提出过我们走

啊走啊，究竟要走到哪里去吗？我们眼下的行动是何等被动啊！仗打得这么窝火，又怎能不叫人心里着急呢？这些仗，为什么不照毛主席的办法打？怎么也看不到毛主席了呢？是啊，说什么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担架又放在地上，我睁开眼一看，到了一个村庄，部队要宿营了。

这是瑶、侗、僮、苗等好几个少数民族杂居的山村。

我支起上身，想看看工兵营在不在这里宿营，没有，没有看到有麻脸的原敌五十九师师长。这时我觉得腿部剧烈疼痛，想到成天躺在担架上，便心里憋气，翻了个身。是啊，山村甚小，住不下这么多人的，也许他们走了。我自语道：

“这样的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

声音刚落，身旁走来一个人，俯下身来，说：“杨政委，伤口痛？我看看你的伤怎么样了。”

这是军团卫生部长姜齐贤同志。姜齐贤同志是湖南人，学医于湖南湘雅医院，是个医道高明的大夫，一九三一年由旧军队转入红军队伍，后来入了党。组织上对他非常照顾，每月发给五十块银元的津贴，这在当时每人每天只有六分钱菜金、物质条件非常微薄的红军队伍里，是很高的待遇了。我们非常熟悉，平时他经常解囊相助，帮助我们买点什么，或改善一下伙食，他岁数比我们要大十来岁，象是兄长，为人也极和善。

此时他把绷带打开，用盐水洗净伤口，把换下来的粘

着血污的绷带卷起来以备洗后再用。在当时一条绷带是很珍贵的，就那样几条，洗来洗去来回换。

姜齐贤同志换完药高兴地对我说：“伤势好得很快，会很快好的。”

他走了，过了一会儿，又兴冲冲地送来一只老母鸡，交给了我的警卫员小白，他就是这样关心着我的伤。我知道，这是阶级兄弟的同志情。

我原来身体条件比较好，又加上姜齐贤同志和戴胡子精心照料，伤口很快就收口了。这时，我可以一瘸一拐地走了。

在担架上躺了十多天之后，回到了四团，犹如阔别了多年似的，耿飚同志看到我高兴得不得了。当他知道我的腿还未痊愈，行动还不便时，就对我说：“骑我的骡子吧，它老实，从不失蹄。”

我不要，说我有，但他坚持要换，于是我改乘他的骡子，把我的那匹有时尥蹶子的调皮骡子给他骑。

这时耿飚同志的疟疾还没好利索，脸色发青，经过湘江这场恶战，比以前瘦了一些，但精神仍很爽朗。

我们相互骑着牲口并辔而行。一路上，我向他谈了我负伤后同志们的关心，那真是同志心，手足情啊！当然我也同时说了在担架上想到的许许多多，他听了点点头说：“你想的那些，团里的干部、战士，也都在议论纷纷。”

是啊，湘江流下的鲜血，使红军的指战员都思索起问

题来了。不过，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改变这种被动局面的。

强 渡 乌 江

一九三四年年底，部队到达了乌江边。这时上级指示我们：“先抵黔北，夺取遵（义）、桐（梓），发动群众……”

遵义是黔北重镇，是贵州的第二大城，向北是重庆，向南是贵阳，东是武陵山，西是大娄山，是黔北的一块小盆地，汉属牂牁，即古书中常说的“夜郎”属地。桐梓是贵州军阀王家烈及其“双枪将”^①首领侯之担的巢穴。乌江又名黔江，是贵州的第一道大川，由西南向东北斜向贵州，把贵州分成南北两部，也是遵义、桐梓南面的天然屏障。在遵义、桐梓之间的娄山关，有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进”的威名。欲下遵、桐，必先渡此江，并过此关。军委命令一军团第一、第二两师，分别在龙溪、江界、黄平一带准备渡江。

我们二师四团在攻占老黄平后，一面继续向乌江前进，一面侦察，同时向部队进行政治动员。

“老乡，这里到贵阳还有好多路？”我拄着拐杖，站在路口，向过路的老乡打听。

① 双枪即指大烟枪和步枪。

没想到那老乡挺友善，对我们丝毫没有戒心，爽快地答道：“只有一百八十里。”

耿团长递上一支烟，接烟的老乡笑了笑，说：“长官，你莫客气么！”

耿团长笑笑，点上火，继续问：“贵阳好打么？”

“啥子？”老乡吸了一口烟，问。

我说：“我们想打贵阳，你看好打么？”

“这个，”他听懂了，想了一想，又笑着说，“王家的人都是大烟鬼，又不多，你们红军大队人马去打，那还打不开么，我看，能打开，他们哪里守得住？”

听老乡认真而饶有风趣的说话，我们不禁笑了。我们又说：“老乡，我们就去打贵阳，消灭王家烈好不好？”

“好，好！贵阳打开了，打掉了王家兵，我们老百姓就好过了！”老乡眉飞色舞，兴高采烈。

其实，我们并不是要攻打贵阳，只是想通过乡亲，把这个虚虚实实的消息传给蒋介石、王家烈听听罢了。而我们真正的意图是：声东击西，直奔乌江。

经过半天的急行军，我们到达了乌江南边一百多里的猴场。这里的群众听说我们是打王家烈、侯之担的部队，高兴极了，自动站在两边，喜笑颜开，夹道欢迎我们。这时传来消息：我一师一团^①已占领余庆，那里的敌人——

① 团长是杨得志同志，政委是黎林同志。

一个团和伪区公所早已闻风逃窜。

夜晚，正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一号的晚上，部队在乌江边上迎新守岁。

以往，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每逢过年或者“八一”，都要举行一些联欢活动。苏区人民敲锣打鼓，肩担、手推着慰问品，来到部队，与指战员相互祝贺，一起联欢，十分热闹。部队自己也开同乐晚会，开运动会，宣传队忙着演出。

记得一九三三年在藤田，各种活动之规模异常宏大。

整个军团召开运动大会，进行射击、投弹、刺杀、架线等军事项目和政治文化项目的比赛，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对作战有功的同志颁发红星奖章。那次，军团奖给我们四团一面红彤彤的大旗，上面写着“英勇冲锋红四团”几个醒目的大字。

温坊战斗胜利之后，在福建长汀南山坝进行的一次文娱体育活动，又别具风味。

那次，进行了盛大的演出活动。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同志，创作了剧本《庐山之雪》，还有军团宣传队编的《杀上庐山》。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的热情真高，百忙之中编写了一个以大革命时期武汉工人收复英租界为背景的剧本。聂政委还亲自担任角色登台演出。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保卫局长罗瑞卿同志也都上台扮演角色。

我们比军团首长年轻得多，更是活跃，做游戏、运动

比赛……全和战士一起，闹成一团。

常见的一种游戏：击掌传手绢，总是引得大家笑声不绝。那时，干部战士围成一个圆圈，大家一齐击掌，一条手绢从这个人手里传到下一个人的手里，当掌声突然一停，手绢传到谁手里谁就算“输”了，他就得在准备好的盒子里抽签，签上写的是政治、军事等各种问答，如果答对了，就奖给一把花生米。如果答得不对，他就得出出洋相，请人代答。

我喜欢打乒乓球，还喜欢玩一种叫做“打蒋介石”的游戏：把五根木头竖起来靠在一起，用一根长的棍子，在离十米远的地方甩过去，全部打倒的话就算赢了。

还有什么“矮人过桥”（钻凳子）啦，比赛山歌啦，名堂多得很。干部战士来自五湖四海，也就带来了各地的一些传统娱乐方式，尽管乡土气息不同，玩起来却津津有味，往往一弄就通宵达旦。

在那热热闹闹的气氛里，同志们回忆一年的战斗与工作，话题丰富得很，打了哪些胜仗，谁都想争着摆一摆，谈一谈。

今晚，在寒风料峭的乌江边上，送旧岁迎新年，与昔日相比，自然别有一种滋味，但各连还是开了晚会。

这个晚会，主要是进行战斗动员。大家聚在马灯、篝火旁，回顾离开苏区以来的战斗，总结教训，展望未来，激励斗志。

我们的红军队伍，不愧是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尽管刚突破四道封锁线，遭到了重大损失和挫折，但依然斗志旺盛。

这个晚会，成了乌江战斗的动员会。

“突破乌江”，“拿下遵义、桐梓”，“完成军委交给我们先头团的战斗任务”，“到遵义去过新年”，“乌江虽险，又怎能挡住红军飞渡”，这些口号，成了每个干部战士的决心和信念。

江风带着冰冷的寒气从低矮的房顶掠过，然而凡是有我们红军在的每间屋子里，都热气腾腾，飞出窗外的都是那铿锵的誓言。

天将破晓，耿飊同志还专门叫小白弄了一小锅红枣炖鸡，这实在要算丰盛的节日美餐了。

吃罢早餐，耿飊同志和我踏着露珠，到渡口进行实地侦察。

一到江边，嗨，果然名不虚传。只见江水滔滔，水清湛然如碧。两岸悬崖绝壁，仰首不见其顶。望江边，白雪铺满大地，沿江的竹子都给沉重的积雪压弯了腰，随风轻轻摇摆，象在向我们欢迎致意。这一天，天气阴暗，冷风嗖嗖，大雪纷飞，只能听到哗哗的水声。我们想用望远镜观察对岸敌人的计划看来不能实现。一问老乡，才知道，就是平时天晴，江面浓雾弥漫，能见度也很差。显然，不能再犹豫等待。耿飊同志和我看完后决定：用机枪扫射对

岸，来一次火力侦察。

“哒哒哒……”一阵清脆的机枪声从江面响起，敌人隔着雨雾，不知虚实，便匆匆忙忙地还起枪来，大大小小的火舌一齐向我南岸吐来。原来，我们江对岸的渡口敌人配备有连哨。渡口上游五百公尺处，据老乡介绍，有条极小的傍山小路，与对岸渡口大道相通，勉强可走人，但那里是陡壁，江岸无沙滩。经过火力侦察，我们发现，纵然如此，敌人在那里还是小心地配了排哨。这时，老乡还告诉我们，敌人在江对岸挖了工事，离江岸约两华里的一个大庙里，驻扎了部队，半山腰里，还有敌人的一个团。

下午，我带着负伤未愈的隐痛，与耿团长一起向师首长作了汇报。师首长明确指示：既然渡口大道是敌人的防御重点，工事较强，兵力较多，而渡口上游敌人防守较弱，就同意我们的决心：佯攻渡口大道，主攻上游五百公尺处的小路。临走时，师首长告诉我和团长：“佯攻处声势要大，要把敌人的全部注意力吸引住。”

返回团部后，耿飙同志与我分头动员，组织力量。

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当天下午，我们组织力量，大张旗鼓地在渡口南岸搬运架桥材料，引得对岸的敌人一阵紧张，不仅时而机枪时而步枪朝我们开火，而且使劲地加修工事。

就在这时，我们用一个营的兵力悄悄赶制了几十个竹筏，连夜又到各个连队去挑选能攻善战且识水性的战士，

准备挑选十八个同志。战士们一听说要凫水过江，执行强渡任务，个个都争着要去。我正要去三连，三连长毛振华同志听到这个事后就找来了。他“毛遂自荐”地说自己一定能完成上级首长交给的任务，为此，摆了很多理由。

毛振华同志我熟悉，二十四五的年纪，瘦高个子，人机警聪明，说话声音很响，湘江边上长大的庄稼人，曾经给贺龙同志当过勤务兵。他打仗勇敢得很，象只猛虎，但是水性好不好我不大清楚。他见我怀疑他的水性，衣服一脱，说：“行不行，当场扎两个猛子！”引得在场的同志一阵大笑。

要求过江当先锋的人实在太多了，这可把耿飚团长和我忙坏了，直到半夜一点，还有人争着要去，争这十八个名额中的一个。有的同志没被挑上，不服气，直接向团长和我请战。

第二天，试渡开始了。为了不失时机，决定在早晨进行。

这一日，风嗖嗖，雨绵绵，刚下过一场雪，天出奇的冷。上午九点钟，佯攻先行开始。我们打出了第一排机关枪子弹，敌人就慌慌忙忙进入工事，又是机枪，又是迫击炮，乒乒乓乓，十分热闹。

就在这敌人打得热火朝天的当儿，我在渡口上游五百公尺的一个竹林里，正面对即将下水的八位勇士。这八名是从十八名勇士中选出来的，他们的任务是拉过去一条缆

绳，以便后续部队渡江。我对这八名勇士说道：

“同志们，战斗打响了。今天下雪天冷，有风，风也冷，江水更冷，但是，再冷，也不能阻挡我们红军凫水过江！”

毛振华同志第一个站出来，说：“为了突破乌江，完成战斗任务，冰水我们也要过去！”

“好，祝你们成功！”说着，我手一挥，小白连忙端过来一壶酒，我和团长给这八位同志，每人斟了一碗，然后说：“祝你们胜利！”

八位同志高举酒碗，一饮而尽。

“出发！”耿团长发出命令。

八位同志几乎同一个时间脱下上衣，打着赤膊，腰里缠着驳壳枪，头上顶着一捆绑好的手榴弹，“扑通”一声跃入水中，他们一手拉着一根绳子，一手轻轻地划着。

朔风凛冽，冷风潇潇。别说在水中，就是穿着衣服，站在这江边，也觉得寒风刺骨。可是我们的八位勇士，头也不回，劈波斩浪，直往对岸游去。

一公尺，二公尺……远了，更远了，眼看快到江心了。敌人忽然射来密集的子弹，夹杂在中间的还有一发发迫击炮弹，打得江面浪花激溅，白茫茫一片。纵然江水冰冷，头上炮弹呼啸而过，但是，八位勇士仍然奋不顾身地向前泅渡。

“快过江的三分之二了，再坚持一下！”耿团长正对我

说，但话音未落，敌人的迫击炮弹打断了八位同志拉着的那条缆绳。刹时间，江中的旋涡大显淫威。游到江中的同志只能折了回来，第一次试渡失败了。在岸边我们接回了泅渡的勇士。但是，一检查，少了一名，原来这位同志，因负伤体力不支，加之在水中冻了两个小时，风又大浪又急，被江水冲走了。他是强渡乌江第一个献出生命的红军战士。

第一次试渡虽然失败，但同志们完成战斗任务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我们接受了白天试渡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实行夜间偷渡，以避免敌人的射击，减少伤亡。于是，部队又赶制双层竹筏，再次进行政治动员。各连纷纷再举“能人”。侦察连连长王友才是个广东人，入伍前当过水手，第一次试渡没有点上他，憋了一肚子气，这次又要求参加偷渡，团长和我考虑架桥需要他，没有批准他的要求。

入夜，江水汨汨，寒风凛凛，我们在竹林里把担任偷渡的一营集合起来，作了战前动员。

突击赶扎的三个双层竹筏放在岸边。第一个竹筏下水了。五个勇士在毛连长的带领下，首先跳上筏子，他们除配备必要的武器弹药外，还带着火柴和手电，约定到了对岸之后以电筒光和火柴光为联络信号。

第一筏顺利地离开了江岸。

敌人没有发觉，第一筏继续向江心划去。

第二筏、第三筏相继下水了。

同志们预祝他们成功，看着他们的竹筏离岸而去，一瞬间即消失在夜色中了。大家站在江岸上，目不转睛地望着对岸黯黑的山影，期待着胜利信号的出现。但是一秒钟过去了，两秒钟过去了，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始终看不见对岸有什么动静。他们究竟到达了对岸没有呢？他们正在前进吗？他们遇到什么困难了吗？为什么既不见亮光，又不见他们回来呢？等了又等，没有一点影子，真象是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无法捉摸。当时最迫切的问题是查明情况的究竟，大家为此焦急万分。直到三十分钟后，才有一个通信员匆忙跑到江边报告，说：“第二筏到了江心后，被水流冲下五里，险些翻掉，现在已经返回来了。”团长与我正在追问详情，第三只竹筏上的同志也返回来了。原来他们的竹筏子也被水冲下了二里远，摸不到方向，几次险些冲翻。至于那第一只竹筏呢？始终不知下落。在此情况下，不敢盲目地再发竹筏，只能另想其他办法。

我们在江边盼着，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但是对岸仍然不见灯光，也未见他们回来。

夜，漆黑的夜，乌江水咆哮着，天空又纷纷扬扬飘下大雪，冷雨湿透了我们的军衣，通身冰凉，我们怀着焦虑的心情，等待了整整一夜。

元月三日凌晨，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同志来了。他带来了重要的情况。他说，追踪我们的薛岳纵队离这里不远了，军委催促我们四团迅速完成渡江任务，要求是越快越

好。并派来了军委工兵营^①归我们指挥，担负架桥任务。他还一再地说，如果我们不能过江，势必只能背水一战，情况将会更加危急。

我们四团的指战员，听到这一消息，情绪激昂，纷纷向团部请战。他们表示：愿意作出最大的牺牲，渡过江去，确保党中央和我军主力安全渡江。我们团党委也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尽管有两次失利也决不气馁，为了不失时机，准备出动六十多个竹筏，立即强渡。

拂晓，天出奇的冷，昨夜一场大雪将竹枝都压弯了，裹在枝头的残雪，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银光，滚滚的江水哗哗作响，而我们第一批三个竹筏上准备过江的战士，却冒着严寒，赤着膊，穿着短裤，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一齐入江离岸，开始了强渡。这时我们除继续对大渡口组织小部队佯攻外，把主力集合在竹林里，由一营担任突击，作为第一突击队。

敌人开始没有发现我们，而当竹筏距敌人约五十米时，突然听到对岸响起了清脆的机枪声。奇怪的是，他们的火力没有朝着竹筏，而是往崖上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竹筏离江心更近了，敌人更慌了，他们几乎乱了阵脚，枪不知往哪里放。正在这时，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仔细一辨，啊，声音是从江对岸石崖边传来。我一阵

① 该营由教官谭希林同志和营长韩连生同志指挥。

紧张，赶忙举起望远镜，现在可以看清，从对岸石崖底下，贴近敌人的地方，钻出几个人来。

“会不会是我们的人！”我正想。

敌人的火力突然一齐转向崖底。

竹筏乘隙加速前进，筏头激溅起一簇簇雪白的浪花。

竹筏靠岸了，他们吹响了宏亮、激昂的冲锋号。

竹筏上的同志与崖底下的人组成了交叉火力，象把钳子紧紧地咬住了敌人。

敌人的气焰被压下去了。他们纷纷向后逃窜。

我们的同志冲上了敌人的阵地，战果在不断扩大。现在完全可以判定，崖底下的人是我们自己的同志。

是谁呢？就是毛振华连长他们。

原来，毛连长与五个同志带了一挺机枪，乘坐第一个竹筏，在二日晚上摸黑靠上了对岸。他们上岸后，希望后续部队过来，但是久等不见来人。他们听到头上几米远的地方有铁器响。显然，敌人在那里筑工事。他们在敌人的脚底下，又怎能打手电、划火柴呢？在这困难情况下，他们只好在敌人工事底下潜伏，等待时机。

偏偏这时天空又飘起雪来，雪花落满了他们的肩头和一身。寒风呼啸着，江边分外的冷，毛连长他们穿着褴褛的军装，相互依偎，紧紧地抱在一起，用彼此的体温抗御着风寒。在敌人的工事下，他们可以清楚地听到敌人的对话、议论。但是为了胜利，谁也不咳嗽一声，谁也不说一

句话。半夜，毛连长突然发现一个年轻的机枪手不见了，五个人到处摸黑寻找，但不见踪影，有的同志开始怀疑了，这个同志是位刚从白军中过来的新战士，会不会经不起恶劣环境的考验，在这生死关头动摇了？有人建议立即转移，或是拚着性命冲上去，向敌人作最后一击。但是坚定、沉着的毛连长分析了一下情况之后，说“不会”，并压低声音说服了同志们——为了全局的利益，决不能贸然行动。他还说：“万一被敌人发觉，我们就等着敌人靠拢，然后用手榴弹对付他们，敲掉一些敌人后，再往山里撤！”过了一会儿，果真那位同志回来了。原来这位新战士拉肚子了。毛连长问他：“为什么不拉在旁边，走出去不怕敌人发觉？”那位战士笑笑说：“我怕拉在这里太臭！”就这样，结束了一场虚惊。第二天拂晓，当强渡的大队竹筏快接近岸边时，这六位勇士才出其不意地从敌人鼻子底下跃了出来。

第一批强渡的同志与毛连长他们会合后，我们又赶紧调集一营的其他同志作为第二梯队，撑着剩下的几十个竹筏向对岸的敌人驶去。这时二营全部火力，加上数十挺轻、重机枪和军团炮兵一齐吼叫起来，向敌人压去。总支书记林子钦和青年干事黄春美考虑到一营没有教导员，为了协助一营长指挥部队占领敌人团阵地后向纵深发起攻击，也和他们一起过了江。

一营过江了，神速地占领了高地。三营这时在江边焦急地等待过江工具——竹筏。忽然，对岸枪炮声异常猛烈

地吼叫起来，我用望远镜一看，不好，敌人的预备队开到了，齐向一营压来。他们夺回了一营占领的阵地，一营且战且退，被迫退到了江边……

在这紧急关头，一直在团指挥所的陈光师长派人叫炮兵连连长赵章成和指导员王东保一同赶来。

炮兵连是军团直属连，本来是炮兵营。那时，有四门八二迫击炮，两门机关炮^①，编成三个连队。湘江觉山阻击战中，损失很重，只剩下两门八二迫击炮了，因此一个营缩编成炮兵连，原来的营长赵章成就当了连长。

赵章成同志可谓红军中炮兵的鼻祖了。他原在白军部队里当炮兵副连长，受过正规训练，炮打得准极了。他是一九三一年在江西参加红军的。

赵章成和王东保很快来到指挥所，团长和我向他们交代了具体的战斗任务。然后，陈光师长问道：“赵章成、王东保，还有几发炮弹？”

“还有五发。”赵章成同志如实向师长报告说。

陈光师长向对岸敌群一指：“看到敌人没有？”

“看到了！”赵章成和王东保一起回答。

陈光师长用力做了个推挡的手势：“非把敌人打回去不可！把敌人打回去！打不回去，拿着脑袋见我！”

“是！”赵章成、王东保二人坚定地回答说。

① 即一二·七机枪。

团长和我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坚决地完成这次任务！”

他们接受了任务，转身往外走。

任务这样紧迫，我也随后跟了出去。

赵章成和王东保一路小跑，边跑边核计如何完成任务。

王东保说：“这是死命令啊！”

赵章成并不慌张，还和平常一样，不紧不慢地说道：“不要紧。留下的几发炮弹，我都检查过了，底火、引信、药包都是好的。”

王东保想了一想说：“我去动员，你去准备。”

“你去动员吧，我马上就准备好。”赵章成说。

王东保最后还是担心地说道：“打不下来，我们两个要拿着脑袋去见首长啊！”

说到这里，已经到炮兵连预设阵地了。炮阵地离指挥所只有几十米远，靠近江边，前面有一排稀稀拉拉的毛竹，地上已经预先挖好了安放炮盘的圆坑。

别说王东保担心，我也在考虑：炮弹这样少，只有五发，万一虚发，那……

这时赵章成同志迅速地架起一门八二迫击炮。

王东保站在旁边，指着敌人，向战士们大声喊道：“大家看到敌人没有？”

战士们齐声回答：“看到了！”

“我们要把敌人打回去！”

这就是临战的紧急动员了。

阵地上非常紧张，但炮连的战士们毕竟经过赵章成的严格训练，忙而不乱，有条不紊。

战士们从炮弹箱里拿出了五发炮弹。这全都是从苏区一步一步背来的哩。谁想到这每一发炮弹如今都联系着乌江战斗的成败啊！

头一发炮弹，传递到赵章成的手里。

站在旁边的我对着他说：“赵连长，沉住气！”

“杨政委你放心！”赵章成同志说。

这个老炮手一手托起炮弹，一只脚往前伸出半步拉成弓步，没有瞄准镜，而是闭上一只眼吊了吊线，把炮弹送进了炮膛。

“轰！”一声巨响。

炮弹在敌群背后爆炸了。敌人仍在碉堡前蠕动，指导员王东保同志有些沉不住气了，说道：“老赵，炮弹不多，这还行！”

“不要慌，重点在后面！”赵章成仔细地瞅了瞅弹着点，原来刚才他打出的这发，是试射，因而十分沉着地答道。

说完，他又用手指头瞄了瞄，然后双手捧起一发炮弹，举过头顶，跪下一条腿，对着天空，象念咒似的喃喃说道：

“不怨天不怨地，我是奉命射击，冤鬼不用找我！”

原来，赵章成信佛，不忍开“杀戒”。这种浓厚的迷信色彩，不免使我觉得可笑。

他说完，将一发炮弹滑进炮膛。

这时阵地上，鸦雀无声，可以听到炮弹在炮筒里下滑的丝丝声。

“轰！”又是一声巨响。

只见炮弹出膛，弹头弯曲飘忽而去，一个隐隐的黑点从高空骤下，少顷，火光一闪，“哇！”炮弹在敌群正中间爆炸了，顿时掀起一股浓烟。

“打得好！”我不禁喊了起来。

接着第二发、第三发连续发射，向我滩头部队冲击的敌群顿时被浓烟覆盖了。

硝烟稍散，只见那品字形的三个炸点的前后左右，躺了一大片敌尸，其余的敌人鬼哭狼嚎地向后溃逃。我滩头部队，乘势发起猛烈的进攻。

从望远镜里看到这一景象，实在叫人太高兴了。于是，我放下望远镜，用两手抓着赵章成同志的双肩，激动地说：“打得好，我要建议军团首长给你们立功！”

“打完了，可惜只剩一发炮弹了！”赵章成同志却在一旁笑笑说。

从他的语调里，听得出他是那样心疼几发炮弹，是啊，步兵战士弄到几颗尖头子弹，象宝贝一样珍藏着，擦了又擦，闲下来时，拿出来与战友比“宝”。这几颗炮弹，自然会是神炮手的心尖子罗！三个月来爬山涉水，不知多少次，他擦了又擦、摸了又摸，这是从上百发炮弹中精选了又精

选留下来的。再说，他是炮兵，没有炮弹，光有空炮有什么意义呢？

陈光师长似乎看出了赵章成同志的心思，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说：“不要紧。我们打到遵义去，就能装备了。”

现在，我们乘胜踏着工兵营用竹筏子和门板架起来的浮桥，跟着三营冲过了乌江。

我们全团过江了。

一军团踏着浮桥浩浩荡荡跨过了乌江。

中央机关也踏着浮桥过来了。

敌人号称的乌江天险，终于被我们突破了。

当薛岳的部队追到江边时，我们已经烧掉浮桥，跃马在乌江上游百里以外了。他们只能望江兴叹，踟躅在江边追忆他们妄图堵截红军的美梦。

隔了几天，即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红星报》大字标题《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报道了如下内容：

红四团三连连长毛振华得红星奖章，其余每人均奖军衣一套。

领导此战斗的主要干部：一营长罗有保^①，三连长毛振华，机枪连^②连长林玉，二连政治指导员王德云，二连青

① 在回师遵义时，罗有保同志两腿被敌机炸断，壮烈牺牲在遵义城头。

② 即机枪连。

干①钟锦友，二连二班长江大标，二连长杨尚坤（堃）等八同志。

涉水及撑排的：“西市”②机连孙明，“山西”③王家福，“西城”④王友才、林玉，“西城”三连五班长唐占钦，“西市”赖采份等六同志。

文字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形容词，几乎都是名字，可是这些金榜题名的英雄，它会象乌江的流水那样，扬名在历史的长河中！

1 即青年干事。

2 3 4 均为部队代号。

第二章

长征（中）

伟大转折

由江边败退下来的敌人，直向通往遵义大道的猪场逃窜。那个“江防司令”林秀生逃得最凶，临走连司令部的电报稿、机要文件都不要了，一口气跑了几十里。他那心爱的“三八式连长”^①负了重伤，找不到担架，让士兵用绳子捆住手脚，象抬猪一样走着，据说没走到猪场，在半路上就呜呼哀哉，成了一头“死猪”。我们一口气猛追，一路上，“双枪将”的烟枪、步枪满地皆是，还缴了些迫击炮弹。

七十发八二迫击炮弹摆在面前，赵章成、王东保看得眉开眼笑。这可够打一阵子了！炮兵连的战士再不必徒手行军了，每人一根竹扁担，一头两发，再加上米袋子，一

① 该连全是三八式步枪，曾担任过候之担的卫队。

共四十来斤，一溜儿几十根小扁担，吱嘎吱嘎响得非常带劲。

六团和我们红四团一路紧追，六团为先头团，他们首先占领遵义城。

随后，我们也到了。这时，经过战斗洗礼的遵义城，沐浴在朝霞里。我们看到，楼房鳞次栉比，街道宽阔，店铺很多，有的已经卸下门板开始营业，鲜红的桔子、松软的蛋糕、装璜华丽的云烟和装璜古朴的茅台……真是琳琅满目，这一应日用百货也都呈现着城市独有的景象。这种强烈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我们最近一个时期，一直在十万大山里钻，一进城，颇有耳目一新之感。看久了茅屋、野店、小径和山路，再看到贵州第二名城，干部战士都颇为惬意。

休息号吹响了，我们准备暂时就驻扎在这里。

哪知，战士们刚放下行装，那些好奇的学生们三人一伙五人一群，就把他们围住了。这些学生争着要看“水马”。

原来红军“水马渡乌江”的消息，早已传遍了山城。这首先是敌人给我们做的“宣传”，为了掩盖他们的无能和溃败，胡吹红军有水马，并且煞有介事地说水马如何厉害。以后又由群众一传十，十传百，就把红军说成是天兵天将了，什么过乌江有水马啦，上城不用梯子啦，有子弹打不透的盔甲啦……越传越神。所以部队一进城，就遇到了这个必须耐心向群众解释的小小麻烦。

不过，这种“小床烦”，倒也使同志们头脑里一直绷得很紧的那根打仗的弦稍稍放松了一下。

休息号吹过不一会，警卫员小白急匆匆地跑来，说：“刘伯承总参谋长来了！”

我和耿飚同志连忙迎了过去，可不，不仅刘总参谋长到了，而且聂荣臻政委也来了。也许昨夜一夜没有睡觉的关系，刘总参谋长显得有些累。

他笑笑说：“同志们，辛苦了！怎么样，疲劳么？”

“我们准备就地休息。”我向他报告说。

“是啊，连续战斗，强渡乌江，星夜行军，是该休息了！可是，不成啊，你们还有重要任务，一刻也不能停留，要乘胜追击，继续前进！”刘总参谋长说完，看看我和耿飚同志，似乎在用目光征询我们的意见。

说实在的，干部战士是这样向往遵义，可是，屁股还没坐热又要出发，还真给政治思想工作出了个大题目呢。

我又进一步想：这个时候叫我们乘胜前进去执行重要任务，这个重要任务是什么呢？

耿飚同志看了我一眼。作为一个锅里掌勺子的老战友，我知道他眼下对这个命令感到突然，顾虑战士们缺乏思想准备。但是，我们也都相信指战员们是会坚决执行的。稍稍过了一会儿，耿飚同志说：“总参谋长，政委，你们交代任务吧！”

刘总参谋长从挎包里取出地图，指着娄山关和桐梓说：

“你们立即出发，迅速占领娄山关和桐梓。”

“是！”我和耿飊同志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刘总参谋长用铅笔在空中一点：“要快，越快越好！”

“我们马上出发！”我说。

聂荣臻政委接上来说：“杨成武同志，你是政委，要向同志们说清楚：任务紧急，不能在遵义停留。早饭也不能在这里吃，到路上去吃干粮，完成任务后，再争取时间好好休息！”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我说。

耿飊同志说：“请首长放心！”

我们送走刘伯承、聂荣臻两位首长之后，立即下令吹紧急集合号。

部队集合好了，我向大家作了简短的动员。看得出，同志们确实不大愿意马上就走。但是我们的战士是最识大体、顾大局的，执行命令也最坚决。我的动员，虽然话不多，但同志们一听就都清楚了。

我们上路了，队伍排得整整齐齐，浩浩荡荡地离开了遵义城。这时城里的群众以惊异的目光望着我们，好似在问：凳子还没有坐热，怎么又走了？

“我们占了遵义城，连块蛋糕也没吃上！”出城四五里地了，耿飊同志边走边开玩笑地说。

耿飊同志的警卫员是个瑞金老倌，怪机灵的，听团长一说，就骑上骡子，说了声“我去买”，飞奔而去。

我们喊了几声，也没喊住。

部队继续前进。没多会儿，蹄声由远而近，小老倌手上托着一个用毛巾裹着的包包回来了。

警卫员跳下骡子，笑咪咪地对耿飊同志说：“团长，蛋糕买来了。”

我瞅了瞅，说：“嗨，真不少，多少钱呐？”

这时刚好在行军休息中，耿飊同志从警卫员手里接过包包，打开一看，愣住了。天哪，这哪里是蛋糕，分明是雪白的胖糕^①嘛。

“你这买的是什么呀？”耿飊同志惊异地问。

警卫员理直气壮地说：“这就是鸡蛋糕！”

耿飊同志提高了嗓门：“你真是个土包子，这不是鸡蛋糕，这是胖糕！”

“我们江西的鸡蛋糕就是这样的。”

“哪里是这样？”

“我看到的就是这样。你就吃吧，不吃，连这个也吃不着了。”

我止不住地笑着说：“来来来，我先尝尝江西的鸡蛋糕。”

大家一哄而起，高高兴兴地一扫而光。耿飊同志也不由得笑了。这个小插曲，把离开遵义城那点不大痛快的情

① 即米糕。

绪冲掉了。

吃完“鸡蛋糕”，我们继续赶路。

遵义到娄山关是六十里，从娄山关到桐梓还有三十里，我们几乎一直都是用跑步的速度行军。当天下午就占领了娄山关南面的板桥，晚上在板桥宿营。

娄山关是遵义通向桐梓的大门，贵州北方的要冲，东西高山耸峙，南北有盘山小道，若是从川南到黔北，占领了娄山关，无险可守的遵义城，便成囊中之物了。所以娄山关便成了扼守遵义的兵家必争之地。

趁队伍在关下休息，我与耿团长登上一个山峰看了看地形，只见娄山关雄踞群山之上，峰峦如剑，直插云间，关势险要，真是令人寒噤。这时警卫员小白跑来报告说：“通信排发现了一个奇迹！”

我赶去一看，可不，通信排的同志七嘴八舌，喜笑颜开。一问才知道，原来他们在架设电话线时，无意中将我们的线搭上了敌人的电话线，敌人在电话里乱了套，叽叽咕咕又是责问，又是请示，又是报告。我要通信主任潘锋（原名潘思年）监听敌人的电话，把敌情搞清楚。

通信主任潘锋便毫不迟疑地开始认真收听、记录敌人的电话了。我们趁此机会打土豪，杀猪，烧饭，让大家美餐了一顿。

一会儿，潘锋拿来电话记录汇报了敌情。原来敌人的大部队并没有走，就在山的背后。从电话中听到的敌情来

分析，从山后到桐梓的路上有好几个团，对娄山关不能采用正面强攻，必须采取迂回的手段，前后夹击，方能奏效。

听说有仗打，有这么多的对手，大家高兴极了。但是天已傍晚，山高路弯，不易活动，加上部队连续行军需要休息，耿飚同志同我研究后决定明晨出击。

夜，静悄悄，大娄山周围好象没有发生什么事似的。但就在这夜里，我们悄悄地却又是十分紧张地在作战前准备。我与耿飚团长分头到连里检查，不仅每一支枪，每一颗手榴弹，甚至每个人的草鞋都必须万无一失。为了避免惊动敌人，我们禁止吹军号，只准口头悄悄传话，通知部队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就赶紧休息。这一夜，在静静的山沟里，每个人都睡了一会儿。

下半夜，我们就把迂回部队组织好，出发了。

迂回部队由一个侦察连和两个步兵连组成。侦察连长是王友才。参谋长李英华负责指挥。他们临走时，我们又一再交代：必须快速、机动，沿娄山关东侧崎岖小道，迂回到敌人背后，待他们打响后，我们正面就开始猛攻。

迂回部队出发以后，我们迅速集合队伍。凌晨四点，趁天未全亮，全团悄悄向娄山关的敌人接近。

大约不到一个小时，山背后果然传来了清脆的枪声，我们正面的部队冲锋号一吹，直往敌人压去。敌人没有想到我们会有一支队伍利用夜间沿着崎岖的小道插到他们的后面，给他们来一个前后夹击。敌人懵懵懂懂出来迎战，

虽然顽强抵抗，打了三个小时，但终于溃不成军了。这一下，他们可真是兵败如山倒，缴枪投降的、受伤呻吟的、死的、逃的，武器、弹药、大米、罐头、被服、装备，一路上到处都是，连那些军官和他们的太太坐的破轿子，也都丢在路旁了。

我们登了娄山关，看到关上有茅屋几间，石碑一块，上写“娄山关”三个大字，目睹山腰间的破城墙，发现王家烈为了堵住红军，筑了许多工事，可惜没有用上，我们却没付出很大的代价就一家伙闯进了大门。

占领了娄山关，我们沿着十步一弯八步一拐的汽车路又往下走，继续乘胜追击，边打边追，一口气追了三十多里路，就在当天上午又占领了桐梓城。

桐梓城是王家烈的老巢，传说中夜郎自大的夜郎国最早就建都在这里。也许正因为这个历史的渊源，久居夜郎的王家烈也学会了吹牛皮。不过，这下子牛皮全都破产了。

然而，桐梓城的建筑确实很漂亮，它不亚于先前我们见过的遵义城。这里，街道整齐，市面繁荣，虽四面环山，却还有电灯，有较为宽敞的南北公路，还有几个小工厂。听老乡说，桐梓城有两万人，可见这小小山城的繁华了。桐梓城小洋楼特别多，一幢幢，一座座，相当讲究，据说贵州省的许多军阀、官僚、富商发了财都在这里建一幢别墅，一则炫耀自己的富有，二则金屋藏娇，在这世外桃源的山城，也可闲来享乐。待我们红军进城时，这些达官贵

人早已逃之夭夭，留下一座座的空楼了，这正好为我们腾出了营地。也弥补了昨天匆匆离开遵义城所带来的遗憾。我们命令，每排分住一座洋楼。

我们红军指战员由于参军前大多数都是贫苦农民，在乡间，多半辈子也没有见过洋楼和电灯，如今一听说每个排住进一座楼，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有的同志还抽空去参观电灯公司的发电机，看看能使许许多多灯亮起来的东西是个什么样子。

中午正在吃饭，总支书记林子钦陪着一个穿着长袍的客人来找我，谈了一下，才知道，他是电厂老板。他对我们来到桐梓表示欢迎，接下去谈本意，叹苦经，说国民党抢走了他们的汽车，煤断了。一句话，机器没煤烧，发不了电。这怎么行，我们刚刚住下，同志们兴致勃勃等着晚上看电灯是什么样子，再说城里的居民也急着照明呀！商量了一下，我们决定派担架连，加上团直机关的同志突击运煤，保证晚上发电。

煤炭又黑又脏，从山那边搬到这边，真是个苦活，但红军战士们还是干得乐呵呵的，因为大家都清楚，这煤炭会给我们带来夜晚的光明。一直忙了两三个钟头，我刚洗完脸休息，陈光师长与刘亚楼政委来了，见了我们第一句话是：“你们马上出发！”

我们都没有这种思想准备，便问：“去哪里？”

“占领牛栏关，向松坎前进，占领松坎。”陈师长说。

刘亚楼政委看出了我们的情绪，拍拍我的肩膀说：“任务紧急，也很光荣。只要我们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革命胜利了，洋楼、电灯有的是。”

我点点头，却又说：“战士们的情绪……”

“战士们的情绪看我们干部。”刘政委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接了过去。

我们感觉到，这次任务非同等闲。占领桐梓还不够，还要前进到松坎。

看看地图吧，松坎北面是浩浩长江，隔江与国民党屯聚重兵的重庆对峙。这态势，分明是从正面掩护遵义。但具体内容，上级只说“非常重要”，不再明说，自然我们也不便多问。这态势，作为团政治委员，我不能不深思了。我觉得只有认真动员，搞通大家的思想，才能完成好任务。

我和耿飚同志研究之后，决定立即召开支部书记会议。

在支部书记会议上，进行了思想动员。他们当即返回连队进行深入的思想工作。

道理一讲清，干部、战士就高高兴兴地打起了背包。下午四点钟，与师部要求出发的时间一分不差，我们派人检查完群众纪律，就列队离开了桐梓城。

走出十几里之后，在山梁上回头一望，同志们高兴地看到，桐梓灯光闪烁，就着山势的高低，层层叠叠，好象那里耸立着一幢幢高楼大厦，显得格外壮观。

我们沿川贵公路北上，经石中场，奔袭四十里，到了

牛栏关。

牛栏关，也名副其实，只有四五户人家，十来间破如牛栏似的茅屋，与桐梓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我们向老乡一调查，说不少的敌人过了一整天。我们派出了警戒，全团露营。面对着满天星斗，战士们在房前屋后，树荫下，竹林里，在狼吟虎啸之声中，伸直了疲乏的身躯，怀里抱着枪，头下枕着小包袱，鼾然入梦了。

次日拂晓，我们上路不久，就在新站镇南边碰上了敌人。嗨，一大溜，抓了个俘虏一问，敌人有四个团的兵力，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占领了牛栏关。于是，我们利用踞高临下的地形，猛冲下去，给敌人来了个措手不及，与敌人四个团战斗了一天，消灭了两个团，剩下的，一部分丧魂落魄地逃往松坎，一部分钻进了旁边的山林。

从牛栏关到松坎将近一百里路，由于与敌人纠缠，一天才走了不到一半。我们怕影响占领松坎的任务，下令吃点干粮，连夜追击前进。敌人一触即垮，一压就倒。黑夜走到半路上，前卫连摸黑碰上敌人重机枪连，一枪不发，六挺机枪夺下了两挺，就这样摧枯拉朽，边打边追，后半夜接近了松坎镇。第二天清早，未等敌人开早饭，我们就把他们撵出了镇子，占领了松坎。

我们刚清理完战场，就接到了师部的命令，要我们在松坎就地休整七天，警戒四川重庆方面来的敌人。

在松坎七天，我们总结了乌江战斗、娄山关战斗、牛

栏关追击战的经验。此时我们又接到了命令：耿飊同志调离四团到一师任参谋长。

说实在的，我和耿飊同志近二年一起浴血奋战，结下了很深的战斗友谊，突然听说他要调走，很是恋恋不舍。

接到命令，他当即交接工作，向干部、战士辞行，登程上路。

我依依不舍地送他，并肩缓步走出松坎。他的警卫员牵着他的那匹性情温顺的骡子跟在后面。

我不由得想起，我初从担架上下来，拐着腿，骑着耿飊同志让给我的这头骡子穿行在坎坷不平的崇山峻岭上，踏着月光，踩着霜花，越幽谷，历险径，如履平川，平稳自如。现在耿飊同志就要和我分手了。送了一程，我站在高坎上，目送着他那渐渐离去的背影。

新调来的团长叫卢子美，是宁都起义的干部，在位时间很短，就换了王开湘同志。

王开湘同志是江西弋阳人，其实还很年轻，二十六七岁，但我们这一帮大抵都是二十岁左右，看上去他就是老大哥了。他个头不高，身形单瘦，一见之下，便觉得他沉毅、忠厚。他原来在赣东北方志敏同志那里工作，后到瑞金学习，留在一军团，曾任一师政委，军团供给部政委，军、政工作都做过。

在松坎警戒的七天中，尽管四面八方风声紧急，重兵压城，但遵义得到了相对的平静。

在松坎警戒的七天中，部队还进行了补充、整编。为加强四团，少共国际师的一个团编入我团。我们隆重地召开了迎新同乐会，欢迎少共国际师的战友，罗华生同志就是原来少共国际师一个团的党总支书记，由于林子钦同志这时也调走了，他调来我们四团后，便顶替了林子钦同志的工作。

警戒到第七天，我们接到了军团拍来的电报，称：中央胜利地召开了遵义会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同志组成军事领导小组。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我党我军的领导地位。

我们这时才明白了，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我们四团进驻松坎，对川敌进行警戒，就是掩护这次会议的。同志们为能执行这样的任务而骄傲！

我拿着电文纸的手，簌簌地抖个不停，热泪滚滚，情不自禁。

尽管这还不是正式传达，电文也非常简要，但它却立即在全团指战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志们奔走相告，群情激奋。

领导我们打了那么多胜仗的毛主席，终于回到军委的领导岗位上来了。这是一件多么振奋人心的喜讯啊！

我不禁想起了从这次战略转移以来，一路上，指战员们一直盼望着毛主席来指挥的那种急切心情；想起了湘江之滨的血与火；想起了五次反“围剿”中的一场场恶战，

啊，那么多的好战友，血染江流，横尸沙场，他们要是能看到今天的伟大变化，该多么高兴啊！

今天，终于云消雾散了，红军在危难之际，有了众望所归的领袖！

虽然时间紧迫，也没搞庆祝活动，但这种欢天喜地的心情是掩饰不住的。它化成了我们冲破云雾向赤水进军的战歌。

回 师 遵 义

一月中旬我们向贵州、四川边界的赤水河前进，敌人怕我红一方面军在泸州、宜宾一线渡过长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四川军阀刘湘、杨森一看这架势以为我们真要捣他们老窝，就着了慌，拚命地组织力量准备死堵。原来，在我们初进遵义时，刘湘已经调集了他最精锐的王牌部队即所谓模范师郭勋祺部开入纂江作好了迎击准备，同时又把主力第五师陈鸣谦部从涪陵调到川南，把二十一军留驻长江南岸，防堵我军入川。当他确知我主力向赤水挺进时，急忙命令郭勋祺部赶到赤水，竭力阻击。这时，湘军徐源泉、陈光中部也奉蒋介石的命令分头由彭水、石阡方向赶来，黔军尤国材、何知重、柏辉章残部和湘军章克基等部从遵义尾追，而吴奇伟纵队又绕贵阳、出清镇北上，滇军孙渡亲率二、五、七三个旅从毕节方面赶来。一时间，赤

水河边人嚷马嘶，刀枪林立，军阀们各显神通，企图组成一个大包围圈，一举把我红军消灭掉，尤其是郭勋祺依仗人多枪好，气焰十分嚣张。

敌我双方都向赤水前进，我们与郭勋祺的部队一水之隔、齐头并进，他们走的是平坦的公路，我们走的是山间小道。但他们是雇佣兵，要赛过我们的“气毛腿”又怎么可能？！不用多久，我们就把他们拉下去了。紧接着，我们红军抢先占领了土城地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侯之担集结在土城的部队打了个焦头烂额，狼奔豕突。这位倒霉的红军手下败将，从此就以“剿匪不力，迭失名城，擅离职守，贻误军机”的罪名，被蒋介石以“军法制裁”了。

我军进入土城一带，群众兴高采烈，不仅夹道欢迎，还燃放鞭炮。

在赤水河边的土城附近，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我们听说郭勋祺的模范师赶到了，另外还有一个师。这时我们的三军团和军委干部团正在与敌人激战。于是，我们一军团上去增援，参加了战斗。

在赤水与我作战的川军负隅顽抗，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由于他们熟悉地形，又有牢固的工事，再加上是以逸待劳，增援部队又陆续赶到，我们越打，敌人越多，打了一天一夜，也解决不了战斗。

战斗胶着了，双方的伤亡都在不断增加。我们战斗的回旋地区在缩小。看来，突破川军阵地，很困难了。就在

这时，朱总司令出现在我们阵地的前沿。

他仔细观察了敌我的战斗情况，当机立断，下令后撤。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军委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改变了过去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路线，摆脱了被动状态，采取了主动、灵活的战略方针。土城战斗，敌强我弱，腹背受敌，于我不利，为了保存自己，打击敌人，避其锋芒，主动后撤是完全正确的。实践证明，撤出战斗，在赤水河两岸的广阔地区与敌人打圈圈，寻找有利战机，歼灭敌人的方针是符合军事辩证法的。

我们从前沿撤下来了。突然，又传来命令，说，朱总司令还没有回来，为了掩护朱总司令后撤，团长和我又带了二十多个同志冲上山坡，堵住敌人。

敌人象着魔似的一个劲儿往我们阵地压来。我们遥见身穿灰布军装的朱总司令，他还在赤水河边用望远镜看着什么。

阵地上的人越来越多，除了我与王开湘同志，六团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同志都来了，大家都为朱总司令的安全担心，我急得手掌都沁出汗来，但是看看朱总司令，他还是稳稳地站在那里，仿佛近在咫尺的土城仅仅是一座寂然无声的空城，周围的战斗全然没有发生似的。

就在这时，一颗子弹飞来，打在我的手上，我的一个手指负伤了，小白急着要给我包扎，我推开他，大声说：“注意前方敌人，掩护朱总司令！”

我们在阵地上顶了整整一个钟头，朱总司令终于收起地图、望远镜，离开赤水河的北岸，不慌不忙地回到阵地后边来了。

我们向他敬了个礼。我说：“总司令，我们在掩护你，你怎么走得这么慢啊？”

朱总司令坚毅的脸上露出了和蔼的笑容，说：“我不知道呀！”

王开湘同志和朱水秋同志也说，我们急得心都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

总司令亲切地笑笑，炯炯有神的目光盯着我们，然后用从容、风趣的语调说：“急什么，诸葛亮还摆过空城计呢！”

我们撤离土城附近的阵地，渡过赤水河，经叙永扑向威信。国民党闻讯赶来。我们又避其锐气。挥戈向东，二渡赤水，我们三军团再占桐梓。川军、黔军、滇军、湘军和“中央军”，在我们屁股后面打圈圈，迷了方向，一时，不知红军的来踪去迹。

我们在这期间途经叙永、威信、古蔺、扎西地区，还扩大了队伍。云贵川这一带，群众倍受军阀的剥削和压迫，衣不蔽体，食不饱腹，正如当地群众所说：“人无三分银，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红军一宣传打倒军阀，解放自己，群众便纷纷响应，参加红军。

当我们把敌人远远甩在后边，乘敌之虚占领桐梓城时，王家烈慌慌张张、急如星火地从其它地方调来了重兵扼守

娄山关。

这时，由三军团攻打娄山关。三军团是长征中的主力，军团长彭德怀同志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善打硬仗。十二、十三团担任主攻。他们都是江西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时威名赫赫的高虎脑、万年亭战斗的英雄团队。而他们的对手是王家烈。所以大家心里很踏实。

果然，翌晨，传来捷报，三军团拿下了娄山头，师部命令我们四团继续向娄山关、遵义方向前进。

这一日，浓雾弥天，对面不见人。我们刚行十几里，雾稍退，就听到“嗡嗡”的飞机声，我正好与通信排的同志一起走。长征路上，我喜欢与这些小鬼结伙行军。

通信排的这些小鬼，最大的十八九岁，最小的十五六岁，一天到晚无忧无虑，说说笑笑，唱唱跳跳，除了一路上积极完成架线、通信的本职业务工作以外，还兼任鼓动、宣传工作。那时间我们没有专职的文工团，也没有业余的宣传队，要调剂部队的文化生活，基本上也就靠这些“业余文艺积极分子”了。晚会上，他们是主角，唱个地方戏，哼个家乡调，说个故事，拉个歌子……样样都来；行军途中，他们也闲不着，喊口号、编快板、搞鼓动、哪里有他们的身影，哪里就腾起一片欢笑；哪里的战斗胶着，哪里攻城遇阻，他们就奋不顾身地出现在哪里。他们即兴编词，自己编曲，用歌声激励团队前进。他们简直成了我们政治工作的左右手。特别是排长小谢，我格外喜欢，这个能——

边走路一边编歌子的机灵鬼，一遇休息，就缠住我不放，要我讲形势，说故事，而这些我随便说来的东西，不用多久，又成了他们“业余宣传队”的宣传材料。

说到小谢，我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实足年龄才十八岁，两年前参军的时候才十六岁，个子不高，一副孩子气，但喜欢装作大人，说话也拖声拖气，刚参军时，因我嫌他小，他还哭过鼻子呢。

小谢的父亲是乡农民协会的主席，红军在江西兴国建立乡苏维埃后又当了乡苏维埃主席，斗争恶霸地主，分田分地，自然是一马当先的积极分子。谁知红军打仗一转移，国民党的民团赶了回来，一夜变了天，那个剿共团团副，又偏是小谢他爹当乡苏维埃主席时亲手镇压的老地主的儿子，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那剿共团团副立即报复，一夜之间就杀了小谢一家好几口子。那天，亏得小谢跳窗逃得快，否则也难幸免。就这样，他一口气逃到外边，沿途求乞，暗里打听红军，才找到他那替我当马夫的叔叔老谢，但他的个头实在小，人还没有枪高，我怕他当红军吃不了苦，想给他安排在政府机关里当勤务兵，可他说什么也不肯，这才留在我们团的通信排了。这小鬼经过两年的战斗锻炼，果然不错，长征开始前，他就成了一个称职、活跃的通信排长，长征路上，更是好样的，执行任务坚决，工作积极肯干，把一个排搞得朝气蓬勃，团结得象一个人。他这个能文能武的排长，真是讨人喜欢哩！

“飞机！卧倒！”我们正并排走着，小谢突然高喊一声，用力把我推到一个两米深的土坎里，与此同时，通信排的同志也全部卧倒在地上了。

“轰、轰、轰”几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我本能地意识到情况不好，抬头一看，三架飞机从我们身边俯冲过后，扬长而去。我赶忙拍拍身上的尘土，瞅了瞅周围，只听到一个小鬼哭了，一边哭还一边喊着：

“排长，排长！”

我知道出事了，从土坎下站起来，上前一看，可不，只见谢排长仰身躺在那里，胸口鲜血直流，我赶忙一手从地上托起他，一手试试鼻孔里的气息，连连叫唤：“小谢！小谢！”可是，他一动也不动，落满尘土的脸显得分外苍白。我用手托着他那软弱无力的身子。

“排长，排长，你不能死呀！”一边站着的通信排的同志失声痛哭起来。

我呆住了，不相信这一切，更不能相信生龙活虎的他——我们的小谢真的死了，但这是真的。我缓缓地用双手托起他，仰望着白云飘浮的蓝天，凝视着这岗峦起伏的群山，仿佛他又在山那头亲昵地呼唤着我，仿佛那“卧倒”的声音，又重新响在我的耳边。

多么好的一个年轻同志啊！为了革命事业，他的一家先后献出了几条生命，如今他为了掩护我，不幸牺牲了自己，把鲜血洒在了长征路上，和我们永别了。可是，他的

形象，他的音容笑貌，他的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却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激励和鞭策着我们继续前进，去投入新的战斗。

“安息吧！小谢，血债要用血来还！”

我默默地叨念着，然后，把他的遗体安放在地上。

同志们都围拢来了，经过清点，敌人这次轰炸使通信排伤亡十六名，几乎占了这个排的一半。牺牲是巨大的，看着烈士们的遗体，想到刚才几分钟前还是欢蹦乱跳的一群小鬼，我的视线模糊了。

有的同志伤心地哭泣起来。

“为谢排长他们报仇雪恨！”我跳上高坡，大声说道。

“为谢排长他们报仇雪恨！”同志们跟着高呼口号，从心灵深处迸发出来的悲愤的声音震撼着群山。

马夫谢定元闻讯从后边赶来了。

“老谢，不要悲伤！”我劝慰道。

“我不会哭，眼泪早流光了！”老谢说。然后，他走近小谢，弯下腰去，用索索发抖的手抚摸他侄子的脸庞。他果然没有哭。突然，他用颤抖的手在谢排长胸口撕下一块带血的军衣，又从地上抓起几颗带血的石子，用这块布紧紧包住，一会儿，呼地站起，把它高高地擎在手里，高声呼喊：

“血债要用血来还！”

雾退尽了，迟来的、金黄色的太阳，照射在老谢身上，

他仿佛变成了一尊庄严的石雕。

“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同志们，前进！追击敌人，消灭敌人，为谢排长和死难的战友报仇！”同志们齐声喊着。

队伍象铁的洪流朝南，朝娄山关，朝遵义方向奔腾着，前进着！

一个个，不用呼唤，不用催促，都在快步走着，我们几乎在跑步，在交织着血和恨的复仇气氛中迅跑。

我们一口气奔到遵义附近。这时三军团已占领遵义，敌人正在进行疯狂的反扑，一军团奉命从遵义东面迂回，插到遵义城东南配合三军团作战，重占了遵义的新城。我二师又奉命直插遵义通向贵阳的公路，截断了敌人的退路，敌人在我军的夹击下，其主力被歼，残部溃散。这时我团奉命向烂板凳、刀把水、乌江追击，限时追到乌江边。

于是，我们就象插上了翅膀一样，放开大步，追到了烂板凳，把敌五十二师杀个片甲不留。

天下着小雨，我们穿上从敌人手里缴来的雨衣又继续追击，追到刀把水这个小镇，又把敌人另一个师，打了个溃不成军。这时，敌人师部的后方来不及撤，一些长官的太太也都被甩下了，留下的敌人也都当了我们的俘虏。那些大官们逃跑之前慌慌张张留下的满桌的水果、高级点心，正好给我们充饥。

我们匆匆吃了点东西，又跑步追击，我们的口号是：

“追到乌江边，全歼敌人！”

“跑不动拄着拐杖追，拄不动，滚，爬，也要赶到乌江边！”

我们的战士都是好样的，尽管白天走了一天路，打了一天仗，晚上又长追一百多里，从满天星斗追到曙光初露，硬是把敌人追到乌江边，一把火烧了敌人在乌江上架设的浮桥。这时，任务完成了，我也感到真正的累了。

回师遵义，这一仗是遵义会议后最大的一仗，是长征以来歼敌最多、重创敌人的一仗。这一仗，红军不仅打败了薛岳、吴奇伟和王家烈一伙二十个团，而且歼灭了兼程北进的薛岳、吴奇伟纵队一个半师。这一仗已列入长征的光辉史册。后来毛主席写下了不朽的诗篇《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四 渡 赤 水

再次攻下遵义，红军略作休整。这时，中央军委在遵义城的天主教堂里给我们团以上干部正式传达了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①的精神。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王稼祥等同志都来了。会上，由张闻天同志传达，当他宣读到毛泽东同志就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时，会场里顿时沸腾起来了。遵义会议就象春天一样，给红军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巨大鼓舞。大家又蹦又跳，多么高兴啊。同志们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纷纷议论道：“只要毛主席来领导，我们就有希望，就一定能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有的同志说：“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使我们丢掉了苏区，给苏区人民带来了一场苦难，使红军主力被迫长征。这次，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的错误路线，我们在毛主席的率领下，一定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会后，什么也不讲究，就地进行了所谓规模盛大的会餐，即用铁盆子盛着菜，倒上大碗的酒，几个人在地上围成一圈又一圈，吃了起来。当时，陈赓、刘亚楼、陈光、耿飚、王开湘等同志和我在地上围了个圈

^① 即遵义会议

子，也不知谁伸出筷子点了点盆里的菜，说了声：“吃呀！吃呀！”大家就随随便便吃的吃，喝的喝，干起来了。我们端着碗，一边饮酒，一边畅谈，开心极了。陈赓同志更活跃，菜已经够多的了，他还跑到伙房又端来了两盆，口口声声说要吃个痛快。天主教堂里，鼓掌的、捶桌子的、唱的、互相握手的都有，有的人还登上凳子大声疾呼，有的人端着酒碗发呆，有的人什么都忘了，我呢，只是高兴地喊着一个字：“好……”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问题解决了，问题解决了！”最后，大家高高地举起了酒碗，共同倡议：

“喝了，喝了，都喝了！”

大家情绪之激动，是前所未有的。

是啊，饱受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之苦的我们，今天，怎能不如醉如狂呢？这是历史严重关头的转折点啊！

随后，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到部队向连以上干部传达会议精神，当时天下大雨，部队冒雨集合在大坪上，一个同志给聂政委打着雨伞。当聂政委庄严宣布毛主席又统帅全军时，整个集合场欢声震天，振臂如林，一个个喜泪交流，握手相庆，那欢腾的盛景前所未有，大家早把大雨忘掉，风声雨声完全被欢呼声所淹没。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被排斥在外的毛泽东同志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之一，正如遵义会议决议中指出的那样：

“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从而在军事上结束了自五次

反“围剿”以来的单纯防御和退却、逃跑路线。事实也证明了，遵义会议后，由于党中央重新确立了正确路线，红军所向无敌，节节胜利。

此后，我们又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攻打遵义之西的鲁班场守敌，打了一夜，未彻底解决，又奉命转移到茅台镇。著名的茅台酒就产在这里。土豪家里坛坛罐罐都盛满了茅台酒。我们把从土豪家里没收来的财物、粮食和茅台酒，除部队留了一些外，全部分给了群众。这时候，我们指战员里会喝酒的，都过足了瘾，不会喝的，也都装上一壶，留下来洗脚活血，舒舒筋骨。随之，我们又奉命从这里涉过赤水河^①，奔赴古蔺，之后，再转回鲁班场，在遵义之西、鲁班场以东，打了一仗，消灭敌人后，又第四次跨过赤水河，南渡乌江，占领息烽，进逼贵阳。

这是毛泽东同志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以后四渡赤水，接连摆下的巧阵。

蒋介石连连吃了几个败仗，极为恼火，特别遵义这一仗，亏了老本，更是怒不可遏。于是，这位惯于孤注一掷的委员长，于三月二十四日从重庆乘专机直飞贵阳，要亲自“部署一切，统一指挥”。

当蒋介石到达贵阳，正绞尽脑汁部署他的部队时，毛泽东同志再次“调动”敌人的兵力，给敌人摆了三个阵势：

① 即三渡赤水河了。

一部分队伍（包括我二师四团）佯攻贵阳；
一部分部队以最快速度向瓮安、贵定挺进；
一部分部队（九军团）在桐梓一带牵制住敌人，摆出决战姿态。

蒋介石疑团莫释，不知红军何处是虚，何处是实。正在这时，他又忽闻侍从室告急，说：共军已到贵阳近郊。蒋介石顿时脸色突变，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

的确，这时我们四团已经占领霓儿关，这里离贵阳机场不远，站在高处可以看到贵阳市里的烟囱了。

贵阳是贵州省的中心，从地图上看，南北较长，东西较狭，成椭圆形，城外诸峰罗列，东西北三面有扶风、栖霞、狮子、黔灵等山环抱，市内地势平坦，面积只有八九平方公里，但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却是个得天独厚的地方了。

此刻，正是初春时节，在北方可能还在飘雪，但在这里蔚蓝的天空上飘着几朵白云，和煦的阳光照在身上暖烘烘的，鸟啁莺鸣，河水明澈，柳梢初绿，碧草、鲜花无处不吐露着春的气息。但是，我们无心赏春，我们心中清楚，要的是整个新中国的春天。眼前来说，我们要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化被动为主动，摆脱蒋介石的追踪，北上抗日。临来前，上级明确交代，此行贵阳郊外，是声东击西，虚张声势，掩护主力从贵阳附近折向西南，往云南边境急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我们大造声势，佯攻机场，采用一切手段，给蒋介石造成错觉，即红军真要攻打

贵阳。

于是，我们到达贵阳城郊，使用石灰在墙上刷出斗大的标语：

“攻打贵阳城，活捉蒋介石！”

“白军官兵们，不要打抗日的工农红军，掉转枪口，打死压迫士兵的白军长官！”

我们还把人集合起来呼口号，高唱《国际歌》。说也奇怪，敌人缩在城里也不还枪。

后来听说，这里由于蒋介石原先错误判断，孤注一掷，把能打仗的部队都集中在桐梓一线，贵阳城里只剩下不多的兵力了。当他忽然听到侍从室告急，说红军逼近贵阳城郊时，怎么不急呢？他等待从长官走出房间，便立即打长途电话给云南省的省主席龙云，要他顾全大局急派增援部队来贵阳，又亲令湘军李韫珩率五十三、五十九两个师赶到息烽保驾。蒋介石又怕我们和第二方面军会合，急令何键到常德监视我二方面军，并调湘军刘建绪、徐源泉等部在川、黔、湘边界布防堵击，又是重兵阻拦，又是派人奔袭，又下令尾追……直搅得蒋介石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更无心观望贵阳的春色了。

也就在蒋介石心神不安“团团转”时，毛泽东同志又指挥我们乘虚而入，引导大部队进入黔南山区。三月二十九日，红军第二次渡过乌江，连克息烽、定番、长顺、紫云，渡北盘江，占安龙、兴仁、兴义等县城，长驱直下，

如入无人之境。一路上，红军势如破竹，军威大振，真有过五关斩六将之势。就这样，我们摆脱敌人，挺进云南。蒋介石在“迷魂阵”中醒来，想重新部署兵力，却为时已晚，鞭长莫及。我们已经长驱数百里之遥，而且进入多山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

毛泽东同志自遵义会议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全局在胸，运筹帷幄，接连指挥我们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连摆巧阵，大量歼灭敌人，使我军取得有利时机，大踏步前进，彻底扭转了形势。毛泽东同志料敌如神，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我们的队伍再也不象刚离瑞金时，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了。那时行军作战，许多同志心中无数，有时白天还不能行军，只能昼伏夜行。现在却完全不同了，我们的同志昼行夜宿，十里一个小休息，三十里一个大休息。在大休息时，有的喝开水、吃干粮，有的打草鞋、补军衣，行军途中，政治鼓动几乎不断，连那伤病员也都忘了病痛，主动跟上了队伍。我们秣马厉兵，说打就打，士气高昂，而敌人，丢盔弃甲，疲于奔命，一筹莫展。记得我们追击敌人时，沿途在贵州的一些小镇子上，处处可见敌人写下的这样字迹：

“本师奉命开赴××，掉队士兵，赶快跟上，今日行程三十里。××师×月×日。”

由此可见贵州的“剿共英雄”逃跑时是何等狼狈了，

这真应着了“黔驴技穷”这句有名的成语。

在与敌人盘旋时，我们不但行军作战，而且一路上还撒下许多革命的种子。象老苏区那样的群众与我们心连心的感人场面，重又在云贵高原再现。

云贵高原地瘠人贫，群众俗称穷人为“干人”

我们每到一地，除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外，就访贫问苦，打土豪、分田地，把地方军阀和地主剥削来的不义之财，散发给干人。他们亲眼看到红军官兵平等，不吸鸦片烟，处处维护穷人的利益，真切地感受到红军是干人的亲兄弟之后，不但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们的重伤病员留在他们的家里，掩护起来，等养好伤后又亲自把他们送回部队，而且把自己的子弟也送来参加红军。我们的队伍要走了，他们就主动跑来送行，而且非要我们拿上他们带来的鸡蛋和包谷粑粑不可，几乎一路都是这样。

军民鱼水情，这个比喻是最生动、妥贴不过的了，红军是革命的队伍，人民的军队，是鱼，有了人民这样的水，才能自由来往，生存下去，离开了人民的水，那就成了涸辙之鲋，怎么也不行了。

智 取 三 县

佯攻贵阳，掩护大部队往云南地区转移的任务完成后，我团又奉命往曲靖、昆明方向前进，经长顺、紫云，渡过

北盘江，占领兴义。

兴义是个小县，但在贵州也算一个中等县城，有长街、闹市，还有一个法国天主教堂。听说这里还是蒋介石的助手何应钦的老家，怪不得我们进入这县城还见到了不少小洋房哩！

县城里的敌人本来就不多，经我们一击，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也都跑光了。天主教堂里那些和国民党反动派串通一气的法国籍、意大利籍神甫也逃之夭夭了。他们丢下了许许多多的火腿、罐头、炼乳、果子酱……这些东西，我们的战士们照例收下，不打收条。他们把这些缴获的作战胜利品全部送到了团部。那时，刚巧刘少奇同志和陈云同志来到我们四团，和我们一起行军，我们负责保证他们的安全。于是，团里的几位干部一商量，决定拿一部分缴获品慰劳几位领导同志。

当时，除了刘少奇同志、陈云同志外，还有八位大姐也随同我们团行动。这八位女同志就是邓颖超、蔡畅、贺子贞、康克清、刘英、刘群先、廖施光、杨厚增，我们称她们为八大姐。

八大姐跟随我们四团行军，也由我们负责她们的安全。由于这些大姐都是参加革命很久的老同志了，她们在行军中处处以身作则，做好样子。她们的模范行动，不仅受到了战士的好评，而且使得我们打心眼里对她们格外地敬重。八位大姐中有的体弱多病，为了照顾她们，我们团里抽出

八匹骡子给她们骑，但是好几位大姐自己不骑，用骡子来驮伤病员，载弹药。在行军中敌人的飞机突然空袭，贺子贞同志负了伤，我们组织担架抬了一天。

当夜，我们还见到刚刚赶到的毛泽民同志。他是一位老同志，刚从中央领导同志那里来，讲了当前的形势，给我们很大鼓舞。

入滇前，领导上作过交代，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必须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他们不了解我们，必须耐心宣传，严守群众纪律，不准与少数民族争吵，更不许开枪挑起冲突。

我们赶到前面山口，只见对面山坡上满是腰挎利刃、头缠青布的少数民族青年，他们见到我们一个劲地“嗷嗷”叫着。原来，他们是与我们说话，但我们谁也听不懂。只见他们手持火枪，奔着，跳着，似正在戒备。

王开湘同志与我商量了一下，决定我们亲自去对话。为了取得他们信任，我们把手里的枪放下，这下果然起了作用，那中间一位年纪稍长的少数民族兄弟也把枪往旁边一甩，后面跟了个年青人走了过来。

原来那年青人懂一些汉语。于是，他便结结巴巴说着汉语，充当翻译官。也真亏他帮了大忙，要不是他架起这语言的桥梁，我们怎么也难以进行复杂的对话。

还是他们先发问，那个年纪稍长的站在中央两手往腰间一叉，问道：“你们是中央军？”

我摇摇头说：“不！我们不是中央军，而是专打中央军

的中国工农红军！”

他们听说是中国工农红军，脸上添了一丝笑容，又问：“你们想住在这里？”

我又摇摇头说：“不，借你们的路过去。”

他又问：“今天就走？”

“对，今天就走！”我说，“你们还有什么条件吗？”

他听完“翻译”的传达，摆了摆手，并且做了个表示请的姿势。

事情想不到这么顺利解决了，我喜出望外，紧紧拉住对方的手。原来这是一位头人，他要“翻译”告诉我们，此去嵩明还有多少路，并说山那边县里的国民党中央军不多，但很坏，要我们小心等。为了感谢少数民族兄弟，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真诚友谊，我们留下了一些布匹、衣物之类的战利品，还给他们一些子弹。他们高兴极了。当我们的行军队伍通过寨子边的山路时，他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倾村出动，夹道欢送，那热烈的场面，实在感人。

我们走了好几天，占领嵩明后，摆出了一个进攻昆明的姿势，本来是想迷惑敌人的，没想到同志们情绪极高，以为这下一定是抄龙云的老巢来了。

半个月前，当我们佯攻贵阳，离贵阳城只十几里路时，云南军阀龙云奉蒋介石之命匆匆忙忙派主力去贵阳增援。想不到，半个月后，红军进入大山绕了个圈子，又到了昆明城下。蒋介石此时正在昆明，不由得手忙脚乱了。龙云

眼看自己的巢穴危在旦夕，便又是电报，又是电话，还派出人去四面告急。

然而，就在我们的战士在昆明城附近将“活捉龙云”的口号呼得山响的同时，部队开始转移。蒋介石和龙云又都上当了。

佯攻昆明，使云南全境震动。滇军不得不匆匆忙忙往昆明集中，这就造成了趁虚北进，渡金沙江的极好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锦囊妙计。兵书云“兵不厌诈”，奥妙就在这里。就在云南敌人匆匆忙忙往昆明集中时，我红军主力突然兵分两路，向西北转辗，直奔金沙江。

我们四团单独完成了佯攻昆明迷惑敌人的任务后，又连克禄劝、武定、元谋三个县城，直奔昆明以北金沙江畔。就在我们这支队伍直插金沙江畔的同时，我红军主力在毛主席的统一指挥下，总参谋长刘伯承带领干部团乘虚而入，在皎平渡渡过天险金沙江，北上而去。

我们到金沙江畔，要经过禄劝、武定、元谋三个县城，那里敌人的正规部队不多，但杂牌部队、民团武装、伪警察还是不少，一旦交手，拖延时间，会影响大部队的行动。

我与王开湘同志在一起商议。

“只能智取，不宜硬攻！”我向王开湘同志建议。

“老杨，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有现成的保护色。”王开湘同志兴奋地说。

原来王开湘同志说的“保护色”是指前不久我军回师

遵义时所缴获的一批国民党军服，和能配上套的一些武器。若是用它来化装，真可谓万无一失了。

我们当即命令两个营各拿出一个连和团侦察连一起进行化装，尤其侦察连要求不但形似，还要神似。我们把侦察连长王友才叫来团部。

王友才是个小个子，别看他个头小，本事却不小，两眼炯炯有神，办事干净利索，上山侦察他能，下水架桥他行，打仗冲在前面，要他们连修路筑道，他也坚决执行命令，他识字不多，革命道理讲不出多少，但干起革命工作来毫不含糊，有人赞他是：神出鬼没的实干家。现在要他扮演国民党连长这个角色，虽然他未试过，但凭他那机灵、聪明的劲儿，一定会成功的。

他听说要他扮个国民党连长，带着一个连化装成“中央军”去执行任务，既高兴又有些担心，他担心连里那些老实巴交的同志到时候露出马脚，至于他自己，则还是信心十足的。为了这次任务的圆满完成，他要求我们向全连同志作一番深入动员。

王友才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当我集合侦察连的同志宣布这个任务时，侦察连的同志有些吃惊，有的同志觉得，用少数人化装可以，但人数这么多，路程这么长，行不行？没把握。不过大多数同志认为，那一带没有“中央军”，地区闭塞，加上我们有好的化装，都会说普通话，只要小心谨慎，随机应变，准能成功。

为了争取时间，我和王开湘同志研究后决定，兵分两路，我们各带一路，他带一路奔袭武定；我带一路直奔禄劝，然后合袭元谋。于是，我随侦察连走在头里，向禄劝赶去。

我们快进城门时，国民党民团武装的几个家伙就跑过来，疑惑不定地问：

“你们是哪里队伍？”

原来，这些蠢猪从来没有见过“中央军”，而他们的上司宣传，红军是一支衣冠不整，手持土枪、梭标，青面獠牙的土队伍，只有“中央军”才服装整齐，武器精良。现在城门口突然出现一队整齐的队伍扛着一色捷克枪，他们心中八分肯定是“中央军”了。但是，由于上司没有交代过要来这么多人，他们不免有些纳闷。

这时，王友才一个箭步冲到那伙民团的前面，用责问的口吻，声色俱厉地反问：

“怎么，你们的上司没有交代？你们胆大包天，竟敢在城门口拦阻我们‘中央军’，放肆！”

一听说“中央军”，象“鬼”见了“神”，民团老爷揣摩着这支队伍一定来头不小。于是，那几个人中站在前面的（看来是他们的头头），双脚“啪”的一声来了个立正，后面三个也连忙歪歪扭扭挺起了胸。

“请问长官官阶？”那领头的战战兢兢地问。

王友才一听火了，伸过手去就是一个巴掌，厉声吼道：

“你眼睛瞎了，老子是上尉连长，我们团长还等在那里呢，还不快去通报！”

那家伙挨了一记耳光，毫不反抗，反而强装出笑脸，说：“小人该死，小人无知，我马上进去通报！”

王友才听说他要去通报，转念一想，说：

“不用了，你就带我们进去！”

就这样，这四个蠢猪放下吊桥，打开城门，引着我们侦察连，大摇大摆地进了城，到了县政府。

一会儿，禄劝县的县长、警察局长、民团团长、商会会长，以及县城里大大小小的绅士、地主都来了，有的还带着太太，他们齐集在县府大厅里。在王友才这个机灵的“上尉连长”的主演下，我在厢房里首先与那个留着胡须、戴着铜盆礼帽、穿着长袍马褂、胖得连走路也困难的伪县长见了面，然后在这位胖子县长的引导下，走进大厅与集中在那里的人一一见面。

说实话，看到这些人，我恶心极了。但是，为了顺利完成任务，我还是耐心地扮演我的角色，以傲慢的姿态和他们一个个握手。

“中央军”首先光临禄劝，自然非同小可，伪县长立即下令悬挂国旗，而且办了丰盛的午餐，好烟好酒摆得满满的。我悄悄交代王友才，为了赶路，放开肚皮吃饱，但酒只能喝少量，以免耽误任务。自然，其他部队也好好地吃了一顿。

县府大厅的宴会上假戏真做，谈笑风生，上了三道菜，我就问旁边的胖县长，说：“龙街的情况怎么样，你们知道不？”

“离这里太远了，搞不清楚！”那胖县长支支吾吾说不上来，半天，才结结巴巴地回答。

“武定县的情况知道不？”我又问。

“我更不清楚！”胖县长说。

“老百姓交了钱粮，养了你们，你们这样玩忽职守！”我打起官腔训斥他。

大厅里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绅士们不摸底细，一个个面面相觑。

王友才趁机向伪县长说：“还不赶紧与武定县通个电话问问！”

“是！是！”县长连连点头说，一边走，一边用手帕擦去额上的汗水。

一会儿，电话通了，对方接话的是武定县的县长。

胖县长不知所措地向我请示。

这时我估计，王团长带的那一路，该到武定了，便怒气冲冲说道：“都是饭桶，耽误军机，谁负责任？告诉武定县，我们的部队马上去！”

胖县长如释重负，连忙应是，跑到电话机房，用公鸭般的嗓音，吼道：“……‘中央军’马上去武定，请开门迎接！”

我起身离座，大大小小的绅士列队相送，丰盛的宴席就这样进行了一半而中止了。

由于禄劝县长的那个电话，后来我听王团长说，武定县欢迎“中央军”的场面更加隆重，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

象武定县一样，由于事先打了招呼，当我带着部队到达元谋时，元谋县大小官员和民团已经集合好，漏夜迎接。

我当即大声宣布：“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在场的大小官绅都愣住了，那些团丁更是糊涂，有的还没搞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就缴了他们的枪。

这时，那些县长老爷们知道上了当，碰上的是真正的红军，不是中央军，但是，他们已经晚了，只好乖乖地当我们的俘虏。

我们由于采用了化装奇袭的手段，在一天中一枪不发就拿下了三个县城，解除了民团的武装，缴获了大批武器、物资，为我们直插金沙江畔赢得了时间。我们继续北行，沿途天气炎热，战士们都说和唐僧、孙悟空过火焰山一样。先头部队赶到江边，只见金沙江犹如一条巨蟒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峡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大浪咆哮。这怎么过呀！

第二天清晨，我们四团奉命赶到皎平渡，按预定计划，我们团才胜利地渡过了金沙江，完成了佯攻昆明，迷惑敌人，牵制敌人的任务。这时，我们向军团和师的首长汇报了智取三县的具体经过，他们一听，都乐了。

飞夺泸定桥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中央红军强渡天险金沙江之后，风驰电掣地继续北上，一路上途经会理、西昌、冕宁数县。

企图对红军进行阻拦的四川军阀部队，一触即溃，望风披靡。

然而，摆在红军面前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此时，尾追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队已进至金沙江南岸，而前头截击的国民党四川军阀刘文辉、刘湘、杨森的部队，则在向大渡河急进。红军如果不能迅速渡过大渡河，势必被迫向西转入更为艰苦、困难的川康地区。为此，中央军委命令，左权同志率二师五团一部分同志和军团侦察连，经越西，占领大树堡担任佯攻，钳制和吸引富林的敌人；红一师一团率工兵连，组成先遣队，由刘伯承（先遣支队司令）、聂荣臻（先遣支队政委）率领，迅速抢占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渡口。

安顺场是一个小镇子。它面对奔腾、汹涌的大渡河，背枕巍峨挺拔的营盘山。营盘山的名称，是人们为了纪念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而取的。石达开就是在这里全军覆灭，成为千古恨事的。

我们来到大渡河畔的时候，不禁想起了石达开那段悲壮的历史。

翼王石达开与洪秀全分裂后，率部挺进浙江、福建、江西，转入湖南，声势震荡，威慑清廷。然后，他南下广西，驰骋于川黔之交，奔突万里，连下百城，飘然若风雨，声势如霹雳，涉奇险，蹶幽径，使官军震眩失措，防不胜防。同治二年（公元一八六三年）三月，他率众由云南进入四川边界，派其先锋赖裕新率众四万，自宁远日夜兼行，引官军追击北上，俾南洛空虚，亲率四万人马渡过金沙江，抵达大渡河畔。当时，大渡河北岸（大渡河从安顺场起，由原来的北南走向转为西东走向），尚无官军，石达开组织部队扎营造船，指挥前锋抢渡，至天黑，已经渡过一万人马。但石达开担心前锋遭到背水作战的局面，以为：“今师半渡，倏官军卒至，此危道也，不如明毕渡。”于是下令，把渡过河的一万余人又撤回来了。石达开的决心未能如愿，大渡河水陡高数丈，四万人马被阻于南岸，营盘山上扎满了军营。待水势下落时，官军由四面八方蜂拥而至。他进退两难，粮食断绝，乃决一死战，向将士慷慨陈词：“吾起兵以来十四年矣，越险岭，济江湖，如履平地，虽遭难，亦常噓而复奋，转退为攻，若有天佑，今不幸陷入绝境，重烦诸君血战出险，毋徒束手受缚，为天下笑，则诸君之赐厚矣！”他泣涕稽首，激励军心，誓于死中求生，乘夜强渡，但失败了。在全军覆没之前，他自沉五个妻妾、两个幼子于大渡河的水流中，写下“大江横我前，临流曷能渡”的诗句，发出无可奈何的悲叹。

石达开和他的农民革命军被从地球上抹掉了！巍巍的营盘山，留下漫山遍野的荒冢。民间传说，大渡河畔，营盘山凹，太平军的怒魂常在黑夜哭泣，高叫复仇。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们，在河畔一座陡峻的石山顶，为他树立起一块花岗石纪念碑，碑文慷慨悲愤。高高的纪念碑，年复一年地听着大渡河水永远唱不完的悲歌！

历史似乎无独有偶！

果然，一个来世纪之后，红军经过万里征战，渡金沙，越冕宁，差不多也是沿着石达开行军的路线来到古战场营盘山扎了营。

几万大军，隐蔽在沟沟岔岔里。和百年前的石达开相比，我们所面临的形势却要严峻得多。

从时令上说，红军到达大渡河畔比石达开要晚半个月，已进入洪水期，水高浪险。

在军情方面，蒋介石师法清代将领骆秉璋对付石达开的战役部署：命令薛岳指挥周浑元、吴奇伟等三个纵队，追击红军；电令刘文辉加强大渡河北岸的防御；电令杨森率全军经乐山、雅安赶赴大渡河；又恐增援不及，并令刘湘先派第二十一军第二师第六旅赴汉源、富林加强防御。这样，下到富林、上至泸定桥沿河陈兵，真似铁桶一般。此外，并叫河防部队搜集船只、粮食及一切可供红军利用的物资器材，还利用特务唆使少数民族阻挠红军前进。蒋介石一切部署就绪，便歇斯底里地嚎叫：“让共产党做石达

开第二！”

然而，他高兴得过早了。

突然，我们红一师第一团成功地袭击了安顺场，抢占了这个渡口。紧接着于五月二十五日在刘伯承、聂荣臻的指挥下，红一团的十七勇士一举从安顺场胜利过河，打开了第一条通路。

但是，大渡河水流湍急，河面太宽，不能架桥，渡口又只有几只小船，往返一次需要几十分钟，几万大军如果只靠这几只小船来渡河，不知要花费多少时日。此时，传来消息，刘湘、刘文辉、杨森的部队已离大渡河不远，薛岳、周浑元的部队也在日夜兼程追击进逼。

眼下，要迅速渡过大渡河，必须火速拿下泸定桥。就在这十万火急的情况下，我们四团，接受了夺取泸定桥的任务，为左路军的先锋团。这时，已过河的红一师为右路军，正沿东岸北进，策应我们四团夺取泸定桥。

二十七日清晨，王开湘同志与我接到命令便率四团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向泸定桥奔袭。

安顺场至泸定桥全程三百二十里，原军委命令三天赶到。一般来说，三天长途跋涉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如今走了一段，却有些担心。这里的所谓路，有时是绝壁上硬凿出来的栈道，有路，也只是蜿蜒缠绕、忽起忽伏的羊肠小道，左边是刀劈一样高入云端的峭崖陡壁，虽是五月深春，山腰以上却堆满了银光耀眼的积雪。这里的积雪终年

不化，走在中间，寒气逼人，再往右看，大渡河汹涌澎湃，它象一条宽阔的白链，盘桓在数丈深的峡谷里，闪着寒光，吐着白浪，令人心惊目眩，稍不注意，就有失足落入这万丈深渊的危险。

“急奔泸定桥，拿下三百二十里！”战士们一路行军，一路高呼口号，谁也不把危险放在心上，只有一个心思：前进！前进！

大概走了三十多里路的光景，忽然河对岸传来“乒乒乓乓”的枪声，大概敌人发现我们的踪迹了，开始向我们射击。为了避免无谓的伤亡，争取时间，早点赶到泸定桥，我与王开湘同志商量后，命令部队爬山插近路。谁知这山真高，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路，却一绕一弯，转了个圈，足足多走了十里，而这十里，不象走平地，化去了我们一个多钟头。

走了大约六十里路，前面又遇到隆起的一座大山。先头连忽然和敌人接上了火，一打听敌人只有一个连，我们命令在行进中把它消灭。部队也就象猛虎扑进了羊群似的，一个猛冲，把敌人全打垮了。上这山要爬十多里地，翻过了山，又是一条小河，木桥已被敌人毁掉了。但幸好河面不宽，我们想涉水过河，一试，水很深，流速又急，徒步涉水不成，于是立刻命令一营组织部队就地砍树，架桥。

打了胜仗，跑路更有劲了。迎着零零落落的枪声，我们继续爬山。突然，侦察员跑来向我们报告，说是左前方

的一个大山上，约有一个营的敌人守着，堵住了我们前卫部队的去路。

打，还是不打？原路前进，势必要敲掉这只“拦路虎”，绕道走，又要化时间，真急人。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作出正确的判断，我与王开湘同志带领一些干部跑步到前面，侦察了一番。

我们仔细看了一下这里的地形：

这山中间只有一条小路，而这小路陡得又象座天梯，仰头往上看，帽子都要掉下来，再凝神一看，发现山顶隘口上都筑了碉堡。右边紧靠着的是——一条河，绕道无路可走，山势险峻，正面和右面是无论如何上不去的。左面也是凌空而起的悬崖，石壁上稀稀落落地长了一些小树和荆棘。

“打吧！”王开湘同志从一棵小树上摘下一根枝条，说。

“打！”我毫不迟疑地说。

“往左面上去，出其不意！”王团长用那根枝条指了指，又说。

我赞成他的意见，又补充说：“通过左面悬崖，包抄敌人侧背，从敌人的后屁股袭取隘口！”

“怎么样？”王开湘同志侧过脸来问问旁边的干部。

三营营长曾庆林同志点着头说：“这是个好办法！”

“那好，你带一个连，就从左边爬上去！”王开湘同志说。

我补充道：“罗华生同志，你和三营长一起指挥！”

“好，保证坚决完成！”罗华生同志答道。

王开湘同志又命令三营的另外两个连正面佯攻。

敌人发现了我们攻山的企图，便组织火力，疯狂地用机枪封锁正面路口。

我看着手里的怀表，时针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约摸过了四十多分钟，突然背后传来了枪声。王开湘同志兴奋地扔掉手中的枝条，拍着我的肩膀，说：

“老杨，成功了！”

我抬起头来，只见隘口左边杀出一排人来，不用问，这是三营的同志。一时敌人乱了阵脚，不知该往哪里还击。就在这时，我们命令正面发起猛烈攻击。

前后夹击，敌人很快被打下去了。接着，一个猛打猛冲，敌人三个连完全被消灭在山崖脚下。我们除活捉了一名营长、一名连长外，还俘虏了两百多人，缴获步枪一百余支，机枪一二十挺，以及许多其它军用品。打扫战场时，我们发现，敌人的烟枪、烟灯满地皆是。据俘虏们交代，他们本是颇有信心，凭险坚守，阻挡我们前进的，怎知被我们一顿奇袭、猛击之后，就觉得无险可守了。

消灭了一营敌人，我们前进的步伐更快了。这一天，走到夜半才休息，足足赶了八十里路。

第二天，为了赶路，我们比原来命令规定的时间提前一小时开饭，五点钟，天未明，即上路出发了。走了几里

路，一匹大黑马象旋风一样从后面追来。我定睛一看，上面骑着军团部的通信员。他过来后，递给我们一份命令，我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王、杨：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五团夺鸭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此一任务的。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

林^①、聂^②

看完命令我交给王开湘同志。

王开湘同志看完后没有说话，他打开地图，我们一同查看了一下现在的方位。

我说：“从地图上标的里程，此处到泸定桥还有二百四十里！”

王开湘同志一边收拾地图，一边说：“今天是二十八日。”

① 即当时的军团长林彪，此人最后走向了反面，成了阴谋家、野心家、叛徒、卖国贼，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皇出逃，乘飞机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② 即聂荣臻同志，当时为军团政委。

“对，明天是二十九日，也就是说两天的路程要一天走完！”我说。

王开湘同志沉思了一下，说：“是啊，一天走完二百四十里，这是个大难题！”

是的，谁也不会料到，任务会变得如此急切。路，是要人走的，少一步都不行啊！而且还要突破敌人的重重堵击。但是，这是命令，这是关系到全军的重大任务，一定要坚决执行，不容许一分钟、一秒钟的迟疑。团长与我统一了认识，找干部们开会已经没有时间，只能边行军边传达，边行军边与团部和营连的干部研究怎样完成这一任务了。我们提出的动员口号是：

“红四团有光荣的战斗历史，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保持光荣传统！”

“向夺取安顺场的红一团学习！和红一团比赛，迅速拿下泸定桥！”

“任务是光荣的，又是十分艰巨的，我们要经得起考验！”

我们具体要求：坚决执行军委命令，一昼夜走完二百四十里，明天六点以前赶到泸定桥。

“走完二百四，赶到泸定桥！”这斩钉截铁、气壮山河的动员口号成了全团的信念和目标。

政治处的同志在罗华生同志的带领下，飞跑到行军队伍的最前头，站在一个小小的土墩上，用竹片敲打着，唱

起了临时编写的行军快板，不停地呼喊鼓动口号。

队伍在前进着，在快速前进，真是快如风，一行行排列整齐的队伍象脚底装了轮子一样，嗖嗖地从我的身边超越，一阵风卷过，又一阵风卷过，他们走得如此专注，如此矫健，每一张熟悉的脸，从我的面前闪过，每一双坚毅的眼睛，飞快地扫瞄着我，虽然，他们谁也没有开口，但好象都在说：“政委，放心吧，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

部队象长了翅膀，在飞速行军，“坚决完成任务，拿下泸定桥”的口号此起彼伏，前呼后应，如铜钟声声，飞向蓝天，在群山中回旋，似惊雷阵阵，穿过云雾，在峡谷与河面上激荡。看着这整齐的飞速向前的队伍，听到那铿锵有力的口号声，我心里热乎乎的，也许是受到了感染，我忘了伤痛，跳下马来，牵着马缰与战士一起徒步前进。

我们在和时间赛跑，敌人也没有睡觉。大渡河东岸原来有杨森的四个旅和刘文辉的四个团守着，现在听说我们在往泸定桥进军，他们急急忙忙抽调两个旅的兵力，沿着大渡河东岸火速向泸定桥进发增援。

我们几乎是在与敌人隔河赛跑。

为了保证任务的坚决完成，一路行军，我们还一路举行“飞行集会”，你看，一簇簇、一堆堆的人临时凑到一起；只那么几分钟，就散了；这群人刚散，接着出现了更多的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激动地说着什么。原来，这是连队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动员，时

间不允许他们坐下来静静开会，只能进行这样紧张的“飞行集会”。

紧急任务的动员工作刚做完，部队已接近猛虎岗。

猛虎岗是一座上下约三四十里的高山，右傍大渡河，左倚更高的山峰，山半腰以上白皑皑，整个山在云雾中，中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这是安顺场通往泸定桥的必经之路，山顶的隘口上有一个营的敌人扼守。

这时候，正是浓雾弥天，四野里白茫茫一片，五步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敌人看不清我们在哪里，只是凭着耳朵听到的声音，躲在工事里，恐慌而又忙乱地向我们前进的方向射击。

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有点着急。但是大家一合计，又有了办法。是啊，将计就计，利用老天给我们布下的天然屏障——大雾，摸到敌人扼守的垭口上，来它个神兵天降。

上山的部队已经集合好了，我们交代说，一律不许放枪，要利用大雾作掩护，接近敌人后，用刺刀、手榴弹解决问题。

部队出发了。我们悄悄地等待着。

五分钟，十分钟过去了。我们紧张得几乎屏住了呼吸谁也没有说话，只是两眼大睁着盯住前方，静静地谛听着，默默地等待着。

“轰隆！”期待着的声音终于响起了。它仿佛节日的礼

炮，揭开了这场特殊战斗的序幕；它仿佛胜利的号角，振奋着我们每个红军战士的心。

随着“轰隆、轰隆”的响声，山头上升起震天的喊杀声。

“又成功了！”王开湘同志兴奋得搓动着双手。

“吹号助威！”我大声喊道。

号声吹响了，雄壮而激昂。随着号声，部队排山倒海般往前压去，敌人根本无法招架。此时，我先头营穷追猛打溃散之敌，一直追到三十多里远的山脚下，到了一个大叫做摩西面的大山边。

溃敌往摩西面逃窜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那里还驻守着敌人的团部和一个营。

我们与敌人又遭遇上了。可是，不管他们是一个团还是一个营，被我们突如其来一击，昏头昏脑地直往后逃，简直成了惊弓之鸟。我们在行进中占领了摩西面。就在这时，可恶的敌人把村东河上的木桥炸掉了，显然，这胜利途中的障碍又给我们增添了麻烦。

我们不得不重新架桥了。于是，我们全力以赴用了两个小时——紧张的珍贵的一百二十分钟，才架起了这座桥。就在这架桥的时候，部队稍作休息。桥一架好，立刻又吹响行军号，同志们一口气又跑了四五十里。等我们赶到大渡河岸一个约十多户的小村庄时，已是傍晚七点多了。我们查看一下地图，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一百一十里。

困难一个接一个地来了。真是天不由人，正当我们想继续前进时，突然，下起暴雨来了。这一阵雨真猛，电光闪闪，雷声隆隆，瓢泼似的雨一个劲地往我们头上浇着。天，黑得象倒扣的锅底似的，伸手不见掌，只有打闪的一瞬间，才能分辨哪是山哪是路，部队一天没有吃上饭，肚子也饿得难以支持。道路泥泞，简直寸步难行，牲口、行李都跟不上。但是，我们还是忍住饥饿艰难地走，一步步前进。

我们正在走着，发现敌人已经走在对岸，我们立即作了以防万一的准备。

我们虽然和敌人沿大渡河两岸平行前进，虽然也作了迎战的准备，但为了坚决执行命令——安全、准时到达目的地，不到万一，我们不开枪射击。我们暗暗下了决心，放开双腿，快速行军，一定赶到敌人前面去。

但是，困难越来越严重。首先是雨大路滑，影响了行军速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向党支部，向所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动员，要求他们想方设法克服一切困难，务必在天明六点以前赶到泸定桥边，同志们发扬阶级友爱精神，用绳拉，用手搀扶，走不动的再拄上根拐杖；饿了，就嚼口生米；渴了，就捧把雨水喝喝……致使我们的队伍就象一团烈火似的，在幽深的山谷里飞速滚动着。但是，毕竟是摸着黑走，还有一百多里，在这泥泞的路面上按这个速度到天亮能走一半，就很不错了。

我们正在发愁。突然，对岸出现了几点火光。看到这火光不由我心头一亮，还没来得及细想，对岸的火光，刹那间变成了一串火炬，原来敌人是点着火把在赶路，增援泸定桥。

“我们也可以点火把！”敌人的火把给了我们启示。闪过这个念头，我立即找王开湘同志商量，他认为是个好办法，但提出必须慎重。他说，我们与敌人仅一河之隔，如果敌人向我们联络，怎么办？这时，我忽然又想到了今天与昨天消灭、打垮的一个团的敌人，他们的番号不是现成的吗？！……

真是“事到万难须放胆！”我们也只好这么办。

我们立即命令部队将附近小村庄里老乡家的竹篱笆全部买下来，每人绑一个火把，一个班点一个，不许浪费，为了争取时间，要求点了火把后的行军速度必须在十里以上。并布置司号员先熟悉敌人的联络号音及信号，准备在必要时与敌人“联络”。还告诉他们，凡是有不清楚的地方，就去问俘虏。我们知道，对岸的敌人大都是四川人，于是我们也选出四川籍的战士和刚捉来的俘虏，准备随时回答他们的问话。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我们把所有的牲口、行李、重武器统统留下，由管理处长何敬之，副官邓光汉率领一个排带着，跟在队伍的后面前进。

团长见我要把马留下，坚决不同意，劝阻说：“你腿上的伤还没全好，走坏了反而不好！”

警卫员小白在旁边也一个劲反对。但是，我想，越是在这困难时刻，越是需要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便谢绝了同志们的好意。为了让同志们放心，我有意用挑战的口吻，对大家说：“同志们，那咱们一块走吧！看看谁走得快！谁先走到泸定桥！”

一切都准备妥当了。我们点上火把，又开始了急行军。

部队兴高采烈地举着火把挺进。大渡河两岸，敌我双方的火把在夜空中焚燃，隔水相望，就象在山谷里盘动的两条火龙，把几米外的大渡河水映得通红。

这时，透过呼啸的风雨声和大渡河的波涛声，突然从对岸传来了清晰的号声。

“敌人在向我们发问了！”站在我们身边的司号员向我们报告说。

“啥子部队？”还没有等我们回答，对面又传来悠悠微弱的问话声。

“吹号回答！”我告诉司号员。

司号员按照敌人的号谱吹响了事先准备的答语。

四川籍的战士和俘虏也按照事先作好的准备，提高嗓门作了回答。

蠢猪似的敌人信以为真，深信我们是他们的“同伙”，当然他们万万不会想到，点着火把大摇大摆跟他们隔河并行的，就是他们日夜梦想着要消灭的红军。就这样，他们糊里糊涂地与我们隔河并行了三十里。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夜也越来越深了。猝然间，对岸那条龙不见了。我看看怀表正十二点，为了摸清对方的情况，我们又大着胆吹号问敌人干什么？敌人当然深信不疑我们是他们的人，乖乖回答：

“宿营休息了！”

敌人休息了。我们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全团同志，大家高兴极了，都说：

“走！”

走！快走！一个跟着一个，我们打着火把冒雨前进，雨越大，夜越深，我们的两腿走得越欢。

大雨滂沱，山洪从峰顶直泻大渡河，冲击着岩石，发出“轰轰”的巨大声响。同志们以豪迈的英雄气概向大自然展开了猛烈的搏斗，在疾风暴雨中走得更起劲。河边的羊肠小道，本来很难走，此刻路面淌着雨水，滑倒的更多了，拐杖也不灵了，一不留神，能来个倒栽葱，真说得上三步一摔，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爬中前进的，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有人还不断打瞌睡，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站住了，后面的人推他：

“走呀，前面走远了！”

他才猛然惊醒，又加快步伐跟了上去。是的，我们的战士实在太疲劳、太困倦了。为了防止跌到河里，最后，我们不得不吩咐每人解下自己的绑带，一条一条接起来，拉着前进。

就这样，经过整整一夜的急行军，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到达了泸定桥的西岸，占领了西岸全部沿岸阵地，按照军委预定的时间赶到了我们的目的地——泸定桥。

一昼夜高速行军二百四十里，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完成中央军委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抢占泸定桥，占领泸定城，掩护中央和我军主力渡过大渡河。

这场急行军是异常艰苦的，抢夺泸定桥、占领泸定城的任务更艰巨。

泸定桥的守敌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红军来得这么神速。一接近泸定桥，我们就消灭了桥西守敌，很快地占领了桥西的阵地和离桥头约半里地的一座天主教堂。战士们稍作休息，便又投入了战斗准备。这时，王开湘同志和我领着营连干部到河边来察看地形。

泸定桥果真是地形险要，就连我们这些长途跋涉、征战万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攻关夺隘的人，看了都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

泸定桥飞架于大渡河上。这里古称“泸水”，诸葛亮所谓“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就是指这一带。河的西岸连着我国第二高峰的贡嘎山，雪峰皑皑耸入碧空，如一把巍峨的冰刀玉剑。河的东岸，是二郎山，壁陡壁陡。贡嘎山——二郎山，两山夹峙，大渡河水在陡峭狭窄的缝隙中奔腾，从高处俯瞰，只见恶浪滔滔，浓雾升腾，满河满谷都是银

色的浪花，如瀑布，如山洪，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礁石，溅起丈多高的水柱，发出雷鸣般的轰然巨响，令人耳聩目眩。显然，在这样的河里，就是一条小鱼，也休想停留片刻，徒涉、船渡都是不可能的。这样凌厉的水势，早把两岸削成两壁高墙，纵目远眺，两厢之间真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天然巨堑。

悬于十丈高空中的便是我们要抢占的泸定桥！它没有从河床上立起的桥墩。大概是由于这样的水势，无法建筑桥墩吧，只有十三根铁索，从河东岸拉到河西岸，共有八十丈长，八尺宽。每根铁索都有碗口粗，九根作为桥面，四根作为扶手。铁索用铁环扣成，每根铁环一尺多长。听说桥面原来铺有三尺宽的木板，眼下，敌人已经把桥板全部抽掉，只剩下寒光闪闪的十三根铁链子了，不要说上去，看着都令人头晕目眩！

看得出，铁索桥的两端，分别固定在两根铁桩上。听说那桩上刻有“康熙四十四年岁次乙酉九月造汉中府金火匠马之常铸椿重一千八百斤”的字样。相传，那是一位名叫戈达的藏族大力士，为了架这座桥，一只胳膊挟着一根铁桩翻山越岭来到这里，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渡过河去，等桥刚一架起，他也就累死了。为了纪念这位藏族兄弟，人们在西岸修了一座小庙，取名叫戈达庙。庙里塑着这位大力士威严站立的形象，就好象他守在河边，昼夜听着河水的咆哮，随时随地都在关心着桥上行人的安全。

铁索两端还筑有桥楼。如今在东岸的桥楼上，敌人垒起沙袋，搭成一个牢固的桥头堡，黑幽幽的射孔里露着机关枪口。显而易见，那个桥头堡，紧紧连结着泸定城。而我们占领的西岸，桥楼后面，是一栋观音阁，红窗金瓦，画凤雕龙，在这偏僻之地，真可算是蔚然大观了。观音阁前面有一道弧形石栏，它的两侧向河岸延伸，在石栏后面，都可以架轻重机枪，连赵章成同志的迫击炮也可以安在那里。

在大渡河边，我看着这铁索飞云空，浪涛汹汹，泸定桥横高峡中的情景，不由得想起桥西头竖着的一块石碑上刻着古人的两行楷体字：

泸定桥边万重山，
高峰入云千里长。

更觉得铁索桥的气势磅礴、险峻了。

我们又隔河了望桥对面东端的泸定城。从望远镜里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座古城建在山坡上，紧挨着大渡河，尽管城墙遮挡着里面的建筑，但仍能看得出城里的房屋很多，尤其是那高耸的屋脊，瓦面上覆盖着积雪看得清清楚楚。此刻，紧靠桥头的城门紧闭，城门外几座碉堡似乎形成了交叉火力。无疑，它完全可以封锁桥头，堵住我们的去路。而我们要进城，必须过此门，要进此门，必过此桥，除此

别无它路。

我们看完地形，便回到了天主教堂。敌人大概是发现了我们，不时地向我们扫射，有时还飞来几发迫击炮弹，弄得我们这边尘土飞扬，硝烟滚滚。据了解，对岸守城的部队有两个团，他们抽去桥板后，妄图凭借天险，把我们拦阻在河西岸。就在我们发起攻击之前，他们还狂妄地喊道：

“你们飞过来吧，我们缴枪啦！”

“有种飞过来！”

“为什么不过来呀？”

哪知，敌人狂妄、愚蠢的喊话，正是对我们战士最好的动员。我们的战士听到敌人在挑衅，气得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实在忍不住了，便高声回答道：

“老子不要你的枪，要你们的桥！”

“你们等着缴枪吧！”

随即我们指战员纷纷请战，部队立即掀起了“争当突击手，飞夺泸定桥”的请战热潮。当我们组织干部分头到各个连队去动员时，各连都送来了突击队员的名单，也都主动要求担任光荣的突击任务。

为了顺利攻桥，不让敌人增援，我和团长研究过后，立即召开干部会，组织了一个营的火力，专门负责封锁河对岸从竹林坪到泸定城的那条唯一的小路。

到了中午，也没顾上吃午饭，我们就在天主教堂里召

开了全团干部会议。

会议刚开始，就碰上敌人从对岸打过来一排迫击炮弹，其中一发落在天主教堂的屋顶上，顿时炸开了一个大窟窿，好象给我们开了一个天窗，随之弹片、瓦片直泻下来。但是，坐在会场里的干部只是抬头瞅了瞅，一个也没动。我抓住这个机会，站起来说：

“敌人又给我们动员了！我们必须打过桥去，刻不容缓！”于是，详细地分析了眼下的敌情之后，又说，“不多讲了，现在大家说说，该让哪个连担任突击队？”

我的话音刚落，坐在我对面，平时不爱说话的二连连长廖大珠刷地站了起来。他那矮小而结实的身子激动得有点发抖，黝黑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他吃力地说：

“一连过乌江立了功，成了渡江模范连，我们要向一连学习，争取当夺取泸定桥的英雄连……”

“夺桥任务非给我们三连不可！”刚从侦察连调到三连当连长的王友才，没等廖大珠说完，也霍地站了起来。他站在那里，活象座小铁塔，话匣子一打开，就象机枪哒哒哒地没个完，“三连哪一次战斗都没落后过，这次我们保证把桥拿下来！”

这会儿，其他连队的干部也都坐不住了。

王友才却丝毫没有察觉似的，仍滔滔不绝、斩钉截铁地说着。最后，他又补充说：

“这次不叫我们当突击队，我这个连长没法向战士们

交代!”

“我请求发言!”四连长忍不住地站了起来。

“我代表六连请战……”

一个个连长都站了起来，他们各摆各的理由，各讲各的有利条件，争着当突击队。他们那些热烈的话语，也都真正表达了大家求战心切、群情激奋、朝气蓬勃、不甘落后的精神状态。直到最后他们也互不相让，看来，谁都不愿意把这个任务交给别人，怎么办？我与王团长商量了一下，便说：

“同志们，静一静，大家都想去，踊跃争当突击队，这是好的，可是桥只有一座，突击队只需要一个，我看民主集中，最后让团长说说，怎么样？”

“好！”大家齐声回答。

王开湘同志向全体干部交代了夺桥任务之后，便指定二连任突击队。

二连连长廖大珠一听欢喜若狂，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而且激动得站了起来。

众人一齐用羡慕的眼光注视着他，以鼓掌表示祝贺。

一阵掌声刚过，我站起来说：“团长的主意好，要打仗有的是，咱们轮着干，上次渡乌江是一连打的头，这次轮到了二连，那么就由二连的二十二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一个精干的突击队，请廖大珠同志担任突击队长，看大家有没有意见？”

会场上又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我发现廖大珠由于激动，不仅脸涨得通红，而且眼里滚动着泪花，便特意伸过手去和他握了握，表示祝贺。这时，他紧紧地拉住我的手说：

“我一定不辜负首长对我们的希望！”

散会了，各个连都分头准备去了。

我走出天主教堂，发现王友才还站在那里。

“政委！”他噘着嘴，显然有点情绪。

“怎么样？不高兴啦？”我问。

“政委，我们三连——”

“三连的任务也不轻！”我说。

“任务不轻？”他问。

“我与团长商量好了，你们三连担任一梯队，跟着突击队冲，还要负责铺桥板，让后续部队迅速冲进城去呢！”

“真的？”他裂开嘴笑了。

“那还有假！就是不先宣布，让你这个急性子窝一窝！”我说。

“那好，政委！你批评吧！只要肯把艰巨的任务给我们，你骂我几声都行！”他又象一挺打响了的机关枪。

“干么要骂？缺点靠自己改，你还有什么意见？”

“没有了！”他两脚立正，脸上堆满了笑。

“那好，回去准备！”我说。

“是！”说完，他乐呵呵地回连队去了。

我们连、营、团的干部，这时年纪都差不多，也就二十左右，由于战争的需要，革命的锻炼，许多同志十八九岁被选到领导岗位上，担任团长、政委，甚至师级干部，这是由于战斗的需要，党的抚育，环境的逼迫和同志们帮助的结果。但是，我们毕竟还年轻，在某个时刻，某种场合，还会抑制不住地流露这种年轻人的单纯和稚气。三连长王友才正是反映了这个共性，你看他为革命敢挑重担，攻关隘不怕艰险，什么个人的要求，怕苦、怕累、怕死、苦恼、怨言，都和他沾不上边。原因很简单，在长征这样艰苦的革命年代，我们党把年轻人的个性高度结合到革命的共性中去了。否则，又怎么能理解这一切呢？

王友才同志眉开眼笑地走了，他与四团所有的同志一样，不顾连续行军的疲劳，抓紧时间，扎扎实实进行着突击攻桥的准备工作。

这时，政治工作做得活，做得实在，不搞空头的说教，都是政治工作人员首先带头干。哪里艰苦，哪里关键，他就到哪里去。我们团的党总支书记一等会议定下二连担任突击队，不用分配，就带着几个干事到二连去了。

一切准备工作都在进行着。

下午四时，总攻开始。

王团长与我手握短枪，站在桥头指挥战斗。

我们的部署是：用两个主力营组成严密的火网掩护，防止两侧增援之敌，其余的分成三个梯队，正面突击，以

二十二个突击队员为先锋。为了加强我团力量，军团首长把军团的教导营^①拨归我们指挥。我们把教导营部署在打箭泸方向，监视、警戒该方向的敌人。这是因为我们从俘虏那里了解到，康定方向还有几个团的敌人。

当事先准备的全团数十名司号员组成的司号队同时吹响冲锋号时，我方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枪弹象旋风般地刮向敌人阵地，一片喊杀之声犹如惊涛裂岸，山摇地动。这时，二十二名经过精选的突击队员，包括从三连抽调来的支部书记刘金山，刘梓华……他们手持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十来颗手榴弹，在队长廖大珠同志的率领下，如飞箭离弦，冒着对岸射来的枪弹，扶着桥边的栏杆，踩着摇晃的铁索，向敌人冲去。

紧紧地跟在突击队后面的是三连长王友才。此刻，他率领三连组成的一梯队，背着枪，腋下挟着木板，一手抓着铁索链，边爬、边铺桥板、边冲锋。

敌人本想负隅顽抗，用各种轻重武器喷吐着火舌组成的火网阻拦我们。但是，敌人的火舌很快就被我们的火龙吞掉了。我们的突击队员精神抖擞，越战越勇，踩着铁索稳步前进。

敌人被我们英勇的突击队吓呆了，他们象丢了魂一样，纷纷从桥头工事里钻出来，掉头就跑。

① 当时的营长是陈士渠同志。

我们的突击队加快了前进速度。他们迎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在激流奔腾的江面之上，攀援铁索，奋勇前进……

我们的突击队爬完最后一节铁索，几乎就要接近敌人的桥头了。突然，西城门燃起熊熊烈火，火光冲天。

原来，这是敌人的预谋——他们为了防止我们攻进城去，用桥上抽下来的木板，集中在城外，然后浇上煤油，一旦用水挡不住我们，就用火来拦阻我们。

火借风势，风助火威，顿时火光照红高峡之间的云空。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冲到敌人桥头的突击队员瞅着这突如其来的熊熊烈焰，顿时愣住了。

这时，我在桥头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振臂高呼道：

“同志们，这是胜利的最后关头，拿出你们的勇敢精神，冲过去！莫怕火！冲呀！敌人垮了！冲呀！冲呀！”

“同志们，冲过去！”王开湘团长激动地挥着手里的短枪。

“同志们，莫怕火，冲呀！敌人后退了！”站在我们身边的同志一齐吼了起来。

“前进！”廖大珠同志突然一跃而起，在同志们的口号声中，带头冲进火海。他头上的帽子着火了，身上衣服着火了，然而，他仍旧不顾一切地向火里扑去。

又一个突击队员冲过去了：这是个从贵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

又一个、两个、三个……他们把手榴弹扔到敌群中间

后，随着“哐哐”的爆炸声一个个蹿过火舌，挥舞着闪光的马刀，杀向了敌人。

“同志们，冲呀！”我忽地从桥头一跃而起，带着三连在二十二个勇士后面一边铺桥板，一边向桥东冲去。

桥板刚铺时，隔一步铺一块，人在上面走，下面的铁索猛烈地摇晃着，就象筛筛子一样。

然而，谁也不顾这些，在三连后面，王开湘团长带领着二梯队，就象潮水般地涌上了桥头。

此时那二十二个勇士已冲进城里，正与敌人作殊死的搏斗。他们的子弹快要打光了，手榴弹也快要打光了，敌人开始向他们反扑了。在刚刚降临的夜色中，他们抡起大刀片，见人就砍，眼前一个黑影一个黑影地倒下去，路两侧不少的树，也都被拦腰斩断了。

就在突击队眼看支持不住时，我带着三连赶到了。我们一阵冲杀，把敌人的反扑压了下去。

不一会儿，团长率领的后续部队也投入了战斗。大家精神振奋，如猛虎添翼，直向敌群冲杀。

激烈的巷战，乒乒乓乓打了整整两个小时，我们终于歼灭敌人大半，敌人余下的散兵游勇纷纷向城北逃窜。

当滔滔的大渡河水映着初升的一轮明月时，我们已全部占领了泸定城。一清点人数，突击队二十二名英雄，当时牺牲三个人。这时，战士们登上巍峨的城楼鸣枪欢呼胜利，我们却清醒地意识到：战斗的任务还很繁重，因为还

有不少敌人在向泸定城压来。为了防止敌人的反扑，我们又重新部署，派出一个营，沿河警戒。

夜晚十点左右，警戒营的排哨突然在前方打响，可是很快就无声无息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天黑难辨，这个排哨占领了一个阵地，发现前面有部队，以为是敌人，来不及盘问，猛一个冲锋，抓了个“俘虏”，一审，竟是红一师三团的自己人，这才知道一师的援兵已到。听到这个消息，大家笑得合不拢嘴。

至于刚才路上碰到的敌人增援的两个旅，半路被我们甩掉后又被我红一师追上了。在我们激战泸定桥的同时，他们在竹林坪打了一仗，敌人败后，因怕我们两面夹击，便慌慌张张地向东边的化林坪方向逃窜了。

我们立即派人迎接随一师前进的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政委进泸定城。

深夜十二点多了，刘总参谋长、聂政委踏着浓霜进了泸定城。他们不休息，问这问那，一边视察部队，一边听取汇报。已经是下半夜两点钟了，刘伯承总参谋长说：“我们还没有吃饭，饿得够呛，你们有什么好吃的，搞点给我们吃。”

我喊来警卫员小白，告诉他给首长们搞最好吃的东西来。

小白说：“这里最好吃的就是鸡蛋煮挂面。”

刘伯承、聂荣臻两位首长都笑着说：“好，这就是最好

吃的！就吃这个。”

小白离去后，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政委都说：“你先带我们看看桥去。”

夜，一片沉寂，一牙新月镶嵌在二郎山顶上湛蓝的夜空，稀疏的星星闪烁着微弱的光芒，银霜遍地，寒气袭人。悬空的铁索隐在朦胧的夜色中，上面稀稀拉拉的桥板，象一条灰色的带子，连同山势陡峻的二郎山的山影映在水面上。整个河面，翻卷着沸腾的浪花，呜呜的一片声响。我提着马灯，陪着脚穿草鞋的刘总参谋长、聂政委向泸定桥走去。他们踏上桥面，铁索晃动，可他们连栏杆也不扶，大步走着。刘总参谋长、聂政委和我，默默地从桥东走到桥西。他们有时停下脚步，远眺暗夜里黑黝黝的群山；有时俯首垂视桥下雾气弥漫的流水。他们仔细地审视着每一根铁索，每一个铁环，还伸手摸摸冰凉的铁索链，象要在这里搜索什么，有时停下脚步，看刻有碑文的石碑，询问着天主教堂的情况，当我们从桥西再折回桥中央时，刘总参谋长突然停住脚步，扶住铁索，从我的手中接过马灯。一团淡黄的微光投到河面上，他再次俯视大渡河里奔腾的急流，随后用脚重重地在桥板上连跺三脚，铁索不由震颤起来。刘总参谋长感慨万千，触景生情地说：

“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化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对，我们胜利了！”聂政委也十分激动地说。

“应该在这里竖一块碑！记下我们战士的不朽功勋！”刘总参谋长又说。

是的，应该记下我们战士的不朽功勋，刘总参谋长、聂政委道出了我们红军全体指战员的心声。

我们的红军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又一次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力挽狂澜，化险为夷。

我们胜利了，这胜利确实来之不易。因为这里地形复杂、险峻，有利于敌人，且桥边有优于我们的兵力，我们是二百四十里长途奔袭，敌人守城是以逸待劳……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我们胜利了。

打下泸定桥的第三天，军团主力到了，接着我们到桥头迎接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迎接中央机关的同志。这时，毛主席赞扬我们取得了夺桥的胜利。

第四天，红军千军万马从泸定桥上越过了天险大渡河。

中央军委为了表彰我们四团，除了颁发一面奖旗外，还给二十二个首先过桥的突击队员，以及我们团长、政委发了奖，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套印有“中央军委奖”字样的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日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这在那时确实是最高的奖赏了。

三十年后，一个战友给我送来一些泸定桥的照片，我对着照片看了很久。铁索桥依然如故，还是那样高高凌架于惊涛之上，架峙于两个笔陡的山峰之间。在上游又新建了一座雄伟的大钢桥。这座新建的大渡河钢桥是康藏公路

的孔道。朱德同志在桥头题了一幅对联：万里征途，犹忆泸定险；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我看着照片，往事如潮涌。我依稀看到那二十二名勇士攀援铁索，看到机枪子弹打在铁索上冒出钢花一般的火星，看到敌人在桥头纵火抵抗勇士们的熊熊火焰。二十二个勇士，二十二个战友啊，你们都在那里？带队的连长廖大珠，血染黄土高原，江西老苏区的红小鬼刘梓华同志长眠在天津城下，还有那个捷足先登的苗族小战士呢？啊，他们的名字，竟没有留下来，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擦去盈眶的泪水，再看那观音阁依然蔚然高矗，还是围着石栏，那石栏上留下了敌人子弹的痕迹。这里曾架着机枪，那里——石栏右侧一张八仙桌大的平面上，是我军的第一任炮兵连长赵章成同志的迫击炮阵地。老赵在这里多么有力地支援了二十二个勇士！这位神奇的神炮手已经为革命鞠躬尽瘁了。戈达庙已不复存在。再看桥东的几张照片，泸定城一片白墙红瓦，楼房高耸，倚着二郎山麓绿茸茸的一漫斜坡，浴在灿烂的阳光里。一片新建的房舍之间，居然还保存着一栋焦黑的屋架，记录着当年敌人纵火的历史陈迹。山城背后，有几个坟茔，夺取泸定城倒下去的战友，长眠在那里。

啊，泸定桥啊泸定桥，你是那样严峻地以一桥系革命安危，永远载入无产阶级革命的史册。一九五〇年，刘伯承元帅为你题名：

大渡河桥

一九七九年，年近八旬的聂荣臻元帅为你题诗：

安顺急抢渡，
大渡勇夺桥，
两军夹江上，
泸定决分晓。

前年，泸定县决定重建纪念馆，要我写点纪念文字，我忽然想到刘伯承元帅当年的话，应该树个碑，记下我们战士的不朽功勋，于是我欣然提笔，写了以下四句话，表达我对战友的怀念：

无边风雨夜，
天堑大渡横，
火把照征途，
飞兵夺泸定。

神 兵 天 降

在泸定住了三天。第四天，我们又出发了。沿着大渡

河东岸的一条小径，我们走了半天，再往东、往北，就登上了去夹金山的道路。不料，进至化林坪，我们遭到敌人的阻击。

这是哪里来的敌人？他们有多少人？兵力是怎么配置的呢？经过侦察人员一了解，我们才知道：

原来，正当我们团奔袭泸定桥时，从安顺场渡过大渡河的红一师就在龙八堡向敌增援泸定的袁国瑞旅发起了冲锋，他们打乱了敌人的部署。袁国瑞带着一个旅向北撤到了化林坪。

化林坪是个不大的镇子，四面有土围子。敌人将小股警戒部队摆在镇子里，把主力放在镇北一个名叫山垭口的高山上，妄图凭险据守。

哪知，敌人在镇子里的警戒部队，被我一师部队一击即溃。乘夜我团和一师的部队向敌展开了一场战斗，很快就占领了这个小镇。随后，我们四团奉命仰攻山垭口，配合兄弟部队作战。后半夜，我们在镇子里听到山垭口前坡枪声阵阵。从那时断时续的枪声中，我们感觉到，这场仰攻遭到了敌人的顽强阻击。红军被挡在山前。

大清早，陈光师长和刘亚楼政委派人把我和王开湘同志叫到山脚下，向我们交代任务：拿下山垭口。

我举起望远镜，只见眼前云遮雾障，峰峦起伏，丛林莽莽，白蒙蒙的棉絮一般的雾气一直缠绕到半山腰，在沟沟岔岔里一大团一大团的雾霭，很快地升腾、飘动。雨，

已经下了半宿了。眼下，毛毛细雨，淅淅沥沥，一直下个不停。一条向上的小路，两尺来宽，是山区常见的那种林间小径，就着山势，蜿蜒曲折，向上，向左，向右，穿过枝叶绵密的松林，攀上长满野花的山脊，消失在云雾里。小路两侧，有的树干上留着弹痕；有的树枝被弹片削到地上；地面上到处是坑坑洼洼，看得出，那是地雷炸的。上面的地形又怎么样？敌人的阵地在哪里？敌人的兵力部署究竟是怎么样的？这些都象谜一样罩在云雾之中。

根据敌情、地形、任务，我和王开湘同志研究进攻方案。

王开湘同志沉思地注视着通向上边的那条崎岖小路，说：“这样的地形，大股兵力展不开。山上有雾，对敌人有利也有弊。我们摸不清他们，他们也摸不清我们，小股部队随机应变，可以出奇制胜。”

我觉得团长说得对，大部队展不开，即使展得开，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势必造成很大的伤亡。于是，我说：“那就把任务交给六连。他们昨天晚上在镇子里和敌人交过手，士气正盛。”

团长点头表示赞许，并说：“再给他们一个机枪排。”

六连连长还是由二营副营长黄霖同志兼职。过了一会儿，黄霖奉命来到了。

刘亚楼政委向黄霖招了招手，说：“听说你们六连昨天晚上打得很好！”

没等黄霖同志回答，王开湘团长跳到一块大石头上，伸手向上一指：“这上面叫山垭口。”又转身西指，“西边是悬崖，连猴子都难爬上去。敌人就守在上面，如今通上去的这条羊肠小道和它两侧人能走的地方他们都埋了地雷。昨天夜里我们多次冲锋都没有成功。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地方离泸定桥一百三四十里，一天多的路程，如果我们不能很快拿下，敌人增加一点兵力，踞高临下一个反攻，就对我们十分不利。你们一定要拿下敌人这个阵地！”

黄霖听着王团长的指示，站在一旁冷静地思索着。

我接着问道：“还有什么意见？”

“没有。”

“有什么困难？”

黄霖稍稍停顿了一下，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聚拢在小开阔地上的其他师、团领导。此刻，他看到的全是期待、鼓励的目光，便不再迟疑，坚定地说：“困难当然有，但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

刘政委看出他的心思，说道：“怎么，怕困难说出来叫领导为难是不是？”

黄霖同志笑了。

陈光师长这时也从一旁说道：“黄副营长，有什么实际问题，你就直说。”

黄霖这才说道：“我们连队一天多没吃上一顿饱饭了。”

刘亚楼同志看了看周围的同志，说：“师机关、直属队

还有没有干粮？有多少干粮都拿出来！”

大家面袋里只有很少一点，都拿出来勉强可供部队吃一顿。是啊，机关同志，供给部的同志，又有什么办法？自从奔袭泸定桥以来，就抓生米充饥。打下泸定桥，敌人纵火烧房，缴得的粮草有限，还要留给后续部队，山区贫瘠，打土豪所得寥寥无几，沿途又杳无人烟。打下化林坪，十室九空，敌人把存粮也早已弄到山上。这两天，部队没有很好地吃过一顿饱饭了。

作为团政委的我，看到黄霖同志提出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不禁想到根据地。没有根据地，真难啊！过去在老苏区，每次战前，父老乡亲送来了肥猪、白米，人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冻馁之虞。那真是兵强马壮，军威赫赫！

过了一会儿，黄霖同志把六连带上来。我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向指战员作了简短的战前动员。我说：“眼下我们确实有不少困难，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忍受得住，能克服这些困难，就一定能胜利！”同志们听了情绪很高。

我们站在原处，目送他们走上林间小路。

他们踏着狭窄的小路，向上攀登。

半山腰以上，仍然笼罩在云雾里。

黄霖和六连指导员在前面，一边观察，一边向上靠。一字长蛇阵里没有枪声，连脚步声也听不见。毛毛细雨落

在枝叶连成一片的巨幅绿色华盖上，针叶上、阔叶上、枝条上到处都是闪闪发光的水珠。丛林深处，鸟雀唧唧啾啾地叫个不停。

敌人没有枪声。这种战斗打响之前的沉闷，憋得人心里难受。

黄霖领着队伍继续向前。他们越过了因枯朽而倒在路旁的古松、白桦、花椒木，遇见了一些粗大的树干，看来还挺壮实，但稍一碰就碎了，倒下了，脚一踩就是一个窟窿。然而，他们并没有留心这些，想着的是一定要完成任务。他们一声不吭，越过树丛，跨过雷坑，直向前奔。

远远看去队伍变得越来越小。我们还在原地凝视着。

“砰！”清脆的一声步枪声，冲破了沉寂。但是接下去未见战斗打响，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敌人朝六连指导员开了一枪，子弹打在他拿着的油伞顶上，脸颊稍稍擦破了一点皮。

黄霖过去一看，见伤势很轻，开玩笑说：“是个好兆头，见面红！”

指导员毫不在意地抹去脸上的血迹，笑道：“在暗处打黑枪，算哪家的英雄好汉！”

黄霖一挥手，部队停止了前进。随后，他又向响枪的地方看去，虽然从山腰往上看能见度好多了，但仍分辨不清地貌的细部。

刚好呼喇喇的一片声响，树枝上大滴的水珠全洒落下

来，他们抬头一看，从天空刮过一股劲风，云雾飞驰，右边山巅上露出了一小片蓝天，那湛蓝的天空衬托着一痕异常险峻的山峰。黄霖抓住了这个时机，又看了看左边山峰的地形：古木森林，巉岩林立，又高又陡。无疑，它成了敌人放心的侧翼。如果从那里向右边压，在一团雨雾之中，一个连队打得猛打得巧，就能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眼下，正面的敌人阵地被雾霭遮掩着，迷茫一片。他没有向放冷枪的敌人还击，带着连队，悄悄向左翼山峰迂回攀援而上，决心从那里发起攻势。

我们的望远镜，一直追踪着这支队伍。

他们从乱麻一样盘根错节的野藤、荆棘丛中爬了过去！

他们被一面笔直的石壁挡住了去路。他们又搭起人梯，踩着同志的肩膀翻上石壁。

有的战士从苔藓上滑下来，虽然那一下滑得很远，但又倔强地站起来，重新往上登。

他们越往上走，行动越是困难。但是，他们终于到达了最后一道天然屏障的底下。他们稍事停留，先由一个战士爬上了一棵大树，从树梢荡上了一个立脚点，接着又爬上另一棵大树……一连地利用大树做梯子，这个战士居然到了顶端，从那里放下连接起来的长长的绑腿。后面的战士，抓住了垂直的“索道”。四个排，一百几十个同志，一个挨着一个地攀援上去。我掏出怀表看了看：十二点整。

我们舒了一口气，好象看到我们的战士，刮破了衣服，

露着斑斑血迹，全身其他地方几乎都是泥，只有眼睛闪烁着战斗的光芒。

我们焦急地等待着，等待着，等待着报喜的枪声。

可是，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毫无动静。

突然，枪声大作。我们兴奋极了。为什么战斗打响之前，那么长时间没有声息呢？后来，从黄霖的汇报中我才知道：他们在一千多米艰苦的攀援中，几乎耗去了浑身的能和热。当爬上山顶时，一个个就象要从大地母亲身上吸取力量似的，一动不动地仰躺在湿漉漉的山顶上。细雨，洗去了他们脸上的污泥；山风，吹干了他们身上的汗水。

稍稍喘过气来，大家就开始检查枪支。

黄霖带着几个排长，观察敌情。尽管周围雾气沉沉象是下着毛毛细雨似的，但在仔细的观察中，他们还是在一片茫茫白雾里发现了敌人的破绽：白色的雾气中，升起两团更浓的雾，冉冉向上。

“那是雾还是烟呢？”不知是谁先问了一句。

“是雾，”二排长说，“这里怎么会有烟？”

“要不是烟，怎么垂直向上冒呢？”黄霖说。

一排长说：“是烟！”

“呀！烟，敌人生火冒起的烟！”二排长恍然大悟，“这里有敌人！”

于是，他们带领战士们，怀里抱着枪，从陡坡上向下滑，滑到厚厚的碎枝烂叶上，不管三七二十一，跳起来就

向冒烟的地方扑了过去。

果然不出所料，敌人怕冷，用湿木头烧起两大堆火，围着取暖，大约有一百多人的样子，这里就是敌人侧翼的警戒阵地。他们万万没有料到，会从云端里飞下一支红军队伍！

七挺轻机枪从高处压住敌人，黄霖带着三个排，一个猛虎扑食，敌人垮了，俘虏七十多个，剩下的向后溃逃。

过了这个警戒阵地，就是敌人的主阵地了。

失去了侧方警戒，敌人惊慌失措，立即进行疯狂反扑。在敌我力量极端悬殊的情况下，六连打得非常顽强。不管敌人怎样反扑，他们就象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纹丝不动。战士们的子弹不多了，手榴弹也快完了，许多同志负了伤，渐渐地连包扎都顾不上了。有的战士连着负了两次伤，也还在坚持战斗。这时敌人又冲锋了，黄霖叫战士们都上了刺刀，握着最后一颗手榴弹，等敌人靠近，再靠近，二十米、十米……“打！”随着黄霖的喊声，一排手榴弹投出去，紧接着他们冒着手榴弹爆炸的浓烟，象决堤的洪水，奔腾而下。敌人支撑不住，扭头就逃。山沟里的敌人全线震慑，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互相践踏，死尸枕藉。战士们从敌人手里缴到了大批武器、弹药，火力猛地增强了，更是穷追不舍，一梭子扫过去，倒下一大片。敌人旅长袁国瑞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带着残兵败将，落荒而逃。

黄霖见敌人大势已去，下令停止追击，清查战果。这

才发现，不仅抓了几百个俘虏，而且漫山遍野都是敌人丢下的武器、弹药、粮食和尸体。

这时，王开湘同志和我踏着如血的落照，登上山垭口。看到了我们这支神奇的队伍——一个加强连，伤亡三十多人，他们中间不少人身上染着殷红的血迹，带着伤还在向敌人冲锋。阵地上，烈士们还保持着与敌人搏斗的姿势。三排长壮烈牺牲了。二排长身负重伤，还在爬着追击敌人。这些排级干部中没受伤的，只剩下一排长了^①。他很久以来一直想得到一支“花机关”，这次愿望真的实现了。

我们正面的兄弟部队也奋不顾身地冲过去了，敌人彻底地垮了，我们胜利了。然而，我看着烈士们的遗体，想起他们生前一个个生动活泼的形象，想起在漫长的征途中，在野营的篝火旁，在老乡的茅屋里，在硝烟弥漫的阵地上，我们一起拉家常，叙革命的情怀，憧憬未来的情景，不禁感慨万分：现在你们为中华民族的危亡，为争取新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你们虽然长眠在山垭口的峰峦，却不愧是英雄好汉，不愧是我军优秀的指战员！

面对着这个惨烈的阵地，我对六连的同志们说：“你们打得好！为大部队的前进开辟了通路。”

刚打扫完战场，刘亚楼政委就来到了我们身边。

这时，我和王开湘同志正在表扬六连攻如猛虎，守如

① 后来在黑水芦花筹粮中，他遭到藏族上层反动武装的冷枪袭击，不幸中弹牺牲。

泰山，敢打敢拚的战斗精神。黄霖同志说：“政委，我们六连完成了任务，但伤亡不小。”

刘亚楼同志站在旁边激动地点着头说：“六连是英雄连队。”

“首长，如果以后还要六连执行这样的任务，要求师、团首长给我们一点老兵。”

“给，给你们老兵，给你们补齐！”我们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着，不由得都笑了。

随后，师、团立即给六连补充了二十多个老兵，同时也给他们补了一批新兵。从此，六连又成了齐装满员的连队。在长征路上，一个连队一下子补上二十多个老兵，可是一件不简单的事啊！

越过夹金山， 意外会亲人

打下山垭口，我们乘胜前进，先后占领天全城和宝兴县城，紧接着又奉军团首长命令：担任前卫，从宝兴县开往大跷蹊，作翻越夹金山的准备。

夹金山，又名神仙山，位于宝兴县城西北，懋功之南，理县之西南，是一座海拔四千九百多公尺的大雪山。

到达山下，已近黄昏。我们站在山下仰望，只见夹金山高得不见其顶，象一个披满白发的老人端坐在那里，团

团云雾在它的四周盘旋，夕阳的余辉斜过来，照在白皑皑的冰雪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虽节令近夏，前几日我们行军汗流浹背，但现在寒气逼人，山上的温度更可想而知了。据说，夹金山终年积雪，日落之后，月出之前，更是冰雪遍地，别说人上去，就连鸟也不易飞过，只有神仙才能登越。“神仙山”也正由此得名。我们派出了工作组，深入当地居民访问。老乡提供的情况，不能令人满意。虽然他们中许多人数代祖居在这里，但大都没有上去过，他们听说我们要上山，都好心地劝我们别冒险，特别是看到我们都穿着单衣^①，说是不累死、饿死，也要冻死。有的老乡还有根有据地说某年某月，某人的爷爷爬山爬了一半遇到雹子就被砸死在山上了；某人的父亲上山遇到瘴气，就再也没回来；还有一次，村里上去了四个人，结果一个都没有回来……有的年长的老乡谆谆告诫我们：如果你们一定要过的话，那早晨、黄昏是绝对不行的，因为那时山上风雪最大，天气最冷，什么也看不见。要过，必须在上午九时以后，下午三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带上烈酒、辣椒，好御寒、壮气，最好手里再拄根拐棍。总之，老乡都把这大雪山看作神秘之地，认为上山凶多吉少。但我们是不信神的，立志要翻越这座雪山。

由于我们是过夹金山的前卫团，为了保证全军安全通

^① 因红军从云南进入四川时值盛夏。

过雪山，当好先锋，我们一面将情况向上级报告，一面积极做准备工作。我们知道，山上除了冰和雪是不可能找到充饥的东西的。可眼下村里的居民既少又穷，烈酒、辣椒都无法买到，只好让大家想方设法，每人备足两至三天的干粮，每人再准备上一根木棍。看来，我们也只能身着单衣去翻那座雪山了。

我们把雪山将要遇到的困难详细地向部队作了交代，要大家想办法做到过山时不拉一个人，不掉一匹马。战士们豪迈地说：

“我们最先强渡了乌江，夺下了泸定桥，突破了敌人层层截击，难道这座山我们还制不服吗？”

“强帮弱，大助小，走不动的扶着走，扶不动的抬着走，我们一定要让每一个战友安全地越过夹金山！”

十二日清晨，在洪亮的集合号声中，部队从邻近的几个小村落向大碛碛村集结，进行翻雪山的动员。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有的小心翼翼地夹在腋下，有的兴致勃勃地上下挥舞。“征服夹金山，创造行军奇迹”的口号声在山前震荡，无数根木棍一齐指向天空，象平地树起的一片无叶林。

九时许，队伍浩浩荡荡地沿着河旁的小路，向夹金山麓进发。到达山下，脚下的路冻得梆硬，木棍着地发出“咯咯”的响声。我们一鼓作气爬上山腰。

我停下脚步，看了看行军队伍。

二营为前卫营，六连为前卫连，只见前卫六连的同志手执木棍，在雪中探路。他们利用刺刀、铁铲在雪上挖着踏脚孔，后面的同志沿着前面闯出来的蜿蜒曲折的小路往上爬。队伍越拉越长，仰面看，头顶上有人；低眼望，底下也有人。红旗灼燃似火，雪映战旗，色彩分外鲜艳。战马喷着雾气，衔尾相随。宣传队站在队伍旁，前呼后应。喊声，歌声，说话声，马嘶声，震荡着白雪皑皑的山谷，发出一阵又一阵欢快的回声。

我们的视线从行军队伍上移开，举目环视。

左面是松软的雪岩，右边是陡立的雪壁，中间是漫漫积雪，险峻情景，使人怵目惊心。

这画面，这声响，实在动人心魄，非身临其境莫能体会，可惜我不是画家，要不，真该把这壮丽的阵容，把这峥嵘的图景描绘下来。

刚上去，路还算好走。但越往上走，路就越窄越陡，空气也越来越稀薄，雪也越来越深，气温也骤然下降。眼下，天空的太阳虽然还是张着笑脸，但是，在这座茫茫的雪山面前，已经失去了它的威力。明晃晃的阳光把白雪照得格外晶莹透亮。雪的反光刺得人们睁不开眼。我们努力地往上攀登，每走一步，都要化很大力气。但是同志们的情绪还是很高，他们奋勇攀登，谁也没有叫苦，谁也没有叫累，有时不小心滑倒了，旁边的同志立即把他扶起。有的不慎掉到几米深的雪窝里，不等他喊，就有成群的人递

去木棍、绑腿，拽的拽，拉的拉。被救的人爬上来拍去身上的雪，又继续前进。

我们虽然还在前进，但不知不觉地行动越来越迟缓，就象要故意放慢前进的速度似的，歌声也渐渐地少了。筋疲力尽的政治工作人员只能用手势鼓动大家继续前进了。

“可能只走了二十里！”团长看看身后白蒙蒙的山峦，对我说。

“是啊，上下山共有七十多里，还差得远哩，后边的路程更艰苦！我们动员一下。”我说。

“对，鼓动一下。”团长赞同地说。

于是，我踏上一块高坡，大声地说：“同志们，老乡都说雪山是神仙山，鸟飞不过，人烟绝迹，只有神仙能过，如今我们上来了，岂不成了神仙！”

战士们一听都笑了。一个小战士跟着说：“政治委员，人们都说爬雪山难，我看也难不过我们的两条腿！”

“对！我们终于用两条腿走上来了。可是，小鬼，也要当心它把你吃了！”我说。

“怎么吃？雪山又没有嘴！”他说。

“有嘴！”我说。

“有嘴？雪山有嘴？”大家哄笑起来。

我指着旁边厚厚的雪堆说：“它就是嘴，只不过嘴上抹的不是粉，而是堆的雪，看不出那嘴的模样罢了。可同志们别小看它，这嘴大得很，深得很啊，有的还不知道有多

深呢，越往上，雪越厚，堆得越高，嘴就越大，可千万要小心，真要掉进它嘴里就麻烦了！”

“这倒是。”众人议论纷纷。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麻痹！一定要踏着前面同志的脚印，一步步走！”我说。

众人静静地听着。

我继续说：“还有，往上走，估计冰雪也越来越硬，要当心滑倒，防止掉下山去。路还长，上边更难走。上级号召我们，坚持下去，翻过雪山！”

这时，王友才同志站出来，举起拳头，带头高呼道：“坚持到底，翻过雪山，就是胜利！”

众人一齐高声呼应，巨大的声浪在雪峰上久久地回荡。

“前进！同志们，胜利在前！”

我下了高坡，赶到前头，顿时感到浑身热乎乎的。

我们团队在前进！

我们的战士一个个挺着胸膛，迎着寒风，在白雪中艰难地奋力前进。

路越来越陡，小道几乎笔立起来了。弯弯曲曲的山路，虽然经过前卫的一番修补，但是，骡、马行走，还是十分困难。这时，偏偏寒风又大声吼叫起来。这风一刮，乌云蔽天，顷刻间阳光就不见了。那山峰上千年的积雪，瞬息变作腐朽疏松的土墙，一堆堆、一块块往下倾斜、倒塌。雪流翻卷，一泻千丈。它撞到坚硬的冰山上，又溅起无数

冰团、雪屑，犹如银蛇狂舞，玉粉飞扬，凛冽的大风夹卷着它直打在我们的脸上、手上，就象刀割似的。我们只能用手捂住脸，忍着痛，冒着暴风雪踉踉跄跄地行进，透气都十分困难。虽然这时我们把所有能披的东西都披在身上了，也还是觉得冷。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有的同志头晕目眩，一步一停，一步一喘。我们互相搀扶着，几乎都是拚着全身力气，在同残酷无情的大自然搏斗。

刚到山顶，突然下起一阵冰雹，核桃般大的雹子劈头盖脑地打下来，我们无处藏身，只好用手捂着脑袋继续向前走。

冰雹过后却是万里晴空，又感到阳光耀眼了。到后山顶，我们举目一望，只见千里冰雪，银峰环立，除了山峰上有几根孤零零的电线杆和少数民族用石头垒起的旗杆之外，到处是一片琼玉世界。俯视山下队伍，象一条灰色长龙，蜿蜒而上，把这个琼玉世界划成两半。此一情景真是：

天空鸟飞绝，群山兽迹灭，红军英雄汉，飞步碎冰雪！

这时，最顶端突然冒起烈焰，那烟在空气稀薄的碧空中袅袅上升，是那样的蓝，就象一条蓝色的飘带在随风飘荡。

仔细一看，原来烧的是一人高的柴棍堆，那堆火就在一座孤零零的小庙前。可以肯定，这是前卫连为了烤火点着的。当我走到火堆时，前卫连已经开始下山了，我们正好烤了烤火。这时，我又看了看那座小庙，这才发现庙门

上写着三个字：寒婆庙。墨迹虽模糊不清，但还看得出那是用汉、藏两种文字写的。庙里有一尊寒婆像，那装束与藏族妇女相仿，她身上零乱地挂着几条哈达，那哈达的颜色已经发灰了。这座小庙何时修建已无法考证，不过从庙前堆的柴棍看，怕有相当长的时间了。

原来庙前一左一右堆着两大堆柴棍，除了点燃一堆之外，还有一堆也有一人多高，想来想去，这很可能是敬神的人上山时拄着的棍子，他们到达山顶，献给寒婆取暖用的。由于这里空气稀薄，终年积雪，这些柴棍并不朽烂，就越积越多了。

随后，我们全团人马沿着山顶上的一条曲折的盘道，绕着夹金山的主峰，又与风雪搏斗了四五个小时，就安全地翻过了山顶。这时，团长清点了一下人数，发现没有一个掉队的。我听了，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下山时，已不象以前那样吃力，战士们的歌声此起彼伏，荡漾在重重的山谷里，好象是专门唱给夹金山听的。

再往前走，有两座山好象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也许是这山谷总有一面朝阳的缘故，我们刚一踏入这夹缝之中就感到气温骤增，象是从冬天忽然闯入了春天，看周围的景色，也象有了春意，两边石壁上，不但不见厚厚的雪，竟有青苔、小草和绿葱葱的青松，草不高，只一二寸长，还有几株不知名的淡黄色的野花在启瓣绽放，迎风摇曳，散逸着幽微的香气。在这千里冰封的雪山上，有这样的绿色

世界，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下至半山，在路边的山坡上，有三五成群的长毛牛在悠然戏逐，这是我们在夹金山上第一次看见的动物。它们发觉浩浩荡荡沿山而下的队伍，吓得尾巴一翘，到处乱跑。

刚到山脚，一条深沟切断去路，我们只得沿着沟边绕道而下。

这时，山脚下突然响起一阵枪声，战士们一个个警惕地注视着前方，握紧手中武器，准备向前冲杀。

团长和我跑到前卫班，营长曾庆林报告说：他们刚到达山下，就发现前面有情况。因风太大，互相问话也听不清，至今谁也搞不清对方是干什么的，他已指挥二营展开战斗队形，让六连掩护，准备四连出击。

我们一边听营长的报告，一边拿起望远镜，看了看，只见山下不远处是一个村庄。在村子周围的树林中，影影绰绰地有不少人来回走动，他们身上背着枪，头上戴着大沿帽，显然是部队，但是这到底是什么队伍？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人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

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四方面军？

关于四方面军，当时，我们只知道他们在岷江边的理番、茂县一带活动，还不知道他们到了夹金山北麓。与四方面军会师，中央军委早就提出来了，我们抢渡金沙江，夺取泸定桥，就是向着这个既定的目的前进的。哪知，我们翻过雪山就意外地遇到了亲人啊。

我们正半信半疑。一个侦察员飞奔而来，边跑边喊：

“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

“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来了！”

与此同时，山下传来了清晰的“我们是四方面军”的喊声。

顿时，整个山谷响起了一片欢呼，震得山谷抖动。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夹金山下，会见了我们日夜盼望着的亲人红四方面军的同志！

我们蜂拥而下，同四方面军的同志紧紧握手，热泪夺眶而出，长时间地沉醉在欢乐中，二百多天，一万多里的征战，我们遇到的是敌人的紧紧追击，重重堵截和想象不到的层层困难，从来没有看到兄弟部队的战友。在湘江之滨，我们虽然那样热切地盼望与二、六军团会合。但未能实现。此刻，突然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我们怎能不激动！怎能不欢喜若狂！

我们欢呼着涌进山下的村庄——大维村。

大维，这是一个近百户人家的村庄。村里的居民大都是藏族同胞，生活很贫困。村中有一座喇嘛庙，金瓦红墙，在灿烂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倒还雄伟。庙四周，全是木头搭的房子。两到三层，房顶用石片或树皮、木板覆盖。喇嘛庙前还有一个大坪，大坪周围有几家店铺，供应的东西少得可怜，除了盐巴、蚕豆和茶砖之外，其它什么也见不到。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就驻在村里，他们忙着把自己的住房腾出来给我们住。

住处刚安顿下来，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和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各一部的同志们来看望我们，向战士们问好，还送给我们不少粮食，做面葫芦慰劳我们。村头村尾的每一角落都有一群群的战士在愉快地交谈，互相询问情况。

当天，我们在四方面军同志的热情安排下，吃了顿好饭，菜很别致，有牦牛肉、羊肉、马铃薯片，饭是青稞、玉米面糊糊，大家吃得十分香甜，几乎全都忘掉了雪山途中的疲劳。

晚上，我们在大维村的大坪上开了一个会师联欢晚会。熊熊的火焰映红了天空，战士们的脸上闪烁着欢乐的光辉。大家同声欢唱着宣传队刚谱写的《两大主力汇合歌》：

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
欢迎四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兄弟！
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噯！

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
坚决赤化全四川！
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汇合！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喂！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
高举红旗往前进！

歌声震荡，欢声雷动。

一阵热烈的歌声之后，是具有江西、四川风土味的节目表演，四川民歌、兴国山歌，一个接一个，间隙中，连续爆发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和掌声。这歌声，这欢呼声，不仅道出了红军战士心头欢腾的情绪，而且仿佛是在向全国人民宣布：反革命要把工农红军南北分割的局面已经结束，红军的两大主力已汇合成一道巨大无比的洪流，这洪流要荡涤旧社会的渣滓，把中国历史推向一个崭新的时代！

当天夜里，八十八师的同志为团长王开湘同志和我安排了住处。在漫长的征战途中，我们还从来没有在这样温暖的环境中睡过觉哩。然而，我们怎么也睡不着，会师以来的欢乐情绪一直在我们的心头奔腾起伏。

我和王开湘同志干脆从床上坐起来，来了个“长夜话”。王开湘同志平时话不多，这会儿破例地打开了话的闸门。

我们一起回忆着长征以来经历的惊涛骇浪和重重封

锁，那血染的湘江、奔腾的乌江、光辉的遵义、蜿蜒的赤水河、汹涌的金沙、险峻的泸定，一桩桩，一幕幕，复又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互相谈着，互相补充，一起总结，感觉到这万里征途上，同是前堵后追，重重包围，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步步被动，而在遵义会议之后，真是虎入深山，龙归大海，创造出那样多的战争奇观，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如今，在这冰天雪岭之下，两大主力又胜利会师了。这是多么令人兴奋啊！

夜已经很深了，我们越谈兴致越高。地下，一个火盆子，烧得通红，我拿起怀表，就着火盆映照的红光一看，两点多了。这时，我们的话锋一转，转向了未来。是啊，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力量空前强大，这对我们开辟新的苏区，粉碎反革命围剿，北上抗日，在全国掀起一个蓬蓬勃勃的革命高潮，该是多么有利啊！

六月十八日，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军委率领下开进了懋功。

懋功又名小金，是雪山脚下唯一的有数百户人家的小城镇，除了藏民聚居、有喇嘛庙外，还有一座较大的天主教堂，偶尔遇到汉民，但大都是做生意的。这里是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的驻地。如今中央军委便借了这座高大、宽阔的天主教堂，召开了一个盛大的一、四方面军部队联欢会。会后还会了餐，又组织大家观看了文艺节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战士剧团演出的《烂草鞋》，这个戏歌颂了红军在长

征路上的英勇机智，讽刺了国民党军队的低劣无能，剧情大致说国民党反动派一个劲儿地吹嘘着在如何如何追、剿、堵、截红军，实际上是一路跟在红军背后拣烂草鞋。由于红军战士剧团演员亲身经历长征，有深切的感受，丰富的生活，演得十分逼真，他们诙谐幽默的动作，不时博得在座的同志哄堂大笑。文艺晚会上战士剧团的同志还表演了刚健多姿的舞蹈……那一个夜晚，可热闹啦。

第二天，两支兄弟部队又分别组织了参观团，互访互学，在十分融洽、热烈的气氛中，抒发了兄弟情，表达了战友爱。

小 金 川 畔

六月底，我们从懋功两河口出发，经过大板村、黄草坪到木城，眼下又要翻越一座大雪山——梦笔山了。

白雪皑皑的梦笔山似乎比夹金山还要高。从地图上看，此山上下九十华里。当我们准备上山时，一位藏族老人急喘喘地赶来，拉住我的手，用不太流利的汉语一再劝说：“千万不能上山！”

原来，这虔诚的、好心肠的老人是一位喇嘛，从他懂事开始，大喇嘛告诉他梦笔山是一个神妖。据他介绍，这个神妖——梦笔山，比夹金山那个神仙厉害得多，无论人有多大本事，都无法从他的身上踩过去，这个神妖一旦发

起怒来，吹上一口气，就会刮起一阵狂风，眨眼工夫，就把人吹得无影无踪。他越说越奇，说山上明明是晴天，突然会下起石块大的冰雹，不把人打死，也会把人打昏，还说山上没有路走，一不小心，就会掉进雪窟里，一旦掉进雪窟里，就休想再从那里爬出来。总之，他把这座咒为神妖的大雪山——梦笔山形容得十分可怕。当然这是经过人们渲染的，但是看起来毕竟它也还是一座充满着艰难险阻的高山。我们耐心地向他解释：为了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多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同时我们对他的那番好意也一再表示感谢。这位老人看我们态度十分坚决，挽留不住，便拿出珍藏的酥油、糌粑馈赠我们。我们不要，他很不高兴，我们没办法，只好多少吃一点，他这才露出笑脸。临别时，他又唤来许多藏民，双手合十诵经，祝我们战胜神妖，一路平安。

我们上山了。这次爬雪山，由于有了翻越夹金山的经验，加上当地的条件比那里要好一些了，所以我们准备得比较充分。每人上山前除喝了辣椒水之外，有的还在身上披上了毡子、毯子，大家的干粮带足了不说，还规定了联络信号。按照军团命令，全体必须于下午两点前下山。这次行军，六团担任前卫，我们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

经过整整一天的艰苦奋斗，我们终于征服了神妖，从梦笔山的山腰通过。但是，当我们翻越完巍巍的梦笔山，经过一段狭窄幽邃的深谷向预定目标——卓克基前进时，

突然听到前面隐隐约约地响起了枪声。侦察员回来报告：前卫六团发现路边飞来冷枪。原来盘踞在卓克基的国民党反动分子胁迫一部分藏民袭击我们，妄图阻拦我们前进。为了保护无辜的藏族同胞，前卫团放慢了行进速度，一边喊话，一边前进，当喊话无效时，一旦看准了反动分子也就放枪还击。也不知是我们喊话起了作用，还是有选择的还击产生了效果，不一会儿，他们纷纷骑上马，哩哩啦啦往卓克基方向逃去了。又经过一天行军，我们从山上往下走就要到卓克基了，离得老远就看到一座颇为宏大的建筑物，原来这是卓克基的一座土司宫。

走近一看，这土司宫位于秀丽的小金川畔，群山环抱，润碧崖青，足有十几丈高，全部是用石块砌成，在这偏僻的山区更显得巍峨瑰丽。它俨然象一座高耸、雄伟的西式大楼。少说也可容纳二三千人。

不料，反动分子胁迫藏民从这高大的建筑物里突然向我们开火。先头兄弟部队一时再也无法靠近，我们也跟着停下。时近黄昏，先头团打亮照明弹。不料才响几发，土司宫里突然哗然而响，接着他们四处逃窜。原来他们由于缺乏知识，不知道照明弹是什么玩意儿，还当是红军用的什么法术哩！于是我们两个团部驻进了土司宫。

眼下，这座土司宫的里里外外，我们也就更清楚了。

这座宫殿宽有二十几丈，前后左右共有四栋高楼。前栋和左右两栋各为四层，后面那栋为六层。

最下层，前栋是大厨房，里面有十来口大铁锅，每口锅足可以做上百人的饭。左右两栋的最下层是马厩和很不讲究的住室。

第二层，是稍微讲究一点的住室，里边除了藏兵的被服、装具，还放着不少食品。

第三层可算是土司宫的精华了。不论哪一间，门都是用上好木料做的，而且都经过匠工的精心雕镂。玻璃窗也都是有色的，这即使在大城市也只有洋人的教堂里才能见到。壁上有木橱，橱中又分许多格，格内陈列着一些珍贵、小巧的古玩：玉如意、小玉佛、瓷佛像、佛珠等。屋里的摆设也极讲究，有长形的黑木条几、方桌、靠背椅、精美的书桌，不仅木料讲究，而且还分别镶嵌大理石。显然，这很可能就是土司的住房了。

第四层为一间间大同小异的佛堂，屋子大小不一，里边除了佛像、鼓、锣、幡外，还有许多藏文经卷，壁上有许多幛子，幛子大都是绸质的，还有白色的哈达，与一幅幅光怪陆离的壁画，我想努力看清它的内容，可惜，年长月久，烟熏火燎，已经不复辨认。但是，幸存的一二个佛教图像，人物造型却是栩栩如生。

四层以上是筑有炮眼的了望屋，它与旁边拔地而起五六层高的碉堡楼彼此呼应着，就象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这就是我所见的土司宫的全貌。这一座位于穷乡僻野，出现在大山区的辉煌建筑，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奇观，

对我们这些出身于贫苦农民，连年行军、作战的红军战士来说，真是开了眼界。但是，通过它也使我们认识到了，那些反动的土司——藏族人民的奴隶主，是一些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他们之所以这样富，正是由于他们残忍地盘剥、鱼肉藏族人民的结果。就在观看这座耗金千万的土司宫的那天，我们还察看了这里藏族人民的普通住房。

一般藏民的住房极简陋，是石块砌成，都是人畜同舍。他们的住房一般为两层：下层是牲畜厩舍，屎尿狼藉；楼上一层大都分为两间，一间是卧室，一间为厨房，也有的卧室、厨房在一起，稍富有一点的人家多一层，就加了个佛堂。由于房屋低矮，门窗又小又少，阳光不足，空气污浊，与土司宫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据当地藏胞介绍，土司在领地内是奴隶的主人。藏人每年两次要向土司纳租朝贡，土司无论有什么差事，都可以随便派哪一个人去做，连那宫前的守卫，也都由藏民轮流昼夜担任。藏民见了土司就得跪下，要等土司过去了，才能起来。土司要惩罚一个奴隶，毋须讲什么理由，一怒之下，砍下奴隶的头，也毋须抵命。他们如此作威作福却得到国民党军阀的支持。我们随即又翻阅了缴获的有关川西北地区的史书，发现：

明末清初，大小金川地区的藏民，因常常出扰肇事，满清政府曾屡派大军围剿，并采取“以夷制夷”政策，让归顺之藏民头目协助满清政府镇压叛乱。每次征服之后，

对于有功者则分别择险要关隘和战略要地建筑城垣，并划附近之肥沃土地为其屯土，免收粮赋，并且给以世袭特权，目的是为了免除边疆之患。从此，这些投诚清政府、平定叛乱有功的藏民成了有权、有势、有钱、有地的土司。民国以后，四川军阀不但对土司仍采取这种封疆特权制，而且还采用了更狡猾的手段来笼络他们。这些军阀时常把各地的土司请到成都、重庆，一住几个月。汽车、洋房、花天酒地，使这些土司乐而忘返。渐渐地，他们也就通过土司在当地进行剥削。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他们还经常给土司们送些洋枪、洋炮，并且在藏区组织了一支反共力量。

听说这座土司宫的主人，就是四川军阀一手扶植起来的一个暴敛的农奴主，他不仅会放洋枪、洋炮，而且还在成都的一个大学里读过书。我联想到他那卧室里的书架上还摆着《三国演义》、《水浒》等汉字的古典文学作品，不禁感到此人已相当汉化，怪不得当我们翻过梦笔山进入幽邃的山谷时，他伙同国民党反动分子胁迫藏民向我们射击，妄图阻拦我们呢。现在，这个家伙虽然逃之夭夭了。但是，他丢下的土司宫和那许许多多的罪证却从反面教育了我们，这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它越发坚定了我们克服困难北上抗日的信心，坚定了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

小金川畔所发生的事，虽然在我们的征途中并不是一

次值得记载的重大战斗，我们团进驻这里也没有遇到什么了不起的困难，但土司官瑰丽的建筑，国民党反动派与藏族反动上层的勾结，以及他们对藏族同胞的压迫，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接着我们继续前进，把寺庙、牛羊移交给三军团教导营彭绍辉营长、李志民政委。

从卓克基到毛儿盖

在卓克基没住几天，我们又向黑水进发，经梭磨河、马塘、刷经寺、康貌之后，又翻越了一座高达四千八百多公尺的大雪山——长板山^①，进入黑水县境的芦花。

在芦花，也许在附近的一个叫什么梁子的村子里，我们进行了一周的纪律整顿，特别强调革命军人一切行动听指挥，强调一定要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贯彻中央的民族政策。在整顿中召开了干部会、党员会和士兵大会，部队经过教育，士气更旺了，战斗力更强了。随后，我们又继续翻越第四座大雪山——打鼓山。

打鼓山气势委实不小，既陡又高，分下打鼓，中打鼓，上打鼓，地图上标着海拔五千公尺。可是，我们费了很大

① 既亚克夏山，又称马塘梁子。这是红四团在长征路上翻越的第三座大雪山。

力气，才上了山，抬头看，只见乌云滚滚，如一个大锅反扣在头顶上，往下看，满山白雪，分不出哪是树木哪是田地。风，狂吼着，象要把一切都推倒似的。我忽地想到现在正是七月，阴历是六月，端午刚过，在江西、福建一带正是杜鹃花初绽，迎春菊盛开，山岳枫红，汀江之上渔帆点点，金溪航道木排成阵……而这里，却是冰天雪地，仿佛成了两个世界，可见我们的祖国是多么辽阔广大啊！

我们忍着饥寒前进，翻过打鼓山，又攀上了白雪皑皑的仓德山^①。这山虽没有打鼓山高，可是它山势陡峭，并不逊于梦笔、打鼓，有时几乎没有路走了，只能见到一条条栈道。提起栈道，我记得早在《史记》上就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这么句话，那只是在书本上看到过，但栈道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次我才亲眼看到：

原来栈道是高山陡峭处，从石缝里插上木桩，木桩与木桩间绑上绳索或架上条木，绳索上或条木上铺垫木板而成的窄路。眼下的栈道一边是绝壁，一边是深谷，踏上去一晃一晃，活象小学校的荡船一般。当然，栈道边也谈不上有什么扶手了。我们在这上边走，必须加倍小心，虽然不象走钢丝，可也真是步步艰难哪。尤其意想不到的，走着走着，那板子没了。原来，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反动土司在我们到达之前，把木板抽掉了。我们仔细一瞅，

^① 又名拖罗岗。这是红四团在长征路上翻越的第五座大雪山。

有的连打在石缝里的木桩也用火烧掉了。是啊，反动派妄想制造一个天然屏障，把我们阻拦在仓德山的一边。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没有栈道，我们就攀树枝，滑雪，滚、爬、跳，终于克服重重险阻翻过了这座山。

七月九日，我们的先头部队到达了毛儿盖。

原来，毛儿盖——松潘县的重镇，是藏胞的聚居之地，往北，便是荒凉的大草地，往南，经懋功便可入川，往西经甘孜则可进入西康省^①。为了卡住这个咽喉，堵住红军北上，胡宗南已下定决心，调集二十几个团在松潘一带布防，用一个营的兵力来驻守毛儿盖。但是他万万没想到，我们红军从卓克基出发，七天内能连续翻越三座大雪山^②，跨过黑水芦花地区，行程六百里，胜利地到达毛儿盖地区。因此，当我们的队伍开到这里时，他的主力部队还没集结起来，防御工事也没修筑好。

我和王开湘同志站在山岗上，向下看去，首先看到的是金碧辉煌的索花寺。这个索花寺坐落在北山向阳坡上，十分醒目。它与我们脚下这个从四川高原上延伸下来的山头，隔着一道丈把宽的溪水。水流澄碧，蜿蜒伸向东南。大概它与那林区的涓涓细流汇成河流后，进入黑水、茂汶，注入岷江去了。

显而易见，索花寺占的面积很大，正殿、旁殿、喇嘛

① 此省建国后不久就撤消了，位于现在的四川省和西藏交界的那一地区。

② 指长板山、打鼓山、仓德山。

住房、云游喇嘛的客房，几乎摆了整整一坡。举起望远镜可以看到，寺院两侧各树一尖顶方塔，自塔顶间四面牵出粗大的铁链，塔前蹲踞着巨型石狮。不难想象，在几百里草地上，这个寺一定负有盛名。一打听，果然，草原上的藏民，各地的喇嘛，到这里朝拜的很多。

我们又看了看，毛儿盖在索花寺下面，依山傍水，是一个有几百户人家的村子。那里的房屋，底层是用石头砌成，二层、三层是板壁。用独木锯成楼梯竖在每层之间，房前屋后都搭着长长的木架子，看样子是晒包谷用的。偶尔也可以见到几个国民党兵在村里蹿来蹿去。据我们的侦察员报告，如今那里驻有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营。

我们仔细地观察着，特别是那些可供我们利用的地形、地物，然而奇怪的是，这么大个村庄，没有墓地，后来一了解才知道，这一带藏民有个风俗就是人死了以后采用水葬^①。那毛儿盖河穿过村边向东南拐弯的地方，便是他们的水葬场。紧接着，我们又看到，村子两侧的山上，树木成林，可是与南方的树林不同，这里显得比较单调，只有青桧、云杉、雪杉、花椒木等几种树木，林间寂然无声。

我们站在山坡上，观察完地形、地物以及敌情，就研究了作战方案，决定派一个营迂回到索花寺的后面，踞高临下地冲向寺院。

① 即人死了，沉到水下，用石头压住，用不了几天，便顺流漂走。

战斗打响后，敌人发觉了我们的意图，却已经晚了。他们立即纵火，妄图阻拦我们，那也无济于事。我们的指战员如同猛虎下山一般冒着烟火冲了过去，把敌人打了个稀里哗啦，他们大部被歼，只有少数人从围墙下的地道里逃走了。

这一仗虽然规模不算大，但缴获的东西却不少。根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按规定把战利品处理后，还把缴到的前门烟，派一个骑兵班分别送给了长期得不到烟抽的聂荣臻政委和陈光师长。

我们打完这个胜仗之后，中央军委和军团部很快就进驻毛儿盖了。他们在这里召开了毛儿盖会议，筹划了过草地的工作，在这里指挥着全军向草地进军。

七月十七日的早晨，我们红四团又奉命从毛儿盖出发，向松潘进军。

我们向东北走了几十里的样子，就遇到了胡宗南驻哈基的兵站，经过一场战斗就占领了那个兵站，缴了一批物资，特别是搞到了盐巴、辣椒。在那里稍事停留，次日一大早，我们又继续前进。

天大亮后，我们从一道平缓的川道上往下走，川道光秃秃的连一棵树也没有，只有绿茸茸的野草在朝霞里不时地闪耀着亮晶晶的露珠。走了没多远，前卫连来人报告说，前面发现敌人。

王开湘同志和我骑着骡子，赶到前卫连一看，敌人正

在对面山坡上修工事，枪支一个班一个班的架着，猛一看一大片。

我们正在观察，敌人发现了我们，于是他们立即停止挖工事，进入了阵地。偷袭的机会不存在了，敌人和我们面对面，中间隔着一片山洼地，分别占着两个山头。相持了半天，我们便主动出击，但是几次进攻，均未奏效。

想不到这一仗从早晨打到傍晚，仍旧是难分难解。我和同志们都火了，简直是和敌人打红了眼，恨不得非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不可。

这时，通信员跑来向我们报告说，军团部的左权参谋长来了。

我从指挥所走出来，月光下，只见左权参谋长着一身褪了色的灰布军装，迎面走了过来。

我向他敬了个礼。

他一边还礼，一边说：“怎么样？天黑了，能不能马上撤下来？”

“撤？”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立即反问道。

“对！”左权参谋长点了点头，随即又向我解释说，如今胡宗南依仗自己武器精良，人数众多，构筑了工事，以逸待劳，妄图打击我们的有生力量。我们可不能上当。最后他说，“你们在黑水、芦花间连续行军，没有休息，战士身体素质不好，这一天能顶下来已经很不错了。为了减少伤亡，现在决定你们暂时后撤！”

于是，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们稍微安排了一下，便在夜色中悄悄地把部队拉了下来。

就在这时，前面传来了手榴弹的连续爆炸声和密集的枪声。负责掩护的两个班哨与敌人展开了激战。原来敌人发现我们后撤，向我们发起了进攻。

我回头望去，只见黑黝黝的夜空中，被曳光子弹划下许多刺目的弧线，手榴弹爆炸的火光忽闪忽闪地映红了一角天空。左边山头上，尤为激烈，闪光中腾起弥漫的硝烟。右边山头上，机枪声响成一片，一听那响声，就知道是我们的机枪在压制冲锋的敌人。

我和团长担心地停下来。随着那刷刷的脚步声，部队从我们的身边走过。我们知道，那两个班哨，一个是八连的守在左边山头上，一个是六连的守在右边山头上，他们成犄角之势，卡住一片开阔地。由于这两个班都配了一挺重机枪，火力还是不弱的。一想到这里，我们又比较放心了。可是再一想，敌人那么多，又攻得那么猛，我们只放了两个班，他们就那么点人，能顶住吗？不由地又感到不安……

一个连队从我们身边过去了，又一个连队过去了。一营走完了，二营、三营也快走完了。突然，二营营长过来向我们报告：副营长黄霖同志在部队后撤时，到六连的班哨上去了，到现在还没有撤下来。

部队快从我们身边走完了，我一边随着部队往后撤，一边惦记着正在掩护我们、与敌人拚搏的战友们。

突然，后面左边的山头上，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停止了。我的心一沉。以往的战斗经历告诉我们，这种骤然的沉寂，意味着我们守卫阵地的战士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八连的这个班哨，无声无息了，可能已经不存在了。而右边山头上，六连的班哨的枪声还在继续。这说明六连的那个班还踞守在山头上。敌人想拿下它，不那么容易。尽管如此，我的心还是象压着一块石头似的。为了掩护主力，作出局部牺牲，这是不可避免的，战争中这也是常有的事。可是从感情上来说，明知道阶级兄弟可能要牺牲，尤其是作为指挥员怎么能忍心，又怎么能通得过呢？

越走枪声越远了，渐渐微弱下去，以后，就什么也听不见了。夜幕象一层又一层无形的黑纱连续不断地覆盖着大地。接近草地边缘地带了，小溪发出淙淙的水声。

我和团长由于再也没有听到后面传来激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估计敌人受挫后暂时停止了进攻。是啊，六连的班哨一定还坚守在山头上。当然，这也许是出自我们的一种愿望吧！

这天夜里，我们撤到哈垭，部队经过激战、行军，已经很疲惫。宣布就地宿营后，大家在草地吹来的冷风中很快就睡着了。可是我却怎么也不能入睡，尤其是想到黄霖同志，他那熟悉的面影，健壮的身躯，豪爽的性格，倔强的脾气，凡此种种，也都一一地在我脑子里盘旋。特别是在全州南部的觉山阻击战中，他冒着枪林弹雨奋不顾身地

把我从公路上抢救下来的情景，更是久久地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是啊，黄霖同志是湖南浏阳人，一九二九年，红军从他的家乡路过时，他就定下决心要参加自己的队伍。可是，他那时年纪太小，个头又不高，脸上毛茸茸的，显得太嫩了。部队一个劲地说服他，叫他过两年再参加红军。部队不肯收，却丝毫也没有动摇他的决心。队伍出发了，他远远地跟在后头。见一个老炊事员挑着担子掉队了，他就从老炊事员肩上取下步枪，帮他背着，跟着他去追赶队伍。途中，突然从山林里蹿出几个敌人拦住了去路，他就把枪机一拉，“砰”的一声，把敌人全震住了，当即抓了三个俘虏，还缴了敌人的枪。然后，他带着这份“礼物”，跟着那老炊事员，找到了红军部队的领导。于是他也就成了真正的红军战士。可是就在他参军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在一个黑夜里突然派兵包围了他的家，不管男女老幼，全都屠杀了，只有一个哥哥当时在外当长工，才得以幸免。

黄霖和我多次谈心中，怀着深深的乡思，描绘着他的故乡是那样的美，那样的令人向往：三面环山，茶树遍野，景致宜人，山川如画……他一再地说，等革命胜利了，一定要回去看看，看看生他、养他的山川土地。

难道如今他……整整一夜，我都没有睡好。

第二天下午，黄霖同志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六连的班哨，在他身后排成整齐的队伍，还生龙活虎地扛着两挺

轻机枪。这简直是从天而降的奇迹。

我一把把他拉住，并向全班的同志问：“你们是怎么回来的？怎么回事？”

同志们都笑了。黄霖说：“敌人攻了一阵攻不动，看出我们只有几个人，就停止了进攻，向我们喊话，劝我们缴枪，我一听，那喊话声是我们湖南家乡的口音，就把敌人的话接过来，向敌人喊话。闹腾了一阵，没动静了。我悄悄摸下去一看，漫山遍野的敌人都在呼呼大睡，看那阵势，是想围到白天抓活的。我就带着全班从敌人的缝里钻出来。出来好远了，一想：我们的重机枪叫敌人给打坏了，丢在阵地上，这样太不合算。我又带着两个人折回去，捞了两挺轻机枪，这不是——”他拍着战士扛的轻机枪说道，“两挺轻机枪顶一挺重机枪，合算！”

同志们都围拢过来问这问那，听着六连那个班的同志们津津有味地讲述，都被那传奇的故事、神奇的情节吸引住了。瞧他们那个样子，哪里象是从九死一生的敌人重围中闯出来的啊，简直就象说书人在讲事先编好的故事一样。我的心弦松弛下来，由衷地笑了。

可是我一想到八连的那个班哨，再也没听到过他们的消息，再也没见到这些同志了，心里忽而又沉甸甸的了……是的，我们坚决执行了上级的指示，没有恋战，保存了我们团的有生力量，这是值得欣慰的，但这是通过局部的牺牲，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呀！

值得一提的是，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合进至毛儿盖后，突出的问题是粮食。

毛儿盖是藏族同胞聚居的中心地区，虽有几百户人家，但要供应我们红军的粮食，还是极端困难的。虽然地里已有不少成熟了的金黄色的青稞，但我们谁也不去动一粒。通过各种宣传、解释工作，我们终于请回了藏民兄弟，并征得他们的同意，用银元购买了一部分青稞麦。可是这也不够吃啊，我们只好用它掺和点野菜充饥。

为了克服粮食的困难，大家十分注意节约，宁肯上山挖野菜，也不肯多吃一点青稞麦。因为这在当地来说，毕竟是最好的粮食了。一次，我们部队到附近山里去挖野菜，偶然发现了在绿荫树下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蘑菇，有碗口大的，有铜板大的，有白的，有灰褐色的，有的上面还有花纹。同志们看到高兴极了，采回来后，用水洗洗，便煮着吃了。怎知吃完后，许多同志上吐下泻，身子软得不成，后来卫生队的医生一检查，才知道是中毒了。于是，上级很快发了个通知，以后再见到这种蘑菇谁也不采了。

为了度过眼前口粮的困难，以及为北上过草地作好粮食的准备，部队一边休整，一边筹粮。为了抓好这个工作，部队在芦花城和毛儿盖还专门成立了筹粮委员会。我们在芦花驻守，便参加了由芦花筹粮委员会领导的筹粮工作。

按照军委和军团委的规定，为了做好过草地的准备工作，每个指战员都要筹足过草地的粮食（或是牛羊肉）和御寒

的衣物。军委又明确规定，筹粮的主要对象，是压榨藏族同胞、勾结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土司，对他们的牛羊、粮食，可以没收，充作军粮。对广大藏族同胞的财产，必须做到公买公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了执行这个任务，我和团长各带一个营，分头出发了。

天已微黑，为了赶路，我们还是摸黑夜行，大约走了三十里才到一个村庄，一找老乡，才发现少数反动土司勾结国民党反动武装把粮食藏起来后把牛羊都赶到山上去了。

为了寻找这批牛羊，打击反动土司和国民党反动派，我们不顾天上下着雨，就往山里去了。

细雨纷纷，乌云簇簇。走了很久，我们才摸进一个深山穹谷，天漆黑，见不到人影，见不到房屋，没有任何藏身之地，只有参天的大树和那没有尽头的荒草。又走了一个时辰，我们又饥又渴，实在累得不行，于是只好就地宿营。为了防止意外，我们除了轮流放哨，还用绳子围了个圈圈，挨着几棵树，背靠背地坐着。这样的宿营虽然艰苦，可也真别开生面。

好歹熬了一夜，天，终于亮了。当熹微的晨光投进密密的森林里时，爬在树上了望的同志突然惊叫起来：

“牛！羊！”

我迅速爬到树上，拿起望远镜一看，可不，前方不远处有一大批牦牛，再往左一看，嗨，还有不少羊哩！这可把我们乐坏了。

原来，这正是我们要寻找的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反动土司赶走的那批牛羊。

那些坏蛋们已经在这里躲了好几天了，但终于被我们发现了。由于反动土司都有武装，于是，我命令部队首先把敌人包围起来。

他们这些家伙，哪里经得住我们轻轻一击，不用多久，他们就全线溃退，凡是没有死的，都统统丢下枪和牛羊跑掉了。

敌人一走，我们便打扫战场，收拾完枪支弹药，一清点牛羊，嗨，真不少，牦牛足有几十头，绵羊大约有五六百只。我们将牛羊赶回了驻地。筹粮委员会见我们筹到这么多东西，还表扬了我们。接着，我们按照指示，把一部分分配给兄弟部队，留下来的其它牛羊就被我们宰掉了。这一天，我们饱尝了一顿，那牛、羊肉的味道可真鲜美呀，可惜没有咸盐，否则味道会更好。当然，我们吃的只是很少的一点，而大部分牛羊宰了后，煮熟，一块块切开，再把它串起来放在太阳下晒着，做成了肉干。

这时，团长带着去筹粮的部队也赶回来了，他们的成绩也不小，听说，开始他们也没有经验，到了一个喇嘛庙，庙里的喇嘛已经跑光了，有的泥塑也被反动分子砸烂了。还是我们的一个战士偶然从砸碎的“泥塑”上发现，那是面粉做的，虽已发黑，但挖一点尝尝，还能品出面粉味道，于是高高兴兴地把那“泥塑”扛回来了。这一下，大伙可

高兴极了。“泥塑”上的面粉虽然发酸，不能做馒头，却可以烙饼充饥呀！

可没想到正当他们尝着新制的有酸味的饼子时，筹粮委员会来了命令，说要保护喇嘛寺，就是反动派砸碎的“泥塑”也不能动。后来，他们又找到了一个反动土司的家，可是楼上楼下，屋前屋后，草堆里，牛栏中，神龛下，都找遍了，什么也没有找到。团长见一无所获，正要领着大家走的时候，忽然一个同志惊叫起来，他指着牛栏说：

“看，新砌的墙！”

大家走近一看，可不，牛栏里有一道新砌的墙，上面糊的泥巴还是湿的哩，这道墙特别厚。动手拆开一看，奇迹终于出现了。嗨，几口大铁锅里盛着青稞麦和青稞麦面，还有一坛坛的玉米、黄豆、红辣椒、酥油，不仅有粮食，还有枪支、弹药，这更证明了主人的身份。同志们管它叫“密窖”。以后他们又一连发现了好几个“密窖”，按照筹粮委员会的规定，凡是敌人留下的东西，我们一律没收。

我们的筹粮活动除此以外，就是向藏民购买一些粮食了。自进入大维以来，我们很少见到汉族同胞，而藏民由于文化落后，交通阻塞，消息不灵，对红军缺乏了解，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反动土司进行欺骗宣传，他们不敢接近我们，更不敢把粮食卖给我们。这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逃跑之前，有言在先，凡是帮助红军带路，给红军当通司（翻译），卖粮食给红军的藏民，一律处以死刑；若不将粮

食藏起来，就要没收一切财产；如不听从土司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命令去打红军，就按“叛逆”论处。为此，我们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要扎扎实实地做群众工作，既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又坚决按照党的民族政策来办事。正因为我们严格遵守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切实做到了“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因此，我们在藏区筹备粮食这项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不仅完成了军委规定的——每个指战员筹足必需的粮食，而且超额完成了任务。那些牛羊肉干，除了按规定留下一部分外，我们又把它分成许多包，分送给友邻部队了。战士们还选了一批最好的牛肉干，拣出最好的青稞麦、酥油，送给了军委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叶剑英参谋长，同时给军团和师的首长也送去了一部分。当时在干部团的陈赓同志听说我们筹到了粮食和牛羊肉，不仅为我们高兴，还特地骑着马，带着警卫员，来我们团部看了看。我们请他乐乐呵呵吃了一顿，临走又给他捎了几十斤粮食和牛羊肉，陈赓同志可高兴了，骑在马上风趣地翘起大拇指连声说：“好！好！”就在我们即将过草地的头两天，他又骑着马匆匆赶来，对我说：“上次，你们给我的粮食、牛羊肉干也不知怎么丢了，如今马上就要过草地了，我没办法了，干脆，把你的那一份给我算了。”他说完，拿起我的那份粮食就要走，我看他很着急，就又想法子再给他凑了点。他高高兴兴地走了。

在毛儿盖附近筹粮，我们停了足足一个多月。就在此时，中央开了几次重要会议。

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对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中央还作出了决议。中央在几次会议上都进一步肯定了北上抗日的方针，反复强调了维护红军团结的重要性。

中央还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编为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以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三军团、中央直属纵队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以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组成左路军。右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左路军总指挥由朱德兼，政委张国焘兼，参谋长刘伯承。

我们红四团属一军团，归右路军指挥。为了加强红四团的战斗力，四方面军的二九四团编入我们四团为第二营。原二九四团团长沙仁初同志任二营营长，副团长魏大全同志任二营副营长，胡炳云同志任二营六连政指，杨信义同志任六连连长。原四团二营变成第三营。原三营分别编入一、三营。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同志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二九四团的部队情况和干部情况，并要我们加强团结，互相学习。编队后，我们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充分地做好了过草地的准备工作，由于大家亲密无间，四团的战斗力也更强了。

毛主席指示

我们过草地

早就听说，出了毛儿盖、松潘以西，是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地，正因为如此，敌军胡宗南等部在松潘一带大筑碉堡，派兵固守，妄图与甘南构成封锁线，压迫我们西走，让红军自己消灭在茫茫的雪山、草地上。

中央军委早已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但是，为了麻痹敌人，仍派我们红四团攻打了松潘。当我们悄悄撤出战斗以后，便同全军上下一起参加了筹粮活动，为过草地作了准备。

八月十七日清晨，我正在与团里的几个干部开会，商量一些事情，突然，接到军团首长通知，要我火速骑马赶到毛儿盖，说毛主席、党中央十分关心先遣团进入草地的行动，四团担任先遣，要我直接到中央军委毛主席那里去领受任务。军团首长还指示我们，最近周副主席病得很厉害，接受了主席的指示以后，一定要去看看周副主席。

去军委开会，过去有过，毛主席在会议上我也见过，但单独到军委，从毛主席那里当面接受任务，这还是第一次，心中不免有点激动。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带着骑兵侦察排，从驻地波罗子附近，飞奔党中央的驻地毛儿盖，十几匹快马象一股疾风，

忽儿飞上高坡，忽儿驰下山谷，在一起一伏的高原上，扬起阵阵烟尘。由于急于听取毛主席的指示，我还是嫌马儿跑得太慢。

几十里路，很快就到了。

到了毛儿盖，进入党中央的所在地，我们就直趋毛主席的住处。

毛主席与周副主席住在一起，他们住的房子是藏民用木头架起来的普通房子，分上、下两层，按照藏族人民的习惯，底层关牲口，楼上住人。在楼外空地上，我首先碰到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邓发同志热情地与我握手，然后引我进楼去见毛主席。

我们一前一后，登上了通往楼上的小木梯，踏上楼板，听说周恩来副主席住在西屋，现在他病了。邓发同志领着我穿过中间的屋子。这屋子中间有一块大石头上面架着个三角架，三角架下面吊了个锅子，这是这里藏区常见的炊事用具，除此外，一张铺。据邓发同志说，这是他的住处。邓发同志指着北面一间屋子说：

“毛主席就住在里面！”

我抑制住内心的激动，整了整军衣，喊了声报告。

毛主席正俯身观看一张地图，闻声后回过头来，瞅着我说：“你来了，很好！”随即与我握手，并指指旁边的木头墩子，要我坐下。

毛主席看出我的激动，有意缓和气氛说：“坐下来，慢

慢说。”他态度和蔼，脸上露出了笑容。

“主席，军团首长要我直接到你这里接受任务！”我虽坐下了，但仍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对，这一次你们红四团还是先头团！”毛主席点了点头，铿锵有力地说。

“是！”我站了起来。

毛主席说：“原想要六团去，但试了一下，没有奏效。”

接着，毛主席总结了六团没奏效的三个原因，这就是：粮食准备不足，思想准备不充分，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和藏族上层反动武装骑兵的伏击。

毛主席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说：“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面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

稍顿了一下，毛主席又指着地图继续说道：

“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坐一带集结了几个师，东面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结于雅州。如果我们掉头南下就是逃跑，就会断送革命。”

他说到这里，右手有力地向前一挥，道：

“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

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路。”

接着，毛主席又详细地告诉我过草地可能遭到的困难。他说草地不见人烟，连树林也没有，行人走过，有时水可浸到膝盖边，夜间寒冷多雨露，就是白天，也气候多变，忽儿烈日，忽儿阴天，有时飘来雨雪，必须作好最坏的打算……然后，他又具体指示解决困难的办法。说完这些，他又强调说：

“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

以后，毛主席又询问了部队的思想情况和过草地的物资准备情况。

我向毛主席报告说，部队的情绪很高，大家一致坚决拥护中央过草地北上抗日的决定，只要中央军委、毛主席一下命令，我们就坚决向草地进军。我们有过草地的思想准备，前些日子省吃俭用剩下了一些粮食，沿途再摘些野菜，估计可以捱过草地。只是衣服成问题，每人只有两套单衣，恐怕抵御不了草地的严寒。

“要尽量想办法多准备些粮食和衣服，减少草地行军的困难！”毛主席恳切地、着重地嘱咐我这两句话，然后问我是否已找到向导。

我说：“已找到一个藏族通司，地形他很熟悉，只是年纪大了，六十多岁！”

“路上走不动怎么办？”毛主席急着问。

“主席，我们已准备了八个同志用担架抬着他为我们带路！”

“这样好！”毛主席高兴地说，“要告诉抬担架的同志稳当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他思索了片刻，又继续说，“一个向导解决不了大部队行军的问题，你们必须多做一些‘由此前进’并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靠些，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前进。”

我仔细地听着，而且掏出随身带的小本子记下毛主席的指示。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毛主席以严肃的口吻对我说，“四方面军的二九四团已经编到你们四团了！”

“是的！”我点点头说。

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必须搞好团结。团结是党的事业胜利的保证，你们搞好了整编后的团结，就是一、四方面军亲密团结的标志。”

最后，毛主席叫我在墩子上坐下。他亲切地问：

“看看，你们还有什么困难？”

我说：“我们一定遵照主席的指示去做，有困难我们依靠大家想办法解决！”

毛主席高兴地说：“很好！”

我急忙站起来告辞。

毛主席一边与我握手，一边叮咛道：

“到徐总指挥那里去一下，去接受具体指示。”

“是！”

毛主席又说：“去了以后，你再回到这里来一下！”

我说：“好！”随即走出房门。

从毛主席那里出来，我就径直往徐向前总指挥那里去了。

徐总指挥热情地接待了我，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四团接受中央军委交与的先头任务作了汇报。他又向我交代了一些具体注意事项。

从徐总指挥那里出来，我又赶紧去看望周副主席，我想从周副主席那里接受一点指示，但是医生劝阻说，周副主席病重，要我暂时不要探望，以免惊动正睡着的周副主席。我只见到了邓颖超同志，她详细地告诉我周副主席的病况，并要我转告同志们不要惦念。当时环境艰苦，粮食极度困难，尤其药物，更是奇缺，眼看就要向草地进军，周副主席病重，委实叫我们担心，我们多么希望他快点恢复健康！

离开邓颖超同志的时候，已近黄昏，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又返回到他的住处，以便看看还有什么事。邓发同志一见我，就问：“吃饭了没有？”经他一问，这才想起今天

还没有顾上吃东西，而且还要走几十里才能回到我们团部的新驻地，我便说还没有吃饭。邓发同志听了，出去走了一趟，又到了主席房里，不一会儿便端出来一个土盘子，盘子里盛着六个小鸡蛋般大的青稞面馒头，一边递给我，一边说：

“毛主席说，你一天没吃饭，还要赶几十里夜路，叫我把他的晚饭给你吃，吃饱了好回去工作。”

我一听说这六个青稞馒头是毛主席省下来的一顿晚饭，心里十分激动，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知道，眼前粮食十分缺乏，部队都勒紧裤带，把数得出的一点粮食省下来，准备作过草地之用。邓发同志找不到饭才告诉毛主席，现在，毛主席要邓发同志把他的那一份饭端给我吃，我怎么能吃得下啊！我望着这六个乌黑的小馒头发愣。是啊，这岂止是六个馒头，这是毛主席对下属的一片心啊！我不能吃！我想，毛主席操劳着全军的事情，工作那么忙，一顿饭才吃这么一点东西，本来就不饱，如果我再把它吃了，那毛主席就要饿肚子。想到这里，我真后悔，不该在邓发同志面前说没有吃饭，便下决心不吃这六个小馒头。但又一转念，不吃，毛主席会不高兴的，只好吃了两个。邓发同志还要我再吃，我坚决谢绝了。

这时候，毛主席从房里走了出来，笑呵呵地对我说：“怎么不吃了，不吃饱不好工作啊！”

“我吃饱了！”

毛主席以慈爱的眼光看了我一会，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看到徐总指挥了吧。好，没有别的事了，望你们完成任务！”

我向毛主席敬过礼，便离开毛主席住处，飞身上马，率领骑兵侦察排向驻地奔去。

西北草原的秋夜已有一丝寒意，何况天上下着蒙蒙的细雨，但是我的心里却是热呼呼的，一路上，毛主席的亲切、明确的指示，不断地在我耳边回响着。草地艰难困苦的情况象一幅图画展示在我的眼前。是的，过草地是向神秘莫测的大自然挑战，要把野兽都走不过的沼泽地征服，要同风雨、冰雪、饥饿搏斗，要粉碎反动派的骑兵的袭击，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在等待我们。但是，当我一想起中央军委的关怀，想起毛主席的指示“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滩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就感到肩负的任务无尚光荣，觉得眼前的道路明亮无比，也觉得浑身是劲，充满了信心！

遵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在全团进行了过草地的政治动员。中央北上抗日的英明决定铭刻在每一个同志的心坎里。四方面军张仁初同志率领的二九四团合编列入本团二营后，他们主动地把本来不多的粮食、衣服抽出一部分，分给一、三营，大家表示要以高度的阶级友爱和钢铁般的团结去战胜草地的困难。

八月二十一日清晨，我们红四团肩负着党中央和毛主

席期望向草地进军了。

我们从毛儿盖出发，沿着通往松潘的大路前进。大约走了二十里，到了一个叫作七星桥的村庄。这个村子不算大，靠路的左边有一溜矮小的藏屋，过了这排屋子，我们就转向西北，进入一个无名的山谷——草地的边缘了。

这个青翠的山谷里有一片密密的树林。按照出发前发出的命令规定：每个战士都必须拣些干柴枝，以作为途中烧水、烤火之用。每人还必须背上一些用木头做的上面写着“由此前进”的路标。此时，我们先头团每个战士身上，除了随身携带的武器、背包外，还背了几斤干粮，如今又添上一些柴禾、路标，负重增加了，行军也更加艰难了。但是，为了战胜草地上的饥饿、寒冷的威胁，为了北上抗日，有这么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绪的鼓舞，我们红军战士，忍受住了这些困难。

我们艰难地攀山越岭，穿过这片树林，便踏入了茫茫的草地。

我骑在马上，举目远望，草地的情景真使人怵目惊心！呀，前面的草原茫茫无边，在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露在外面的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息。这里没有石头，没有树木，更没有人烟，有的只是一丛丛长得密密麻麻足有几尺高的青草。在这广阔无边的泽国里，简直找不到一条路，脚下是一片草茎和长年累月腐草结成的“泥潭”，

踩到上面，软绵绵的，若是用力过猛，就会越陷越深，甚至把整个身子都埋进去，再也休想从里面爬出来。

六十多岁的藏族通司看到我和团长拿着望远镜发愣，便从担架上下来，他拄着拐杖，走近我们，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

“往北，只能走这条路！”

我点点头。可是，心里在想，路在哪里呢？这一片茫茫泽国！

“只能拣最密的草根走，一个跟着一个。过去，我就是这样，几天几夜走出了草地！”老通司呐呐地补充道。同时，他又告诉我们：草地上的水淤黑的，都是陈年腐草泡出来的，有毒，喝了就会使肚子发胀，甚至中毒而死。别说喝，就是脚划破了，被这毒水一泡，也会红肿溃烂。当然，通司的话极为重要，团长与我商量后，立刻作为一条纪律——不准用草地上有毒的水，命令一个个传下去。稍作停顿，我们便按照通司的要求，一个跟着一个，小心翼翼地踏着密集的草根，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由于天阴又有浓雾，根本分不清方面，好在我们可以靠通司和手中的指北针。

草地天气一日多变，早晨浓雾蒙蒙，天昏地黑，中午突然一阵狂风，吹开了天上的积云，于是，天空忽然晴朗，从轻云里射下柔弱的阳光；可是，到了午后，乌云密布，气温骤降，不一时，狂风四起，大雨滂沱；黄昏时，由于

被这一阵莫名其妙的暴雨袭击，河水挡住了去路，我们只能在一个稍高的小坡坡上露营。

我们首先完排了通司的休息处。为了保护这位老人，用带来的一块油布，支上木棍，油布的四个角各扯上一根绳子，算是帐篷，让他睡在里面。我们与战士们一起，把背包当作凳子，相互背靠着背，以对方的体温取暖，可这怎能抗冻呢？得烧点火烤烤才行啊！可是，我们从七星桥带来的柴禾大都给淋湿了，好在宣传队有个叫郑金煜的小鬼，虽然只有十七岁，人却很聪明，他一路上贴身藏了几根柴禾始终没有淋湿。我们就用这几根干柴禾当引火柴，好不容易地点燃了。大家烤火时，又烧了一脸盆开水，每人分着喝了一小杯。有的还就这水拌着青稞麦面吃了一点，好象这一吃就解除了饥饿与疲劳似的。不过走了一天，这也许是草地上最好的一顿饭了。

吃过饭，大家正想睡上一觉。怎知天公不作美，骤然间又下起倾盆大雨，雨中还夹杂有冰雹。油布、树棚、油纸伞都不顶用了。天漆黑，四野茫茫，走也没法走，我们只能硬挺挺地坐着，忍受着，雨水直往身上淋，衣服都湿透了，全身冻得直发抖，但是谁也没有做声，谁也没有半点怨言。“北上抗日，走出草地”的信念鼓舞着我们，就这样，背靠着背，半醒不睡地坐着，给雨淋着，度过了茫茫草地的第一个长夜。

第二天，拂晓时分，我们命令吹响集合号，在号音中

大家揉了揉眼睛，收拾了一下简单的行装，抬起又酸又重的两腿，又继续上路了。

现在我们按照通司的话说，正在向草地的中心部进发。

越往草地中心部，困难越是严重。

草地中心的气候更是捉摸不定，时风时雨，忽儿漫天大雪，忽儿冰雹骤降。

记得第二天下午，我们抬着通司走完了几十里地，来到一座山背上，迎着飘雪，通司指着不远处一块山丘说：

“那是分水岭。”

我们又走了几里地，爬上这个既没有树木，也没有石块的土丘，眼前闪亮着一条河流。通司一边帮我们插着路标，一边看着眼前的河流说：

“我们从毛儿盖来，经过的河，都往南流入岷江了。以后那水又流到宜宾汇合到长江了。过了前面那个小山，这河里的水就由南往北流，进入玛曲江后，就流到黄河里去了。所以那叫分水岭。”

听完他的介绍，再极目北望，果然北面是一片水域，原来川康高原、青藏高原上的雪水都流到这里，肥沃的草地成为泽国，正是它常年不息流动的结果。

我们在“分水岭”插上路标，又继续前进。这里由于地势偏高，地面比较坚硬，河水不时地从我们的旁边流过，而随着水势，冲刷出一条弯弯曲曲的水道，看起来十分绮丽。它铺在绿茵茵的草原上象一条条彩虹扯成“之”字形

的图案。战士们高兴极了，恼人的草地上居然还有这样逗人的地方，简直可称是草地的花园了。但是好景不长，如果说，沙漠上可以看到“蜃楼”，那末草地上现在见到的只是片刻的“海市”。不用多久，我们便陷入比头两天还要艰难的困境了。也许，这里才是典型的草地哩。

你瞧，绿茸茸的水草，全泡在水里，一脚下去，水没到膝盖，“路”都浸在污浊的水里，地下是多年的腐叶败草，土质松软，一伸出脚，至少陷进半尺，许多人的草鞋给泥巴沾去了，而且连找也没法找，更可恶的是隐没在这水草下无底的泥潭，人与马一陷入，愈挣扎愈往下沉，假若别人援救，那连救的人也要陷下去。偏偏这时又下起雨来。大家怀着如履薄冰的心情，踏着前面人的足迹，慢慢地前进。而且每走一步，都要慎重地举起，慎重地踏下，纵然如此，还是一不小心就陷下去了。小战士谢德全^①就是如此，大半截身子陷在泥水里，手抓住一把草拚命地挣扎着，幸亏我和同志们离得近，急忙靠上去，把他救了出来。

救起那个同志，我们又走了一段艰难的路，总算在黄昏前赶到一个难得的小山坡，于是，命令全团就地宿营。

夜，既漫长，又寒冷，霏霏的细雨更使人难受，我们只能用老办法，几个人挤在一起，背靠背地取暖。但是，今天雨虽然小些，地上的水，却比昨天要多，特别连着淋

① 谢德全同志被救之后，一直战斗到陕北，以后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现在仍然健在。

了两天的雨，战士们的衣服都湿透了，坐下来比站着更冷。于是，大家索性站了起来。就这样，全团同志在风雨中站着，眼睁睁地盼着天亮。天快亮时，前方突然传来了枪声，前卫营的侦察员跑来报告，说发现国民党反动派和藏族上层反动武装骑兵来骚扰。原来，松潘的国民党反动派发现我们往草地进发，就唆使他们来袭击，可是我们早就有了准备，只用一个连，便很快把他们打垮了。

赶走了反动的藏骑，天已大亮，在通司的带领下，我们继续往前，一连又走了二日。我们已经进入草地第四天了。连日来风雨、泥泞、寒冷的折磨和饥饿的煎熬，使同志们身体明显地衰弱下去了。战士的脸色苍白、蜡黄，身上的衣服破了，有的只剩下筋筋条条，有的感到两腿酸软无力，举不起步。但是，我们牢牢地记住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越困难，大家团结得越紧。身体较强的同志搀扶着身体弱的同志走，并把自己的粮食让给他们吃，希望他们增加一些力气，走过草地。我们几个团的干部的乘马和所有的牲口也都抽出来组成了收容队，轮流驮送伤病员，但还是有不少同志倒下了。当我们熬过一个夜晚，离开宿营地继续前进时，有的战友就长眠在我们共同躺过的营地上。在这些光荣牺牲的同志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把四根柴禾藏在贴身处的小宣传队员郑金煜。

郑金煜同志是江西石城人，这个小老倌，个子不高，但长得十分秀气，人也挺机灵，冲锋打仗更是不含糊，是

个非常惹人喜欢的红小鬼，因为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十六岁就入了党，进入草地时是团部党支部的青年委员，刚开始草地行军时，他精神抖擞，不知疲劳，柴禾拣重的背，工作拣难的做，不但行军走在前头，还抽空搞宣传，他不仅能唱几支好听的歌，而且还会讲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前两天，他那活泼的身影从队伍中消失了，一问，才知道他病了。我还特地去卫生队看了看他。他烧得厉害，但还让人搀扶着自己走。我嘱咐卫生队的同志好好照料他。过了一天，郑金煜同志病况恶化，已经不能走了。因为地势高，严重缺氧，引起呼吸困难，身体瘫软，但他很坚强，对同志们说：“我在政治上象块钢铁，但我的腿不管用，我要掉队了，我多么舍不得你们啊！”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焦急，我命令饲养员谢定元，把我的乘马给郑金煜骑，并且把我们的干粮匀给他吃。后来，他衰弱得连腰也直不起来，马也不能骑了，我们就用老办法，用背包在前后把他身子支撑起来，再用绳子把他绑在马背上，叫一些同志轮流扶着他走。怎知道，这天中午，忽然后面收话上来，说：“郑金煜同志要政治委员等他一下，他有话同政治委员说！”我知道有问题了，便怀着沉重的心情站在路旁等着，远远地望见老谢牵着牲口，步伐沉重地走来。

“小郑！”没等他们走近，我奔了过去。

“政治委员！”郑金煜同志听到我的声音，强打精神，微微一笑，少顷，他又无力地闭上眼，只见他面如白蜡，

额头沁着汗。

“怎么样，不舒服么？”我问。

“政治委员！”他又强睁开眼，用颤抖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我不行了，感谢你对我的照顾。我知道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政治委员，我确实不行了，我看不到胜利那一天了。”说到这里，他的眼泪夺眶而出，站在我身边的警卫员和饲养员也泣不成声。

我极力控制住感情，轻声地安慰道：“小郑，不要多想，我们很快就要出草地了！”

他摇了摇头，经过一阵急喘后，他用那微弱却又是十分坚定的语调说：“政治委员，希望党的路线胜利，革命快胜利，胜利后，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家里，我是为执行党的路线，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的！”

我无法再抑制自己，不禁泪珠从眼眶滚了去来……我抹去泪珠，对郑金煜同志说：“郑金煜同志，你一定能走过草地，同志们一定帮助你走过草地！”

随即，我叫警卫员把水壶交给老谢，交代老谢好好照料他，无论如何要把他带出草地。

可是，到了下午，郑金煜——这个年轻的优秀共产党员，就在这风雪交加的草地上，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站在小郑的遗体旁边，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是的，草地，茫茫的草地，残酷无情的草地，你夺去了我们多少战友宝贵的生命，不少同志在草地的短短几天经受饥寒交

迫的折磨，把全身的每一分热，每一分力气都消耗尽了。他们在死前的瞬间还非常清醒，还念念不忘革命，还希望北上抗日，迈完征途的最后一步。可是，缺氧、风雪、饥饿、寒冷却夺去了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身体虽然停止了跳动，可是他们的英雄事迹、斗争精神，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让我们永远缅怀这些同志，学习这些同志的革命精神，让他们的形象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经过四天艰难的行程，到了色既坝。色既坝是一条岔路口，往右可通松潘，往左通往班佑。部队进入三岔路口，藏族通司双手合十祈祷，说是神灵保佑，他安全过来了。这个六十多岁、一头白发、心善面和、一路上很少说话的老头，做完祈祷，欣喜地告诉我们，色既坝是松潘通往阿坝的主要商道，当年他过草地，要不是遇上商队相救，恐怕也到不了这里。那真是九死一生啊！如今红军这么多人，居然过来了，真是了不起。他竖起大拇指，连连称奇，而且把我们赞为神兵。

我们打开地图，请他介绍这里的地形。

他用手指着东南方，反问道：“看到山口没有？”

我看了看，说：“见到了，还挺高！”

他点点头，指着说：“山口有条路穿向这里，与我们来的路合拢起来，成了草原上的一条屋脊，我们藏民叫它色既大坝。它大得很哩！”

我从地图上一看，果然这块隆起的草原脊地纵有百余

里，横有数十里。

通司又指着前面的通道说：“长官，我们出了水草地，可以走大道了。”

通司讲的一点也不错，经过四天四夜的水草地行军，我们终于跨上了较为平坦的高地，只见野草一望无边。

几天来，我们的双脚泡在水里，上面又有雨淋，真不是个滋味，现在又跨上较为平坦的干燥路，不用说，有多高兴了。大家虽然已经疲惫万分，但是踏上这条路，精神陡增，两腿轻快，行军速度不用催促又加快了。路上畜类的蹄印较多，据说，由于色既坝是草地的主要商道，春夏两季，来往的商队较多，因此路是在人、畜长期踩踏下自然形成的。有时在草地中并列几条小路象绿色地毯上镶嵌的白色丝带，伸向西北遥远的尽头，同志们走到此地，心情一下舒展起来了，尤其是那些活泼的宣传队员，又站在路边唱起了“同志们，快快拿起枪”的歌。我忽然又想到了长眠在草地的战友们，仿佛他们还在我们中间……

“同志们，我们快出草地了！勇敢地向前进啊！”突然，一个小鬼站在路边振臂高呼。

我定睛一看，是个宣传队员在鼓动。

这时，几天来未露面的太阳，竟然从云隙中抛出微弱的光线，洒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觉得分外地温暖。

“政委，军团发来的电报！”我正站在那里遐想，王开湘同志对我说。我回头接过电报，只见上面写着：

敌 情 通 报

敌薛岳部已抵天全、芦山，胡宗南部见我进入草地后，也火急赶到松潘，甘肃敌新编十四师鲁大昌部亦往北边压来，胡宗南所部一部分从西安开始往西北移动，马步芳部亦从西北往南移动……

看完敌情通报，我笑笑说：“看来蒋介石又搞‘合围’的老把戏了！”

“是啊，他想把我们堵在水草地里！”王团长说。

“可惜，我们抢先一步，出了色既坝。”我说，“我们这条火龙又游出来了，现在更加感到，中央走出草地，北上抗日的路线完全正确。”

王团长点点头，少顷，又说：“天色不早了，我想，趁天晴，让部队好好休息，睡一个好觉！”

“我同意，而且要各个分队挖点野菜，睡前吃个饱！”我说。

于是，部队翻上一个山坡，我们下达了休息的命令。当休息号吹响时，战士们三五成群，挖土坑，挖野菜，欢声笑语又飞扬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我看了看战士们挖起的土坑，那可真是不错：既可作战壕，防止敌人袭击，又可作睡觉的地方，四边插上棍子，油布一挂，还是个满不错的小帐篷哩！

是啊，敌人是无法想象的，四天四夜越过水草地，风霜雨雪加冰雹，气候一日多变，我们没有棉衣穿单衣，没有交通工具，双脚泡在水里，从天蒙蒙亮一直到黑夜，饿肚子，连喝水都很困难，有时还得通宵淋雨等到天明，行军、作战，一路上千难万苦毫无怨言，为的是什么？信念——对事业、对革命、对北上抗日的路线的信心，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我们坚信一定会胜利！坚信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张闻天总书记一定会带着我们冲破困难，走向胜利。这个信念鼓舞着我们咽苦如饴，鼓舞着我们忍受着一切难以想象的困难，鼓舞着我们忍饥受寒，以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而在所不惜。

色既坝露营也许是未出草地前最好的一次宿营，在那绿茸茸的草原上用人工挖出来的土坑棚里，上面盖着我那条旧被子，我们几个人挤在一起，背靠着背，一边喝着炊事员烧好的开水，一边嚼着剩下来的那没咸味的牛肉干，吃着香喷喷的野葱、野韭菜。在那个土坑棚里，我还讲了闽西大森林斗争的故事。我告诉同志们，那时在闽西大森林里打游击，人很少，只有几十人；现在我们有几千人、几万人，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了。过去，我们远离领导，武器低劣，只有土枪、长矛；现在有党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有步枪、机关枪，还有迫击炮了。比起过去闽西斗争时的条件，现在确实好多了。说着说着，外边又哗哗地下起雨来了。”唉！草地，这鬼天气！”有人轻声地说。但是，

更多的人却唱起歌来了。可不，下雨难不倒我们，土坑里流进了水，我们就干脆站起来。”看老天还有什么办法能治我们！”一个同志这样说。顿时，笑声又起了，坑里面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兴奋和热闹。人们越是在临近胜利的时候，回想过去艰难的历程，往往容易唤起前进的力量，这正如处在困难环境中，向往美好的将来，能够唤起前进的力量一样。而现在，我们在色既坝的土坑棚里，兼有着这两种感情。

不是么，红军长征是一首宏伟、壮丽的史诗，雪山草地行军是艰苦的一章，而这个乐章，正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下，由广大指战员有声有色地演奏着，那悲壮、豪放的旋律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使日月添辉、山河增光。我们红四团有幸担任前卫，与后续部队比，先一步踏上了水草地，但是，整个草地还没有完，斗争还在继续，饥饿和寒冷还在考验我们。然而，不管怎么说，我们毕竟快走出草地了。因为通司说，到目的地——班佑只有一天多路程了。

天亮了，雨停了。于是，我们从泥浆水里拔出双腿，穿着湿漉漉的衣服，背着被雨水淋过的沉甸甸的背包和武器，踏上了通向班佑的路。

这是八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我们走得特别早，其原因不仅是因为昨夜大雨浇了一宿，我们根本没有睡觉，更主要的是大家有好几天没有看到居民和房屋了，如今听说快到班佑了，就象多日航行在海上的海员渴望见到大陆一样，

盼着早一点到达那里。

可是没有想到，下了这一夜雨之后，河水暴涨，昨天还是干燥的路，如今成了锁住我们双脚的泥泞小道。我们高一脚，低一脚，每走一步都要化出很大力气，由于几天几夜少睡少吃，在空气稀薄、缺氧的情况下人本来就很虚弱，经这么一折腾，那个艰难劲儿就不用提了。一不小心，人跌倒了，就得马上爬起来，要是你想稍稍休息一阵，虚弱的身子就会让你的意志和毅力消耗在那里，那你就再也别想起来了。就这样，大家也还是你搀我，我扶你，走了四十里。

“前进吧，同志们，班佑就在前面！”

队伍中不时发出这样的喊声。大家向往班佑，仿佛班佑是我们的根据地似的！对于班佑，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想象，有的甚至充满了五光十色的幻想。因此，不论是谁一听说“前面就是班佑”，就受到鼓舞，劲也就来了。我们终于走完了一段泥泞的道路。雨，渐渐止了。但是，大自然好象有意作弄我们似的，眼前又横着一条小河。据通司讲，这里原来有座简陋的桥，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不见了。我们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是被人拆掉了。无疑，这是反动派干的。现在这条河由于下了大雨，河水陡涨、湍急，越发显得开阔了。若是绕道走，既费时，也不知路，于是我们与通司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从这里涉水过去。

先头营派了几个同志跳进冰冷刺骨的河水先游了过

去，然后从对岸拖过来一根粗大的绳子，我就拽着这根绳子第一个下了河，这时只觉得脚底淤泥松软，雪水冰冷刺骨，水深齐至胸口。团长王开湘、总支书记罗华生也一个个走了下来。我们一只手拉着绳子，一只手互相挽着胳膊，由于水流湍急，走一步，几乎就要晃荡一下。但是，大家的情绪还是很高，因为我们知道：草地再苦，也快到边了，“严冬过去，春天就在前头。”不知哪个同志在我们涉水时，自编自唱道：

茫茫草地不可怕，
雪水再冷跨过它，
我们跨过它，
我们战胜它！

他这一开头，许多同志也都跟着哼唱起来。歌声伴随着我们在河面上荡漾着，一直飘到了对岸。

第二天下午三点，当我们又翻过一个高地，视野里出现一两座小山时，远远看到前面升起了烟火，同志们高兴地叫了起来。别说年轻的战士，就是那个连日来坐在担架上

“班佑，班佑到了！”

的老通司也高兴得手舞足蹈，从担架上跳了下来。

每个人都露出笑脸，忘却了连日的疲惫，有的同志不由自主地小跑起来。

这时路边也能见到一些石头了，有的同志高兴得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地惊叫着：“石头！”还把它揣在怀里。是的，整整六天了，我们没有见到炊烟，没有见到群众，没有见到房屋，没有见到石头。六天，饥寒交迫的六天，困难重重的六天，在这六天里，我们和大自然作斗争献出了多少宝贵的生命！如今，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依靠阶级友爱和团结互助，以及红军特有的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我们终于在茫茫的草地上踏开了一条北上抗日的前进道路。

翻过一个高地，又爬上一个山岭，当我们又走下坡去时，发现路旁长着一丛丛的野花，啊，花丛里还结着一串串金红色的小果实哩！调皮的警卫员摘了一串，一阵风似地跑到我的跟前，兴奋地递给我一颗，仿佛那是一颗千年未见的仙果似的。

我捧在手心看了又看，它只有葡萄那么大，放在嘴里一尝，啊，果然不错，一种酸味，虽然没有葡萄那样香甜，但也沁人心脾。这时团长也策马而来，一见到我就勒住马缰，豪迈地说：

“我们终于胜利了！”

这时我发现他脸上添上了从未有过的光彩。我情不自禁地又转向大家，大声说道：“快胜利了，向班佑前进！”

于是，我们的队伍象潮水般向班佑涌去，终于到达了班佑。

班佑并不是大城市，它既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柏油

马路，只是一个拥有一二十间牛屎房的小村庄。

说起牛屎房，倒也十分有趣，用柳条编起来，外边糊上一层牦牛屎算是屋墙了，上面搭着的也是树条，糊着牛屎，没有窗，外表黑黝黝的。藏胞在这里大抵过着游牧生活，他们把积下来的、并无臭味的牛屎既当燃料，又作建筑材料。用它盖起的房子虽简陋，但对连日所见全是茫茫泽国、不得不风餐露宿的我们，能够住进去，也算是一种好好的享受了。先头营的同志与牛屎房的主人一联系，想不到他们出乎意料的热情，当夜就把我们分别邀进了他们的房里。别看这是牛屎房，风吹不透，雨打不着，比起草地露营不知要强多少倍。我们在睡觉前，又叫各连烧些水，让大家洗洗脚，烤烤火，大家随后又吃了点干粮，便呼呼地进入了梦乡。

我与团长利用这个空隙，先向军团和师首长报告了进驻班佑的经过，接着又邀了两位年轻的藏胞来给我们谈了谈附近的情况。

原来，这里最大的集镇是阿西，它离此二十多里。这个镇上，不仅有一座可容千人的喇嘛寺，还有近几百户住家，粮食较多，房屋也好，是个理想的粮食采购区。离此往西还有一个叫巴西的村庄，也是一个粮食比较多的地方，那里有小集镇，有喇嘛庙，还有一片茂密的树林，是个最好不过的宿营地了。但听说，翻过山去，那边经常有胡宗南的骑兵出没。我们就派出了警戒，还加强了巡逻，以防

敌人的突然袭击。

夜深了，外边下着雨。我与团长刚用热水洗完脚，警卫员已经给我们铺了个铺。我经过这几天的折腾，觉得一身松软，钻进棉被里，真感到舒坦极了。是啊，别看这十几间牛屎房不怎么起眼，它却给我们先头团带来了温暖，给陆陆续续走出草地的大队红军带来了快慰。就在我们团离开班佑去巴西之后，继之而到的是师部，听说陈光师长见到这些牛屎房高兴得不得了。他躺在房里，吸着纸烟，竟夜畅谈，向往着革命的胜利。他和其他的师首长谈啊谈啊，不知不觉把烟头触到了牛屎墙上，又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哪知，牛屎墙上的星星之火酿成大火烧起来，不用多久，这间房子就烧得一塌糊涂。幸好同志们抢救得快，把火扑灭了。偏偏这时雨又下大了，师的领导和许多同志不愿意再去麻烦别人，就只好站在雨里，打着伞整整蹲了半宿。

隔了一天，傍晚，我们四团又奉命返回班佑，担任警戒任务。中央直属队进驻巴西，并传来右路军另一股主力在包坐获胜的消息。原来胡宗南看到红军北出四川，向甘南挺进，认为包坐是必经之地，不仅派兵防守，而且派出驻松潘的敌四十九师伍诚仁部增援。八月下旬，我右路军的红三十军和红四军分别通过草地，向包坐前进，与包座之敌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消灭了敌四十九师主力，取得了重大胜利。

包坐大捷的消息传来时，我们非常振奋。此时，党中

央、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主力各一部组成为右路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于八月下旬先后胜利走出草地，刚由班佑到达巴西。

巴西是一个山谷小镇，房屋较稠密。那里的房子多半是木头建的两层楼房，与毛儿盖藏胞的一样，上边住人，下边养牲口。尤其那个喇嘛寺，造得很精致。毛主席、周副主席、张闻天同志都住在喇嘛寺里，寺边有一条小溪，常年喷着白浪，流水清澈见底。

后来在北进途中，上级向我们传达说，巴西会议就在那里开的，会议上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原因是，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到达巴西的时候，左路军已经到达了阿坝。这时张国焘突然重提南下川康的计划，与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相对抗。中央指示张国焘：“目前只有北进才有出路，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毛主席与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知道张国焘危害党、分裂红军，乃立即决定由下巴西返回上巴西（约三十华里）。回到上巴西后，他们仍住在那座喇嘛寺里。深夜，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张闻天总书记研究决定，在巴西寺院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张国焘南下逃跑、企图危害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并毅然采取果断措施，决定率领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及中央直属纵队近万人，继续北上。一军团为前卫，奔向腊子口，中央机关在一军团后面，彭德怀同志、杨尚昆同志率领的三军团为后梯队。

第三章

长征（下）

白 龙 江 畔

部队继续北上，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四日我们红四团到达甘肃境内的白龙江边的莫牙寺。

十五日黄昏，师部通信员送来了一封信，信上写道：

军团首长命令即速继续北进，着第二师第四团为先头团，具体向甘肃之前的岷州前进，三日之内夺取天险腊子口，并扫除前进途中拦阻之敌人！

接到命令后，我们立即召开团的主要干部会议，研究分析情况，作好行动的一切准备。

夜深了，在莫牙寺边的小屋子里，会议还在进行。到会的同志一致认为：腊子口可能是我们北上途中最后的、

最险要的一道关口。突破了腊子口，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挡住我们红军北上抗日的阴谋就彻底破产了，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就能胜利实现。如果拿不下腊子口，我们红军就要被迫掉头南下，重回草地。这将使革命向后倒退，是违背广大指战员“北上抗日”的意志的。如果采取西进绕道出青海，或东进川东北取道三国时孔明六出祁山的旧地——汉中，就要踏进敌人早已布下重兵的口袋，那将对我军极为不利。因此，眼下只有突破天险腊子口，才是唯一的出路。

我们在会上，摊开地图计算了一下，从莫牙寺到腊子口足足有二百来里。从得来的情报知道，腊子口那里有鲁大昌的国民党陆军新编第十四师驻守。由于鲁大昌的老窝在腊子口不远的岷州，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阻挠红军前进，除了派出第一旅旅长梁应奎率领重兵在腊子口以南重重设防外，还在岷州城外，大拆民房，扫除障碍，扩大射界，添设碉堡，妄图阻击我军进入陕甘地区。

我们也分析了自己的条件：部队经过雪山、草地之后，体力普遍减弱了，要想突破腊子口，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这确实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但是，我们坚信四团可以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因为我们红四团从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以来，一直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的直接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支老部队，打过各色各样的硬仗，有着光荣的

战斗传统。特别是在这漫长而又艰巨的征途上，战士们英勇顽强，无坚不摧，每攻必克，完成了中央军委给予的各种艰巨任务。现在，在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正确路线的重要关头，只要全体指战员懂得夺取腊子口的重大政治意义，就能发挥出无比的力量，扫清前进路上的障碍。

会议统一了认识，制定了计划，刚一结束，我们就立即到各个部队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而且决定：连夜行动。

深夜十一点钟，静静的村庄响起了集合号。不一会儿，全团集合在路旁的草坪上。战士们小声地议论着：

“我们今天又当起先头团了。”

“今天的前卫，无论如何，总跑不掉了吧？”

我站在队前，见大家异常高兴，又向部队做了一次战斗动员：“同志们，我们马上就出发了，我们担任先头团，要在三天之内，夺取腊子口，为大部队扫清前进道路的障碍，以便迅速到达抗日的最前线，执行抗日救国的光荣任务。同志们，能完成任务吗？”

“能！”战士们雷鸣般地答道。然后，各连呼起响亮的口号：

“坚决夺取腊子口！”

“迅速打到西北去！”

“不怕一切困难，坚决完成先头团的光荣任务！”

“打！打！打！”

在直冲云霄的口号声中，在悠扬的进军号声中，部队

浩浩荡荡向腊子口前进了。

刚刚走出五里左右，我们就踏上了崎岖小路，碰到了藏胞架起的独木桥。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这段路实在难走，只听得扑通扑通的跌交声。

“爬起来呀！”

“注意呀！”

“后面的同志这里要小心呀！”

这些话，前前后后的响着。

尽管道路崎岖，行动艰难，但同志们的情绪异常高涨，边走边说，边说边笑，丝毫没有沉闷的感觉。

这个说：“等会儿打腊子口，我们可得比比，看哪个连队打得漂亮！”

那个说：“进雪山、草地我们是前卫，出雪山、草地我们还是前卫。看这样，上级对我们这前卫还是挺满意的哟！”

漆黑的夜幕覆盖着山山岭岭，我们兴致勃勃地踏着黑黢黢的夜色，踩着崎岖的山路，走过悬空的栈道，跨过一个又一个的独木桥，听着白龙江在深谷里发出的流水声。我们基本上是沿白龙江面上，这条江上游的一个支流就是腊子河。大家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天空出现了鱼肚白，这会儿才知道，我们快到棒卡了。

突然，“啪！”“啪！”前面传来两声枪响。先头连与藏族上层反动武装打起来了。尖兵班的同志回了一个排枪，与其说是打，还不如说是吓唬对方。与藏族上层反动武装

打多次交道，经验告诉我们，只要用新花样，他们过去没经历过的，什么照明弹呀，放排枪呀，甚至甩出几颗手榴弹也能收到这种效果。果然，前面一阵骚动，他们向两边老林里跑掉了。

部队半宿急行军，脚一直没停，趁这个机会，我们干脆就地休息了一会儿。

然后，又向那高山前进。

九月十六日清晨，我们进入了一望无际的松树老林。高原上的疾风把那挺拔、倔强的松树吹得东摇西晃，林海立即掀起一片松涛、绿浪。同志们却好象要压倒松涛似的，唱起了战歌：

同志们，快快拿起枪，
我们是工农武装，
要消灭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
要建立工农共和国。
敌人发抖了，
勇猛向前冲，
我们是无敌的红军，
噼咧啪，噼咧啪，
抓紧枪向前杀，
打倒反动派，
建立苏维埃！

嗨——

我们的红旗，

插遍天下！

一支战歌刚唱完，另一个同志起了个头，豪放的兴国之山歌又从森林里升起。那嘹亮的歌声，真是此起彼伏啊！到了卡郎山脚，不知谁在队伍里大声吼道：

“同志们，我们又走了五十里了。现在上高山，我们来比赛吧。”其他的同志也不肯示弱，纷纷答道：

“行呀，行呀，看谁先到山顶！”

战士们真干起来，个个争先恐后，一个赛过一个，真是生龙活虎，哪象是爬过雪山，穿过草地，走过二万多里的一支队伍呢。

不用多久，三四十里高的山峰踏在战士们脚下了，鲜艳的红旗在山顶飘扬着。我在同志们这种热情的感染下，也忘了劳累，一步不停地奔上了山顶。啊，云海苍苍，群山迤迤，多美呀！这时，遥望西边，忽见一排乌云飞来，慢慢地把太阳遮住了。高原的飞候真和草地一样多变，刚才还是晴朗的蓝天，顷刻间，纷纷扬扬地洒起雪花来了，片刻，哗哗的冰雹也跟着过来凑热闹。但是，这怎能吓倒我们从雪山、草地过来的人？！大家忍住寒冷，有的调皮鬼，还高声嚷道：

“好啊，真好看呀，大家来吃‘白糖’吧！”

“对！还有‘冰糖’哩！”有人附和说。

战士们正在嬉戏，刹那间，天又翻了脸，真象是恶作剧，不让我们多欣赏一下云海雪景，又是一阵狂风暴雨，把我们里外淋得透湿。就在这样的风雨中，我们快速行军，待到山脚下时，天快黑了。一算，路已走了一百二十里，我们又连续走了十里路，赶到班藏王福的附近才略作休息，下半夜又继续行动。

部队冒雨行军极为疲劳，同志们一停下来，倒头就睡，一睡就着。最辛苦的算是炊事员了。这会儿，他们要忙着做饭做菜，更紧张了。

我与团长检查完部队，来到一个连的临时炊事房里，听到这样一段对话：

“今晚的饭一定要做好，让同志们不但吃饱，还要吃好！”

“对！让他们吃饱、吃好，去打腊子口！”

“可不，吃饱了，打起冲锋来跑得快，冲得猛！”

这使我们深有感触，我们的炊事员多好啊，别看他们的眼睛布满了血丝，那是长期缺乏睡眠造成的呀！听吧，这就是他们心灵的写照。他们想的和大家完全一致，而且与本职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了。确实，在长途征战中，我们团队中有不少这样的炊事员，他们的工作并不显眼，但却象钟摆一样，永无休止地进行着。部队宿营休息了，他们在做菜煮饭，等到同志们吃饱饭要出发了，他们更休息不

成，又得匆匆忙忙收拾炊具挑着担子，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听说国民党和军阀部队看不起炊事员，把他们唤作“三等伙夫”，意思是说炊事员是最低的三等兵。而我们的炊事员在那平凡而又伟大的工作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工作着，始终受到党和同志们的尊重，大伙称他们是“我们的保姆”、“无名英雄。”的确，在漫长的征途上这些炊事员对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炊事房出来，夜已很深了。团长与我在房里睡了片刻。

九月十七日凌晨两点，部队全体指战员从睡梦中被唤醒，吃了我们炊事员精心制作的一顿好饭，又冒着毛毛细雨，上路了。

我们摸黑沿着深山老林中又窄又滑的黄泥路，继续向腊子口前进。天明八时许，先头营派来通信员向我们报告说：

“首长，前面没有路了！”

“那个向导呢？”我与团长都愣住了，忙问。

“他说路忘记了！”通信员一本正经地说。

后来仔细一问才知道，那个六十多岁的向导，由于他还是十年前到过这里，现在这里的山路，确实忘记了。

我们走了这么多路，这样的情况还确实少见，怎么办呢？另找一个向导吧，这里不见人烟，周围是原始森林，停下来吧，耽误了时间，那三天还能拿下腊子口来？真是

进退两难，团长与我焦急万分。

想了半天，现在只有依靠那只唯一的指北针。

于是，我们拿来了指北针和普通的中国大地图，对照着地图和北面的大山隘，决心从密林中踏出一条路来。

部队又继续前进了。但走了不到一个钟头，先头营又派人来报告说：“在我们前进方向的左侧，发现敌人一个营，正在构筑工事。”

团长与我策马向前，仔细一看，果然是真，并发现敌人派出一小股部队正向我方搜索前进。

“送上来的礼，不收是无礼的。”我说。

团长点点头。我们一起跳下马来，摊开地图，立即研究如何吃掉这股敌人。

“让一营先开开手！”团长说。

“好！”我说。

于是，一营在营长季光顺的率领下，立即向敌侧翼迂回，准备隐蔽地绕到敌人后面，截其归路。团长等了一会儿，又派两个连在正面准备突击。“打！”团长一声令下，只见两个连一个猛冲，“啪啪啪”、“轰轰轰”，很快就占领了敌人刚做好的工事。正在修筑工事的整整一个营的敌人遭到我们的突然袭击后，什么也不顾，丢下枪支、镐头、洋锹，连滚带爬地往后面拚命地逃。

“杀啊！冲啊！”我们的战士劲头上来了，一个劲地往前冲。

可惜我们的迂回部队——一营没有及时赶到，虽然消灭了大部分敌人，但还是让一部分敌人跑掉了。

为了执行原定任务，队伍又调转头来向腊子口前进。战士们纷纷议论说：

“打得真痛快！二十分钟打垮了他一个营。”

“鲁大昌的熊兵，经不起我们一打！”

部队继续前进。同志们似乎越走情绪越高，大概是想
着腊子口还有仗打吧！的确，我们有的战士，一听说有仗打，心里就痒痒。

将到黑朵附近的时候，我便衣队捉到了三个敌人的官探，审问结果，据说前面敌人有一个营埋伏在我们要去的大路右侧，企图侧击我们。

“这是一个好机会！”团长获得消息，高兴地说。

“咱们来它个武戏文唱，将计就计。”我和团长认真商量过后，情不自禁地说。

“对！”王团长兴奋地说。

我们的决心下了，便利用前几个小时冲垮敌人那个营所缴获的服装和武器装备，来化装我们的一个连队，让他们扮成白军走在最前头。

愚蠢的敌人，见到他们真以为是自己的部队。当我们这个连一直走到他们的跟前，他们还丝毫没有察觉。但是，一阵“轰轰轰”的手榴弹声把他们搞乱了，我们的战士端起刺刀往上冲。这时，敌人要还手已经晚了。他们措手不

及，满地乱跑，所有的东西，丢得一千二净。我们这个连除缴获了大批的物资外，还俘虏了敌十四师鲁大昌的副官、营的医官等二十多个军官。据俘虏称：离天险腊子口不远了，顶多还有十五华里。

午后四点钟，腊子口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我们的先头一营已与敌人打响了，天险之战的序幕就这样揭开了。

突破天险腊子口

王团长与我策马急驰。待我们到达腊子口时，一营正和敌人打得不可开交。由于是白天，加上周围都是石山，我们无法隐蔽，被敌人的机枪火力和那下冰雹似的手榴弹挡了回来。

王开湘团长和我回来后又立即领着全团的营、连干部，到前面察看地形。

我们来到前沿，用望远镜抬头一看，果然这里地形险峻极了。沿沟两边的山头，仿佛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型的大刀劈开了似的，既高又陡。周围全是崇山峻岭，无路可通。从下往上斜视山口只有三十来米宽，又象是一道用厚厚的石壁构成的长廊。两边绝壁峭立，腊子河从沟底流出，水流湍急，浪花激荡，汇成飞速转动的旋涡，水深虽不没顶，但不能徒涉。在腊子口前沿，两山之间横架一座东西

走向的木桥，把两边绝壁连接起来，要经过腊子口，除了通过这个小桥别无它路。桥东头顶端丈把高悬崖上筑着好几个碉堡，据俘虏称，这个工事里有一个机枪排防守，四挺重机枪对着我们进攻必须经过的三四十米宽、百十米长的一小片开阔地，因为视距很近，可以清楚地看到射口里的枪管。这个重兵把守的碉堡，成了我们前进的拦路虎。石堡下面，还筑有工事，与石堡互为依托。透过两山之间三十米的空间，可以看到口子后面是一个三角形的谷地，山坡上筑有不少的工事。就在这两处方圆不过几百米的复杂地形上，敌人有两营之众，此外还有白天被我们击溃逃到这里的敌人。

口子后面的腊子山，横空出世，山顶积着一层白雪，山脉纵横。据确切的情报，鲁大昌以一个旅部率三个团的重兵，扼守着口子至后面高山之间的峡谷，组成交叉火力网，严密封锁着我们的去路。

经过反复缜密的侦察，和我一营攻击时敌人暴露的火力，我们发现敌人有两个弱点：一是敌人的炮楼没有顶盖；二是口子上敌人的兵力集中在正面，凭借沟口天险进行防御，两侧因为都是耸入云霄的高山，敌人设防薄弱，山顶上没有发现敌人。

我们又把望远镜对向敌人石堡旁边的悬崖峭壁：

这一面石壁，从山脚到顶端，约有七八十公尺高，几乎成仰角八九十度，山顶端倒是圆的，而石壁既直又陡连

猴子也难爬上去，石缝里零零星星地歪出几株弯弯扭扭的古松。敌人似乎没有设防，可能是因为它太陡太险。团长和我边观察边研究，觉得倘若能组织一支迂回部队从这里翻越上去，就能居高临下地用手榴弹轰击敌人的碉堡，配合正面进攻，还可以向东出击，压向口子那边的三角地带。可这面绝壁看着叫人眼晕，如何上得去？

现地观察回来，我们就在离口子二百多米远的小路旁的那个小树林子里召开干部会议，研究战斗方案。突然，敌人从石堡里射出一梭子子弹，正和我们一起研究情况的师政治部的组织科长刘发任同志负了重伤。我们派人把他抬下去之后，又继续开会了。会上研究的重点是能否攀登陡壁。可是讨论来讨论去，点子不少，把握不大。

在这关键时刻，我们又召集连队的士兵开了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打下腊子口，要大家献计献策。哪知，一个贵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来了个“毛遂自荐”，说他能爬上去。大家都惊奇地望着他。当然，只要有一个人能上去，就可以上去一个连，一个营。可是，他怎么能爬得上去呢？

事关大局，我专门和这个苗族小战士谈了话。原来，他是从贵州苗区入伍的，从小受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很深，反抗性很强，入伍后，经过教育，作战非常勇敢。战士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云贵川”。他只十六七岁，但看上去却俨然是个大孩子了，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显得有些瘦，但身体结实，脸上稍带赭黑色，眼睛大而有神。他

的汉话说得还不太好，但能听得懂。其实，象他这样的同志，在我们团队里也还不少，瑶、彝、羌、藏族的干部战士都有。

究竟他有什么好办法呢？他说，他在家采药、打柴，经常爬大山，攀陡壁，眼下这个悬崖绝壁，只要用一根长竿子，竿头绑上结实的钩子，用它钩住悬崖上的树根、崖缝、石嘴，一段一段地往上爬，就能爬到山顶上去。

于是，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这个苗族小战士的身上，决心做一次大胆的试验。

腊子沟水流太急，难以徒涉。我们就用一匹高头大马把苗族战士送过去。绝壁紧贴着腊子沟；我们站在这边的小树林里，看他用竹竿攀援陡壁。这里离敌人虽然只有二百来米，但向外突出的山形成了死角，敌人看不到我们。

那小战士赤着脚，腰上缠着一条用战士们绑腿接成的长绳，拿着长竿，用竿头的铁钩搭住一根胳膊粗细的歪脖子树根，拉了拉，一看很牢固，两手使劲地握住竿子，一把一把地往上爬，两脚用脚趾抠住石缝、石板，噌噌噌，到了竿头的顶点。他象猴子似的伏在那里稍喘了口气，又向上寻找可以搭钩的石嘴……

我和王开湘同志、李英华同志，还有营、连干部，都屏住气仰视着山顶，生怕惊动了“云贵川”，好象是谁要咳嗽一声，他就会掉下来似的。夕照里，只见他那比猿猴还要灵活、轻盈的身体，忽而攀登，忽而停下。

越往上，这个瘦小的身影越小了。我们真担心，万一他失手，从那高崖上摔下来，可就糟了！这位苗族战士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我们的心，真是一发系千钧哪，因为他一个人的成败关系着整个战斗的胜负啊！

他终于上去了！我们这才感到脖子已经仰得有些发僵了，不由得长长地舒了口气。是啊，攀登成功了！多叫人高兴啊！

他在上面待了一会儿，又沿着原来的路线返回来了！我们握了握他的手，向他表示祝贺。他裂着嘴笑了笑，仿佛在说：“我说了，能上去嘛！”

天将黄昏，我们又抓紧时间，做两面出击——翻山迂回和正面强攻的准备工作。

团长和我研究决定，迂回部队由侦察队和通信主任潘锋带领的信号组以及一连、二连组成。正面强攻的任务由二营担任，六连是主攻连。在这个艰巨任务面前，为人笃厚的王开湘同志对我说：

“政委呀，过泸定桥你在前面，这回我来带翻山部队迂回敌人，你在正面统一指挥！”

团长摆出一个无与争辩的姿态，我笑了笑。由团长带领迂回部队，当然是把握十足的，我们全团指战员一定会很高兴的。我说：“好，我在下面指挥强攻！”

我们当即把情况和决定向师、军团首长报告。

军团政委聂荣臻和陈光师长等来到了前沿指挥所。首

长询问了情况，又观察了一下地形、敌情，然后对我们说：

“你们的决心是对的。正面冲锋道路狭窄，敌人已经组成严密的火力网，我们的兵力展不开，英雄无用武之地，必须坚决从侧面爬上去，迂回到敌人侧背，来它个突袭，这样定可奏效。这是攻占腊子口决定性的一着，要打得狠，奏效快，迂回的部队要大一些。同意由王团长亲自率领迂回部队，无论如何要插到敌人侧背去。正面由杨政委负责指挥。为了加强正面攻击的火力，军团的迫击炮配属给你们。炮弹不多，必须集中轰击隘口的炮楼和敌人兵力的集结点。”最后，军团首长望着腊子口陡峻的山峰，鼓动说，“你们只要坚决这样做，天险腊子口就一定可以突破。”

军团长林彪也到了现场。

于是，团长与我立即分头行动。我们预计迂回部队要在凌晨三时才能到达预定地点，便规定好，他到达目的地后，发出一红一绿的信号弹，然后正面发起总攻，同时规定了总攻的信号为三颗红色信号弹。

指战员们看到各级首长都来察看地形，十分重视攻打腊子口的战斗，便充满了必胜的信念，纷纷表示：“保证拿下天险腊子口！”

黄昏前，迂回部队已动员完毕，不用说同志们该多高兴了。他们和侦察连的同志组成一个整体，并且集中了全团所有的绑腿，拧成了几条长绳，作爬崖之用。勇士们一个个精神饱满，背挂冲锋枪，腰缠十多颗手榴弹，在王团

长的率领下，开始渡腊子河。

开头，试图徒涉，但下去两个人，还没到河心，便被水冲走，喝了几口水才被救了上来。于是，我们只好用几头骡子来回骑渡。

人多时间紧，他们又想了个办法，砍倒沿河的两棵大树，叫它倒向对岸，一下子就添了两根独木桥。

几百人渡过去，太阳已经落山了。

还是苗族小战士“云贵川”捷足先登，将随身带着的长绳，从上面放下来，后面的同志一个一个顺着长绳爬上去。

天已经擦黑了。他们往上爬呀爬呀，不停地爬着。渐渐地看不到人影了，只是偶尔传来小石子滚落下来的响声。

正当团长率领迂回部队渡河、攀登时，我又跑到担任突击队的六连进行了紧急动员。

二营六连原属四方面军二九四团，是由一个营缩编而成，过去开辟四川“通、南、巴”根据地，进军川西北，打过许多胜仗，有着光荣的历史。编入四团以后，表现一直很好，特别是与原四团的同志，团结得非常好。二营营长张仁初、副营长魏大全同志做出了表率，三个连队都很突出。他们与一、三营亲密无间，互相帮助，眼下，六连能够也应该在巍巍的腊子山麓，汹涌的腊子沟畔树下他们的历史丰碑！选择突击连的时候，我和团长意见一致。

这时六连战士在连长杨信义、政治指导员胡炳云同志

的率领下，集结在茂密的树林里。

我开门见山地说：“同志们，我们左边有杨土司的骑兵，右边有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北上抗日的道路，只有腊子口一条。这里过不去，我们就不能尽快地到达抗日前线。”然后，我又提高嗓门，“乌江、金沙江、大渡河都没能挡住我们红军前进，雪山、草地我们也走过来了，难道我们能让腊子口挡住吗？”

“坚决拿下腊子口！”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六连的指战员喊出了同一个声音。

“刀山、火海也挡不住我们！”刹那间，我的面前站出几个虎彪彪的战士，他们齐声喊道，“首长，我们是共产党员，请考验我们！”

“好，主攻腊子口的光荣任务就交给你们六连！”我说。六连同志欢呼雀跃。

接着，我又问：“你们有没有把握？”

“有！”六连的同志齐声回答，声音象雷鸣一样。

“好，团里再抽出一部分轻重机枪，由你们指挥、使用。”我说。

六连在动员会上，象过去抢夺泸定桥一样，大家争当突击队员，我们选择了二十名，由连长杨信义和指导员胡炳云指挥，组成突击队。最后，我说了四句话：腊子奇无险，勇士猛攻关，打开北上路，不惜一恶战。

动员会一结束，天已近黄昏了。高原山区的天气，已

有一些寒意，但是，战士们的心中热乎乎的。他们接受了主攻腊子口的任务，都象小孩子过年一样高兴，蹦的、跳的都有，但全都在抓紧战斗前的那一片刻作准备。他们把手榴弹三个一捆，两个一束，挂满了全身，有的把刺刀、大刀擦了又擦，擦得闪闪发光。战士们那股子劲，真是气吞山河。

我检查了几个战士的准备情况，又把几个干部叫到一边，交代说：“你们六连从正面进行连续袭击，相机夺取峡谷上的独木桥，如果偷袭不成，也要达到疲劳敌人，消耗敌人的弹药、牵制敌人、迷惑敌人的目的，以配合迂回部队的突然袭击。”

六连突击队，乘着朦胧夜色，开始向敌人桥头阵地接近了。

我部署完毕，又去看了看右边的陡壁，参谋长李英华同志正在指挥迂回部队有条不紊地攀登山峰。哗哗的水声，急骤的枪声掩护他们的行动。

王开湘同志短促的声音，从河对面传过来。

侦察连上去了，一连长毛振华同志带着一连上去了，二连上去了……

我仰视山顶，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见。

现在那个立下特殊功勋的苗族小战士正在顶峰帮助后面的同志攀登。遗憾的是他的名字我竟没有记住，只记得他的绰号叫“云贵川”。

迂回部队上去了。于是，按照计划，为了麻痹敌人，六连从正面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那二十个突击队员在连长杨信义、政指胡炳云的指挥下，以密集的火力作掩护，手持大刀和手榴弹，悄悄向隘口独木桥边运动。狡猾的敌人，凭着险要的地形和坚固的炮楼，有恃无恐地躲在工事里一枪不发，等到我们接近桥边时，就投下一大堆手榴弹，向我们反击，一团团的火光在隘口翻腾飞舞。

突击队员们见此情景，急得直冒火，待敌人的手榴弹一停，又冲了上去。但几次冲锋，都没成功，先后伤亡了几个同志。

“打，不让兔崽子抬头！”年轻的一排长，见冲不上去，便命令机枪手狠狠射击。机枪喷出的火舌映红了半边天，激烈的枪声在山口震荡着，子弹打得敌人阵地上的岩石直冒火星。但是，仍压不住敌人。就在我们突击队前进的道路上，敌人投下的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爆炸着。

我们又组织人员，向敌人开展政治攻势，喊道：

“我们是北上抗日的红军，从你们这里借路经过，你们别受长官的欺骗，让路给我们过去吧！”

“赶快交枪，交枪不杀，还发大洋回家！”

顽固的敌人，不管我们怎么宣传，还是骂我们，并吹牛说：“你们就是打到明年今天，也别想通过我们鲁司令的防区腊子口！”

敌人的谩骂与手榴弹的还击，激怒了我们的勇士，他们纷纷要求再次冲锋，而且立誓：“天明前一定拿下腊子口！”

毛主席和军团首长这时又一次派人来前沿了解情况，问突击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有什么困难，要不要增援。

上级首长的关怀，激励了我们的斗志。我和营的干部一起分析敌情：已经打了大半夜了，再有三四个钟头天将破晓，鲁大昌拥兵五六个团在岷县县城，只隔着一座大山，总兵力比我们的要多得多，如若延迟下去，鲁部真的倾巢增援，他们几个钟头就能赶到，那局面将更严重。可是我们上山的那支迂回部队，仍不见信息，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也还不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王开湘同志他们一定也遇到了困难。但是眼下时间紧迫，任务逼人，不能再拖下去了。

大家统一了思想，便重新组织火力与突击力量，再次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可是，接连攻了几次，还是接近不了桥头。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一个个在地上乱滚，炸裂的弹片在桥头三十米内的崖路上铺了厚厚的一层，有的地方，没有爆炸的手榴弹已经堆起一层了。我命令六连不要再继续猛攻，只进行牵制性的战斗，等待迂回部队到达预定位置发出信号后，再一齐给敌人来一个总攻击。

炊事员用缴获敌人的面粉、猪肉做好饭菜送来了。饭菜虽香，可是战士们心里沉甸甸的，谁也吃不下。我命令

六连连长、指导员带头吃，他们才勉强吃了一点。

战士们撤到离前沿稍远的地方，靠着石崖一个个坐着，四周黑乎乎的，不见一点光亮，只有河水翻起的浪花偶尔闪耀着白光。在黑暗里我忽然听到几个战士在低声谈论：

“敌人对崖路封锁太严啦！”说话的声音很清脆，听得出是个青年战士。

“我看，”另一个接着说，“单凭正面猛冲怕是不行。”

战士的话忽然提醒了我，可不，整个六连从正面扑上去，也很难达到疲劳和消耗敌人的目的，倒不如抽出少部分同志组成突击队，以小分队形式接二连三地向敌人轮番进攻，来疲劳和消耗敌人，再伺机夺桥。

于是，我交代党总支书记罗华生同志，要他与六连的领导一起从党团员中抽出十几个人组织突击队，其他同志仍旧原地休息。于是，不用多久，前沿又响起了枪声和喊杀声。

趁这间隙，我到后面树林里转了一圈。

在树林里休息待命的总攻部队，听着前沿六连同志那惊天动地的喊杀声，哪能入睡。他们一见我去，都争着上来要任务和打听桥头攻击部队的进展情况。我叫他们抓紧开饭，做好向纵深追击的准备。

三点前，全团饭后进入总攻位置。我遥望河对岸山那边，急切地盼着王团长发来信号，为了万无一失，让参谋长李英华同志指定三个通信员专门了望右岸悬上空崖。

怀表上的指针指向三点，我睁大眼睛注视着天空，但是不见一丝信号的踪影。

我看着表上的指针在不停地运转，三点三十分过去了，四点过去了，还是不见动静。正在焦急，六连的通信员跑来向我报告，说：“六连的突击队冲到桥下去了！”

我立即赶到桥的附近，果真，六连的战士偷偷地涉水过河到了桥那头。

原来，在一个多小时以前，当我们把队伍拉到后边休息时，敌人真以为我们“无能为力”进攻了，于是都缩进碉堡里打起盹来。六连又组织了十五名突击队员，他们一个个背插大刀，身挂手榴弹，有的还配有一支短枪，趁着天黑，分作两路，一路顺河岸崖壁前进，摸到桥肚底下，攀着桥桩运动到对岸，另一路先运动到桥头，待前一路打响，就一齐开火，给敌人来它个左右开弓，两面夹击。

刹时，另一路也扑了过去。

这时，我看到指导员胡炳云同志正带着一个排也压了过去。

我一边看着突击队勇敢冲杀，一边还想着对岸山顶上的信号弹。是啊，天快亮了，要是天明前，王团长他们完不成迂回任务，我们和他们不能在桥头上下联合起来给敌人作最后的一击，那么我们的整个战斗部署就会暴露，六连突击队偷袭桥头的战斗也将前功尽弃。迂回部队究竟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们的部队能征惯战，猛冲善追，勇于克

服困难这一点，在长期的征战中是证明了的，我们是完全信赖的，但是，黑夜攀登如此陡峭的悬崖，毕竟还是第一次，重重困难是预料不到的，他们会不会给断崖绝壁挡住？会不会因为走错了路而耽误时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必须实现，腊子口非拿下不可。能不能过腊子口，关系十分重大。

正当我万分焦虑与盼望之际，右岸高峰上面突然升起一颗红色信号弹。

“信号弹！红色信号弹！”我差点喊出声来。

紧接着又升起一颗绿色信号弹。

一红一绿那是我们规定的进攻信号。啊，红色、绿色的光芒，透过拂晓的薄雾，照亮了桥这边每个红军战士的心。

“王团长的信号！”

“迂回部队胜利到达预定地点！”

战士们顿时欢腾起来了。

“发信号弹！”我命令通信员。

“通、通、通！”接连三发红色信号弹射向天空。

三颗信号弹仿佛三颗红星在拂晓前的茫茫晨雾中闪耀着光辉。与那一红一绿的信号弹交相辉映。

“总攻开始了！”战士们欢呼。

“最后的一击盼到了！”我松了一口气。

这时山上山下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

只见六连的同志，抡起大刀，端起步枪，在敌人中间飞舞、猛击。右面悬崖上的部队在王团长指挥下，看准下面没有顶盖的炮楼和敌人的阵地，扔下一个接一个的手榴弹。所有的轻机枪和冲锋枪也一齐开火，直打得敌人喊爹叫娘，没死的抢着爬 炮楼，我们哪里肯让他们逃掉，回答他们的是更狠更准的射击。

晨曦中，总攻部队开始过河了，全团的轻、重机枪也一齐向隘口炮楼逃出来的敌人扫射。六连的同志更是威风，现在连步枪也不用射击了，一个个身背马枪，抡起雪亮的大刀，冲向独木桥，向敌人左砍右杀，只看到峡谷里刀光闪闪，鲜血四溅。没用多久，我们就抢占了独木桥，控制了隘口上的两个炮楼。我见初战获胜，便命令总攻部队分兵两路，沿着河的两岸向峡谷纵深扩大战果。

我与部队一起跨过小桥，正贴着崖脚的小路往里冲，突然有人喊道：“政委！”

我一看，路边，与小路平行地躺着通信主任潘锋同志。他的腿上被血染红了。我感到奇怪，负责发出信号的潘锋怎么躺在这里？右边是悬崖，迂回部队已穿过山梁向北压去，没有、也不可能从这里下来呀？我来不及多问，只听他说，冲锋时从山顶上掉下来了。他伤势不轻，我叫卫生员马上急救，并指示担架队一定要把他抬上。

见到潘锋同志，我不由地想到，为什么他们不能早一点给我们发信号呢？经了解，才知道：

原来，毛振华同志率领一连先爬到山顶，只觉到处都是悬崖陡壁，找不到往前和往左的去路，为了寻找道路，可又不能照明，只好摸着黑找。他，一个突破乌江的英雄，便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在前探路，哪知，一步踩空，摔进一个深坑，头部碰伤，但他不顾伤痛，毅然奋斗不懈，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条出击的道路。然而，这却整整花去了大半宿的时间。

经过两个小时的冲杀，我们突破了敌人设在口子后面三角地带的防御体系，夺下了一群炮楼，占领了几个敌人的预设阵地和几个堆满弹药、物资的仓库。全团一边作战一边就地补充弹药，随后向敌人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

敌人退至峡谷后段的第二道险要阵地后，又集结兵力，扎下阵脚，顽固抵抗，企图等待援兵到来之后一齐向我反扑。被我迂回部队截断的一营敌人，这时也疯狂地向我侧射击。我立即命令第五连配合我我崖上的第一、二连，消灭这股敌人。经过连续冲锋，我们把他们压到悬崖绝壁上，随后就缴了他们的枪。与此同时，我们还集中其余所有的兵力向敌人的第二道阵地冲击。在我炮火、机枪的猛烈射击下，经过我二营近一小时的连续冲锋，敌人终于全部溃败了。我们便全部占领了天险腊子口。

这时，溃败的敌人在长长的峡谷里点起了火，由于沟的两侧荒草遍地，古木参天，火乘风势，烈焰腾空，致使噼噼啪啪之声遍山崩响。我们的勇士们仍在追击。他们从

忽闪忽闪的火舌之间跳过去，不给敌人一点喘息的机会。

残敌向岷州方向败退了。我们立即命令第二营、第三营跟踪猛追。一营和侦察连虽爬了一夜悬崖峭壁，又连续打了好几仗，连口饭都没吃，也不肯歇一会儿，仍继续参加追击……

当大队通过峡谷时，只见道路两边到处是敌人的死尸和敌人丢下的枪支、弹药、被服等各种军用物资。宣传队的小同志站在峡谷出口处可活跃了，他们一会儿在道路的两旁贴上红红绿绿的鼓动标语：“追到岷州去，活捉鲁大昌！”

“不怕肚子饿，就怕敌人跑！”一会儿又爬到峡谷的山崖上高呼口号。他们满怀着胜利的喜悦，还唱起了响亮的战歌：

炮火连天响，

战号频吹，

决战在今朝，

……

开展胜利的进攻，

消灭万恶的敌人！

战士们在这歌声中迈着大步，信心十足地向前面奔去。

我们追出峡谷不远，敌人又以大刺山那十里高的山峰为依托继续顽抗，并用密集的炮火轰击我们，企图掩护其主力逃跑。我们便立即分兵两路，从大刺山的两侧插过去，

怎知敌人一见我们向他侧后迂回运动，立即恐慌起来，掉头就跑。

我们加快步伐，追到大刺山下，敌人象老鼠见了猫似的已逃得无影无踪。这时，我们碰见了几个汉族乡亲。这是我们进入雪山草地后，三个月来第一次见到能互通语言的老乡，真是乡音倍亲，喜出望外。他们听说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部队，看到我们的态度很好，非常高兴。我们向他们询问逃敌的去向，他们有声有色地说：“鲁大昌的兵象一群丧家狗，向大草滩跑去了！”并告诉我们去大草滩的路线。我们向他们道谢，送给他们一些刚缴来的衣服、白面后，又向大草滩追去。

逃敌后卫的一个营到了大草滩后，满以为天黑了，离腊子口已有几十里，红军经过一场激战，再也不可能追来了。哪知他们刚要住下，我先头营便赶到，发起了冲锋，直打得敌人乱跑乱叫，死伤满地，东逃西窜，惨败不堪。我侦察连又连夜插向岷州，占领了岷州城东关。甘肃之敌，大为震动，以为我们一定要马上打岷州城了。但次日我们却接到军委的命令，要我们挥兵东去，乘胜占领哈达铺，至此，腊子口一战结束。

腊子口一战，是长征途中少见的硬仗之一，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这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显示了红军战士智勇双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硬骨头精神，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的罪恶计划。

从而，它也就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哈达铺整编

我们四团打下腊子口，追歼残敌的侦察部队又赶到岷州东关，确实给国民党反动派震动不小。听说当时在甘肃首府兰州的官商显要，都收拾起金银细软，带着姨太太准备往西安溜了。就在敌人惊慌失措的当儿，我先头团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挥师东进，到了哈达铺。

哈达铺是甘肃的一个镇子，盛产药材当归，回民占一半以上，据说越往北走，回民越多。中央军委考虑到我们进入了回民聚居地区，为了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给我们临时颁发了《回民地区守则》。这个守则条目很多也很细，除了规定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任意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外，还规定不得在回民住家杀猪和吃猪肉。

我们到达哈达铺时，正是一个晴天的上午。天蓝盈盈的，太阳和煦地照在身上，眼前一片片的庄稼地长着黄橙橙的谷穗，成群的绵羊在山坡上啃着杂草，农民们三五成群地在田里劳动，偶尔还能见到骑在牛背上悠闲的牧童，就差一支牧笛了。哦，这时我才想到，节令该是秋分了。可不，自从去年十月离开江西瑞金，也是一个秋天，快一年了。连日的征战，复杂的地形，差异巨大的西北气候，把我们向来习惯的节令概念搞糊涂了。莫说远的，就在岷

山那边，我们还能见到冰雹、雪花，可仅仅两天的路程，仿佛换了一个世界，现在，看到这金黄的谷穗，绿茵茵的草地，看到这一排排整齐的树木，和煦的秋日的阳光，个个喜形于色，心情为之豁然开朗。

当我们来到哈达铺镇子边一条河坝上集合时，群众主动聚拢来看我们。他们中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其中有汉人，也有戴着白色圆帽的回民，还有几个戴着面罩只露出一张脸的妇女，看来也是回民。他们毫无敌意，笑嘻嘻地看着我们。我们一边向他们打招呼，一边集中传达《守则》，各连政治干部又一次宣讲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趁部队休息的时间，我随先头营进镇联系，当镇上的老百姓听了我们的来意和主张后，都欢迎我们进去，而且主动让出房子给我们住。我们相互问长问短，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

接着，军团首长来了，毛主席、周副主席也率领中央军委直属机关进驻镇里。毛主席就住在小镇上的一家中药铺子里，中药铺离司令部不远，跨过一条横街，拐弯便到。周副主席和司令部住在一起，那是一座低矮的木结构的两层楼房，记得走出门，还有个小小的院子，周围是用土垒的围墙。

红军到达哈达铺，国民党反动派一时未敢匆忙行动，一是可能鲁大昌惊魄未定，近处又无重兵，其次是国民党反动派一时还摸不透我们的底细。趁此片刻，我们又得以

休整。

为了迅速恢复红军体力，红军来了个别致的命令，全军上下，上到司令员，下到炊事员、挑夫，发大洋一块，别看这一块大洋，在当时确实是十分可贵的呢。

哈达铺是甘肃省的边缘，由于交通不便，物产运不到内地，东西十分便宜。一只百来斤重的肥猪，五块大洋就够了；一只肥羊，才要二块大洋；一块大洋可买五只鸡；一毛钱能买十个鸡蛋；蔬菜也只几毛钱一担。加上鲁大昌部队逃跑时丢下的大米、白面数百担，食盐数千斤，足够我们大大改善生活了。尤其我们这些福建、江西、湖南籍的干部战士，很久没闻到饭香了，一见大米、白面，顿时胃口大开。领导上根据当地物质条件和全体同志的体力消耗情况，提出了“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这一下，哈达铺的商人可走运了，生意兴隆，有什么都卖光，而且利市三倍。

我们团部的几个干部，加上通信员、警卫员、马夫，也来了个小会餐，我们找了一户汉族老乡家，借了他们的锅灶，来了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做了不少的菜，真比过年还热闹，我们还请来了房东。

房东大爷是一个谦和的老头。他蓄有短须，讲究礼仪，看来读过一点古书，说话慢条斯理，喜欢引经据典。吃饭时，他坐在我的旁边，动筷举杯，都连称“红军先生，请”，搞得我们很尴尬。酒过三巡，他有了一点酒兴，才随和多

了。当王团长再次敬他一杯，他潜然泪下，解开紧扣的领子，慷慨激昂地站起来说：“红军乃仁义之师，如此尊敬百姓，自古至今实为不多。红军乃天降神兵，一夜攻克天险，自古至今亦属少见。老汉今年六十有七，愿代表乡里向诸位一拜！”说完拂袖离席，右腿屈膝下跪。

我与团长赶快扶起他，连说：“红军是人民的队伍，与亲是鱼水之情！”

“鱼水之情，好，佳句！好，鱼水之情！此话甚好！”他坐回席前，然后摇头喟叹道，“诸位，哈达铺自古是重镇，驻有大兵，远的不说，就说那鲁大昌的兵，一住多年，敲诈勒索，鱼肉百姓。你们初来，就如此赤诚相待，尊敬老人，实令人终生难忘！”

这时他的老伴也凑上来说：“红军先生，你们不走了吧？”

我说：“我们是暂时借住，路过这里，还要北上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

房东老大爷连连说好，同时翘起大姆指说：“有志气，中国有这样的军队，老百姓就有希望了！”

少顷，他又激动地站起来，提高嗓门呼唤老伴道：“去将那坛寿酒取来，七十岁我提前过了！”

“七十岁提前过了？”他的老伴睁大眼睛。

老人见老伴不动，大声吵吵道：“啊呀，妇道人家，你怎么不懂，我今天看到红军先生，不，他们称红军同志，见到红军同志高兴，要和他们同喝寿酒三杯，把那坛子酒

取来，今天借喜席，提前过七十岁！”

“是这样！”老太太这下懂了，高高兴兴地应了声，“好，就来。”随即“蹬蹬蹬”地往屋里跑去。

原来，房东大爷六十五岁那年用糯米自做了一坛米酒，泡上当地盛产的当归，埋在地下陈藏，准备七十岁时开坛，与远在外地的儿孙开怀同饮。今天谈得投机，居然提前献出这坛珍贵的酒了。显然，此时此刻，我们是无法推却的。

在老人家的盛情招待下，我们又一同饮了几杯。我们有的同志站起来，为老人家敬酒。老人家激动得抖动着手白胡子，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连连说：“祝红军北上抗日，旗开得胜！”在相互祝愿中我们散席。

这顿饭吃得时间很长，它留给我的印象也特别深，主要是由于有房东老人爷的参加使我们的会餐增添了新的意义，尤其是那坛珍藏了几年的酒的突然出现，它不仅温暖了我们的心，而且使我们深深感到人民子弟兵和老百姓真是一家人、一条心啊！我们有这样的靠山，这样的后盾，北上抗日又有谁阻挡得住呢！

第二天，在关帝庙前的院子里，党中央召开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由于大家到达哈达铺的第一天都好好睡了一觉，改善了一下生活，擦了擦澡，许多同志还理了个发，所以这天我们碰到一起互相一瞅，也都感到对方比过去精神多了，也年轻多了。人陆陆续续快要到齐了。三三两两凑到一起，叽叽咕咕，笑声不断。

会议开始了。毛泽东同志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走进会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我们仔细一瞅，他们也显得格外的精神。

毛主席挥挥手要大家坐下，然后，笑笑说：同志们，今天是九月二十二日，再过几天是阳历十月，自从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这本身是个伟大的胜利！毛主席激动人心的讲话，使会场上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稍稍停顿了一下，毛主席又说：但是，在胜利面前，我们必须冷静地分析形势，估计形势。接着，他介绍说：

我们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险阻，粉碎了敌人数不清的堵截、追击，也顶住了天上敌人飞机的轰炸，但现在在甘肃等待我们和准备截击我们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西北军还有三十多万人，朱绍良（伪甘肃省主席）、毛炳文、王钧等部在甘肃；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在陕甘；在宁夏、青海、甘肃边境还有“四马”^①的骑兵和步兵。至于蒋介石，态度仍很顽固，他不顾当前的民族危机，

^① 即：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

一直不肯接受我党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提出的中国工农红军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主张，仍醉心于打内战，妄想再次用他的优势兵力，消灭他们认为“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

毛主席说：国民党反动派把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陕西、甘肃一带追堵我们，对红军北上抗日，不能不说是严重威胁。所以，北上抗日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毛主席在形势分析中还谈到四方面军与张国焘。

毛主席说：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反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要躲开矛盾，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讲到张国焘闹分裂对抗中央时，毛主席还特别提到：在关键时刻，叶剑英同志是立了大功的！

毛主席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然后诙谐地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听到这里，同志们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热烈地鼓起掌来。

毛主席又挥挥手，要大家安静，并且说：我们和同志们都惦念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我

们也都在惦念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的，也许在明年这个时候。

此时掌声雷动，大家的心里热呼呼的。毛主席又笑笑说：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

顿时，同志们都静了下来。

毛主席接着又说：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决定部队改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当司令员，我兼政委，下属三个纵队。

于是在掌声中，毛主席宣布陕甘支队编成三个纵队，即第一纵队由红一军团改编，第二纵队由红三军团改编，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第三纵队。

毛主席接着又说：同志们，我们目前只有八千多人，人是少了一点，但小有小的好处，目标小点，作战灵活性大。人少，更不用悲观，我们现在比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毛主席说完，举起一个指头，笑着说：现在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在松潘地区，我们是没收反动土司的粮食、牛羊和购买藏民的粮食，现在我们应该坚持以打土豪、筹粮筹款为主，不能侵占工农的利益。这是人民军队的一条重要纪律。

毛主席最后用洪亮的声音号召大家：经过两万多里的

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红军指战员是一定能够以自己的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战斗经验，来战胜北上抗日途中的一切困难！你不要看着我们现在人少，我们是经过锻炼的，不论在政治上，体力上，经验上，个个都是经过了考验的，是很强的，我们一个可以当十个，十个可以当百个。特别是有中央直接领导我们，这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进阵地！”毛主席挥舞着拳头结束了鼓舞人心的讲话。

“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

“到陕甘根据地去！”

“前进！前进！”

“和二十五军、二十七军会师！”

一时间口号阵阵，此起彼伏。

毛主席的指示，坚定了我们胜利的信心，增添了我们斗争的勇气。

当夜，我们几个团干部到各个连分头传达，召开战士座谈会，回顾一年来长征作战的胜利和体会，有的同志在座谈会上激动地说：“长征好比是个大海，我们从不会游泳到学会游泳，虽然喝过几口水，但毕竟学会了！”有的同志说：“雪山、草地都过来了，眼前到陕北七八百里就都是草滩、雪崖，我们也要走过去。”有的同志看到连里只剩下七

八十人，说：“刚出江西时有一百多人，许多同志没有到哈达铺，在长征路上倒下了，‘北上抗日’的壮志未酬。我们活着的同志责任更重。我们缅怀、悼念牺牲的烈士，继承他们的遗志，在以后的北上征途中要使出更大的力气。”更多的同志表示：今后不管天南地北，党中央、毛主席指到哪里，就跟到哪里；不管出现什么艰难险阻，党中央、毛主席下令，我们就冲、就上！什么路途坎坷、生活艰苦，这些都是小事，北上抗日，能打出个新局面，拯救中华民族，这才是真正的大事！我们共产党员要的是共产主义！

“共产党员要的是共产主义！”这铿锵有力的语言，震撼着我们每个红军战士的心。可爱、朴素，心田透红透红的战士啊，你们的话，道出了千千万万共产党员的心，你们的话，说出了我们的崇高理想！

在哈达铺休息了两天。在这期间，按照毛主席指示，部队进行整编，我们四团编为一纵队的四大队。第三天，九月二十三日，我们精神抖擞地踏上了奔赴抗日征程的最后一段路程。

哈达铺整编在整个一年多的征途中，只是那么短暂的几天，可它给我们的印象却非常强烈。确实，毛主席在关帝庙前那鼓舞人心的讲话，给我们增添了战斗的活力，哈达铺也就因此而成了我们长征途中名副其实的加油站了。

六 盘 山 上

陕甘支队出了哈达铺，连续急行军。我们扬言攻天水，却出敌不意地越过武山来到一个名叫鸳鸯镇的地方宿营。算了一下路程，三天跑了二百多里，同志们顾不得吃饭，一倒下去，便睡着了。

拂晓我们接到命令，要我们立即行动，渡过渭河。

鸳鸯镇到渭河边还有几十里山路，晨雾朦胧中我们就踏上了这条道，由于路窄，地面又滑，忽儿爬山，忽儿下坡，停停走走，走走停停，耗去了许多时间，但听说要过渭河，说那河就是姜太公钓过鱼的那条河，又都给自己的行动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产生了一种喜悦的心情。在行军路上，我就听到两个战士边走边嘀咕，一个说：“咳，渭河这么有名，准比大渡河、乌江大多了，一定挺险要！”

另一个说：“我琢磨，姜太公钓过鱼的河，准是风景好的地方。”

不久，渭河摆在我们面前了。

它既无险要可言，也无秀媚的风景。由于这是上游，河虽宽，但试了一下，水并不深，刚淹到膝，不用筹船动桨，也不用架设浮桥。于是，我们一声令下，卷起裤腿，就蹚过去了。

渡过渭河，战士们神秘色彩也全都消失了。我有意

跑到那两个战士跟前，逗笑道：

“怎么样，这姜子牙钓过鱼的渭河？”

他俩几乎同时回答说：“不怎么样，政委。”

说罢，其中一个又补充道：“可见当年姜子牙钓的鱼不会太大，我们蹚着水就过来了！”

我们紧接着攻占了渭河之滨的陇西，缴获了不少东西，战斗一结束，就把这些东西移交给来接防的二纵队十大队黄祯大队长和杨勇政委。他们看到那么多东西，非常高兴。

我们又继续前进，忽然正前方远处传来了哒哒哒的机枪声。

这时三纵队——中央直属队在陕甘支队参谋长兼纵队司令叶剑英和纵队政委邓发同志的率领下从后面赶上来了，走在前面的是毛主席。再一看，彭德怀司令员早就立在山坡上拿着望远镜在观察了。

毛主席看了看远方，又仔细听了听远处传来的枪声。

不一会儿，在急骤的枪炮声中，可以听出哪是步枪、机枪声，哪是手榴弹、迫击炮弹的爆炸声了。

毛主席十分镇静，仿佛登临一个风景点，正在欣赏周围的山山水水。

一会儿，彭德怀同志走了过去，问道：“主席，你看怎么样？”

毛主席笑笑，说：“我看不是敌人的主力，随便派两个连出去，放几枪，吓吓他们，他们不敢怎么样的。”

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我们的小部队才放几枪，敌人的枪炮声顿时停住了，两翼刚才噼噼啪啪扫得正起劲的声音，几乎同时哑了。

“毛主席真是料敌如神啊！”

“看，毛主席一句话，就把敌人制住了。”

津津乐道的战士们一边走着，一边盛赞着。

毛主席的指挥才干我们真是佩服极了！自遵义会议以后，又和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一样，率领我们红军攻关守隘，冲破重重险阻，夺取一个个胜利，哪次战斗毛主席不是高瞻远瞩，“四渡赤水”可说是个典型的例子了。当时，敌人仗着人多势众，耀武扬威，恨不得一口吃掉我们，毛主席对此了如指掌，带领红军扬长避短，几个来回，就把敌人搞得七零八落，成了战争史上的奇观。当然这是毛主席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掌握了战争的规律，把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结合起来了的缘故。所以，毛主席在红军中享有很高很高的威信。跟随毛主席北上抗日，我们始终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我们大摇大摆地过了漳县，巍巍的六盘山遥遥在望了。

六盘山地跨宁夏、陕西两省。

进了六盘山，风光、气候、居民着装、住房都迥然不同了。

首先见到的田野，是一片连一片的黄土，见不到砖砌的房屋。当地群众全在山边挖个土洞，后来我们才知道这

就是窑洞。在集镇上偶而见到一排排的房屋也都是黄土垒的。无论树枝，房屋，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黄土。放眼一看，到处都是黄的，色彩单调极了。但是，走进这样暖和的窑洞，对我们这些穿着单衣的红军来说，可以说得上是一种享受了，尤其那热烘烘的土炕，真叫我们这些南方战士感到新奇和满意极了。至于那黄黄的小米，吃起来不象大米那么习惯，可总比在雪山、草地上吃野菜、青稞面强过不知多少倍。总之，西北高原留给我们的印象是：豪放，单调，庄严。

九月的最后一天，我们红一大队占领了通渭城。

通渭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县城。这里苍老残破的城墙与我们在西北高原上遇到的城墙一样，是用黄土堆的，几座缺腿少臂的城楼竖在半空，老鸦成群结队地在上面起落，更显得它很孤独。城里只有几十家做小生意的店铺，悬空高挂着古意盎然的招牌。

街上充塞着来往的行人，他们大都是赶集的庄稼人，对敌人飞机的临空和我们的突然来到，也不怎么介意。

天已寒冷，我们还穿着单衣，在通渭附近略作休息。越过西兰公路后，我们兵分三路前进。我们纵队是右路，正好碰到比一个团还要多的敌人，但是一接火，他们便逃之夭夭。这些家伙实在不经打，一触即垮，便招来我们战士的嘲笑。我们越过公路，很快就到达了界石铺。

十月七日下午两点，我们的队伍正向六盘山进发，通

信员策马奔来，迫不及待地在马上报告说：

“队长、政委，纵队首长请你们马上到前面山上去！”

我与王开湘同志立即跳上战马，快速向前，越过一个山坡，只见纵队首长站在那里，聂政委手里拄着一根棍子，凝视着前方；聂政委左边站着的是林彪；左参谋长正举着望远镜在仔细观察。啊，再一看，毛主席也站在山坡上，昂首远望，他穿着一件蓝布长袍子，连日奔波疲劳，脸庞显得消瘦多了。他手里握着一根细细的棍子，在空中点着说什么。他的旁边站着一大队大队长杨得志同志、政委肖华同志，五大队大队长张春山同志和政委赖传珠同志。

我们知道，自从离开哈达铺以来，毛主席和我们纵队首长一起，总是带着一、四、五这三个大队走在前面，每天的行军、作战、宿营都是毛主席和纵队首长亲自指挥的。我们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毛主席。

我与王开湘同志下马敬礼报告。

毛主席这时回过头来笑笑说：“好，都来了，现在说一说。”然后，他指着远方又说，“都看到了吧，隘口下边有个村子叫青石嘴，据确切情报，那里驻扎着敌人东北军骑兵第七师的一个团，有几百匹马，别小看它，我们要消灭这股敌人，不然它拦着我们的去路。”

毛主席这时转过身来，从警卫员手里接过两块饼子，一边把它分成几块，一边问：“都还没吃午饭吧？”

大家点点头。

毛主席爽朗地笑笑，说：“那好，分而食之，打下了青石嘴，再吃好饭！”说完将饼子分给大家。

我们每人从毛主席手里接过一小块，而且都高高兴兴地吃了起来。

毛主席一边嚼着饼子，一边说：“一定要消灭它们，搬开拦路石，一大队、五大队左右迂回，记住，一定要迂回，由四大队直接冲锋！”然后他又转过脸来，看看我与王开湘同志，又说，“四大队是有名的英勇冲锋的红四团嘛，要发扬你们的特点，动作要快，要猛，要狠！”

“是，一定遵照毛主席指示，猛打猛冲！”

这时毛主席从警卫员手中接过水壶，拧开壶盖，倒了一点水在壶盖里，递给我们，说：“你们每个人喝一口吧，喝完了，就去打！”

“是！”我们接过壶盖，仰起脖子，将盖子里的水一饮而尽。

待我们一个个喝完，我望望纵队首长，问：“首长还有什么交待的吗？”

纵队首长摇摇头，说：“没有，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

毛主席痛快地说：“那好，交代完毕，分头执行，我在这里看着你们打！”

我们辞别毛主席，骑上马。虽然西北高原的秋风尖利，可心里暖洋洋的，挥鞭策马，一会儿便回到了大队。

同志们一听说有仗打，而且是毛主席亲自指挥，还听

说毛主席特意提到了我们是有名的英勇冲锋的红四团，鼓励我们发扬过去优良的战斗作风，大家的情绪可高了，在我们召开的动员会上，纷纷表示：一定要打好青石嘴这一仗，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

不用我们再多说什么，部队便斗志昂扬地投入了战斗。我们以飞快的速度，悄悄翻过垭口，正面接近垭口下的村庄青石嘴。

这时，一大队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北边迂回插进青石嘴后边，五大队也迂回到南边，截断平固公路，形成了一个钳形包围，敌人骑七师的这个团^①便成了瓮中之鳖。

一声枪响，我们大队分路出击，一齐压向敌人。伴随着千百人的喊杀声和枪炮声，一刹那，我们就冲进了青石嘴这个山村，这时敌人正在开饭，几百匹马系在村头来不及解，他们就被我们打死的打死，缴枪的缴枪了。那膘肥、高大的战马，自然也就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战斗不到半个小时，我们三个大队胜利会合了，与缴获的花名册一对照，人员、马匹，一点不少。我们大队一清点，还发现多出了十多辆马车的子弹和军装，还有大批的布匹。原来，这是“西北剿总”送来的东西，这里的敌人刚刚收到，没想到，他们还未来得及享用，就全部“移交”给我们红军了。这些马匹，后来按照毛主席和纵队首

① 即敌人东北军骑兵第七师的王牌，骑兵第十九团。

长的指示，我们把一部分交给一纵队侦察连，大部分交给了纵队，由纵队组建了红军的骑兵侦察连。我们的骑兵侦察连有了那么多马匹，“气”可“粗”了，以后又逐步扩建，组成了一个骑兵营。至于那些军装、布匹，除我们少量留下一部分外，其余的都按照纵队首长指示上缴和发给了伤病员。至于那些俘虏，经过政治思想教育，说明我们红军的宗旨，凡是觉悟过来了的也都高高兴兴地自动参加了红军。

战斗结束以后，刚打扫完战场，军委就指示我们大队前进二十里宿营，并命令我们明天向环县方向前进。我们又立即出发了。战士们举着的红旗在迎风招展，我们队伍象奔腾的铁流涌向前方，此情此景，真是壮观万分，我们的心情也实在难以用语言表达。正象毛主席后来写的这首诗^①：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① 即《清平乐——六盘山》，作于一九三五年十月。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连长王友才

西北高原是黄土的世界，这话一点不错。

自从进入甘肃东部，尤其进入了六盘山，这黄土的印象更为突出。看，这土是黄的，屋是黄的，连这山也是黄的。我们到那里时，阳历十月，正是深秋，在南方，在我们江西、福建老苏区，正是晚稻飘香，一片翠绿，可在这里，我们眼前的西北高原，到处都是黄的，顺着这绵延、寂寥的黄秃秃的土山，走了好几十里，却看不到几株翠绿的独立大树，更找不到一块完整的绿地。有时风也是黄的，可不，大风一起，旋风中夹着黄沙，弥天盖地。

天刚蒙蒙亮，我们这支红军队伍，在黄土高原上徐徐前进。翻了一道岗，又过了一条沟。这里的沟深且宽，下沟，再翻到顶上有时要花费一两个钟头。但是大家的情绪始终是高昂的。队伍就象一条银灰色的带子，沿着凹凸不平的土路；弯来绕去，向东北方向延伸着。

我一边行军，一边和王友才同志谈话。

王友才同志又犯老毛病了——打了人。王友才在乌江架桥、智取三县、飞夺泸定桥、突破天险腊子口等战斗中

都立下了战功，是全团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广东人，当过海员，在大洋上漂泊过，不堪压迫，投入了红军。他二十四五岁，中等个子，皮肤黝黑，显得有些瘦，但很结实。他作战勇敢，观敌料阵很有经验。哪里是敌人的薄弱环节，哪里能够冲上去，他一看就知道。战士们说，跟着王连长打仗吃不了亏。可是战士们非常怕他。很可能是四处漂泊的海员生活给他打下的烙印，他爱骂人，有时还打人，政策观念不强。长征途中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次宿营，是在回民的村庄，上级通知不准吃猪肉，团里还专门发了个书面通知。他识字不多，叫连部文书念给他听，那文书从南方过来，搞不清在这里吃不吃猪肉的政策性很强，马马虎虎地念了一下竟把“不准吃”念成“准吃”了。王友才一听自然高兴得很，弄了一头猪来，宰掉后就让全连改善了一顿伙食。哪知，他们还没吃完，团长王开湘同志推门而入，劈头就问：

“你们怎么吃猪肉？”

“团里通知准吃啊！”

“什么‘准’吃？把通知拿出来——”

把通知拿出来了，团长指着不准吃几个字念了一遍。王友才噘着嘴说：

“刚才我听得清清楚楚，文书念的是‘准吃’嘛。”

团长对他进行了批评。

团长一走，倒霉的文书回来了。王友才二话没说，照

着文书啪啪两个耳光。

为了这次打人，我们撤了王友才的职，把他放在团部通信排里，跟着潘锋他们一起行军。即便如此，王友才也还是成天乐呵呵的。

象这样的撤职，对他已经是好几次了。他有句口头禅：

“打一仗我又是连长，现在让我休息休息。”

这倒是真的，打起仗来，在关键时候，他总能出奇制胜。对他的机智、勇敢，我打心里喜爱，就是撤了职时，也放在团里保存起来。但对他思想作风的毛病，也从不放过。他是很有些怕我的。

这时，我对他说：“王友才，你又打人了？”

“我昨天实在忍不住了。”

“你违犯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几条？”

“……”王友才知道犯错误了，眨着眼睛。

“你这样对吗？”我又问。

“不对，我以后改正。”他态度诚恳。

“你就是这个毛病，这个毛病改了，你就全好了，一弄你就发火，一弄就胡来。”

他用拳头敲敲自己的脑壳，说：“唉，火头一上来，我就沉不住了！”

我说：“那怎么行啊！你不能老是当了连长下来，下来了又当连长啊！”

“政委，我以后要是不改……”他要发誓赌咒了。

诚然，他的检讨是发自内心。但要改变多年来形成的秉性，也确实很难。我就给他讲道理，说明我们长征一结束，要迎接抗日高潮，红军就好比是火炬一样的，要去点燃全国的革命之火。每一个指战员都肩负重任，都要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去完成新的任务，挑起历史交给我们的重担。时时刻刻不要忘记了，你是共产党员。

我边走边和他谈话，不知不觉天已蒙蒙亮了。这时，便衣侦察员跑来报告，说：“前面发现敌人，正向我们这边走来，离我们只有三四里路了。”

我和大队长王开湘同志立即登上右边的山头，只见它和左边那个山头夹一道川，川道上，敌人哩哩啦啦拖着一条很长很长的队伍，人数还真不少。看样子他们还没发现我们。经研究，我们决定布下一个口袋，给敌人来个伏击。即：机枪连和一个步兵连占领右边高地，另一个步兵连占领左边高地，等战斗一打响，让他们从两边用火力压住敌人，我们再用两个步兵连和一个侦察连对着敌人的行军队形猛冲，首先冲垮他，然后再一鼓作气地猛追。

我转身对旁边的王友才说：“王友才，你带着侦察连冲过去！”

王友才一听要打仗，嘴巴裂开了，说了声“是”，就回连去了。

很快，左右两边山上和川里枪声大作。

“冲啊！”山谷里顿时腾起雷鸣般的响声。

别看敌人不少，全是些不中用的东西。我们乒乒乓乓一打，再加上那惊天动地的喊杀声，他们就懵了。这时，我们顺着川道压下去的步兵连和侦察连，真象猛虎扑羊群似的，势不可挡。王友才冲在最前面，见一个，撩一个，见一对，打一双。不到半个钟头，就结束了战斗。一清理战场，我们这才知道整整消灭了他们一个团，找俘虏一问，才清楚，他们是甘肃省主席邓宝珊的队伍，整整两个团，三千多人。他们是奉命从庆阳出来去加强东北军骑兵师的，可惜还未到达目的地，就撞在我们枪口上了。敌人后面的那个团，听到这里枪声激烈，顺着来路一溜烟向庆阳方向逃之夭夭了。

被我们抓住的一个军官说：“谁也没有想到你们红军来得这样快，我糊里糊涂就当俘虏。”

我们还没来得及向纵队首长报告，聂政委、朱瑞主任就骑着马赶上来了。聂政委勒住马缰，问道：

“怎么回事？”

“刚才和敌人遭遇了，战斗已结束。消灭了敌人一个团。”我说。

聂政委、朱主任似乎不大相信。聂政委疑惑地问道：“一个团？都解决了？”

“对。歼灭了一个团，敌人后面还有一个团已掉头向庆阳方向跑了！”我又补充道。

纵队首长愣住了。原来，这个仗，是个遭遇战。我们

也没有思想准备。

我和王大队长接着又陪着聂政委和朱主任看了看抓到的一大群俘虏和缴获的武器，他们仿佛这才相信我们的话是真的，也都高兴地笑了起来。然后又命令我们：把俘虏和缴获的武器交给后面的部队，继续向预定的目的地前进。

这时红日高照，云淡天高，风轻气爽，部队的士气非常旺盛，在黄土高原弯来绕去的道路上，拉开了行军队形。刚刚发生的战斗，象个小插曲似的成了大家议论纷纷的话题。

我又看到了侦察连长王友才。嘿，他可得意，帽子都推到天灵盖上去了。是啊，他身经百战，却没有负过一次伤哩！我打心里喜欢这个常胜英雄，但我还是敲了敲他的警钟：

“王友才，打了胜仗，可不准翘尾巴。”

他高高兴兴说了声“是”，带着几个侦察兵到前面去了。

我在想：我们这支红军队伍，有的来自贫苦农民，有的来自产业工人，有的来自自由职业者，也有的是从国民党反动军队里过来的，还有的是背叛了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后来到这里的，文化水平，思想觉悟，生活经历都各不相同，他们也都带来了各式各样的思想烙印，象在乌江树立卓越功勋的神炮手赵章成同志就是从旧军队来的，他也不也成了红军的骨干，照样带兵打仗，当然，开始时他还信神信佛，象个虔诚的不忍杀生的佛教徒，可是后来不也变

了么。象王友才，又是另外一种典型。革命战争的烈火陶冶了这些战士，若干年以后，当他们回首这些往事，一定会觉得起初我们在政治上是多么幼稚啊。我作为一个政治干部，深深地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毛主席制订了一系列治军原则，可我们执行得还很不够。

我这样想着，再看看王友才，他已消失在去河连湾的大道上了。

我们翻岗越沟，不知不觉地来到了白杨城附近。

白杨城是个小城，城内总共四五十户人家，有几家店铺，有卖香烟、杂货的，有卖茶叶、黄豆、炒粉的，也有卖馒头、糕点的。我们在镇子外边刚要休息，忽然听到嗡嗡的飞机声，部队连忙疏散防空，可是目标仍然很大。这主要是因为黄土高原，没有什么遮盖，加上昨天青石嘴缴获一批高头大马，今天刚又消灭了邓宝珊的一个团，早就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敌机临空后，肆无忌惮地直接向我们的部队俯冲，又扫射又投弹。我们只听到轰轰几声巨响，接着地动山摇，人喊马嘶，有的同志负伤了，有的战马被炸死了。王友才同志又出现了。他临危不惧，在那里积极抢救战友，那一举一动是多么感人啊！然而，这一天的战斗实在紧张，我们也没有来得及仔细看看白杨城的全貌，就匆匆离开了。

英雄捐躯河连湾

我们绕经环县、曲子镇，晓行夜宿，长驱东进经过几天的行军，来到河连湾。

这正是黄昏时候，远处一架土山顶上露出半轮红日，透过一团薄云，黯淡的红黄色的日光照着百十户人家的小村镇，这里的房舍，除窑洞外大多是平房，墙全是土打的或土坯垒的，房顶也是用黄泥抹的，一律坐北朝南，北墙均无窗户，从房头向前伸出两堵土墙，显得十分简陋。这千篇一律的建筑都在说明，这里经常受风沙的威胁，这个威胁来自几百里之遥的大沙漠。然而，眼下对我们的威胁是，这个村镇的一头，有个土围子，一股民团和地主武装龟缩在里边，不时地向我们放冷枪。

我们的大队部刚驻下来，就听到前面枪声大作。一听那声音，我就知道部队在打土围子。

过了不久，一个同志跑来报告说：一连长毛振华同志中弹。

我大吃一惊，忙跑到前面去。

毛振华同志一动不动地躺在一间土屋的门前，头上流着血，子弹是从额骨打进去的，他静静的象是熟睡了似的紧闭着眼睛。

我用双手托起他的头大声呼唤着：“毛振华！毛振华！”

他没有回答。他永远不能回答了。我用手伸到他的衣服底下，尚有余温，可他的心脏却已停止了跳动。

毛振华同志的牺牲，是我们的一个很大损失。我非常痛心，放下烈士的遗体，抬头见一连指导员站在一旁，便大声地问：“指导员，你们怎么搞的！”

指导员也很难过，沉痛地说：“战斗打响了，毛连长要上……”

我劈头盖脑地打断了他的话：“他要上你就让他上？哎？”

“我……都怨我！”他滴下泪来。

我还是怒不可遏，继续说道：“为了这么个破土围子，牺牲我们的好连长，值吗？这个仗完全可以不打，用火火把敌人控制起来，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这里了，你们偏要打这一仗！”

指导员自知错了，更加难过。他默默地低下了头。

是啊，我们的英雄——毛连长象一颗明亮的星陨落在了河连湾，多叫人心痛！不错，对一个红军战士来说，在夺取伟大胜利的最后一刹那，把火红的战旗插在敌人最后一个阵地上，一颗飞弹穿透了他的头颅，他会在红旗下含笑而死的。可是，河连湾土围子，一股土顽，算什么东西！而毛振华强渡乌江时，是他率队先头偷渡，在敌人鼻子底下潜伏下来，有力配合强攻部队夺取滩头阵地，立下不朽功勋的。这在红星报上金榜题名，已誉满全军了。在天险

腊子口，又是他带头翻山开路，迂回到敌人的背后，为红军突破天险立下了头功。就在前几天，即哈达铺整编之后，他和我谈起他的老军长贺龙同志时，那种喜悦的心情也深深地感染了我。他谈到了与二方面军胜利会师时，见到贺龙同志的情景，又谈到了几路红军会师后的盛况，我们还一起憧憬着未来的革命形势，那兴致是多么高啊！

毛振华同志是湖南人，高个子，人比较瘦，非常果断，比我大几岁。他参加南昌起义时，给贺龙同志当勤务兵。起义的队伍被打散了，他化装回到家乡，一九三〇年我们打长沙时他又找到了自己的队伍，从那以后就转战湖南、江西、福建之间，表现一直很好，堪称楷模，为全团上下所称道。

就在前天的行军路上，我在一连队伍里，与他并肩走着，他还说：“杨政委，贺总指挥有把金调羹，在潮州三河坝失败时我给他丢了，见了面我怎么交代呢？”

我说：“嘻，贺总指挥看到你不知该怎么高兴呢，还会向你耍那把调羹？”

他接着嘀嘀咕咕又和我谈了一阵。我这才知道，那把金调羹，在南昌起义时的确是贺总指挥的一件心爱的小玩意儿。他叫毛振华同志给他保存着。可是失散以后，毛振华什么都跑丢了，哪还能顾得上那金调羹呀！然而，就在那件小物品上，寄托着毛振华同志对贺总指挥深深的怀念啊！

的确，毛振华同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指挥员，完全可能成长为一个很有才能的将领。他勇敢、机智、沉着、果断，有着非常美好的内心世界。可是，他在这黄土漫天的小镇上献出宝贵的生命，才刚刚二十多岁啊！

我、大队长王开湘同志，副大队长张仁初同志，参谋长季光顺同志，总支书记罗华生同志，都围在这位烈士遗体的周围，还有连里的干部，大家肃然无声。

卫生队军医范英武和李智广同志小心翼翼地擦净烈士身上的血迹，把血染的军衣脱下来，换上一套干净军衣。啊，振华同志，请你原谅，没有新衣服给你换上，只好打开你的小包袱，拿出你亲手洗净的爬腊子口悬崖穿的这套旧军衣。我们觉得，尽管这是旧的，但只有你配穿上这军装！因为你是强渡乌江、突破天险腊子口的英雄啊！

夜深了，从大沙漠刮过来的寒风卷着尘埃，在天空飞舞，发出呜呜咽咽的响声。

茫茫黑夜里，一连的战士们，还有不少其他连队的战士，也悄悄来了。大家站在旷野里，对着挖好的墓坑，一语不发，只听到北风在疯狂地怒吼。

烈士的遗体，抬到了墓旁。

大队长和我难过地最后看了看和我们永别了的战友，站在挖墓坑积起的松土上，我向战士们说道：

“毛振华连长，是我们的好连长！他渡乌江立了大功，得了奖。腊子口一仗他又立下了大功。他是带兵的模范，

打仗的英雄。他的牺牲，是我们这支队伍的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个好战友，党失去了一个忠诚战士。按说，这次战斗他本不该牺牲的，但他牺牲了。我们要接受这个教训，要尽可能地避免那些不必要的牺牲。但是打仗就免不了要流血，要牺牲。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学习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完成烈士未竟的事业。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把革命进行到底！”

接着，王开湘同志也讲了话。他最后说：

“……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毛连长。”

烈士的遗体安放在墓穴里，我总想向墓穴里多看几眼。亲爱的战友，你在这里安息吧。你驰骋近十载，征战几万里，几乎踏遍了祖国的青山绿水，在十几个省里都留下了你的脚印，如今你躺在这黄土高原上歇着了，永远地歇着了。放心吧，你要做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去做的。

我用双手捧起一捧黄土，轻轻地撒在烈士的脸上。

王开湘同志也捧起了土，从那撒土的动作上，可以看出，他的手在剧烈地颤抖。

一锹一锹的黄土，在烈士遗体上积起来。平地上出现了一座新坟，我们在坟头上树起一块木牌，上面写的是：

毛振华同志之墓

拂晓前，二纵队彭雪枫司令员、李富春政委赶到河连

湾。我们向他们报告了敌情，报告了毛振华连长的牺牲经过。他们听说毛连长牺牲了，都很悲痛，让我们带他们到烈士墓前，脱帽致哀。

我们把包围土围子的任务交给二纵队后，怀着悲愤，又继续前进了。

我看了看敌人的土围子，暗暗发出誓言：总有一天，我们要把你们这些凶神恶煞全部消灭。你们等着吧，这一天会很快到来的。

长征胜利万岁

十月十四日我们到达洪德城，十七日到达陕甘交界的老爷山。

老爷山有一座古庙，三间庙宇均是用火石和红砖砌成，远远望去，十分壮丽。听说这个庙在甘肃、陕西、宁夏都有点名望，庙里除有几个和尚长年供奉香烛之外，还有不少善男信女长途跋涉来此敬神。山上有口井，虽无水源，但有水。那水全是下雨时的积水。我们南方人觉得稀奇，北方同志却不以为然，说这里的井大都如此。我们进庙，和尚十分客气。他告诉我们说，由于此山很高，又地跨三省，处在甘肃、陕西、宁夏的会合处。为此鸡鸣一声，三省皆闻。故此庙又有“鸡鸣三省的老爷庙”之称。我们也讲了讲，到此地只不过是路过，并无他意，目的是北上抗

日。于是，稍稍歇了一会，我们就动身了。由于我们对神台、庙宇秋毫无犯，临行时，和尚还合十礼拜送行。

我们红军素来反对迷信，但对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认为那是他们的自由，从不干涉。长征途中，我们的所见所闻，可以说是多得数不清，但无论碰到何种庙宇都未予损坏，至于那些喇嘛、和尚、神父……我们也都尊重他们。为此，红军得到了佛教、回教、天主教徒的拥护，单在甘肃一省，沿途就有近百回民子弟自动参加了红军。他们入伍后，我们不管怎样困难，也都注意尽力创造条件，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

离开了老爷庙，我们继续东进，不多久便踏上了陕甘两省分界的子午岭。这里往东，地势显然渐渐低落。十月十七日，我们快马加鞭经过铁边城附近，来到了一个叫作元城的地方，便就地宿营。这个村子不太大，既无城墙，也无集市，怎么叫作元城？我有些纳闷，向一位老人一打听，才知道，很久以前，这里是重镇，人很多，由于屡次反对官府，遭到镇压，几乎被官兵杀光了。到元朝时，这里又聚居了几千户人家，而且筑起了城墙，定名元城。明朝末年，闯王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曾在这一带积极活动，元城的很多好汉，也都跟着闯王杀到了京城。但是不久闯王事败，元城遭到血洗，连周围数百里的平民百姓也未能幸免。从此，这里的城墙被平掉了，这里又沦落为一个村庄。然而人民是斩不尽、杀不绝的，如今回、汉人民

又聚居到这里，城墙虽然没有，但他们心底的墙依然存在，这村子又叫起老名来了。

我望着这小小的村庄，不禁肃然起敬。我们兄弟民族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是有着多么悠久的历史啊！难道先辈们反压迫、反剥削的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夜晚，战士们睡得很迟，熄灯号吹响了，尚有人在叽叽咕咕，要在以往，这种情况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是不是老人介绍村史带来的激动？是，但又不全是。因为大队长提醒我，还有几十里就要到吴起镇了。是啊，快到陕北抗日根据地了，这怎能不让我们的战士激动！

十月十八日这一天，进吴起镇之前，我们刚翻过一个小坡，带路的同志指着前面的一个村庄，说那就是吴起镇时，队伍中顿时沸腾起来了！

“吴起镇到了！”同志们欢叫着冲着跑了下去，看到这个欢乐、热烈的场面，我们都很高兴。

是的，我们红四团的指战员和整个红军一样，经过万水千山，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经过无数次残酷的战斗，忍受了一切物质生活上的困难，不少同志流了血，许多战友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我们现在终于到达了北上抗日的根据地——陕北的吴起镇，怎能不兴奋、不激动呢？

吴起镇披着灿烂的阳光在欢迎我们。

我们在蓝盈盈的天空下，列队进入了这个镇子。我们

早就听说，吴起镇是为了纪念战国时代名将吴起的功绩而命名的小镇。可是走进镇子一看，除了一条小河，一排古老的窑洞之外，却看不出有什么纪念吴起的古迹，倒是一个窑洞口旁边挂着的一块牌子吸引了我们。

啊，原来这里挂的是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子。

苏维埃！多么亲切的名字啊，见了她，象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可不是，自从去年离开瑞金、于都河，无论在巍巍的雪山上，还是在茫茫的草地上，不管是在怎样艰难的日子里我们都惦念苏维埃。如今，在陕北吴起镇的窑洞门口，终于又见到了这个名字！

区、乡苏维埃政府的同志来了，我们互相祝贺、互诉衷肠。

没隔多久，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中央领导机关的同志也来到了吴起镇。我们红军刚想在吴起镇安营休息，怎知敌人又追上来了。

自从过了哈达铺，我们为了保全和发展自己的力量，迅速北上抗日，一般不和敌人硬打，尤其进入陕北后，更是如此。除非敌人穷追、拦阻，惹怒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给予还击，搬去前进路上的障碍。

然而，进入黄土高原以来，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一直尾追我们。到了吴起镇，他们更是追而不舍。还有鲁大昌——我们在腊子口交过手的这个手下败将也匆匆赶来了，妄图报复。

经过甘南急行数百里的红军部队，减员不少，给养困难，又初到天气寒冷的西北地区，极需休整。但是为了保卫边区人民的革命胜利果实，中央军委决定，给敌人一次沉重的打击。毛主席亲自指挥了这一仗。

这是十月的一天早晨，秋高气爽，太阳还没有升到头顶，毛主席率领部队进入吴起镇一带的山头阵地。我们一纵队四大队担负着迂回敌人左侧的任务，一路上只见兄弟部队也都进入各自的伏击阵地。

八时整，我们埋伏在川道左侧的山沟里都有些急了，这时突然见到前方川道里冒起一团团尘土，我与大队长王开湘同志各自拿起望远镜仔细一看，嗨，果真马大胡子的骑兵来了，一队接着一队，还真不少。

战士们在一旁手里握着枪，眼睛紧盯着川里，从他们的神情可以看出，此刻谁都心里痒痒的，恨不得一下扑过去，将敌人彻底消灭。但是，这次是联合行动，必须听从统一指挥。我知道，现在两边山沟里，数百挺轻、重机枪都等着他们，只要一声令下，便可见到万马奔腾，千钧雷霆之势。这时，我习惯地转过头去，看看后边阵地。

突然，“啪！”山谷里响起了清脆的枪声。

刹那间，两边山沟里的轻、重武器一齐吼叫起来，两厢伏兵一齐杀了出来。敌人此时才知道进了我们的伏击圈，但已经晚了。我们一个迅猛突击，把走在前面的那个团打了个七零八落。受惊的马狂奔乱跳，敌人无法控制坐骑，

纷纷从马背上跌落下来。有的腿还挂在脚蹬里，硬给马拖着跑了。敌人后边的三个骑兵团，阵势还没有摆定，一家伙就给他们自己的败骑冲散了。真是人喊马嘶，不打自垮。我们就这样轻轻松松地消灭了敌人一个骑兵团，打垮了敌人三个骑兵团。在打扫战场，清理缴获的文件中，我们看到了蒋介石的密电，电报称：

“……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命令你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

“红军长途行军”“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这话都不假，但却是我们“相机包围”了蒋介石的骑兵，并把他们给歼灭了。

谁知道，这就是我们长征中的最后一仗啊！这一仗，宣告了一年来蒋介石“追剿”计划的彻底破产。但是我们也付出了代价。除伤亡了一些同志外，原团参谋长现二大队大队长李英华同志也壮烈牺牲了。他是在哈达铺整编时由四团调到二大队去的，在此之前，一直在我们四团任参谋长，我们天天生活、战斗在一起。长征途中，他组织司令部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我怎么也忘不了他！

就在我们回击二马^①骑兵的同时，军委警卫连、工兵连在左权参谋长的率领下，也拔掉了陕北最反动的地主豪绅安在千佛山的一根钉子。原来那里有一股反动民团，经

① 即指马鸿逵、马鸿宾。

常下山来作恶，当地老百姓恨之入骨，这次把他们消灭了之后，附近各县的乡邻全都拍手称快，他们欢天喜地，抬着猪、羊来慰问红军，红军的威信更加高了。

打完二马骑兵，我们在吴起镇边休整了一个星期，十月三十日，在陕甘根据地人民的热烈欢送下，我们又向陕北甘泉前进。经过几天的行军，于十月革命节前夕，即十一月六日，在甘泉县附近的区域里，我们中央红军与刘志丹、徐海东同志率领的红二十五、二十七军会师了。虽然那天天降大雪，我们仍穿着单衣，但情绪很高，心里始终觉得是热呼呼的。

吴起镇战斗之后，有一天，我和王开湘同志由于事先接到通知，要去参加中央召开的全军干部会议，而这个会为了防止敌机骚扰，确定天一亮，就在吴起镇附近开。于是便从驻地骑着马直奔会场。

天虽奇冷，但我和王开湘同志不知性急还是怎么的，骑着马一口气跑三十多里地，一头是汗。路上碰到了我们的老首长邓小平同志，我们赶紧勒马下来，向他敬了个礼。小平同志与我们热烈握手，然后问：“你们驻扎在哪里？离这多远？”我们一一作了回答。他又问道：

“听说你们团在青石嘴一仗，缴了敌人不少布？”

“是的，上交了不少，还留了一点。”我说。

小平同志说：“关心一下宣传队的同志，给剧团的小鬼每人做套衣服怎么样？”

“好，照指示办！”我回答得很爽快。

小平同志高兴地笑了，又说：“讲妥了，一言为定！如
有多，还可以给机关同志添件衬衣。”

我点着头说：“好，我回头派人给送去。”

我们牵着马跟着小平同志，边走边说，不一会儿，就
到了会场。

太阳快要出来，人已到了不少。司令部，政治部，供
给部，一纵，二纵的同志已把一个晒麦的场子占得满满的
了。

这个地方本来就不大，只几十户人家，这里四周有土
墙，墙外长着几株大树，正是天然的屏障。

会议还未开始，会场里熙熙攘攘，许久不见的同志相
互寒暄、敬礼、握手。我找了一个靠墙的地方坐下。

天刚蒙蒙亮，会议开始了。

毛主席、周副主席、张闻天总书记、彭德怀等同志先
后走进会场，会场里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同志首先讲话，他说：“同志们，辛苦了！”话音
刚落，顿时响起了热烈的口号声。

是的，今天在这里开干部会，同志们格外兴奋。毛主
席、周副主席、张闻天总书记，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领导
同志和大家一起，度过了长途跋涉、征战万里的艰难岁月。
你们——党的领导人，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党
的事业，为了红军的胜利，不知疲倦地操劳着，全都消瘦

了，花去了多少心血啊！你们在这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运筹帷幄，把我们从一个胜利引向一个新的胜利，是多么不易啊！要说辛苦，你们最辛苦了！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和同志们一样，十分激动。

毛主席接着说：

“从瑞金算起，十二个月零二天，共三百六十七天，战斗不超过三十五天，休息不超过六十五天，行军约二百六十七天，如果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止二百六十七天。”然后，他扳着手指说，“我们走过了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

“长征万岁！”会场里刹时升起欢呼声。

“二万五千里长征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

毛主席打断口号声继续说：“二万五千里中，红军占领了几十个中小城镇，筹款数百万元。扩红数千人，建立了数百个县、区的苏维埃政府，我们走遍了五岭山脉、苗山、雷公山、娄山、云雾山、大凉山、六盘山，渡过了于都河、信来河、潇水、湘江、清水江、乌江、赤水河、北盘江、金沙江、大渡河、白龙江、渭水河，经过了苗、瑶、彝、回、藏等兄弟民族地区。我们完成的空前伟大的远征，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毛主席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接着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

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我们越听越激动，越听越高兴，深深感到：胜利来之多么不易！

这时太阳在天空露出了笑脸，阳光灿烂，也许是由于刚才骑马狂奔出了阵汗，衣服湿了，现在骤然一热，我身

不由已地打了一个寒噤，但还继续听着毛主席的讲话，只觉得周身的热血直往上涌。

毛主席这会儿打着手势，说道：“同志们，长征我们胜利了，但是损失也是巨大的，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时有十万人，现在大约只剩下一万人了，人数虽少些，但留下的都是中国革命的精华。现在中央红军又与陕北红军、陕北人民一起，担负着更艰巨的任务，我们今后要更好地团结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

听完毛主席的讲话，大家异常兴奋，纷纷表示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最后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同志宣布大会休息一下，休息后全体进行盛大会餐。

恸悼王开湘同志

听完毛主席的总结以后，我感到浑身发冷，没有参加会餐，向杨尚昆主任请假。杨主任说：“那好，你回去吧，路上要当心。”路上，我又淋了一阵大雨，回去后一头躺在热炕上，一冷一热，便得了伤寒病。

大队长王开湘同志参加会餐回来，第二天也病了，病势来得比我还猛。他要到卫生部医院去了。我抱病到门口送他，叮嘱他好好养病，告诉他把病养好，还有新的任务等着我们哩。开湘同志话不多，他那深挚的感情，全从目光里流露出来了。他向我，向季光顺和一起送行的同志连连

点头，并叫我赶快回屋里，莫又冻着。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我们这一对自四渡赤水以来朝夕与共的老战友之间的诀别。

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转战，我们的体质自然都差多了。我们都没经得起伤寒病的袭击。

我治病住的村庄，离部队有十几里，军团医院离我们也有十几里。为了照顾我，组织上派了军医李智广同志跟着我，除他外还有马夫谢金才，警卫员钟学林。原来的警卫员白玉林这时下连当干部了。

我一发烧就烧得非常厉害，终日昏昏沉沉，睡在土炕上，裹着那条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薄薄的被子。

军医李智广同志，对我非常关心，当时药品奇缺，小小的药包里，只有酒精、苏打水，还有从云南敌人手里缴来的白药，那可算是万能药了。然而也不多，除了留下一点应急的外，只能给团级干部发一包，负了伤就撒上，然后用绷带绑起来。李医生的那一条绷带也是不知给多少人用过多少遍，洗了多少次了。但他始终还是保存得很好。我发高烧时，他昼夜守着我，不断地把冷毛巾放在我那烧得烫手的额头上。

我一连几天只喝一点点水，始终处于半昏迷状态，一会儿觉得象腾云架雾一样，一会儿又象是处身于硝烟弥漫的战斗中。每次昏迷过后，我睁开眼睛，只见李智广同志坐在旁边，轻轻地说：“政委，你又说胡话了。”

当我神志清楚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了些什么？”

李智广笑了笑，说：“你呀，有时喊某个连长的名字，有时喊‘冲’，有时伊里哇啦地听不清楚。你有时还使劲地抓住我的手，似乎那样可以减轻痛苦似的。”

这次，病魔缠身，多亏李智广同志专心地照料了我，护理了我。要不，也真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呢！

李智广同志，我熟悉，他是河北人，参加过旧军队，我们在苏区反“围剿”时，他参加了红军，一直表现很好。在漫长的征途中，他担任团卫生队副队长，救死扶伤，工作认真负责。过去，我几次找他谈话，说他应该争取入党，但他说自己是个医生，以医疗为本职，又不担任什么领导工作，入不入还不是一样，所以一直没有入党。但是他有一副热心肠，对同志就象一团火似的。

眼下，他就这样昼夜陪伴着我。

就在这样一个时刻，突然噩耗传来：王开湘同志逝世了！我掀掉身上的薄被，猛地站起来，摇晃了几下，但还是站稳了。我大喊一声：“备上马！”

李智广同志劝阻我，说外边下着大雪，又这样远，跑一趟会使病情加剧的。我哪里还听得进这些话？我要去，我一定要去！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去见一见我那亲密的战友开湘同志，哪怕是最后一眼。

我实在不敢相信，开湘同志真的从此永远离开了我们。

可不，就在毛主席进行长征胜利的总结大会上，他还

是那样兴致勃勃的嘛！

就在我们到达吴起镇地区的那天夜里，我们两人还谈到深夜，都被长征的伟大胜利所鼓舞、所激动。惯于控制感情，稳健、老练的开湘同志，不也打开了感情的闸门，久久不能入寐吗！我们谈啊谈啊，我看了看怀表，时针指在两点上，便轻轻地说：“老王，不早了，睡吧！”

“好，”他应道，但一会儿，又说，“总算到这一天了，我们到达陕北根据地了！”

虽然黑洞洞的屋里没有光线，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是从他的声音里我听得出，他十分激动。

“政委，”他继续说着，“往后，怎么安排？打日本，抗日？打完了日本，还干什么？建设国家？建设共产主义！”他越说越兴奋，以后干脆坐了起来，披上了衣服。

我知道，这是他的老脾气。在这个时候，要是你不奉陪，他准会大声吵吵，甚至伸手把你从炕上拖起来。何况，我现在心里也浪花四溅呢。于是，我推开被子，霍地坐起，笑着说：“好吧，奉陪到底！”

他笑了，笑得是那样的舒坦、香甜，笑过之后，又说：“老杨，你瞞不了我，你呀，你也睡不着啊！”

我哈哈笑了。同时点亮了灯。

我们相视而笑。于是，我们披着衣服，靠在炕墙上，回忆过去，谈论现在，想着未来。我们自然而然地谈到了江西根据地，谈到了一年来难忘的征途，也谈到了到达陕

北根据地后所希望的一切，而谈得更多的是人生和理想。我们谈了各自对共产主义的解释，相信党的事业一定会成功，未来的中国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一定会出现一个生机勃勃的景象。谈啊，谈啊，我们一直谈到窗户上映出焮红的曙光……可是，现在却突然传来他的噩耗！这在感情上，我怎么能够接受得了！

李智广见劝阻无效，就请老谢在前面牵着马缰，他在一旁扶着我上马，始终跟着我。看得出，他俩生怕我从马背上跌下来。

我骑着马出发了。这时，满天飞舞着鹅毛大雪，本来是黄色的光秃秃的山头上，全是一片白，远近的房舍，都被大雪覆盖，仿佛整个大地也都换了装，穿上了缟素。

不知是因为他俩怕我从马上跌下来，还是天气的关系，我的马放不开四蹄。等我们赶到纵队医院所在地时，王开湘的遗体已经埋葬了。

卫生部长姜齐贤等同志陪着我们，来到烈士的墓前。

一座新坟业已披上白雪，它枕着高山，面对洛河，遥望南方无穷远的天际。周围有几株枯槁的枣树，在风雪中颤抖，发出呜呜咽咽的低鸣。

老战友啊，你生前缄默少言，沉毅果决，现在，你静静地长眠在这里，壮志未酬身先死，叫我怎么不难过！

我悲痛万分，泪水长流。

姜齐贤部长告诉我，王开湘连日发高烧到四十度，完全

处在昏迷之中，自己抓响了他珍藏在枕头下面的手枪……

我忽而怒不可遏，大声吼道：

“怎么可以叫他摸到手枪！这是胡闹！”

姜齐贤同志感到深深不安。

当我一顿激怒之后，稍稍冷静下来，觉得这多半是王开湘同志自身的原因。老王太爱手枪了。他成天把那支“六轮子”当作心肝宝贝似的，逢人就夸他那支枪如何如何好，行军、打仗再忙再累，也要亲自擦拭。平时，他把那支枪挎在皮带上，经常用手摸摸，生怕那么个沉甸甸的家伙会不翼而飞似的。后来打土豪，他弄了一块红绸子布，就把枪包得严严实实。老王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的爱好，就是喜欢摆弄那支手枪。他住在医院，也带在身上。按照通常习惯，躺下时放在枕头底下，也没什么。谁想到，他会在昏迷中把枪抓响呢？唉，这是多么不应该呀！

我们默默地站在坟前，身上落了一层雪，脚已被飞来的雪片盖住了。

过了一会，姜齐贤同志告诉我，开湘同志留下了两件遗物：

一件是开湘同志爱如珍宝的那支“六轮子”手枪。

一件是他的怀表。那还是我们智取三县时，从敌人那里缴来的胜利品，当时政治处考虑到我们指挥作战的需要，给了团长和我各一块。开湘同志带着这块怀表，指挥我们四团打了多少胜仗啊！我看着这块表，又不禁想起了一次

又一次在战前和他对表的情景。

现在，物在人空了。我一手捧着怀表，一手捧着“六轮子”，禁不住滴下泪来。亲爱的战友，让你留下来的珍贵的纪念品，继续为实现你的遗志而做出贡献吧。

坟上，积雪越来越厚。大片大片的雪花在坟上降落、堆积。我忘了自身的寒冷，忘了身外的一切，默默地站着，身上落了厚厚的一层雪。

姜部长看看我的脸色，关切地说：“杨政委，你身体不好，回去吧。”

我脱下帽，深深地鞠了一躬，离开了长眠在地下的战友。

一路上，我脑子里翻腾着在火与血中结成的战斗友谊。回忆，把我又带到刚刚走过来的长征路上去了。

那是草地的夜，一阵乌云过后又是一阵冰雹，我们坐在各自的马鞍子上，共同顶着一小块油布，雨点、冰雹象打鼓一样在上面捶打着，我们背靠着背，互相用体温取暖，面对着广漠无垠的草地，面对着凄风冷雨，开湘的意志是那样的坚定。

“老杨，我们一定熬过去，熬过去就好办了！”他背靠着我说。

“对，我们一定要从茫茫草地探出一条路来！”

“我们四团一定要完成任务，不能损伤井冈山老二十八团、英勇冲锋红四团的荣誉！”

我明白开湘那话的意思。一支兄弟部队曾在我们之前在草地探过一次北上的道路，但失败了。我们吸取了兄弟部队失败的教训，一进入草地，就轮流着今天他在前面探路，我在后面收容；明天我在前面探路，他在后面收容，密切配合，克服困难，坚韧不拔地北上、北上，在一片泽国里寻找一条北上之路。

草地的天空，象孩子的脸那样多变，一阵冷雨之后，又撒了满天星斗。

开湘遥对着北斗星，谈起了崇高的理想。他说：“我们将来革命胜利了，是什么样呢？”

“就象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那样啊。”我说。

“对！列宁、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革命胜利，没有剥削，共同富裕，多好啊！将来我们也一样！”

说着说着，他轻轻地哼起一首歌来，那歌词是描绘苏联当时的社会主义生活的。在老苏区时，我们经常唱这首歌，歌词很美，把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共和国描绘成天堂一样，曲子也雄壮有力，娓娓动听。

他唱了两句，我便与他合唱起来，很快，周围的战友们也都跟着唱起来，雄壮的歌声盖住了雨后的风声。啊，红军指战员尽管睡在烂泥地上，但却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斗争越是艰难，意志越是坚定。

“政委，你抓住鞍子。”在一旁扶着我的军医李智广说道。

李医生的话，把我从草地的场景中唤了回来。

这时，马正走在一道小山梁上。李智广看到我神情恍惚，怕我失手摔下来，才提醒了我一下。

可是，不一会儿，我又回到了过去。

那是天险泸定桥：铁索横空，寒光逼人，水声震天，白浪滔滔。开湘同志站在桥头，送我带着一梯队冲过火星四溅的铁索桥……

那是腊子口：绝壁高耸，两山夹峙，枪声阵阵，军情紧急。开湘腰里挂着“六轮子”，抓住悬在绝壁上的长绳，沉着地攀登，在他身后，跟着迂回部队，我屏住气息，目送着战友披荆历险……

啊，开湘同志，我的老战友，你没有死，你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活在红四团同志们的心里！你的未竟的事业，我们来继承。你的美好的理想，我们去实现。你头枕着西北高原的黄土冈，看革命的红旗怎样飘过黄河，飘过长江，飘过三山五岳吧。革命成功的那一天，我们一定要带着伟大胜利的喜讯，到你长眠的地方，献上绚丽的花环。我要告诉你，你在草地上向往的美好生活，已经快要到来了！你望着北斗星唱的那支憧憬着理想的歌曲，很快就要变成现实了。

我想着想着，泪水一滴一滴往下落，不由得鼻子发酸，嘴角又轻轻地抽动起来。

十几里之遥，我不知道是怎么走过来的，只是下意识

地感到纷纷扬扬的大雪在我眼前飘撒，飞舞，别的什么也没有看见。

回到我养病的窑洞，我躺倒了。

沉痛的心情，来回的奔波，寒风的侵袭，使我本来不支的体力，几乎要瓦解了。我一阵昏迷，一阵清醒。

聂荣臻同志、左权同志、朱瑞同志，还有其它的纵队领导同志对我非常关心，都从几十里外跑来看我。我当时还不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后来听说，首长们认为我不行了，差不多算是来与我诀别的。

也许是由于我原来的体质比较好，李智广同志又想尽了各种办法为我治疗，我终于摆脱了病魔的折磨，一天天地好起来了。

可是，李医生累垮了。还有警卫员钟学林同志，因为疲惫，抵抗细菌侵袭的能力降低了，他从我身上染上了伤寒。

对李医生，对钟学林同志，对许许多多战友的感激之情，我是永生难忘的。

后来，中央下了一个通知，凡是参加长征，经过长征这个严酷斗争的考验，从长征中过来的同志，一律可以批准入党。我便开了个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会，在会上我对李智广同志说：“李医生，你过去不入党，现在可以入党了吧！要革命一辈子，还是入党吧。我当个介绍人。”李医生便光荣地加入了党的组织。

我与王开湘同志几乎同时被同样的病魔缠身，我顶了过来，而他与世长辞了。

王开湘同志，你在洛河之滨安息吧！你小小的坟墓前，只有一块小小的木牌子算作墓碑，没有树起当之无愧的巍巍丰碑。但这又有什么要紧，你的光荣业绩将记入中国革命的史册，激励着你的战友和后人前进。你的丰碑，立在人们的心中。

王开湘同志，你放心吧！你留下来的那块怀表，我后来转赠给左权同志了。左权同志当时接过表，就说：“这个好，一个纪念品，一个很重要的纪念品！”左权同志带着它，在巍巍的太行山上，在滔滔的漳河水畔，驱逐日寇，收复河山，最后带着它为中华民族血染疆场。至于你最喜欢的那把“六轮子”，后来我留给我们四团了。那是我调离这个单位的时候，留下这支枪时，我还特意向同志们讲了话：要珍惜你留下来的这支枪，让它去消灭更多的敌人，要学习你的优秀品质，学习你英勇杀敌的革命精神！象你那样，在革命的征途上勇往直前！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①

就我亲身经历的长征，到此就结束了。本来，还有作为奠基礼的直罗镇战役，但我因病重，只能骑马跟着部队，没有参加，一军团一、二、四师都参加了战斗。这次战役，四团主攻，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直罗镇战役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拂晓打响的，战前我还冒雪赶回部队交代了情况。代理政委黄甦同志那时刚刚到任，他是带着组织介绍信直接上阵地的。我们在路上相见，说了几句话，便匆匆分手了。哪知道，就在这天夜里向敌人发起总攻的时候，他壮烈牺牲了。

黄甦同志曾任一军团红一师政治委员。前两天，他还专程来探望过我，就坐在老乡的炕头上和我促膝谈心。怎知道，匆匆一别，竟再也见不到他了。可他那英勇地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却始终在我脑海里萦绕着。

在直罗镇战役中，四团打得非常英勇。全团七百余发扬了四团英勇冲锋的光荣传统，夺取了敌人的重要阵地，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为歼灭敌人立下了战功。

① 转引自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五年十月所写的《长征——七律》。

直罗镇战役是毛主席、周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打得非常漂亮。这一仗歼灭了敌人一〇九师，活捉了敌师长牛元峰，击溃了敌人一〇六师，并歼其一团；吓得敌人一〇八师、一一一师、一一七师都缩回去了。正由于这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扎稳了红军在陕北的脚根，同志们才把它称作名副其实的奠基礼。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一文中说的那样：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毛主席说的一点也不错。从此，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历史使命——长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为着新的战斗任务，发扬“长征”精神从胜利走向了新的胜利！

东 征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打了个直罗镇战役。这个战役，是中央在陕北安下大本营的奠基礼。参加这次战役的有第一方面军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由第二十五军、陕北第二十六、二十七军组成）。

直罗镇战役胜利后，部队进行了整编：

首先恢复了红二师和红四师的番号。红二师下辖二团、

四团、五团，红四师下辖十团、十一团、十二团。

十二月份又恢复了红一师。所辖的部队有：一军团的一团、三军团的十三团和陕北红军的三团。我们是在宜川县临正镇整编的。

紧接着，在瓦窑堡召开了东征会议。

毛主席在会上做了动员。他阐述了东征的重大意义，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讲了为什么必须东征，为什么不能北征，不能西征，不能南征？他说，因为东征的旗帜最鲜明，是到抗日前线去。向北不行，那里是大沙漠。向西不行，因为我们是从西边过来的，都知道那里人烟稀少。南边呢，是西安重镇，敌人屯有重兵，因此，只有东征。当时的意图是，如果形势发展好的话，不仅打到山西，还准备打到河北去，因为那里有我们的地下党组织。我们听了主席的动员，很受鼓舞。虽然我们的部队比起在中央苏区来是少多了，但毛主席那博大的胸怀，毫不把周围的强敌放在眼里，所表现的一个统帅的雄才大略，使我们眼光远大了。我们高高举起抗日的旗帜，建立了“抗日先遣支队”。毛主席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司令员。下辖林彪、聂荣臻指挥的一军团和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指挥的十五军团。

开完会以后，我们回部队传达贯彻，做东渡黄河的准备工作。

彭、林直接抓了东渡的准备，看地形，选渡口，备船

只，选择突破口等等。我们师、团干部又专门去看过地形，这才把部队开到黄河边上。

渡河前，毛主席分别把我们师的干部召去，再次强调东征的重大意义，鼓励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完成好这个任务，强调指出：这在政治上、战略上、国际形势上、国内形势上都很重要，讲了两个多小时。

渡河中，二师是第一梯队。整个部队进展比较顺利。渡河后打了几个小仗。阎锡山的援兵来了，我们在吕梁山郭家掌和大麦郊打了一仗，持续两天，歼灭敌人近两个团，仍解决不了战斗。毛主席决定分兵两路：十五军团向北，威逼太原；一军团向南，指向汾河流域。红一师直插南关镇车站，攻克后南攻霍县，占汾城，由汾城趋史村、侯马。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到侯马。想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制造所谓“杨余傅”事件，把我关押在这里达两年之久。

与此同时，二师进军临汾，四师攻洪桐、道城。北面的十五军团亦势如破竹。抗日先遣支队震动了敌人，振奋了全国人民，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决心。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主力进入山西：一路由潼关向北，一路由娘子关向西。

我们一师奉命由稷山往西转向北进攻，占了吉县，消灭守敌。

至此，东征遂告胜利结束，我们一师担任掩护，渡河

回到根据地。

在东征期间，周恩来副主席坐镇陕北，保障着陕北的安全。毛、周一个在前方，一个在后方，密切配合，浑成一体。那情形使我们联想起汉高祖刘邦与汉相萧何坚守汉中的历史。

到陕北以后，在延水地区的大乡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总结东征战斗的经验。这时整个形势很好，抗日的局面逐渐成熟，陕北根据地已经成为抗日的前线。会议决定抽调大批有经验、有锻炼的连、营、团、师包括军团这一级的干部，到红军大学学习。这所大学，为抗日高潮的到来做了十分及时、十分宝贵的干部准备工作。“红大”后来改名为“抗大”，并在抗日前线成立了分校，数以千万计的干部从这所学校毕业，走上抗日前线，成长为我军的优秀指挥员。“抗大”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有着特殊的历史功勋。

当时从红一师调到“红大”学习的有耿飏、谭政和我；红二师有刘亚楼；红四师有陈光、彭雪枫、黄永胜、王平等。我们到瓦窑堡集中，听了毛主席的报告。毛主席讲了形势任务，号召同志们迎接抗日战争大好形势的到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情况报告。在“红大”，毛泽东同志任校务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学员分为三个科：军团一级、师一级的干部为一科，科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他们本身也是学员，参加操课。团、营职干部为二科，科长周建平，政治委员谭政。三科多

是连、排职干部，都是老红军。罗瑞卿任教务长，负责具体工作。一科的课程比较重，讲马列主义，讲联共（布）党史，讲战略学，讲战役学等等。毛主席亲自任教，讲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讲哲学。洛甫讲中国革命问题，也讲哲学、政治经济学。林彪讲战役学。李德讲战术学等等。还有凯丰、吴亮平等，老师很多。开头，我们一科对讲课有些意见，毛主席给我们做工作说，你们应该尊重老师，已经换了几个老师，你们还有意见，总而言之，他们比你们强，再不要提意见了。我们这个科一共三十来个人。

我们在“红大”学习期间，中央红军西征，三大主力会师。

不久发生了“西安事变”，我们准备迎接新任务：红军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部队联合起来，准备粉碎亲日派何应钦打内战和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以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争取国共合作、共同抗战，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华民族。

我们作为“红大”的第一期学员毕业了。在奔赴抗日前线之前，突然听说中央军委打算让我回到一师当师长。我当时想，自己过去一直当政委，还是干老本行吧，最好不要改我的行，便要求领导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说我不一定能当好师长。林彪和罗荣桓同志向中央反映了我的要求。但是，中央军委经过全面的考虑决定了，毛主席定了，朱总司令定了，周副主席定了，还是叫我当师长。毛主席、

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委托林、罗找我谈谈，怎么当师长。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份，林、罗找我做了一次长谈。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我当时作了记录（早在战争年代里，我就养成了随手记录的习惯。凡是上级开会布置任务，或者领导找我谈话，不论主席还是谁，我都记）。罗瑞卿、刘亚楼和陈光同志当时都知道。以后他们又看过我的记录。谈话的内容是：

一要勤快。不勤快的人办不好事情，不能当好军事指挥员。应该自己干的事情一定要亲自过目，亲自动手。比如，应该上去看的山头就要爬上去，应该了解的情况就要及时了解，应该检查的问题就要严格检查。不能懒，军事指挥员切忌懒，因为懒会带来危险，带来失败。又比方，一个军事指挥员，到了宿营地就进房子，搞水洗脸洗脚，搞鸡蛋煮面吃，吃饱了就睡大觉。他对住的村子有多大，在什么位置，附近有几个山头，周围有几条路，敌情怎么样，群众条件怎么样，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部队到齐了没有，哨位在什么地方，发生紧急情况时的处置预案如何，都不过问，都不知道。这样，如果半夜三更发生了情况，敌人来个突然袭击，就没有办法了。到那种时候，即使平时很勇敢的指挥员，也会束手无策，

只好三十六计，跑为上计，结果，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和打败仗，常常是因为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组织准备，工作没有做到家，懒的结果。因此，不论大小指挥员都要勤快，要不惜走路，不怕劳累，多用脑子，做到心到、眼到、口到、脚到、手到。事情没有做好以前，不能贪闲。贪闲就隐伏着犯错误的根子。什么事都要心中有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雷打不动的干部，牛皮糖式的干部，不管有多大本事，都不是好干部。我们最喜欢勤快的干部，提倡勤快，反对懒。

二、要摸清上级的意图。对上级的意图要真正理解，真正融会贯通，真正认识自己所受领的任务在战役、战斗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打破框框，有敢于和善于在新情况中找到新办法的创造性，才能有大勇，才能决心强、决心狠，敢于彻底胜利，有强烈的吞掉敌人的企图和雄心。指挥员的勇敢集中表现在歼灭敌人决心的坚定顽强上面。指挥员的大勇建立在革命的高度自觉性和正确理解上级意图的基础上面。

三、要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主席早就讲了的。对于敌情、地形、

部队情况和社会情况要经常做到心中有数。要天天摸，天天琢磨，不能间断。这样做，不能看作是重复，实际上这不是重复，而是不断深化不断提高的过程，是取得正确认识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平时积累掌握的情况越多越系统，在战时，特别是在紧张复杂的情况下就越沉着，越有办法。急中生智的“智”，才有基础。因此，调查研究工作要贯串在各项工作中，要贯串在每一次战役、战斗的整个过程中，反对打莽撞仗、糊涂仗，反对急性病，反对不亲自动手做调查研究的懒汉作风。特别是敌情，必须切实摸透。因为敌情是活的，敌人必然会极力隐蔽、伪装他们的真实企图和行动。要尽一切可能不间断地侦察，查清敌人的部署和动向，看它扮演什么角色？是主角还是配角？是主力还是非主力？是骄兵还是败兵？能集中多大兵力向我们进攻和阻挡我们的进攻。查明敌主官的特性，看他惯用和擅长用什么战法，根据他当前的企图判断他可能采用什么打法，等等。只要摸清了敌情、地形的底，决心就快，就硬，就坚定，就不会被任何假象所迷惑，就不会被任何困难所吓住。如果情况不清，就会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坐失良机，或者勉强下了决心，一遇风吹草动，听到畏难叫苦和不正确的建议，就容易

动摇，可能一念之差，前功尽弃。调查研究也包括多读一些书，首先要研究和读好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问题》和主席的各种指示。不仅要读革命的书，还要好好研究敌人，经常总结经验教训。这样，自己才有锐利的思想武器，才能针对敌情找到克敌制胜的好办法，把力量用到刀刃上。

四、要有个活地图。指挥员和参谋必须熟悉地图，要经常读地图。熟读地图可以产生见解，产生智慧，产生办法，产生信心。读的方法是把图挂起来，搬个凳子坐下来，对着地图看，从大的方向到活动的地区，从地区全貌到每一地段的地形特点，从粗读到细读，逐块逐块地读，用红蓝铅笔把主要的山脉、河流、城镇、村庄、道路标划出来，边读边划；等到地图差不多快划烂了，也就差不多把地图背熟了，背出来了。在熟读地图的基础上，要亲自组织有关指挥员和参谋对作战地区和战场进行实地勘察，核正地图，把战场的地形情况和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都装到脑子里去，做到闭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鲜明的战场图景，离开地图也能指挥作战。这样，在你死我活、瞬息万变的战斗情况下，可以比敌人来得快，争取先机，先敌一着，掌握主动，稳操胜券。

你们强渡乌江的战斗所以能够很快地突过去，就是因为你们在战前熟悉了地图，细致地进行了战场勘察，正确地选择了渡河点。

五、要把各方面的问题想够想透。每一次战役、战斗的组织，要让大家提出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要让大家来找答案，而且要从最坏的最严重的情况出发来找答案。把所有的问题都回答了，再没有问题没有回答的了，这样，打起仗来才不会犯大错误，万一犯了错误，也比较容易纠正。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不能因为想了很久想不出来就把它丢开，留下一个疙瘩。如果这样，是很危险的，在紧要关头，这个疙瘩很可能冒出来，就会使你心中无数，措手不及。当然，在战争环境中，要考虑的问题很多，不可能一次都提完，也不可能一次都回答完，整个战役、战斗的过程，就是不断提出问题和不断回答问题的过程。有时脑子很疲劳，有的问题可能立即回答不了。这时，除了好好的和别人商量以外，就好好地睡一觉，睡好了，睡醒了，头脑清醒了，再躺在床上好好想一想，就可能开窍，可能想通了，回答了，解决了。总之，对每一个问题不能含糊了事。问题回答完了，战役、战斗的组织才算完成。

六、要及时下达决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可以下决心打呢？指挥员必须以最大努力组织战役、战斗的准备工作，力求确有把握才动手，不打无把握之仗。但是任何一次战斗都不可能完全具备各种条件，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一般说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把握，就很不错了，就要坚决地打，放手地打。不足的条件，要通过充分发挥人的因素的作用，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特有的政治上的优势，充分发挥指战员的智慧和英勇顽强地战斗作风来弥补，以主观努力来创造条件，化冒险性为创造性，取得胜利。敌人的士兵多是穷人出身，同革命军人打仗，它的战斗力不会强，不能同我们比。你看，泸定桥不是冒过去了？直罗镇那个晚上的战斗，不是以一个连打垮了敌人一个团的进攻？一点险都不敢冒就打胜仗，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战例。我们这样讲，不是提倡冒险主义，不是无根据的冒险，这种冒险是有根据的。其实，这并非冒险。根据就是我们的部队是党领导的，是毛主席教养出来的部队，不怕苦，不怕死，勇敢，聪明，有纪律，坚决执行命令，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打仗有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人民群众站在我们这一边，是帮助我们的，我们依靠人民群众，就可以把敌人封锁起来，就可以

把敌人变成聋子、瞎子、傻子。这种政治上的优势是我们独有的，在战斗中可以转化为一股巨大的物质力量。有了这一条，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把握时就可以下决心打。对于比较弱的敌人，对没有或者缺乏准备的敌人，有百分之六十的把握也可以打，可以把它消灭。

七、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班子。领导班子思想认识要一致，行动要协调、合拍，要雷厉风行，要有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要勤快，要千方百计地办好事情，完成任务。不互相扯皮，不互相干扰，不抱旁观者的态度。如果领导班子不好，人多不但无用，反而有害。所以，班子问题，从领导角度来讲，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做好工作，带好部队，打好仗的关键。

八、要有一个很好的战斗作风。有好的战斗作风的部队才能打好仗，打胜仗。好的战斗作风首先是不叫苦，抢着去担负最艰巨的任务，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猛打猛冲猛追。特别是要勇于穷追。因为把敌人打垮以后，追击是解决战斗，扩大战果，彻底歼灭敌人最关键的一着。在追击时，要跑步追，快步追，走不动的扶着拐棍追，就是爬，滚，也要往前追；只有抓住敌人，才能吃掉敌人。好的战斗作风要靠平时养成，要靠实

际锻炼，只有在紧张、残酷的战斗中才能锻炼出来。不敢打硬仗、恶仗的部队，让他打几次就打出来了，因为已经见识过硬仗、恶仗的场面，有了体会，有了经验，知道怎么打了。百炼成钢就是这个道理。做工作也要有好的作风，说了就要做，说到那里做到那里，要做得干脆利索，要一竿子插到底，一点不含糊，不做好不撒手。好的作风的养成，关键在于干部。强将手下无弱兵，干部的作风怎么样，部队的作风就会怎么样。因此，首先要抓好干部，要干部做出样子，影响带动部队。只要干部作风好，指挥好战斗，多打胜仗，即使是新建的部队或者原来基础较弱的部队，也会很快打出好作风来，象铁锤子一样，砸到那里，那里就碎。

九、要重视政治，亲自做政治工作。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要靠平时坚强的党的领导、坚强的政治工作。连队的支部一定要建设好，支部的工作要做活，就是要把所有党、团员的革命劲头鼓得足足的，充分发挥他们的模范作用、带头作用，通过他们把全连带动起来，通过他们去做政治工作，提高全体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有了坚强的党支部的领导，有了坚强的政治工作，就可以做到一呼百应，争先恐后，不怕牺牲，前赴后继。战

术、技术也要练好，特别是技术，如果枪打不准，战场上就不能消灭敌人，不能解决战斗。因此，军事训练不能马虎，党政工作要领导好训练。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部队有了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有了好的战斗作风，再加上过硬的作战本领，如虎添翼，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军事指挥员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政治，要亲自做政治工作。调一批政治干部去做军事干部，不仅不会削弱政治工作，实际上是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

以上内容是根据我当时的记录整理的。

关于政治委员改为军事指挥员的问题，毛主席后来给“红大”学员讲课时说：我们红军的军事干部、政治干部，都是党培养起来的，不完全象苏联军队不少军事干部是从白军中转过来的，政治委员是党派到军队里监督一切的。毛主席说，不论是军事干部还是政治干部，都要做政治工作，也全都要会做军事工作。这种改变，有利于我们军队的发展。

我离开了保安（一九三六年敌人占领瓦窑堡，中央所在地迁至保安），经过刚从张学良将军那里接收过来的延安，到云阳镇前线野战司令部（司令员彭德怀），住了两天，到军团部，又到一师驻地正宁县，换下陈赓同志。陈赓同志及二师师长杨得志同志参加了“红大”的第二期

——即“抗大”的第一期的学习。

此外，部队投入练兵，学战术，并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在宫和镇开运动会，一、二、四师全参加了。当时聂荣臻同志任军团政治委员，陈光同志代军团长，朱瑞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不久，罗荣桓同志来到前方，任政治部主任。

第 四 章

挺 进 敌 后

誓 师 云 阳 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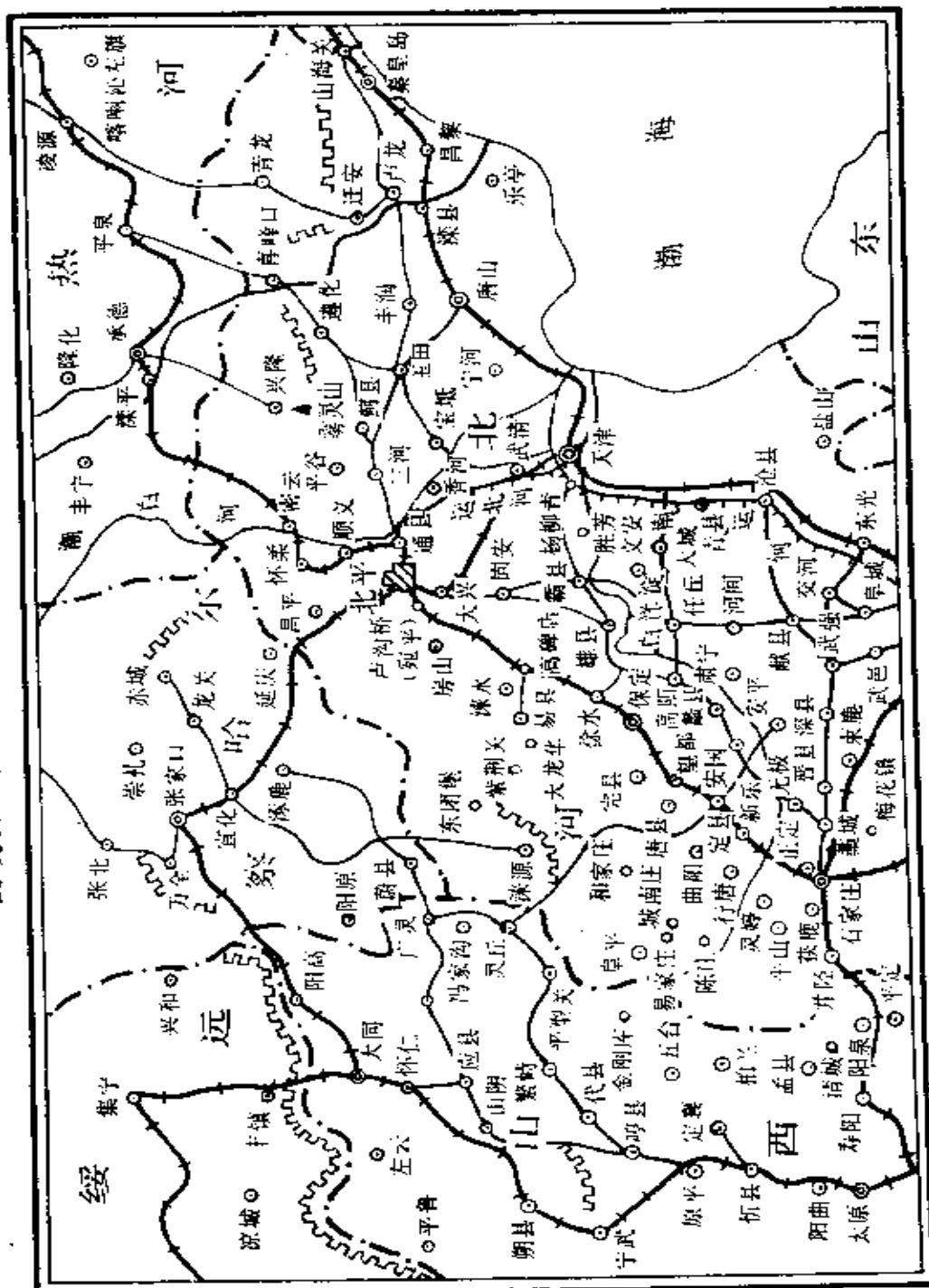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上午，我们红军大学一科^①的学员正在窑洞里分组探讨战略问题，忽听窑洞外有人喊道：

“同志们，蒋介石被抓起来了！被张学良、杨虎城活捉了！”

我们顿时惊愕了，相互用目光询问：会是真的么？窑洞内静寂得只听见周围人粗重的呼吸声，我的心激动得噎噎直跳。但是大家谁也不开口，在判断，在倾听，在沉默，窑洞外那个狂喜的声音还在响着，其它窑洞已经隐约响起

① 红军大学即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设在陕北保安县城外，毛泽东同志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学员分为三个科，一科的学员大都是师职以上干部，下面又分为六个组，刘亚楼、彭雪枫、谭政、杜理卿、张纯清和杨成武同志分任各组组长。二科的学员是团、营职干部，三科的学员多是连、排职干部。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区域略图



欢呼声了。是真的！我再也抑制不住喜悦了，抡拳往炕上一捶，大叫道：

“好啊！”

组里的同学①同声欢呼起来，大家争先恐后挤出门，要去打听明白。门框被挤得咔咔响，我们为数不多的、心爱的铅笔，自制的炭笔、粉笔和小本子纷乱地掉在地上，大家也顾不得了，一齐朝科部方向拥去。

在“红大”学习，是我革命历程中的一个新起点。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红军于直罗镇战斗之后，在陕西宜川县临镇重新组建了红一师。陈赓同志任师长，我任政委，杨得志同志任副师长，参谋长是耿飏同志，政治部主任是谭政同志。下属三个团，即原红一军团的一师一团、红三军团的五师十三团，陕北红军的第三团。经过半年的整训，红一军团的一师、二师、四师和红十五军团等部队一起，组成了由毛主席和彭德怀同志亲自指挥的抗日先遣支队，随后渡过黄河进行了东征。东征回来后，我就进入“红大”学习了。

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我们是没有机会坐下来静心学习的。所以，当组织上送我进“红大”时，我自然是异常兴奋，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我们学习的主要课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军事辩证法，

① 即：莫文骅、许世友、武亭、赵尔陆同志及黄永胜等。

都是由毛主席亲自讲授。张闻天书记讲授中国革命问题和哲学，博古同志讲授马列主义与联共（布）党史、中共党史，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也经常来作报告，这使我眼界顿开，政治上、军事上都进入了一种新的思想境地。回想起以前我所信奉的那种“只要打仗不怕死，不贪污，不腐化，就天不怕地不怕”的简单的革命“哲学”，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幼稚可笑了。

战略问题，是我最感兴趣的课程。我开始懂得革命所处的战略阶段不同，革命的对象、动力以及直接同盟军、间接同盟军都不一样。军事上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是速决？是以运动战为主？还是游击战为主？也因敌我力量对比不同，社会背景、历史、地理条件不同而各异，充满了革命的辩证法。

正当我们反复地学习、探讨战略问题时，忽然听说蒋介石被抓住了，我们光知道高兴，一时并没有意识到，中国革命一个大的战略转变就要来临了。

当我们来到一科科部门口，只见一科政委罗荣桓同志喜笑颜开地走出来，挥舞着拳头说：

“蒋介石被抓住了，在临潼抓住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立了大功！”

“啊，张学良这回可真转过弯来了呀！”我心里想，情不自禁地又忆起，张学良奉命进攻苏区时，有一次，我们“红大”从瓦窑堡转移到保安之前，用树枝扎了一座牌楼，

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莫把亲人当仇人”，下联是：“勿将他乡作故乡”，横批是：“打回老家去”。

随后，学校领导也证实了这个喜讯，并向全体学员传达了“西安事变”的大致经过：

东北军和西北军广大官兵，是被蒋介石逼到陕北来打红军的，也曾经和我们交过几次手，吃过败仗，而我们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缴获的人、枪和和气地送回去，讲明国难当头，应当一致对外，不要再做那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影响下，他们的抗日热情益发高涨，逐渐和我们成了朋友。尤其是那二十万东北军官兵，面对日军入侵，却被迫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命令，放弃了东三省，从关外撤到华北，又从华北开到陕西来打内战。他们尝够了辱国丧家、同室操戈之痛，纷纷要求打回老家去。张学良将军和日军有杀父之仇，更有爱国进步之心，几番想停止内战，回师抗日，蒋介石却严令不许。这位在当时被人们骂作“不抵抗将军”的东北军首领，忍辱衔耻，其内心痛苦，可想而知。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在全国人民抗战呼声推动下，他先是和我们红军搞了个“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后又在一个天主教堂里和周恩来副主席进行了秘密会谈，接受了我党的抗战主张，接着这就和杨虎城将军一起，毅然实施“兵谏”，把到西安来督促他们进攻红军的蒋介石抓了起来。

学校领导还说，中央领导同志目前正在开会，准备立即派一个代表团赶赴西安。

那一天，我们真是欣喜若狂，笑啊，跳啊，把帽子抛到了天空，人在雪地里打滚，怎么也平静不下来。这可是我们盼了十几年的事啊——捉住蒋介石，惩处这个双手沾满人民和红军鲜血的罪魁祸首，为无数死难烈士报仇雪恨！好多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有的人竟蹲在地上呜呜哭起来，不用说，那是想起了死去的战友和父母兄弟，要是他们也能知道这个喜讯，该多好哇。

回到窑洞，同志们还是激情难捺。外面是冰天雪地，可我们却议论得热火朝天。怎么处置蒋介石呢？我的想法里：对这个罪恶滔天的家伙，千刀万剐也不过分。

大家几乎都是这么个看法，有人说：不能简单地杀头了事，那太便宜他了，应该把全国各界代表都请来，开一个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然后当场枪决。

有人说：应该把他交给我们，绑回江西苏区去，让他向苏区人民认罪，然后由当地人民处决。

总之，我们都觉得，非杀蒋介石不可，决不能再给他留条什么生路了。当晚，大家围着一盆小小的炭火，几乎是彻夜不眠，继续讨论着杀了蒋介石以后的全国形势。比如：红军的任务会不会变化，国民党会不会分崩瓦解，日本侵略军的反应又会怎样等等，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人人都说：只有将蒋介石处决，革命事业才能迈进一

大步，红军也才能够很快地开赴抗日前线，和全国人民一起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华大地。

随后几天，我们都在焦急地等待西安方面的消息，有的人还跑到中央驻地去打听：蒋介石押来了没有？什么时候把他押来？

是啊，我们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大家都很年轻，不解“西安事变”之后纷纭复杂的政治形势，不懂得怎样对待蒋介石这个“阶下囚”才对抗战大局最为有利。

很快，我们又得知：周副主席已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要和蒋介石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下子，我有些纳闷了：怎么，要放蒋介石？同志们也疑虑重重：蒋介石素来无信义可言，和他谈判，能谈出什么名堂？

就在这时，朱总司令和张闻天、博古同志先后来校做我们的工作，讲明了中央对待西安事变的态度：不杀蒋介石，因为杀了他，不仅国民党内部投降派可能得势，而且日本侵略军很可能会利用这件事在我国挑起内战，这对抗日大局没有任何好处。只要蒋介石接受我们党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就放他回去，争取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朱总司令和张闻天、博古同志特别关心我们一科学员的思想状况，几次参加我们的讨论会，帮助我们解除疑虑，澄清认识。

通过学习，我渐渐理解了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头脑也冷静了，懂得了当前面临的主要危险是亡国灭种，

我们要以民族利益为重，认清眼下最主要的敌人不是蒋介石，而是日本侵略者。中国革命已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不能再以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观点对待当前的政治局面了。为了举国一致抗战，蒋介石确实不能杀。

同志们也大都转过弯来，不再坚持杀蒋了。只有个别同志有些遗憾，觉得就这样放他回去，太可惜了。不过，他们在言行上绝不流露出来，而是表示，中央既然决定了，就坚决服从。

当时，我最关心的有两点，一是放蒋回去后，他会不会撕毁抗战协定，重开内战？二是我们什么时候开赴抗战前线？形势发展这么快，我估计我们快要离开“红大”回部队了。

果然，过完阳历年，中央就决定了：“红大”学员提前毕业，回部队准备上前线。我也接到了通知，回红一师由政委改任师长。

紧接着，“红大”在保安的旧戏台上举行了毕业典礼，毛主席也来了。我长时间地注视着他，发现这些日子来他消瘦多了：颧骨微凸，两眼有些下陷，身上的棉袄也显得宽松。听说，自从“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他每日只休息几个小时，文稿、电报、会议一下子增加了几倍，百忙之中，还三天两头地了解我们“红大”学员各种情况，可见，他多忙啊！但是，毛主席一开口，我就感到，他心情很好，仿佛有什么喜事，声音洪亮有力，笑容满面，举止洒脱。

他刚刚走上主席台，就朝我们大家扬手道：

“祝贺同志们从红军大学毕业，我代表中央来给大家送行！”然后，他高兴地和我们一起鼓掌。

掌声一停，主席又着重讲了“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形势发展的趋向。他说：“‘西安事变’带来了两个可能，一是国民党加剧内战，二是促使蒋介石抗日，形成民族统一战线。现在看来，情况往好的方面发展。我听讲，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抓住后，‘红大’里头不少同志主张杀蒋。请同志们说说，杀一个蒋介石好，还是形成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好？现在还有不同意放蒋的同志没有？站起来发表你的主张嘛，我可以把这个讲台让给你。”

主席幽默的问话唤起满场笑声，主席也亲切地笑了。最后，主席说：

“现在大家要到前线去了，我希望你们回去以后，一定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部队搞好联合。要知道，你们联合得越好，对抗日就越有利。希望你们那里将来都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希望发展以后，我们中央和你们用无线电联系，而不是用骑兵通信员联系！同志们，抗战到底，前途光明！”

主席最后一段话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使我感觉到我们任务异常艰巨，同时又信心十足。是啊，“抗战到底，前途光明！”

从“红大”毕业后，我们赶到三原县云阳镇红军前敌

指挥部报到，彭德怀司令员和邓小平主任召集我们开了大会，对我们的工作做了指示。随后，我策马离开云阳镇，向驻扎在正宁县的红一师赶去。

从前敌指挥部到红一师驻地近三百里，我在路上奔驰了三天多，于第四天傍晚赶到红一师师部，和新就任的邓华政委、罗元发主任见面了。此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抓紧整训部队，等待开赴抗日前线。

天气渐渐炎热，身上的棉袄早已穿不住了，可我们又没有单衣替换，直到初夏时分，战士们还身着棉袄在山野练兵。一天下来，浑身直冒热气，棉袄上泛出白花花的汗碱斑，洗也没法洗。有的战士熬不住，就把棉花拆出来，把棉袄改成单衣穿。

“怎么还不行动啊？”战士们越练求战情绪越高，心里越急，特别是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经常有人到师部来打听消息。

这一天，我接到了红一军团骑兵通信员送来的命令，上面有军团政委聂荣臻和代军团长陈光的签名，内容是：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国工农红军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红一师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任命我为团长，熊伯涛同志为参谋长，罗元发同志为政治处主任。

我刚把命令通报下去，又接到了前敌指挥部电报，要我们迅速开拔，经旬邑、淳化，赶到三原县云阳镇地区集

结。

终于要行动了，同志们又激动又高兴，我到各营去检查行军准备工作时，到处都呈现出一派许久不见的活跃景象，到处都能听到笑声和这样的歌声：

同胞们，向前走，
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用我们的血和肉，
去拼掉敌人的头。
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亡国的条件，我们绝不接受，
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
同胞们，向前走！
莫退后，莫退后！
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

经过四天行军，我们赶到了云阳镇地区，刚刚驻扎下来，又得到一个消息：部队立刻换装，然后召开抗日誓师大会。

我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早就盼望着能给部队补充一些装备，这下有着落了。现在已是八月天，战士们可以脱

下穿了大半年的棉袄，换上新军装，多么令人高兴啊！

第二天一早，供给处长董永清就带上人去领装备，快中午时，他们赶着十几匹骡马回来了，每头牲口载着两个大麻包。我兴冲冲地迎上去问：

“都领回些什么来了？”

董永清同志满头是汗，神色有些不悦，说：

“都是军装，一人只能摊上一套，再多就没有了。”

“别的呢？”

“还有两万多块钱，不是大洋，是国民党的纸币。我算了算，这两万多元纸币，只够咱们团几天的花销！”

我追问：“没补充点武器弹药？”

“一枪一弹都没有！”

当时我有点失望。这意味着，我们还得以反“围剿”时期从国民党反动军队手中缴来的武器，去和装备优良的日本侵略军作战。后来我才知道，就是新发的这些军装和资金，也是周副主席在太原阎锡山总部反复交涉后才得到的。国民党政府是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冲击下，不得不同意我们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的，但蒋介石又以“统一军令、政令”为理由，要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企图通过改编，削弱和限制我们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说穿了，蒋介石不给我们补充武器弹药，主要是害怕我们红军在抗战中发展壮大。眼下，他只不过是执行了十年的血淋淋的“剿共”方针，改换为较隐蔽的“融共、限共”

方针了。其目的是希望八路军在与日本侵略军的浴血苦战中，逐渐消耗殆尽，同时也遏制一下日军的侵略势头。

我对董永清同志说：“没有就算了，我们到日本鬼子手里缴去。长征二万五千里，打了那么多仗，没有一天是物资充足的，不是也过来了吗。你通知各连来领军装。”

董永清同志还郑重地告诉我，前敌指挥部指示：各部必须在今天换装完毕，明日要穿着佩戴好胸章、臂章、帽徽的国民革命军军装去参加誓师大会。我便立即让参谋长熊伯涛同志把这条指示传达下去，务必人人皆知，执行不误。

那天，我和大家一样，也领到了一套崭新的灰布军装和一顶圆军帽。一看就知道，这是阎锡山部队的军装。另外，还有一块胸章和一块臂章。胸章上印着：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臂章上豁然三个大字：八路军。这是我们区别于国民党部队的标志。

通信班的战士笑笑嚷嚷的。他们都为得到一套新军装而高兴，对那两块胸章、臂章特别感兴趣，围成一堆一个字一个字地认，认明白后便开始往军装上钉。开始时，他们连位置也搞不清楚，有的把臂章钉到胸前了，有的把胸章钉到右胸上了。由于补给困难，多年来大家都是足蹬草鞋，身穿破旧军装出生入死，有时，战友牺牲了，班里战士不忍见烈士穿着烧焦的衣裳被安葬，就把自己身上的衣裳脱下来，给他换上。在那时，能得到一双新鞋，一件结实

的布衫，也很不易。

忽听铛的一声，有个铜钱大的金属掉到地上，接着听人叫道：

“这不是国民党的帽徽么？和蒋介石头头上戴的东西一样，我不戴！”

我循声望去，见是我原来的一个警卫员。他是经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了。此刻，他正睁圆两眼，气得发呆。

接着，其他战士也从自己的军帽里翻出了青天白日帽徽，一个个都面面相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于是，他们就过来问我。我说：

“戴上，所有发下的徽章，一样样都必须佩戴上。”

这时，我忽然明白前敌指挥部为什么让我们彻底换装，原来就是怕有些战士不肯戴它呀。同时，我也感到，这颗青天白日帽徽，会在一部分同志心目中激起强烈反感，特别是那些对改编想不通的红军老战士。

我原来的那个警卫员恳切地说：

“团长，我们把胸章、臂章都钉上，只把帽徽换换，还戴我们的红五星，行吗？”

我心情沉重地摇摇头，正欲向他解释，一个参谋喊我接电话。电话是罗元发主任从三营打来的，他告诉我：不少战士不愿意佩戴国民党帽徽，对改编、换装议论纷纷。有的战士甚至怀疑我们不革命了，和干部争吵起来。

我和罗元发同志立即做出决定：团、营干部全部下到

连、排去做战士的思想工作，讲清改编的意义和必要性，坚决执行前敌指挥部命令，全团必须今天换装完毕。

放下电话，我自己迅速换装，脱下已经穿旧了的红军服装，穿上佩有胸章、臂章的国民革命军灰军装，扎紧腰带和绑腿。当摘下缀着红布五星的八角帽时，我轻轻抚摸着它，久久地端详着它。从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到现在，我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它，帽子上的红五星伴随我打土豪、反“围剿”、爬雪山、过草地，无数烟尘雨雪使它改变了原先的色泽，变得粗糙和微微破损了，但它标志着红军的使命与信仰啊！它似乎成了我血肉躯体的一部分……可我心里明白，这次换装是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战略阶段的需要，便迅速戴上了那顶缀着国民党帽徽的新军帽。然后，我把摘下的红军八角帽^①装进马褡子，虽然不戴它了，但它仍然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我。

我换装完毕，径直朝一营驻地走去。二连一排住在村头一幢大院落里，还没进门，就听得一阵暴雨般争辩声。我的腿刚迈进去，争辩声顿时停止了，院内的同志们都站起来。我定睛一看，好家伙，地上扔着好几个青天白日帽徽，有的还被踩到烂泥里去了。几位战士满脸通红，额头冒汗，竭力遏制着自己的怒气。

我说：“全捡起来，一个也不能少，丢了还没处补发呐。

① 抗美援朝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征集革命文物，杨成武同志把这顶八角帽和其它纪念物品一起献给了该馆。

不戴它，国民党不让你东渡黄河抗日！”

他们沉默了一会，也许见我也戴上了这东西，于是把地上的帽徽一个个捡了起来，七嘴八舌地问我：

“团长，过去咱们的枪口一直是对准这东西开火，现在怎么戴起它了？戴上它，咱们红军岂不是和国民党的军队一样了？”

“改编改编，我看是上了国民党政府的当！”

“戴红五星一样抗日嘛，干么非戴它？群众见了我们会怎么想？”

三班长——一位江西籍的红军战士，猛然把自己军装扯开，亮出胸脯上的一些伤痕，其中一处弹伤还未痊愈，闷声闷气地说：

“和国民党军干了这些年仗，没想到今天自己倒成了国民党军，这是什么改编？我就不改！我至死都是红军！团长你说，敌人欠我们的血债还不还了？地主、老财的地分不分了？那仇还报不报了？再说，要是苏区百姓见我们这身打扮，会怎么想？我们一块从村里出来投红军的共有十几个，如今只剩下我和排长了，我们要是戴上这玩意儿，怎么对得住那些牺牲的同志啊？”

三班长说不下去了，蹲下身子，捂着脸悲伤地哭了起来，哭得浑身颤抖，泪珠从指间渗出来掉到了地上。

多好的战士啊！他们对党对人民无比忠诚。我也激动起来，记得和我一块参加红军的闽西青年，光在红四军的

就有一千多人。而今天，许许多多熟悉的面庞不见了，过去日日在耳的乡音和闽西山歌也难听到了。他们有的调走了，有的在长征路上失散了，可绝大多数同志被敌人的子弹、饥饿和疾病夺去了生命。想起这些，我浑身冒火，他们的理想、愿望、仇恨全凝聚在我们这些幸存者的心中，我曾经发过誓要为他们报仇，也曾向三班班长这样为他们淌过泪……可现在，我相信，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共产党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政党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拯救中华民族，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相信烈士的血不会白流。无论怎么改编，我们的心还是红的，八路军仍然是人民的子弟兵。

我扶起三班班长，把我对改编的看法告诉他和同志们，谈着谈着，他又蹲下去了。

一排长已经换装完毕。可惜记不起他的姓名了，因为他脸上有几颗麻子，许多人都称他为“麻排长”。他在旁边跺脚道：

“你起来，快起来！把衣服穿上。咱们按指挥部命令办，绝不会错。”

“麻排长”是个很好的同志，立过多次战功，可惜他说不出许多道理，只是一股劲儿催促大家“执行命令”。

说服三班班长后，天色渐渐暗了。我正要离开二连一排，“麻排长”追出来，悄悄问道：

“团长，说真的，非改不可吗？改编以后，谁指挥我

们？”

我笑着问：“怎么，你也有点想不通？”

“当然喽。”他爽快地说，“不过咱是干部，要带头执行命令。”

“上级不是反复讲过了吗？红军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这就是说，我们还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听党中央和毛主席指挥。”

他点头道：“这就好，这就好。”快步回去了。

改编前，“麻排长”是红一师一团的连长，改编后，他成了排长，原来的团、营干部，也都下到连队任职，原来的排长大都扛起步枪当战士去了。那时谁也没为此发过怨言，都觉得今日上明日下是极平常的事，斗争需要嘛。

八月的一天上午，独立团到达会场。会场设置在镇外一片稍稍倾斜的山坡上，西边是主席台，台子是临时用桌子拼起来的，主席台上方拉起了横幅，上面写着：红军抗日出征誓师大会。左侧竖一块门板，上面贴着《红军抗日出征誓师词》，字字硕壮有力。

云阳是个弹丸小镇，人口不多，今天忽然聚满各路红军，小镇也变得大为壮观。会场四周，竖满标语和旗帜，镇里的乡亲全惊动了，连多年不出门的老大爷也骑着牲口来观看，孩子们则爬到屋顶和树杈上，挥舞着小彩旗。每支队伍入场，四周都轰响一阵响亮的口号声：

“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

“坚决执行中央军委改编命令！”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兄弟姐妹齐奋起！”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

.....

口号声中，战士们举起枪，乡亲们挥舞着小彩旗。真是：其声壮如天鼓，其势如汹涌海浪。

聂荣臻、罗荣桓等领导同志骑马从镇上赶来。他们和我们一样换上了国民革命军军装，腰扎牛皮带，打着绑腿。他们后面，跟随着几位政府人员和一些爱国人士。走上主席台后，他们时而环视会场，时而向熟识的同志招下手，交换一下笑容。

我挺身朝四周一望：嗨！指战员们多神气啊！一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多年没见过这么多部队和战友了，今天聚集在一起真是难得。这是出征前的欢聚，是胜利的前奏！我非常兴奋，为我们的力量而自豪。

大会开始，先由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指示：

依据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谈判的结果，中国工农红军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前敌指挥部将改为八路军指挥部，以朱德同志为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为副总指挥、叶剑英同志为参谋长、左权同志为副参谋长。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同志为主任、邓小

平同志为副主任……

周围的人都在屏息静听，眼内闪耀着严肃的神色。天气很热，地面暑气蒸腾，人群内密不透风，身上的军装早已被汗水湿透，耳旁有粗重的喘息声。为了听清每一句话，人们不知不觉地朝前拥挤了。

讲话完毕，罗荣桓同志亮开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声说：

“同志们，父老乡亲们，东三省已沦入敌手，现在华北危在旦夕。日军正想越过黄河，侵占全中国。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关头，为了不亡国灭种，每个中国人都要奋起抗战！红军就是抗战的先锋……”

最后，罗荣桓同志高高攥起拳头，在烈日下率领我们全体战士，发出了整齐的誓言，也就是《红军抗日出征誓师词》：

“……浴血奋战，拯救中华民族。发扬红军光荣传统，誓做抗战先锋……”

再 度 东 征

开完誓师大会，师部通信员就送来了出发命令和行军路线图。我们独立团将作为第一批部队火速东进，渡过黄河，奔赴华北前线。

可是，就在这天夜里，完全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几个营先后报告：有人乘夜深擅自离队，武器也带走了。

看来，不会再回来。

我大吃一惊，实在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刚刚开过誓师大会，就要东进渡河了，他们怎么不辞而别呢？

我一了解，全团擅自离去的有四五个人，其中包括我原先的那个警卫员和前天哭得最凶的二连一排的三班班长，其余的也都是江西、湖南籍的红军战士。三班班长临走前还留了个条子，说是“坚决不当国民党，回江西苏区闹革命！”有的同志在走之前流露：这里的红军“变了”，延安的红军不会变，要到延安去参加真正的红军。

我这才略微放心了。看来，他们是对改编想不通才走的，他们的革命意志和斗争热望不会泯灭，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干革命。同时，我也为他们感到痛心，因为我很熟悉这些同志，他们出身贫苦，几乎家家都有一部血泪史，参加红军以来，遵守革命纪律，作战勇猛、顽强，万里长征也都冲杀过来了，可是，在这革命发生急剧变化的关头，他们的思想却跟不上发展的形势，掉队了。我一想到自己没有做好思想工作，就感到责任还不在于他们，主要在我们领导。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哪里去了？这不是失职么！为此，我感到内疚。走的同志，都是班排的战斗骨干啊！

我和熊伯涛、罗元发同志为此事一夜未眠，也没有时间再去寻找他们了。各级干部被我派去掌握部队之后，我向师部报告了这件事，同时听说其他兄弟部队也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天色渐亮，军号声此起彼伏。八月二十二日，我们独立团离开云阳镇，向东进发了。

数日后，部队行至蒲城县境内。中途休息时，一营副营长袁升平从后面赶来向我报告：

“团长，我们营跑掉的人又回来了！”

“哦，”我一喜，“叫他们来。”

袁升平同志兴冲冲领来两三个人，领头的就是二连一排的三班班长。他憨笑着，腼腆地挪动双脚，悄悄往后缩。

“你不是要回江西苏区吗，怎么又回来了？”我问。

他不好意思地说：“我想来想去，还是抗日最重要。家乡离这里千万里，怎么回去？就是回去了，乡亲们一旦问我：‘日寇打进来了，你怎么没跟红军去抗日？’我又怎么回答呢？……我在队伍后面跟随了两天，看大家确实是要东渡黄河，打日本鬼子去，我就回来了。”

其余同志也都分别讲了他们的情况。原来，这两天他们四处奔跑，转了二百多里，想投奔一支没有“改编”的红军队伍。谁知，所见到的红军队伍全部都改编成八路军了，而且都在准备出师抗战。于是，他们就回头追上来了。

我笑了笑，向他们表示欢迎，让他们各自返回原单位。然后告诉袁升平同志：虽然他们有过失，但不要处分，还要象以前那样信任他们，让他们担任原来的职务。

傍晚时分，又接到报告，我原先的那个警卫员也回到连队了。这样，擅自离队的同志就全部回来了，实在是令

人高兴啊。

连续行军七天，期间，我们又接到了中央军委关于我们这支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正式命令。八月三十日，我们到达黄河西岸的韩城县芝川镇，前面就是禹门渡口，黄河水的呼啸声已经隐隐可闻。在这里，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和三四三旅旅长陈光同志把我和六八六团团团长李天佑同志找去。罗主任说：

“禹门渡口设有国民党检查站，未经改编的红军一律不许过河，你们是不是都彻底换装了？”

我们将部队换装的情况向他们报告之后。罗主任又说：

“你们是第一批过河的八路军，要提高警惕。渡口两岸都驻有国民党的重兵，如果他们只是一般的刁难，你们则要沉着、镇定，忍着，争取安全地渡过河去。如果他们背信弃义，有预谋地制造争端，发生了意外事情，你们就要立刻向总部和师部报告。过了河以后，你们把队伍拉往侯马一带，如果途中发生了意外事件，你们两个团就要合起来，李天佑同志负责军事，杨成武同志负责政治，共同应付突然情况，要尽量减少损失，把部队带上抗日前线。”

我明白，渡口一带情况比较复杂，便通知部队要严守纪律，不理睬国民党军的刁难，一定要防止枪走火，同时也要提高警惕，切不可麻痹。然后，带领部队朝渡口奔去。

到达渡口时，部队就地待命，我率数人踏上了黄河西岸的石砌大坝。透过蒙蒙细雨，只见黄河水由北而南，沉

重地呼啸着奔腾而去，河水混沌，水势浩大，浪头上翻滚着一块块烂木板和一堆堆灰黄泡沫，黄河发出震耳的吼叫，脚下的大坝也似在微微抖动。这里，相传是大禹治水的地方，故得名禹门渡口。上流不远处是著名的龙门，疾驰的黄河水从那里奔腾而出，河面一下子由两里宽变得烟波浩淼了。由于连日降雨，河水猛涨，对岸已消退在蒙蒙细雨中。

“又到黄河了！”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忽然想起了去年春天，毛主席指挥我们红军“抗日先遣支队”东渡黄河的情景。

那是一个夜晚，我还在红一师当政委。忽然接到军团首长电话，要红一师的领导同志立即赶到黄河西岸一个名叫古峪村的地方，去接受毛主席的指示。当时，主席亲自担任抗日先遣支队政委，彭德怀同志任司令。

我和师长陈赓同志等骑马赶了三十多里路，到达古峪村时，已是午夜。主席正在等我们，他提着一盏马灯出来，把我们领到屋里火炉旁坐下。窗外，风儿送来黄河呼啸声。主席侧耳谛听了片刻，笑道：

“明日你们就要渡河了，它在呼唤呐！”

主席详尽地询问了我们过河的准备工作，接着对我们说：红军为什么不向北发展，不向南发展，而要进行艰苦的东征呢？因为我们要高举抗日的旗帜，挺进晋中，防止日军入侵华北。有些同志认为东征困难太多，还怕因此而

丢掉陕甘宁根据地。这不无道理，东征困难是多，阎锡山这个土军阀会阻挠红军东征抗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现在还没进入山西，但红军一进，他们也可能进入山西堵截红军。主席说，东征的关键是过河之后多打几个胜仗，仗打得越好影响就越大，抗日的阻力就越小，陕甘宁根据地就越巩固，这样才会促使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第二天，红一师便从延川北面渡过黄河，进入三交镇、石楼城。果然，红军一入晋，阎锡山就手忙脚乱，四处调兵来阻击我们。但是他的部队不禁打，我们首战大麦郊告捷后，便分兵两路：一军团向南打，直下晋中平原，扩大政治影响；十五军团向北打，威胁太原。仅半个月，红一师就和兄弟部队一起，接连攻下了南关镇、汾城、史村，歼敌逾万。后来因为陈诚率重兵从潼关风陵渡过了黄河，妄图卡住我们退路。我们便由史村先西向稷山、河津，后北上，打下了吉县，又从那一带西渡黄河返回陕北。那次东征，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堵截，我们没能到达抗日前线，但是红军的抗战热忱，却为天下人民所共知，大大促进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形成。

今天，我们再次东征抗战，莫非还会受到国民党军阻挠吗？我四下望望，发现渡口设了严密的检查站，河岸上筑有不少掩体，大堤上有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巡逻；泊船处的守卫们为了加强对渡船的警戒，扯起了一根根铁索。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头戴雨帽，手上拿着个大纸夹子，

在渡口处来回踱步。一打听，原来他是国民政府派驻这里的口岸检查官。如果要从这里过河，非得他那个大纸夹子里有我们部队番号才行，否则，他是不会放行的。

我知道，在国民党政府规定的那个编制序列里，八路军一一五师不设独立团，如果直接去交涉，肯定不行。为了避免麻烦，我没有把队伍带上大堤，而将独立团带到黄河西岸数里远的一个小树林去了。

恰在这时，李天佑同志率领的六八六团在小树林里与我们会合了。我把情况告诉李天佑同志，当即商量决定，把两个团混编起来。下午，我们就将队伍开到渡口。此时，岸边正停靠着二十多艘大渡船，战士们一拥而上，先把它占住了。

因为六八六团在“政府规定的八路军编制序列”内，所以那位检查官未加阻拦。至于六八六团为什么多出近一倍的人来，我想他之所以佯装不知，也许是他在不违背上峰指令的情况下，希望有更多的部队开上前线去抗日。

登上黄河东岸，我们冒雨行军几十里，抵达晋南万荣城，在那里休息了半天，起火造饭。饭罢，又顶着夜风急雨，踏着泥泞小路，进入黝黑的中条山脉，向同蒲铁路急进。

这天中午，雨停了。我们踩着一滩滩积水，走进曲沃县南面的侯马车站。我立刻派人去找国民党驻侯马的办事处交涉火车，安排各营在车站附近就地休息，等候登车。

然后，我和熊伯涛同志沿着石板铺砌的小街向城里走去，想察看一下侯马的地形和驻军情况。

途经一家小酒馆，熊伯涛同志忽然碰了我一下，我随他视线望去，见几个国民党军官正围着一桌酒菜吃喝，还醉醺醺地议论我们呢。

“又撤下来一群死鬼，在车站上扎营了。”

“你认错喽，那是八路军。呃……就是老共！不是从前面撤下来的，是从陕西往河北前线奔的，向我们要车皮。呃……”

“老子家眷往南走还没车坐呢。你们还能有车皮装他们？”

“想打仗，自己跑着去嘛。”

“对对，他们跑路那可是有名的……”

我啐了一口，愤愤地走开了。在侯马，我们被那群饱食终日的国民党办事员留难了两三天，经过一而再再而三地交涉，有时竟拍着桌子吵起来，最后才得到十多节敞篷车厢。我赶去一看，竟是运牲口用的，两边钉着厚栏杆，一头一尾用铁索连绞，地板上残留不少牛羊粪便和杂毛，一股刺鼻的臊臭味。

对此我倒并不在意，有车皮让我们上前线就行，我们组织部队匆匆洗刷一遍，就登车了。由于车皮太少，每节只好挤进一百来人，列车一开，两边栏杆象要裂开似的咔咔作响，车身抖动得使人站不住。没开出多远，天又变了，

急风裹着大雨劈啪打来，头顶没有遮蔽物，战士们紧紧靠在一起，任凭身下污水横流。许多人是头一回坐火车，兴奋极了，在大雨中仰天高歌：

工农兵学商，
一齐来救亡。
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
走出工厂田庄课堂，
到前线去吧，
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

.....

列车载着我们在晋中汾河平原上奔驰，铿锵有力的车轮转动声，听来让人心情振奋。八路军出师抗战的消息，早已沿着铁路线传开了。同蒲线北段每个车站，都挤满了欢迎八路军的群众，那情景让我既兴奋又吃惊。

特别是在太原站，虽已是午夜时分，我们老远就看见几盏高悬的水银灯，把站台照得如同白昼。车未进站，那里已经爆发出海潮般的欢呼。列车刚刚停靠站台，工人、学生、市民和一些小商小贩全都涌了过来，围住各节车厢，一边热烈问候，一边把核桃、花生、红枣、香烟和毛巾等慰劳品往车厢里扔。

许多青年拿出纪念册，要我们的战士签名留念。我们

的战士在本子上写下杀敌誓言后，他们高兴极了，有的就把那支签名的笔送给了我们的战士。

一位女学生双手张开半件烧焦的布褂子，上面还有暗红血渍。她哭着向战士们诉说父母惨死的经过。她身边站着一位七八岁的小女孩，看模样是女学生的妹妹，小姑娘脖子上套着一根黑绸带，黑绸带下面拴着一个相眶，相眶贴着她枯瘦的胸脯，里面是一张“全家福”照片。显然，这一家现在只剩她姐妹俩了。姐姐在嘶声控诉日本侵略军的罪行，小妹妹却不言不语，默默站立着。一问，才知道，小妹妹的两耳已被炸弹震聋，什么也听不见了……许多战士听了直流泪，湿漉漉的眼里闪射着一种渴望复仇的怒火。

在站台上，我和一位老铁路工人交谈起来。他告诉我，昨天日军飞机又轰炸了太原市，南关一带被炸得很厉害。太原市的群众早晨就在这里等候欢迎北上抗日的部队了，八路军一一五师是第一批开进华北的。

站台上还有许多东北三省的流亡学生，他们衣履破旧，无家可归，为呼吁抗日救国，已在车站扎下大营。他们举着大旗和标语，臂挽臂列队唱起悲壮的《松花江上》，唱着唱着，声音哽咽了，眼里滚出的泪水，就象断了线的珠子。

群众热情地要求我们发表演说。我便站在车厢上，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达我们八路军的抗战决心。

战士们激动极了，大家持枪列队，齐声高唱《打回老家去》，感谢父老乡亲的热望。

列车添煤加水完毕，呜的一声长鸣。就在这即将分别的时刻，车上车下的人纷纷抢着握手，不少人失声痛哭起来。太原站渐渐远去，我回首凝望，那里仍旧灯火通明。

第二天，列车在太原以北继续奔驰着，不料，日军的飞机就来轰炸了。敌机时而俯冲，时而扫射，搅得车上的同志们不得安宁。但是，敌机的轰炸和扫射，并没有吓倒我们八路军，反而更加激发了我们坚决抗战的爱国热情。

列车最后一节车厢是唯一的卧车，在临汾站加挂的。车内有位东北军的将军，是个骑兵军长，名叫何柱国，对我们颇有好感。从临汾起一路上目睹了群众欢迎我军的热烈场面，他感慨不尽地对我说：

“红军得民心，得民心即得天下。有此依靠，日寇纵有坚甲利器，何足畏也。”

可见，我们抗日，不仅自己有信心，就连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对我们也是抱有希望的。

天刚蒙蒙亮，独立团就到达了晋北原平车站。

我刚刚跳下车厢，在站台上踢蹦着，舒展酸麻的腰腿，就见一一五师师部通信员赶来。他说，聂荣臻政委正在车站东面十几里处一个村庄里等候我们。

我和参谋长熊伯涛立即随通信员赶去。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满身大汗地进入村中一个小院落。

聂政委正站在碾台边，细心观看铺开的军用地图。见我们来了，他高声道：

“成武同志，部队辛苦啦！”

我简略地汇报了部队东渡黄河和搭火车北上的情况。他听后问：

“有掉队的吗？”

“没有，战士们情绪高得很。”

“你们上来得很快，好！但敌人的动作也不慢啊。”

聂政委把我们领到地图前面介绍说：就在我们北上的这些日子里，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已经攻占华北重镇张家口和大同；此外，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团配合察哈尔派遣兵团已攻入蔚县及内长城一线，他们企图突破平型关、雁门关等险要关隘，进行“太原攻略战”。一一五师原定作战方案是驰援张家口和大同，现在改为：抢占察南、雁北地区的飞虎口、九宫口、直峪、石门峪、恒山一带，寻机歼敌。独立团的任务，是立即开赴平型关西面的大营镇集结待命。

“从这里到大营有四百多里路。”聂政委指着地图说，“为了争取时间，减少部队疲劳，你们去找国民党要汽车，他们在原平有一个军事交通处。”

我们喝了几口水，告别聂政委，直奔“原平军事交通处”。该处的负责人是一个国民党上校，面庞瘦削，胸脯笔挺，大热天还穿着整齐的军装，一本正经地接待了我们。

听我们说完来意，他阴沉沉的脸变得惊讶了，怀疑地打量着我们。

“哦，贵军真要上前线？”

我们以沉默回答他。因为，类似的问题，这几天我们听腻了。

上校见我们不语，窘迫地“哦”了几声，神情关切地压低声音说：

“日军已经攻下大同，先头部队离这里不到二百公里。飞机、大炮到处轰炸，几十万国军都没顶住，你这一点人，这么简单的武器，唉，请三思……”

我淡淡地答道：“上校既然对日军这样了解，对红军的战斗力大概也知道一点吧。”

“那当然。在江西，在陕北，兄弟都同贵军交过手，现在都是一家人了，不必遮羞。直说吧，我们的牛师长还被贵军俘虏过。”

“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应当携手抗战。”我打断他的话，“相信你不会拒绝合作的。”

上校却把双手一摊：

“贵军的抗日勇气令人敬佩。兄弟本应全力相助，只是实在拨不出车辆，只好请二位谅解。”

窗外土场停着一百多辆卡车，我们早就看见了。熊伯涛同志指着那些车说：

“我们只要一半就够了！”

上校作色道：“这些车可动不得，是长官部的，已有派用。二位不要误会，兄弟委实难以相助。”

我说：“你既然作不了主，那么请你给阎锡山长官司令部挂电话。”

“兄弟不敢。”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只有强硬起来了，今天非弄到车不可。我起身再次向他申明：

“我们是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开往前方的，情况非常紧急。由于你的阻挠，我们可能丧失战机，后果你要负责。我不得不报告八路军总部，公开揭发你这种阻挠抗战的行为。”

上校愣了一会，叹道：

“这样吧，等兄弟打完电话，再遵命行事，如何？”

“那你就打电话吧。”

过了半小时，上校从里屋出来，一反旧颜，满面赔笑道：

“阎长官非常赞赏贵军的战斗勇气，指示兄弟，全力满足贵军的要求，并且要兄弟转告，请你们以最快速度开赴前线，重创日军，以慰国人。二位还有什么要求？请讲。”

“没有喽。”

“那么，祝贵军奇兵制胜。”

这位上校满头大汗，再不说“日军飞机、大炮”之类的话了，而是口口声声祝我们胜利，殷勤地一直把我们送

出门口。

我和熊伯涛同志相视而笑。阎锡山的老谋深算，世上有名。现在，他的部队已被日军咬住了，想利用八路军顶住日军，掩护他撤退，保住他的山西老巢。

独立团分乘五十多辆卡车从原平出发，向大营镇急进。过了代县之后，扑入眼帘的是一片山河破碎，溃兵如潮，百姓离乱的凄惨景象。

六架日本军用飞机，分为两批，低低地擦着树梢飞过，喷出一阵弹雨，然后朝太原方向飞去。敌机在天边消失后，我惊讶地看到，从壕沟，从村庄，从庄稼地，从各条小路，从凡是可以藏身的角落里变戏法似地冒出国民党溃兵，蚁群一般涌上公路，与我们争道而行。

我们向北，要上前线。

他们向南，要往后撤。

我们的卡车只得在溃兵的乱潮中困难地前进，同志们算是看够了他们凄凄惶惶、狼狈不堪的丑态：好些人把步枪当扁担，挑着包裹、鸡鸭；还有人怀中揣着一个酒瓶，边走边骂，满口酒气与脏话；伤兵无人理睬，躺在路旁呼号、呻吟……一路望去，竟然看不到一个戴正了军帽，束紧了子弹袋的国民党军人。我们这支逆潮北进的部队，也引起他们的惊异。

国民党军队里的一个老兵朝我们指点着说：

“喂，你们把方向搞错了，快掉头，前面是日军。”

我的警卫员回答他：

“我们就是去和日军作战的！”

谁知这句话竟引来一片讥嘲和劝解：

“你们就这几支步枪，逞什么英雄？”

“上去了可就下不来啦，要知道，日军凶得很哩。他们一个班能攻下一座县城啊！”

“他们脖子上挂个小佛像，有神保佑，子弹打不中他。他们还有飞机、大炮，你们有什么？”

我们的战士心里说：你们就会抢老百姓，在日军面前都成了草包，等我们上去打个样子给你们看看吧！不知谁嚷了一句：

“怕死的，快走开吧！”

他们之中也有人不服，争辩说：我们也不想打，长官不叫打；我们不愿意撤，长官非叫撤。我看见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伤兵倒在泥泞里，挥舞着半截拐杖，有些神智不清地吼着：

“冲啊，和日寇拼到底！不许退，一个也不许退……”

接着而来的是一串串马车和担架，但上面不是伤兵，而是官家的太太和小姐，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仍然打扮得妖里妖气，身前不是搂着个首饰盒子，就是抱着只狮毛狗，身后跑着勤务兵和老妈子、挑夫。看那样，平时一定挺威风，可今天他们却招到了退兵的嘲骂。

路沟里散置着许多被遗弃的机枪、山炮和一箱箱子弹，

任凭日晒雨淋，溃兵践踏。联想到改编时，国民党政府不肯发给我们一枪一弹，不由人不气！路旁田野里还散布着许多炸弹坑、烧焦的汽车、破衣烂鞋、罐头盒、国民党军旗、日军的传单等等。

我领着队伍往前赶，心中却感触万端：这都是国民党中一部分人实行不抵抗政策的恶果啊，亡国论、唯武器论甚嚣尘上，部队怎还会有士气呢？其实，不少下层官兵是渴望抗战的，是他们上面的一些人消极抗战、保存实力，使他们欲战不能，只好败退。然而，“兵败如山倒”。什么体面、廉耻、军纪、良心，他们统统不顾，一路撤一路骂，一路抢一路吃。沿途村庄被洗劫后，十室九空，集市无人买卖，庄稼无人收割。逃难的乡亲象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溃兵们。眼下，百姓还未遭日本侵略军蹂躏，却先吃尽了国民党溃兵的苦头。它使我想起在太原站，从学生们抛上车来的报纸里读到的一些消息：国民党某师从山西沙河、大营一线退到代县、崞县、忻县、五台一带，沿途没有逃脱的妇女，从十三岁到四十多岁几乎没有不被侮辱的。凡退军所过之地，所有的牲畜都被他们以“军需”的名义牵去了。但是牲畜背上驮的是女人和家私，而真正军需之物：枪、炮、弹药之类却委弃于地……眼下的一切，不也是这样吗？尽管国民党政府在华北驻有近八十万军队，可是他们与日军稍作接触，就溃成这样，这说明了什么呢？

是的，正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才带来了中华民族的

恶运。“七·七”事变之后，两个来月，黄河以北大部国土，在国民党军队南撤的脚步下迅速沦丧了。而我们呢，为了民族的解放，却恨不得一步跨上前线，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初 战

在奔赴大营镇的途中，是战备行军。因为离敌人越来越近，即使途中碰不上敌人，再往前，也必定会有一场恶战，这是完全可以估计到的，这就是我们一一五师出师敌后的第一仗，也就是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讲的“初战”或“序战”。自然，这一仗只能打好，仗打好了，不仅对我这次回到红一师改任军事指挥员是个鼓舞，而且可以增强部队指战员战胜日本侵略军的信心，激发他们抗日的战斗热情。

大营镇到了，面前一片混乱。

我在破砖碎瓦中穿行，四周的断壁颓垣仍在冒烟。一位老乡告诉我：这里原来是国民党镇党部。可不，一块又长又大的门牌虽被烧焦了，但牌子上那几个字仍依稀可辨，国民党党旗在院中旗杆上有气无力地蔫搭着。我探身朝里面唤了一声，无人回答，只嗅到一股刺鼻的焦臭味。镇外有几处新坟，纸钱随风翻卷，坟前插几根残香颤颤巍巍。

问明师部位置，我和熊伯涛同志匆匆赶去，走进一间

瓦房，见到了师长林彪¹。他指着桌上的材料，说：

“你们先看通报。”

我拿起通报一看，是总部拍来的。内容是：

国民党军队在平汉、平西线作战，由于不敢发动群众，不敢机动，不敢侧击，也不敢深入敌后独立作战。故较强者力守挨打，较弱者稍触即溃，老朽者闻风而逃，动摇者则引狼入室。日军得以少数兵力纵横驰骋，致使我华北屏障尽失，黄河北之重镇，有全部陷落之危险。

林彪说，一一五师原准备抢占飞虎口、九宫口和蔚县、广灵以南一带。可是，日军坂垣征四郎中将率领的第五师团已经迫近，我们来不及了。但大营镇东面几十里处的平型关，是日军南下忻口的咽喉要道，那里群山绵亘、沟谷密集，便于伏击敌人。现在，决定利用这一带有利地形打一仗，独立团须马上赶到平型关东南方向的上寨、下关集结，随时准备出击。

我们独立团连夜赶了一百多里路，于凌晨到达上寨镇。哪知，刚刚与师部接通电线，就接到师首长电话，命令我派一位精干的侦察参谋，率人插到灵邱以南的太白山去侦察敌情。

我马上想到了熊招来²同志。他原是红一师三团的参

1 林彪后来走向了反面，成了阴谋家、野心家、叛徒、卖国贼，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皇出逃，乘飞机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2 即熊奎同志。

谋长，云阳改编后，调任侦察参谋，随三营行动，在侦察工作方面，很有经验。我便往三营打电话，配给他一部电台和一个便衣侦察班，让他立即出发。

九月二十三日中午，熊招来从松鼠岭发来电报：

日军第五师团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占灵邱城，正在那里大肆绑抓民夫、掠夺牲口。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即将向平型关进犯。

就在这一天，我又从逃难乡亲的哭诉中得知，昨夜间，涞源城也沦入敌手了。这一来，敌人距我们几乎近在咫尺。而且，灵邱、涞源两路敌人又可互援互进，无论打哪一路，另一路敌人必会赶来解围。情况复杂了。

我把敌情报告给师部，师首长果断地下了决心：战机已到，打！在平型关开设战场，集中主力消灭由灵邱城南入侵之敌。

随后，我又匆匆赶到师部，参加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师长林彪介绍了敌情，分析了首次与日军作战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聂荣臻政委特别强调了八路军出师抗战第一仗的重大意义：

“这一仗必须打胜，打败了或者打个平手都不行！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都在盼望八路军第一个战报！……”

那天天气很热，近百名干部聚集在一个小院子里，军装都汗湿了。墙角有个大水缸，边上放几个粗瓷碗，谁渴了可以去舀凉水喝。但大家静静坐在台阶、泥地、破砖

上，任凭汗水往下淌，没人走动。他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聂政委的讲话，生怕漏掉一句，眼中却不时地漾动着严峻与兴奋的神采。

由于时间紧迫，会议很快结束了。这时营、连干部“轰”地一下围住水缸，互相拥挤着，发出响亮的“咕咚咕咚”咽水声和舒畅的喷嚏声，然后一个个说笑着大步赶回驻地。等我挤过去喝水时，那口水缸已快见底了。

“嘿，好大的肚量！”我忍不住笑了。

接着，各团的领导干部又聚集在一起，分别受领了各自的作战任务。

我们独立团的任务，就是大胆深入敌后，隐蔽地插到腰站地区，切断敌人从涞源至灵邱和从广灵至灵邱的公路运输线，阻击涞源、广灵两个方向的日军援兵，保证兄弟部队歼灭平型关正面的日军。

师首长叮嘱我：你们如不能把敌人的援兵挡住，平型关战斗就胜负难料。所以，你们必须全力以赴死死顶住敌人，绝不可放过一兵一卒。

我应道：“保证完成任务！”心里明白：独立团深入敌后打援可能是场恶战，但它又是夺取平型关战斗胜利的重要保证。我们必须象座山那样挡在敌人的前进路上，无论敌人怎样疯狂攻击，我们都不能退后一步。独立团要夺取的胜利，不光是消灭多少援兵，更重要的是，为兄弟部队提供歼灭平型关日军所需要的时间。平型关战斗胜利了，就

是打援胜利了。这样一来，也就要求独立团在一个局部战场上，为全局的胜利付出更多血的代价。

“可不能拼消耗噢。”聂政委向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说，“将来还要开辟根据地，和日军长期作战。头一仗倘若把你们的本钱打光了，那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不过，我相信你们会打好的。”

回到上寨团部，战士们站在镇口笑咪咪地望着我们，武器装备已收拾停当。原来，我们一去开会，他们就料到要打仗了。是啊，自从一八三六年夏东渡黄河到现在，我们厉兵秣马一年多，还没有机会显试身手呐，战斗欲望早就按捺不住了。

午饭后，我们独立团从上寨出发。一口气蹿出去三十多里。山里天黑得早，六点多钟，四周就昏黑一片了。我们手拉手涉过唐河，闻到空气中有稀薄的焦糊味，我判断：快到村庄了。果然，上、下北泉就在唐河北岸上，这两个村庄都不算小，相距二里多，焦糊味就是从村里飘来的。

趁副官李光汉同志进村号房子时，部队在宽阔的河滩上坐下，各连抓紧时间进行战斗动员。可是直到动员完毕，房子还没号好，李光汉同志回来向我报告说：

“村里一个人也没有，怪事，简直是个死村子。”

我走进村庄，果然死气沉沉，转了几条巷子，别说人，连条狗也见不到。细看，房门都锁死了，窗缝里也不见光亮，大概人们都离村避难去了，可总该有一两个守家的人

啊。继续找，到了村庄深处，忽然听到有麦秸压动的响声，循声望去：一堵矮墙根下，似有几个蜷缩的人影。靠近看，五六个年近古稀的老汉，相挨着坐在麦秸捆子上，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垂着头不看我们，口里虽然紧含着烟杆儿，却不敢点火，大概是怕烟火亮光暴露了他们。

我连喊几声，他们不理睬，身体簌簌发抖。

“我们是八路军，来打日本鬼子的。”

听到这话，一个老汉动了下身子，抬头疑惑地问：

“真的呀？”

“毛主席、朱总司令派我们来的。你们听说过红军没有？我们就是红军改编过来的，现在叫八路军。”李光汉同志向他们解释道。

“听说过，听说过。那队伍能打，也讲规矩。只是……他们不还在河西么？”老汉们渐渐兴奋了。

“为了抗日，我们过河了。大爷，这村里的人呢？”

“都上山喽。”老汉们互相搀扶着站起来。

原来，村里的乡亲为了躲避日本侵略军的残害，都藏进村北的大山里去了。这几个老汉，舍不得故里家园，他们相约着留下：日军要是来了，就任他杀剐；日军要是没来，就替全村人守村子。今天，灵邱县城方向大炮响了半日，天黑时只见那边闪着火光，他们估计准是日军到了。刚才在月光下，他们看见我们过河，以为是日军，觉得这回性命难保，索性在这里等死，万没想到来的竟是抗日的

队伍。

老汉们乐呵呵的。一个人举着火把，一个人拿着锄头叮叮当当在一个地方挖开了，先挖开一堆草皮，接着又往下刨，不一会刨开一口大缸，他们揭开盖子，露出满满一缸核桃、红枣、花生，他们硬让我们吃。而另外几位老汉则提着一盏小灯，上附近的马驮山唤人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男女老少呼呼啦啦涌进村，把我们战士团团围住。妇女则奔回家中，为我们腾房子、烧水、做饭，几个孩子还用柳条簸箕端来花生、瓜子等吃食，我们顿时感到身在苏区般的温暖。

战士们和乡亲们聚在一起笑着唠着，相见的欢喜过去后，几位乡亲流下泪来。

距上、下北泉三十余里有个南、北石佛，两地的百姓有不少通亲联姻。就在前天，西进占领涑源的日本侵略军闯进了南、北石佛，乡亲们躲避不及，牲口全部被抢走了，十几位妇女受辱，三位反抗的青年被刺刀捅死。日军上午撤走，下午又从蔚县败下来一百多名国民党溃兵，进村就威逼着乡亲们“犒军”。牲口没了，他们就杀鸡宰鹅，穿在刺刀上烧着吃。醉饱一通后，野性大发，几个当官的把大盖帽往地上一扔，就去强奸妇女。当兵的翻箱砸柜搜刮财物，连老婆婆、小媳妇头上的簪子、耳环都硬拽下来，塞进自己腰包。整个村庄被践踏得乌七八糟。后来听到山头上枪响，他们才紧忙溜了。

逃难的人把消息带到上、下北泉，全村人心都乱了。他们仇恨日本侵略军，也恨那些大发国难财、人面禽兽、既怕死又贪婪的国民党溃兵。因此，他们把所有能吃的东西全部埋藏起来，然后撤进深山，只留下一座空荡荡的村庄和几位死活不肯离家的老人。

战士们听了，激愤难捺，对日本侵略军的痛恨和对国民党溃兵的痛恨交织在一起，个个夜不成眠。

九月二十四日清晨，部队集合出发。乡亲们自动聚集到晒场上为我们送行。看见前面的队伍已走上东北面的小路，他们确认我们是去和日本侵略军作战的，于是泛起一阵兴奋的议论声。

昨晚在这里“等死”的一位老大爷，仔细瞅了瞅行军队伍，然后悄悄走近我，犹豫地问：

“杨团长，你们咋没炮哇？”

“是没有炮。您放心，我们到日本鬼子那里缴去！”

他不作声了。我明白，乡亲们见我们只有简单的轻武器，却敢去和装备着飞机、大炮的日军作战，他们又敬佩又忧虑。我不愿意多做解释，因为只有战斗胜利的喜讯，才能使他们放心，使他们更深刻地了解八路军。

我们以急行军向腰站前进，两旁高山如天门欲合，当中一条石铺小道，恰容战士们持枪小跑。快到山顶时，小道更窄了，大家手攀脚蹬，穿过荆棘丛和乱石堆，一气越过马驮山，进入天降沟。从这里开始，山势渐渐低下，道

路也愈见开阔，我们摆开了战斗队形。

前卫营是一营。营长曾保堂，教导员张文松，副营长袁升平，都是久经沙场的红军干部。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一营的战斗力的确很强。他们的前卫连是一连，连长是张德仁，前头摆的那个排如同一把刀尖，在前面搜索前进。

晌午时分，路旁山洼部显露出一个村角，腰站到了。我举目望去，腰站东面有座高山，山顶有个马鞍形的隘口，那就是驿马岭，公路从隘口处通过。好地形！如果在隘口处伏兵，这条细窄的公路就落入我们的火网中了，日军万难通过。我命令一营做好战斗准备，占领驿马岭隘口。

驿马岭是山西省与河北省的交界地。岭西是山西，岭东是河北。等仗一打完，我们就要踏入河北境内了。我有些激动：离敌人越来越近了。脚下的公路越发盘旋曲折，左拐右拐，弯道不绝，可监视的路面不过几十米，战士们贴着山根快步前进。突然，前面响起枪声，枪声夹杂着马嘶。我一惊，快步赶上前。

待我赶到时，枪声停止了。只见一匹受伤的日本战马在草沟里翻腾，路面上横躺着两个日军尸体。

“怎么回事？”

尖兵排喜孜孜地向我报告：他们正走着，忽然听到细碎的马蹄声，还没来得及隐蔽，公路拐弯处就冒出了一群高头大马，马上骑着穿黄军装的人，相距不到五十米。排

长眼明手快，看到这伙骑兵头戴钢盔，刺刀还挑着一面日本旗，便大喝一声：“冲！”同时先敌射出一串子弹。

战士们随排长冲上去，一边冲一边射击。敌人被这突然袭击打懵了，哇哇怪叫，战马在公路上惊得前扑后蹦，有两个家伙枪还没端稳，就栽下来了，其余人骑着马掉头就跑。一共也就几分钟的事！

我想，日军也没什么了不起，不象国民党溃兵吹的那样，日本兵和我们一交手，就露怯了嘛。看来，他们早已先期占领了驿马岭，我们还不知道呐。而他们对我们的神速接近也一无所知，所以才出现这场遭遇战。

我命令部队立即占领公示两旁的山头，构筑阵地。这些山头比驿马岭矮些，但仍可以堵住敌人去路。

下午，侦察员报告，日军二十八师团又一个联队从涞源城向腰站赶来了。

情况严重，日军装备精良，从人数上说，一个联队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团啊！我估计敌人到达腰站已是夜晚，而他们不知道我们虚实，夜晚是绝不敢通过腰站的。那么明晨必定会有一场恶战，我们只有一夜的准备时间了。

为了打好这一仗，我们决定：一营在山上警戒；二营连夜进抵三山镇，切断广灵通往灵邱的公路；三营作为预备队，后撤白羊堡宿营。团指挥部随一营驻扎在山上。

刚刚入夜，天就下起毛毛细雨，打起闪来了。不一会，风声、雨声、雷声，一起在山间轰响，震人心魄。山水渐

渐汇积，越蓄越多，越淌越急。忽听山上呼哗一阵响，不知哪里破了口子，滚滚山水卷着泥沙从我们身下冲过。借着闪雷的光亮，可以看见山岗里的战士们怀搂着步枪、手榴弹，静静地坐在一块块岩石上，任凭雨打水冲，没有人离开自己位置。就这样，我们在雨中持枪坐到了天明。

天明时雨停了，山间却聚满了浓雾，五米以外就人树莫辨了。这正是隐蔽运动的好时机。我下达了命令：保持肃静，迅速占领阻击阵地。

大家心里明白，也许敌人也在此刻运兵，说不定又会突然相遇，为应付意外，禁绝任何号音、哨音和高声喧哗，战士们弹上膛，枪上刺，一个盯着一个，竭力不使身上的披挂相碰出声响，蹑手蹑脚地占领了阵地。

七点多钟，浓雾悄悄散尽，峰峦沟谷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岩石缝里发出轻轻的流水声，树下、草间、土沟里都卧满了战士，他们在紧张地擦拭枪支。

刚来的情报说：今天凌晨，涞源城又开了一个联队的日军，赶到了驿马岭。

这样，我们面临的敌人就是两个联队了，兵力超出我们数倍。怎么办？只有坚决阻击！我们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敌人并不知道我们有多少兵力，所以我们决定猛打猛冲，毫不犹豫，使敌人对我们兵力产生错误判断，不敢倾巢攻击。

敌人已经占领了驿马岭顶上的隘口，把它作为支撑点

向我们挺进。我们要挡住敌人，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拿下它。可是眼下不行，我们只好布置一连正面阻击，视机冲击隘口。二连从右翼袭取隘口，三连迂回攻占南面比隘口更高些的山峰，用火力压制隘口上的敌人。

“来了！”有人低声道，“喏，这么多！”

一群身穿土黄色野战服、提着三八大盖枪、戴着钢盔的日军下了隘口。他们摆开战斗队形，两三人一伙，利用岩石、土坎做掩护，探头探脑地朝我们逼近。

一连的机枪首先开火。顿时，各个山头的枪弹齐发，眼见几十个敌人栽倒了。但是大群敌人并不后撤，而是呼啦一下散开，藏到隐蔽物后面同我们对射。已经倒下的敌人居然也带伤爬起身，拖着枪往土沟里爬，继续攻击。

我把敌人情况报告师部。片刻，师部就复电了：你们要坚决阻击当面之敌，不得放其西进。平型关那里的敌人已进入我伏击圈，战斗即将开始。

我一阵兴奋，好啊，只要我们死死顶住这股敌人，平型关的胜利就有把握了。

一连阵地忽然站起一个满身是泥的人，挥动驳壳枪，率领战士们冲锋。我细一看，是“醴陵拐子”张德仁。他是一连长，湖南醴陵人，个子不高，但很机灵。他不但不拐，还有一双快腿，爬山涉水总走在别人前头。他活泼，好动，爱和同志们开玩笑。别人常常对付不了他那股“刁”劲，所以戏称他“醴陵拐子”。这时他的帽子不见了，大步

如飞地朝敌人冲着。半道上，他把驳壳枪往腰上一插，一弓身，拾起敌尸旁的一支三八大盖枪，打开枪刺，又前进了。不一会，他领着战士们喊着“杀——”，冲进敌群，与敌人展开了肉搏。一刹时，猛烈的刺刀碰击声隔很远都能听见。

几分钟后，下到公路上的敌人被他们消灭了。张德仁同志从敌尸手里换了一支枪，擦去溅到脸上的血，沙哑地喊了一声：“上啊！”又朝隘口冲去。

我紧盯着他，只见他象松鼠似的，又蹦又跳，紧随着溃退之敌，一步不放地往山上冲，致使敌人无法用火力阻拦。

不料，他冲到半山腰时，隘口两翼突然喷出七八条机枪火舌，张德仁同志身子晃了几晃，便和前面的两个日本兵一同摔倒了。他身后的战士也纷纷中弹，顺着山坡滚了下来。

我心如刀割，一连今天损失大了，牺牲的同志中，有不少是红军战士啊！

这时，西南方向传来了炸雷似的山炮轰鸣，我循声望去，不禁喜道：

“好哇，平型关战斗开始了！”

紧接着，师部电告我们：敌三千来人遭我伏击，战斗进展顺利。你部须坚决阻击敌援，直至师主力战斗胜利。

平型关的炮声，震撼了我们面前的战场。敌人有些惊

慌，火力顿时弱了。我立刻命令司号员吹号，让二连从右翼阻击隘口。

望远镜中，闪出一个矫敦敦的身影，那不是二连一排的“麻排长”吗？只见他率领十几个战士，攀上连山羊也难以立足的一壁悬崖，消失在乱蓬蓬的灌木丛中。

那可是敌人没注意到的地方啊！我的心咚咚直跳，密切地注视着隘口上的动静，同时命令正面部队再度发起攻击。

别看“麻排长”其貌不扬，但气力极大，他怒喝一声，那声音简直象猛虎长啸。枪一响，他在战壕里就呆不住，非扑出去冲杀一番不可。平时，一些战士常和他开玩笑：

“‘麻排长’，你这辈子休想找到老婆，即便找到，也会被你这副长相吓死。”

他嘿嘿一笑，从不发火，有时也争辩道：

“麻子怎么啦？麻子也是一条硬汉。找老婆干么，革命没成功，还是先干革命吧。”

“麻排长”率领战士们果真从悬崖攀上去了。他悄悄爬到隘口旁的一块巨石后面，探身一望，嗬，敌人指挥部！

山洼里密密麻麻支满了帐篷，还停着几辆摩托车。几百个日本兵正在隘口后面一边吃干粮一边喝水，准备出去。

怎么办？敌众我寡，在这里打，顶不了几分钟自己的人就会打光。干脆，冲进敌群，来个乱中血战，再设法脱身。这样虽然危险，但可以歼灭更多的敌人。“麻排长”决

心下定，便将手一挥，全排战士都拔出了手榴弹。随着“麻排长”一声令下，大家一声不吭地跳进隘口，扑入敌群。

没等敌人反应过来，十几枚手榴弹就落到他们头上了。“麻排长”他们手榴弹打光了，紧接着又和敌人拼刺、肉搏。隘口的敌人遭此突然袭击，死亡惨重不说，一时间，简直乱了套。但“麻排长”他们终因人数太少，寡不敌众，最后还是陷入了敌人的疯狂射击中。“麻排长”腹部、腿部多处中弹，仍然死战不退。他不退，战士们也不退，拼力和敌人厮杀。结果，大部分同志，包括在云阳改编时擅自离队的三班长也都战死在隘口上了，只有几个战士带着伤撤了回来。

一排的勇猛突击，虽然没拿下隘口，却大大杀伤了敌人，使敌人变得心惊胆战了。他们搞不清楚我们有多少部队，只好三面防御，不大敢向我们正面阵地冲击了。倘若他们知道我们只有两个营，猛烈突击的话，战斗的胜负就难以预料了。可见，在优势敌人面前，我们一味固守是不行的，只有力争主动，猛打猛冲，大胆迂回侧击，才会使敌人望而生畏，左右挨打。

就在“麻排长”他们与隘口敌人激战的时候，副营长袁升平同志和教导员张文松同志率领一部分队伍，占领了南面比隘口更高的山头。那山头上还完整地保留着阎锡山第三旅半月前挖掘的堑壕——这些友军虽然挖了堑壕，却一弹未放地撤走了。正好我们利用上了。

袁升平同志跳进堑壕，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张文松同志跟进来说：

“让我看看。”

“注意隐蔽噢”。

“没事儿。”张文松同志举起望远镜一看，不由地低声惊叫，“嗨，最近的敌人不到五十米，好打！”

恰在这时，从小树林飞来一颗子弹，正打中张文松同志的胸膛，他“嗯”了一声，仰面倒袁升平同志怀里，当场牺牲了。袁升平同志愤怒得发抖，他喊通信员把张文松同志遗体背下去，接着就端起机枪，朝小树林后面的敌人猛扫……

抗战初期的日军，大都经过严格训练。他们战术熟练，枪法准确，野战服与秋庄稼颜色一致，便于隐蔽，攻击力强，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使他们侵入华北以来，攻城略地，长驱直入，虽和国民党军队打过几仗，也轻易地取胜了，因而傲气正盛，枪一响，敢打敢拼，十分疯狂。而我们八路军呢，出师以来，士气正旺，满怀民族仇恨，正憋足了劲要给敌人一个痛击。两兵交手，构成了一场浴血恶战。

日本士兵与国民党兵截然不同。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我们只要冲到国民党士兵面前，大喝一声：“缴枪！”他们多数会把枪一扔，伏地投降，没几个拼死顽抗的。而今天，我们冲到日本兵面前，他们却主动跳出来，端着又长又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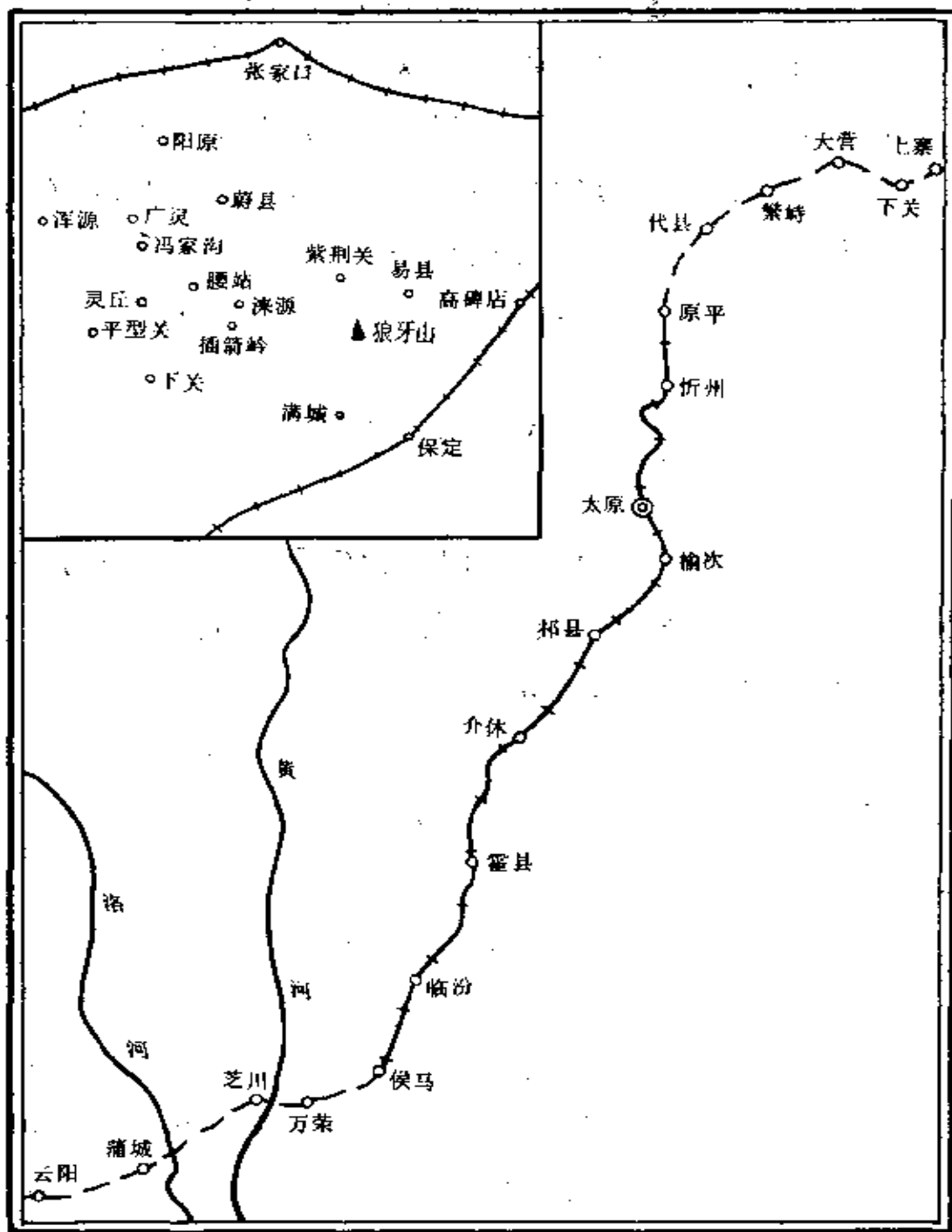
的三八大盖枪和我们拼刺，刺杀技术强不说，负伤了也不投降，抱住我们的战士又掐又咬，使我们不得不把他们一个个消灭，以致增加了我们取胜的代价。

下午四时，师部拍来电报：歼灭日军坂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千多人。你们独立团已胜利完成打援任务。

我们得讯，欣喜若狂，立即派出团预备队五个连和一营的一个连，插到隘口东面，从敌人后路打上去。由于我们这支生力军一直在养精蓄锐，而此刻，隘口上的敌人已成疲惫之师，加上他们摸不清我们是什么部队，打得这样勇敢，也摸不清我们有多少人，竟敢一次又一次地冲杀。他们只知道平型关的日军快完蛋了，于是，更怕自己也陷入绝境。当他们的后面枪声一响，山上便人影窜动，乱了阵脚。我们呢，趁势在正面也发起了冲击，四面山头齐吹冲锋号，战士们呐喊着扑向敌人的阵地。从望远镜中可以清楚看到：敌人在胡乱吞吃干粮，把喝空了的水壶、雨布、饭盒全扔掉了。哦，敌人要跑！果然，残敌向右面聚集，集人火力冲上隘口，夺路逃向涞源城。我们乘胜追击了五十多里，一营一直逃杀到涞源城下。敌人又从涞源东撤，一营随即光复涞源，二营继续向东追击。

打扫战场了。大路上、山野里、草棵中遗弃着各种姿态的敌尸三百多具，机枪、步枪、手榴弹、折断的刺刀、击穿的钢盔满山遍野到处都是。可惜的是由于日军顽抗，我们没有抓到一个活的，仅俘虏了一此伪军。

——五师独立团北上行动路线略图



晚风还未吹散山谷里的血腥气和硝烟味，远山已经传来凄厉的狼嚎了。

初战结束了，这是场胜仗，也是场恶仗。一连和三连减员过半，有的班排全部阵亡。好些伤员是在战斗结束后才昏倒在地的，牺牲同志的遗体上，不少是身中数弹，曾给黄苏同志当特务员的会昌老倭罗立铭同志，此时在一营当排长，也是这么英勇牺牲的……

历史开始证明：有八路军在，中国不会亡！

冯 家 沟 伏 击

天亮后，平型关大捷的消息就传开了，我们走到哪里，都遇到箪食壶浆踊跃劳军的群众，每进城镇，还有不少身着长袍、马褂的绅士和商贾沿街向我们作揖称贺。他们摇着小旗子，一口一个“劳苦功高，可敬可佩！”完全改变了旧日对共产党的看法，希望我们“提胜利之师再度出击，莫使日寇进城。”

平型关大捷震动全国。国民党军队也开始在忻口、太原方向抗击日军，华北抗战出现了新局面。

九月间，毛主席又先后给八路军和地方党发出五个重要电报，规定了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战略方针为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其中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

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当时，八路军总部和一一五师领导及时地将这些精神转达给我们，并且指出，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是我们取得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途径。

十月上旬，总部即命令我们向敌后挺进，任务是配合忻口、忻州附近的国民党友军作战，破坏敌之后方联络，断绝敌之交通，以游击战术的手段与敌人在广灵、灵邱、涞源、蔚县地区周旋。

此时，敌人每天都有数十数百辆汽车、马车在这一带的公路上跑来跑去。

涞源之敌，因深入山地，怕挨打，不敢出城。

十日夜，我们的一营及便衣队袭击涞源，日军一百多人闻风而逃，我们胜利收复涞源城，涞源十四万同胞又重见天日。

就在当天夜里，我们又接到了一一五师转来的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令：向敌后挺进，以北岳恒山地区为中心，放手发动群众，开创根据地。我们即派出小部队四处侦察，很快摸清了敌人运输部队的行动规律，并决定：一营和三营立即从涞源城、上寨两地出发，插向灵邱、广灵通路之间的冯家沟地区，伏击日军的运输队；二营则以涞源城为基地，由肖思明同志率领原红十三团的三、四

两个连乘胜向紫荆关、易县退却之敌跟踪追击，收复易县城，沿途发动群众，袭击守城日军，大刀阔斧地开辟抗日根据地。

十月十一日拂晓，准备前去伏击敌人运输队的部队饱餐了一顿小米粥和煎饼，第一营营长曾保堂、副营长袁升平两同志令各连立刻到指定地点集合，全营指战员精神振奋地在一个晒场上集合了。我下达了任务，又简短地动员了几句。同志们听说去伏击敌人的运输队，都很高兴。运输队是块大肥肉，拉着满满的粮秣和弹药，我们出师两个多月，该好好补充一回了。

号声渐逝，部队进入山间崎岖小路，这里离冯家沟近二百里，几乎全是深山大谷，可是明晨必须赶到，因为迟了，敌人运输队就会溜过去。

前不久，一营曾打过一回伏击，谁知敌人竟没有出现，战士们白跑了一百多里，又在山头上埋伏了一夜，身子都几乎冻僵了，最后败兴地返回。今天再度出击，他们不顾昨夜奔袭涞源城的劳累，却忆起上回伏击不成的窝囊。心中有气，脚生风，情不自禁地越走越快。

没走出多远，天就下雨了，原来就模糊不清的山路，现在更黝黑难辨了。有石板的地段，步步打滑；没有石板的地段，泥泞拖脚。只要听到枪支撞击岩石的声音，那就八成是有人摔倒了。

不过，大雨、狂风、跌跤和疲劳对于久经沙场的战士

们来说，根本算不了一回事。大家最担心的是：天下雨，日军的运输队不肯出动。

说来也怪，我们刚一担心扑空，一些同志就以为这回真会扑空，信心也不足了，脚步也放慢了。

快半夜时，我率领着团部从上、下北泉来到腰站这个小山村。不料，我们刚走到村头，忽然传来哨兵的询问：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一一五师独立团。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我们是一营。”

我感到奇怪：按照计划，一营应该在前面迅速前进着，怎么会在这里放起哨了？便上前问：

“营部在哪里？”

哨兵认出我了，答道：

“在村子里。”

“为什么不前进？”

“不知道，营长叫停止前进的。”

我急忙进村，果然看见部队在村庄里分散休息了。找到营部，我劈头质问一营长：

“谁通知你们休息的？”

一营长不安地沉默一会，说：

“战士们太疲劳……天又下雨，敌人恐怕不会出动了……”

他说的是实情，一营战士太疲劳了。有几个人在行军

中还跌到山沟里摔昏了。但眼下无论如何不能擅自停下来啊。我严肃地说：

“不能休息，立刻集合部队前进！”

一营长答应着，出门吹哨，集合部队后继续前进。我看了看表，这一停一走，就耽误了近一个小时，心里暗暗发急，便派人催促前面部队加速前进。

这天，我们在山隙和狭谷中，穿行了一百多里。天黑时，赶到了一个很小的山村：荞麦川。这里的百姓们都姓杨，他们不知怎么听说来的这个团的团长也姓杨，都很高兴，互相转告着，纷纷腾出住房让战士们歇息，待我们亲如骨肉。几位老人还找到团部，问我：

“杨团长是哪里人？……”

尽管乡亲们热情相待，我们却不能久停，大家身不卸装，足不下履，只吃了一顿饭，又起身朝冯家沟地区急进。

到达北白堡，已是下半夜，雨下得更大了，脚下的道路几乎成了水沟子，不时有人扑通扑通摔倒。我们正要穿过村庄，我忽然发现村头影影绰绰有两个哨兵。一问，又是一营的。原来，他们又在这里歇下来了。

这时，我很奇怪，进村找到营部。一营长正在做饭吃，看见我，起身解释道：

“雨下得这么大，敌人肯定不会出动了，没必要再往前走了。”

我说：“雨中行军速度慢，更需抢时间前进，你怎么知道敌人不会出动？”

我说过之后，他默不作声。集合哨又急骤地响起来，一营再次冒雨出发。然而，又耽误了宝贵的两小时，现在只有飞速前进才能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眼前可是一个关键啊，战士们几乎走不动了，如能停下来休整片刻，那真是太美了。何况还真有这种可能，我们拼着命赶上去，敌人运输队就是不出动，我们想打却打不上呢。

可是我知道，不能有丝毫的侥幸和动摇，必须坚决执行命令，即使白跑一趟，也要全力以赴赶上去！因为，能不能打着敌人运输队，要等赶到伏击地域后才能知道，如果在这里舒舒服服休息一阵，就很可能丢掉战机，我们的行动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一营长是位红军干部，立过不少战功，前些日子腰站战斗打得不错，如今行军一疲劳，他又迁就了。不过，被指出以后，他又振奋精神，憋着一股子劲拼命往前赶。部队在大雨黑夜里居然跑步前进了。我听到他大声喊：

“万里长征都过来了，剩下几十里路算个啥。上啊！谁也不许掉队！”

党员们呼应着：

“赶到阵地再休息。”

“打了胜仗再休息。”

天亮前，一营终于赶到南阁崖村，这里距冯家沟只三

四里。战士们进入树林隐蔽，迅速擦拭枪支上的污泥浊水，军事干部则向冯家沟方向侦察地形，选择伏击阵地。

夜雨渐停，东方白中透红。虽然现在可以休息了，战士们却反而不觉得疲劳了。眼下，“敌人来不来？”这倒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冯家沟是一个小村子，紧挨着灵（邱）、广（灵）公路，南接灵邱六十里，北连广灵二十里。路两旁全是连绵不绝的大山，中间利用干涸的沙河滩铺修出一条单薄的汽车路，路宽也就十来公尺，南边有个小山包，形成一个垭口。这种地形对于伏击从北面广灵南下的日军自然十分有利。

于是，我指示一营在冯家沟南边的这个垭口上布置一个口袋阵。他们让一连居西一线排开；二连靠东监视并阻击灵邱方向可能出现的援敌；四连占领路旁山坡；三连留作预备队，隐蔽待命。

随后，我又派三营营长黄寿发，教导员张襄国同志率领部队直插一营南面的义泉岭地区，准备重点伏击可能从灵邱出发，往北来的日军运输队，在同一条公路上，我们向两个方向设伏，前者为主要伏击方向，后者为了配合，但是哪个方向的敌人先出现，即成为实际的主要出击方向，另一方向为配合。这就既可互相支援，又可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在一营布置阵地时，三连连长宋玉琳一直气鼓鼓的，因为三连被安排到后山去做预备队。他争辩着：

“干么不让我们上，我们能打！”

在腰站战斗中，三连损失过半，枪支、弹药消耗得更多，全连只剩下几把完好的刺刀了。那一仗下来，宋玉琳同志伤心得几天不肯说话。今天要打伏击了，他一方面想报仇雪恨，一方面想趁此机会多缴获些武器装备，可偏偏在伏击线上却没有三连的阵地，他能不恼火吗？

不管他怎么争，我们也没有同意他的要求。

宋玉琳同志绷着脸走开了，独自在山头上转悠，我知道他在琢磨着为三连找一块阵地。

果然，他转悠了一会，大步赶回来，对营里的作战部署提出了异议，说：敌人的运输队将由北向南进入伏击圈，枪一响，有两个可能，一是边抵抗边撤，二是不顾死活地往南冲，妄图冲破伏击圈。可我们现在布置的伏击地域纵深有限，敌人若是猛冲一气，很可能穿过“口袋”底部逃之夭夭。他建议让三连到“口袋”底部去，以便必要时堵住敌人，全歼之。

我们觉得他的意见有道理，便采纳了。宋玉琳同志终于得到了一块阵地。从这件事情上，我发现这个连长不但作战勇敢，而且肯动脑子，善于从敌我双方的态势来考虑一场战斗，思索缜密，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指挥员。

宋玉琳同志欣喜地领着三连奔向村东高地。途经一个小山坡时，他看到许多割下的谷草，绑成一捆一捆的，竖成一个个草垛子，心里一动：若从这里伏击敌人，定可出

其不意啊！于是，他当即决定，自己率一个排，带三挺机枪，埋伏在距公路仅二十来米的山坡上。他命令战士们隐蔽在谷草垛子后面，机枪穿过谷草对准公路，说：

“我不开枪，谁也不准开枪，我一打，都打！把敌人打倒后，就冲！非抓几个活的不可！”

军事干部选举阵地时，各连指导员也都抓紧时间对战士们进行了战前动员。他们的口号是：坚决勇猛向前冲，夺取敌人大汽车！

进入阵地后，大家说话也都压低了嗓音。有人还轻声哼起了《打骑兵》之歌：

骑兵来了不要怕，
我们举枪来打它。
瞄得准，放得快，
打得敌人栽下来。

.....

我们打垮它，我们消灭它！

阵地上十分平静。初露的阳光穿过矮树缝隙射来，潮湿的山野开始挥发水气，形成一片淡淡晨雾。轻、重机枪早已安放好，子弹已上膛待发，手榴弹也敞着盖摆在战士手边的草叶上。我们在山坡反斜面注视了两三个小时，仍不见北面观察哨发来敌情信号。

战士们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气哼哼地议论道：

“狗崽子不来，我也不走，看谁熬得过谁。”

“我看不会来了，等也白等。”

干部们又分头做工作，告诫大家：我们已经抢到了敌人的前头，现在关键就是耐心等待了，谁也不要急。其实，干部比战士更急，因为他们知道，按照常规，敌人运输队大清早从广灵出发，现在应该通过这里了。

太阳越升越高，山野中雾气早已散尽，我们越等越不安，这时忽然接到观察哨的信号：发现敌人！

我心里一阵喜悦，战士们也笑了，有人还兴奋地捶了一下大腿，随即大家蹑手蹑脚地进入射击位置，连大气也不敢出，就象来了一只狐狸，生怕把它惊跑了似的。

敌人可还那么骄横大意，只见公路上轰隆隆开来两辆摩托车，接近我们伏击区时，忽然停下了，坐在车斗里的日本兵端起架在车上面的歪把子机枪，接着车头向右一转，掀起一条烟尘，闯进公路下面的冯家沟村庄里去了。

随后，两个骑自行车的便衣，也跟着摩托车进了村庄。

稍过片刻，尘峰起处，公路上出现一群骑兵，约摸二十多人，前面那个家伙的枪刺上挑着一面日本旗。他们刚走到垭口边缘便停下来，了望了一会，接着勒转马头，“得得”地退回村庄。只剩一敌骑兵立在脚蹬上，用望远镜继续观察公路两边的山坡，并不时向后看看，似乎在等待什么。

我有一丝不安，因为临战前的几分钟要比实际战斗更难度过，敌人已经来到陷井边上了，这时只要哪位同志不慎抬一下胸脯或从他身边滚落一块石子，敌人就会立刻警觉或退缩，战斗的突然性和胜利的把握都会大为减低。这时需要全体同志高度自制、冷静、坚定，沉默得象那一块块山石！

村庄里传出阵阵骚动声和枪声，过后，开道的二十多个敌骑兵又重新出现了。紧跟在后面的的是日军坂垣师团第二运输大队，足有一百二十多辆胶轮大车，每辆大车都由三四匹骡马拉着，车上的作战物资堆得象小山一般，正慢慢吞吞地沿公路往斜坡上爬。押车的日本兵可真大意极了，缩着脖子躲避寒风，三八大盖枪搁在车架上。可以肯定，他们还在半睡半醒呐。啊，车队的后面，还有三十多个骑兵跟着哩！

大部分车子从坡顶上滑过来，进入我们的伏击区了。这时在坡顶处了望的敌骑兵忽然示意车队停止前进，准是发现我们了。可是车队正在下坡，根本停不住。前面的车刹住了，后面的车仍一辆紧挨一辆滑过来，在坡底处挤成一堆。这是绝好的战机了。

埋伏在“口袋”底部的三连长宋玉琳，眼看敌人的大车快要撞过来了，仍然耐心地等待着。直到敌人大车前后相撞，乱作一团时，他才下令开火。三挺机枪喷出三条火舌，直向车队扫去，敌人纷纷倒下，有的连插在袖管里取

暖的手还没抽出来，就栽倒了。未死的敌人急忙用战刀劈断捆在枪上的绳子，拖着枪狼狈地钻到车轱辘后面抵抗。车上小山般的物资翻倒了，把好些死的和未死的日本士兵埋在下面。

这时，一连、二连同时开火，痛击车队后面的敌骑兵，用火力的封锁了敌人的退路。

一颗颗手榴弹飞了过去，在敌人车队中爆炸。

宋玉琳同志大喊：“上，抓活的！”一马当先，率领战士们冲上公路。

残敌从车底爬出，端枪同我们拼刺。三连虽只有几把完好的刺刀，但毫不顾忌，他们一拥而上，没有刺刀的战士，就用枪柄、手榴弹，与敌人杀成一团。他们多想生俘几个日军啊！

可是敌人拼死挣扎，宋玉琳同志头上肩上两处负伤，浑身沾满鲜血。他见难以生俘敌人，火了，大叫道：

“开枪！”

随着战士们枪一响，这股敌人当即全部毙命。

不一会，一连、二连也冲下公路，同敌人肉搏，不同语言的喊杀声和各种枪支的射击声汇成一片。狭谷里到处是翻倒的车辆，大小木箱滚了一地，受惊的骡马踏着敌尸乱蹦乱跳。它们还没脱缰，把大车拽得歪来歪去。敌人抗不住我们的打击，日本兵纷纷被击毙，三十多个伪军跪地投降，有几个还恬不知耻地笑哩，惹起我们战士一阵怒斥：

“汉奸走狗，你还有脸笑！”

“嘿嘿。当俘虏比当汉奸好哇……我发誓，我是朝天开枪的！”

“为什么不朝鬼子开枪？为什么甘当汉奸却不敢和鬼子拼命？”

他们不做声了，灰溜溜地象一群土耗子。

这一仗，我们只用了三四十分钟，付出了很小的代价就大获全胜。继日军坂垣师团主力在平型关被歼后，它的第二运输大队也在此覆没，只几个骑兵漏网。我们共毙伤日本侵略军一百多名，缴获摩托车三辆，大车一百二十多辆，骡马八百多匹，步骑枪七十多支，各种短枪十多支，炮弹二十多箱，子弹四十多箱，罐头、饼干、汽水等食品多达二千二百多箱，还有一大批呢大衣、军毯。

满身泥土、硝尘的战士们，把缴获的物资重新装上大车，运往上庄子地区。在路上，大家打开一包包饼干吃起来，那饼干配有红红绿绿的小糖豆，嚼在嘴里嘎崩嘎崩响，味道可真香甜。有的同志饿了，就用刺刀撬开牛肉罐头，吃得满嘴油乎乎的。他们高声说笑着，回忆刚才的战斗场面，其欢乐情绪真非笔墨所能描绘。

当天，三营在营长黄寿发、教导员张襄国、副营长邱蔚率领下，在同一条公路的南段——义泉岭地区，紧接着又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这时从灵邱北驰广灵的日军还不知道冯家沟已在我们

手里，更不知道第二运输大队已全军覆没。他们乘着五辆汽车闯进三营的伏击区。三营三面合击，一阵猛打，三辆汽车成了战利品。至此广灵至灵邱的重要交通线被我们完全控制了。

随即，十一月十七日师部发来贺电：

……你团袭占涞源后，前日又将广灵、灵邱间交通完全截断，缴敌人大批军需品及骡马，昨日又将广灵占领，此种行动给日寇之打击与困难甚大，予我军与友军以极大的兴奋与极好之模范，望继续发扬积极行动之精神，与灵活、机动，为争取无尚光荣的新胜利……

建立抗日根据地

枪声刚刚消失，我叫人把俘虏的伪军带到指挥部来，一问，原来他们多数是当地人，在日军的刺刀逼迫下不得不来卖命的。我问起周围几个县城的情况，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

广灵城只有几十个日军，灵邱城的日军也不多，日本侵略军正忙于“太原攻略战”，在后方只有少数兵力占据着县城，以保护他们的交通线。

于是，我立刻命令三营出击，直取北面的广灵城。战士们抓起刚刚缴获的枪支弹药，揣上几包饼干，一边吃着，一边朝广灵城奔去。

从冯家沟漏网的几个日军，已经抢先逃进了广灵城。由于他们带去了运输队覆灭的消息，守城的日军一下子举止失措了：出城攻击吧，兵力太少；弃城撤退吧，又无法保住交通线。正在这时，城内外忽然大乱了，四面八方传来了鸟铳、锣鼓、鞭炮和阵阵呐喊声，他们更是慌了神，全缩到城楼上去了。

原来，我军冯家沟战斗的胜利消息也在当地群众中传开了。他们欢天喜地，故意弄出各种各样的声响，好象我军就要攻城，搞得守城的日军真假难辨。

下午三点多钟，三营兵临城下，当地群众更加高兴了，纷纷操起鸟铳、长矛、斧头跑出家门，协助我们攻城，造成很大的声势。广灵的城墙高一丈二尺左右，并不十分坚固，有的地段早已破落。三营一攻，便破城而入。守城日军纷纷逃窜，又被歼灭了几十人。

广灵城收复后，南面灵邱城的日军也就孤军难立了，他们只好弃城西窜，我们又收复了灵邱城。随后，我们又分兵向东、西、北三面推进。这样，不到二十天，我们就连续收复了涞源、广灵、灵邱、易县、蔚县、阳原、浑原等七座县城，并向平西地区和平绥、平汉铁路沿线大踏步地挺进了。

那是独立团大发展的日子，差不多天天都有收复失地的胜利消息传来，一一五师发来嘉奖令。

后来，田间同志和罗浪同志写过一首歌：

独立团，
一一五师的兵团，
独立团，
老红军的兵团。
过了黄河就打了腰站战斗，
这是第一个战斗，
这是胜利的战斗。

为了华北人民，
为了中华民族，
英雄们勇敢冲锋，
接连把七座县城一起收。
广大土地能够耕种，
百万人民获得自由。

十月底，独立团已由出征时的一千七百多人发展到七千多人，奉八路军总部命令扩编为八路军独立第一师，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团，还有特务营、骑兵连、通信连、炮兵连、工兵连，另外还组建了各地的游击支队和县大队，独立团宣传队也扩大为战线剧社。我任独立第一师师长。部队一下扩大几倍，干部显得很缺乏，我打电报给八路军总部和一一五师领导，说我一个人搞不开，请求派邓华同志来当政委，派陈正湘同志来当一团团长。尽管当时各部

队都在扩大，都缺干部，上级还是同意了我的要求，把邓华和陈正湘两位同志派来了。

我和邓华同志是老战友，我到红一师当师长时，他曾经从红二师调到红一师当政委，我们彼此都很了解。这次能又在一起工作，我们都很高兴。

一天傍晚，我们行军来到涞源城东的紫荆关。邓华同志兴奋地叫道：

“古长城！”

我说：“上去看看，这是座雄关呐。”

紫荆关青史垂名，是长城上的险关要隘，地处居庸关、倒马关之间，立在太行山的薄阳陉上。古称五原关，宋朝时又叫金坡关，后因山上密生紫荆而易名为紫荆关。

这里是著名的古战场，民间流传杨六郎曾经在这里抗击外寇侵略的故事。站在城头上举目一望：远近群山峭矗，状如列屏。阵阵秋风里，枯草委地，野兔窜动。古长城经过千年风雨、各种战乱的洗劫，已经破败不堪了。但它雄伟的身躯，时隐时现地蜿蜒在太行山巨峰重岭之间，夕阳再给它抹上一层金辉，雄风依然不减当年。它所体现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就要在它脚下，在新收复的涞源、广灵、灵邱、易县、蔚县、阳原、浑原之间，秉承八路军总部和聂政委的意图，筹创抗日根据地。

独立第一师成立后，我们立刻派出由方国华等同志组成的地方工作团，普遍、深入宣传党中央的“抗日救国十

大纲领”，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各界“抗日救国会”。由它再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供给部队给养，实行合理负担，募捐、收集武器、粮、款等。这样，各个县的“抗日救国会”先后建立起来了。

接着，在晋察冀三省的结合部——恒山地区地方党建立了特委，并分别建立了县委和区委，王国权同志任特委书记。各县也相继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由部队派出了县长，如：王茂斌同志担任了涞源县县长，侯国梁同志担任了灵邱县县长，张苏同志担任了蔚县县长，钟蛟蟠同志担任了广灵县县长，王道邦同志担任了浑原县县长，曾雍雅同志担任了阳原县县长，葛明远同志担任了易县县长。

以后，为了统一各县政府的工作，又建立了行政委员会，张苏任行政委员会主席。各界的“抗日救国会”又联合起来，建立了“抗日救国联合会”。

至此，党、政、军和抗日群众组织，在根据地七个县里初具规模了，并且不断地向其它地区开展工作。比如，七县之外的宣化、涿鹿、怀来、涿水、涿县、房山、良乡、宛平、昌平、应县、天镇、阳高等县，我们只控制了一部分村镇，便把其中每两三个县联合在一起，成立了联合县政府。

那些日子里，分区地方工作团几百人，宣传、发动、组织、武装群众，起到了很大作用。兄弟部队也在晋察冀的其它地区先后着手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大家的工作

都很繁忙。我在独立第一师开辟工作的地区不时地从这个村镇赶到那个村镇，参加各种群众工作会议，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几乎也没有闲的时候。

做群众工作，是我军三大任务之一。在中央苏区自不必说，长征路上做了一路，可以说人人都会做。可是现在群众工作的内容变了，要讲统一战线。工农群众当然还是我们统一战线中的基本群众，是我们依靠的力量，减租减息是我们政策的重要内容。然而抗日的地主、绅士也要团结好。这是我们做群众工作一个新的课题。绅士彼此的态度也不全一样，工作内容真可谓丰富多采。打开涞源城，我们曾召开过一次绅士座谈会。绅士们的态度，十分典型。会前，我们发了请柬，准备了几样菜。

那天，绅士们衣冠楚楚，客客气气地来了。我把他们一个个迎进大厅内，请他们入座，发现其中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人有些异常。别的绅士都戴皮帽，穿皮袄，他只戴一顶旧毡帽，着一件棉袄，象个家境窘迫的小店主。奇怪的是，其他绅士都主动向他抱拳作揖，笑呵呵地搭话。我暗向旁人一了解，原来，他就是远近闻名的当地最大的财主王莆。关于他的情况，我早就听说一些，很希望他能为抗日多出些力量，多捐些粮款。现在一看他这打扮，我感到有些好笑：他是不是装穷噢。其实，他有多少杆护院枪支，有多少粮款，他家的佣工全都告诉我们的了。

王莆祖辈很穷，母亲还要过饭。闹义和团时，他父亲

救过一个外国神甫的命，后来，这神甫给他家不少银元。王莆用这笔钱做买卖，很快成了大财主。过去他没房子住，在破庙内容身，现在住房盖得和城楼子一样。早先他不分冬夏只穿一条裤子，现在他在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都开有皮货庄。他没读过书，除了银元、纸币外，一个大字不识，但十分健谈，做起买卖来，旁人都说他有三头六臂。此人虽吝啬，但孝心颇重，人们都说，他是母亲要饭把他带大的，直到现在，他仍把母亲的话奉为圣旨。母子间一有不睦，他母亲就翻出当年的讨饭篮子、打狗棍来斥骂他。

饭菜很简单，两荤两素一个汤。吃饭时，大家互相认识了一下，各饮了几杯当地糶酒。饭罢喝茶时，我才开始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动员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有知识的出知识。等我讲完，绅士们也一个跟一个开始表态，大多是恭维奉承之辞，夸奖八路军作战英勇，表示拥护统一战线，就是不说自己要捐多少粮款。好些人眼睛都望着王莆，那意思很明白，要看这位大财主“献财”呢！

我笑问：“王莆先生有什么考虑？”

一个绅士从旁边插了句嘴：“谁人不知，王兄的银洋能从张家口铺到天津关。哈哈。”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王兄家资雄厚，挑头说个数吧。”另一个绅士说。

王莆捧着水烟壶，连吸了几口，瞪了他们一眼，然后放下烟壶，缓缓站起身，向我欠下腰，说：

“在下是小有家产。各位高邻也有目共睹，这是鄙人多年血汗积累，不必相瞒。而今国难当头，抗战是民族大义，在下手无缚鸡之力，不能效前方将士为国捐躯，难道还不能为国捐财么？！鄙人认捐——”他伸出了五个指头。

“五千？”一个绅士惊问，这个数字不算小。

王莆一摆头，背手高声道：

“暂时先捐五万元，若抗日政府认为不够，王某还可再作考虑。”

顿时惊叹声四起，好些绅士脸色都变了，王莆捐五万元，他们该捐多少呢？

王莆又说：“奉劝诸位一句，国将不保，家何能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与其让家财落入敌手，为何不献于抗日。望诸位三思。”

王莆言辞慷慨、滔滔不绝地表明了自己抗日救国的决心，狠狠将了其他绅士一军。于是，不管内心愿意不愿意，其他绅士也先后认捐了。不过，数目要小得多。有的说“量力而行”，捐了一千元；有的说“鄙人当等而下之，不敢与兄比肩”，捐了八百。

大财主王莆参加了“抗日救国会”，先后捐了近十万钱粮，比全县财主所捐总数还多，也比较好地执行了抗日政府“减租减息”的法令，还同我交了朋友。从他身上，我

感觉到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力量，这项政策把一切能团结的人都团结到抗日的旗帜下了。尽管他们靠剥削为生，有些人曾残酷地榨取人民血汗，但在大敌当前时，仍有爱国之心，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愿意为抗日做些事，确实值得欢迎。

我另一个朋友，是灵邱县下寨一个叫孟凡棠的地主，他在一次会上一开口就认捐了一百多担粮食。会后，我们请他吃饭，他带着两个佣工，担着一口半人多高的坛子来了。

我问：“是酒么，我们可喝不了噢。”

他说：“不是酒，是山西老陈醋。清朝同治年间酿下的，家藏六七十年了。按现价，一两值一块大洋呢。请贵军尝个新鲜。”

我们感到新鲜，当场揭去泥盖头，倒出半碗来，果然香气扑鼻，细看：这醋已不是常见的那种样子了，已成又浓又稠蜂蜜似的胶汁了。

“得用水化开才能吃。”他说。

随即，我对上开水尝了一口，这醋酸中带甜，香味不绝。我便让身边的同志把这坛醋分到各部队去了。

上面两人是当地比较进步的绅士，当然也有视财如命，甚至敌视抗日政府的财主。对付他们，光动员不行。我们就通过他家的佣人、长工把他家所藏的枪支、钱、粮一样样搞清楚，然后把埋藏的地点公布于众，这样，他也就

不得不捐助了。

十一月七日，晋察冀军区成立了，聂荣臻同志担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我们独立第一师所开辟的察南、雁北、平西及保定以西的冀西地区，被划为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①，我被任命为独立第一师师长兼一分区司令员，邓华同志任师政委兼一分区政委，熊伯涛同志任分区参谋长，罗元发同志任分区政治部主任。

晋察冀一分区是晋察冀军区北面的门户，是通往平西、平北、冀东以至东北的通道。它在地理上是晋察冀三省直接接壤的部分。比如我们收复的涞源县城，它就属河北省，灵邱、广灵、浑原就属山西省，蔚县就属察哈尔省。是敌人占据的四大战略据点——北平、保定、张家口、大同合击的中心。我们一分区和独立第一师要守住晋察冀军区的北大门，就要经常和从北面张家口、大同出来的日本侵略者的“蒙疆驻屯军”和从北平、保定出来的日本侵略者的华北派遣军及其附庸齐燮元的伪军作战。发动群众抗日，开辟这块地区，这就是一分区所面临的任务。

可是这时的一分区，也和整个华北其它地区一样，正

① 雁北地区一九三八年夏以前归一分区管辖。一九三八年夏至一九三九年秋成立了雁北分区，由三五九旅管辖。一九四〇年雁北成立五分区，邓华同志任司令员。一九四一年取消五分区，雁北又归回一分区领导。为加强领导，一分区成立了雁北指挥所，高鹏同志为司令员，罗元发同志为政委。平西地区一九三九年以前归一分区管辖，以后成立了平西分区，由挺进军肖克司令员领导。

处在群雄并起，“司令赛牛毛”的时代，各色各样武装都打着抗日的旗号，我们除了要经常研究敌情，加强对敌作战之外，还要经常研究友情，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处理好与友军的关系；识别哪些是真正抗日的部队，哪些仅仅是打着抗日的旗号及其各色游杂武装的社会、政治背景。这些部队内部也是够复杂的。大多数是下级官兵真心抗日，上层动摇不定或别有其政治目的，也有和日军暗中往来的。这种部队，往往一夜之间变化很大：它今天抗日就是友军，明天一旦投敌当伪军就是敌人。

当时在一分区活动的，除我们分区独立第一师是一一五师的正规兵团，是打平型关战斗下来一连收复七座县城，众望所归的抗日部队之外，尚有平西的“国民抗日军”，察南的“黑马队”，保定西北的“七路军”，易县赵玉昆的“十路军”，高宏飞的“三路军”和涞水、涿州一带的其他游杂部队。

其中，名义上一度是赵同当司令，而实际上是由我北平地下党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国民抗日军”，是抗日最坚决的一支部队。一九三八年夏天，这支部队与一分区部队的合并，加强了分区部队的战斗力，对于后来改造其他各色游杂部队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分区成立以后，将边区抗日政府颁发的政令、法令通过布告、标语等形式贴了出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号召当地群众参加八路军。这些布告、标语一贴出去，立

刻就引来各色各样的人，引起统一战线工作的大开展。

一天中午，两个骑马穿便衣的人找到驻蔚县的独立第一师师部，为首的是李清川，另一位是为他带路的当地人。李清川见到我和邓华政委，笑着介绍道：

“我们是‘察南抗日别动队’的，见到你们的布告了。此行一是祝贺贵军连日来作战胜利，二来想和贵军商讨一下联合抗日事宜。请多多指教。”他抱拳拱了一拱，拿出一封信件来。

那信不长，内容和李清川说的差不多，信末却盖了个茶杯口那么大的印章，很气派。

我们热情地请他俩进屋坐定，他俩左看右看，处处感到新鲜。李清川问：

“你们就是共产党的红军吧？”

“我们是由红军改编过来的。”

他喜道：“好好，找的就是你们。”

我问：“你们领导人是谁，部队有多少人，现驻扎在哪里？”

“咱们这队伍是王天存、段如山、我和刘永祺几人拉起来的。王天存是大队长，段如山是参谋长，我是副官。共三百来人，二百来条枪，一百多匹马，现驻在广灵县火烧岭阳圈村。”

邓华同志点头笑问：“你们呀，就是老百姓说的那支‘黑

马队’吧？”

“是是。王天存原是中央军骑二师骑兵连连长，他奉师长张承德——就是张夜猫的指令，到察南来拉队伍，打游击。”

我们明白了。据说张夜猫又称夜猫张，察北人，年轻时干过“胡子”，也就是土匪，抡一根大棒，三五人近不了身，夜间眼力好，能使双枪击中远处烛萤般的兽眼。因此匪伙尊他为头，称之“张夜猫”。此名流传开来，成了江湖浑号，正名倒不大为人所知。他在察南拉起一支数百人的马队，群众叫它做“黑马队”，这并不是说他们的坐骑一律是黑马，而是形容他们人野心黑，近似草寇。

蒋介石和阎锡山曾几次派兵清剿“张夜猫”，也都没剿掉。剿不掉就封官，于是“张夜猫”就成了“中央军骑二师师长”。他曾奉蒋介石的命令围剿过已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

“七·七事变”后，阎锡山、陈诚的部队拼命往南跑，“张夜猫”大骂国民党一通，便和他们分手了。随即，他带着一伙人跑到察北老家拉起了一支队伍。

李清川详细讲完他们队伍情况，正色道：

“我们几个人和‘张夜猫’还不一样。我们对共产党、八路军慕名已久，对朱（德）、毛（泽东）更是敬佩。八路军在国军南撤时，孤军北上抗战，是全国榜样。看到你们的布告后，我们几个人碰了个头，决定先来联系，如蒙不

弃，愿投贵军，充当抗日前驱。”李清川有些激动。

我问：“‘张夜猫’知道你们的意思吗？”

“还没见到他，估计他不知道。”

“那么，他会不会同意你们加入八路军？”

“我们这支队伍，他管不了。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我们坚决参加八路军。”

邓华同志说：“八路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也不发饷，生活艰苦，战斗频繁。这些，你们一定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考虑好。”

“哈，这才证明八路军和其他队伍不一样嘛。”李清川很坚决。

接着，我们又向他介绍了党的抗日主张和目前敌我双方战争形势，并且解答了他们想了解的几个问题。

当晚，李清川在蔚县县政府宿下了，我们则向军区聂司令员报告了此事。聂司令员复电同意我们收编这支队伍。

第二天一早，我向李清川传达了军区的决定，李清川高兴得连声说好。于是，我们给李清川和那位为他带路的人各发了一套八路军军装，嘱咐他们：立即返回阳圈传达军区指示，收拢人员、武器和马匹，尽早到蔚县来与独立第一师会合，我们在此等候。

数日后的一天傍晚，邓华政委忽然跑来告诉我说：

“师长，他们来啦！”

我随他赶去一看：山脚拐弯处传来几声马嘶，接着一

支黑压压的、极不整齐的队伍进了村庄。有骑牲口的，有徒步的，在那些牲口中有高头东洋大马，也有骡子和叫驴，枪支也是杂七杂八，有雀头盒子，有“中正式”，有“土压五”，也有鸟铳，着装更是五花八门，有阎锡山部队的军装，有日本军装，有农民的黑袄，也有商人的皮袍，人员也老少不一。

李清川和几个腰携短枪的人跳下马，匆匆向我们走来。我想那几个大概就是王天存他们，经介绍，果然是。同时，我也注意到有一个老头微弓着背在我们旁边徘徊，一声不吭。

王天存向我介绍道：“哦，这位是骑二师张师长。”

老头向我拱手道：“不敢当。鄙人张承德。”

嗨，他就是“张夜猫”呀。我仔细瞅了瞅他。他大约六十多岁，个头不高，脸庞黄瘦，肩头搭个蓝布搭裢，里面鼓鼓囊囊不知装些什么，穿一件短皮袄，没枪。从他满腿泥尘、雪沫判断，他甚至连马也没骑，是徒步跟着队伍走来的。

“张夜猫”身后站着一条大汉，冷面横眉，不声不响，身上也没枪，一手叉腰，一手拄着根酒盅粗、齐眉高的水火棍。看来，他是“张夜猫”的徒弟兼保镖了。

“欢迎你来。”我说。

“八路军威名远扬，老朽甘拜下风。此行只想交个朋友，长些见识，没有别的意思。”“张夜猫”微微一笑。

队伍进村住下后，李清川、王天存告诉我：

“‘张夜猫’是来探八路军虚实的。”

原来，前几天，当“黑马队”收拢了队伍准备开来与我们会合时，“张夜猫”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带着一个保镖从察北赶到阳圈，要亲自到蔚县看看，看是否真有一支红军改编的部队，看这支部队究竟怎么样，能不能打得过日本人。可是他倔，硬是不肯骑王天存给他的马，而是自己一步步跟着走来的。

我和“张夜猫”谈了一次话，他对八路军的军纪、战绩、抗日热情和军民关系深为敬佩，对王天存“黑马队”加入八路军也表示赞同，但对我们的武器却有些看不上眼。我劝他留下和我们共同抗日。他不肯，说：

“野惯了，还是各干各的吧。”

我说：“既然如此，也好。我们还是友军，今后有困难，还可以来找我们。”

我们准备了一些酒和菜，请“张夜猫”吃了一顿饭。饭罢，他拱拱手告辞后，便和那个保镖徒步离去了。

后来，我们把王天存带来的队伍编入独立第一师第二团。为了争取王天存，我们让他当了二团团长，原团长黄寿发改任副团长。段如山任参谋长，李清川任军需处长。而二团原有的不少红军干部，却都成了王天存、段如山二人的下级，这充分显示了我们对他们的信任与重视，希望他们能够在革命斗争中改造自己。可是，王天存到了八路军，

既过不了艰苦生活，又受不了严格纪律的约束。由于贪图钱财和物质享受，一九三八年七月，他带着两个亲信偷偷地跑掉了。这样的人跑了，对部队有利无弊，我们也不去寻他。

谁知这一年冬天，“张夜猫”只身骑个小毛驴又来到涞源我们营地，既没带枪也没带保镖。见到我，老远就抱拳施礼道：

“对不起啊，杨师长，对不起！”

我有些诧异：

“怎么回事啊，张师长。”

“听说王天存又跑了。这小子怎么搞的？”

我说：“八路军过的苦日子，他受不了，就跑了。”

“我‘张夜猫’最恨这等没脸皮、没心肝的软骨头，最恨忘恩负义、言而无信之徒。当初，他只带了十几匹马过来，我就让他当连长，他嫌官小，跑你们那儿去了。你们委他个团长，待他那么好，他还是‘跳槽’。”

“张夜猫”接着又告诉我，说他本人在察北一带的马队，被日军打散了，现正在重新组织，经费困难。我们便资助了他二百块银元，又根据他的要求，委了他个“察北游击司令”的官衔，请他喝了两杯酒。傍晚，他骑上小毛驴，兴冲冲地走了。

收编“黑马队”前后，我们已开始往平西方面发展抗

日根据地。斋堂以西，樊山堡南面，有座大山叫十八盘。一天，我们的部队在那里抓到了两个便衣，带回来一问，他们说：

“我们是‘国民抗日军’的。”

我有些意外，便催促道：

“那就谈一谈你们‘国民抗日军’的情况吧。”

他们说，“国民抗日军”是一支抗日游击队，有一千多人，总司令是赵同……

冯家沟战斗后，我就听说北平西山一带活跃着一支游击队，由于成员大多是东北流亡学生和北平抗日青年，所以又被那里的群众称作“学生军”，想不到今天碰上了。我立刻把这个情况报告八路军总部和军区。当天，总部就回电，让我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任弼时主任的名义，给他们写一封信，要点是：一、向“国民抗日军”表示慰问；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介绍八路军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情况；三、如果他们愿意联合作战，我们表示欢迎。

我们遵照总部指示，写了封信交给他俩。他俩欢喜地带着信回去了。

十一月初的一天黄昏，我接到二团副团长邱蔚从驻地西合营打来的电话。他报告说：北平西山游击队派来一个先遣小组，寻找八路军，刚刚到达他们那里，是焦土¹同

1. 即焦若愚同志。

志带他们来的。

我问：“就是‘国民抗日军’吧？”

“是的。他们收到总部的信了，派人来同我们联系。”

“来的是些什么人？”

“三个秘密共产党员，除名叫焦土的外，还有戴昊、宋元，都是‘国民抗日军’里的干部。”

我又惊又喜，想不到“国民抗日军”里有党的组织。

“好好招待他们，明天一早，你派人把他们护送到我这里来。”

放下电话，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邓华同志。他异常高兴，当晚就要赶去看望他们。我说：

“让他们好好歇一夜吧，明天就见面了。”

邓华同志连声说：“不容易，不容易。我们总算和北平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接上头了。”

第二天，邱蔚同志陪着焦土他们来到蔚县城，我和邓华同志出门迎接。见面时，三个青年人欣喜得眼睛都湿润了，紧紧握住我们的手不放，说他们在北平搞学生运动时，就听说了不少红军英勇奋战、长征二万五千里的感人事迹。自从红军改成八路军到达抗日前线后，他们曾想尽办法来联系，今天总算如愿了。

我们把他们请进屋中，做了竟日长谈。

原来，“九·一八”以后，东北“救国会”曾经派出一批青年学生联络南面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在这批学生中，

有一位名叫赵同，他先投辽南义勇军邓铁梅部，邓部溃散后，他就跑进关来了。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武装民众抗日的方针指导下，在华北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里，在北平党和东总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利用赵同等搞过义勇军的军事经验，成立了一支抗日武装，随后逐步锻炼成长为一支受党领导的上千人的游击队。

八月二十二日深夜，这支武装砸了北平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放出一批被囚的共产党员和政治犯以及八九百个刑事犯，扩大了队伍。从此，他们打起“国民抗日军”的旗帜，活动在北平郊区。随后，他们又进行了黑山扈战斗，消灭了六十多个日本侵略军，还用步枪打掉一架飞机，轰动了北平市。日伪军大为头痛，称他们为“西山赤匪”，却又奈何不了他们，便在秋末出动一个师团的兵力对他们进行全面“围剿”，把平郊三十多股各色各样的游杂武装全打散了，但这支“抗日军”却跳出了包围圈，进入了昌宛山区，在那里建立游击根据地，斗争越来越艰巨了。

这时，“国民抗日军”忽然接到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任弼时主任的信，顿时轰动了，共产党员和绝大多数战士们都坚决要求同八路军会合。赵同犹豫了几天，勉强同意派出一个先遣小组前来联系。

当时，“国民抗日军”的领导人：司令赵同，政治部长高鹏，秘书长汪之力，总参议陈大凡。我们共产党在这

支“抗日军”中有一个秘密组织：队委会。王远音同志是书记，汪之力同志是副书记，陈大凡、王建中、史进前是队委委员，此外还有党员尚英、张如三、焦土、尉迟修职、王达等几十人。他们在这支部队中做了大量工作，在连队建立了秘密党支部，成功地改造了这支部队，共产党的组织这时已经基本上掌握了这支队伍。

可是，他们处境仍然挺困难，缺乏被服、医药、子弹，伤病员也不少，冬天又快到了，北平敌人可能进行新的“扫荡”，队伍领导层中情况复杂，赵同一直想抓权称王，独树一帜，内心并不愿意与我们会合。因此，团结、斗争、改造的任务，仍然很艰巨。

他们拿出了一封信。在信中，“国民抗日军”的领导人要求组织一个参观团，到蔚县八路军驻地来参观学习。我立刻把情况电告聂司令员，同时转达了他们的要求。当天，聂司令员就回电了：同意“国民抗日军”来蔚县，所需物资装备，由独立第一师尽全力予以补充。

我把电文拿给他们看，他们高兴得跳了起来，当天就要动身回平西传达军区指示，我们又留他们休息了一夜。天亮后，他们换了身衣服，带上下粮，出发了。

十一月中旬，“国民抗日军”移驻蔚县川途中，派来了二三十个队干部，由赵同带队，前来我师参观，其中有七八位秘密共产党员。我们济济一堂，笑容满面。

我先转达了聂司令员的问候，然后代表部队向他们表

示热烈欢迎。高鹏和纪亭榭激动地倾诉了他们渴望同八路军共同抗日的心情。

赵同也略说几句“很受感动”之类的话，说着说着，便有些忘形了，带有些炫耀意味地介绍起他自己早先在东北坚持“抗战”的经历，是如何苦战，如何招兵买马，直至现在有多少杆枪，打死过多少日军，北平的敌人是如何怕他等等。正说得起劲，忽见身旁高鹏不屑地扭开脸，他便知趣地止住话题，转而称颂起八路军的赫赫战绩来了。最后他表示希望获得我们的支持。

我明白，他说的“支持”，是指粮、财、弹药、医药一类，特别是过冬的被服。我说：“既然你们‘抗日军’愿意到蔚县来整训，那么，所需物资我们包了！”

会后，我和邓华同志又同其中的党员分别谈了话，进一步了解“国民抗日军”的情况，并且传达军区指示，希望他们做好工作，把“国民抗日军”整训好。他们都十分赞同。

过了几天，“国民抗日军”到达蔚县近郊，我和邓华、熊伯涛同志带着队伍去欢迎他们。两支队伍会合时的情景真是热闹极了。

我们的战士在路旁列队，呼口号，鼓掌，带着红蓝两色袖箍的“抗日军”战士拥上来，握住我们战士双手，笑啊跳啊，欢呼声象海浪一样此起彼伏。

他们中不少人是知识分子，一激动起来，就泪光闪闪，

有的还高声吟诵诗句，大家都沉浸在欢乐情绪里。

到了驻地，战士们又把自己珍藏的毛巾、肥皂、香烟送给他们，还有的战士把自己身上的毛衣、皮袄脱下来，硬塞给衣履单薄的“抗日军”战士。

在蔚县城里，县长张苏为欢迎“国民抗日军”，还主持召开了隆重的群众大会。

参加大会的有我们的一个连队，由副营长林必元带着。他们荷枪步入会场，口令响亮，队列整齐，步伐雄壮有力。一声令下，全连战士唰地盘腿坐下，胸挺腰直，没有一点杂音。这情景使“抗日军”感到惊奇，他们由于过惯了行踪不定的游击生活，猛一见我们战士组织得这样严谨，一个个赞叹不已，情不自禁地议论说：

“到底是老红军，走起来都不一样！”

“枪不怎么样，人可是蛮厉害！”

“咱们也受受这种训练就好啦！”

各方代表讲话以后，接着是我们一分区战线剧社为“抗日军”演出。他们看着那些节目，简直入了迷，想不到八路军能征善战之外，还有这一手。每个节目过后，都是一片掌声，会议一直开到中午才散场。

散会以后，“国民抗日军”中的几个学生还跑上台去，非要看一看演员卸装不可，他们以为演戏的肯定是从城里请来的戏班子，哪知，全是八路军战士，不由得口口声声说：

“不得了，真不得了！”

就在“抗日军”看戏的时候，城内群众已经在杀猪宰羊，准备犒军了。等他们看完戏回到驻地，县政府就带领群众肩扛车推，送来了大量慰问品：宰好的猪、羊、鸡以及煎饼、腌蛋、红枣、柿子等。根据地群众的热情，使他们非常感动。

当天，我们发给“国民抗日军”五百万纸币，给每人发了棉袄、棉裤、棉帽、棉鞋，还给他们伤病员重新包扎、治疗。傍晚，“抗日军”的干部、战士换上新装和我们一起会餐，气氛十分融洽。

不料，吃饭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国民抗日军”的一总队长纪亭榭和二总队长宋鸣皋，不知在哪张餐桌上拾到一张文稿，匆匆浏览了一遍。原来这是份机密电报的底稿，上面有：“抗日军”各领导人的出身、经历、政治态度和会师后的一些情况以及我们团结和争取主要领导人的方针等等。电文已拍往晋察冀军区，这是我们一位同志由于喝多了酒，不慎遗忘在餐桌上的。

纪亭榭和宋鸣皋看罢，很吃惊，纪亭榭说：“啊！共产党真不简单，他们把我们每个人的情况都弄得清清楚楚，在我们来到之前就报告到杨司令这里了！好些是多年前在东北义勇军里的事呀，他们怎么也知道？”于是，纪亭榭和宋鸣皋断定：“抗日军”里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开展工作很久了。他俩回到自己的小屋里，便悄悄地议论起来。

“你看谁是共产党？”宋鸣皋问。

纪亭榭说：“具体的我搞不大清楚，反正咱俩都不是。”

纪亭榭几年前就想入党，也打听、寻找过党组织，可惜一直找不到，直到今天才知道不仅自己队伍里就有党组织，而且他们的工作很活跃。

宋鸣皋问：“你看陈大凡象不象？”

“陈大凡在‘东联’^①是搞统一战线的，从苏联回来的。”

“汪之力呢？史进前、张如三、尉迟修职他们呢？……”

他俩又猜测了一阵，有的猜对了，有的猜错了。后来，宋鸣皋把小炕桌一拍，高声道：

“是喽。那些不要金银财宝的人，八成是共产党！”

一句话提醒纪亭榭，他记起来，“抗日军”刚组成时，赵同为筹集军费，率领队伍武装挖掘了清朝七王爷坟，搞到几麻袋金银珠宝。这件事遭到队伍中青年学生的强烈反对。赵同为了安抚军心，给每个人分发了一些玛瑙石、珍珠串、如意、扇坠等小件玉器。其中许多青年学生不肯要，有的扔了，有的把它们送给了当地穷苦百姓。那种表现，不就证明他们“在党”嘛！

这下他们基本猜对了，也明白了过去想不通的许多事情。

第二天，高鹏、纪亭榭找到我，讲了昨天看到电文底

① “东联”，即东北旅平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北平成立，先后有十几个抗日群众团体参加。

稿的事，接着诚恳地提出入党要求。于是，我和高鹏、邓华和纪亭榭分别在两间屋子里同时谈了次话。我们代表党组织对他俩的入党愿望，表示热烈欢迎。“抗日军”的这两位领导人，一直是中心队委的可靠战友，每当我们共产党和赵同发生分歧的时候，常常是通过他俩去做赵同的工作，劝其放弃错误决定。因为他俩和赵同一块在东北干过义勇军，在部属中有威信，所以赵同不敢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哪知，我们话还没谈完，天空就传来了敌机声，参谋匆匆送来情报：日军分八路进攻晋察冀军区，总兵力达两万多人。北路张家口之敌日夜兼程南下，已逼近蔚县城。东面也赶来了“蒙疆国”伪军李守信的部队。谈话不得不中止，我们从屋里出来了。

“先打仗吧，打胜了再谈。”邓华同志对纪亭榭说。

我对高鹏说：“所需弹药，我们马上抽调给你们。”

紧接着，军区来了作战命令，分区各部队立即开始行动。我率主力经广灵南撤到涞源以西地区，邓华同志率军区机关和少数部队直接撤向涞源城。尽管我们的供给十分困难，我们也还是从部队里拨出一批弹药，支援了“国民抗日军”。

眼下就要分手了，“抗日军”的好些人告诉我：到了根据地，就好象到了家里一样，吃得饱、睡得宽不说，不怕被袭，不愁供给，还上了一堂大课。

我瞅了瞅他们，每人从上到下都焕然一新，可有人却

掉下了眼泪，他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强颜欢笑地向我们招手致意。然后，他们沿着蜿蜒的山路向西行进，遵照军区的指示，转移到阜平整训去了。我明白：他们前面道路依然曲折，有斗争，有歧途，有胜利。

这时，我们却向南，奔向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敌人这次分八路进攻，重新占领了涞源、广灵、灵邱等县城，我们则进入深山和敌人展开了游击战。不久，我们再次收复涞源。可是到了一九三八年春天，敌人沿平汉线大举进攻，又第三次占领了涞源城。此后，我们连续进行了王安镇、紫荆关和佟川战斗，掐断了涞源敌人的供应线，第三次收复了涞源城。

就这样，涞源城一直是处在敌我的剧烈争夺中。敌人总是想占据它，从根据地撕开一个缺口，安上一颗钉子。我们总是在不断收复它的过程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八年三月，军区遵照中央指示，建立宋（时轮）、邓（华）支队，准备挺进冀东，开辟冀东抗日根据地，拨调我们一分区的主力部队——老三团，并拨调了分区直属队一部给邓华同志组建指挥机关。尔后，开到平西地区进行东进的准备工作。这时正是我们第三次收复涞源城之后，独立一师一团在分区指挥下为了配合宋、邓支队挺进冀东，组织了东进支队，由陈正湘、王道邦同志负责指挥，跃过

平汉线，进入冀中地区活动。他们一路占领了容城、雄县，过拒马河到了霸县地区，然后进入任邱、河间、饶阳、安平地区。到了初夏，一团从保定南面西跃平汉线，回到了一分区根据地。

自从邓华同志走后，分区的领导有罗元发、熊伯涛和我，我们又重新组建了新三团。

斋堂合编与 东、西庄大战

七月下旬，一个燥热的午间里，我们忽然接到聂司令员急电，说赵同已叛变投敌，五支队人心波动，高鹏、纪亭榭等主要领导人要求军区速派干部，率部队前往斋堂，协助整编五支队。聂司令员要我去完成这个任务。

五支队就是“国民抗日军”。我们和他们在蔚县分手后，他们又奉聂司令员的命令开拔到河北阜平整训，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四月奉军区命令北返平西斋堂地区，建立了五分区和几个联合县的抗日政权。

接到聂司令员的电报后，我心里十分不安，立刻率二团一个营和分区特务营星夜兼程北上，由涞源城，越紫荆关，于第二天黄昏，来到一片苍莽群山中一个叫“野三坡”的地区。从这里开始，面前只剩一条尺把宽的小路了，两旁深草没人，天还没黑，山中已传来阵阵凄厉的狼嚎。虽

是盛夏，这里的风却还是冷冰冰的，吹得人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我命令先头部队提高警惕，边搜索边前进。四周沟谷密集，各种树木参天，在这里即使伏下千军万马，也不会露痕迹的。何况，这还是个愚蛮未化的地区呢。外人到此，非得小心谨慎不可。

“野三坡”在奴才岭以南，蓬头以北，分上坡、中坡、下坡，方圆百里全是深山老林，散居着几千户人家。他们从来不与外界交往，不受政府管辖，甚至不知道如今已是民国了，还在坚持要“反清复明”。

这里的男人头上都束发，女人裹足的很少，服装大都是黑布短袄，头上缠一块青布头巾，面色黧黑。男女老幼都善奔跑、攀援，都善使长刀、火铳。“三坡”举出三位年岁最大的老人做首领，死一个，补一个。“三坡”老人掌管这一方天下的生杀予夺之权，谁都不敢违抗。

“三坡”人自给自足，不纳税，不交粮。国民党兵来了，他们捉住就杀。汤恩伯、卫立煌的部队从南口败退下来后，路过这里，被他们缴了一个多营的枪，还杀了一百多人。一些抗日队伍过路，也常常遭到他们的袭击。早在一九三八年春，邓华同志率领季光顺同志的第二团来到平西山区开创平西抗日根据地。张梓华科长及分区地方工作团的吴光启等同志，均被“野三坡”附近的群众活埋。不久前，五支队的工作队长唐老寿和一个队员因公过往此地，

一个被枪杀，一个被活埋。总之，他们不准外人来。

“野三坡”的中心镇叫紫石口，镇面不大，却安然矗立着一个高大的天主教堂，那里不时传出沉悠的钟鸣声，几个外国传教士出出进进，说是布道讲经。看到那景象，我很气愤：真是咄咄怪事，在这片荒蛮之地，国民党政府用枪杆子也建不起政权，外国教会势力却能够安然潜入，口称“开顽化愚”，实则利用宗教作掩护，进行文化侵略。仅此一斑，也可见国民党当局治国无术，腐败透顶！

紫石口是五支队通往晋察冀军区的咽喉要道，又是我房（山）、涞（水）、涿（县）联合县政府所在地。这里有一个县大队，大队长王文和政委那恕是五支队派来的党员干部，中队长和队员都是本地人，内中不少是旧日的保镖、散兵和土匪，枪支是财主们捐献的，队伍极不巩固。恰在赵同叛逃的同时，这支县大队里的一些人，勾结当地的土匪武装也叛变了，杀害了那恕同志，绑架了王文等其他干部。平西根据地通往军区的道路至此也被割断了。五支队各部正各镇一方，还要处理赵同叛逃带来的问题，一时也就不能集中兵力对付“野三坡”地区的叛乱。

我来之前，已通过电报和五支队约定好了，我们率兵北进，五支队一营西来，共同合击“野三坡”，合击地点就是紫石口。

眼见阳光在山头上殆尽，部队不宜在“野三坡”久停。我命令前卫连做好战斗准备，朝紫石口快速前进。

紫石口到了。不出所料，这里除几只归巢寒鸦在枝头嘶鸣外，渺无人迹。教堂大门敞着，教士和佣工也跑光了。镇中心是一条石板街，以往三日一集，各地山货土产都在这里买卖。现在房棚已朽，地上尽些鸡毛和绳索，看来，叛兵已经藏进深山。

我正要派人侦察，山头上传来零星枪声，战士立刻提枪要往山上冲。

我忙道：“不要去，隐蔽起来。”我估计山头上的人可能是五支队的同志。

从望远镜里看：山头上有人影晃动，象是正在抢占路口。

“发信号，问问他们是哪一部分的？”

司号员吹起军号，枪声随即停止。稍过一会，他们回答了。果然是五支队一营。我的老秘书陈子端急忙跑去接应。几分钟后，陈子端同志领着一人快步走来，向我介绍说：

“这是营长兼教导员王建中同志。”

王建中同志擦着汗说：“接到合击命令后，我们从清水出发，翻过老爷岭、奴才岭，一直赶到这里，没遇见一个敌人。”

我问：“你估计他们会跑到哪里去呢？”

“他们都是地头蛇和土匪，很可能钻进山里去了。”

我们分析了情况，这伙叛匪正扣押着我们的同志，倘

若搜山硬打的话，恐怕我们的同志会受害，再说，天色已晚，也无法搜寻。于是，我们只好暂时驻下来，另选良策。

后来，五支队找到当地老百姓，请他们去和叛匪谈判，叛匪怯于我们的武力，不得不放回那些被扣押的同志。不久，大伙叛匪也被我们消灭了。而“野三坡”的群众，经过我们艰苦的工作和反复的开导，终于和我们站到一起。他们打起日军来，分外勇猛，以致“野三坡”成为分区最可靠的抗日根据地之一。

当天夜里，我们加派了岗哨，大队就驻扎在紫石口镇。第二天清晨，留下一个营在此警戒，我和王建中同志便率领大队径直往斋堂赶去。

斋堂是一道大山川，漫山遍野的红枣、柿子、板栗、山楂、杏子等果树，是平西有名的山货产地，果实下来，当地百姓只愁运不出去。

这里家家都养有几箱蜜蜂，由于蜂蜜收得多，山货有的是，好些富户也全家吃素。一次，有家地主请我们赴宴，摆了满满两桌，全是面筋、豆腐、栗粉、蘑菇加以蜂蜜、香油调配烹炸成的素鸡、素鱼。

这里的家禽也特别贱，两毛钱可以买一只大母鸡，两分钱能买三个蛋。川内农家淳朴而富裕，老人、妇女多数笃信宗教。西面有个杨家坪大教堂，住着四十多个外籍教士，这伙人又传教又放高利贷，还兼做买卖，以低价收进干果、蜂蜜，运到北平去卖高价，几乎完全控制了斋堂的

农家经济。

五支队的支队部也驻扎在斋堂。我进到支队部时，见高鹏正在用大嗓门挂电话，他戴着眼镜，高胖身材，乐呵呵的。自从在蔚县谈过一次话后，我们一直没见过面。这次他一见到我们就笑道：

“司令员，你可来啦。咱们那次谈话还没谈完呐，这回你可以接着往下谈了。”

“还是先请你谈吧。”我说，“部队情况怎么样？”

“部队一直是稳定的。赵同只带走了十几个亲信，其余的，一个建制班也没带动。我看啊，他跑正是他的失败，是我们的胜利。”

我听了挺高兴，高鹏成熟多了，他在阜平整训时，入了党。这个东北大学的高才生，如今已经是五支队的代理司令员了。我请他召集五支队党员干部开个会，分析一下眼前的情况。在那次会上，大家摆出一桩桩往事，深刻地揭露了赵同的反动本性。

高鹏同志和赵同相处多年了，对赵同深为了解。高鹏同志说，赵同是国社党党员，是一个视兵权如性命的个人野心家，总想依靠国民党当局撑腰，在华北搞独立王国。早在“国民抗日军”成立以前，他连队伍还没有，就在北平东安（风）市场刻了“总司令印”的铜印，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即使在逃命时也紧挂在腰间。后来有了一支象样的队伍，他就经常拿出来摸一摸。他的母亲和妹妹，住在

大后方，也经常抛头露面，大讲“国民抗日军”如何如何，千方百计地去替他与蒋介石挂钩。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八年夏，这母女俩盗用“国民抗日军”的名义，打入国民党当局的上层，四处活动，居然得到宋美龄的垂青和接见。宋美龄让这位“赵老太太”由重庆去广州再到香港，宣扬国民党当局也在坚持“敌后抗战”，致使赵同之母名噪一时，欺骗了许多国内外同胞。有家重庆报纸居然恬不知耻地吹捧她为“军中之母，女中之师，中华民国之神后……”

我听了不禁觉得好笑，那些呆在大后方的国民党官僚，总想贬低八路军的功绩，可是他们在华北敌后又没有什么坚持抗战的部队，就只好在赵同身上做文章了，真是荒唐。

史进前同志接着高鹏的话说：

赵同的性格和手腕都十分阴毒，为了扩大自己实力，他贪婪地鲸吞各种游杂武装。一九三七年九月间，平郊有些抗日武装曾主动与他联合，也都吃了他的亏。如：原冀东保安队高宪章部，有四五百人马，二十多挺机枪全是崭新的捷克造，在平郊各游杂部队中算是一大股，实力并不比赵同弱。他们听到了“抗日军”作战胜利的消息，便派使者前来商谈联合抗日事宜。赵同眼红他们的武器，暗怀吞并之心，虚与委蛇，定日摆开鸿门宴，以谈判为名，诱来高宪章。当高宪章等来到赵同的司令部时，赵同一帮人向前，双手捉住对方的双手，在热情寒暄欢笑的瞬间，内外伏兵齐出，把高宪章和随来的卫队的枪下了，当即将高

宪章绑起来，推出门外，枪毙在院后老榆树下，紧接着又派两个总队火速包围高部驻地，高呼：“高宪章勾结日寇，已被枪决。”高部的人听说司令已死，大乱，也就不甚抵抗，相继缴械投降。赵同把高部的人、枪编到各总队，自以为赚了个大便宜。他得意极了，还在干部会议上吹一通自己干这一手是如何干净利落。事后，平郊各游杂部队再也不敢与他商谈合作了。这不仅使“国民抗日军”后来的发展受到了局限，而且“国民抗日军”的声誉也大大跌落。为了稳住军心，团结抗日力量，我们在“抗日军”里的地下党员，也就只好对被吞并过来的高宪章部做艰苦细致的解释和说服工作。

纪亭榭同志说，他们早就想罢掉赵同的官了。去年深冬，部队在阜平整训时召开了第三次军人代表大会，会上讨论了“改编成八路军”的议案。几十个代表，包括赵同在内一致举手赞成。决定下来后，赵同突然起身表示：请准予他辞去总司令职务，去八路军总部学习，另选别人任司令……实际上，是想试探一下他自己在队伍里还能不能站得住。哪知，他刚说完，纪亭榭和高鹏同志相继发言，表示欢迎赵同入学深造，请大会另选司令。随后，代表们表决的结果，一致通过了赵同的要求，当场解除了他的司令员职务。这一来，赵同傻眼了，泥塑般地坐着，一动不动，面色如土，久久不语。

这件事我早就听说了。当时聂司令员知道后，十分焦

虑，立即表示：不能让赵同辞职。他两次把中心队委的同志们请去，反复陈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意义，要大家注意贯彻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言行是一致的，要考虑对外影响。因此，一定要让赵同继续留任司令，不要把他推出去。即使他执迷不悟，将来发生了问题，那再做道理。现在，只要他还愿意抗日，还肯跟共产党走，我们就不能让他辞职。队委的同志被说服了，大家回队后，动员所有党员和干部，对赵同进行了挽留工作。紧接着，聂司令员又单独找高鹏和纪亭榭同志谈心。他俩虽然思想上不怎么通，但还是接受了聂司令员的意见。最后聂司令员又和赵同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给了他许多勉励，终于使他得以留任。

“聂司令员对赵同可真是仁至义尽了。”王远音同志感叹道，“那天，赵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委屈，说‘日久见人心’呢，还假惺惺地说他赵同‘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呢，话全让他说绝了，可是不久，赵同听到高鹏、纪亭榭入了党，就觉得自己被冷淡了，便几次向我提出入党要求，还向聂司令员提出申请。鉴于赵同政治思想和品德方面的许多问题，聂司令员和我们都坚持原则，一方面婉言拒绝了他，一方面又勉励他加强思想改造，努力争取。赵同却大为不满，言语中流露出隐隐恨意，后来渐渐地在行动上也暴露出来了。

“一天，赵同突然提出，要把他的亲信吴新民从三总

队调回警卫连任连长。此事引起了大家的警惕，自然不能同意。由于赵同一向爱耍阴谋诡计，爱搞突然袭击，中心队委早在党内做出一个决定：无论何时何地，到司令部来开会，总队、大队领导干部不能同时都来，必须留一人看家。

“赵同有个私人卫队，大半是他过去的亲信，也有几个有奶便是娘的老兵痞，他们武器好，枪法准，平日跟着他寸步不离。为了防止这伙人作乱，中心队委决定由史进前同志负责，专门挑选了一位坚定可靠的共产党员，即刘伯松同志做支队政治部警卫连长，交待给他的任务是：保卫政治部，专门对付赵同，防止他搞军事阴谋，一旦有事，警卫连专门对付那个私人卫队。刘伯松同志日夜警惕地坚守自己的岗位，使赵同想下手也无机可乘。

“五支队的党组织对赵同是很警惕的，特别警惕他搞军事阴谋。从他在阜平以辞职要挟我们以来，我们不断察觉到他的一些异常迹象，如搞私人卫队，使其成为他的死党；他的亲信九大队长吴新民夜间放哨对着八大队警戒；石景山战斗后，他一再想把几个总队调到斋堂沟里驻扎，象要搞什么名堂等等，我们才采取一些措施，组织了警卫连专门对付他。前不久，从大后方来了一个人找赵同，说是亲戚，其实可疑。我和有的队委、同志们都交换过意见，进行过分析。这个从大后方来的不三不四的人，赵同说是从他母亲那里来的。他和赵同形影不离地厮磨了几日，不

知合计了些什么鬼名堂。在那人走后不久，赵同便带着他的十几个亲信悄悄地离开了支队部，叛逃了。”

我问：“他跑到哪里去了？”

纪亭榭同志说：“不远，还没有出山，就在前七村。他在那儿又勾结地主武装拉起了一个独立大队，有百十人，自己号称‘华北游击军总司令’，还想东山再起呐。”

“他要真的蒙骗一部分群众，拉起一支队伍，肯定会给我们添不少麻烦的。”

“可不是，这人心毒着哪。当时我就想，既然他已经叛变革命了，趁他没走远，干脆消灭他得了，请示军区，哪知，聂司令员不同意，说他还没有公开与我们为敌，就要设法挽救他，让我们派人去争取他回来。”

我听到这里，心中不禁浮出敬佩之情，聂司令员真是胸怀宽阔，站得高，看得远啊。直到这时，他还给赵同留一条生路，并不一棍子打死，希望他回来重新做人呢。

“这可是个危险任务呀，你们谁去了？”

纪亭榭指着焦土同志说：“他和老吴两人。”

焦土是昌（平）、宛（平）联合县长，那天也到会了。吴静宇是五支队的副官长，也是共产党员。

焦土同志笑道：“接受任务后，我就准备牺牲了，老吴也是这样。人说老吴有‘三条命’，丢了哪一条他都活不成，一条命是雁子头盒子枪，一条命是那匹好走马，再一条才是性命。”

大家轰地笑开了。

焦土同志接着说：“为了执行这个任务，老吴把枪和马都扔下了，只身骑匹老瘦马，和我赶到前七村。他说，赵同最多捡我一条命去，那两样宝贝不能落到他手里。”

“有胆略！”我称赞了一句，“见面后，赵同怎么说？”

“这回他把伪装全撕掉了，真面目彻底暴露，狂妄极了。他说：咱就想把你们党员一网打尽，把部队拉走。后来想想算了，在一块拼杀了几年，临分手干么抓破脸呢，合不来，就各干各的。”

“哼！他早把我们的住宿情况摸清楚了，只是由于我们警惕性高，警卫连又忠于党，他没法下手。”吴静宇同志气愤地说。

“赵同还吹，‘抗日军’是他搞起来的，不信搞不起一支更大的队伍。你吴静宇三条命今天才来了一条命，咱也不杀你们了，带个信回去吧。”

我问：“他的信呢？”

高鹏同志拿出信交给我。这是封致五支队领导人的长信，赵同在信中大肆吹嘘了一番他“披肝沥胆创建‘抗日军’”的经过后，毫不隐讳地说了他有消灭支队各级领导人的计划，只是碍于“多年交情”才算了。他还发誓要“干出个样儿来”让共产党瞧瞧。

焦土同志说：“既然他毫无悔改之心，我们临走时便警告他：你不回去就算了，但你别与八路军作对，否则，绝

没有好下场!”

到达斋堂后的第二天，我便和五支队领导人一起研究如何对部队进行整顿教育，决定把赵同的那封长信公布于众，揭露他的狂妄野心和毒辣手腕。对过去和他相处比较密切的人员，我们概不追究。就连赵同在部队里的亲戚，只要表示愿意抗日，也仍然让他担任原职务。我们还公开宣布：谁愿意走，可以报名，到赵同那里去，也允许，绝不留难。

一千多人的五支队，只有五六人要求走，我们还专门为他们开了个欢送会，请他们吃了一顿饭，给他们每人发了几块钱作路费。临走时，我们还向他们打了招呼：如果在外混不下去或在赵同那里干不下去了，欢迎你们再回来。几个月后，有两三个人真的回来了。

八月八日，晋察冀军区应五支队的请求，发出命令：五支队的战斗部队与一分区的新三团的第三营合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三团，隶属一分区。纪亭榭同志任团长，袁升平同志任政委，王建中同志任政治处主任。高鹏同志调一分区任副司令，王远音同志调一分区任政治部副主任，后又改调八分区任政委。汪之力同志已在二道河战斗后调二分区任政治部主任。这时，陈大凡同志也调走了。

① 赵同叛变后，拉起一支队伍，不抗日，于一九三九年冬在华北专门从事反共活动，被我一二〇师指战员击毙。

五支队当然也是有自己特色的武装，但是它和其他游杂武装本质不同，它的成员大多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农民，又有北平地下党派来的同志们在领导。和收编“黑马队”大不一样，改编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上上下下心情舒畅。这支一千多人的队伍合编到一分区以后，提高了分区部队的作战实力。对于改造分区其他部队，是个示范。五支队的同志，和长征来的老红军编在一起，进步也很快，出了很多干部，尤其是政工干部。

纪亭榭在那几天里高兴得逢人就说：“咱们现在是八路军正规部队了，啥事都不能马虎，一举一动都要象个正规部队样儿。”

他每天带着部队出操、练兵、学习战术，连三顿饭都在山头上吃。晚上又常到我这里来，一聊就到大半夜，老让我给他讲红军长征的事情。当我说到突破乌江天险、强渡大渡河、激战腊子口的战斗场面时，他简直象醉了似的摇动着身子，拍着腿乐呵呵地笑：

“好啊！了不得……可惜我不在那儿。”

就在这一年，先后从妙峰山、潭柘寺、北平等敌占区来到晋察冀军区和一分区抗日的地下党员和青年学生确实不少，如：王维、于蓝、赵路、王辛等。他们的爱国行动，真是令人钦佩。尤其是还有一些国际友人，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我们抗日，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更是使人难以忘怀。

纪亭榭同志是个高个子，又粗又壮，浓眉大眼，行如风，坐如钟，两支胳膊结实，能一边挟一个人跑步上山。他虽然出身于学堂，但早在“国民抗日军”的时候就是一员猛将，性子直爽，嫉恶如仇，枪一响就按捺不住地想往前冲，遇到不平事就要摸枪，连赵同也对他忌惮三分。

他告诉我说，赵同的娘舅任福祥当过“抗日军”一总队的总队长，这家伙在东北时是“胡子”，和他的弟弟、儿子等并称“任家五虎”。参加“抗日军”后，仍然依靠赵同的势力横行不法，几次私率亲信，抢劫当地群众财物，“抗日军”中的学生们对他十分厌恶，赵同却接受任福祥的贡俸，视其为膀臂。

任福祥受宠，竟图谋杀死纪亭榭，分裂“抗日军”。不料，他的计划被大队长王文同志、包乾同志和指导员王达同志知道了。他们悄悄告诉了纪亭榭。

纪亭榭一开始不动声色，先劝赵同把一总队开回安全地带宿营，机智地迟滞了任福祥的行动，然后率几个人闯进赵同屋子，向他摆明了任福祥的分裂阴谋，质问赵同：

“你是要你的舅舅，还是要抗日？清明讲！你若不信，马上叫任福祥当面对质。如果事情属实就得枪毙任福祥，如果我说错了就砍我的头！”

赵同无奈，只好立即派人叫任福祥来问。任福祥一进门，就被包乾同志下了枪，在讯问中只得如实认罪。接着，纪亭榭拿出枪来催促赵同一起去大队，在那里又下了任福

祥的弟弟、儿子的枪，将他们带回来再度讯问，也都一一承认了。

纪亭榭怒不可遏，当即要求公审他们，任福祥扑通一声跪下了，哀求纪亭榭道：

“我死而无怨，只是小儿子年幼，原不知此事，是我把他们扯进来的。于您留他一条活命，让我任家香火不致绝灭，我在阴间也谢您的大恩。”

赵同在旁边也帮任福祥说情，王文、王达和包乾同志为了团结赵同，也劝纪亭榭：他们既已认罪，就从宽处置吧。

纪亭榭干过义勇军，很重义气，见面前老的小的跪了一地，心中也有些不忍，一摆手，道：

“好吧，一个都不杀，你们带上点钱统统走吧。”

当晚，“任家五虎”检点行装，象群丧家犬似地灰溜溜地离开了“抗日军”营地。以后，纪亭榭担任了一总队总队长，党组织在一总队很快建立起牢固的领导，赵同的势力大为削弱。

“抗日军”改编成五支队后，在二道河子打了个歼灭战，在那次战斗中，纪亭榭同志和战士们一块冲杀，胳膊中了一弹。战后，他住进军区医院。

以后每次行动，我都要叮嘱他慎重。可是在一个月后的阜平保卫战中，纪亭榭同志又离开指挥所冲杀去了。

那是一场恶仗，战斗地点在阜平东面的东、西庄。

这年九月，侵华日酋杉山元集中了华北日军的一〇九师团，一一〇师团，二十六师团，铃木师团以及伪蒙疆军一部，总计四万多人，以军区驻地阜平及五台为中心，从四面八方方向晋察冀军区大举进攻。

平汉、平绥、同蒲、正太四条铁路线上，日伪军源源不断，密如蚁群。火车、装甲车的灯光，来往不绝，直至天明。

北面，由察哈尔省的矾山堡、桃花堡等地分四路围攻宛平、斋堂，兵力在三千人以上。

东面由易县、满城分三路向涞源进攻，兵力也在三千人以上。

西面由浑原、广灵向灵邱及其东面进攻，兵力在四千人以上。

东南面由曲阳经党城进攻阜平，是一路主力，步兵、骑兵、炮兵和空军相配合，兵力七千人以上。

攻五台之敌，则分道由盂县、定襄、代县而来，人数也在七千以上……

总之，攻入晋察冀军区的敌人有多少路，已经难以清晰辨别了，少说也有十几路，它们或穿插或迂回，或强攻或侧击，妄图把军区分切成许多碎块，然后加以剿灭。

敌人为了组织这次“扫荡”，进行了长期准备，抽调了空前强大的兵力——全是华北日军的主力师团。他们的战略目的，是彻底消灭晋察冀军区部队，一举摧毁边区根据地，

以动摇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当时的日伪报纸一片喧嚣，把“北取五台，南下武汉”吹嘘为在华北战场上的两大战役，谓之“必胜！”

这是晋察冀军区成立以来面临的第一次严峻考验。

聂司令员急令我率一团、三团火速赴援阜平，会同三分区的部队在东、西庄一带阻击向阜平进犯的敌人。二团留在涞源、蔚县、易县、平西地区，在各游击支队、县大队等地方武装配合下与“扫荡”之敌作战。

当时我正和三团在平西妙峰山、潭柘寺地区活动，接到电报后，命令部队立即出发，日夜兼程，越过紫荆关、走马驿、倒马关，赶到东、西庄。我碰到了边区政府的秘书长娄凝先和教育处长张苏。娄凝先急火火地说：军区党政军机关都在彻夜转移，但是多路敌兵已经接近阜平，转移已变成了突围。

正说着，又碰到几位赶着骡马的边区银行的同志，其中一人认识我，他大声嚷着：

“杨师长，你可要把敌人顶住，我们还有几十万票子没拉出来哩！”

我呢，正在焦急地等待三分区的部队。敌人步兵、骑兵、炮兵四千多人，已经由曲阳前进到王快镇了，离我们只有几十里地，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三分区的部队还没有赶到。

战场也不理想，敌人必经之路的南面是大沙河，现在

正是涨水季节，有的河段深可没人，因此阻击部队只好埋伏在路北那光秃秃的山上，从敌人侧面由北向南打。公路正面的阵地十分狭窄，兵力多了放不下，兵力少了又怕敌人突破。最后，我决定只放三团的一个营，其余两个营埋伏在东、西庄的西北山上，一团的主力由团长陈正湘、委王道邦率领埋伏在北山上，担任伏击，三分区的部队从东面截断敌人尾巴。

可能是由于通讯联络的问题，直到战斗打响，三分区的部队仍未赶到。一团和三团的一个营陷入了空前激烈的苦战。

我把战斗方案用电话报告聂司令员。聂司令员说：

“杨成武，给你一个原则：三天以内不许一个鬼子进阜平。”

我说：“一定完成任务。”

聂司令员又打电话叮嘱陈正湘同志，要知道，阜平县是我们晋察冀的军事、政治中心之一，不能轻易丢给敌人，你们可在阜平以东消灭它几百，能全歼就全歼，能将其大部消灭就大部消灭，要给敌人以迎头痛击。这对我们来说，不仅可以鼓舞士气，而且有利于我们的下一步行动。聂司令员还打电话给纪亭榭、袁升平同志，交代说，正面阻击特别关键，只有把敌人迎头顶住，伏击部队才能有效地歼灭敌人。

战斗方案定下来后，我又告诫纪亭榭同志：

“提醒你一条：你必须牢牢地站在指挥位置上，不许横冲直撞，我在后面用望远镜盯着你！”

纪亭榭同志说：

“了不起我牺牲呗。师长，你就给我准备个人接替吧。不过，我要让敌人用几百条命来换我这个脑袋！”

“你对正面阻击有几分把握？如果让敌人冲破底了，担心我撤你的职。”我说。

纪亭榭同志说：“我担保打赢。”

这时，一团部署在东、西庄以北，沿东西走向，海拔五六百公尺的山地上。一团长陈正湘领着几个营长察看地形，转到西庄南北的几个山头上，看到了与三团的接合部之间有一条通道，可这山的一面二百多米都是河滩和平地，一面是坡地。远看，山的两边约有三四百公尺宽，无遮无挡。可见三团扼守的那座山一旦被敌人突破，往后撤都很困难。于是，陈正湘同志决定，若敌人截断一、三团的联系，一团则侧击敌人，以确保一、三团通道的安全。

十月三日晨，日军一百多人向东、西庄试行进攻，被我三团正面抗击的一个营击退，在反击中三团稍有缴获。显然，这只是个序幕，敌人在摸我们的底。

十月四日，太阳刚露头，日军派出一千多名骑兵，在大炮、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向阜平进攻，其中八百多人已向东、西庄进发。上午九点钟左右，日军的先头部队约一百多人到了西庄。他们往山里一看，虽未发现一团的主

力，但发现了一团的警戒部队，于是，架起迫击炮，轰了二十多分钟。刹时间，一团阵地陷入一片火海，附近的房屋纷纷坍塌，果树倒得遍地都是。敌人在机枪的掩护下通过河滩进攻一团二营的阵地。不料，一团二营突然从山上打出一排手榴弹，来了个反冲击；埋伏在西北面的三团主力也同时出击。他们呐喊着朝敌人冲，一瞬间就进入了白刃战。三分区的部队这时已经赶到他们的战斗位置，也在准备向敌出击。

这时，东、西庄一带，公路上、田地里、草丛中，到处是刺刀击撞声和日军的惨叫声。从远处看，只见尘土弥漫，战士们和敌人滚在一起肉搏，不时从崖头滚下沟谷，从野地滚入河滩……敌人被冲垮了。他们退下去后，三团主力和一团二营占据着有利地形，也不去追。不一会，敌人增兵，加强火力，开始了第二次炮火准备，随之飞机也来轰炸，二营赶紧撤离阵地三四百公尺，等炮火一停，又跃入阵地，与敌搏斗，很快又把敌人打垮了。敌人第三次冲锋，也无济于事。停了一段时间，敌人的后续部队上来补充，达四百多人，又组织了新的进攻。这一次，敌人向一团二营的阵地施放了毒气弹，可当时正刮着风，一团二营反冲击部队又在山后，因此，对他们部队战斗力影响不大。敌人前前后后反倒在河滩伤了一百多人，从曲阳、党城一线前来进攻阜平的总兵力已达七千多人，战斗越来越激烈。阵地前面，每隔几步就有一具敌尸。然而，我们的

伤亡，也越来越大！

下午三点钟左右，敌人停止了进攻，可这时二营阵地上打成的松土足有半尺深。

在一团阵地上，笼罩着厚厚的一层烟雾。一团四连长率领全连提着手榴弹反冲击时，一边冲一边甩，一连攻下敌人六个阵地。在战斗中，一团的指战员打得非常英勇，不幸，七连指导员牺牲了，还有两个连的干部负了伤。他们为了赢得胜利，挑起了重担，伤亡了一百多人。

在三团阵地上，纪亭榭同志打得火冒三丈，由于通往各营的电话线被打断，他抓起香烟盒，写下给各营长的命令后，把那张香烟纸交给袁升平同志，说：

“政委，这里你指挥吧，我冲下去了！”

袁升平同志阻止不住，纪亭榭同志和副团长邱蔚同志便率领战士们冲出山头阵地，一路呐喊着，扫射着，朝敌群扑去。

我从望远镜中看见三团指挥所冲去一伙人，急忙打电话问：

“那是谁？”

袁升平同志报告说：“是纪亭榭同志。”

“你叫他回来！”我有些生气。

袁升平同志命令身边的人喊话、打旗语，可是纪亭榭同志连头都不回。

这时，敌人又朝我阵地连连发射毒气弹，灰黄的烟雾

笼罩了山头，辛辣的气味呛得我们指战员头晕、咳嗽、呕吐、四肢无力，好些人当场就昏倒了。懂些防护知识的人急忙抓过毛巾浸上水或尿，紧紧捂住嘴和鼻子。

一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见此情景，果断地指挥部队全线出击。敌人原以为毒气会把山头的人统统熏倒，万没想到，在毒气烟雾中冲来大批战士，用手榴弹、刺刀以及吐着火舌的机枪乒乒乓乓一顿猛揍。敌人顿时乱了阵脚，纷纷弃枪逃跑。

纪亭榭同志命令身边的战士：

“只许冲锋，不许打扫战场！”

他从山上冲下来时，看见山坡上散卧着十几个伤员，心中有些不忍，可又不肯停止追击，就歉疚地对他们喊道：

“同志们，一会儿就回来接你们。”

伤员们一看是他，精神大振。

纪亭榭同志一面跑，一面挥舞着驳克枪，率领战士们一气追出几里，直到歼灭了不少敌人，才收兵撤回。

纪亭榭同志回到山头团指挥所，看见袁升平同志满脸血红，忙问：

“你怎么啦？”

袁升平同志气鼓鼓地说：

“你跑得倒快，我守在这儿挨毒气弹，中毒啦！”

原来，袁升平同志和坚守阵地的一些战士，刚刚苏醒过来。他俩忍不住大笑起来。

自三团的一个营和一团在东、西庄顶了一下之后，这场恶仗反反复复，足足打了三天，敌人伤亡一千三百人以上，而我方也伤亡了四百多人，其中有四十多位连、排干部牺牲了。此外还有七百多人中毒。自东渡黄河以来，我们还没碰到过这么艰苦的战斗。

军区机关早已安全地转移出阜平，敌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得到的只是一座小小的空城和数不清的抗日标语。此外，找不到一只鸡、一只羊，也找不见一口锅、一粒粮。敌人占领这座空城之后，不是运输队被我们缴获，就是营房被我们袭击，昼夜不得安宁。

敌人不甘心，又分兵几路搜剿我主力部队，但总是扑空。一次，敌人被我们打懵了头，两路敌人会合时，居然拿出报复的狠劲，竭尽全力对打起来，反复冲杀，各不相让，直到天亮时才认清“对头”原来是“友军”，双方一算帐，伤亡二百多。更有趣的是：双方都发报叫飞机来助战，四架飞机临空，也搞错了目标，把他们的骑兵认做八路军，接连丢下数枚重磅炸弹，炸得敌人马倒人亡，只一阵子，就有一百多人毙命。

东、西庄战斗结束后，一、三团主力转到阜平以东，配合三分区的部队专打阜平通曲阳的敌人运输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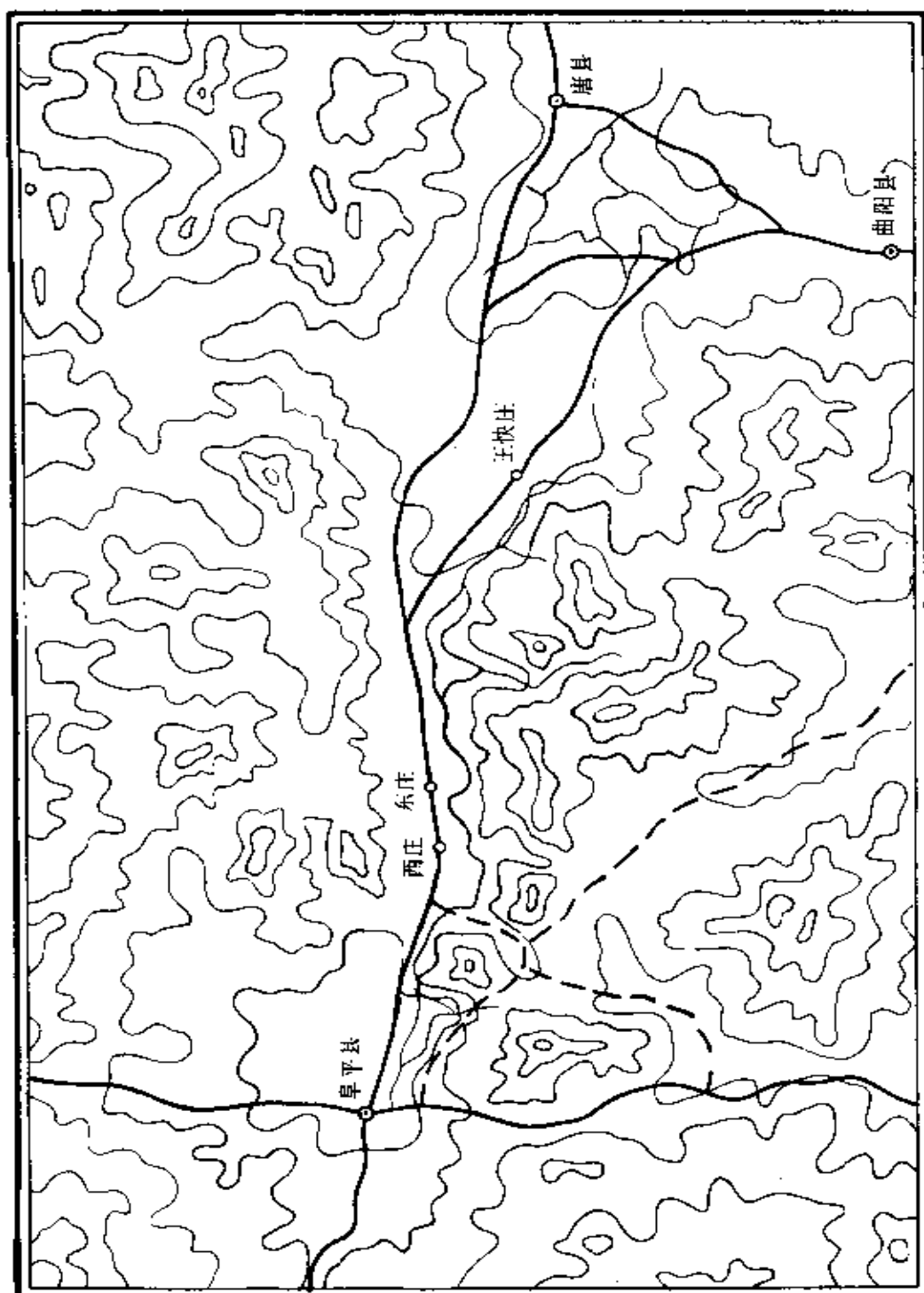
十月十五日，一团东转到贾口、郑家庄附近胜利地伏击了敌人运输队。

二十五日，三团、三五九旅七一七团一部将阜平残敌

肃清，收复阜平城。

十月底，各路敌人全部败回巢穴，军区机关重新进入阜平城。分区机关和一、三团先后回到了一分区。

东、西庄战斗地区略图



第五章

反“扫荡”（上）

军事解决“七路军”

从阜平回到一分区后，涞源城已被“扫荡”的日军占据了。我们原想攻打涞源城，因为这座城嵌在根据地里对我们很不利。后来经过周密侦察，发现城中敌人的步兵、骑兵和炮兵已增到一千多人。他们趁我们主力外出作战的时候，还修筑了碉楼、堑壕，安上了铁丝网，城墙也加厚、加高了。我们不能硬打，便将部队转移到南、北城子一带着手整训，准备向东面的平汉线发展。

一天，我得到情报，游杂部队“七路军”的司令孟阁臣脚踏两只船，一面打着“抗日”旗号，一面公开和北平、保定城中的日伪直接勾结，准备投敌。他在狼牙山脚下有个兵工厂，可以造步枪、手榴弹，这个厂是他花钱从保定“买”来的。他还有被服厂、医院。敌人这次“扫荡”，孟阁臣没损失一兵一卒。敌人来了他就跑，日军不追。敌人

退了他就回去，日军也不反击。他和日军没打过一仗，象有什么默契，原来敌人不肯动他，是想利用他来隔断我们，以保证保定及平汉线的安全。

以往，孟阁臣占据着一分区最富裕的地区，并且把它当成自己的领地，不让发动群众。我们的部队即使过路，他也剑拔弩张，慌乱得很，派些小头头带些吃食跑来犒军，脸上笑嘻嘻的，真实用意是怕我们停留。为了团结他一道抗日，我们一般以礼相待，送些东西给他，队伍却从不在他那个地区歇脚。可孟阁臣在当地扰民害民，民愤极大。他抽大烟，娶了三个老婆，老百姓都说他是流氓、土匪。

近日来，孟阁臣把他几支稍有战斗力的部队都集中到娄山、西山北和南、北独乐地区，司令部就设在根据地的边缘北娄山，那里离日军占据的保定城不足四十公里，他还命令部下专门为他的一台汽车修了一条公路。

孟阁臣的举动，引起了我们的警惕。他为什么要把部队拉到远离我们主力而接近日军的地方呢？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他和日伪有勾结。眼下我们一分区部队要向东发展，进入定兴、保定及平汉线地区。而孟阁臣象块大顽石，横躺在我们与敌人之间，我们要去触动日伪，非先碰它不可。群众要求我们解决孟阁臣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我们也看到，不解决它，边区不仅不能巩固，而且还要影响抗日。

当时易县有这么一支民谣：

穷八路，
富“七路”，
要娶媳妇上高部¹。

.....

的确，八路军纪律严明，除了有打日本侵略者用的枪弹外，没有多少钱财，是最穷的。

“七路军”最富，也一点不假。司令孟阁臣借筹集军费为名，盘剥无度，到处搜刮民财，大官小官成天酒肉不断，出门有高头大马，身后跟随着一伙兵痞，左挎短枪，右挎一个白晃晃的三节手电筒，在当地横行霸道，群众恨之入骨。

高宏飞在易县则是个土皇上。他拉起的一支队伍更是无法无天。他那司令部前有一株老槐树，平时，树下放着三顶花轿，姓高的要是看中哪家的姑娘或媳妇了，喊声：“娶亲去！”他那副官便带人抬上花轿将人强抢到司令部来，供他淫乐。人家的父母哭着在花轿后面追，那伙兵痞使用皮鞭抽、枪托打，直打得人家追不上了为止。有时，三顶花轿同时出动，抢来的闺女，高宏飞自己玩腻了，就犒赏给他手下的人，弄得那些受害者非死即残。

在高宏飞的驻地附近，民女纷纷远避它乡，方圆十几

1 即游杂武装高宏飞的部队。

里内，没人敢白日娶亲。百姓们一提起高宏飞，一个个咬牙切齿，痛恨不已。

然而，这些游杂武装下层的成分有很多是工农群众和爱国青年。但是，对于这样一些已经堕落为土匪和汉奸的头子，我们如果袖手旁观，听之任之，那么就会脱离群众，甚至难以巩固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了。

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根据上级命令，我们一分区陆续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惩办了白秀亭、周文龙、胡占海、高宏飞等首恶分子。

眼下，在我们一分区管辖的范围里两股最大的游杂武装，一是“七路军”，七千多人，司令孟阁臣；一是“十路军”，五千多人，司令赵玉昆。这两股人仗着有些枪杆，不执行边区政府法令，彼此你攻我打，结怨甚深，四周百姓不堪其扰。

有一天，我又接到情报：孟阁臣的膀臂、参谋处长马越携带巨款到北平去了，名义上是去买无线电台，而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却发现他在日本宪兵司令部出出进进。另外，孟部的人和保定城里的日伪组织的来往一下子也频繁起来了。

事不容缓，必须立刻实行军事解决。

我请示军区。聂司令员说，边区政府早就接到不少群众来信，控诉孟阁臣的罪行，要求八路军“铲除祸害”，军区现在也已经掌握了他与日伪勾结的确凿证据，解决他是

对的。再不解决，他就会发难了。

聂司令员在电话里问：“你准备怎样解决？”

我说：“召他来开会，在会间扣押。”

“不行啊，孟阁臣是个土匪，狡猾得很，不一定来。再说，光扣他一个人，掌握不住他的部队，搞不好会出乱子的。你要趁他毫无准备的时候，把他们包围起来，一个袭击解决问题。”

以前，我们多次出面调解孟阁臣和赵玉昆之间的冲突，避免了双方火并。这次，我们根据聂司令员的指示：准备了两种方案，一是通知孟阁臣和赵玉昆率各自主要人员到一分区司令部大良岗会面，商调双方矛盾，孟阁臣如到会，则就地逮捕他；如不到会，则施行第二套方案，出动部队包围“七路军”驻地，解除他的武装！

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成立了，彭真同志担任分局书记。

记得过完阳历年，我们就给孟阁臣发了开会通知，并且把解决“七路军”的意图告诉给赵玉昆，同时警告他：这是军区的命令，不许干预。

赵玉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赶紧派人来向我诉说，他是坚决抗日的，孟阁臣暗通日伪，不除必酿成大患！为表示他和孟阁臣截然不同，还要求参加解除孟阁臣武装的行动。我没同意，只是让赵部注意警戒易县、定兴、涞水方向，以阻止敌人从那里出来接应。

腊月三十，是预定“开会”的日子。不出聂司令员所料，直到中午，仍不见孟阁臣踪影。下午三时，哨兵报告，“七路军来人了”。

我出门一看，村头尘土飞扬，人唤马嘶，来了一支队伍。为首的，是“七路军”卫生部长卢星文和他们剧社的一位负责人，后随几十人，几十匹骡马，满载着酒肉、水果、布匹、医药……将司令部前的土场子挤得满登登的。

我问卢星文：“孟阁臣为什么不来？”

卢星文笑道：“孟司令身体违和，在驻地调养。本来想抱病赴会，他又担心日寇趁虚偷袭，只好告罪了。眼下正是新春佳节，孟司令备下些礼品，着我等送来慰问杨师长和各位将士，并有书信呈交。”

卢星文递上一封信，我看了看，无非是“贱体偶染微恙，戎务匆忙”一套话。后面还有一份长长的礼单，从单上的众多名目看，“七路军”真是富甲王侯！同时可见，孟阁臣鬼得很，就在他准备投敌的时候，还给我们送来了厚礼，无非是想麻痹我们。

我说：“孟阁臣暗通日伪，欺压黎民百姓。今奉军区命令，委屈你们一下。有带武器的，全部交出来！”

孟部的人一听，全呆住了。

我又说：“你们别怕，明天天一亮你们就自由了，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我们只抓孟阁臣和几个首恶分子，其余的人只要不抵抗，都是我们的弟兄。将来，愿意参加抗日

的，我们欢迎；愿意回家种地的，我们予以方便。”

卢星文是地主家庭出身的进步知识分子，素有爱国心。孟阁臣在他家乡拉队伍，诱他入伙。他为了抗日，也就弃学从军，当了“七路军”卫生部长。眼下，他和随行人员听说孟阁臣由于暗通日伪要完蛋了，反而觉得轻松了。

我当即下令：各路部队火速行动，乘夜包围西山北，南、北管头，南、北独乐，塘湖镇，东、西林泉，四赵庄，钟家店，白堡镇等“七路军”驻地。参加这次行动的，有一团、三团、骑兵团和二团二营，我率分区特务营和二团第二营从大良岗出发，经管头直插北娄山——孟阁臣的司令部。

月光下，满山白雪莹莹生辉，战士们脚踩积雪和薄冰，咔咔直响。我们沿着沟谷小路，穿过大南尖、三尖寨、黄古坨等几座险峻山岭，悄悄地来到北娄山附近。这时，东面山脊已透出几缕细弱的白光，处于群山环抱中的北娄山村和南娄山村还沉没在一片灰白色雾霭里，如坠烟谷，浑然无迹。随着天色渐渐发亮，雾霭中出现了几株高大柿子树的树尖。接着，柿子林，房舍院落，身披白雪的草垛子和乌黑的小径也在望远镜中出现了，只是迟迟看不到人影走动。

蓦然，一阵激越的冲锋号从山顶传来，枪声四起。战士们一面冲锋，一面喊着：

“我们是八路军，快放下武器！”

“孟阁臣暗通日伪，我们只抓他一人。”

“不要替孟阁臣卖命，受苦人是一家。”

“七路军”的人听见枪声和喊声，知道被我们包围了，也纷纷喊：

“八路兄弟，我们不打，你们也别打了。”

“到底咋回事啊？”

我们战士喊着：“孟阁臣叛变了！他要投靠日伪，军区命令抓住他。”

他们一听，把枪收了起来，不再抵抗。

枪声紧密处，是孟阁臣的特务连和机枪连。那里面孟阁臣的亲信较多，平时孟阁臣也格外地宠他们，所以他们还在抵抗。但我们的战士居高临下，从两翼突击，机枪、手榴弹暴雨般地泼到他们头上，他们渐渐不支。

孟阁臣有个习惯：每天早晨起来，脸不洗，就倒在烟榻上抽白面，由他的三老婆服侍着，足足要过上一个多小时的大烟瘾，才起身进餐。这天他正在吞云吐雾，忽然听到枪声，连忙爬了起来，问：

“谁打来了？”

“杨师长带队伍把我们包围了。”外面的人报告说。

孟阁臣愣住了，脸上黑沉沉，咬牙切齿了一阵，又一言不发地倒下身，抓过烟枪狠狠地抽。外面枪声越响越紧，卫兵慌了：

“两面山上的弟兄全投降了，怎么办？”

孟阁臣问副官：“其它团情况怎么样？”

副官放下电话告诉他，能喊出来的团都已被八路军包围了，失去联系的团，恐怕已经出事了。

孟阁臣晓得末日到了，微闭眼不做声，咬得烟枪上的翡翠烟嘴嘎嘎直响。好半天，他才慢吞吞地爬起身，带着几个卫兵出了院子，四面望了望，然后朝山坡上的警卫连假惺惺地吼道：

“谁让你们开枪啦？都是抗日的队伍嘛，不许打，我去迎接杨师长。”

“他们要咱们缴枪。”

“唉，缴吧。”

孟阁臣装模作样地把周围人训斥了一顿。

最后一阵枪声停息了。我远远看见一伙人打着白旗从北娄山出来，一边摇旗一边喊：

“杨师长在哪里？孟司令要求见杨师长。”

几个战士把他们引来。孟阁臣看见我，急匆匆迈上几步，苦笑道：

“杨师长，我们投降。请到鄙人司令部休息。”

我说：“你先命令你的人统统放下武器，集合待命！”

“是，是。”

不知是天寒还是心寒，孟阁臣脸色黄里透青，嘴边挂着一缕呆板的微笑，身子微驼，双手簌簌发抖，结结巴巴

地传达了 my 命令，然后步履蹒跚地领我们向北娄山走去。

在村口，我们看见竖着一个路标似的蓝木牌子，上面写着几个白色大字：行人靠左走！同志们失声笑了，小小一个村庄，也开展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了。接着，我们又看到什么“七路军医院”、“军机要地，闲人莫进”等等木牌子。也就在这时，我一团、三团、骑兵团分别在西山北、塘湖镇、白堡镇、岭西包围了孟部的人员，迫使他们全部缴械。

孟阁臣原在国民党汤恩伯的部队里当连长。“七·七事变”后，部队在南口一带被日军打散，孟阁臣带二十多人逃进深山，由平西流窜到察南。路过“野三坡”时，他的部下被土著武装缴了械，有的还给活埋了，仅剩下他和另外两个人冒死突了出来。

他们进了易县后，身无分文，便沿途强索食物。一天，他们闯进小坎下村，拍打着腰间短枪，朝村民要酒要肉要马骑。

村中财主卢连甫，当过河北省议会的参议和国民党区党部书记，见过不少世面，晓得这伙败兵不好惹，但可以利用。便以礼相待，把他们请到家中，先陪着过足了大烟瘾，又弄了十几样佳肴款待他们，还请了几位首富作陪。

席间，孟阁臣大肆吹嘘自己的经历，卢连甫等人见他言语“不俗”，便劝他就在此地拉起一支队伍，保境安民打天下，做一代乱世英雄。

当时，赵玉昆已在易县东南部拉起武装，经常派人来要钱要粮。卢连甫等财主觉得需要有一支自己的队伍，以便和赵玉昆对抗，而孟阁臣是“中央军”，牌子大，正可用他来挑头。

孟阁臣呢，野心勃勃，觉得此地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东南临华北平原，北依太行山脉，国民党军队已经跑光了，八路军刚过黄河，立足未稳，日军控制不了这里，他正好可以称王称霸！

于是，卢连甫和孟阁臣一拍即合。卢连甫负责联合地主豪绅，出钱出枪出计谋，先后腾出一片房屋，给孟阁臣做卧房、议事厅、卫室等等，还陆陆续续给他娶了三个老婆，为他扎营立寨大造声势。

孟阁臣受到抬举，抖擞精神，把司令部设在南独乐村，打着“抗日”的旗号，在易县、满城、徐水一带，大肆收罗溃兵、散枪和各村青壮年，以富家子弟和国民党军官为部队骨干，还吸收了少数知识分子。卢财主等豪绅捧他做总司令，他即以“总司令”的名义封卢连甫为秘书长，卢尚仁为委员长，卢会川为易、满、徐、涞联合县长。这“三卢”都是当地有名的财主。孟阁臣将手下人马分成七个总队，头目大都是贪婪狠毒之人，下层人员则多数是为了抗日、保家乡的当地农民。

孟阁臣起事后，先占下白堡、塘湖及易县西南一片，后又占下保定以西的满城地区。接着，他给各村下条子派

款征粮，极力扩张势力范围，还通告赵玉昆、高宏飞等部，不许前来插足。

当时，孟阁臣人马并不多，枪支就更少了。头目们有支短枪，下面人大部分只佩着鬼头刀、棍棒、鸟銃、手电棒，服装也乱糟糟的。他们用红布搓成绳套，每人脖子上套一条作为标志。还恬不知耻地向百姓们宣称：

“知道红军吗？我们就是红军变过来的部队！”

一九三八年春，这支游杂部队自封为“河北省游击军第七路”，简称“七路军”，此时已发展到一千多人，武器装备也有所改善。

与“七路军”接壤而驻，就是赵玉昆的“十路军”。两家为了争夺地盘和钱粮时常发生冲突，但又不敢倾巢出动，都怕对方把自己吃掉。真可谓是小打不断，大打不敢，竞相吞并旁的小股武装，以壮大自己实力。

一次，赵玉昆出兵攻打东霍山大地主董茂轩，没打住，反而被孟阁臣偷袭了后路，损失了十来条枪，赵玉昆为此恨透了孟阁臣，发誓要报此仇。孟阁臣却趁机把董茂轩的护院兵编为自己的第八总队。后来，孟阁臣感到总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赵玉昆势力太大，自己不能统一，也无法将其消灭，日久必两败俱伤。所以他就提出了“合编”的建议，情愿让赵玉昆做总司令，自己做参谋长。赵玉昆佯作同意，却由自己的参谋长宋学飞设计，埋下伏兵，诱孟阁臣前来商量“统一”，把孟阁臣及主要头目统统扣押起来

了。随即，他们提出条件说，若解散东霍山地主武装，赔偿赵部的损失，就放人，否则，就杀头。

我们党的保定地下党组织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为了团结双方抗日，便派路志国同志去做工作最后孟阁臣答应了赔偿枪弹钱粮。可是放他走后，他又翻脸不认帐，一枪一弹不给赵玉昆。

这以后，双方势力都有扩大，而孟阁臣和赵玉昆二人已成生死冤家。

孟阁臣由于形势所迫，不得不依附八路军。他曾到阜平参加过一次“晋察冀行政委员会会议”。在会上，他极力表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服从晋察冀军区的指挥，坚决抗日。并请求军区予以正式任命，派干部来改造“七路军”。军区依据党的统一战线精神，容纳了这支队伍，并授予“晋察冀军区第六军分区”番号，还派陈大凡同志出任六分区政治部主任。

陈大凡同志任职期间，在孟部办了军政干部学校，兼任校长，先后招收过几届学员，培养了一批基层政工干部，可是由于孟阁臣的阻挠，没能发展党员。孟阁臣对我方的政治工作非常反感，称指导员是“捣蛋员”，公开怂恿手下人反对他们，不让他们掌握实权。陈大凡同志走到哪里，孟阁臣也都派亲信盯随。

孟阁臣手下还有一帮爪牙，专门打砸、抢劫，周围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孟阁臣本人则成天喝酒走马，勒索民

间财物，见到什么稀罕玩意儿就要，不给就抢，一口大烟瘾也越抽越重，川流不息地派专人到北平、保定采购上等烟土。

我们押着孟阁臣走进他的司令部。这是北娄山的一幢独立大四合院，原来是大地主刘迪山的住房，他为了巴结孟阁臣，拱手相让了，还搭上几个仆人。北屋是客厅，西屋是孟阁臣和三老婆的卧室，东面一溜小房，住卫兵和仆人。因孟阁臣爱吃活鱼，院子前面派人挖了一个鱼塘，水是从北娄山“民生泉”引来的，清澈活泛，放养着百十尾鲤鱼，现已深冬，结了一层薄冰。四周的核桃、柿子、梨、苹果等果木，已成一派雪树银花。倘若待到开春，这里准是山青水绿，花果飘香。可惜一处好河山，做了孟贼巢穴。

大家坐定，孟阁臣哭丧着脸站着。

我说：“孟阁臣，你表面抗日，暗中勾结北平和保定的日伪汉奸，欺压当地群众。军区命令我们逮捕你！你要好好交待自己的罪恶，准备接受审判。”

孟阁臣面色如土，半晌说不出话，倒在一张椅子上，从眼里挤出几滴混浊的眼泪，一声声叹起气来。

那天我们吃了一顿异常丰盛的午餐。孟阁臣的伙夫把窑中所藏的海参、鹿脯、香菇、蹄筋、火腿、熊掌……每样都烹饪出一些来。此外，我们还吃到了香蕉、桔子，真可谓大开眼界。这个土皇帝搜刮了多少东西啊！

正吃着，南屋突然轰隆一响，只听人惊叫道：“不好，炕塌了！”

好端端的炕怎么会塌呢？我诧异地赶过去一看，满屋烟尘弥漫，地上却到处滚着金银珠宝和银元，一抬脚就能踩上，我平生还没见过这么多的金银哩。原来，孟阁臣的副官——后为一分区警卫连连长的吴炎同志，正领着大家清理孟阁臣的银库。他们把孟阁臣搜刮来的金银首饰、珠宝玉器，五十两一个的银元宝，十两一个和五两一个的小银锭，以及几万块银元和几十万元“中交票”全部翻了出来，堆在大炕上清点，谁知竟把这大炕压塌了！

墙角，还堆着两箱崭新的八路军臂章，可见自从军区颁发给孟部以来，他们一块也没佩戴。

我气恨极了，斥责孟阁臣道：

“你这还不是打着‘抗日’旗帜，喝百姓血汗么？”

孟阁臣两眼直瞪瞪盯着满地金银珠宝，两撇小胡子一抖一抖，都快站不住了。

“押下去！”我命令道。

孟阁臣的三老婆哭天喊地朝我扑来：

“杨师长，积德哟，您饶了他吧……”

我厌恶地推开她：

“听着，你要好好改造！”

然后，派人把她送到地主刘迪山家去了。

孟阁臣被关进东面一间小屋。临进屋前，他可怜巴巴

地恳求卫兵，让他带几包白面进去，口口声声说：

“饭不打紧，没烟土可活不了呀！”

不到三天，孟阁臣由于断了烟，眼泪、鼻涕、冷汗一起下来，甚至连下炕解手的劲都没了，屎尿就厕在炕上。开头，他还发神经似的哭唤着，央求吴炎派个人，骑快马到保定府买些烟土来救命，吴炎根本不理他那个茬，冷冷地拒绝了。后来几天里，孟阁臣象具僵尸蜷缩在炕角，裹条大绸被子，一动不动。送饭的人一进去，他就求告着要大烟。

孟阁臣被押往军区的那天，从屋里架出来已经烟瘾得不象人了：面孔发绿，两眼眯成一条缝，连个子似乎也矮了许多。本来，我们为他准备了一匹马，可这个烟鬼连马也上不去。后来换了一辆马车，让他坐在车板上，谁知他连坐也坐不住，旁人一松手，他就滚下来。无奈，只好抬来一个大圈椅，把他安置在椅子上，四面用毯子裹住，再用绳索绑牢，他才勉强坐稳了。就这样，我们派人把他送到晋察冀边区政府去接受人民的审判了。

改造“十路军”

“七路军”被解决之后，除去投机分子，剩下约三千多抗日战士，高高兴兴地转入我们一分区各部队来了，不少人还当上了指挥员，也有的当了中、高级干部。

这时，我们一分区司令部由大良岗迁到北娄山村，政治部迁到了南娄山村，地委^①驻在西娄山村，专署^②驻在松山村，各村相距一二里。

这一带风景清丽幽深，地形隐蔽，三面是山岭，中间是一片起伏不大的小平地。四面山野全是密密的核桃林和柿子林，各家房前屋后，也都栽有不少果树。

可是，从这里越往北，山越高，西北十几里处就是险峻的狼牙山群峰。北面有条易水河。东南面临大栅河，此河源于深山，有好几条河道，在管头村会合，然后九曲十折，流向白洋淀。它是条季节河，每当夏日山洪暴发，河面宽达一百来米，深可及丈，水势湍急，斗大的石头都停不住。缺水时如同一条小溪，温驯而又清冽，可饮马濯足。

我们司令部背倚群山，面临栅河，这里的绿荫如云，林间有一块操场，可供我们厉兵秣马之用。东北面六十多里是易县城，东南面四五十里是保定城，敌人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们的耳目。在这里，出击、养息、侦察、练兵、指挥，都十分便利。

东北三十里有个北百虹村，那是赵玉昆的司令部。现在，整个一分区境内，就剩下“十路军”了。因此，团结和改造他们，成了当务之急。

一九三九年春节过后，我们建议军区将“十路军”编

1. 一九三八年特委组织改为地委组织。

2. 一九三八年行政委员会改为专员公署，简称专署。

入一分区建制，原“十路军”所属的大小十二个团五千多人合编成三个团，归一分区指挥。

命令宣布后第二天，赵玉昆就率领几人骑马来到北娄山。在司令部门前，他下了马，对我咋地靠足敬礼，粗声粗气地说：

“杨司令，我们前来领受训示。”

“请大家屋里坐吧，谈谈心。”我邀请道。

进屋后，赵玉昆介绍了随行人员，内中有“十路军”的参谋长宋学飞和几位主要团长。赵玉昆嘿嘿笑着：

“杨司令，罗主任，今天是‘十路军’的好日子啊，正经成了八路军。咱这支队伍是自己闹起来的，各方面都比你们差远了，编进了一分区，就怕给领导添麻烦。再者，外界有小人造谣，说我不愿意接受改编，真是恶毒至极。改编是我多次要求的嘛！”

很明显，他怕我们不信任他。

罗元发同志摆了摆手说：

“我们明白，‘十路军’是一支抗日武装，大部分人都是为了抗日、保家乡才参加队伍的。今天又是为了抗日，大家才成了战友。我们非常高兴。日子长了，一定会互相了解的。不过，话说回来，八路军过的是苦日子，纪律严明，哪位如觉得干不下去，请现在提出来，我们欢送他走。只要不投靠日伪，我们就不会为难他。”

赵玉昆拍了一下胸脯，昂首道：

“咱坚决跟共产党走！”

立刻，他手下人也同样拍了胸脯，七嘴八舌说出同样的话。只有一位坐在后面的中年人没拍胸脯，而是亲热地望着我，颌首微笑：

“来日方长，来日方长……”

我认出来，他是宋学飞，服装比那些人整洁些，紧束着武装带，显得很精干。谈话时，他很少开口，只长时间地默默听。对我和罗元发同志的话，他常常报以一个热切的笑容，对赵玉昆等人粗声大气的言语，他绷着脸不动声色。我一下对他产生了好感。

赵玉昆话最多，好象一静默下来他就不安，总不停地讲，讲他自己如何“抗日”起家，痛骂孟阁臣两面三刀，询问八路军发不发饷，一月有多少给养。

趁他罗嗦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这人。

赵玉昆个头足有一米八五，屠夫一样的胖大身材，脸很黑，有几个刺眼的麻子。一兴奋，麻子就变得象红豆。豹眉刺眼，即使笑的时候也隐隐透出股杀气。一转脸，他又会变出一副愁苦的样子，一下下拍着膝盖，乞求似地说：

“杨司令哎，罗主任哎，你们可要好好帮助我赵玉昆，我的毛病不少哇。”

那摇头晃脑的模样，真让人忍俊不禁。我和罗元发同志交换了一下眼色，心里都明白：这是个闯过世面、性格阴毒的人，对他绝不能掉以轻心。

关于赵玉昆的历史，我们早已摸得一清二楚。他是易县东邵人，祖辈有些钱财、田地，到他父亲手里，被吃光赌尽了，赵玉昆就投到山中为匪，去干些剪径绑票之类的勾当。

他身高体壮，枪法准，为人凶狠奸诈，不久，混上了个头目。可是在一次抢劫时，他被官府拿获投进了死牢。

眼看就要砍头，他与同牢七个犯人拜成把兄弟，图谋越狱逃跑，日夜窥测时机。这时“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华北，国民党当局大小官吏都在收拾细软准备逃跑，无心管理牢犯，赵玉昆等人的案子也就拖下来了。

一九三七年深秋，日军占领保定的那一天，出动四架飞机轰炸易县城，城中大乱，牢犯们趁机砸开监狱脱逃。赵玉昆和他七个把兄弟跑到曲城一个亲戚家里，站住脚跟后，商量着要干一番“大事业”。一天，他们宰了一只公鸡，饮血为盟，指天发誓，推举赵玉昆为头，开始起事了。

他们利用当地百姓仇恨日本侵略军和要坚决保卫家乡的心愿，到处招兵买马，四处游说，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如果不是汉奸，就得参加我们的队伍”这样的话，半诱骗、半威逼地聚集了一些人，成立了“华北民众救国军”。

他们制了一杆白旗插在村头，上面写着“天下第一团”五个血红的大字。几个头子公开叫嚷：天下第一团，人人该我钱，只许我不要，不许你不还！

赵玉昆还以“抗日捐献”为名，向四方村民派粮派款，限期交毕。逾期不交者，则绑他家人做“肉票”，逼着用重款来赎。一些富豪人家见他势大，也渐渐来投靠。起初，赵玉昆内部纪律比较严格，抢谁绑谁，都由赵玉昆亲自决定，不容部下乱来。特别是对待旧官家和知识分子，往往先礼后兵。先请他们参加自己队伍，不从，就请他们捐粮捐款，不捐，就绑“肉票”、砸明火了。

一九三八年春，赵玉昆将其队伍自封为“河北省游击军第十路”，当地群众不明真相，也都称之“十路军”。这下，他更神气了。

霍山村地主董茂轩，是易县有名的富家之一，家财万贯，良田数百亩，还在城内开有商号、当铺、作坊等，同时又是当地菜市霸主。在安国菜市上，董家人不到场，谁也不能开盘行市。董家住一幢高宅大院，有几十杆护院枪支，平日不怕官不怕匪，横行乡里。听得“十路军”要来抢，董茂轩便把钱财埋在地下，叫人放风道：“你赵玉昆有没有炮？有炮，咱开门请你进家。没炮，你休想搬动咱一根毫毛。”同时勾结“七路军”孟阁臣，严密提防赵玉昆。

赵玉昆攻了两次董宅，均未成功，还吃了孟阁臣的暗亏。于是他拼命找炮，终于找到一门国民党溃兵遗弃的迫击炮和三发炮弹。他再次带兵围住董宅，令人叫道：

“姓董的，看炮喽！”放了一炮，响了，正炸到董宅院里。

赵玉昆不叫打了，又令人喝问：

“给你个样儿看了，开不开门？不开就轰垮庄院！”

董茂轩还以为赵玉昆真有了一支炮队呢，慌了，只好打开院门。赵部的人一涌而入，从地下挖出几箱金银首饰和银元、钞票七万多元，还缴获了几十支枪，发了个大财。

赵玉昆滔滔不绝地谈了一通之后，忽然起身朝门外喊道：

“好了没？好了就搬进来。”

话音刚落，几个卫兵就捧着、抱着，搬了一大堆东西进来了。什么香烟、火腿呀，什么板鸭、酒呀，等等，摆了满满一地。

罗元发主任笑道：“赵玉昆，你可真慷慨呀。送来这么多东西。”

我想：赵玉昆这样做，无非是想和我们拉“关系”，套近乎，让我们说他好。然而，我们拒绝了。

赵玉昆窘迫了，脸皮有些发紫：“你们生活太困难了，这全是战友情谊，没其它意思。”

“情谊拿东西是换不来的，希望你以后不要这样做了。”我严肃地告诉他。

“当然，当然。”

我和罗元发同志陪着他们在北娄山转了转。这时警卫连正在林间空地上练刺杀，见到我们，战士们练得更起劲了，有的脱去棉袄，身上直冒热气，随着刀光一闪一闪，

腿脚敏捷地一蹦一蹦，尤其是那喊杀声，震天动地，让人听着心中痛快。赵玉昆看得两眼发直，半晌不说话。

我缓缓走到宋学飞身边，轻声说：

“听说你在东北军当过营长，你看我们的刺杀训练有什么毛病没有？”

宋学飞正在凝神观看，听到我的话，忙转过身来激动地说：

“我看日本鬼子绝不是这些勇士的对手！了不起，真了不起！唉，只有真心抗战的部队，才会这样刻苦练兵。我们哪……”宋学飞苦笑着摇摇头。

“有什么话，说嘛。”我劝道。

“杨司令，我有一个希望。”

“请说。”

“你把我调到八路军里去吧。不能当干部，当士兵也行。”

我笑了：“你现在已经是八路军了嘛！”

“不，我的意思是，到你们一分区的部队里去，行吗？”宋学飞声音很低，两眼热辣辣地盯住我，一脸期待的神色。

他的要求使我很感动，但我不能答应他。改造“十路军”，也需要依靠他这样正直的旧军人啊。

宋学飞出生于易县霍山村一个地主家庭，年轻时考上东北军的讲武堂，是个高才生，毕业后，当上了张学良的骑兵营长。“九·一八”以后，东北军遵照蒋介石不抵抗的

命令，被迫放弃东三省，撤到关内来进攻陕北红军。宋学飞对此十分不满，一气之下，扒掉军衔辞官不干了，跑回家乡，终日读书饮酒。因他有些人望，又懂军事，当地官府又聘请他做了易县保安队长。

不久，赵玉昆在易县招兵买马，可惜招来的大都是纨绔子弟和大批愿意抗日却不懂军事的当地农民。赵玉昆也感到自己人马虽多，但军事实力太差，连个搞训练的人都没有。部下刮地皮行，一旦和日军交起手来，肯定一触即溃。于是他拼命寻求旧军人和各种有用之才，听说宋学飞这个人后，便学刘备“三顾茅庐”的做法，一遍又一遍地登门请他。

宋学飞原本看不惯“十路军”这支芜杂队伍，为了抗日保家，也就答应加入了。但是，他提出三个条件：

- 一是要当参谋长；
- 二是要改编队伍进行抗日；
- 三是要严肃军纪，不抢平民百姓。

赵玉昆答应了他的全部条件。

宋学飞走马上任后，首先设立了“召集处”，广泛吸收抗日青年入伍，应征者不少，“十路军”的成份渐渐有些改变。要求抗日，要求民主进步，要求靠拢八路军的人一天天多了。

去年春天，宋学飞率兵伏击日军运输队，击毙了二十多个日本兵，缴获了四辆汽车和不少军用物资。六月间，

又率兵攻入定兴城，与守城的日军打了一天一夜。虽然没拿下县城，但名声传开了。乡亲们一看：嗨，“十路军”还真抗日呐，参加的人也就更多了。赵玉昆的这支队伍竟扩大到五千多人，编了大大小小十二个团。

从北娄山出来，我们又回到司令部。吃罢午饭，我把赵玉昆留下来，商量改编“十路军”的事情。其他人，就先请他们回驻地。

过了一会，门外有人嚷嚷：

“不行……赵司令不走，我也不走！”

我出门一看，一个瘦得象柴杆似的汉子，手叉腰站着，大概多喝了两杯，脸上紫红，仗着酒劲，口喷白沫乱喊一气：

“你们别唬人，这一套瞒不过咱老韩，快把赵司令交出来！”

我问了一下，这人是“十路团”的一个团长，叫韩宝书，是赵玉昆的心腹。他见我们单单留下赵玉昆，起了疑心，以为我们要害他。

我厉声道：“韩宝书，放规矩点！你们常干的事，我们

地离去了。

赵玉昆不自然地对我解释道：

“杨司令，您别在意，这小子贪杯，让酒灌昏了，我回去非教训他不可。不过，他有口无心，脾气虽大，有时连我也骂，打仗时倒挺有种的，是把好手哩。”

“敲诈民财也是把好手吧？”

我了解过，“十路军”里，韩团纪律最坏，经常勒索当地民众，迹近土匪。韩宝书差不多把四周百姓的钱全榨干了，还得意地吹嘘：“机枪真管用，一架上就开门。他如说没钱，你别信，吊他半日，准保拿钱出来。”

赵玉昆装模作样地叹道：“这小子是有不少毛病，今后我一定严加管教，让他改。”

回到屋里，我依据军区指示，谈了改编方案。整个“十路军”编为一个支队，番号还是“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五支队”，将大大小小十二个团缩编为一、二、三团，赵玉昆仍任司令，宋学飞仍任参谋长，白静洋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分区派一批党员干部进去担任部分领导职务，逐步改造这支部队。

赵玉昆一一同意了，并表示保证执行军区和一分区的命令，遵守边区政府的法令和八路军的各项纪律。接着，我们又陆陆续续派王道邦同志任支队政委，韩庄同志任副司令，王建中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张如三，詹道奎同志任团政委，另有几十人担任了各级政治干部。后来，赵玉昆

提出了几个要求，第一是“发饷”，另外，伙食标准也要高一倍！他一口咬定：

“每个月都得发饷。没钱，谁肯来打仗，抗日是要掉脑袋的呀。”

我原则上答应了。但是告诉他：坚持抗战靠的是艰苦奋斗，八路军不能勒索老百姓，国民党又不给一文军费，我们自己的经费相当困难，同志们不发饷也照样打仗，照样流血牺牲，而且毫无怨言。希望你们向八路军战士学习。然而，我们尽可能地给你们发饷。对待赵玉昆我们采取了特殊照顾的政策，每月发给他二百块钱，而我们自己，包括分区领导干部，有时最多只发五元零用钱，更多的时候是一文钱也没有。

赵玉昆的第二个要求是让马佩然、韩宝书、翟秀峰当团长，让李耕耘当参谋主任，这几个全是他的心腹。其中，李耕耘为人奸诈凶狠，一肚子坏水，被人称作“李蛮子”。

我说：要请示军区。后来，军区考虑到我们已经任命了各级政委，不怕他们闹事，便同意了。

赵玉昆的第三个要求是准许他们自由活动。这个我没有同意。我说，我们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们编入一分区了，一切行动就应当听一分区的指挥。

“是，是！”赵玉昆嘴上这么答应着，心里却一直把“八路军”看成是他自己的私人资本，对我们派去的人不仅另

眼相待，而且十分不满。他早年为匪，本性阴毒，一贯视兵权如性命，目前虽然在抗日的旗帜下和我们走到一起来了，但究竟能走多远不得而知。为此，我们改造“十路军”，重点是改造基层，同时也改造赵玉昆。对他，我们既努力争取，又不期望过高，既讲团结，又保持警惕。然而在这两年和各种游杂部队打交道的复杂经历中，我得出了一条经验：广大士兵都愿意和我们共同抗日，而少数头头往往很难改造过来。

果然，过了两个月后，赵玉昆就指使人来找麻烦了。

这天，五支队军需处的李处长找到我，开口就要钱：

“杨司令，怎么不给我们发饷了？”

原来，我们给五支队发了两个月饷，分区供给部就没钱可发了，我看这样下去实在不行，就通知他们停止发饷了。

“你回去告诉赵玉昆，现在我们财务上实在是没钱，从这个月起，暂时不发饷了。”

“不发了？”

“嗯！”

“啊，啊……”

李处长快快不乐地回去了。第二天，他又骑着马赶来，嚷嚷着要见我。

我问他：“什么事？”

“不发饷不行，既然管着我们，就得养着我们！”李处

长态度十分蛮横。

我耐心地劝告说：“一开始，给你们发饷，那是考虑到你们刚转入八路军，过不惯我们的艰苦生活。现在分区实在是没钱了，等以后形势好转，我们再续发嘛。”

李处长闹了一阵才回去。第三天，他又跑来了，这次见到我，劈头就说：

“赵司令交待了，今天领不到饷钱就不回去！”

我顿时火了，说：“你去问问我们干部有没有饷。你再到医院看看，我们的伤病员吃的什么。现在连买药的钱都没有，你还一个劲地饷、饷、饷，回去告诉赵玉昆司令，愿意干八路军，就要过艰苦生活，现在要饷，肯定没有！”

李处长脖子一缩，跐着脚走开了。从此他再不来要饷了。

几个月过去了，改造五支队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各级政治机关都已建立，各连也都陆续配上了指导员，其中不少是从先进战士中选拔出来的，虽然不全是党员，但受我们的影响大，工作热情高，军事、政治素质也都不错，在基层有较高的威信。赵玉昆对他们却是抱着一种阴阳怪气的态度，一是不喜欢、不理睬；二是不承认他们能干、比他的那伙人强。

接着，我们为把“十路军”改造成为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和老八路一样勇敢、坚强的抗日队伍，又在五支队办起“政治教导队”，分批培训在职干部，组织他们学习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方针政策，从优秀学员中发展党员，每个团都建立党支部，各营都设党小组。随后党组织又逐步扩大，把所有的基层干部都争取过来了，广大战士也都坚定地跟我们走。

一九三九年雨季战斗后，我们对分区部队建制做了调整，把主要部队改编为两个相当于旅的支队：

一支队司令陈正湘，政委袁升平，下辖一、三两个主力团。

五支队由“十路军”编成，司令赵玉昆，政委王道邦，副司令韩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建中，参谋长宋学飞，下辖二十五、二十六团。

这样，分区形成了两个有力的拳头，便于指挥和出击。除两个支队以外的其余各团及游击支队，直属分区指挥。

不久，拨给宋、邓支队的老三团从冀东回来了。他们编为一分区的第六团，团长、政委先后由季光顺、肖思明、杜文达、谢国仪等同志担任。他们参加了一分区东部和雁北地区的抗日斗争，起了重要作用。后来，还参加了“百团大战”。这支有红军基础的老部队的到来，一下子又增强了我们的实力。

一个晴朗的秋日里，我和高鹏同志策马来到五支队司令部所在地洪城村。

王道邦政委、韩庄副司令、宋学飞参谋长高兴地朝我们迎过来。我左右望望，不见支队司令，便问道：

“赵玉昆呢？”

王道邦同志摇摇头说：“他呀，根本不住这儿。”

“住哪里啊？”

宋学飞流露出对赵玉昆的不满，接着告诉我，赵玉昆从来不与部队同住。他带着老婆、孩子和十几个卫士，住在离这里十几里外的一个小山庄里。他认为那里地形隐蔽，目标小，住宿安全，不会引起日伪的注意。每天上午，赵玉昆率一伙马队，到司令部来聊聊天，发布几条命令，拿上新鲜果品就回去了。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那个小山庄里饮烟、打牌、抽大烟，广大士兵看不见，还以为他在那里办公事呢。

王道邦同志看了看表，说：

“司令员，部队我们可以拢得住，可赵玉昆我们管不了，你想个办法吧。”

我告诉他们：不要着急，这支部队毛病很多，不是一挂上八路军臂章，就跟八路军一样纪律严明、能征惯战了，要做长期艰苦的改造工作。军区已经同意了，调五支队进山整训，坚决把五支队整顿成一支正规化的主力团队。

他们听了，都喜形于色。

宋学飞又告诉我，在雨季战斗中，赵玉昆根本不随部队行动，要走了武器装备最强的一个连，在所住山庄周围的隘口统统派兵把守住，自己照旧享乐。有一次，他和王建中同志去看赵玉昆，赵玉昆不问部队反“扫荡”的情况，

只是催促他再给东南山口添一个排，说：

“那儿不堵上，咱心里不安稳。”

我听了心中很气，赵玉昆确实太不象话，身为支队司令，却扔下部队不管，只会守着老婆过舒服日子。他派那么多人去保护自己那个小山庄，难道就不知道这样倒是很可能把日军引过去吗？可见在军事上他也是个草包。

宋学飞沉思了一会，说：

“司令员，对赵玉昆，你们一定要小心，他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呀！”

每次到分区开会，宋学飞都要单独和我谈一谈，反映支队情况，提出一些建议，末了，总叮嘱我要“小心”赵玉昆。宋学飞是个正直的军人知识分子，看不惯赵玉昆和他膀臂们的丑恶行径，平常孤独寡言，心内不痛快了就喝点酒，跑跑马。

宋学飞的坐骑是全分区出名的一匹蒙古马，高头长腿，毛色雪白，跑起来轻快稳健，象一道白色闪电，谁见了都啧啧称赞。他精于骑术，也特别喜欢和人谈论马。一次，他唬马夫：

“你听着，我有好几个儿子，死个儿子不要紧，马要是被你碰破一块皮，你就提着头来见我！我这辈子心爱的东西就是它，知道不！”

平时，宋学飞省吃俭用。可对马，他什么都舍得，常拿津贴费买鸡蛋和面饼喂马。每天夜里，他几乎都要到马

棚里去看看，上点料，添点水。闲来无事，他就遛马。那马对他也满有感情。他唤一声，马就得得跑来，头朝他怀里蹭。

“赵玉昆来了！”韩庄指着村口说。

一个马队飞快地跑来。赵玉昆翻身下马，嚷着：

“杨司令，我来迟了，恕罪恕罪。”

旁边一个矮胖子帮腔道：

“赵司令去视察部队，刚刚听说杨司令到，就赶来了。”说罢，他一连声催促勤务兵倒茶备饭，指手划脚，忙个不停。

我说：“不用忙了，今天我们还有事，不能久坐。”

这个矮胖子是参谋主任李蛮子。他经常在赵玉昆那里给我们出点难题。早先，他就反对改编“十路军”，说“部队给共产党抓走了”。后来，他又坚持要单独活动，说：

“抗日就是要抗嘛，不让咱们出去怎么行？”

由于赵玉昆与宋学飞面和心不和，司令部里的权就全让这个李蛮子抓去了，支队大印也在他手里，军事操练、日行公文等，他样样都插一手，很得赵玉昆赏识。后来我们才知道，李蛮子原来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安插在“十路军”中的核心人物，他暗中与日伪勾结。

五支队主要领导人都到齐后，我宣布了军区指示：五支队开始军事、政治整训。目前五支队的驻地靠敌占区太近，天天都有敌情。为了使大家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分区

决定把一、三团拉出来，接管五支队防区，五支队则转移到山里去，其中二十五团驻牛岗，二十六团驻桑岗，支队部驻大良岗。

待我说完，大部分人都表示拥护。赵玉昆虽然情绪低落，也还是同意了。他无精打彩地说：

“又换防，又整训，好嘛，咱们执行。”

其实，不管赵玉昆愿意不愿意，整训五支队已是铁板钉钉的事了。开完会，我对赵玉昆说：

“听讲你又娶了个老婆，我们还没给你贺喜哩。今天，能不能请我们上你家看看？”

赵玉昆有些意外，随即又满脸是笑：

“请，请。”

我和高鹏同志跳上马，带上几个警卫员，和赵玉昆一同策马而去。

在路上奔驰了约半个小时，我们来到一个小山窝，这里三面是山，当中一条狭谷，谷中溪水清澈，两边草深林密，顺山谷进去不远，半山坡上有一个小村子。赵玉昆就住在这里。他可真会选地方啊！

走进一座石墙小院，赵玉昆大叫：“杨司令来喽！”

正房里一阵响动，出来个胖女人，嘻嘻笑着向我们施礼。她是赵玉昆的三老婆，不久前娶的。这女人原在易县城戏班子里唱戏，嗓子不错，外号“小老黑”，在周围几县都有些名气。赵玉昆爱听戏，一眼瞧中了她，非娶不可。

娶来后就占住小山村住下了，终日在此作乐。“小老黑”以前挺瘦弱，现在却胖得象一个鼓鼓的面口袋，脸上描眉施粉，妖里妖气。

进房坐下后，我朝偏屋一看，里面有张烟榻，榻上铺着熊皮，红木小桌上放两盘烟具。看得出，赵玉昆和他三老婆都是大烟鬼。

客厅里的陈设也十分奢侈，几张太师椅，都铺着皮垫，沿墙摆着一溜描龙画凤的柜子，一张长案上立着玉壶、金佛和两只银香炉……高鹏同志看得直皱眉头，脸都变色了。倒在这么个安乐窝里，怎么还顾得上抗日呢？！

我忍不住了，说：

“赵司令，部队里可是有反映啊，你这个家，比保安城里的大老财还阔气哩。”

赵玉昆窘迫得说不出话。

那天，我婉转地批评他：身为八路军干部，要艰苦奋斗，注意改造思想。军区聂司令员在反“扫荡”中还和部队一块行军作战呢，你可不能陷在安乐窝里拔不出来呀！

赵玉昆满面不自在，诺诺称是。

我们离开小山庄，赵玉昆送了一程。分手时，他忽然玩了一个花招，对我说：

“杨司令，您看……我想加入共产党。”

我又气又好笑，心想，就凭你现在的样子，能入了党么。我们是想团结你，可是也不能拿党的原则作交易

呀。心这样想，可又不便直说，我便勉励道：

“你这个愿望很好，我回头叫人给你送一本党章来。希望你加强学习，努力争取，能经受住党的考验。”

回到北娄山，我和高鹏、罗元发同志商量了一下，为了加速改造五支队，决定从组织上采取措施，先搬掉五支队中的几个“顽石”，否则，他们总是和我们作对，整训也搞不好。

首先，我们将五支队的参谋主任李蛮子调到分区教导大队，把他和赵玉昆隔开，使他再也不能给赵玉昆出坏主意了。与此同时，我们查了查这个人的根底，发现他原来是国民党派到“十路军”的一个特务。耐人寻味的是：李蛮子调走后不几天，他的喽罗——侦察科孙科长就投敌了。这当然不是巧合。

去了这两个人，赵玉昆等于少了一条膀臂和一只耳朵，变得老实一些了。接着，我们又继续搬掉了几块“顽石”，几天后，五支队便开进山中整训去了。

转眼春节将近，赵玉昆忽然兴致大发，宣称要大请客，庆祝“十路军”编入一分区一周年。

那几天，赵玉昆每见到我，都要说一遍酒席如何丰盛，厨师手艺如何高明，反复邀请我赴宴，都被我婉言谢绝了。

请客的日子到了，早饭后，赵玉昆果然亲自出马，到处请人赴宴。高鹏同志被他硬拽去了，分区机关的科长和几个团的领导同志也被请去了。赵玉昆还不满足，再次来

请我。我说：

“你的心意我领了，酒就不喝了。分区总得留个领导看家嘛。你请的人已经够多的了，代我向五支队的同志表示祝贺吧，告诉大家不要喝醉了，另外，吃饭时间也不要太长，大家都是有工作的。”

中午，通信员告诉我，赵玉昆在大良岗摆了二十多桌酒席，热闹极了。他频频劝酒，大有一醉方休的劲头。

不知为什么，我有些不安，总盼着酒宴快些结束，同志们都安全回到各自岗位上去。

下午三点多钟，我打电话询问，酒席已经平安收场，被请的同志也陆陆续续离开了大良岗。我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高鹏同志回来时，我问他：“怎么样，喝足没有？”

他略有醉意，笑呵呵地回答说：“足啦，明年一年里，我滴酒不沾，好好打它几仗！”

“去了那么多干部，我真有些担心呐。赵玉昆的表现怎样？”

高鹏同志一怔，回想着：“哦……好象有点不正常，情绪不高，酒也喝得不多。”

晚上，我忽然接到宋学飞同志从塘湖镇打来的电话，他气喘吁吁地报告：“赵玉昆要叛变！”

我一惊，连声问：“是吗？你怎么知道的？”

宋学飞父亲刚去世，他回到霍山村为亡父服丧，怎么

会从塘湖打电话来呢？赵玉昆在塘湖吗？没容我细想，宋学飞同志急忙说：

“我现在在三团一营驻地，赵玉昆他们刚刚从我家离开，叛变的事情是他的卫兵偷偷告诉我的。他们现在已经出山了。”

“他带了多少人？”

“只有十几个卫兵。”

啊，整个五支队还是稳定的，我略微放心了。可宋学飞同志又说：“王道邦同志也在里面，他不知道赵玉昆要叛变。”

“这个王道邦啊，真糊涂！”我又气又恼。因为我多次王道邦、韩庄、王建中、张如三等同志讲过：赵玉昆不能过塘湖镇。一过塘湖就是山外，离敌占区不远了，他要去，必须事先向我报告。另外，无论什么时候，不要独自和赵玉昆一块行动。可他呢，就是没听。这不是眼看就要被赵玉昆当作“礼品”送给日军了吗？

我当即命令宋学飞同志：“你立刻去追赵玉昆，设法把王道邦同志安全地带回来。要谨慎，这是个危险的任务，搞不好你也回不来。”

宋学飞同志高声道：“你放心，我立刻去追！”撂下话筒就跑了。

我赶紧又打电话给住在塘湖的三团一营长肖应棠同志，命令他火速带兵去霍山方向，接应王道邦和宋学飞同

志。

接着我又给五支队挂电话，告诉韩庄和王建中同志：赵玉昆叛变了，你们要加强警戒，掌握好部队。

罗元发同志连夜赶往大良岗，我和高鹏同志守在电话机旁等待消息，一夜没合眼。

现在真相大白了，今天赵玉昆摆的盛宴，是一场鸿门宴。他本来打算用那二十多个亲信把赴宴的团以上干部统统扣住，之所以没动手，用高鹏同志的话来说：“很可能是因为没请动你这个司令！”我想有道理，如果赵玉昆在宴席发难，我可以立即调动部队消灭他。另外，大良岗距山外还有几十里地，途中还需穿过一、三团防区，稍有错乱，赵玉昆也休想出山。还有，去赴宴的多是一分区骁将，都带着枪，对赵玉昆并非毫无警惕，一旦交手，赵玉昆和他那伙人也未必能占上风。于是，他只好假戏真唱，把这场酒席变成他的“告别宴会”了！

凌晨，肖应棠同志挂来电话：

“司令员，王道邦政委回来了。”

“宋学飞呢？”

“也接回来了。”

我如释重负：“请王道邦同志听电话。”

王道邦同志急忙叙述了赵玉昆叛逃经过：

……酒席结束，赵玉昆送走客人，忽然向支队的几个领导人提出：“我到辽水走一趟，把便衣游击队接回山里来

整训。”

王道邦和王建中同志都劝他明日再去，他不听，说：

“天还早嘛，马上就走，天黑前可以下到平原。别耽搁了，立刻就走。”说着就通知卫兵备马。

赵玉昆这一手来得很突然，王道邦同志来不及请示我，又想了解赵玉昆到底要干什么，便毅然道：

“我陪司令员走一趟吧！”

于是，赵玉昆带着他的卫士，王道邦同志领着警卫班的几个人，他们一起飞速地朝山外奔去。黄昏时，他们穿过了三团警戒区，到达游击区。

辽水村游击队约四百人，武器也不错，分区命令这支游击队开回山中整训，谁知这也触痛了赵玉昆的心肝。他提出

“游击队进山，得我亲自跑一趟，说说话，免得他们有顾虑。”

到了霍山村，王道邦同志说：“宋学飞丧父，咱们拐进去看看他吧。”

赵玉昆犹疑一下也就同意了。两人进了宋家，向灵牌遗像致哀，然后就在宋家客厅小歇了一会，商量晚间住处。

王道邦同志说：“这儿离三团驻地不远，还是回前哨连过夜吧，安全些。”

赵玉昆说：“不不，咱们连夜赶到游击队那儿去。”

两人相持不下，宋学飞见政委和司令谈不拢了，顿时对赵玉昆起了疑心，婉言劝他俩就在自己家中过一夜，不

要分开行动。

赵玉昆坚持要走，说：“政委不去就算了，我一个人走！”

赵玉昆的企图越来越明显了，王道邦同志愈发不肯放他一个人走，便答应和他一块动身，两人又上马东行。

宋学飞见事情不妙，觑个空子，拽住赵玉昆的一个卫兵——这人是宋学飞的同乡，问他：“司令究竟想干什么？”

这个卫兵支吾了一阵，悄声透露出赵玉昆的叛变企图。宋学飞便跳上马，飞奔到三团一营驻地向我报告。

王道邦同志和赵玉昆来到游击队的驻地辽水村，天已黑透了。赵玉昆的心腹邱赫庭把他俩迎进队部。这个邱赫庭是游击队的领导人之一，他早就通过涞水县一个姓纪的大地主和易县日伪挂上钩了。进屋后，赵玉昆连坐也不坐，对王道邦同志说：

“你歇一会，我去看看部队。”便和邱赫庭一同出了队部。

王道邦同志等了一会，不见赵玉昆露面，四下一看，队部已让人把住了。他佯装上厕所，踱到门外，爬上墙头一看，嗨，村外的一块空地上聚满了人，赵玉昆正在那里宣布叛变计划。

情况紧急，王道邦同志召集同行的警卫班战士，一起翻过院墙，跳上马，冲出村庄。

刚出村，正逢一匹快马赶来。原来是宋学飞派来报信的人。

这时，赵玉昆率人追来了，看那样，是想抓个八路军政委投敌报功哩。

天黑路窄，风狂马疾。王道邦等同志趁夜暗一气冲出十几里，到达霍山村时，正好遇见宋学飞在村头接应，于是他们合成一路，朝根据地急奔。前面，肖应棠同志率接应部队迎面赶来，痛击追兵。打了一阵，赵玉昆怕偷鸡不成蚀把米，便匆匆退回辽水村，率其队伍连夜奔向敌据点易县城。

游击队大队长张琴南，是个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赵玉昆命令他断后，他不露声色地应承了。过中易水时，张琴南同志在西岸，等赵玉昆和心腹过了河，他突然拔出驳壳枪大呼：

“同志们，赵玉昆是叛徒，要投降鬼子当汉奸。不能跟他走。快，咱们回根据地去！”

一呼百应，许多在河畔犹豫的人也退回来了。赵玉昆和他那几个心腹在河东，既不能阻拦也不敢攻击。张琴南同志便带着一百多人回到了分区根据地。后来，新组建了定（兴）、易（县）、涞（水）游击支队，他担任了支队长，专门对付赵玉昆。

赵玉昆领着二百来人到达易县城，日军委他个“易县警备团长兼特务部长”。这个叛徒由于熟悉我们内部情况，第二天就率特务突袭邻近几个县的县、区政府，抓去了不少工作人员。特别是定兴县委，先后被他破坏两次，许多

领导同志都牺牲了，县委于书记也被他活埋了。

赵玉昆的叛变，对五支队震动不小。很多人感到突然，不好理解。因为他过去满口革命辞藻，大施小恩小惠，笼络了一些人。为此，我们集中力量，对五支队进行整顿教育，我亲自召开了两次军人大会，剥去了赵玉昆的“抗日”伪装，集中批判了他搞个人天下，当山大王的反动本性，指出：他跑过了今日，跑不过明日，叛变投敌者只能是死路一条。

在整顿中，只要与赵玉昆划清界限的人，一律予以信任。赵玉昆的堂叔赵振声，仍然担任二十六团副团长。这样一来，军心稳定，士气大振，跑掉个赵玉昆，反而除去了心腹隐患，工作正常了，上上下下，焕发出一股团结上进的新气象。从每日操练的情况看，五支队越来越象一支主力部队了。

宋学飞同志已经改任二十五团团长，见部队一天天进步，高兴极了，几次同我说：

“共产党有气魄、有办法，我还以为五支队会乱一阵呐，想不到一天强过一天。”

五支队通过几个月的紧张整训，成绩很大，特别是指挥员的军事、政治素质有了明显增强。

一九四〇年七月，军区决定撤消支队番号，由一分区直接率领各团。二十五、二十六两个团，投入了震动全国的“百团大战”。

血战大龙华

一九三九年一开春，日本侵略者华北方面军就对晋察冀根据地展开了“第一期肃正作战”，强调要“肃清占领区和附近地区八路军，确保治安，为分散部署兵力打下基础……”调集了一一〇师团、二十六师团、第一军及四五个独立旅团，对太行山脉、平西、冀中进行大规模的“扫荡”。

我们一分区兵力较多。敌酋曾把晋察冀军区的三分区称作“政治区”，四分区称作“经济区”，二分区称作“无人区”，把一分区称之为“军事区”，很注意对一分区用兵。

春末，我们一分区的主力部队正在北娄山一带整训。大力贯彻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学习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使指战员初步树立了持久战的战略观点，肃清了亡国论，批判了速胜论。在中层以上的干部中，普遍学习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干部战士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提高。

在整训快要结束时，我们忽然得到情报：易县敌一股，五百多人，炮三门，于四月十七日出城沿涞（源）易（县）路西进梁各庄。

由于梁格庄是易（县）、涞（源）两路敌人的一个重要支撑点，我便产生了警惕：敌人在东、西庄战斗败归巢

穴后，并无大的动静，此次孤军出动用意何在？是去增援梁各庄守敌？还是想继续西进透我主力出击，然后会合涞源之敌合围我主力？敌情不甚明了，我们便按兵不动，继续执行整训计划，只派出少量便衣，密切监视这股敌人的动向，同时通知易县的情报站迅速查明他们的企图。

五月七日，进抵梁各庄的日军又西进占领大龙华镇，然后不再前进。第三天，他们反而退回梁各庄一百多人。

继续监视中，我们发现敌人在大龙华镇立起了铁丝网，在西、北两面高地上设置阵地哨，抓夫派料修筑碉堡，并派兵监护民工往西铺筑汽车道。种种迹象表明：敌人不走了，要在大龙华安下据点，然后西进。同时，涞源城之敌也不断东出活动，与大龙华的敌人遥相呼应，互援互进。

见此情景，我们不禁为之一震。原来，敌人是想打通涞易路啊！

涞源到易县这条汽车路，全长二百多里，蜿蜒在崇山峻岭之中，从西到东，横穿我一分区。一年多来，我们多次破路、伏击，它已基本瘫痪，敌人重要的运输队根本不敢通过。

但是，涞源和易县的敌人时刻都想打通它，因为它对敌人来说太重要了。敌人可以通过它运送兵员、物资，进攻晋察冀军区腹地，深入太行山，直至阜平。从我们一分区的角度来看，一旦敌人打通了涞易路，就等于拦腰砍了我们一刀，把我们根据地的南部与北部分割开了。

现在，敌人已占大龙华，下一步必然沿涞易路西进，占领紫荆关、王安镇、浮图峪等关隘，贯通一气，由点连成线，再由线扩展为面，压迫我们，使我们退缩或不得不跃出与敌主力决战。在他们看来，涞易路如同手中的一柄剑，挥起它来则可腰斩我们。

然而，在我们看来，涞易路如同敌人的大动脉，我们正可以紧紧揪住它，破袭它，使之损兵折将，血染山野。

在北娄山司令部，我们连夜商议应敌计划。

“打嘛。出来了就打掉它。否则，敌人在涞易路上修起碉堡，安上据点，连成一气，就不好打了。”副司令员高鹏摩拳擦掌地说，“敌人不多，我们整训已近三个月了，部队静久思动。一旦出击，准保如同猛虎下山。再说，整训的成果如何，正可以通过这一仗检验一下。”

政治部主任罗元发沉重地说：“鬼子一来，路两侧的村庄被祸害得不浅啊。上千人的小盘石村，被烧得一干二净，就剩下一个小戏台子，那还是由于敌人的指挥官站在那里指挥烧杀，才留下的。要是敌人打通涞易路，成天兵马不断，沿途村舍的百姓就别想安生了。”

看来，非打不可，这个决心不能变！可关键是怎么个打法？

我当时主要考虑：大龙华敌人虽不多，但武器精良，特别是周围的易县、梁各庄、涞源、满城、姚村、解村等地的敌人都可能一拥而至，因此提出：打大龙华，就得准

备打援，要想打援成功，首先要切实弄清各地敌军的驻防情况。

“我去田岗方面侦察。”黄寿发参谋长同意我的看法，表示说。

数日后，黄寿发同志带回来一些情况。随后，我又带数人深入到敌各据点之间侦察敌情，勘察战场。

局势渐渐明确了：

进入大龙华的是敌桑木师团小林联队，约三百多人，有两门炮，三挺重机枪，十挺轻机枪，还抓了一百五十个民夫。梁各庄有敌内海大队三百多人，伪军一百三十多人，六门炮，轻重机枪近二十挺，每日都有汽车来往于梁各庄和大龙华。易县城敌军不足一百。一旦大龙华告急，这几处敌人是必定要增援的，但即使如此，也不敢倾巢出动。至于姚村、解村之敌，我们可另派部队牵制，使其无法增援。满城敌人虽多，但离得较远，加上受我军的牵制，若来增援，二十四小时之内也难赶到。

由此可见，大龙华战斗一旦打响，敌人能投入战斗的最多不过八百人左右。而我们准备用一团和三团一部以及师直骑兵营、特务营、两个游击支队一同投入战斗，总兵力达三千多人，以绝对优势歼灭敌人。

从易县到涞源之间的地形，我都非常熟悉，不看地图也知道，梁各庄到大龙华之间是一条二三里宽，数十里长的大谷，北部山丘浑圆低缓，村庄较为密集，部队可以隐

蔽运动；南部排列着华盖山、花果山、金坡山，这三座高山屏障似地立在敌人必经之路一侧，完全可以设伏。这样，我们轻而易举地就能从南北两面形成包围圈，敌人的援兵不出则罢，出了就莫想回去！

我们登上金坡南山，从这里看大龙华，房舍、河流已经清晰可见了。忽然，大龙华西面金坡村传来急骤枪声。我知道，这是曾雍雅、梁正中支队在游击敌人。接着，大龙华敌人开炮了，哐……哐……哐……炮声稀疏，也不见敌人出动。

我一阵高兴：自从敌人占领大龙华后，曾支队就不断游击敌人，敌人开始被他们搞得很惊慌很疲劳，后来发现他们力量单薄也就放松了防范，有时即使遇到袭扰也只是放上两炮，依旧督促被抓来的民夫在山中抢修公路。这一情况对我们下一步运兵确实有利。

我们越过金坡山，悄悄登上花果山的南坡，这里除嶙峋巨石之外，很难见到花果，朝北一望，数里外，隔着涞易路，就是清朝皇陵之一——西陵。望远镜中，可以清楚地从百年松柏的枝头上，望见金色的琉璃瓦，绿色的飞檐、吻兽和白色的石像生。

西陵始建于一七二九年，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个皇帝及成群的皇后、王公、公主、妃子。在广阔的永灵山陵区内，立有宫殿一千多间，石雕一百多座。

清清栅河水从陵前流过，河上架着七孔石拱桥，后面

是高昂的牌坊。西陵四十八村住着许多清代旗人后裔，世代吃朝廷俸禄，以护陵为生，生活颇为富足。

辛亥革命后，他们的境遇江河日下，至“七·七”事变”时，多数人已穷困潦倒。他们由于长年脱离生产劳动，失去朝廷俸禄之后，简直不知拿什么去填饱肚子了。

于是，男的或当兵，或上山偷伐树木卖给烧窑的，赚几个钱来糊口。青年女子或被卖进张家口妓院，或嫁给外地农民为妻。许多村子居然没有人烟，被蒿草埋没。有的村子住着一些人，勉强学着种地，但没有一挂车，没有一头牛，孩子光着屁股没穿的，连叫化子都不如。

西陵无人护卫，匪偷兵劫，殿内许多珍奇古宝失散了。

永灵山周围数百里，从梁各庄直到紫荆关，原来全是大松林，虎、豹、熊、鹿经常出没，山关隘口，更是古木参天，可是如今禽兽飞尽走绝，浩荡林海成了座座土丘。

直到八路军北上抗战，开到这里，建立民主政权，领导他们发展生产，这里人们的生活才有所改善，以致许多人报名参加八路军，后来成了党的干部。

日军占领华北后，伪满洲国溥仪为保护祖坟，在这里派驻了一支“西陵守备队”，有四个连，驻泰陵附近。大队长溥安，是溥仪的叔伯兄弟。此人和我们暗中达成一条协议：只要八路军不动西陵，守备队绝不妨碍八路军的抗日活动。

可是日军胁迫他们进攻我们，我们有时也不得不还击，

但我们遵照聂司令员的多次指示，西陵的一草一木，一柱一石，都要善加保护，将来把它们完好地交给后代，便严令分区各部队，战斗中要尽量避开陵区，不准朝陵内建筑物打炮、扔手榴弹。

这一命令被很好地执行了。即使在同日军作战中，我们通常也不在西陵境内进行，而这次打援，将在西陵边缘进行。为此，在布置战斗时，我们一再强调要保护西陵，力争在公路两侧消灭敌人，不让溃兵窜入西陵。

回到田岗村。我心中很不平静，即将发生的战斗使我想到，大龙华与大红门距离太近，相距不到十五里，敌人两面炮火可以衔接。战斗一打响，敌人势必迅速出自大红门，凭借炮火掩护，向大龙华急进。我们攻城、打援的部队都将在敌炮火下战斗，甚为不利。怎么办呢？只有依据有利地形和优势兵力，尽快解决战斗，才能减少伤亡。

侦察参谋快步赶来，身后跟着一位放羊装束的男子。参谋说：

“他主动找来的，要提供大龙华的敌人活动情况。”

我请他坐下，问：

“你叫什么名字？”

“张宝贵，支部书记叫我来的。”张宝贵同志憨厚地笑了，“杨师长，我认得你。听支书说，你们要打大龙华，我们都欢喜。”

“你是哪个村的？”

“就是大龙华的。”

“是党员吗？”

“是。我还是游击小组的。”

“你知道敌人住的地方吗？”

“嗨！就住我家里。别处也有，东南西北我都清楚，带你们去看看好不？你们认准了才好打哇！”

我大喜，握住他手道：

“感谢你，仗还没打，你就先立下一功。”

张宝贵同志呵呵笑：“不说这了。只要你们用得上我，我什么都敢干。”

当即，我派人把张宝贵同志送到一团，他带着我们进攻部队的干部潜行到大龙华南面，指点着告诉我们：敌人驻在九幢大房子里。哪里有炮，哪里有电台，指挥部在哪个小楼里，哪里放了岗，哪里有暗哨，他指着不远处一座灰屋说：

“那就是我家，住了十一个鬼子，你们可劲打，房子打倒了我再盖新的！”

当时，大龙华的碉楼还只盖起小半截子，敌人都住着民房，比较分散，有利于我们集中兵力一股一股地将其歼灭。若是等敌人把碉楼盖起来，再攻打就比较困难了。

根据张宝贵同志提供的情报，我们制定了周密的进攻计划。此后，张宝贵同志又一日数次只身进入镇内，探清每一座住房里的日军人数，及时地向我们报告。

傍晚，我问他：“打起来时，你敢给我们带路吗？”

张宝贵同志昂首正色答道：“敢，打鬼子嘛，死了就死了，怕个甚！我和你们一块上。”

他不但一口应承了，还连夜动员了六位乡亲给我们当向导。

十八日，我向聂司令员报告了我们的决心和战斗部署，聂司令员复电同意。

十九日傍晚，四路兵马按照预定计划，饱餐一顿后，借着渐渐昏暗的天色，从驻地出发了。

林必元同志率一营，经金坡村迁回到大龙华东与西南，准备从两面同时攻打大龙华，我们对他们的要求是务必勇猛、迅速地歼灭敌人。

一团主力及曾雍雅、梁正中支队两个大队，由王道邦、熊招来同志指挥，随一营跟进到金坡村后，即分道扬镳，直奔大龙华东北方的老虎岭地区，占据有利地形，待击由梁各庄赶来的敌人援兵。

三团的三营及分区特务营、骑兵营、炮兵连、轻机枪队、工兵连，曾雍雅、梁正中支队主力，统由师部直接指挥，分头出动，插到大龙华东面十多里外，在涞（源）易（县）路南面的南、北石楼山隐蔽集结，配合一团主力歼灭西进敌援。

五支队分兵奔往易县方向，游击姚村、解村据点，制止据点内守敌出动。五支队二团伏兵梁各庄南面山岭里，

放过驰援大龙华的敌人，待西面我主力伏击援敌时，在后路配合作战，并向东侦察、警戒。

我们的指挥所设在西大地南山，那里一眼就可望见大龙华、大红门、西陵和梁各庄，可用电话、号音和信号弹同各部队保持密切联系。

我们总的意图是：一路攻点，三路打援。保证全歼大龙华守敌，同时争取聚歼敌之援兵。

深夜，攻打大龙华的二营副营长邓南风同志率领第七连在那七位乡亲带领下，秘密绕过三道铁丝网，直奔敌人住的九座大房子。这时，敌人已被曾雍雅、梁正中支队连续半月的袭扰搞得困倦不堪，正在死睡。四周的阵地哨也十分麻痹，待察觉到我们的部队冲进村时，想阻拦也来不及了。战士们的枪口对准他们的胸脯，一阵急射，打翻了数人。房内敌人听到枪响，顾不得穿衣服，光着脊梁扑到机枪上朝我们射击。战士们纷纷投出手榴弹，随着那“哇！哇！哇！”的爆炸声冲进房内，与敌人拼杀。

经过三小时的激战，九个大房子被我们攻破三个，敌人死伤五十多名。我们缴获机枪一挺，步枪三十多支。可是，剩下的敌人仍在拼命抵抗，火力凶猛异常。

此时天已大亮，二营副营长便留下一部分人与敌对峙，其余的撤出村外休息。

邓南风同志一点人数，七连竟无一阵亡，仅五人轻伤。干部、战士全都笑了，这场夜战打得着实漂亮。大家一边

喝水、吃干粮，一边注视着村内敌人动静，那个劲头是，再一打，非把残敌消灭不可！

日上三竿，骄阳似火，脚下大地开始发热了。我们不再射击，敌人也不发一弹，村内外一片寂静。

战士休整过后，提起枪，沿着沟坎，矮墙，土台，又悄悄地进入了村庄。

突然，大红门传来密集的枪声，我朝东望了几眼，知道那是我们打援部队和敌人接上火了，转而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大龙华来。

大龙华的敌人正焦急地等着增援，一听到东面枪响，象挨了一针强心剂似的，猛然蜂起，纷纷端枪蹿出大房子，由一个身着衬衣手持指挥刀、哇哇狂叫的佐官率领，数挺机枪边打边冲，直向东面奔去，妄图与援兵会合。

“不能让敌人跑掉！”我下令冲击，战士们猛然从隐蔽物后面跳出来，扑了上去。没想到，早已死寂了的大房子墙上的枪眼，突然又喷出火舌，几个战士猝不及防，当即倒下。原来，敌人分成两股，一股向东拼命突围，一股留下拼命掩护。

于是，我们将攻击部队也一分为二，一部分围住大龙华守敌，一部分追歼东逃的敌人。

向东突围的人多势众，显然是敌人的主力，他们在我们枪林弹雨之中纷纷毙命，剩下一百三四十人依然不顾死活地狂奔，沿着洮易路往东窜到小龙华附近。这时，埋伏

在路北的二营战士随着枪声、手榴弹爆炸声跳出来，堵住了敌人，会同一营战士，把这股敌人包围在一片稀稀拉拉的树林之中。不容敌人喘息，一营和二营接连不断地冲击，结果不到两小时，敌人又死伤大半。

这时，剩下的敌人又分成两股逃窜。

一股继续向东，妄图与东面援兵会合。可没逃出多远，就被我分区特务营和曾雍雅、梁正中支队歼灭了。

另一股往回窜，却被战士们咬住，一直跟到大龙华。随后，一营和二营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把大龙华团团包围起来，从不同方向开始攻击。战士们冲进村时，喊着刚在整训中学会的日语口号：

“日本兄弟，放下枪，别为军阀卖命！”

“停止抵抗，优待你们！”

“顽抗者死路一条！”

“你们父母姐妹在盼你们生还。”

.....

大龙华里的残敌，在主力突围后，一直死守待援，如今援兵久久不至，突出去的主力又折回来了，而且只剩下几十个人，他们便绝望了。一个年轻的敌军士兵听到我们战士喊日语口号，便把枪一丢，坐在地上嚎啕大哭。一人放声，众敌垂泪。战士们冲进大房时，再未遇一弹，却只见十几个敌人东倒西歪、满面泥尘和泪水，痛哭不止，叫也叫不应，拖也拖不动。

在东面，昨天夜间，易县和梁各庄守敌就接到大龙华敌人告急的电报，因天黑，他们不敢出动，只嘱其固守待援。

上午八时，梁各庄开出来五辆装甲车，车上枪管四伸，边爬边朝两侧山头射击，向大龙华搜索前进。

一望可知，这是敌援的先头部队，大队人马即将出动。大家兴奋极了，西面敌人正在挨打，东面敌人又来送死，今天的胜利肯定不小！

谁知，五支队人员隐蔽不好，阵地太突出，被敌人发现了。敌人随即下车向五支队进攻。

进攻虽被击退，但我们全歼敌人援兵的意图已经暴露，敌人不肯轻率钻进我们伏击圈了。

这时，敌人的第二梯队携带着山炮从梁各庄出动了。他们向五支队据守的山头猛烈轰击，并频频发起冲锋。我们分区骑兵团配合着五支队将他们击退了。

接着，敌人主力四百多人和骑兵一百多人，从梁各庄、易县一齐出动，朝狭小的三营阵地连续发射了五百多发炮弹，打得山头碎石满天，灰烟蔽目。战士们卧在地上，抬不起头来，但是没有一个人乱动。这实在令人紧张又高兴，过去，我们不少新战士就怕敌人的炮，炮一响心就慌，现在锻炼出胆量了！

看来全歼敌人的计划不可能实现了，我即令一团火速迂回大红门，从敌人背后出击。同时，三团三营、骑兵团、

特务营从侧翼进攻。敌人腹背挨打，顿时大乱，溃散成数路朝梁各庄仓惶逃窜，公路两侧丢下一百多具尸体和大量的枪支、弹药。我们打援的战斗也就这样结束了。

枪声刚刚消失，我便催促部队打扫战场，因为时间拖久了，敌人会派飞机来轰炸，或者纠集更多的兵力来报复。

在荒野里，战士们发现在一尊九二式步兵炮旁边，躺着几个只穿着短裤的敌尸，大概是因为天热，敌人为了打炮，脱去了军装。令人高兴的是，山炮完好无损，还有十几箱炮弹哩。一团副团长熊招来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时，我高兴地连声说：

“拉回来，不惜一切代价拉回来。”

出师以来，国民党反动派一枪一弹也没给我们补充过，我们只有几门小口径迫击炮，算是重火器了，可照样打胜仗。如今有了这门山炮，我们以后打碉堡、炮楼就更不愁了。

在小树林内，敌人死尸压着死尸，我们一个班长带一个新战士把他们一个个拖开埋葬。突然，一个年近三十，长着络腮胡子、膀大腰圆的日军士官从敌尸下爬出来，嚎叫着朝那新战士扑去。班长眼疾手快，忙迎上前去，和敌人搏斗起来。双方的枪都被打掉了，两人互相掐着对方脖子，都恨不得一下子掐死对方。敌人力大，把我们班长压在底下，眼看就要得势，班长急叫：

“开枪！快开枪！”

战士急了，上前就是一枪，敌人背上当即溅出一股血花，谁知，班长也不动弹了。他的两手还紧紧掐着敌人脖子。

战士掰开敌人，摇着班长肩膀伤心痛哭，周围人闻声赶来，不禁悲恸地叹息着。

后来我听讲，这个战士因为作战十分勇猛，很快也当上了班长，不幸在黄土岭战斗拼刺中牺牲。

战利品满山遍野，有的竟飞上枝叉、墙头。如敌人的钢盔，就被我们手榴弹炸飞，挂到树上去了。摘下一看，外面蒙一层深绿色薄丝棉，我们起初不解，后来从敌人文件中查到：“战伤大都在头部，钢盔反射日光，赤军枪法准确。须采用丝棉蒙遮钢盔套……”这才明白，原来敌人被我们打怕了，及时总结经验才把钢盔做成这个样子的哩！这层套子质地很好，我们的战士把它拆下来，用来做袜子、手套。

大龙华战斗，缴获敌人山炮、九二式步兵炮、迫击炮五门，轻、重机枪六挺，长、短枪百多支，子弹五万多发，各种机械、土木器具六百多件，还有大批毛毯、大衣、手套、指挥刀以及堆积如山的粮、油、饼干和方块糖等等。大龙华的区长赵鹏飞连夜动员了一百多匹骡马和上千名群众，才把这些战利品统统运走。

这时，我听说，给我们攻击部队当向导的张宝贵等七

位同志在战斗中非常勇敢和机智，他们有的拿着捡来的枪朝敌人开火，有的拾起地上冒烟的手榴弹朝敌人火力点扔。其中有个同志抱起一块大砖把敌人一个士官砸死了，另一个同志扯住一个死不投降的敌人的两腿猛跑把他活活拖死了，还有一个同志居然缴到两挺机枪。不幸的是，他们之间牺牲一人，负伤三人。打扫战场时，他们默默地抬走了那位乡亲的遗体，谁都没有一句怨言。

我特意去看望他们时，那位烈士的弟弟流着泪说：

“我哥虽不是八路，可他是为消灭日本鬼子死的，死得光荣！”

他的话感动了我，我不知该怎样感谢这些普通而伟大的乡亲们。后来，我写了篇文章《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登在晋察冀边区刊物《新长城》上，专谈这七位同志的事迹。我深深感受到：在任何一个战场上，群众和我们不仅心连在一起，而且血也是流在一起的。没有他们的支持，也就没有我们的胜利。

俘虏押来了，一共十一个，个个狼狈不堪，在周围群众怒目逼视下连头也不敢抬。过去由于日军拼命向士兵灌输武士道精神，有的“宁死不降”，受伤后被我们抓获，他还从担架上滚下来，脑袋朝石头上碰，就这么碰死了。有的在我们医护人员给他包裹伤口时，竟扑过来乱抓乱咬。但是在我们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面前，顽抗到底的敌人

越来越少，武士道精神也渐渐不顶用了。有些士兵甚至暗地里给我们送三八大盖枪。

我瞅着那群俘虏，问我们的同志：

“不是一共十七个俘虏吗，还有的在哪里？”

身旁的人报告说：

“被群众用锄头劈死了！”

怎么回事？

原来，这半个月，大龙华的敌人在村内无恶不作，光是敌酋的那条狼狗，就先后咬死两个小孩，群众见到俘虏说什么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趁我们的同志不注意，一涌而上，当即打死了六个。

这时，我瞅见俘虏中，有几个人看那模样也就十六七岁，不禁有些奇怪，过去战斗中，我们击毙的敌人多是二十五六岁的老兵，如今怎么变了？

我简单地问了问那几个年轻的日军俘虏。原来，他们中学刚毕业就应征入伍了，只经草草训练便送上中国战场。而且他们有的人的父亲和哥哥早已被派往其它战场，死活不知。说着，几个敌兵哭了起来。

我心想，日本军阀发动的这场战争，不仅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难以言传的痛苦。现在战争刚进行两年，日本已经显出国力不支的先兆了。再打几年，他们必定彻底失败，这是毫无疑问的。

走在后面的是一个黑瘦的高个子，到了我面前，他忽

然站住，弯腰鞠了个九十度的躬：

“杨太君！”

我问站在我身边的敌工科长刘原亮同志：

“这是谁？”

刘原亮同志说：

“他是敌人的翻译官，朝鲜人，叫金范俊。”

金翻译站得笔直，跟着说：

“是的是的，我是朝鲜人。我的祖国沦陷了，我是被迫到中国战场上来的。”

我说：“日本侵略者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你应该和我们站在一起，反对他们。”

金翻译被带走了，我问刘原亮同志：

“你看，能不能把这个人争取过来，留在分区当翻译？”

刘原亮同志兴致勃勃地说：

“可以试试。分区的翻译太少了，我也缺敌工人才。”

过了一会，一团派人送来两个大铁箱，里面是几十册装订好的文件。来说：这些文件是在敌人指挥部发现的，他们逃跑时没来得及烧掉。随同文件一块被抓获的，还有日军西陵警备队长兼易县指挥官穴田。

“快，把穴田带来……等等，把金翻译也带来。”

在师指挥所，我通过金翻译，审问了穴田。他一看到桌上那些文件，身体都软了，半天不吭声。最后供认：这些文件记述的是日本军政府的对华侵略、政治目标，各师团战区的任务，有日本侵略者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颁发的《关于剿匪与警备的指针》、《使用特种器材（毒气）之参考》和我晋察冀根据地的《一九三九年一、二、三期肃正作战概要》，包括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侵略我国的指导条款，还有情报工作、伪政权的建设与利用以及日军一一〇师团司令部颁发的《对山区方面匪团封锁计划》，等等。

穴田还叹道：“我们原以为你们打不下大龙华，才把这些文件放在这里了。这样的仗，你们一年只要打三四次，日本就会垮台。”

大龙华战斗中，我们共歼灭敌人四百多，这是抗战以来我们分区消灭敌人最多的一次战斗，胜利可谓不小。但是此刻，我忽然明白了，大龙华战斗最重要的胜利，不是别的，而是缴获了这批文件！

我立即派专人将这批文件连夜送往军区。过了几天，聂司令员收到这批文件后，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

“你们缴获的这批文件，比缴获敌人几百支枪、几十门炮的胜利还大。他们大量核心机密都被我们掌握了。我已经写了报告，随文件一起上送延安，供党中央参考。”

后来，聂司令员说，毛主席看到了这些文件，觉得它

对于研究敌人，很有参考价值，中央制定的对敌作战的一些方针、原则，有的就是据此而定的。

经过教育，金翻译官也成了我们的同志，当上了敌工科干事，大家都亲切地唤他“老金”，跟他学战场上用的日语喊话，我也跟他学会了不少，这些都在后来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大龙华战斗中的其他俘虏，被我们送往军区，接受反战教育。一个月后，军区依据他们的愿望分两批遣归敌营。

一批由群众领着送到易县塘湖镇据点，并将军区介绍信交栗屋大队长。栗屋读后狐疑不解：八路军怎么会宽大日本人呢？他亲自与放归的士兵谈话，士兵争着向他述说八路军以友相待的情况。据点内士兵闻讯纷纷赶来，见“阵亡”一月余的弟兄竟然活着回来了，身上穿得又干净又整齐，还比以前胖了，顿时大哗，受到了不小震动。可是，放归的士兵当晚即被禁闭起来，以后就下落不明了。塘湖镇的敌人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士兵低落，同我们打仗战斗力也明显不如以前了。有些人甚至不战而降，举着枪喊：

“宽待！宽待！我的明白。”

另一批俘虏被送到大王店据点，同样受到日军中队长的审讯和士兵们的探询。那个中队长怕军心动摇，立即把他们送往保定桑木师团部。当天夜里，他们在保定郊外被宪兵队枪杀。大王店士兵得知此事，悲愤交织，半月不能

出动。其中一个特务长独自一人到镇外酒店寻酒泄愤，拍着桌子大呼：

“赤军不杀战俘，给饭吃，还给烟抽，我佩服他们！桑木杀自己士兵，要失败的！”

是啊，非正义战争注定要失败，从事非正义战争的军队也注定会崩溃。大龙华战斗在政治上、军事上、心理上，都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使他们预感到灭亡的命运。

“名将之花” 命丧太行山

秋凉了。

山野的颜色在变，山顶上的草木先黄，渐渐蔓延到山坡山脚，最后整座山都染上秋色，显得暗淡了，宁静了。在夏天被草木覆盖住的峭岩怪石，也从枯枝衰草中显露出来。枫树——这一丛那一丛，仿佛举起了火把，满树红彤彤的，充满着生命力，在萧瑟的山野中傲然挺立，格外招人喜爱。

我策马穿越山野，朝阜平奔去，参加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

阜平过去是个不起眼的小山城，坐落在太行山的怀抱里。有言道：平山不平，阜平不富。整个阜平城，就只东西两条石板街，不到一刻钟就走遍了。

军区成立后，军区的指挥机关随即由五台迁到阜平，这里变成晋察冀边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小城才渐有生气。我来时，阜平已和从前判若两地了。循小街走去，只见各街口行人熙攘，集市上喧声鼎沸，马路两旁，到处悬挂各机关、抗日团体、政府各部的门牌标志，墙上贴着各色抗日标语、动员令、海报、通告，沙河两岸隐隐显露出部队的营地。这一切，多象昔日江西苏区啊。

十月三十日，北方分局组织工作会议在青山村一座天主教堂里召开。各地委书记，各分区司令员或政委都到会了。会后，军区还要隆重举行“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不料就在当天晚上，我接到了分区司令部的敌情报告：

坐镇张家口的伪“蒙疆驻屯军”司令兼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派辻村宪吉大佐率日军第一大队和伪军共一千多人已进驻涞源城。据侦悉，敌人拟分三路向分区根据地“扫荡”：

西路经北石佛驰往灰堡；

西南路出涞源城经插箭岭奔走马驿；

东路由辻村宪吉大佐亲率一个大队和一个炮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共六百多名日军，有经白石口、鼻子岭向我组站地区“扫荡”的迹象……

挥兵北上，直逼阿部中将老巢张家口；在敌人方面，则把张家口至涞源一线的据点视为插入我晋察冀军区的一把尖刀，企图用这把尖刀割裂我平西、察南、雁北根据地，阻我向察南、雁北活动，巩固其伪“蒙疆国”占领区。因此，敌人在涞源多置高垒、深沟，经常驻守重兵，并以此为营地，不断向我根据地“扫荡”。引起这次“扫荡”，和前两个月我们分区的二团一部和特务营配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在涞源、明堡以北的石门峪和井子会之间打了敌人一个伏击有关。因为这一仗一打中断了敌人在该处的交通线，他们不敢走峪中的公路，只能从山梁上走，相当恼火。无疑，敌人这次“扫荡”又是报复。

早在九月底，敌人就先从晋察冀根据地的南线，开始了冬季大“扫荡”。八百多名日军进犯四分区的陈庄地区，被八路军一二〇师和四分区的部队歼灭。

南线失败后，敌人就把攻击重点转移到北线——即我们一分区这面来了。

首先，敌人从九宫口经摩天岭、曹庄子、上庄、中庄，动工修筑一条汽车路。这条路与涞源公路干线衔接，可以把大量兵员及武器装备调运到前线来，增强敌人的机动性。一旦汽车路筑完，他们在北线的冬季“扫荡”即可全面开始。

我们当然不能让敌人得逞，便立刻组织了“北进支队”，由分区参谋长黄寿发同志率领，专门打击掩护筑路的

敌人。十月十九日，“北进支队”夜袭摩天岭，消灭了一百多名日伪军，把摩天岭公路支路彻底摧毁了。

随后，敌人调动更加频繁，涞源公路线上的军车几乎昼夜不断，大量武器装备运到各个据点。敌人还四出掠夺，抓了一千多名民夫和近两千匹骡马。

我记下敌人三路出动的情报，立刻去向聂司令员汇报。

聂司令员把马灯拧亮了一些，注视着桌上的地图，仔细地听着我的汇报，问：

“情报可靠吧？”

我答道：

“涞源情报站的站长，是分区崔喜峰参谋，他们送出的情报，是根据涞源伪维持会和宪兵队的我内线情报员的报告，然后又汇集了五回岭情报站的情报，经过与各地情报人员的核实、分析，再报到分区司令部来的。一向都是比较及时、准确的。”

涞源是我们北上抗日最先解放的一个县城。那里有坚强的党组织和隐蔽的情报网。县城虽被敌人占领，但四周乡村仍在我们的控制之中。那里的敌人一举一动，我们情报人员全部掌握在手中。五回岭情报站站长叫崔明贵，个子不高，成天乐乐呵呵，心计极多。他原是东北一个流亡学生，参加八路军后，爱上了情报工作，涞源、易县城里的千头万绪，他几乎了如指掌。经他手出来的情报，对于我们歼灭敌人常起到很大作用，同志们都戏称他是给敌人

送终的“催命鬼。”

聂司令员点点头，他显然知道这些无名英雄。

我建议道：“司令员，让我们打一仗吧？”

“敌人有三路，你打哪一路？”

“打东路！”

这一带地形我熟悉。从涞源到银坊全是深山大谷，出涞源城，过白石口，再往南到雁宿崖、银坊，其间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两面是大山乱石，不难找到伏击地域。虽然这路是敌人的主力，可是由于大山阻隔，另外两路敌人难以策应，敌主力便成了孤军一支。而我们分区主力团队多数远在管头以东，打其它两路，部队运动起来困难大些，打东路就方便多了。

聂司令员说：“我同意你的意见，打！你去请彭真、贺龙和关向应同志来，我们再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一二〇师刚从冀中地区返回冀西地区，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是应聂司令员、彭真书记的邀请，到阜平参加军区成立两周年庆祝活动的。

我立刻请来彭真书记和贺龙、关向应两位首长，向他们汇报了敌情与我们的作战设想。

贺师长听完后高声地说：

“送上门来的，打嘛！打一个胜仗，庆祝军区成立两周年！”

我们都笑了。

彭真书记和关政委也同意打。

聂司令员当即命令我：“会议你不要参加了，立刻赶回分区组织指挥这个战斗。”

十一月一日凌晨，我和两个警卫员骑马离开阜平，回分区司令部驻地管头村。

途中，我特意绕经银坊镇、雁宿崖、三岔口、白石口、插箭岭、黄土岭，再次详细察看每一处的地形地貌。那众多奇峰峡谷强烈地吸引着我；多好的伏兵藏弩之地呀，战斗计划渐渐在脑海形成。

从白石口至雁宿崖一段路，实际上是个宽约四十米的干河滩，两边的山岭陡峭，如果伏兵两侧，并以一部分兵力诱敌至此，再用火力封锁住白石口，断敌退路，那它就插翅难逃，只能葬身于乱石之中。

特别有意思的是，我脚下的山地，正是古战场。矗立在白石口上的城楼，还楔有“云谷重关”四字；传说杨六郎插箭立营而得名的插箭岭上，六郎庙古风犹存；内长城虽已坍塌，但它那石龙般的城基仍然卧伏在苍莽山野中。

战斗迫在眉睫，分分秒秒都不可虚掷。我一面察看地形，一面思考战斗部署，一面利用附近的电话站把作战命令下到各团，让部队准备行动。

看完地形后，我又到达三团驻地银坊镇，和团长纪亭榭、政委袁升平、副团长邱蔚进一步研究作战方案，接着

命令各团立即按计划开进伏击地域。

十一月二日，我们在分区司令部召开干部会议，对作战方案又做了一次研究和确认。经聂司令员批准，决定：以部分兵力和地方游击队去牵制、堵击插箭岭、灰堡之敌，不使那两路敌人接近我们战场；三分区的团长唐子安、政委黄文明率其二团，纪亭榭、袁升平率三团，分别埋伏于雁宿崖东西两面；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率一团插至白石口南，随时截击敌人的退路；以素有“狼诱子”之称的曾雍雅、梁正中支队，由白石口向雁宿崖佯动，诱敌深入。待敌进入雁宿崖地区后，全线发起战斗。

这样，我军参战兵力有一分区的一、三团和三分区的二团，共三个主力团，与敌人可能落网的一路兵力相比，占有绝对优势，由于兵力集中，具备了歼灭这路敌人的条件。

我向聂司令员报告作战方案时，聂司令员指示说：

“一定要抓住战机，争取全歼这一路敌人。我不会离开电话的，你要随时报告战斗进程，彭真、贺龙、关向应同志，都很关心这场战斗。”

放下电话，我命令所属部队进入伏击阵地，当夜指战员们就在山中荷枪露宿。

十一月三日是个好天，晴空之下，万岭苍苍，旭日抹红山尖，清冷的穿谷风阵阵扑面，实在令人兴奋。

七时许，我军同三路敌人先后接火，东路敌人被曾雍

雅、梁正中支队诱击了一下，果然大踏步闯进狭谷来了。行至雁宿崖，一分区三团的主力已在张家坟及其两侧山上隐蔽展开。一团长陈正湘和政委王道邦率其一营到达雁宿崖东山，从望远镜里看到，敌先头部队约一百多人，正在雁宿崖村东河滩休息，有的坐着，有的靠着背包躺着。敌主力正从上下台、三岔口沿河沟缓慢地向雁宿崖开进。

陈正湘同志命令一营长李得才迅速将二、四连隐蔽展开于阵地的内斜面，派出警戒，监视敌人，组织火力掩护主力展开。接着，他向各营下达战斗命令：

一营主力展开于二营左侧，与三团阵地接衔，从雁宿崖东南实施攻击。二营长宋玉琳、教导员郑三生率主力从中间冲击，首先消灭河滩之敌，尔后向雁宿崖村内攻击。三营由熊招来副团长和营长张英辉、教导员邓经纬带领，沿小山沟向北疾进，攻占三岔口，断敌退路；三营攻占三岔口后，以一个连的兵力占领三岔口附近有利地形，防敌从涞源、白石口增援；并以适当兵力进占上下台东山阵地，以火力侧击敌之左翼，掩护营主力由北向南攻击敌第二梯队。命令各营指定突击队并组织好火力，各连、排、班长要亲自观察、熟悉地形、道路和敌情，选好冲击路线和冲击地段，区分冲击目标。各部队应绝对隐蔽，没有统一命令，不准开枪。

一团指挥所设在雁宿崖东山上。

骄横狂妄的敌人，行军和休息不派警戒，对两侧也不

搜索，竟大摇大摆地向张家坟前进。

埋伏在张家坟以北及枣儿沟的三团一、三营已严阵以待。一团一、二营也已进入阵地。当一团三营赶到三岔口时，敌人后卫刚刚通过。三营除留一个连控制三岔口断敌退路、阻敌援兵外，主力则尾随敌人向南压缩。

当敌先头部队进到雁宿崖与张家坟之间时，三团突然以猛烈的火力给敌以迎头痛击。

这时，一团长陈正湘命令号长吹起冲锋号，一团一、二营主力从两侧阵地同时向河滩猛扑过去。

冲锋号声响彻山谷。一团一营迅猛出击，以一部向南打，配合三团力争迅速消灭敌前卫部队；以一部向雁宿崖东南沟攻击前进，配合一团二营歼敌，同时一团二营主力也沿弯曲狭窄的东沟向河滩之敌冲击。伏击部队的机枪一齐开火，枪声、喊杀声、手榴弹爆炸声在山谷间回转激荡，震耳欲聋。

敌人遭到猝然打击，象被逐的兔子一样四处飞窜，纷纷寻找隐身之地。

很快，敌人就从昏乱中清醒过来了。他们迅速组织抵抗，先占据河套附近的小高地作为立足点，然后以十几挺机枪、几门山炮为掩护，一面向三团阵地发起连续反扑，一面指挥上下台以南的炮兵向一团二营右侧伸向河滩的小山头轰击。同时，几十名敌人迅速沿村西南沟的小道抢占了无名高地以西、上花沟以北的六一五高地。

在三团的阵地上，指战员十分沉着，等敌人靠近了，再突然扑出去，以手榴弹、刺刀把他们歼灭在阵地前沿。

一、二团的机枪也在敌侧猛扫，打得反扑的敌人象山崩时的碎石那样纷纷滚落山坡。

敌人被歼灭大半，剩下的已被压缩在上庄子与雁宿崖西北的那个小高地上。

此时，一团三营已控制三岔口东南山阵地，很快又攻占了上下台南面河沟敌炮兵阵地。

经过激烈的战斗，三分区二团也攻占了六一五高地。

没多久，上庄子敌人全部被歼，至此，雁宿崖外围之敌基本被我们肃清。

但是，小高地上的敌人却还在疯狂抵抗。显然，他们想坚守到天黑，等待那两路敌兵驰援，哪里知道，那两路敌人在我们和各部队的牵制、堵击下，也都寸步难进。

下午四时多，一分区的一、三团和三分区的二团围歼雁宿崖之敌的总攻开始了。

这时，各团都有部队运动到小高地下面，把敌人围得水泄不通。小高地顶上是敌人指挥部和炮阵地，辻村宪吉大佐正督促士兵四面抵挡，山炮不停地发射，灰蓝色硝烟把山顶都笼罩住了。

三团一营担任对这个高地的主攻，营长赖庆尧^①在最

^① 即赖兴中同志。

前沿指挥。冲锋号一响，十几挺机枪朝小高地顶端倾泻弹雨。三连指导员甩去棉袄棉裤，高举驳壳枪，领着全连冲上去了，刹时占领了山顶。

敌人倾巢扑来，山头上展开了白刃格斗，三连指导员身上数处负伤，一只眼睛被鲜血糊住了，仍然挥舞着驳壳枪不停地射击。由于只有一面陡坡能够通向高地顶端，却又被敌人的机枪封锁住了，后续部队上不去，已经攻上去的战士们则因寡不敌众被敌人压了下来。

夕阳落到山后，山峦沟谷渐渐模糊起来，我决心已定，命令部队必须今天解决战斗。

战士们开始第三次冲锋。一团绰号叫“病号排”的曹葆全排也全部投入战斗，冲锋号四面八方吹响，曹葆全同志领着全排着了魔似地冲在最前面，大部队如狂潮一般涌了上去。

辻村宪吉大佐的指挥所，原设在村北的小山包上。由于我军步步逼进，被迫撤到村西的一个院子里。一团二营、三营的部队紧紧把这个院子围住，机枪、步枪不断地向院里喷射着复仇的子弹；手榴弹纷纷投进屋里，顿时火光四起，烟雾弥漫，房子着火了，敌人的机枪哑巴了，屋里的日军好象热锅上的蚂蚁，四处乱钻。我围攻的部队乘势冲进院子，将敌歼灭，与此同时缴获了部分武器、弹药和其它物资。

经过激烈的拼杀，六百多日军除被我们生俘十三名外，

其余几乎全成了死尸散布在河套、山谷和村庄里，只有极少数漏网。

一团七连连长钟茂华同志，穿着一件日军将校呢大衣，十字披红地挎着一把指挥刀、一把王八盒子，笑眯眯地大步走到营部。营长宋玉琳和教导员郑三生一见，都被他这副模样逗笑了。他们看大衣上金晃晃的军衔，知道这是个大官，但不清楚多大，翻开衣襟，见里面用金丝线绣着“辻村”二字，他们也不认得“辻”字。

钟茂华同志说：“我们迂回到敌人炮阵地侧后面时，打倒一个鬼子官儿，缴获了这套行头。”

可惜，我们在打扫战场时没找到辻村宪吉大佐的尸体，所以并不能确定这家伙是死是活。不过，辻村宪吉的部队是覆没了，其余两路敌人当夜仓惶奔回涞源城。

日军作战有个规律，每次失败，必然出兵报复，失败得越惨，报复得越凶，而且常常是败兵刚刚归巢，大队人马就立即扑来，妄图趁我们“消化”胜利果实时，打我们一个猝不及防。如大龙华战斗后，敌人即出兵报复，利用雨季，对我易（县）、满（城）、徐（水）地区进行“扫荡”。我们进行了二十天的艰苦战斗，在东赵庄、鱼姚、团山、天津沟等地先后毙伤敌一千多人，于七月二十八日胜利结束了雨季反“扫荡”。

因此，我们对敌人失败后必然报复这一情况有所提防。

雁宿崖歼灭战枪声刚刚止息，我立即命令部队连夜打扫战场，埋葬敌尸，迅速转移。被敌人裹胁来助战的民夫，则让他们各自回家。谁的骡马就由谁领走，因这些牲畜全是沦陷区群众的财产，我们不能留作战利品。然后，我又通知各情报站，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

这天午夜，我刚刚拧暗油灯，想抓紧时间睡几个钟头，只听外面有人敲门，打开门看，分区卫生部长张杰同志站在门口，喜悦地说：

“司令员，白求恩大夫来啦！带着医疗队来的！”

“哦？！”我又惊又喜，急忙奔出门，心想，白大夫来了，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啊。”

当时，我们医疗条件十分困难，仅有的一些药品是从战斗中缴获来的，伤员们经常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接受手术，奎宁、止血剂都是难得的宝贝，一支针剂往往就决定一位战士的生命。分区医院大手术不能做，重伤员只好连夜送往军区五台医院，因为伤重路远，常常在半路上，伤员就因为流血过多牺牲了。每当战斗结束后，我望着民工们抬着担架急步朝山中走去时，心中就象刀剐似地难受，不知道那些负重伤的战友能不能再回来。

白大夫来了，将会为我们挽救回多少伤员的生命啊！

黑暗中，一个高大身影跳下马，阔步走来。啊，是白求恩大夫。我急忙迎上去，握住他的手说：

“您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

说心里话，白求恩大夫在战斗前夕到一分区来，我又欢喜又担心。欢喜的是，他的医术精湛，许多伤员可以在他手下起死回生；担心的是，他在前方医院工作，那里往往也在敌人火炮射程之内，万一发生不测，这损失可就太大了。再说，我感觉到他身体不太好，神情疲倦，握手不象以前那样有力了，指间还裹着白纱布，看来是一处刀伤。

白求恩大夫声音却依然洪亮，翻译翻着他的话说：

“聂司令员派我来了。说你这里要打个仗，是不是？”

“已经打了一个，可能还要再打。”

“那么，我来对了。”

我笑道：“是你自己要求来的吧？”

“是我要求的，聂司令员批准了。战士们在前方倒下，我们应该在前方救治他们。要是我们在后方医院等伤员，有些伤员就会死在路上。”

白求恩大夫身披土黄色粗布军袄，腰间扎一条宽皮带，下身却没有穿棉裤，只在单裤外面紧紧地扎着裹腿。脚上是山里人常穿的那种二三斤重老布鞋。这种鞋的鞋底足有半寸多厚，用麻线纳得十分细密，连小伙子也弯不动。初穿它的人，脚会磨出血来，可是白求恩大夫穿着它上马下马，噔噔走来，却显得步步精神。看他这装束，谁会相信他竟是英国皇家医学院的院士呢。

白求恩大夫进屋刚刚坐定，就开口用中文说：

“杨，我跟你东西来了。”

“要什么，说吧。”

“五百付夹板，一千付绷带，还有担架、拐杖……”

他说了一大串名目。

“什么时候要？”

“明天中午十二点！”他做了个手势，表示坚定不移。

我可真吃惊，那么多东西，如何做得出来呀？不过，我还是应承了：

“就十二点吧，交给你东西！”

白求恩大夫笑了，立即站起身和我握手告别：

“你我都忙。我走啦！”

送到院门口，他又叮嘱我一句：

“十二点！”

这下子，我也睡不成了，连忙找来卫生部长张杰和供给部长董永清，要他们想方设法在明日十二点以前，把白求恩大夫要的东西做出来，以供医疗队使用。

第二天中午，白求恩大夫匆匆赶来，问我东西做好没有。我带他去验收，当他看到所需要的器具全部按他的要求制作完毕时，高兴地连连点头：

“好！好极了！我十分快活。让我把伤病员的感谢转赠给你，我亲爱的杨！”

我请他吃了一顿午饭，桌上最好的菜就是一盘炒鸡蛋，这是当时唯一能弄到的好菜。吃饭时，我向他介绍了敌情

和我们的部署。吃罢饭，白求恩大夫率领医疗队，带着刚刚做成的医疗器具出发了。

就在这天凌晨，又送来了情报：

驻张家口日军出动其精锐部队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所属各部，即由中熊直正中佐率领的二大队、绿川纯治大佐率领的三大队、坻辻中佐率领的四大队、森田春次中佐率领的五大队，约一千五百多人（伪军除外），分乘九十多辆卡车急驰涞源。涞源城里的残敌彻夜不宁，又在到处抓夫。很显然，敌人是实行报复性“扫荡”来的。可能沿着让村宪吉大佐旧路，进至银坊，然后，或西取走马驿，或东扑黄土岭，寻找我主力决战。

我在管头指挥部把这新情况报告给聂司令员，并且建议再打一仗。

聂司令员笑了，问：“部队情况怎样？”

“刚打了个胜仗，伤亡很小，士气很高，正在银坊、司各庄一带休整，出击方便。银坊以东，直到黄土岭，地形仍然利于设伏，只要敌人敢于由银坊东进，我们一定能伏击成功。”

聂司令员指示说：“你们先以小部兵力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敌人，把他们引向银坊，向他们扑空。然后你们隐蔽起来，让敌人寻找你们决战。你们在银坊北面示以疑兵，诱敌东进，等他们进到黄土岭后，你们再利用有利地形集中兵力歼灭它。”聂司令员接着又说：

“你们先做准备吧，我和彭真、贺龙、关向应三同志再商量一下。”

很快，聂司令员又来电话了。他高声道：

“彭真、贺龙、关向应三同志都赞同我们的意见。成武同志，你争取打个更大的胜仗吧！贺龙同志怕你兵力不足，决定让一二〇师特务团从神南北上，天黑前赶到黄土岭地区，归你指挥。此外，我们让二十团、二十六团、三十四团^①箝制易县、满城、徐水等地的敌人。”

首长们这样支持，我真高兴。这样，参战部队就有一、二、三、二十五、特务团^②，还有游击支队和分区直属炮兵部队，取胜就更有把握了。

敌人上次分兵三路吃了大亏，这次恐怕不会再分兵了，可能集中力量一路进剿，极力寻找我主力决战。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率领这支敌兵的指挥官，竟是赫赫有名的阿部规秀中将。

阿部规秀是接替去年被我军击毙的常岗少将，来统帅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该旅团在日军中堪称精锐，而阿部规秀又是在日本军界享有盛誉的“名将之花”，是擅长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以伪“蒙疆国驻

① 二十团团长陈宗坤，政委李振声；二十六团团长詹道奎、政委尚英；三十四团团长马辉，政委黄连秋。

② 一团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三分区第二团团长唐子安，政委黄文明；三团团长纪亭榭，政委袁升平；二十五团团长宋学飞、政委张如三；一二〇师特务团团长杨嘉瑞。

屯军总司令”的身份兼任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旅团长。日军的旅团长一般由少将出任，中将够得上荣膺师团长之职了。阿部规秀上个月晋升中将，并担任北线进攻边区的总指挥。辻村宪吉大队被歼，使他在刚刚晋衔之后如同挨了八路军一记耳光，丢了脸。所以，他在第二天就亲率精锐之师出马“扫荡”了。

我们虽不知道阿部规秀亲自进山。但阿部规秀骄野成性、轻狂自负，刚刚晋衔，急于报效天皇，也并不知道我们的厉害。临行前，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

……爸爸从今天起去南方战斗！回来的日子是十一月十三四日，虽然不是什么大战斗，但也将是一场相当的战斗。八时三十分乘汽车向涞源城出发了！我们打仗的时候是最悠闲而且最有趣的，支那已经逐渐衰弱下去了，再使一把劲就会投降……圣战还要继续，我们必须战斗。那么再见。①

这时，我兄弟部队三五九旅七一五团一部为了箝制涞源之敌，由上寨积极向涞源城、灰堡和南、北石佛活动。我们部队正在进行战斗动员，“打一个更大的歼灭战”的口

① 这是本书作者后来从缴获的日本《朝日新闻》上查到的。

号，强烈地激动着战士们的心。一分区和三分区的群众也从各地赶来，组织了许多担架队、游击小组、侦察小组，帮助我们放哨、侦察、救护伤员、送水送粮。方圆几十公里的战场都在沸腾着。

当天夜间，敌人又越过白石口一带的内长城，进到雁宿崖下，他们把我们已经为之埋葬的一些敌尸，一具具挖出来，用木杠子抬到一起，架上柴堆，烧上汽油，点火焚化。整条山谷弥漫着焚烧尸体的焦臭味，几里外都可见熊熊烈火，可以听见战马惊惧的嘶鸣。

十一月五日，一千五百多日军从龙虎村向白石口前进。

一团一营五、六连与二十五团一部在白石口与敌接火，忽而坚决堵击，忽而大踏步后撤，象翻飞的鸽子那样紧紧缠住猎物不放，即敌人既求战不能又追赶不及，气得暴跳不止。

当晚，敌人到达银坊镇，实施“三光”，银坊一带村庄大火冲天，彻夜不熄，好在群众都已撤离，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

十一月六日，敌人两次扑空后，急不可捺，终于，离开银坊镇，倾师东奔黄土岭。

“敌人来了！”

消息传来，各团士气大振。这天，我们丝毫不惊动缓缓东进的敌军。晚间，他们搭起帐篷，解开行囊，在黄土岭、司各庄一带宿营了。夜里，天气陡变，浓云蔽空，星

月无光，太行山上的阵阵冷风，扑击着寂如坟岗的黄土岭。

部队乘夜展开，一团、二十五团在寨坨、煤斗店集结，卡住了敌人东进道路；三团从大安出动，占领了黄土岭及上庄子以南高地；三分区的二团则绕至黄土岭西北尾随敌后前进。在敌人毫无觉察的情况下，我们完成了对他们的包围。

十一月七日，天空飘洒着密密的雨丝，周围群峰都消逝在浓雾里，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紧张感。“黄土岭”听起来象黄土高原上的土山，其实不是，它是太行山北部群山中一座岬口，四周有许多深沟大谷和一条不甚宽的河滩。时已深秋，山里冷得早，林木脱尽叶子，地上是一片枯草。

上午，敌人继续东进，前进时十分警惕，总是由先头部队——约三十多人，携重机枪、轻机枪数挺，先行占领路侧小高地，然后大队才跟进。

中午十二时，敌先头部队已接近黄土岭东面的寨坨村，大队还逶迤在上庄子一线。直到下午三点钟左右，全部人马才离开黄土岭，陆续进入峡谷中的小路。这时，我一团、二十五团迎头杀出，三团及三分区的二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过来，把敌人团团围住，压缩在上庄子附近一条长约二三里，宽仅百十公尺的沟里。我军一百多挺机枪从各个山头一齐朝沟中打。分区炮兵部队也连续发射了数发炮弹，这条山沟立刻被弹片、碎石和浓烟覆盖住了。

敌人依仗其兵力雄厚和优良火器，向我寨坨阵地猛冲，

遭到反击后，乃掉头西向，妄图从黄土岭突围，逃回涞源。我三团紧紧扼守住西、南阵地，我兄弟部队一二〇师的特务团这时也赶到了。他们从三团的左侧加入战斗，使敌人欲归无路，只能就地抵抗。

黄土岭东有个名叫教场的小村庄，那里是敌人指挥部。此刻，一群穿黄呢大衣的军官，站在一座独立院落的平坝前，正用望远镜朝山头了望。这情景，恰被一团长陈正湘用望远镜发现。他急忙把目标指示给配属一团的分区炮兵连连长杨九秤，杨九秤指挥迫击炮连发数弹，正打在敌指挥官人群中，随着“哐、哐、哐”几声巨响，敌军官立刻倒下一片。后来得知：阿部中将就在这群炮弹下毙命了。

日本报纸《朝日新闻》特派员十一月二十日发出详报说：

……阿部中将亲临第一线，以便视查敌情，随时下达命令。当到达上庄子以南约一公里的一处人家时，敌人一发炮弹突然飞至身旁爆炸，阿部中将右腹部及双腿数处受伤，但他未被重伤屈服，仍大声激呼“我请求大家坚持”。然后俯首向东方遥拜，留下一句话：“这是武人的本份啊。”负伤后约三小时，即七日晚九时五十分，中将壮烈死去……

巧的是：当时有十七八个群众被敌人关押在独立院落东边的小屋里，他们蜷缩在一个大炕上，亲眼看到炮弹在屋前连连爆炸，日军指挥官全炸倒了，连那条高头狼狗也炸裂了肚子，可是却没有一块弹片飞到小屋子里来，他们无一负伤，暗中称奇：

八路军的炮真神。

敌人失去指挥官，极度恐慌，绿川纯治大佐命令部下抬着阿部的尸体，朝黄土岭拼命突围，此时遭到了我三团、特务团的迎头痛击。随之，他们又向寨坨突围，又被我一团击退。这以后，敌人反扑势头顿减，战法也乱了，不得不收缩兵力固守了。

入夜，估计敌人残存兵力尚有七八百人，由于我各团之间联系困难，不便于乘夜攻击，我便命令各团固守已有阵地，不使敌人漏网。同时派小部队袭扰敌人，疲劳敌人，等到拂晓再开始总攻击。

八日凌晨，飞来五架敌机，在战场上空盘旋侦察，过一会，投下七个降落伞，那降落伞上吊着的除了弹药、粮食外，还有人，很可能是派来指挥黄土岭残敌突围的。

果然，八时许，敌人留下二百多人在上庄子掩护，其余人开始向司各庄方向突围，各种枪声象海潮那样轰响着。一团和二十五团果敢地插上去，切断了敌突围部队和掩护部队的联系，三分区的二团、一分区的三团和一二〇师的特务团也开始全线攻击，一、三分区的广大群众积极支前……

中午，一团报告，三岔口方向传来机枪声，我们断定这是敌增援部队与我三岔口曾支队接火了。

情况很快就查清了，敌人纠集了前所未有的重兵，驻保定的一一〇桑木师团、驻大同的二十六师团、驻张家口的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余部纷纷出动，从灵邱、涞源、唐县、完县、易县、满城等方向分多路向黄土岭合击，先头部队距黄土岭已不到三十里了。敌人企图在我们的包围圈外面对我们形成一个更大的包围圈，把我们的参战部队一网打尽。

聂司令员得知以上情况后，立即指示部队撤出战斗，注意敌情变化。

敌人的冬季大“扫荡”全面开始了。我们不再恋战，迅速撤离黄土岭战场，跃至外线作战，不断从敌人侧背予以突击。到十一月底，敌人的“扫荡”部队损失渐大，疲惫不堪，又捕捉不到我们的主力，不得不全线溃退。从而，我们取得了冬季反“扫荡”的胜利。

黄土岭战斗，是晋察冀军区继雁宿崖歼灭战后又一次空前的胜利。我们共歼灭九百多名日本侵略军（伪军不在内），缴获二百多满载军用品的骡马车，五门火炮，几百支长短枪及无数弹药，还生俘了十几个日本兵。可惜的是，有两三门炮因为来不及搬运，只好埋在黄土岭河滩里了。

这样，我们从十一月三日至八日，六天中就连续取得了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的胜利，共歼灭日本侵略

军一千五百多人（伪军不在内），并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当时，魏巍同志随一分区部队作战，他所写的《雁宿崖战斗小景》和《黄土岭战斗日记》^①，也正是这两个战斗的真实写照。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总结。聂司令员突然打来电话，他喜悦地高声说：

“成武同志，好消息啊！延安拍来贺电，说你们打死了阿部规秀中将，我祝贺你们啊！”

我又惊又喜，根本没想到这位中将旅团长竟亲自率兵进入黄土岭，并且被我们打死了。放下电话，我向旁边正在统计战果的秘书陈子端喊道：

“老陈，聂司令员说，我们打死了阿部中将，总部祝贺我们哩！”

陈子端一怔，拍着统计表叫道：

“中将？我们还不知道有这个死鬼呐，哈哈哈。”

在场的人都高兴得开怀大笑。

我急忙给一团挂电话，转告了这个喜讯，并且要他们立刻到战场寻找阿部中将的遗物。当天，阿部的绣着两颗金星的黄呢大衣，和把上嵌金包银的指挥刀也落到我们手中。后来，我们把这些东西送到了军区，军区又派人把它送到了延安。

^① 当时，反映这方面的诗歌和散文还很多，如田间同志也写了一篇描写黄土岭战斗的诗歌。

阿部中将被击毙，日本朝野震动，陆军省发布了阿部规秀的阵亡公报。《朝日新闻》以通栏标题痛悼此人：“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连登三天。这家报纸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其它各报也频频报道阿部的生平、战功、死讯。他的骨灰送回东京时，“帝都降半旗致哀”，“以高龄的柴大将为首，杉山大将、东防司令官稻叶中将、代理陆军大臣中村以下各位将领到车站持吊旗致哀。爱妇^①、国妇^②等团体和很多遗族前往迎接”，可谓“哀荣”至极！

阿部规秀是日军侵华战争以来丧失的一个高级将领，也是中华民族整个抗日战争中消灭的职务最高的一个日军指挥官。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这在华北战场是第一次，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的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拍来贺电，祝贺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全国各地的报纸也纷纷报道黄土岭战斗经过，刊登各种祝捷诗文。真是欢声动地，贺电满天，广大人民异常振奋。有趣的是，远在大后方的国民党中央政府，一向诬蔑我们，说八路军游而不击，只顾扩张实力，这一回却象挨了一棒似的低头噤声了。蒋介石还发来了电报：

朱总司令：据敌皓日播音，敌辻村部队本月

① 爱妇，即日本“爱国妇人会”，以保护侵略军伤病员遗族为目的的团体。

② 国妇，即“大日本国防妇人会”，日本军部在战时成立的妇女组织。

江日向翼西涑源进犯……支日阿部中将率部驰援，复陷我重围，阿部中将当场毙命等语。足见我官兵杀敌英勇，殊堪奖慰。杀伤将上项战斗经过及出力官兵详查具报，以凭奖赏，为要。中正
(二十八年十二月)

不久，彭真同志指示我，就黄土岭战斗经过写一篇文章，驳斥国民党内部那伙诬蔑我们“游而不击”的人。我便写了一篇题为：“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瞧一瞧八路军是不是游而不击”的文章，登在当时的抗日刊物《新长城》上。

反“扫荡”胜利结束后，一天，五回岭情报站转来日军的一封信，信是写给我的，信口还插三根鸡毛，以示“万分火急”。

我拆开一看，竟是驻张家口日军警备司令小柴写的。

杨师长麾下：

中日之战是中日两国政府的事，麾下与鄙人同是人类一分子，没有私仇，参加战争仅是为了吃饭，国家的争论与我们无关，别因此影响我们的友谊。麾下之部队武运亨通，长胜不败，鄙人极为敬佩。现鄙人有两件事求教：一是请通知鄙人在黄土岭、雁宿崖被麾下部队生俘的皇军官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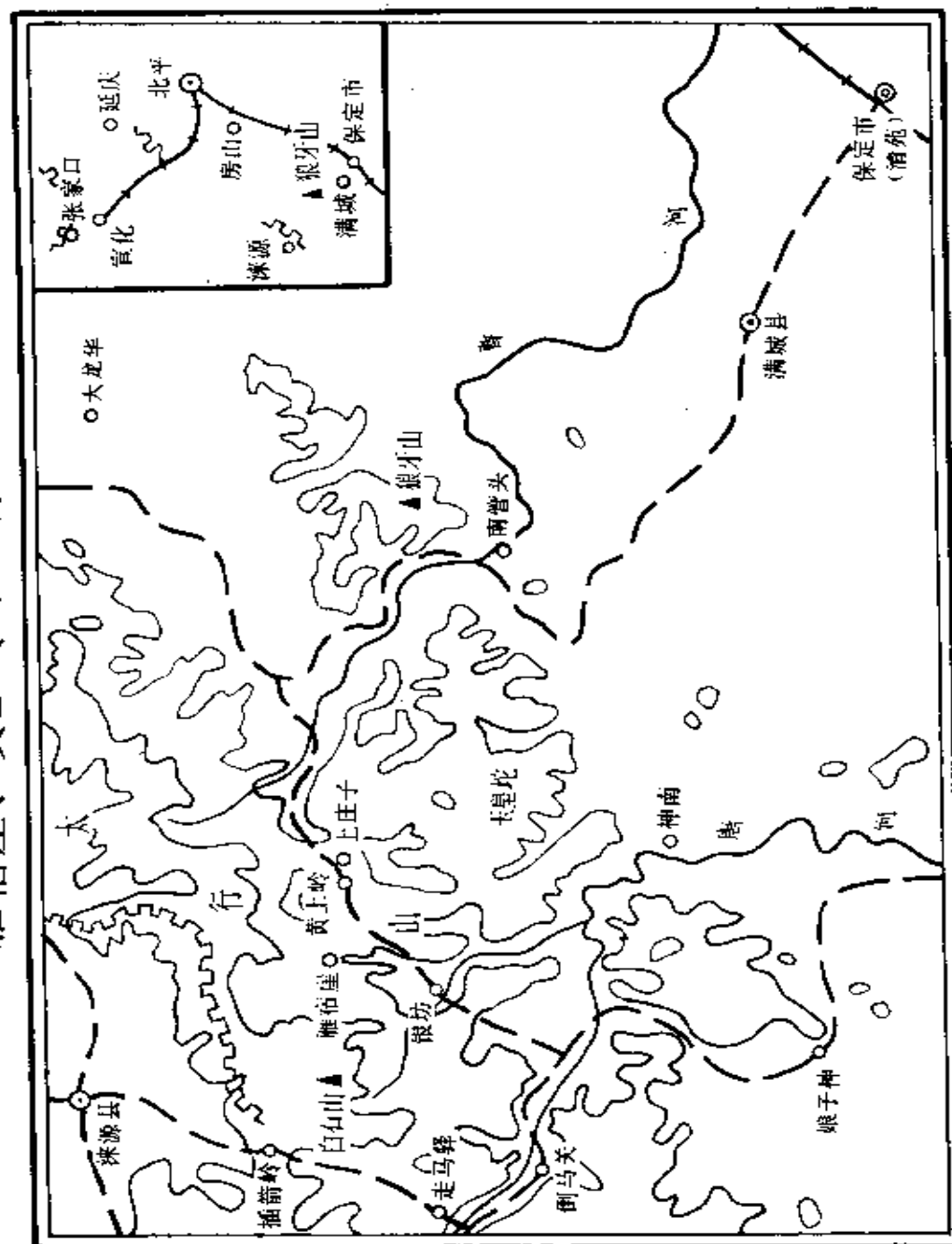
的数目、军职、姓名及他们的生活近况；二是战死的皇军官兵是否埋葬？埋在何处？可否准予取回骨灰，以慰英灵？……

我把此信拿给同志们看，同志们会心地笑了。我当即复他一信，首先驳斥他所谓“国家争论与我们无关，参加战争仅是为了吃饭”之类的言论，指出他自己就是法西斯的侵略工具。我们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是必胜的。然后通知他，八路军一向优待俘虏，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一律宽大处理。俘虏们生活得很好，已开始认识自己的侵华罪行，表示反对这场侵略战争。对于那些做了日本当局炮灰、蒙受日本当局给予的灾难的死者，我们已妥为安葬，并立有石碑，以兹标志。

在胜利的喜悦中，我更深深怀念牺牲的同志们。白求恩大夫在分区甘河净医院，不顾指间刀伤，为一名患颈部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动手术，不幸被这种病毒感染。他带着高烧、病痛，继续救治黄土岭战斗中下来的伤员，后因自己病情恶化，终于在十一月十二日和我们永别了。

噩耗传来，我心情异常悲痛，原想反“扫荡”胜利后，把白求恩大夫请到分区司令部来好好休息几日，再请他为我们一分区卫生工作作些指导，谁知竟不能了。他以他的卓越医术和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精神，支持和激励着我们的战士在黄土岭勇猛杀敌。他的名字是和黄土岭胜利紧密相连的。

雁宿崖、黄土岭歼灭战地区略图



第 六 章

反“扫荡”（下）

南 管 头 被 袭

黄土岭战斗结束后，我与高鹏、黄寿发同志立即研究各处报来的敌情和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我们一致认为，这次反“扫荡”，一开始就在雁宿崖和黄土岭两个地方重创了日军，敌人惨败之后，肯定要大规模的报复。现在，增援黄土岭的日军不但未退，还从各地抽调了更多的部队，企图从四面八方对我们一分区来一次总的“扫荡”，预计敌人下一步合击目标，极有可能是分区机关所在地——南、北管头。我说：

“在黄土岭战斗中，敌处内线，我处外线，给敌以极其沉重的打击。现在情况变了，分区周围的敌人全部出动，我处内线，敌处外线，对我们不利。我们的主力和指挥机关应该迅速跳到外线去，以少数部队与敌接触，寻求有利战机打击敌人。即使找不到战机，也不致受到敌人的夹攻，

这样，可以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

高鹏、黄寿发同志都同意这个意见。

这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傍晚，司令部搞了一顿难得的菜馅饺子，庆祝黄土岭大捷。高鹏副司令员端着两盆饺子，吆喝着冲进屋里，我和黄寿发参谋长以及警卫员、电话员、勤务员、马夫一拥而上，嘻嘻哈哈抢饺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饺子没吃完，天空中忽然传来轻微的嗡嗡声。

“敌机！敌机来了，注意防空！”有人在屋外高声喊。村头上的哨兵也发出了防空信号。我们赶紧放下饺子，抓起枪就往外跑。我边跑边想，天快黑了，敌机还飞到我们这里来，实在有些蹊跷！

我们刚在村边土坡上隐蔽好，两架日本飞机就在西北天空出现了。我估计，敌机是到桑岗、杜岗一带侦察后，飞到南、北管头来的。据报告，这两天，敌机对那一带很注意。按理说，增援黄土岭的敌人扑空之后，东退时是会途经大良岗、金坡据点，最后返回易县的。可现在，敌机在桑岗、杜岗反复侦察后，又飞临南、北管头上空，这不能不使人警惕：敌人真的要合击南、北管头了。

敌机在我们头顶上盘旋了几圈，居然没有投弹，眼看要飞走了，忽然一架敌机扔下一个挺大的玩意儿，“嘣当”一声，正好落在南管头与陈家会之间的那个小山梁上。

“妈呀，好大的炸弹！”小勤务员惊叫一声，捂上耳

朵。

我笑道：“别慌！那是副油箱，炸不响。”

高鹏同志说：“天快黑了，狗日的没炸弹啦。就是有，这帮飞贼要赶回去喂脑袋，也顾不上扔罗！”

小勤务员一听来了劲，两手一撑站起来，指着正在爬高的敌机骂道：

“你有种就给我下来！老子不怕你！”

在一片哄笑中，两架敌机消失在暮色里。

当晚十点钟，我们下达了转移命令，决定分区司令部、政治部及直属队天亮之前离开南、北管头，转移到上、下隘刹西南的慈家台、白沙一带；驻水泉的供给部和从桑岗退出的卫生部，也向那个方向转移；驻武家庄子的一团一营和口头的一团二营于今晚下半夜向南移动，拂晓前在南、北管头和上、下隘刹集结待命。为了慎重起见，我还直接给一团二营挂了个电话，对二营长说：

“在黄土岭扑空的敌人，东退时有两个可能，一个是经大良岗和金坡，原路退回易县，另一个可能是经口头到南、北管头来‘扫荡’一番，然后退回满城。后一个可能性是很大的，你们要注意正在杜岗焚烧民房的鬼子，加强警戒。如果敌人走口头这条路，你们就狠狠地敲它一下！”

一切都安排完之后，警卫班班长曾荣昌同志连声催促我们睡觉。确实，自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以来，连续十几天，我们都没睡上个囫囵觉。为了指挥战斗，高鹏、黄寿

发等同志眼睛都熬红了，胡子拉碴的，顾不上刮，我的嗓子也喊哑了。现在能不能睡呢？我虽有些迟疑，但又一想，口头、武家庄子各有一条流向南管头的小河，一条源于黄土岭，一条源于大平地。河两岸大山夹峙。万一敌人开向南管头，他们只能沿着河边走。而这一路上有一团一营和二营堵着，不容易一下子扑到南管头来。于是，我征求大家意见道：

“罗元发主任带着机关和直属队下半夜转移，我们和警卫班迟走一步，多睡一会吧。”

高鹏同志一听，马上跳上炕，躺下说：

“睡，都睡！抓紧时间。”

大家相继躺下了。

我睡得正香，突然被人摇醒，睁眼一看，警卫班长曾荣昌神情紧张地对我说：

“司令员，有敌情！”

我猛地坐了起来，一手从枕头下摸出手枪，一手拍拍睡在身边的高鹏同志，转而问曾荣昌：

“怎么回事？”

“山头上放哨的民兵鸣枪报警！”话音刚落，北管头方向枪声大作，一个警卫员提着枪旋风般地冲进屋，上气不接下气地嚷道：

“司令员！快……快走！鬼子进了北、北管头啦！”

不出所料，敌人果然途经口头，奔袭南管头来了！可

是，敌人难道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此时，除警卫班外，我们身边竟没有任何部队了！

敌情紧急，容不得我多想。高鹏和黄寿发同志也都摸出手枪，跳下了炕。好在我们睡觉是和衣躺下的，不必穿衣服。我们几个人飞跑出门，直奔河边。

屋外，晨雾朦胧，枪声更响了。我们正跑着，不知谁喊了声：

“电话机还没拿出来！”

一个电话员应声掉头跑了回去。

我们刚跑到河边，又听高鹏同志叫苦不迭：

“哎呀！饺子，那盆饺子还放在屋里呢！”

好几个人不由地放慢了脚步。我也记起来，昨晚我们吃到后来，大家正互相推让，由于敌机临空，还剩下一盆饺子。现在丢在屋里，是挺可惜的，不过敌情紧张，也只得把它丢喽。

“饺子哪能留给敌人？我去拿回来！”高鹏同志说着，转身就跑。

我急忙喊道：“老高，你别去！”

他喊了声：“没事。”晃动着重子，救火似地向司令部猛跑，一边跑，还一边不断地用手去扶那快掉下来的眼镜。

我急忙指着一名大个子警卫员：“你！快跟高副司令去！”

那个警卫员连忙快步奔去。曾荣昌同志轻声惊叫：

“司令员，快看——”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见淡淡的晨雾里，北边小山梁上透空处，隐约出现了十几个头戴钢盔的日军，便命令道：

“快过河，到对岸掩护高副司令他们！”

北山梁上响起清脆的歪把子机枪声，敌人向南管头村里射击了。我们飞快地跑到河边，一下子跳入结着薄冰、冰冷刺骨的河水里。

我们过河的地方，是两条河汇合处，河滩有一里多宽。多亏有雾，敌人没有发现我们。直至我们跑到对岸，那子弹才“嗖嗖”地飞来，打得河里直冒水花。好险！我们只要迟一两分钟过河，恐怕就要有人牺牲在河里了。高鹏他们还没有过河，怎么办？我立即命令警卫班隐藏在岸边山坡上的灌木丛中，向对面山梁上还击，掩护高鹏他们。正在这时，只见高鹏抱着那盆饺子，警卫员提着枪，电话员拎着电话机子，三个人蹒跚着河水朝这边猛跑。警卫员一直要抢着端那盆饺子，可是高鹏同志不肯，大概是怕他把饺子弄撒了。

“哒哒哒……”敌人机枪响得更激烈了，子弹落到河里，发出“啾啾啾”的怪叫。

真是侥幸，他们在弹雨中冲过了河，居然谁也没被伤着。我高兴地喊道：“不要停下，快上山！”我担心日军追下山，冲过河来。

警卫班边撤边举枪还击，民兵也在四处打枪。真该感谢他们，是他们发现了敌情，并且极力袭扰日军，掩护我们撤走。

我们一口气跑了六七里，到了南管头与上、下隘刹之间的山梁上，发觉敌人没有追来，才停住脚。高鹏同志一屁股坐在地上，直喘粗气。大家全都累坏了，一个个东倒西歪，喘个不停。

我举起望远镜，见一大群敌人已经冲进南管头。这时，陈家会方面也传来密集的枪声，可惜被西山梁挡住，看不见那里的情况。我估计一团一营赶到了，和敌人干了起来。但北管头方面枪声却稀稀落落，使人担忧和不解的是，一团二营不知出了什么事，至今不见一丝动静。

“金饺子，银饺子，从鬼子口中夺回来的宝贝饺子，吃一个可以长生不老！谁吃？慢着！要吃，得先向这盆饺子磕个头。”高鹏同志缓过劲来了，指着那盆饺子，得意地说。

我忍不住笑了：这老高，为了夺回一盆饺子，差点把命送掉！

同志们经历一场风险后，也感到饿了，高兴地从盆里抓起饺子。天气寒冷，那饺子已冻硬了，一口咬下去，噉哩喀喳，满是冰茬子，吃起来别有风味，又顶饿又解渴。

吃完饺子，我们迅速奔向上、下隘刹，以便及时弄清情况，对付敌人。我原以为，一团一营这时候肯定按分

区的命令，撤至上、下隘刹，堵住西进的敌人，掩护分区机关、直属队转移到慈家台。谁知我们到达上、下隘刹，才知道一营并未把任务弄清，在陈家会跟奔袭管头的日军打了一阵之后，一撤竟撤到刘家台去了。幸好敌人没有西进，否则慈家台也危险了。

更让人生气的是，昨晚二营并没有很好地执行分区的命令。他们只估计到敌人会从大良岗原路返回，而不注意我们提醒的敌人也有先向管头“扫荡”然后才向满城撤退的可能。结果，由于麻痹大意，警戒疏忽，他们在半夜行军转移时，竟与偷袭管头的日本兵走到一块去了。经过一场混战之后，才撤上了河西边的高山。

原来，狡猾的敌人趁昨晚夜黑天寒，从杜岗出发，利用流水声作掩护，悄悄绕过二营驻地口头，沿河边小路奔袭南管头。恰好，二营也正向南、北管头转移，双方在黑夜里稀里糊涂地混到一起。二营一个战士看到一个人在路边解手时，插进他们班的行列里，便问：

“你怎么搞的，走到这儿来了！”

那人一听，“嗷”的一声，把我们这个战士拦腰抱住。

这个战士生气地大声说：“好好行军，开什么玩笑！”

这下子，队伍里的敌人叽哩咕噜地怪叫着跳开了，端起枪就打。二营的同志一见不妙，在暗夜里与日军混战起来。

走在后头的战士们听到前面响枪，正要赶上去，却被

河边突然吐出的火舌扫倒了好几个。他们这才发现，日军早就把重机枪支在一座小庙旁的河岸上，人泡在冰冷的水里隐蔽好了。

二营长立即组织被敌人冲散的队伍，边打边向山上撤。好在他们地形熟悉，才没有遭到太大的损失。日军也因这场混战破坏了夜袭管头的计划。他们赶到管头时，天已大亮，我们已在两个小时以前将机关、直属队转移走了。敌人进占北管头，扑了个空，很可能以为我们南管头的人也撤光了，否则他们从西山梁上一个冲锋下来，我们这几个分区领导同志就危险了。

“沉重的教训！”我对高鹏和黄寿发同志说，“我们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不该提出多睡两个钟头，虽说是在根据地里，可敌人正在‘扫荡’，我们指挥员不该脱离部队推迟转移。今天早晨我们几个分区领导同志差点被敌人干掉，我应该检讨，吸取教训。”

高鹏同志点头道：“我们也有责任。”

我接着说：“第二个错误，是二营麻痹大意，没有很好地执行分区的命令，被敌人占了便宜。还有一营，未把任务弄清，也有教训吸取。他们能征善战，立过许多战功。可是，如果打了大胜仗就骄傲自满，麻痹轻敌，那么跟来的将是血的教训。听说二营一个马夫骑着骡子，跟敌人一直走到天亮，才发现前后都是敌人，结果被敌人用刺刀捅死了。麻痹到这种程度，还能不吃亏吗？！”

后来，二营长跑来找我，作了深刻检查。我们也把这个教训写进了战斗详报，供全分区同志牢牢记取。

偷袭的敌人，在南、北管头住了下来，我们便派出少数人在南、北管头四周活动，疲劳敌人，迷惑敌人。由于南、北管头周围都有我们的枪声，敌人弄不清楚哪面是我们的主力，不敢贸然行动，便四面防备，可日夜不得安宁。三四天之后，这股敌人也就灰溜溜地经满城返回保定去了。

可是，其余敌人仍在对一分区反复“扫荡”，寻找我们的机关和主力。

我带着司政机关和直属队沿着山边的大道，由北往南，一连行军数日，跃到三分区的唐县，等敌人追踪前去，我们一夜之间，又沿着百花山脚下一条捷径小道，再由南往北插回一分区，使敌人一连扑空。各部队也多次灵活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并寻机打击他们。

敌人在这一带反复“扫荡”，没捞到便宜，便转向其它地方去了。

重 返 娄 山

我带着司政机关从岭西回到南管头之后，我们对一九三九年历时四十天的反“扫荡”进行了总结，既充分肯定了黄土岭战斗击毙日本侵略军阿部中将的辉煌战绩，也深

刻检查了南管头被袭的原因，真可谓有经验也有教训。不久，我们分区机关和地委重新搬回了南、北、西娄山。

娄山地区是我们一分区群众发动得最好，抗日民主政权最为巩固的根据地之一。这一带物产丰富，市场繁荣，为了抗日，乡亲们什么都舍得。他们平时节衣缩食，从物质上支援我们，只要我们一出击，就组成运输队和担架队跟在后面。为了掩护八路军，他们在日军面前宁死不屈。

一次，日军冲进北娄山这个美丽的山村，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牲口就抢。村长刘宪章为给我们送给养，撤退得迟了一点，被一个从孟阁臣部逃出去投靠日伪的汉奸告了密，日军抓住刘宪章后，把他吊在一棵歪脖子树上，为了从他嘴里抠出八路军的去向，打听我们司令部的下落，日军用战刀把他额头上的皮割下来，野狼似地嗥叫着：

“说不说？”

刘宪章额头上鲜血直流，流得满脸都是，可他毫无畏惧，怒睁着两眼，破口大骂：

“你们这帮日本强盗！你们这群两条腿的豺狼！等着吧，八路军会来收拾你们的！”

日军无可奈何，又用乱棒打他，他还是那样，丝毫不屈服，直至牺牲。

这次返回北娄山，尽管村子被日军糟蹋得不成样子，许多房屋被烧掉了，但乡亲们仍热情地跑出来欢迎我们。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我们军民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斗争

经验也更加丰富了。我来到了司令部的旧址。往日那个漂亮的小庭院已经不存在了，留下的只是断壁残垣，连院子的那棵丁香树，也被烧成了光秃秃的焦木！剩下的两棵大核桃树，两棵常绿松树，树身上尽是刀痕。原来清澈见底、淙淙流淌的“民生泉”，也被敌人投下的污物堵塞了。

望着这一切，我不禁回想起曾在这个庭院里度过的那些时光。在这株丁香树和常绿松树下，我曾读过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的有关论著，读过古书；在这清泉旁边，我曾和高鹏同志坐在一起谈我们的童年，谈来到一分区后的感受，谈对未来的憧憬；在这被烧成一片焦土的屋子里，曾来过周巍峙同志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成仿吾同志率领的华北联合大学考察团，袁牧之、吴印咸和陈波儿同志率领的延安电影团，袁勃、张帆、沙飞、徐肖冰、石少华、高粮、刘峰、邵子南等前线记者和作家周而复、田间、程追^①等，还有一些民主人士以及汪洋率领的军区抗敌剧社的同志们；聂司令员第一次视察我们一分区的时候，也来过这里。随同聂司令员来的还有邓华、孙毅、唐延杰等同志。

我们重返娄山不久，罗瑞卿、罗华生和苏振华同志到了我们这里。老战友重逢，分外亲切。自一九三七年在陕北“红大”分手之后，我们已经两三年没见面了。我只知

^① 即罗丹同志。

“红大”改名为“抗大”之后，他们都留在那里工作，怎么又到晋察冀一分区来了呢？

经过交谈，我才知道，罗瑞卿等同志率“抗大”总校来到了晋察冀边区。他们这次来，一是想了解一下一分区部队的有关情况，二是想让我们给“抗大”支援一些物资器材。我满口答应了。因为我们一分区家底比较厚，前不久又在大龙华、黄土岭一带打了几个大胜仗，缴获了敌人不少物资。现在我们一团和三团全是日本装备。于是，他们开了一张清单，我们全都照办了。

他们住了一个多星期，骑上我们送给他们的骡子，高兴地离开了北娄山。临走时，罗瑞卿同志笑着说：

“希望你们打更多更大的胜仗，到时候我再来找你们这些‘财神爷’领战利品呀！”

初春的一个中午，我正在北娄山司令部里翻阅政治部编印的《工作通讯》，秘书陈子端走进来对我说：

“司令员，狼牙山上的棋盘坨老道下山来了。”

我心里一喜，连忙走到屋外，只见远处一位头戴道士帽、身穿黑白相间四方格道袍的老人，手挽一个柳条筐，在我们一位战士的指点下，正向我们司令部走来。

去年一月，我们解决了孟阁臣之后，司令部第一次驻北娄山，我曾在山路上巧遇这位从棋盘坨寺庙下来化缘行医的老道。开头他对我们持有戒心，我与他攀谈了一阵，

他看我们对道人尊重，很是高兴，便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从他口中，我得知他姓李，年逾五旬，出家十五六年了。他的师父姓曹，年轻时练就一身好武艺。清朝时，河南彰德府有一个官曾带人来找他师父学过艺，如今师父八十多岁，身体有病，不能下山，庙里尚有年轻道士数人。

从那以后，我与李老道交上了朋友。他时常来看我，不是给我们带点狼牙山上的苹果就是带点杏子，要不就是带点红薯。狼牙山上的苹果味道十分香甜，据说古时候是专给皇帝进贡的。老道在山上种的红薯也很好吃。他每次来，我也回赠他一些东西，同时也跟他扯些抗日的事。看得出，他是有爱国心的，对我们的抗日工作很支持。在反“扫荡”前，我们不少被服和装具送上狼牙山，都是在他热心帮助下坚壁到秘密山洞里的。在异族入侵，国破家亡的危急关头，连出家人也都挺身而出，毅然投入保卫中华民族的斗争，成了我们的亲密朋友，这是多叫人兴奋和感慨的事啊！

我们在门口迎接李老道。不料，管理科科长曹凌和警卫连连长吴炎却从另一边匆匆走来。

“司令员，听说李老道在反动军阀部队干过。”吴炎同志说，“我们的刺杀教员段廷起上午到棋盘坨取坚壁的刺杀防具时，他还主动提出和段廷起同志对刺呢！”

“我刚刚听说，我们坚壁在狼牙山上的一部分物资曾被前来‘扫荡’的鬼子发现了，他们正要烧，”曹凌同志疑

惑不解地补充道，“可那李老道不知怎么会讲日语，他跟日本人叽哩咕噜一讲，鬼子居然不烧了！你说奇怪不？”

我也颇感惊奇。

说话间，李老道已经来到了门口。

“欣闻贵军重返娄山，贫道特来叩拜杨师长！”李老道笑容可掬，声若洪钟。数月不见，他仍是貌古神清，胡须飘然，颇有几分仙风道骨。

我客客气气地请他进屋一叙。

“善哉！善哉！”李老道慌忙还礼，一撩道袍，进了一间我们专门用来接待客人的房间。我的警卫员用洋铁皮碗送上水来，李老道又是一番谦让，才坐了下来。我交待警卫员为李老道备饭，李老道说他已化过缘了，又“善哉，善哉”地客套了一番。

寒暄几句之后，我提到我们坚壁在狼牙山上的物资得到保护的问题，向他表示感谢。李老道一捋灰白的长须，正色道：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道者以善为本，讲道德，重礼义，爱护生灵，普渡众生。寇兵践踏我大好河山，涂炭生灵，焚烧我同胞衣物房舍，乃为道门所憎恶，天理所不容也！”

我含笑问他，何以能通晓日语。

他听后，两道浓眉轻轻一挑，淡淡地答道：

“贫道出家之前，曾学过一点日语，天长日久，早已

忘得差不多喽。见笑！见笑！”言罢，他捧起洋铁皮碗，低头喝起水来。

我看他不想多谈这事，便未继续询问。少顷，警卫员把几碟小菜与枣子酒端了上来，我们便吃了起来。

几杯酒下肚，我们都有点脸红耳热。李老道的话也慢慢多了起来。他端起酒杯，站起身来，侃侃而谈：

“杨师长身负国任，乃我中华真正英武之军人矣！贫道倾慕已久，今逢良机，特敬杨师长一杯！”

我说：“应该敬道长一杯——感谢道长对我们一分区抗日工作的支持！”

李老道一仰脖，把一杯酒全倒进嘴里，然后慢慢坐下，长叹一声道：

“不瞒杨师长说，贫道出家之前，与你一样，也是戎马中人。贫道曾在吴佩孚的部下任过营长，原想尽忠报国，后因诸多烦恼之事——谅我不能尽述，遂逃离红尘，来到这狼牙山棋盘坨庙堂，拜师出家，苦练修行，凄风冷雪，朝雾暮云，已有十五六年矣！”

说到这里，李老道深深地嘘出一口气，好象要把这些年来郁积在胸的闷气一吐而尽，又啜了一口酒，转而慷慨激昂地说：

“贫道既已出家，本不应问世俗之事，皆因日寇入境肆虐，令人发指；而八路忠勇抗击，以血肉之躯护民报国，与诸国军有天壤之别，不由贫道赞叹不已，时常忆及少年

时从军报国之梦。可叹本人已入道门，年逾半百，故只能为贵军做些小事，聊表寸心！”

原来，这位李老道协助我们在狼牙山上坚壁了大批物资之后，日军来“扫荡”，从一个山洞里搜出了一部分被服，数量不不小。日军因找不到我们的有生力量，十分恼火，正要点火烧掉这批物资时，忽然李老道说着日语出现了。日军做梦也没想到，狼牙山上会冒出一个会讲日语的道士。日军本来就很有些迷信思想，李老道又大讲山上的忌讳，居然把日军给支走了，那批物资一点也没受损失。

今天上午，我们的刺杀教员段廷起同志带着警卫连的几个战士上狼牙山，准备取回由李老道帮助坚壁的酷似古代盔甲的刺杀防具。当他们在李老道指点下从一个石洞里搬出这些东西时，李老道颇感兴趣地问：

“请问贵军，取此物何用？”

段廷起同志并不了解李老道的底细，而李老道也不知道段廷起同志是八路军的刺杀教员。段廷起同志告诉他，学刺杀时穿上它可以保护身体，免被误伤。

不料，李老道忽然挺内行地问：

“请问贵军，练的是华刺还是东洋刺？”

段廷起同志一愣，方知老道有来头。当时，我们并不按国民党的那一套刺杀方法来练习，而是把日本俘虏教育好后，再请他教我们练刺杀，所以段廷起同志回答说，学的是东洋刺。

李老道笑了笑说：“依贫道看来，他那个东洋刺就是一个突刺，别无花样，毫无用处！”

段廷起同志认真地回答：“总是有些用吧，要不上级不会叫我们学这个的。”

李老道可能又忆起了少年时期的“从军报国之梦”，一时心血来潮，竟主动提出要与段廷起同志“对刺一番，领教领教”。

段廷起同志有点犹豫，可是几个战士在旁一个劲地起哄，他便爽快地答道：

“那好吧！请道长穿好防具。”

这下子，可把几个战士看呆了，只见李老道把道袍一脱，熟练地单腿一跪，挺内行地按顺序穿好刺杀护具。随即，他握着木枪站起身，走到也穿好了防具的段廷起同志面前，按军阀部队的规矩行了个礼。段廷起同志还了个八路军军礼。于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刺杀，在狼牙山上开始了！

李老道虽然出家年久，但是全身一披挂，把刺杀木枪双手一握，虎气生生地拉开架式，旧军人的凛凛威风犹在。几位战士看他这副模样，不禁为年轻的段廷起同志捏一把汗。

段廷起同志心里明白，这位老道有功底，不能轻视，便端枪与老道对峙着，动着脑子，李老道还挺有点狼牙山主人的味道，亮开胸部来个“大敞门”，说：

“请先上吧!”

段廷起同志晓得这个“大敞门”是个圈套，说了声：“对不起，我就不客气了!”猛地一个虚刺，李老道上了当，防了个空，段廷起同志疾速地来个突刺，把李老道一家伙刺了个四脚朝天!

段廷起同志慌忙把木枪一扔，双手把李老道扶起来，连声说：

“道长，实在对不起，我太冒昧了!”

李老道脸不红，气不喘，若无其事地爬起来，要求继续比试。段廷起同志只好又与他来了几个回合，不一会，又把他刺倒了。李老道这下才认输了：

“贫道不行喽，眼睛看不清了!你刺杀本领甚为高强，善战!善战!”

段廷起同志忍不住笑了。

几个战士对李老道会刺杀感到很奇怪，可是刚问了个头，李老道就把话岔开了。段廷起同志和战士们只好谢过李老道，背着防具下山。在山坡上，一个战士碰到一位打柴的老乡正是东西水村的，原来就认得，便向他打听李老道的情况，这才知道李老道出家前曾当过军阀部队的营长，可是从未发现他出家后干过什么坏事。回连队后，那个战士跟吴炎同志一讲，吴炎同志心里不踏实，他发现李老道也下山来了，便赶紧跑来跟我讲了那些话。

现在，事情弄清楚了，这位李老道并不是什么坏人，

而是一位很有个性的宗教界人物！

我和李老道越谈越亲近，从古易州著名的十景^①谈到易县城隍庙旁，从槐树里长出一棵枣树的“槐抱枣”；从城东门那棵传说是孙臆拴牛的老槐树，谈到西陵后面传说孙臆与庞涓向鬼谷子学兵法的乳水洞；从易县东北穆桂英的点将台，谈到荆柯刺秦王的悲壮故事，以及抵御外敌入侵的巍巍内长城。

“这里确实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啊！”我感慨地说，读了一些古书，我发现，三国时曹操远征渤海，东临碣石，易县曾作为他战时的留守基地。明朝外寇入侵，不是从居庸关那里进来，而是从蔚县、涞源迂回过来，然后过易水河，占紫荆关，长途奔袭北平的。我还听说，八国联军进占北平后，也到了易县紫荆关。

“杨师长所言之事，贫道也略有所闻。”李老道显得很高兴，说，“贫道师父曾言及：唐朝时，有一刘氏以狼牙山为根，招兵买马，与李世民作对，李世民花费了很大气力，方将刘氏的兵马一举剿灭。”

听到这里，我心想，我们早就计划要到狼牙山去看看地形，即对李老道说：“过些日子，我一定抽个空，上狼牙山去看看。”

李老道喜形于色，说：“贫道欢迎杨师长大驾光临，并

① 易州十景，即：太巍烟岚、洪崖积雪、孔山星月、狼山竞秀、紫荆残月、易水秋声、雪溪春涛、吟台夕照、侯台清晓。

愿效犬马之劳，陪同勘察！”

酒足饭饱，李老道留下一筐苹果和核桃，乐滋滋地告辞了。

傍晚，我与宣传科长史进前同志在北娄山的大操场上散步，他停住脚步，望着晚霞飞飘的狼牙山巅，充满诗意地说：

“司令员，你注意到没有？狼牙山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山的颜色一天到晚都在变。早晨，太阳出来之前，狼牙山是深蓝色的。太阳一照，狼牙山就变成紫红色的了。正午，整个山峰金光闪闪。夕阳西下，整座山又变成玫瑰色的了。”史进前同志是政治部出名的活跃分子，年纪二十一二岁。前年底，我在阜平的董家村第一次碰到他时，听人说他嗓子好，就请他唱首歌给大家听听。他非常爽快，唱了一首电影歌曲，名叫《古罗马的城头》，歌声洪亮、浑厚，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今日，他的这番谈吐，显露了他对狼牙山的一片深情和观察的细致。

我说：“等天气暖和一些了，咱们上狼牙山去看看，好吗？”

“真的？”史进前同志高兴地说，“那我再找个会照相的同志一起去！”

“行！我们上去以后，先请棋盘坨的李老道给咱们介绍介绍，然后再请他领咱们转一转，以便仔细地看看地形，准备一下战场。不过，到了山顶上，你可得放声唱一支歌

呀!”

“没问题!”史进前同志高兴地说,“司令员,到时候把那只缴获的日本大洋狗带上行吗?”

“行!”

.....

踏勘狼牙山

进入一九四〇年春天,我们有一段时间比较安定,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段时间的安定是相对的、暂时的,因为毛主席已经发表谈话,宣布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我们对相持阶段的到来,一方面为形势发展这样快而感到由衷地高兴,另一方面也担心敌人从正面大量地调兵力来“扫荡”敌后。这时,整个晋察冀边区军民都在抓紧时机,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部队也开始了政治整军,并作粉碎敌人更残酷“扫荡”的各种准备。

踏勘狼牙山,是我们分区计划要进行的准备工作之一,因为狼牙山方圆数十里正处在我们分区的腹地,分区的部队无论是出击或据守,都和它的地形密切相关。因此,把狼牙山的地形勘察一番,地形适当改造一下,作出一些未来反“扫荡”的设想和作战预案,是很必要的。而我们在击毙日本侵略军的“名将之花”后,能抽空去一览狼牙山春色,的确也是一大快事。

正是春深似海时，我们从北娄山村出发，前去踏勘狼牙山。

同行者中，有副司令员高鹏，组织科长黄连秋，管理科长曹凌，宣传科长史进前，地委书记王国权，地委组织部长赵凡，摄影记者刘峰，以及全副武装的警卫班战士们。史进前同志真把一条从日本侵略军手里缴获的大洋狗带上了。

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心情格外舒畅。高鹏同志的话最多，黄连秋同志与他一呼一应。他俩一个胖，一个瘦，凑到一块，真是“相映成趣”了。高鹏同志素有“百事通”的美誉，一扯起天南海北来，总是滔滔不绝。黄连秋同志的业余爱好是烹调，最拿手的是做“香酥小狗肉”。曹凌同志背着一个装食品的布袋和一壶酒。过去，各团的干部到分区司令部来开会，如果伙食不好，曹凌这个管理科长就躲得不见影子。如果他在场，那么，就准有好吃的。日子长了，团里干部也都晓得这个规律，一开会就“老曹，老曹”地叫个不停，缠着他，不让他脱身。今天我们爬狼牙山，不知他那布包包里装了什么好吃的，他不宣布，谁也不问，都等着到时候看他的“戏”。

曾在日本留过学的王国权同志，边走边和我议论着狼牙山在军事上的价值。警卫班的战士们一路上兴奋地谈个不停，惊叹这里到处都是打埋伏，消灭敌人的好地形。

狼牙山确实是幽奇高峻，危峰迭起，状如万柱狼牙抵

天。我仰头望那巍巍峰顶，只见蓝天中一朵朵白云飞快地掠过，竟使人觉得那险峰似乎在不停地向后倾倒。那山径宽不盈尺，藏在荒草杂树和乱石之中。多年征战中，我虽然踏过不少名山大川，但在这里，倒也需要步步在意。

爬了半天山，我们都已汗流浹背了。可是那古松、清泉、危石、绝壁……变幻不绝的地形地物，使我们忘了饥渴和劳累。过了险峻异常的“阎王鼻子”，一阵单调的木鱼声随风飘忽而来，眼下一峰高耸，正是远近闻名的棋盘坨。

棋盘坨旁，依山势建有一座不大的寺庙，我们刚刚步入山门，诵经声便戛然而止。

“贫道已恭候多日，今日诸位光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李老道快步出门，笑吟吟地施礼说。

我赶紧说：“我们上山来看看，一定打搅你了，请道长多多原谅！”

“善哉！善哉！”李老道乐呵呵地答道，伸手牵着我，把我们引进寺中。

我环顾四周，只见里外空敞，并无他人，十分诧异。

李老道目光一黯，低声说：

“师父不久前寿终升天，徒弟们在这几度日清苦，打熬不住，散去了。”

我敛去笑容，点了点头。

“请诸位喝碗水，稍歇片刻，贫道再领诸位到狼牙山各处走走。”李老道从寺庙旁边的山泉里汲来一桶水，给我

们每人斟满一碗，端上说，“棋盘坨上的这口泉，泉眼虽小，水却清甜爽口。”

我们谢过，端起碗来一饮而尽。真解渴呀！早晨从东西水一直向上爬约十五里，我们只喝过一点小米稀粥，是该吃东西了。这会只听到坐在我身旁的曹凌同志喊道：

“首长，同志们……”

黄连秋同志马上抢过他的话头，学着他的腔调说：

“今天伙食不好，请别见怪！”

大家“轰”的一声笑开了。

我把手伸进曹凌同志的布袋里，摸出一张焦黄喷香的烙饼，放到李老道手中，请他也尝一尝。

曹凌同志在赞扬声中高高兴兴地把烙饼分给大家，得意地宣布：

“每个人还可以分到一口酒，注意，只有一口啊！”

吃罢饭，李老道领我们走到寺庙后面的孙祖洞，又去看了看棋盘石。那里地形险要极了。

李老道向我们介绍说，棋盘石有两块，分为上棋盘和下棋盘。下棋盘是人工凿的，至于是哪个朝代所凿，不得而知。上棋盘是天然形成的，那块巨石上有许多格子，酷似棋盘，棋盘边有一株松树。民间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孙膑与五蟬老祖王敖在此下棋，王敖对着那块凹凸不平的巨石吹了一口气，石头马上变得平展光滑了。孙膑伸出手指一划，石头上就出现一条条沟槽，成了棋盘。两位仙翁

又信手拈来小石子往那棋盘上一放，那小石子就变成了棋子。有个入山打柴的樵夫，看到两位老人兴致勃勃地在那里下棋，便好奇地站在旁边观看。不料，棋盘石旁边的树叶子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不停地变换着颜色。待到黄昏，这个樵夫下山回村，竟惊异地发现满村皆是生人，没有一人是他认得的，也没有一人认得他。一打听，方知九十九年前，村中有位樵夫上狼牙山打柴失踪。从此，有着棋盘石的山峰便被人叫做棋盘坨。

李老道刚说完，高鹏同志便哈哈大笑：

“来，来，来！让我们都到这块棋盘石上呆一会儿，等我们下山时，要是看到北娄山村里全是生人，晋察冀和全中国早已把日本鬼子赶走了，伟大的抗战胜利已载入史册，共产主义也已经实现了。岂不快哉！”

我们全乐了，连李老道也捋着长髯琅声大笑。史进前同志牵着那只洋狗，头一个蹦上棋盘石，他搂着狗卧在棋盘石上，说：

“在这儿老实呆一会儿，说不定你会变成一只仙犬呢！”

刘峰同志打开照相机盖子，笑道：

“你们都上棋盘石去，我来给你们留张‘仙影’！”

大家欢呼一声，全都跳上去了。我挽着李老道，邀他一块合影留念，大家也一再催促，他却客气地推辞道：

“贫道丑陋，怎敢与诸位合影，告免，告免。善哉，

善哉!”

我只好作罢，站上棋盘石，与我们的同志合影。

“诸位请看，那是仙人洞。”李老道领着我们往前走了一段路，指着一团白云说。

我们定睛望去，不禁击掌称奇：悬崖峭壁上隐约可见一个洞，从洞口竟然不停地冒出一股悠悠翻卷的白云来，真象有那么一位大仙在里头往外吹气似的。

李老道接着又说：“狼牙山上有许多秘洞，藏人藏物皆不易被发现。”

“哦!”我想，狼牙山真是个藏兵卧马的好地方，我们应该利用它来与敌周旋，这些千奇百怪的天然洞穴岂不就是敌人的葬身之地么。

李老道又领着我们来到“饮虎泉”畔，他告诉我们，从前狼牙山上有老虎，黄昏时便到此饮水，饮饱后静静地蹲在泉畔，人们从山下往上望，那虎在夕照晚霞中披着一层绚丽的光彩，显得十分威武。

“这狼牙山上，有许多奇怪的名儿。”李老道说，“什么‘阎王鼻子’、‘小鬼脸’、‘鬼见愁’、‘神仙桥’等，皆因山之险峻、径之崎岖而得名。而‘大莲花瓣’、‘一线天’、‘牛角壶’、‘通天顶’、‘鬼舌头’山，则道出峰峦之高绝陡峭，千姿百态。”

李老道的话一点不假，狼牙山又名朗山，从大处来说，它属于太行山脉，从小处来说，则属于五台山支脉，位于

平汉路以西，易水河南面，东西走向一百多里，南北走向六七十里。从远处遥望此山，一排险峰直刺青天，酷似狼牙。《水经注》谈到它时，说它“如鸟翅”、“如剑戟”，以状其险。此刻，我们置身于险峰之上，俯视万丈深渊，不禁有些心悬，而极目雾里群峰，杳无尽处，则令人神动。

听李老道说，山的西北方向还有个寺庙叫老君堂，住着一位八十多岁的道长，名叫石海中。此人会武功，性豪爽。而此山的东面是姑姑坨，上面有座尼姑庵，抗战前有四五十个尼姑，现在恐怕所剩无几了。

站在狼牙山巅，纵览群峰，远眺易水、保定城和平汉铁路，千里古战场尽收眼底。一种庄严神圣的感受，使同志们沉思默想。我摊开军用地图，对照着，比划着，激动地思索着：狼牙山东面是一片平地，一直伸展到平汉线，西北边有九莲山和一溜十八岗，北面是易水河和通往战略要地的紫荆关，西南边是满城、保定。我们只要占据了狼牙山，在军事上来说，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攻的话，一夜能直捣保定、徐水、定兴、高碑店，甚至还可以此为根据地，一直攻到北平；守的话，可在棋盘坨、仙人洞等地设伏，在“鬼见愁”、“阎王鼻子”等处打阻击，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

猛然，我想起《水浒》中宋公明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祝家庄修有盘陀路径，宽窄不等，死路与活路相杂，不察内情者往往误入绝境，真可谓“好个祝家庄，尽是盘陀路。

容易入得来，只是出不去”。宋江攻打时由于情况不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了几次也没打下来。眼下狼牙山地形如此险峻，除两条羊肠小道能分别通往棋盘坨和姑姑坨、一条沟能通老君堂之外，别无它途。如果我们派部队和民工在这狼牙山和九莲山一带，环绕各座山峰，修上几条秘密的盘陀路，让其隐蔽在怪石与草木之中，与原有的小径相接，那么打起仗来，我们就可以神出鬼没地痛击敌人，而敌人则不得不晕头转向，那该多好啊！倘若我们再在狼牙山与其它主要山峰架上电话线，如同“飞线”一样，叫敌人想破坏也破坏不了，再设置一些秘密观察所，收集情报，我们岂不是就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更有利于作战么。

想到这里，我特别振奋。下决心发动群众对狼牙山的地形进行改造，并在这一带架上“飞线”，设立观察所等等，这是我们这次踏勘狼牙山所得到的最大启发和收获。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我正想着，忽听史进前同志领头高唱，那歌声象一把火，点燃了我们沸腾的感情。我们全都情不自禁地放声唱了起来：

看吧！

千山万壑，铁壁铜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

豪壮的旋律，燃烧的音符，飞入深涧，飞向远山。

“我们就在这里打个齐射，预祝抗日战争的胜利吧！”
高鹏同志提议。

我们便从枪套里拔出了手枪，指向空中，警卫班的战士也一齐举枪。同志们高呼：

“打到北平去！”

“打到鸭绿江去！”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抗战胜利万岁！”

.....

砰砰砰砰.....

枪声响了，大洋狗被吓得蹦了两下，与此同时，刘峰同志捧着照相机，“咔嚓”一声，抢下了这个镜头。我发现，站在一旁的李老道那庄重、枯瘦的脸上，悄悄地淌下两行激动的热泪.....

敌后的检阅

一九四〇年以来，日本侵略军在加紧对我根据地“扫荡”的同时，加紧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诱降。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日妥协投降的危险日益严重。我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任务更加艰巨。

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鉴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发出了政治整军的指示。据此，我们一分区轰轰烈烈地进行了两期五个月的整军，一期政治整军，一期军事整军。这期间，一团奉命南征反“摩擦”，到晋东南讨伐军阀朱怀冰。全分区各项工作也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达到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以来的高峰。

为了检阅力量，鼓舞党政军民的斗志，迎接更加尖锐复杂、更加艰难困苦的斗争，我们决定在五月三十日召开一个以检阅军、政、文、体全面训练成绩为目的的运动大会。

运动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是罗元发同志，副主任是史进前和李清川同志。会场设在北娄山大操场，操场跑道幅员足有六百米，场内军事体育、田径、球类设备，应有尽有。操场的西、北、东北都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柿子林。柿子树生长在狼牙山麓的丘陵地带，一层比一层高。狼牙山奇峰突崛，直插云霄，好象一副依天插地的万里屏风环抱着我

们。我们的部队每天朝阳喷薄时在这操场上操练，夕阳西下时在这操场上打球、游戏，和这壮丽的江山融合一起，真是令人心旷神怡，斗志旺盛！

用木板搭起的阅兵台上方，横挂着“五·卅运动大会”红色会标。大会设置军事、政治、文化娱乐、体育、生活检查、巩固部队、日伪军工作以及总优胜八面优胜锦旗。锦旗悬挂在阅兵台上，分外引人注目。阅兵台两侧的柿子林中，用芦席搭起大棚子作为“战利品展览馆”。操场附近每一棵柿子树上，都插着一些红红绿绿、写着标语口号的小纸旗。

在操场西北方向的柿子林的一块高地上，建了一座六角形的烈士纪念碑，足有八米高，上书“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抗战牺牲烈士千古”，分外庄严、肃穆、美观，这是我们分区文化宣传干事李直同志的杰作，他是北平美术专科学校的学生，也是我们篮球队的“健将”。

战线剧社书画队的曹振峰等同志为配合运动大会画的宣传画和漫画，布满了会场周围房屋的墙壁。

为了迎接这次运动大会，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钱丹辉、魏巍、彭彭^①、蔺柳杞等同志负责编印的《文艺轻骑》和《诗战线》还出了专辑，并印发了不少诗传单。

五月三十日，太阳刚刚出山，北娄山大操场上渐渐聚

^① 即彭正谟同志。

满了乡亲。为了观看阅兵典礼，一些小脚老太太也在亲人的搀扶下，颤巍巍地走了好远的山路，满心喜悦地赶到这里。孩子们笑啊，跳啊，不停地唱着抗日歌曲。妇救会员忙着为阅兵部队烧水。民兵们扛着枪，与部队战士并肩站岗，严密地警戒着保定方向的敌人。

我和高鹏、黄寿发、罗元发等同志陪同来宾走上了阅兵台。参加检阅的有地委和专署的王国权、李耕涛、牛树才、杨士杰、梁正中、白文治等同志，还有各县县长和县委书记，开明绅士卢泽洲，满族代表李覆英，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卢连甫也到了场。

上午八时半，史进前同志告诉我：

“一切准备就绪。”

我说：“开始吧！”

蓦地，一阵惊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军号声响彻会场，以数百名号兵为前导的部队，全副武装，一式三八大盖，气宇轩昂，迈着整齐的步伐入场了！

勇敢的行列，
勇敢地行进，
大兵团在敌后成长，
控制着敌人的心脏。
我们来自田野，
个个英勇顽强，

为了明天，为了幸福，
冲杀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

歌声豪壮有力，伴随着整齐的脚步，震撼着全场人的心。我跳上预先备好的骏马，进入广场之中。

“一——二——三——四！”阅兵指挥李清川扯开嗓门，朝队伍喊起了口令。

数千名战士跟着吼了起来：

“一——二——三——四！”

声音象打雷似的，围观的乡亲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一分区已经由一个一千七百多人的独立团，发展到最多时已成近两万人的武装了。经过五个月的整军，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大大增强。

一分区的子弟兵坚守着晋察冀军区东北面的大片土地。

阳光在刺刀尖上闪耀，铁流般的受阅队伍从我们主席台前通过。他们目光炯炯，正视前方，步伐有力，气势雄壮。乡亲们渐渐安静了，敬佩地望着他们，许多人眼含泪花。

阅兵式结束后，大会紧接着举行了祭奠阵亡烈士的仪

① 敌人伤亡在十名之下的战斗未统计在内。

② 一团在团山战斗中消灭日军一百多人，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粉碎了敌人的雨季攻势。

式。抗战三年来，一分区全体指战员在党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军区聂司令员的正确领导下，在兄弟分区的大力支持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坚持华北抗战，创建与巩固了抗日根据地。我们历经大小战斗二百一十一次^①，取得了腰站、冯家沟、浑原、紫荆关、王安镇、东西庄、大龙华、团山^②、雁宿崖、黄土岭等战斗的胜利，给了凶残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计毙伤敌人九千七百八十多名，击毙了日本侵略军“名将之花”阿部中将。

然而，我们一分区指战员也有一千五百四十七人壮烈牺牲，其中共产党员占半数以上。阵亡的团、营干部，都是我所熟悉的战友：在腰站战斗中被敌人子弹击中胸部的张文松同志，在“野三坡”遭土匪伏击而牺牲的张襄国同志，在塘湖战斗中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邓南风同志，还有葛明远、张梓华、钟蛟蟠、张濯生、周振国、张岐秀等同志。想起他们，我的心情格外沉重。

在祭奠仪式上，我说：

“凡我将士碧血所流到的地方，直接唤醒了千百万的同胞毅然决然地挺起胸膛参加抗战。烈士们虽为祖国为民族尽忠尽职，疆场捐躯，但他们光荣的名字，却将永远遗留在人间而长存不朽。”

同志们想起牺牲在各个战场上的战友、兄弟，激起了对敌人的仇恨，发誓要为烈士报仇，斗志更加高昂。一份

书写着一百三十九名阵亡干部姓名的《烈士芳名录》，端端正正地贴在主席台上。我们全场人员向它三鞠躬，然后默哀。

参加大会的所有人员，都相继前往瞻仰烈士墓。向烈士宣誓，要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乡亲们为祭奠八路军英烈，还以各种方式来寄托自己的哀思。

我陪同来宾走向战利品展览馆。为了用实物来表明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功绩，以还击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诋毁，各团都把在战斗中缴获的敌人武器、装备，选出一部分送来展览。

展览馆门前的柿子树上，拴着我们缴获的高头长鬃的东洋战马。旁边，还停放着一辆日本坦克，那也是我们的战利品。

展览馆内芦席墙上，贴着许多嘉奖令，都是冯家沟、大龙华和黄土岭等战斗后，上级发给我们的。接下去，是一大片各式各样的贺信、贺电，有兄弟部队发来的，也有各抗日团体和民主人士发来的。另外还有抗战三年来我们歼敌人数和缴获战利品的统计表，有日军驻涞源警备司令部小柴司令写给我的信，以及我们的复信抄件，这两封信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还有一封《未收复区同胞的慰问信》，也使大家读了又读。那信上写道：

第一军分区杨司令员钧鉴：

近来冷风时作，大雪纷飞，天气骤寒。钧座仍率领诸勇士冒寒抗战，这种为国家为民族艰苦奋斗之精神，实令人钦佩异常。反观吾等身处家中，受日寇压迫，不能赶赴战场，为国杀敌，对于“青年”二字，实觉有愧，但吾等并非忘了祖国，甘做亡国奴，实为情势所迫，未能如愿，今吾等村长、教员、小学生等谨将日常生活费用节省之数（共七元）贡献钧座慰劳诸战士，聊示吾等爱国微忱，区区之数，尚祈查收。不胜荣幸。专此顺请勋安。……

除了这一类的慰问信外，还有彭真同志为我们一分区群众性的诗歌创作组织“铁流社”的题词等，也都贴满了墙壁。

山炮、九二步兵炮、掷弹筒、轻重机枪、步枪、短枪、电台、电话机、地雷、望远镜、手榴弹，还有饼干、罐头、药品、军装等战利品，摆满了展览馆。

我看见一名来参观的战士伏在一门缴获的山炮上哭泣，不由得一怔。我上前一问，才知道，为了缴获这门炮，他的班长带领全班战士浴血奋战，与敌人反复争夺，最后，敌人被击溃了，班长欢呼着跑上前去，摸了摸这门炮，可正在这时，倒在大炮底下的一个日本伤兵偷偷地爬起来，

端起刺刀猛一刺，班长猝不及防，倒下了。战士看到这一情景，发疯似地冲上前去，朝着那个日本兵连打数枪。日本兵脑袋开了花，可班长已经倒下牺牲了……

摆在这个展览馆里的每一件战利品，都是我们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些从敌人手中缴来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表明了八路军积极抗战，战果辉煌，连国民党易县县党部的代表卢连甫，也连连称赞，频频点头。

看到这些展品，我不禁想起了今年三月间来过一分区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公朴先生为了向全国人民介绍八路军的抗战伟绩，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敌人重兵把守的同蒲路，到达华北敌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考察。公朴先生身穿八路军军服，蓄着黑亮的长须，一到北娄山，就谈笑风生地握住我的手说：“好一个白袍小将！”我请公朴先生吃饭，与他同住一处，有时坐在泉边聊天。他仔细地向我了解一分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运等方面的情况，还询问过我的家庭情况。我告诉他，自从我参加长征之后，就与闽西老家的父母失去了联系。

公朴先生听了这件事，很是感慨。他临走时，对我们一分区各项工作给予很大鼓励。他建议我，在可能的情况下，把战利品摆出来展览展览，用事实来批驳那些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家伙。他说：

“我要把你们这些战斗在晋察冀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伟大创造和音容笑貌，传达给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我

要告诉他们：华北是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

如今，我们搞起了战利品展览馆，还开了规模盛大的运动会，遗憾的是公朴先生已经走了，要不，他看到这么多战利品，不知要有多高兴呢！

更为振奋人心的是大会的比赛和表演。由于处在战争环境，要防止发生突然情况，各团只派了一个连队作为代表来参加比赛，可那水平都是呱呱叫的。无论射击、投弹、刺杀、爆破，还是越障碍、土工作业、战术表演，都博得了人们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跳木马、单双杠和着装比赛，使人们看得眼花缭乱。

与此同时，从各团抽来的几十名营级干部，在另一处树林中接受政治学习测验。在当时以作战勇猛闻名，后来在大棚营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刘万里营长，这时也象小学生一样，涨红着脸在回答什么叫“持久战”，什么叫“相持阶段”。干部的政治水平，在前一段整军中曾得到普遍提高。

篮球场上围的人更多。我和高鹏及参谋周自为、郭猛子等人组成的篮球队也上场了。我们赢了三团，却输给了五支队。记得，我们一分区的篮球队在一九三九年晋察冀军区成立二周年的体育比赛中打了个冠军之后，贺龙同志带着一二〇师的“战斗”篮球队来了，他说：

“好哇，让我们和冠军队赛一场！”

大家都知道，贺师长的“战斗”篮球队是一支篮球劲旅，他们篮球队里的那个刘营长曾经是北平师大五虎队的

队员呢！我们要取胜，看样子很难。可是，贺师长说话了，聂司令员也点头同意了，不比赛一下，又不礼貌，只好比。

说来也巧，正当双方队员准备上场的时候，军区突然通知：日军又来“扫荡”了，大家立即各就各位，准备战斗。结果没有赛成。

在运动大会期间，分区战线剧社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这些节目都是剧社的同志自己编的，不仅为大家所喜爱，而且使大家受到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对日伪的腐朽文化起了有力的抵制作用。

运动大会的比赛结果公布了。最出人意料的是五支队，他们虽然出了赵玉昆叛变投敌的事，部队震动很大，但是我们主要从教育入手，引导广大干部、战士揭发、批判赵玉昆的罪行，所以五支队军心稳定。加之部队进行了整军，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大大增强。原来有些人以为五支队不管怎么说，无法跟老部队相比，各方面可能差距较大，因此，对他们的比赛成绩不抱什么希望。但在第一天的阅兵中，五支队的步伐特别整齐，精神面貌非常之好，给人印象很深。比赛开始后，五支队所属的二十五团和二十六团相继夺走了军事项目的好几个第一，篮、排球比赛的第一名也分别被他们的支队部和二十六团夺走了。最后，八面优胜旗被五支队得了三面：二十五团是生活检查优胜和日伪军工作优胜，二十六团是文化娱乐优胜。

闻名于一分区的邱支队——游击一支队因为远离分

区，在察南险峻的群山中坚持斗争，无法前来参加运动大会。支队长邱会奎同志便派了副官张珏胜同志为代表来出席大会。在会上，我提议说：

“邱支队自成立以来，同日寇、汉奸顽强斗争，守卫着晋察冀军区的北大门，胜利地完成党和上级交给的任务，也进一步壮大起来了。我们应该表彰他们，给他们发一封慰问信。”

同志们纷纷表示赞同。于是，运动大会通过了给邱支队的一封慰问信，分区司令部、政治部还奖给他们一面锦旗，上写“灵活机动的邱支队”几个大字，由张珏胜同志带了回去。

运动大会结束了。同志们和广大群众通过参观、检阅，增强了胜利信心。民主人士们则纷纷表示：中国抗战胜利有望，要积极支援八路军，以驱逐日寇，还我河山！

正太之役与 日本孤女

顶着仲夏烈日，我又来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

军区司令部设在阜平县一个不显眼的山村里，只有走进院落，穿过几株高大的槐树，望见从屋脊上隐蔽地伸出的天线和电话线，才会明白这是军事指挥部。

我奉命急急赶来，是为了参加军区高级干部会议。在

这次会议上，聂司令员宣布：

“八路军前方总部发布了战役命令，晋察冀军区将与冀鲁豫军区、晋绥军区一起，对全华北敌人占领的交通线及其沿线城镇据点，发动大规模的破袭战^①。我们晋察冀军区的任务是：负责破袭正太路石家庄至平定段，破袭重点为娘子关至井陉煤矿段及其两侧地区，并且对平汉路、北宁路、津浦路、石德路、沧石路等铁路和公路线段进行广泛破袭，以阻止敌人向正太路增援！”

“好哇！”到会的各军分区的领导同志都惊喜地轻声欢呼起来，这可是抗战以来，八路军发起的一次最大的破袭战役啊。”

一九四〇年，正是国际法西斯最猖獗的年头，在西方，希特勒用“闪击战”打垮了欧洲许多国家，气焰嚣张，睥睨全球。在东方，暴戾的日本帝国主义，正把越来越多的兵力投入对华战场。他们计划八月拿下西安，控制西北交通，进而攻取昆明、重庆，企图以全面的军事攻势，迫使中国投降，同时打击英美在远东的势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独霸亚洲。而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投降的情绪也日趋严重，在他们那里，笼罩着一片对战局悲观失望、妥协投降的气氛。在阴云四合之际，八路军却要在敌后数千里长的战线上进出大破袭的闪电。正如八路军总部的战役命令

^① 指后来被人们称为“百团大战”的正太战役。

所说：

“在华北战场上展开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的计划，创立显著的成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军民，争取时局好转。”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参加了战役的研究工作。军区司令部聂鹤亭参谋长和我们一起研究制定作战计划。

聂鹤亭是位老同志，南昌起义时就是排长了。他对司令部工作很有经验。作战计划制定出来后，很快得到八路军总部批准。

在破袭战的第一阶段——正太战役中，晋察冀军区将调集十八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又两个骑兵团、三个炮兵连、一个工兵连和五个游击支队，分别组成三支主力纵队、一支牵制部队和一个总预备队，担负主要方向的作战任务。

在三个主力纵队中，左纵队总指挥是四分区司令员熊伯涛同志，他们负责破袭微水到获鹿的地段；右纵队总指挥是二分区司令员郭天民和四分区政委刘道生同志，他们负责破袭娘子关至平定、阳泉一带的地段；中央纵队总指挥是我，纵队主力有三个团：三分区的二团、一分区的三团和冀中军区的十六团。我们负责破袭娘子关至微水段及其两侧，以井陉煤矿为重点。军区要求我们以飞兵突袭的方式解决战斗，如突袭不成，则强攻克敌，务必制胜。

正太路沿线敌人的驻防情况是：守备东段井陉到石家

庄两侧地区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旅团长是水原义重少将；守备西段娘子关到寿阳一带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旅团长是片山省太郎中将；守备太原、榆次地区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敌人在铁路沿线的大小城镇、车站、桥梁、关隘、隧道和矿区，都构筑了碉堡群。碉堡之间有交通壕相连，周围设有铁丝网、外壕等障碍物，火力交叉配置，可以相互支援。

在军区高干会议上，聂司令员指示我们：这次破袭战是在很长的战线上进行的广泛攻坚战，为达到预期战役目的，一定要在战前进行充分准备。我立即将聂司令员的指示传达给各参战部队，要他们抓紧战前的时间，隐蔽地侦察敌情，进行攻坚作战的训练，准备爆破器材，印制对敌宣传品，建立兵站，贮存粮秣，进一步动员群众，准备打仗。

八路军总部规定了正太战役发起攻击的时间，并秘密下达给我们。它是：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二十二时。

吃罢早饭，我和随行人员骑着战马离开阜平，沿着山谷小道直接驰向井陉，开设前方指挥所。在军区时，我已向各参战团队下达了行动命令。此刻，他们也正在向正太路运动了。

途中，我们先到达四分区，在滹沱河北面西柏坡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住了几天。在那里，我与三分区的二团、一分区的三团和冀中军区的十六团都沟通了联系，了解到部队经过半年的整军，战斗情绪相当高，在

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战前准备工作都做得很充分，很出色。我把破袭花芦岭到获鹿一线铁路的任务交给了三分区二团团长肖思明同志，把攻击北峪和马峪的任务交给了冀中军区十六团团长盛治华同志，把主攻井陉煤矿的任务交给一分区三团团长邱蔚同志。

邱蔚同志原是一分区三团副团长，原团长纪亭榭同志到延安学习后，他升任团长。原政委袁升平到延安参加“七大”时，王建中同志为政委。副团长是肖应棠同志，政治处主任是方国华同志，总支书记是邓经纬同志。营、团干部里，除了王建中同志原是北平的地下党员外，其他同志都是老红军。黄土岭战斗后，部队静久思动，这回听说又要打大仗，战士们一个个摩拳擦掌，热情倍增。为了练习破电网，他们把几个心爱的篮球也剖开了，用球胆做手套，这样，手握铡刀劈电网，不致于触电。

八月十七日，我得到三团报告：部队行军数百里，已到达平山洪子店，正在补充弹药和干粮。我还听说，一路上，四分区的群众支前工作做得相当好：送茶水，照顾病号，替部队封锁消息……以致于使部队能迅速、隐蔽地赶到目的地。

时值盛夏，天气乍晴乍雨，热的时候简直要把人烤干，下雨时又把人淋得湿乎乎的。道路泥泞，山障河阻，行军中有不少难以预料的困难。部队能够一日百里，按规定的时时间赶到滹沱河边，是相当不易的。

我通知三团长邱蔚同志到指挥所受领战斗任务，他很快就起来了。

我告诉邱蔚同志，井陉煤矿的煤是被日本军国主义掠夺的重要矿藏，它质地优良，开采量大，挖出来后除了供给华北日军外，大部分运到日本去了。因此，必须拿下它，消灭煤矿守敌。攻入矿区后，对我们有用的机器，能搬走的尽量搬走，搬不走的就全部炸毁，使矿井瘫痪。

邱蔚同志与我详尽地研究了破袭井陉煤矿的作战方案，保证啃下井陉煤矿这块“硬骨头”。然后，他跳上马飞快地返回团里去了。

听说，三团政委王建中同志在向部队进行战斗动员时，跳上一张八仙桌，讲述了井陉煤矿发生的一桩惨案：一次井下起火，日方经理为了掠夺这个矿的资源，竟下令封住井口，一下子活活闷死一千二百多名中国矿工。战士们听后愤怒至极，恨不得立即直扑井陉，歼灭守卫在那里的日本侵略军。

我随部队来到了滹沱河边，由于山洪暴发，河中浊水翻腾，水位比过去升高了许多。眼下过河的人多，却只有一两只小船来回摆渡。同志们只好脱去军装，把它和弹药一起放到船上，人员下水，拽着一根从对岸扯过来的绳子过河。大部分人员都安全地过去了。可是后面的人过河却出了一个重大事故：那根绳子由于拽的人太多，突然断了，不少人倒在水中，尽管马上组织了抢救，仍然有同志

遇难。其中，跟随我们行动的军区敌工科长被急流卷走，牺牲了！

我把负责组织渡河的参谋找来，责问道：

“为什么一次过那么多人？为什么不在急流处搞个标志？现在造成了非战斗减员，而且牺牲了个军区的科长，我们怎么向上级交代？！”

那个参谋眼睛里饱含着泪水，痛苦地低下了头。我也沉默了。唉，大战迫在眉睫，万事火急，只要有一丝疏忽，就会付出血的代价。

八月二十日下午四时，部队到达距井陉煤矿只有十多里的山野里，隐蔽待命。我带前方指挥所人员和三个团的营、团干部，爬上一个草木繁茂的山头，勘察地形，分配任务。然后又同三团的干部一起察看井陉煤矿及其周围的地形。只见远处矿区矗立着几座高高的烟囱和风车房，烟囱正冒着浓烟。伴随着“呜——”的一阵汽笛声，一列满载着煤的列车驶离井陉煤矿车站，进入弯道，渐渐消失了。

我用望远镜反复观察攻击目标的位置：井陉煤矿分老矿和新矿，老矿在岗头，新矿在东王舍村。老矿附近的贾庄山头上，设有炮楼。根据情况判断，守敌并未发觉有被攻击的危险，各项活动一如往常。我们长途奔袭的第一步成功了。我当即决定，一营攻打新矿，二营攻打老矿，三营攻打贾庄炮楼。

趁各营布置任务的时候，我打算与邱蔚同志一块化装

成老百姓深入到煤矿近处侦察，选择突破口。

几位同志放心不下，说：

“司令员，你别去了。那里距离敌人太近，一旦暴露，撤退都很困难。让我们去吧！”

我没有同意，因为我感到这次战斗太重要了，不亲临实地察看一番，心里不踏实。同志们只好搞来便衣。于是，我和邱蔚同志及少数几个警卫员全都化装成当地百姓的模样，近黄昏时，下了山。我们顺利地走出一段路后，便在暮色中匍匐前进，一直爬到矿区边上，仔细地察看了一番。

选好突破口后，我决定把前方指挥所设在离新矿仅二里的小村子里。邱蔚同志便立即回部队组织攻击。天黑之后，战士们陆续钻出沟谷，爬上山岗，等待着攻击命令。突然，远处的矿区电灯齐放光明，好些战士都大吃一惊，因为他们过去没见过电灯。有的看得目瞪口呆，有的啧啧赞叹：“这东西好，又亮堂又好打！”灯光使战士们忘记了危险，忘记了长途跋涉的疲劳。

借着微弱的手电光，我凝视着手表，表针慢慢地移动着。到了！正太战役的总攻时间：八月二十日二十二时正。

“轰！”骤然传来手榴弹的爆炸声，冲破了宁静的夜晚。

在井陉煤矿的一位工人兄弟指引下，一营三连的战士

顺着长梯爬上了电线杆，用虎头钳钳断了一根粗电线，顿时，新矿的电灯全都熄灭了。一营长赖庆尧同志吼了一声：

“灯灭了，冲啊！”

二连的指导员高喊：“三八大盖等着我们去缴哩，上！”

战士们向敌人的碉堡冲去。

此刻，枪炮声大作，手榴弹爆炸的火光，犹如一朵朵嫣红的花朵在夜幕中闪亮。空中弹火交织，瑰丽无比。我听见身边有人感慨地说：

“太美了！好久没见过这样的夜战场面了！”

井陉煤矿的敌军刚入梦，被这意外的突袭吓呆了，有的赤条条地窜出房来，有的盲目地打枪，有的居然还壮着胆子问口令。

战士们通过电网时，一位班长触电牺牲了，其他同志赶紧拿大铡刀劈开一条通道，再架上门板，部队这才通过了电网。不到十五分钟，新矿就有两个碉堡被二连拿下来了。这个连队有一位以往打仗不太行的班长，今天他一口气缴获了四支三八大盖，高兴得直嚷嚷：

“同志们，咱们不能满足，还得要！”

说完，他带着班里的战士，猛虎般地朝第三个碉堡扑去。

隐蔽在东王舍村一家药铺里的四连，也猛扑出来，十来分钟便攻下第一座碉堡。然后由西北往东打，又碰上两座非常坚固的碉堡。这两座碉堡建在土山上，四周围着高

墙，墙上有电网，墙内还有一条深深的壕沟，三道铁丝网。敌人躲在碉堡里，疯狂地向外射击。四连长沉着地喊道：

“刘金山，把鬼子的电网和铁丝网给我统统砍断！”

战士刘金山应声抽出背上那口大铡刀，手上裹了两层篮球胆，回头对周围的人交代说：

“谁让给我两个手榴弹？我的打完了。等把电网和铁丝网都破坏了，我就打手榴弹，你们听到手榴弹一响就冲！”

这位大个子战士把递来的手榴弹往腰里一掖，噌地爬上梯子，高举铡刀，老牛似地吼了一声，手起刀落，那电网便齐刷刷地断开了。等敌人发觉，密集的机枪子弹向这个战士打来，打得墙头砖屑四迸时，他已经敏捷地跳下墙，跃过了壕沟。紧接着，我方的重机枪咆哮着为他掩护。他一鼓作气，又砍断了两道铁丝网，一扬手，扔出了手榴弹。不料，一颗子弹射中了他，而他的手榴弹正巧扔进了敌堡，敌人的机枪马上被炸哑了，同志们哇的一声冲了上去，乒乒乓乓一阵猛打，把堡内敌人收拾干净了。

撤下来时，大家才看到刘金山同志，只见他捂住伤口，躺在壕沟底边喘气边笑，说：

“手榴弹又没啦！”

四连又向最后一个碉堡——敌人的中心堡垒发起攻击了。那个碉堡聚集了不少敌人，有十几公尺高，堡墙极厚，上下好几排射孔，每个射孔都很小，而且可用活动铁板遮蔽。战斗打响后，敌人机枪疯狂地向外扫射，可我们的子

弹却不容易打入堡内，手榴弹就更难投入了。这时，二班长命令战士吴鸿奚去把中心堡垒外的铁丝网砍断：

“象刘金山那样，上！”

吴鸿奚同志响亮地回答：“是！”操起一口铡刀，扑了过去，奋力猛砍，铁丝网齐刷刷地断开了。

“好！”班长的话声刚落，忽然，大碉堡内飞出一颗子弹，正巧打中吴鸿奚同志插在腰间皮带上的手榴弹，没等他反应过来，腰间红光一冒，那颗手榴弹便爆炸了！

“啊！”班长和同志们叫了一声，随即奋不顾身地冲上去。碉堡的射孔又吐出火舌，我们又有几个同志倒下了。部队攻不上去，只好退回来。二班长落在最后，拼命将吴鸿奚同志抢了下来。

月光下，吴鸿奚同志的脸惨白，下腹被炸开了一个大口子，血汨汨地流着，伤势很重，但他的神志还清楚，咬着牙不叫痛。

班长半跪在他身边，用缴获敌人的纱布裹住他的伤口。他用微弱的声音说：

“班长，同志们……你们别管我，快把那个大碉堡拿下来！”

这时，乱云已吞没了月亮，象是要落雨。二班长把自己头上的军帽摘下来轻轻地往吴鸿奚同志脸上盖时，吴鸿奚同志停止了呼吸。

二班长怒狮般地吼着：

“重机枪掩护，我们就是冲一百次也要把这个碉堡拿下！”

一排的战士胸中燃着复仇的烈火，一次又一次地向敌人冲击。

二排六班在这个中心堡垒侧面猛攻，打得只剩下一个人，这个人毫不气馁，跑到一排，喊着：

“六班还有人在！”不等人家回答，他就跳进了一排的冲锋行列。

天蒙蒙亮了。我在前方指挥所了解到一营四连打得很顽强，也很艰苦，便命令邱蔚同志，要他立即将一营的人员重新组织一下，集中兵力，四面围攻那个最顽固的堡垒。

担任牵制任务的三连连长沈万玉闻讯把战士们带到营长赖庆尧面前，要求参加攻打中心堡垒的战斗。营长同意了。沈万玉同志高兴地把驳壳枪的木匣子拍得嘭嘭直响，一回连就问战士们：

“你们怕不怕死？”

战士们齐声回答：“不怕！”

“不怕？不怕就跟我来，敲掉那座碉堡！”沈万玉同志说罢，便带着队伍出发了。

“三连攻呀！把那座碉堡拿下来呀！”赖庆尧同志举着望远镜，扯着嗓子喊着。

几个连队的火力飓风般地朝着同一个目标扫去。几名

无畏的勇士抱着炸药包，前赴后继地冲上去，终于把大碉堡的堡墙炸裂。随后又是一阵猛攻猛炸，十几杆枪封住敌人一个射孔，使敌人无法抵抗。接着，不知把里面什么东西打着了，堡内喷出火舌，眼看碉堡就要坍塌了。战士们一起冲上去，同剩下的敌人肉搏，把他们全部击毙。可是，三连长沈万玉同志在激战中壮烈牺牲。

天大亮了，全身乌黑的矿工们欢呼着从各个角落里钻出来，他们大声地招呼着村子里的人：

“喂！快出来呀！八路军来啦，出来给他们搬胜利品吧！”

于是，矿工和乡亲们便和我们的战士一起，把敌人的枪支弹药、掷弹筒、电话机和各种军用物资搬了出来。他们向我报告：缴获的大量炸药中，除了梯恩梯外，还有一种条状、有甜味的炸药。我要他们送来看看。

条状炸药送来了，我接过来，伸出舌头轻轻一舔，果然是甜的！

送炸药来的同志说，这种炸药多得不得了，是日军用来开矿的，听说爆炸起来威力很大。我听后大喜，对邱蔚他们说：

“把这些炸药统统运回去，将来爆破敌人的碉堡呀，兵工厂做手榴弹呀，就不愁了。还有矿井里那些机器和设施，能搬走的尽量搬走，搬不走的就地炸毁！”

随后接到报告：贾庄炮楼也拿下来了。三团二营攻克

了南正。但是岗头老矿的守敌非常顽固，他们施放了毒气，致使三营在连克三座碉堡之后，攻击受阻。其中有一个排虽然从侧面攻入了矿区，但由于矿区太大，他们找不到攻击目标，只停留了一会，便撤回来了。

在三团激战井陘时，三分区二团攻占了蔡庄据点，破坏了乏驴岭铁桥。冀中军区十六团攻克地都、北峪据点，歼守敌大部。正太路日军在我中路纵队破袭战中，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井陘新矿硝烟未散，盘踞在岗头老矿的敌人听说中心堡垒已经陷落，就射来夹杂着烧夷弹的排炮。炮弹落处，烈焰四起，中心堡垒一带成了熊熊火海。然而，这已经挽救不了他们在新矿的惨败了。

新矿的十四盘开矿机器，十个锅炉，三座鼓风机，两个储水池，两个烟囱，一个绞车房，一个电机房，一个火车站，五座铁桥，以及矿区表面建筑，全部被我们摧毁。据被俘的日本工程师说，只此一矿，日本侵略者就要损失一亿日元，即使再运来全套机械设备，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复工。

敌人炮击后不久，我接到三团报告：井陘煤矿火车站日本副站长加藤清利夫妇被炸死了，遗下一对小姑娘，被一营的战士从炮火中救了出来。我要他们好好照顾孩子，立即送到我们前方指挥所来。

此时，我的心情很不平静。奋不顾身地从战火中抢救

妇孺，这在我们八路军中是常事。可这回三团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救出来的并不是乡亲们孩子，而是丧失双亲的日本小姑娘。我自然而然地想起，在日本法西斯进行的这场侵略战争中，多少中国人民惨遭杀害，甚至连初生婴儿也不能幸免。我曾经听过两件真实的事：一个日军中佐，一手提着指挥刀，一手拎起一个刚出生几天的中国婴儿，剁成碎块，扔进磨盘里，令其士兵推磨洒水，在婴儿的母亲撕心裂胆的哭叫声中，将婴儿磨成了肉浆！还有一群日本兵把一个中国孕妇拖进猪栏里，一阵惨不忍睹的蹂躏之后，猪栏里传出初生婴儿的啼哭声，日本兵拍手大笑：“大地好！……”

日本法西斯分子为了使我们亡国灭种，残杀了我们多少无辜的孩子！而现在，我们的战士却在死神的魔爪中把两个日本小姑娘救下来了。是啊，孩子无罪，她俩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我们进行的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不仅是为着拯救中华民族，也是为了使日本人民从军国主义统治下摆脱出来。

两个小姐妹被送到前方指挥所来了。

我一看，稍大的那个约莫五六岁，穿着一件又脏又破的小连衣裙，头发乌黑，圆圆的小脸蛋上，挂着泪珠，一双大眼睛闪着惊惧不定的光，令人爱怜。小的那个，最多只有一岁，右肩胛受了轻伤，此时，她合着睫毛长长的眼睛，已经在战士怀里睡着了。她那又白又胖的小

脸上，时不时地轻轻抽搐着。唉，可怜的娃娃，梦中也不得安宁。日本军阀的侵略行径，使他们本国的婴儿也在为战争流血啊！

指挥所的同志都围了过来，不住地叹息：

“可怜啊，这么小的孩子！”

我叫人给这两个日本小姑娘弄点吃的东西来，并给那个负伤的婴儿重新进行包扎。

晋察冀军区前线指挥部，就在距我们不远的洪河漕村。我把三团抢救出两个日本小姑娘的事，用电话向聂司令员作了报告。他听了很高兴，连声说：

“很好！很好！三团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你们要把孩子照顾好，等她们吃饱后，马上派人送到我这里来。”

岗头老矿的敌人又开始打炮了，并有反扑的迹象。我赶快派人把两个日本小姑娘送走了。听说，聂司令员很慈爱地收下了这两个日本小客人，亲自给孩子们削雪花梨吃，给她们买了许多糖果、饼干，派军医为她们治伤看病。后来，聂司令员亲笔写了一封给日本官兵的信，派人带上信，将两个日本小姑娘送到石家庄，请日方将两名孤女转交其亲属抚养，引起日军内部极大震动^①。

① 事隔四十年之后，新华社发表了《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文章。日本《读卖新闻》转载，轰动日本各界。几天之后，就找到了当年那个五六岁的小姑娘——美穗子。美穗子应聂帅之邀，前来我国访问，以额触聂帅之手，感谢当年救命之恩。此事成了中日友好的一段佳话。

正当我中央纵队与兄弟部队一起继续猛烈地攻击敌人、扩大战果时，华北的日本侵略军被八路军的大破袭战所震惊，他们急忙从冀中、冀南调集了五千兵力，从八月二十五日起向正太路东段反击。石家庄、井陘等据点的敌人也纷纷出动。同蒲路南段的敌人也集中于榆次，向正太路西段我一二九师进攻。在敌人东西夹击下，我军继续破袭已不可能，八路军总部决定，撤出正太路，重新进行部署。于是，我带着部队离开井陘地区，执行新的战役任务去了。

东团堡歼灭战

正太战役结束以后，前方总部命令八路军各部队进入大破袭战的第二阶段。

晋察冀军区立即组织了涞（源）灵（邱）战役^①和一系列对铁路、公路的破袭战。决定在涞灵战役中，把主要力量首先使用于涞源地区，夺取涞源城，拔掉附近各据点，然后转移攻势于灵邱地区，相机攻取灵邱城和附近各据点，打开边区西北地区，以便同晋西北和平西抗日根据地形成面的联系。

聂司令员命令我指挥由第一、二、三、二十、二十五

① 涞灵战役第一阶段时，邓华同志指挥五分区部队在灵邱、广灵牵制敌人，配合一分区部队作战。涞灵战役第二阶段时，杨成武同志指挥一分区部队在涞源、蔚县牵制敌人，配合五分区部队作战。

团和骑兵团主力、一分区特务营，第一、三游击支队、分区工兵连等组成的右翼部队，参加涞源战斗。左翼部队第六、二十六团和察绥游击支队位于蔚县南部和灵邱东部担任掩护。挺进军第九团活动于桃花堡、矾山堡之间，阻击平绥路东段增援的敌人。此外，二分区、军区教导团、冀中军区一部都进行相应的配合行动。

自从黄土岭战斗击毙日军阿部中将之后，驻张家口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恨不得一口吃掉我们，却又无从下口。新任旅团长人见与一中将也是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他派兵深入我边区，在涞源城、东团堡、三甲村、白石口等地设下据点。驻大同的日军二十六师团，则把魔爪伸入灵邱、广灵、南坡头等地。军区之所以选择在涞灵地区发起战役，就是为了斩断魔爪，拔除敌人设下的据点。

但是，当我军大举出击正太路时，涞源地区的敌人已有警觉，各据点相继增加了兵力，仅涞源城就增加到五百多人。他们纷纷加固工事，储备粮弹，严加警戒。这就大大减少了我军突袭成功的机会。

我带着三分区的二团和一分区的三团从井陉返回分区，略作休整，即向涞源方向进军。事先曾派分区侦察科新任科长姜洪照同志带人到涞源一带进行侦察。经研究并报军区批准，我们决定由一分区的一团攻涞源城，三分区的二团攻三甲村，分区的三团攻东团堡。

我曾经住过涞源和三甲村，也到东团堡看过地形，对这几个地方都很熟悉，指挥作战时根本用不着看地图。我把前方指挥所放在三甲村附近内长城的一座烽火台上，这里离涞源城极近，离东团堡有七八十里，位置理想，三处战场，不用望远镜能直接观察到的就有两个。

东团堡位于涞源城东北，是敌人供应线上的重要中断站，又与上庄、中庄、王喜洞、摩天岭等据点相呼应，成为敌人在涞源、宣化公路上封锁我根据地的一大支撑点。

东团堡内外筑有上下三层的大碉堡、地堡、围墙、外壕，设有铁丝网、鹿砦、构成了坚固的环形工事。守敌是日本侵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一个士官教导大队，共一百七十多人，全是从其下属部队中挑来受训的士官，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翻译官名叫金井，朝鲜人。我地下工作人员曾多次做他的工作，他对我们的抗日斗争也曾表示同情。

半个月前，三团长邱蔚曾派了四名侦察员化装成老百姓进东团堡侦察。那回，他们正赶上日军放映无声电影，强迫当地老百姓去看，以宣扬他们的“王道乐土”和“大东亚共荣圈”。我们的侦察员混进看电影的人群中，虽然金翻译官有所觉察，但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向日军报告。在我地下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侦察员把敌人的人员和武器装备等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又平安地出了据点。

东团堡周围数十里的乡亲，恨死了据点里那帮奸淫掳

掠、杀人如麻的日本侵略军。三团进军东团堡路过乌龙沟、其中口等村庄时，乡亲们群情激昂，有的泣诉日军的罪行，有的兴高采烈地说：

“这下可好，龟孙子的死期到了。你们不知道，叫东团堡的鬼子杀了我们多少人呀！”

还有位乡亲拍着自己的胸脯说：“你们要能拿下东团堡鬼子据点，我们家就给你们杀一头大牛慰劳！”他们有的主动给我们带路，有的跑来给我们抬担架，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援。

三团于夜间潜入离东团堡十里外的村庄。天亮后，邱蔚同志带领侦察参谋刘贵、作战参谋杨兴唐及一营长赖庆尧、二营长郭延林、三营长陈宗坤同志上山看地形。邱蔚同志看完地形后，在电话里向我报告了作战部署：一营攻打上庄据点，切断东团堡与中庄的联系；二营在东团堡的东面和南面担任助攻；三营在东团堡西面及西南面实施主要突击，九连为突击队。

夜色降临了，明净的秋月照着长城内外的荒山野岭。我站在烽火台上，于九月二十二日二十时，向参加涞灵战役中涞源战斗的所有部队发出了攻击命令。

过了片刻，激烈的枪弹声骤然响起——涞源战斗开始了！

战斗一打响，烽火台上的指挥所电话铃声就响个不停，

各团的战况不断报来。

一分区一团正在向涞源城猛攻。敌人火力很猛，我方打得异常英勇，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敌人。

三分区二团用炮火猛轰三甲村东山上的敌堡，战士们冒着敌人的弹雨，奋勇劈开一道道铁丝网，跨过外壕，向敌堡发起攻击。

一分区三团三营，在东团堡附近的馒头山打响，战士们在民兵们带领下伪装狗叫，匍匐前进，砍开铁丝网，紧接着把日军哨兵也砍倒了。正在碉堡内睡觉的日军惊醒了，可是未等他们还击，战士们就把成捆的手榴弹扔进堡内，把他们炸成了一堆碎尸。担任突击任务的九连在火炮和机枪掩护下，由东团堡的农会主任赵宗带路，向东团堡守敌首先发起冲击。其它连队也一齐猛攻。可是担任助攻的二营被带错了路，未能按时赶到东团堡。在这种情况下，三营的同志们仍然奋起攻坚。敌人打开探照灯，使用各种武器向我还击，并与冲去的我方战士展开白刃格斗，厮杀声和刺刀的撞击声响彻夜空。

“几个团都打得很艰苦呀！”我对高鹏同志说，他点点头。我们知道，遇到这种情况，部队伤亡不会小。

一夜恶战过去，传来一分区一团攻占了涞源东关、西关和南关的战报，但是涞源的大部敌人并未被消灭，他们退入城内防守。三分区二团曾一度冲入三甲村和中庄两地，遭到敌人猛烈的反击，被迫退出。一分区三团九连在拂晓

前攻占了东团堡西南角的炮楼，打开了突破口，三营主力随之突入村内。二营赶到东团堡之后，八连以勇猛神速的动作抢占了村南路口的碉堡。但是敌人很顽固，不时组织反冲击，我军在东团堡杀了个几进几出。攻击上庄据点的三团一营，曾夺得敌人一座堡垒，敌人发动了连续反扑，一营几度力拒，终因伤亡过重，不得不后撤。其它方面，担任攻击插箭岭、白石口、张家峪、王喜洞、摩天岭、沟堡等据点的兄弟部队，都无进展。只是五分区六团攻克了北口，特务营占领了辛庄，挺进军第九团占领了桃花堡、白乐镇、吉家庄三个据点。

情况严重。我拿起电话筒子，找到了邱蔚同志。

“邱蔚，怎么回事？东团堡还拿不下来吗？涞源城附近几个据点不拔掉，拿下涞源城就更困难了！明白吗？”

“明白！”从听筒里，传来邱蔚同志嘶哑的声音，“司令员，部队又发起了强攻……鬼子真狠哪，施放毒气，好多战士中毒倒下了！眼下我们正在采取防护措施，继续攻击……”

“这群法西斯强盗！”我骂了一声，转而对邱蔚同志说，“告诉营、连干部，东团堡的守敌除了军官以外，几乎全是士官，都是带兵的人，对付他们，不能光是死攻硬拼，要多动点脑子！”

邱蔚同志心领神会，立刻去找人想办法。我又和三分区二团团长肖思明同志挂通电话。他告诉我，三甲村的四

个碉堡已被他们攻占了一个。攻击部队虽然被迫撤下来了，但是并没有放弃这个碉堡，而是留下一个班，搬了好多手榴弹上去，等于在敌人腹地安了颗钉子。我交待肖思明同志：

“那个碉堡要控制好，可别让它丢喽！我马上调一门山炮给你，你用它打另外的炮楼！”

肖思明同志高兴极了。

一分区一团的战斗完全陷入胶着状。代理团长宋玉琳同志忧虑地向我报告说，部队仍在东、西、南城关与退入城内的敌人激战。他还如实报告说，一营有一个排在攻打敌人失利时，战士们没有撤下来，排长慌得自己先跑了回来。

我告诉宋玉琳同志，不要放弃已经得到的阵地，但是也不必死啃硬骨头，部队可以原地略作休整，监视敌人，待我们调整部署以后再说，至于那个临阵逃跑的排长，当然应该对他执行战场纪律。

在烽火台上，我与分区几位领导同志简单而又慎重地交换了意见。我提出：目前我们的兵力过于分散，以致进攻受挫，应该按照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以一部兵力监视城内敌人，集中力量先扫除周围各据点，再攻涞源城。几位领导和参谋人员都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将此意见报告军区，聂司令员立即复电：同意改变部署。

部署改变之后，一分区一团奉命抽出一个营与三分区

二团合攻三甲村，其余部队继续监视涞源城敌人。我要肖思明同志部署好第一、第二梯队，做好准备，将支援火力集中于敌薄弱部位后，突击部队即秘密向该部位集结，在火力掩护下强行袭击。

下午，我给肖思明同志配备了一门山炮，由于这门炮是缴获来的，没有瞄准镜，炮弹极少，因此交待他顶多打三发。肖思明他们小心翼翼地从小炮筒里向敌人东山碉堡瞄准，哪知，刚打了两发，并未命中，碉堡里的敌人就吓得跑了出来，向涞源方向逃窜。肖思明同志乐得大喊大叫，忙叫一营长吴生荣同志带人冲击，随即占领了东山碉堡。

黄昏后，一分区一团三营利用暮色悄悄地离开涞源城关，涉过拒马河，赶到三甲村，和三分区二团一起，把三甲村敌人团团围住。一团三营副营长张英辉同志带着三个连包围了一座小山，用铡刀劈开铁丝网，朝一个碉堡扔了几百颗手榴弹，把碉堡炸开了一个口子。三甲村的敌人垂死挣扎，各种枪支通通从枪眼里伸出来射击，二团一位叫遂志任的班长冲上去，一使劲，把敌人一支三八步枪拔了出来。在二团和一团三营的猛烈攻击下，日军死的死，伤的伤。至二十四日清晨，三甲村一百五十多个敌人，除二十多名日军和五十多名伪军被生俘外，其余全部被歼。

太阳升起来了，我对高鹏同志说：

“三甲村的战斗差不多了，走，下去看看！”

我们一行人跨上战马，驰向三甲村旁边的小山头。战

地上的硝烟还未散尽，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气味，到处是敌人的尸体、枪支弹药以及成堆成箱的罐头、饼干和酒。部队正忙着打扫战场。我估计涞源城的敌人很快就会出来增援，便与肖思明他们研究了打援的办法。正说着，天空中忽然传来炮弹的呼啸声，肖思明同志喊了一声：

“司令员快走！”

话音未落，只听“哐！哐！哐——”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三甲村周围的山上冒起了一团团浓烟。

我们策马返回的路上，那炮弹竟象粘上我们似的叮叮哐哐地跟在身后炸个不停。我们跃过小河，才摆脱敌炮的射击。驰入山谷，空中又响起了敌机的引擎声。

“来了个报丧的！”高鹏同志笑道。

我们重新回到烽火台时，涞源城的敌人已经饿狼似地窜出来了。我们居高临下，清楚地看到涞源小盆地里的战斗情景。一百多个日军端枪扑向三甲村，快接近村子时，我方阵地各种武器一起开火，前头的日军顿时象被疾风吹折的高粱秆子一样纷纷倒地，后面的日军慌忙拖枪溃逃。不一会，日本士兵又被他们的军官驱赶着，再次扑了上来。和第一次冲锋一样，他们留下一大堆尸体，又掉转头逃了回去。就这样，敌人象一群受了惊的牲畜，一会赶过来，一会被轰过去，来回折腾着。最后，敌人的飞机胡乱投了几颗炸弹，也一撅屁股飞走了。残余的日军只好灰溜溜地缩进涞源城。

三甲村又回到了人民手中，饱受日本侵略军蹂躏的村民们欢呼雀跃，当即就有一百八十多名青年报名参加了八路军。

在拿下三甲村的同时，中庄、白石口、下北头等敌据点也被我们攻克了。

可是，东团堡仍在血战中……

一分区三团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

东团堡的守敌，全都是战斗经验丰富，武士道精神十足的日军军官和士官。他们凭借坚固的工事，将轻、重机枪和掷弹筒打得如泼水一般，不时地施放毒气，有时还组织战斗群反冲锋。战斗打响的那天，正巧士官教导大队井出大队长接替原大队长甲田。这两个家伙都被围在里边了。激战两夜之后，敌外围工事均被我占领，残敌麋集于西南角一地主大院内，依仗核心工事挣扎待援。

一分区三团的指战员们戴着浸过水的口罩，前仆后继，勇猛冲击，民兵们也参战了。他们运送伤员，抢下烈士遗体，见到戴口罩、倒在地上的人就往外拖。激战中，三团党总支书记杨志德阵亡了。消息传来，我的心情很沉重。我早就认识杨志德同志，红军时期他就开始做部队中的党务工作了，是一位优秀的红军干部。

三团的重伤员，全部被送往乌龙沟，由印度援华医疗队抢救。印度援华医疗队这是第二次到一分区来。他们首

次来一分区时，是由巴苏华和柯棣华大夫率领的。我们请他们吃过饭，作过一些交谈，对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都非常钦佩。涞灵战役一开始，巴苏华和柯棣华即于九月二十三日带领医疗队赶至乌龙沟，开设火线医疗站，直接负责救护东团堡战斗中我军伤员。巴苏华和柯棣华以高超的医疗技术和满腔热忱的态度，抢救了许多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战士。他们亲眼看到日本侵略军使用的达姆弹，给我军指战员造成的伤亡，表示了对法西斯分子的极大义愤。他们对我军战士无比英勇的战斗精神，十分敬佩。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二十四日中午，邱蔚同志向我报告：上午八时许，四十多名日本兵向九连扑来。九连沉着、灵活，待敌近至五五十米处，才突然开火，将敌击退。三排还趁机夺占了大院西南角一暗堡，予敌很大威胁。日军甲田大队长赤膊上阵，亲率数十名日本兵举着战刀向我一排扑来。一排长于勇带领全排与敌展开肉搏，他一人就接连刺死四个日本兵，自己头部也被刺伤，最后毅然拉响四颗手榴弹冲入敌群，与日本兵同归于尽。九连与敌激战三个多小时，连续击退敌人六次反冲击。邱蔚同志亲眼看见一个排冲进去同敌人肉搏，全部壮烈牺牲。沉痛与仇恨使他几乎忘掉一个指挥员的职责，差点跟着冲进去……

这天晚上，已是攻击东团堡的第三夜。邱蔚和王建中同志集合全团，再次进行动员，鼓励大家下定决心，今夜

把敌人消灭。动员之后，部队进入阵地，团指挥所向前移，支前的乡亲们积极准备运送伤员的担架和牲口。

二十时正，部队对敌核心工事发起了总攻。二营七连一排用炸药包炸开大院东大门，并占领两座房屋，保障连主力占领围墙东南角碉堡。九连、十二连乘机突破围墙，相继占领西南、西北两个碉堡。十二连攻击的碉堡三丈多高，四十名战士抬着大梯子火力掩护下，奋勇往前冲。梯子一架上碉堡，三班长王国庆就背着二十几颗手榴弹往上爬，正当他要往碉堡里塞手榴弹时，却被敌人的子弹打中，挂在梯子上牺牲了。十二连党支部书记黄禄气红了眼，又背着二十几颗手榴弹爬上梯子，把王国庆同志身上的手榴弹也取下来，合在一起塞进了敌人的碉堡，四五十颗手榴弹在堡内轰然爆炸，把日军全部炸死了。

东团堡的残敌最后退守东北角碉堡顽抗，死不投降，并连续施放毒气，致使三团指战员大部分中毒，只好暂时停止进攻，继续包围敌人。

这一夜，三营损失极大。一、二营伤亡也不小。三营长陈宗坤急得打电话直接找我要兵，说着说着，声音变了调，发起脾气来。我理解陈宗坤同志此时的心情，他为失去那么多的好战友而难过，对使用毒气的敌人恨之入骨，并且急于求胜。我对他说：

“陈宗坤，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赶紧组织剩余力量，包括文书、理发员、炊事员，准备向残存的顽敌作最

后的冲击！打完仗，再给你补充兵员！”

二十五日上午，一架敌机从张家口方向飞来，给东团堡残敌空投下几箱东西。第一个降落伞飘飘摇摇，恰好落在敌人的铁丝网外。正在三营阵地前沿的邱蔚同志叫侦察参谋刘贵带上两个侦察员，去把敌人空投的东西弄一个来看看。刘贵他们爬过去，扛来个木箱子，打开一看，全是黄头绿底的日本子弹。这时，天上降落伞全都落了地，可把战士们乐坏了，因为都掉到我方阵地上。日本飞机既为我们补充了弹药，那一张张降落伞布还给我们的战士提供了小包袱皮。

当天傍晚，阵地上显出一种异样的静寂。三团的同志们虽然连续作战几天几夜，疲劳至极，但仍在积极准备着继续冲击，他们知道，东团堡的日军士官只要活着出去一个，就会带出一群残害中国人民的日军来！

突然，从残敌据守的碉堡上传出几声清脆的枪声，原来，敌人营垒里有一个人，逃离敌巢时，被敌哨兵发现，打了几枪。

这个人就是金翻译官。事后，邱蔚同志把这个情况向我作了汇报。

二十四日上午，邱蔚同志看到我敌工人员对日军战场喊话无效，一场血战不可避免，便亲笔写了一封信给金翻译官，要他寻找机会逃出来，千万不要当日本法西斯的殉葬品。信中还请他把敌情了解清楚，报给我们。信是由东

团堡区公所武装部一位叫赵进的同志冒险带进去的。金翻译官从碉堡上下来，悄悄地接过信，看完后便放进嘴里嚼了几下，咽下去了，然后又返回碉堡。

二十五日下午，敌人准备突围。三团再次从四面猛攻，置敌于绝境。甲田见大势已去，便将粮食、物资和枪支弹药堆放在一起，洒上汽油，命令所有剩下来的人员跳入火中自焚。他还挥舞指挥刀，将一个不愿自焚的日本兵的肚肠挑出来，杀一儆百。金翻译官在我地下工作人员马奎同志的带领下，趁机溜了出来。日军哨兵发现后，连打几枪，都没有打中，他安全地到达我方阵地。金翻译官一见到邱蔚同志，“啪”地敬了个日本式的军礼，抖动着脸白的双唇说：

“太君只剩下二十七个了，他们把机枪、掷弹筒浇上汽油，准备跳到火里，统统死啦死啦的。”

邱蔚同志一听，马上挂电话向我报告。我大声喊道：

“邱蔚，赶快命令部队冲进去，要不鬼子放火一烧，就缴不到那些机枪、掷弹筒了！”

三团立即从四面八方攻向残敌龟缩的角落，这时，武士道精神十足的日军爬到屋顶上，疯狂地饮酒，唱着《君代国歌》，跳着日本武士舞，向东方遥拜，然后发出如牛般的吼叫，一个个纵身跳入熊熊大火。等到战士们冲入时，日军官兵已全部烧死，部分武器也被烧坏了。尽管如此，三团在乡亲们的支援下还是缴获了不少轻、重机枪和掷弹

筒，另外还有步枪一百多支和大批的弹药、罐头和粮食等物资。

凶狠、顽固的东团堡日军士官教导大队被我全歼，使华北的日本侵略军受到极大震动。在三团返回的路上，乡亲们扶老携幼，箪食壶浆，慰劳部队。那位表示要“杀头牛”的乡亲，果真杀了头牛送来，向战士们祝贺胜利。

九月二十八日开始。敌人从蔚县、涿鹿县各个据点和张家口陆续以小股兵力朝涞源方向增援，渐渐增多到三千多人，猛烈进攻我们。我右翼部队不能继续扫点攻城，奉军区命令，主力撤出战斗。涞灵战役的前一阶段即告结束。

涞灵战役的后一阶段，由邓华同志指挥左翼部队进行。一团奉命调入左翼部队，他们在南坡头战斗中打得十分出色。

整个涞灵战役于十月十日结束，历时十八天，歼日伪军一千一百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我军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在战役进行期间，各地党、政、民进行广泛动员，大力支援前线。涞源县县委书记李彪亲任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涞源人民把大批熟食、蔬菜、水果送往前线。易县妇女自卫队组织了有百副担架的妇女担架团，由妇女队长松森同志带领，步行百多里运送伤员。龙华县一、二、三区动员参战人员近八百人，全县组织三个运输站，专事运输军需品。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与广大人民

群众的支援分不开啊！

东团堡的歼灭战，使涞源警备司令小柴俊男不寒而栗，痛心疾首。后来日本侵略军重占东团堡，这位败军之将小柴俊男还大言不惭地立了一块大石碑，两面分别用中文和日文楔下一首《长恨歌》。这首歌中虽然充满法西斯的臭味，但作为这段历史的佐证，故将全文抄录如下：

东团堡警备队长恨歌

行军西征涞源县，路越一岭叫摩天。
围绕长城数万里，西方遥连五台山。
南到白石山更大，东与易州道开连。
千山万水别天地，有座雄岩紫荆关。
察南边境一沃野，小柴部队此处观。
窥谋八路军贼寇，中秋明月照山川。
丰穰高粮秋风战，敌军踏破长城南。
精锐倾尽杨成武，势如破竹敌军完。
盘袭怒沟如恶鬼，我含笑中反攻然。
惨复天地炮声震，团堡一战太凄惨。
此处谁守井出队，彼处谁攻老三团。
敌赖众攻新手替，我仅百余敌三千。
突击不分昼和夜，决战五日星斗寒。
穷交实弹以空弹，遥望援兵云貌端。

万事休唯一自决，烧尽武器化灰烟。
烧书烧粮烧自己，遥向东天拜宫城。
高齐唱君代国歌，决然投死盘火里。
英魂远飞靖国庭，壁书句句今犹明。

一死遗憾不能歼灭八路军，
呜呼团堡士壮烈肃然千古传
昭和十五年秋
部队长陆军中佐从五位勋三等
小柴俊男作

这篇为日本法西斯匪徒歌功颂德的碑文，在叙述战斗的惨烈情景时，却也衬托出我三团作战的英勇，更流露出敌人对我们八路军的刻骨仇恨。涞源县的同志派人将碑文抄送给我时，正好是八路军“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反敌“报复扫荡”胜利结束。读了《长恨歌》，我想，日本帝国主义者不停止对中国的侵略，那么，他们的《长恨歌》是永远写不完的，现在只是开始！

巧破“铁壁合围”

一九四一年的秋季，是晋察冀边区血与火交织的年月。盛夏的酷热刚刚退去，秋风便接踵而至，山村内外柿子树的树叶纷纷扬扬地往下落。秋庄稼还未收割，日本侵略军“扫荡”的铁蹄就践踏过来了。

为了吃掉我们一分区的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敌人对北娄山地区进行了多纵队、多梯次的合击，采用了远程迂回和“铁壁合围”战术。

八月二十三日，从东、北两面向我合围的敌第二十一师团机动部队，由徐水迂回到易县、金坡、紫荆关一线。

二十四日，进到易县的敌人又迅速回头向南，进到解村和姚村据点。从南面向我合围的敌第一一〇师团一部，二十四日突然乘汽车由保定向南绕到望都，再转向西北，经完县县城、杨各庄至刘家台。同日，金坡的敌人也进到了娄山西北的苑岗和上下铺。这样，在敌酋津田美武少将的指挥下，合围我一分区的阵势就在突然间基本形成了！

八月二十四日傍晚，在北娄山西南面的周庄分区司令部里，电话铃与电键声慢慢稀落了，我们已经把一切都部署完毕，准备夜间带着机关转移。秘书陈子端和张斌正忙着整理公文箱，找挑夫。门外，一群又一群乡亲扶老携幼，背着粮食，赶着骡子、毛驴和牛羊，抱着大母鸡，有秩序

地朝狼牙山撤去。望着那一张张冷峻的脸，我心里不禁一阵发颤，为了革命，为了抗战，乡亲们又将付出血的代价，然而他们却是那么坦然，那么坚毅！

敌人的这次“扫荡”规模之大，兵力之多，来势之猛，是前所未有的。

“百团大战”后，日本侵略军震惊于八路军的伟大力量，大声疾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一九四一年，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正处于极为困难的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成立后，日本侵略军回师，搞起了“治安强化运动”，即模仿国民党反动派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提出的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为一体的“总力战”。在军事上除了更加频繁、残酷地进行“扫荡”外，还四处挖封锁沟，推行碉堡政策，逐步“蚕食”抗日根据地。在政治上，则极力强化伪组织，加紧特务活动，推行“自首”政策，破坏我地方党政组织。在经济上，除对我根据地实行封锁外，还配合军事、政治方面的需要，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六月，苏德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站在南进或北进的十字路口上伺机而动，为解除后顾之忧，便加紧了对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疯狂进攻。

号称日本军界“三杰”之一的冈村宁茨，接替了因“囚

笼政策”破产而被撤职的多田骏，继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是有名的屠杀朝鲜人民和东北同胞的刽子手，因双手沾满鲜血而被晋升为大将。他到华北的下马威，是立刻集中大量兵力，首先向我晋察冀北岳区来一次空前的大“扫荡”。冈村组织的这次大“扫荡”，号称“百万大战”，正是为了报复我们的“百团大战”。敌人在战术上采取所谓“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马蹄形堡垒线”、“点鳞式包围阵”，并大量使用伞兵和毒气。

八月二十日，冈村亲自到驻保定地区的第二十一师团，进行了巡视，视察了战场情况。同时，敌人集中了八架飞机，飞临狼牙山地区上空，来回盘旋，轰炸扫射。团长陈宗坤、政委李振声同志率领的二十团被炸，受了一些损失。过后，我听说，冈村大将当时就坐在飞机上视察，他把我一分区视为“军事区”，下令务必把一分区的指挥机关搞掉。

我们是八月十九日收到军区从娘子神发出的反“扫荡”作战方针和战术指示的。在这之前，我们接到军区命令，派一团——除留下一个三连随分区司令部行动、七连坚持狼牙山地区的斗争外，主力都到军区执行保卫军区机关的任务去了。现在，军区要求我们分区转移到外线去，避免与敌决战，以保存有生力量。

我立即与其他领导同志进行研究、部署，对部队下达了命令。早在七月二十二日，我们接到军区发布的反“扫

荡”训令和政治工作指示，就开始做了些准备。不久前，刘澜涛同志来到一分区检查工作时，就住在司令部，和我们同吃同住，对一分区的各项工作，包括反“扫荡”的准备工作，都作了指示。所以，我们这次反“扫荡”的各项工作虽紧张但并不匆忙。

为了适应反“扫荡”的作战需要，我们把司令部指挥机构搞得很精干，除了副司令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地委书记和专署专员外，身边只留作战科、情报科、通信科的一部分人及机要科的全体人员，政治部只留了少数几个人，其他的机关干部全部下到各情报站去了。我们建立的情报站是与电话站以及民兵指挥所相结合，由党政军民的基层领导同志负责指挥，为一个统一的战斗集体。

我们考虑到敌人正在“扫荡”，分区指挥机关一旦与敌人遭遇，一场恶战是少不了的。所以，我们把分区警卫连、侦察连及一团三连都放在身边。

警卫连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连队，有二百二十多人，全部用缴获的日本武器装备，有十二挺机枪和四具掷弹筒。我们还有意识地为这个连队配备了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兵。不少班长都是老战士，排长则是从各团连长当中挑选来的。

侦察连有近二百人，他们训练有素，武艺高强，也基本是日式装备。

一团三连是红军老连队，也有一百多人，其战斗力之

强，在腰站、大龙华、黄土岭等战斗中已有明证。

就这样，我们这个只有三四十人的指挥机关，率领着一支五百多人的战斗部队，既可以保障指挥，又可以随时投入战斗，行动方便，消息灵通，常常一日奔出百里开外。

敌人“扫荡”开始，照例其势汹汹，多路多层次地分进合击，图谋一举消灭我主力或首脑机关。在这个阶段，我们要“避锐”，虽然也派些小部队利用有利地形从正面或侧面杀伤敌人，监视敌人，迟滞敌人行动。但是主力一般地不和敌人接触，以便适时地跳出敌人合击圈。

夜色慢慢从狼牙山峡谷中弥漫开来，把周庄遮盖住了。我们默默地告别了这个山村，带着机关开始转移。今夜，二十团和一区队也随司令部一起行动。我们的目标，是东北方向的金坡，它在大龙华以西，一溜十八岗以东。但是，我们出了村，却故意向东走去，走了一段路，又向南行进，最后突然改变方向，急急地向东北方向奔走。这样做，是为了迷惑敌人。

警卫连连长吴炎和指导员徐信带着警卫连走在队伍的的前头，战士们一个个荷枪实弹，随时准备应付突然情况。

夜越来越深，一轮新月升起来了，清冷的月光洒落下来，使得四野里闪着一片淡淡的幽光。队伍走在山路上，山间响着急骤的脚步声，偶尔还有小石头滚动的声音。几

个小时后，队伍来到一个山脚下。

作战参谋周自为立即叫电台人员拉起天线，抓紧时间给各团发电报。电文刚发了一半，徐信同志突然报告：

“前面发现敌人！”话音刚落，枪声就响了起来。

周自为同志焦急地对徐信同志说：“这个电报很重要，还有一点没发完，能不能把敌人先顶住一下？”

徐信同志答了声：“行！”就立即带着一个排迎向敌人去了。

据侦察员报告，敌人是一个大队，估计是从涞源方向来的，正在夜行军时遇上了我们。月光下，可以隐约看到山脚下敌人的一顶顶钢盔闪着微光。我立即命令队伍迅速绕过敌人，并要连长吴炎派通信员告诉徐信同志，待我们的大部队撤走后，他们也撤下来，我在前面等他。

周自为同志把电报发完之后，让电台人员迅速收好器材，然后也撤下来，跟在我们后头。走出八九里地，我听见枪声慢慢稀落了，不知徐信他们情况怎样，便停下来等候。

徐信同志曾经在一团四连当指导员，人很精干，既能打仗，也能做政治工作，还肯学习。他是行唐、灵寿那一带的人，他们村一块参加八路军的有五个人，按年龄排列，分别改名为仁、义、礼、智、信。他的年龄最小，所以叫信。他刚调到警卫连时，老是跑来缠我，说在后方憋得慌，不如在前线打仗痛快，嚷嚷着要回战斗部队去。我

跟他讲了一些道理，他才逐渐安下心来。但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个听到枪响就心里发痒要往上冲的角色。今晚他肯定是打得来劲了。我心里有数，有他在那里顶着，一般地说，我们是吃不了亏的。

果然，不一会，徐信同志就带着战士们回来了。我听他说，他们刚迎上前去，敌人就凶猛地扑过来了，由于他们占据了有利地形，“捷克造”、“勃朗宁”和“三八大盖”一起开火，把日军扫了个晕头转向，纷纷倒地。敌人没想到碰上了这么硬的部队，在情况不明、伤亡惨重的情况下，再也不敢贸然进逼。徐信同志见大部队已经走远，便带人撤了下来，我方几乎没有伤亡，只有个别战士挂了花。

就在这天夜里，我们和二十团、一区队平安地绕过了苑岗的敌人，进到煤斗店地区。一团留下来的部队在这天夜里也跳到了狼牙山区。六团向西北转入了根据地腹地。四区队向北，三区队向东跳到了战役外线的敌后。在这反“扫荡”的初期，我们一般地都是以分散对付敌人的集中，使敌人的合击失去目标。要等敌人分散“清剿”时，我们再以集中对付敌人的分散，即集中主力寻机打击分散“清剿”之敌。

八月二十五日，我们安全地到达煤斗店地区，休息时，各个情报站陆续地向司令部报告了敌人合围南、北娄山的情况：

二十五日天刚蒙蒙亮，进到解村、姚村的两千多名敌

人，即由东而西，经界安向步乐、娄山前进。二十四日还隐蔽在满城的一千五百多名敌人，也同时由东南而西北，经白堡、龙门庄向娄山前进。各路敌人在接近合击目标时，一路变两路，两路变四路，四路变八路，最后变成十多路，一直扑向南、北娄山。进至苑岗和刘家台的敌人，也在这时南北并进，北边的进到干河，南边的进到水泉。

敌人的妙算是：即使我军能突破南、北娄山的第一道“铁壁”，也不能突破干河的第二道“铁壁”与水泉的第三道“铁壁”。

可是，敌人万万没想到，二十五日下午，当他们按照预定步骤，先打了一阵炮，然后在飞机掩护下小心翼翼地进入南、北娄山时，不但没有发现八路军，连个老百姓的影子也没有，“铁壁合围”的美梦全落了空！

徒劳无益的“合围”，使敌人象只失去猎物的野狼那样咆哮着，狂跳着，到处瞎窜。此时，正是敌人“扫荡”的高潮，我们的转移相当频繁，不停地与日军兜圈子，途中的休息时间极短，连电台天线都来不及架，常常是刚喘口气，敌人就追来了，我们只好拔腿又走。就这样，一连七天我们与军区失掉了联系，后来听说军区非常担心，还以为我们一分区的指挥机关被敌人吃掉了呢。

一天，途中休息的时候，作战参谋周自为同志把我悄悄拉到一边，说：

“三〇一^①，我有个想法要对你说说！”

我问他：“什么想法？说吧”。

周自为同志警觉地四下里望望，然后小声地说：

“我怀疑我们内部有奸细！要不敌人怎么象长了眼睛似的，我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

我沉吟了片刻，说：“也可能是敌人派出了探子，混在群众中。这样吧，咱们找个易于隐蔽的地方，然后封锁消息，这样可能会有效果。”

周自为同志点了点头。我立即把作战参谋阎佐三这个“活地图”找来，一问，得知我们附近的这座大山叫蝙蝠岭，翻过山就是涞源，这正是敌人不大注意的地方，便于我们隐蔽。

决心一下，我即命令部队克服连日转移的疲劳，进行急行军。我们沿着一条山沟，走进了蝙蝠岭与五回岭附近一个叫万年冰的小山村。这个村只有两户人家，翻过山不远就是敌人设有据点的三甲村与浮图峪。进入山沟后，我命令部队把口子封死，来个只准进，不准出，六亲不认，就是天皇老子也不让出去，以防走漏消息。这一招还真灵，敌人失去了目标，没有跟上来。事实说明，敌人的探子就混在逃难的群众中。我们当即对一些跟进万年冰的逃难群众进行审查，很快地便找到了一个伪装成乞丐的敌探。

① 即：反“扫荡”中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的代号。

我们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安稳地住下来，架起电台天线，开始与军区及各团联系。不一会，各团都陆续回了电报，报告了各自的情况。

饭做熟了，揭开锅，嗨，真香！香极了！在艰苦的反“扫荡”中，能舒舒服服地喝上一顿小米粥，简直算是一顿山珍海味了！

不曾想，一顿饭还没吃完，机要科副科长强培珊同志跑来，对我说：

“聂司令员拍来了一份电报。”

我放下饭碗，接过电报一看，电文的大意是，军区机关周围都是敌人，南下不容易，固守也很不利，你们哪里情况如何？

我想，军区聂司令员那里的处境一定十分困难，可聂司令员关心的却是我们。为了不使机关、部队和群众的情绪产生波动，我当时什么也没说。

一阵铮铮呀呀的胡琴声响起来了，好些人围在那里看热闹。原来，训练科长李清川和作战参谋阎佐三吃完饭，从那两户老百姓家里借了把老掉牙的胡琴，杀鸡似地“锯”起来了。周自为同志则坐在一边，专心致志地用他自己配的墨水记着反“扫荡”日记。我没有惊动李清川他们，只把周自为同志叫了出来，让他看了看聂司令员发来的电报，然后叫他立即拟个电文，大意是：电悉。我处安全无恙。若需要，我即派一至二个团前去接应，以配合一团保证军

区机关的安全。

电文拟出来后，我看了一下，便立即交待机要科长让他赶快发出去。我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却心急如焚。我知道，此时敌人正集中主力包围军区，妄图以歼灭军区领导机关来显示所谓“大日本皇军的圣战奇迹”。然而，我坚信，身经百战的聂司令员，会在万难之中化险为夷的。不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电报发出去了，却没有得到回音，随后军区电台的信号也完全消失了！

我一阵心悸，在极度不安中期待着。

一天、两天过去了，无论我们电台怎样呼叫，都收不到军区电台的回答。

后来得知，延安方面也失去与晋察冀军区的联系，不管延安电台日夜呼叫，军区电台都没有回答。八路军总部的首长们忧心如焚，以为晋察冀军区出了问题，派出专人前来寻找、联系。

这个时候，我一方面叫周自为同志通过情报站了解情况，一方面要秘书陈子端打开收音机，注意收听广播，特别是日伪方面的新闻。

秘书陈子端负责保管一台收音机，装收音机的木匣子还是我帮他钉的，他经常收听我方和敌方的广播，把重要的内容记下来，送来给我们参考。不久，他就听到敌人广播的一则消息，说什么“聂总部的电台已经被英武皇空军的

勇士炸毁，今天已是第三天听不到聂总部的电台发报了”。

听到敌人广播的这则消息，反而使我有些放心了，因为“聂总部”的电台没有出现，并不等于“聂总部”不存在了，何况电台是否被炸毁还很难说呢！我估计，敌人可能是先从军区的电台方位上，侦听到了军区指挥机关的位置，然后合击的；而军区首长可能也察觉到这一点，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便于转移，才暂停电台联络的。想到这里，聂司令员那种大敌当前仍泰然自若的神态又出现在我的面前。的确，在这次秋季反“扫荡”开始时，聂司令员带领军区机关仍然留在中心区，就是为了指挥全局，吸引住敌人，好让军区主力和各分区部队跳出外线去打击敌人，这个目的达到后，他才考虑如何率领军区机关突围。

很快，我的判断得到了证实。

机要科报告，收到军区一部电台从阜平方向发出的信号，奇怪的是发出的电文常常是答非所问。我们猜测：这可能是军区为了迷惑敌人，有意派出来暴露目标的电台。这时，周自为同志也把各情报站的报告汇总送来了。根据情报分析：军区确实暴露了。他们陷入敌人合击的重围中，但是现在又隐蔽起来了。敌人正在团团乱转，寻找目标。

九月六日，我们终于收到了军区安全跳出敌人“铁壁合围”的电报。原来，军区机关和直属部队近千人在转移途中，正巧与也在转移的中共中央北方分局、边区政府、北岳区党委、分局党委、北岳区党校及“抗大”二分校相

遇，总人数近万人，全都挤在一个东西约二十五公里，南北约三十五公里的敌人重兵合围的圈子内，而且已暴露目标。敌人广集重兵，愈逼愈近，敌机也不断地飞来轰炸，情况极其严重。军区首长经过周密研究和反复分析，最后决定沿着西、北两路敌人合击的空隙，跳到了常家渠一带的山区。聂司令员亲自指派一个五十多人的侦察小分队，携带一部电台，到雷堡以东的台峪一带去暴露目标，使敌人中了计。七千多名敌人分多路合击台峪，扑了个空。聂司令员他们则跳到了常家渠，在靠近敌人交通要道、不引人注意的山村隐蔽了两三天，几次准备突出去，都因发现敌人正在开进而退回。最后，他们钻了敌人的空子，才巧妙地转到了外线。

在敌人疯狂捕捉我们各级领导机关时，我们跳到外线的主力部队与坚持在内线斗争的部队、地方游击队、民兵密切配合，狠狠地打击着敌人。我二十团在干河打了个漂亮仗。分区的其他部队在劳山，东邵地区阻击了由姚村、解村出动的敌人，给了敌人很大杀伤。易县的敌人出动两辆汽车，载着四十多名步兵赶来增援，也被击退。各地游击小组和民兵英勇顽强地对敌开展着斗争。他们带着土枪，土炮、步枪、手榴弹和地雷，破坏敌人交通，监视和侦察敌人情况，在敌人必经道路上埋设地雷，在村庄和房舍内到处拴挂土造手榴弹，并采取伏击、袭扰和麻雀战等战术打击敌人。

我从军区得知，中央和八路军前方总部一直密切地关注着晋察冀边区的反“扫荡”斗争。前方总部命令冀鲁豫和晋绥军区同时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冀中军民也发动了大规模的破袭战。敌遭重创，不得不从“扫荡”地区抽出一部兵力，转到战役外线。从九月四日起，北岳区敌人把总兵力的三分之二约四万多人，陆续撤到各战略要点和交通干线上，一面伺机而动，一面对我边区继续实施分割、封锁和“蚕食”；另以三分之一的兵力约两万七千多人，仍然盘踞在我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实行“奔袭”、“搜剿”、“辗转剔抉”。光在我们一分区的塘湖、管头、岭西、龙门庄地区就有五千多敌人，雁北、灵邱的上寨、下关地区有一千多敌人。

我们离开万年冰，准备返回狼牙山一带。我带着十几个人走在前面，从一座叫穆家寨的大山中穿过，向合婚台走去。合婚台是山下的一个村子，据传是因为古代有一名守三关的将军在此结婚而得名。我们分区的供给部长董永清的爱人就是这个村里的人。

没想到，我在这里遇上了涞源县县委书记李斌以及他带着的几个县委干部和警卫员。我们又惊又喜。去年进行“百团大战”之中的涞灵战役时，李斌同志负责战地动员，支前工作做得很出色，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司令员，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李斌同志紧紧地握住我的手问。

我把我们的转移经过简单说了一下，然后开玩笑地说：“我是特地到合婚台来喝喜酒的。”

我们在合婚台歇了一下脚，吃了一顿饭。我对李毓同志说，军区已经发出了反“扫荡”第二阶段的作战指示，我们将适当地集结一部分主力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消灭敌人的搜山“清剿”部队，并采取更大的分散、游击动作，打击汉奸、伪政权，恢复社会秩序。我要李毓同志警惕那些伪装成我军指战员和化装成当地群众深入山沟来“剔抉”、“清剿”的小股敌人。

李毓同志直点头。他把我们送出好远，才返回合婚台。

没想到，半个月后，我们赖以与敌周旋的狼牙山，却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这是因为一般人都认为狼牙山的地形好，在这一带活动的党政军民往往以它作依托。一到敌人“扫荡”，除了能跳到外线去的以外，大多数人都习惯性地沿着狼牙山伸出来的沟沟壑壑，向狼牙山的纵深转移。一般小“扫荡”，敌人兵力少，的确不敢深入到纵深去“清剿”，所以也就掩蔽过去了，可是，那时早就有人说过，这样盲目地往狼牙山钻，狼牙山里的人挤多了，迟早会吃敌人的亏。果不其然，这次敌人是大“扫荡”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敌人在我们一分区制造了一个惊人的大惨案。这天凌晨，盘踞在塘湖的敌人突然出

动，把狼牙山下的南淇村和北淇村包围了。除少数乡亲在民兵掩护下跑出去外，绝大部分男女老幼统统被日军赶到一个大土场上。然后敌人进行惨绝人性的大屠杀，除了扫射、活埋、刀砍、枪挑等惯用手段外，这次还增加了开膛破肚、用铡刀大卸八块、剜心、挖眼、活剥皮、喂洋狗、点天灯、滚水烫、毒气熏等。日军还逼着乡亲们跳入水井，不跳，就用刺刀刺、枪托打。他们把近百名男女老幼投入几口大井中，然后叫伪军搬来一块块大石头，将井口封死。土场上的乡亲见此惨状，有的怒骂不已，有的号啕大哭，哀恸之声，传出数里外。日军还在光天化日下，凌辱妇女，屠杀儿童。他们用带钉的皮鞋踩烂婴儿的脑袋不说，还将其倒提着撕开两条细腿，扔在其母亲跟前。土场上鲜血流得到处都是，两个村子的房屋大部被烧光，几百名群众统统被残杀。

南、北淇村大惨案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我们司政机关，好多同志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流着泪跑到我这里来，要求我下令，让部队出击，消灭这股敌人，为乡亲们报仇。

敌人在这次秋季大“扫荡”中，已经由以往混乱的烧杀掠夺，变成为残酷地执行华北方面军的“肃正计划”：“为了消耗、困死共产势力，以主力参加此次作战，采取彻底封锁和消灭共军根据地的行动。”

我估计敌人还有更大规模的进攻，便告诉大家现在还不是出击的时候，应当避敌锋芒，等待战机。仇，迟早要

报。

几个同志陆续走了，只有教育科参谋胡尚义不肯走。胡尚义同志是从赵玉昆部队改编过来的。赵玉昆叛变之后，胡尚义一提起赵玉昆的名字就骂个不停。此时，他两眼通红，象要喷出火来。他对我说：

“听说血洗南、北淇村的伪军，也有赵玉昆的人。司令员，你让我到战斗部队去吧，我一定为乡亲们报仇！”

胡尚义同志的心情，我完全理解。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从游杂部队转到八路军以后，学习努力，进步很快，整天想打仗，我答应考虑他的要求，他才走开。

敌情不断报来，情况越来越紧张。进攻我们的敌人，是敌华北方面军的乙兵团，由步兵第一三三旅团及各配属部队组成，兵团长是步兵第一三三旅团长井田美武少将。乙兵团曾于八月十四日与丙兵团一齐对冀中地区进行了疯狂“扫荡”。然后改变攻击目标，转向冀西进袭。与此同时，易县、金坡、满城、徐水、大王店等据点及保定守敌也如毒蛇一样纷纷出洞，向我扑来。塘湖敌人的先头部队一占领南、北淇村，主力也就倾巢而出^①了。由于有赵玉昆的伪军带路，所以日军开进速度很快。

① 对这次大规模行动，日本《华北治安战》一书记载：“二十三日拂晓，乙兵团由定兴、方顺桥附近分三路纵队西进，对盘踞于满城北方的北娄山附近的第二军分区司令杨成武指挥的约有五千人的部队开始了围攻。由于一部分共军据守北娄山西北方的坚固阵地进行顽抗，我军在空军的密切配合下展开了肉搏战……”

我们布置好了全分区的反“扫荡”工作，然后从周庄经上、下隘刹向西转移。在转移途中，我得知敌人已经拉开一个巨网，把整座狼牙山包围了。

二十四日中午，司令部转移到了张家庄。这里离狼牙山挺远，要走两天的山路才能到达。一到张家庄，我立即通过“飞线”向被包围在狼牙山上的一团团长邱蔚了解情况。

在这次反“扫荡”中，一团主力奉命去保卫军区，留在狼牙山的少数部队，由正在山上养病的邱蔚同志率领。此时，邱蔚同志在电话里焦急地说：

“司令员，情况很紧张啊！我们和敌人从早晨打到现在，敌机轮番轰炸、扫射，敌人的炮弹也落到了棋盘坨上。山上被围的除了我们一团外，还有易县、定兴、徐水和满城四个游击支队和四个县的党政机关人员以及狼牙山周围村庄的群众，合计三四万人哪！怎么组织这么多人突出去呢？我的脑袋都快要炸了！”

今天清晨，三千五百多名日军带领着伪军开始从各个方向进攻狼牙山，他们在日本侵略军山地战指挥官高见的率领下，堵住山口，在所有进出道路上都布置了重兵，然后兵分九路，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张牙舞爪地向狼牙山扑去。令人切齿的是，赵玉昆这个十恶不赦的叛徒，已经由敌人的特务部长和保安联队长升任警备团长，他也耀武扬威地率领着伪军来包围狼牙山。

接到邱蔚同志的报告，我和高鹏、黄寿发、罗元发等

分区领导同志及地委书记王国权、专署专员李耕涛同志都紧张起来。原先我们估计，易县、定兴、徐水和满城四个游击支队边打边退，是会撤进狼牙山的。一些地方干部和群众也会在反“扫荡”中进入狼牙山隐蔽。但没想到人数竟多达几万。于是，我握着电话筒子对邱蔚同志说：

“现在，四个游击支队归你统一指挥，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顶住，决不能让群众受损失！你随时报告情况。我们一定想办法尽快给你们解围。”

放下电话，我们分析了形势，一致感到眼下即使邱蔚他们能凭借天险及我们改造过的地形守住阵地，也解决不了被围在狼牙山上几万人的吃饭问题，所以必须组织突围！

事不宜迟，我立即给各个情报站挂电话，要他们尽快查明各处敌人的情况，迅速报来。

一阵阵秋风呼啸着掠过张家庄。我遥望着狼牙山方向，等待各地的敌情报告。这里自然听不到狼牙山的枪声。但我能想象出那里的激战场面。狼牙山的告急电话也一个一个地打来。

邱蔚同志向我报告说，有几股敌人已经上山了，但被盘陀路弄得晕头转向，在那里瞎转，象狼一样嚎叫。群众非常紧张，战线剧社有一个刚当兵不久的小鬼，在敌机的轰炸中退到棋盘陀上，被吓得有些精神失常了，钻到一块大石头底下又哭又叫，说什么“共产党、八路军啥时候都行，

这回不行了！完了！完了……”

怎样帮助邱蔚他们掩护地方党政机关和乡亲们突围呢？我们决定先查明各处敌情，然后，设法调动敌人，只要空出一个长约十多里的口子，他们就能够突出去。而要查明敌情，现在全靠情报站了。

我们的情报，大部分是由各个情报站通过“飞线”报来的。每个情报站都有电话机，能及时报告敌情，传达上级指示。情报站的站长，是分区情报科和敌工科、锄奸科派去的。情报员有武器，与周围村庄的民兵结合战斗，情报站也就是民兵指挥所，他们可以独立作战。每次反“扫荡”，我们的机关干部就下情报站去。负伤掉队和失掉联络的人，只要找到情报站，就会很快地找到部队。除了山里的情报站外，保定、张家口、易县周围还有我们的几个大情报站。保定南关，每天不知有多少化了装的情报员在那里转来转去。情报员与城里的亲戚朋友串起来，一得到情报，马上用电话传回分区司令部。这样，敌人稍微动一下，我们都一清二楚。一般说，敌人准备大“扫荡”，我们都能提前一星期左右知道。一打仗，各地的情报站更是紧张地工作，注意搜集各方面的情报。现在，我为了指挥一团和几万人突出狼牙山重围，正迫切地需要了解狼牙山周围的敌情！

各个情报站通过“飞线”很快地就把敌情报来了：狼牙山周围的干河、毛儿崖、管头、东西水、松山、娄山、淇村、菜园、雪麓岭、碾子台及九莲山都有敌人。情报站

把各地的敌人兵力都搞清了。我立即给邱蔚同志挂电话，说：

“现在整个情况已经明了，我们来个‘围魏救赵’^①吧。我调集三团和二十团的全部兵力，从上、下隘刹和岭西打出去，猛攻管头、娄山、松山和周庄一线的敌人，让敌人误认为我们主力要同他决战，从而把九莲山和碾子台那一路的敌人吸引过来。敌人如果中计，就会空开十多里长的一个口子，你们就可以突出去！”

邱蔚同志兴奋地说：“那好极了！我们现在就做突围的准备。”

“对！先做好准备，到时候我通知你，争取在今天晚上让地方干部和群众全部突出去。”我思索了一下，又对邱蔚同志交待说，“应该留下一个连掩护，与民兵配合好，争取明天打半天，使敌人误认为你们没有突围。这个连队完成掩护和诱敌任务之后，再沿着盘陀路秘密撤走。”

邱蔚同志接完电话，忙着布置、动员去了。我也开始调动部队了。

黄昏后，三团和二十团从岭西，隘刹，东、西武家庄子和刘家台一带，如猛虎下山，同时出击，管头、松山一带的日军伤亡惨重，赵玉昆的伪军更是被打得落花流水。敌人顶不住了，认定是我们的主力要吃掉他们那几个据

① “围魏救赵”是古代兵法《三十六计》中的一计。

点，便纷纷告急。这时，我寸步不离地守在电话机旁边，等待敌人上钩。不久，九莲山、碾子台、雪麓岭等地的情报站都报告敌人有调动的迹象。我要他们继续监视，等敌人撤离当地便立即来电话。

半夜时分，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情报站来电话了。站里的同志兴奋地报告：

“九莲山、碾子台和雪麓岭的敌人奔北娄山方向救援去了！”

我一听大喜，忙问：“敌人空出的地方有多宽？够不够十里？”

“不止，大概有二十多里呢，九莲山、碾子台、沙岭子、雪麓岭一带一个敌人也没有了！”情报站的同志肯定地说。

我当即给邱蔚同志挂电话：“邱蔚，我同你讲，敌人的口子开了，你们可以突围了！记住，从姑姑坨西边那条盘陀路过去，绕过上次我们坐在那里吃柿子的歪脖子树，再插向我们曾经铺作战地图的那块大石头，那正是敌人的空子。突出去后，赶紧把老乡们分散到牛岗和大良岗一带。你们在东、西田岗稍作休息，就插向平汉路，直捣敌人的铁路交通线，不愁日军不退兵！”

夜，秋风呼呼地刮着。邱蔚同志把一团七连留在狼牙山上掩护，自己带着各县游击支队、机关干部和群众开始转移。他们沿着秘密的盘陀路，悄悄地向口子走去。自从

去年春我们对狼牙山等几座主要山峰进行地形改造以来，一团、二十团和民兵们不知流了多少汗水，有的同志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历时一年半，终于完成了战场准备。为了更好地熟悉地形，以便在战斗中与敌人巧妙地周旋，一团曾在山上反复进行过演练，练得每个战士都如识途老马，又似山中猛虎，会打会藏，能攻能守。现在正是关键时刻，准备好的战场起了很大作用。

邱蔚他们转移的时候，三团和二十团与从碾子台赶来的敌人接上火。敌人来势凶猛，一心想与我们决一死战。我要这两个团顶住，等乡亲们和一团全部悄悄地跳出敌人包围之后再撤兵。

“司令员吗？我们全都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至今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邱蔚同志终于向我报告了这个好消息。

“围魏救赵”成功了！司令部的同志们都很兴奋。我当即命令三团和二十团：

“撤！”

三团和二十团真是来似闪电，攻似霹雳，撤似疾风。日军刚刚摆开阵势，想一口把我们的“主力”吞掉，不料我们的两个团一眨眼就钻进夜色笼罩的山里，无影无踪。这时候，日军象只疯狗，在山野里乱窜乱咬，直打转转。

我看目的已经达到，便带着司令部赶紧转移了。

离开张家庄之后，我们经水泉连夜转移到一个两山夹峙的小山村，村名叫大新开沟。我把警卫连连长吴炎找来，要他立即放出警戒。吴炎同志应声跑了出去，亲自带着四五十人向山沟两侧的山坡爬去。

通过“飞线”，我们很快便与一团联系上了。邱蔚同志报告说，从狼牙山突围出来的几万名党政机关人员和老乡，正在向牛岗和大良岗一带分散，一团已经到了东、西田岗，正在搞饭吃，吃了饭就准备奔袭平汉路。

我们在大新开沟住下来，管理科长曹凌居然买到些猪肉。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分到了一点红烧肉，都很高兴。教育科参谋胡尚义特别兴奋，因为我们已决定派他到侦察连任代理连长，训练科长李清川找吴炎同志商量过了，决定从警卫连调两挺机枪配给胡尚义同志。吃罢饭，他就要到侦察连去上任了。这时候，他满脸笑容地把自己一份红烧肉和译电员苏国柱的一份倒在一起，两个人欢欢喜喜地抢着夹肥肉吃。

下午三点多钟，狼牙山“通天顶”上的观察组向我报告：

今天清晨，五百多名日军带领着伪军开始向狼牙山总攻。敌人以为围住了一团主力，又是用炮轰，又是飞机炸。七连连长刘福山和指导员蔡展鹏带领全连，在民兵配合下分兵把口，与冲上山的敌人浴血苦战。在胜利完成掩护群众突围的任务之后，六班留下来继续掩护，连主力沿着盘

陀路向外突围。六班五位同志在连主力突围后，为了不暴露群众撒走的方向，毅然把敌人引向棋盘坨高峰上的绝路。现在，敌人正在疯狂地向他们扑去。在望远镜里，可以清楚的看到五位同志的投弹和射击动作。

仿佛有人把我的心突然掏走一样，我屏住了呼吸，似乎听到了一种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依稀可辨的声音——那是激战到最后时刻的异常壮烈的呐喊！我知道，这五位同志，是突不出来了。

不一会，从“通天顶”观察组的“飞线”里又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七连六班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砸坏手中的枪支，纵身跳下了万丈悬崖！

屋子里静穆，肃然。我为有着崇高民族气节的英雄战士骄傲！为我们巍然屹立的狼牙山骄傲！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骄傲！门外，秋风一阵接着一阵呼啸而过，那风声里仿佛夹着一首悲壮的歌。

山沟里天黑得早，下午四点钟左右，太阳就沉到山背后去了。侦察员报告，川里和甘河净一带发现敌人。也正在这时，狼牙山下的一个情报站通过“飞线”向我报告说，狼牙山棋盘坨寺庙的李老道特地跑下山，要情报站设法赶快转告我，有五位八路同志在棋盘坨附近的险峰上英勇跳崖，其中两位被挂在凌空伸出的小树上，是死是活不知道，请赶紧派人去营救！

多好的棋盘坨老道呀！我当即让情报站代我向李老道致谢，同时，赶紧派人去营救那两位战士。

大平地情报站和我们派出的侦察员，不断地报告周围的敌情，估计敌人马上就要合围大平地一带。我们匆匆地吃了晚饭，又转移了。警卫员李旺仁看到还有点剩饭，就急急忙忙地帮我装了一盒子，放进了他的挎包。

黄昏时分，我们集合队伍离开了大新开沟，准备跳到安全的地带去。谁知我们这一跳，却正好跳进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中。

梯子沟突围

我们离开大新开沟后，走进了一条又长又黑的山沟，不一会，落了一阵小雨，我们一不小心，就要踩进水坑，或者是被挡路的石头绊一跤。

队伍向西南走，准备过了三岔口以后直奔玉皇庵，然后跳到花塔北山中。出发之前，我与高鹏、黄寿发、罗元发、王国权、李耕涛等同志研究过转移路线。我们周围的敌人太多，走到哪里都不太安全，应该跟敌人换个防——他们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干脆到他们那里去，跳到紫荆关、金坡方向去，跳到狼牙山北面去。有的同志认为应该突向花塔北山，那里可能比较安全。我也同意，因为大良岗的敌人已经向干河压了过来，从涞源出来的敌人也到了银坊，

有向玉皇庵进逼的迹象，我们不能再犹豫不决，得尽快跳出去。

花塔北山是一座陡峭的大山，山西是银坊、川里。山南是唐河。唐河那边是三分区。这个山区远离大路，平时没有敌情，我们的部队也很少去进驻，它偏居一隅，通讯闭塞。这种地区要么敌人不敢进去，要是进去，兵力一定少不了。我们跳到这个地区以前，由于这个地区通讯闭塞，对敌情作了错误的判断。

过了玉皇庵，我们来到一个叫石家庄子的山村，然后摸黑攀登花塔北山。山路立陡立陡，我们手脚并用，每向上移动一步，都得小心翼翼，花费不少气力，若不小心掉下了去，恐怕连尸骨也都难找。

我们七百多人爬上花塔北山上的北当山头时，已是拂晓时分。同志们实在走不动了，一个个又饿又累，东倒西歪地瘫坐在山坡上，准备生火做饭。我心里不踏实，赶紧叫作战参谋周自为通过“飞线”搜集情况，同时拿起望远镜向山下的花塔方向望去。可是下面灰蒙蒙一片，看不真切。

过了好一会，天蒙蒙亮了，我又举起望远镜一望，不由得大吃一惊：好家伙！花塔周围，日军的帐篷一个连着一个，密密麻麻，数都数不过来。想不到，我们千辛万苦跑了一夜，自以为把敌人甩开了，最后这么一跳，却正好跳进了敌人的另一个合击圈。因为敌人在“扫荡”期间不

只是搞一个合击圈，有时是一连搞几个合击圈，有时是大圈套小圈。

事情的严重还远不止此。正当我们研究突围办法时，发现山上还有冀中军区后勤部人员和白求恩军医学校的学员以及逃难的群众，男女老少约莫有两千多人。这样，我们被敌人围住的人员总数，已近三千人了。

情况出人意料，万分危急！看来敌人是同时在有计划地合围这座山的。果然，八点钟以后，山下的敌人就排成进攻队形，开始推进了。敌人虽然不知道山上被围住的有多少人，但是他们那四面并进的架势，是一心想拉大网、捞大鱼的。

冀中军区后勤部的王文波政委和“白校”的俞忠良政委、二队队长丁一同志知道我上了花塔北山，都连忙派人来找我联系，要求我们带他们一起突围。花塔和南、北清醒一带，是冀中军区的后勤基地，他们一直在这一带跟敌人周旋，至于“白校”，在这次反“扫荡”中他们分为两队，一队由校长江一真带领，二队由政委俞忠良带领，从学校所在地葛公分头转移。上花塔北山的是二队，两百多人，女同志将近占了一半。二队几次被敌人发现后追赶。向导带着这些年轻的学员满山钻，不分昼夜地同敌人兜圈子。他们虽没多大损失，可也极度疲劳了。

说实话，在目前情况下突围，如果光是我们这些惯于征战的人，会好办些，难就难在有这么多手无寸铁的男男

女女啊！可他们全是我们的兄弟姐妹，特别是“白校”学员，都是知识分子，不少女同志放弃了名门闺秀的优裕生活，自愿参加八路军，抗日救国。他们是我们整个革命队伍中不可多得的宝贵人才，说什么也得把他们带出去！

我立刻答应带他们突围，只是要求他们服从统一指挥。情况紧急，我们被围的人又这么多，行动必须越快越好。应该承认，我们跳到花塔北山是一个失误，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失误，我们才和花塔北山被围的一二千名后勤人员巧遇，才可能带着他们突围。我想，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沉着、冷静，准确判断敌情，以迅猛有力的冲击撕破敌网，从内线跳到外线。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责任担当起来。

《三十六计》的最后一计名之曰“走为上”，是一条败战计。今天我们陷入重围，兵力对比十分悬殊，当然也只有“走为上”了。关键是怎么“走”，才走得出去。

根据几个情报站的报告，从银坊过来的敌人已经占领了玉皇庵，正在向石家庄子推进；南面清醒一带也发现了敌人，正由杨家台向石家庄子合围；西南面的川里也冒出了敌人，正和花塔的敌人一起逐渐把大网推向花塔北山。这时，用望远镜已经可以看见远方的多路敌兵了。

我周围站着不少人，一个个都焦急万分：

“司令员，怎么办？”

“司令员，快作决定吧！”

现在，情况渐趋明朗了：敌人合围的会合点是石家庄子，他们正在努力把那个缺口封住。从地图上看，石家庄子附近有一条梯子沟，据我情报站报告，那里尚未发现敌人。我想，我们可以把它选作突围路线。但是，要跳出敌人的合围圈子，此意图不可暴露过早。否则，敌人发觉了会咬住我们不放。由于部队太疲劳，再发生新情况，难以应付，所以我们必须在敌人的合围圈将要形成而又未合拢的时候，即类似战略学中讲的“利害变换圈”选择对我最有利一处间隙，猛地冲出去。

中午十一点钟左右，我们看到，山下两股敌人正从两个方向同时朝一个目标——石家庄子开进。我终于下了决心，说了一声：

“突！”

一声令下，队伍便“呼”的一声，跑步向东北方向冲去。

花塔北山的陡峭，我们昨天晚上就领教过了。现在我们在大白天里下山，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些连山羊和猿猴都难攀的“路”，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昨晚就是从这里上的山。

“白校”的一些女同志又紧张，又疲劳，两腿发软，只好靠别的同志用绳子拉着带下山。

到了梯子沟口，我命令侦察连和一团三连抢占两侧阵地，掩护突围。侦察连负责顶住北边从玉皇庵扑过来的敌

人，三连负责顶住南面从杨家台过来合击的日军。我对两个连长下了死命令：

“你们死也得把敌人顶住！队伍没有走完，你们不准撤下来！”

侦察连代连长胡尚义和三连长用严峻的目光注视着我，坚定而急促地应了声：“是！”转身跑去，带着连队飞速占领了沟口两侧高地。

我回头看了看高鹏和黄寿发同志，说：

“我带警卫连在前头向梯子沟突。老高你殿后，负责检查山上还有没有我方人员，若有的话，叫他们都撤走，一个也不能留下。老黄，你蹲在沟口，等两个连完成掩护任务之后，再把他们收拢回来！”

我的话音刚落，枪声大作，流弹从我们头顶上空“嗖嗖”飞过。我两个连队分别跟跑来堵截的敌人接火了。敌人来势很猛，战斗很激烈。两个连要顶住数倍于我之敌，是得付出血的代价。

这就是梯子沟吗？两面刀削似的危岩绝壁，宛如铁青着脸静立着，凜然可悸。一条狭窄潮湿的山石小径闪烁着古怪的绿光，象梯子一样向上延伸，叫人望一眼就觉得头晕目眩。偶尔有哪位同志不慎将枪托或水壶撞在石壁上，其空谷回音会使人绷紧的心弦发出震颤。我是在闽西山区长大的，可从来也没见过象这样险恶的绝壁和可怖的深沟。现在，对我们这支全部进了沟的两三千人的突围队伍来说，

最危险的不是阴冷的石沟和森然的峭壁，而是前面某个拐弯处随时可能射出敌人的子弹，被日军封死在这条狭长的深沟里。

是啊，我们必须快速通过梯子沟！

我带着便衣侦察班和警卫班走在队伍前头。战士们枪上着刺刀，提着手榴弹前进，把我和周自为、徐信同志夹在中间。我们身后，是长长的突围队伍。

山沟里起了雾，淡淡的雾霭虽然有助于我们隐蔽，却也使我们不易发现埋伏着的敌人。我们小心翼翼地前进，随时都准备与敌人遭遇，决一死战。我也作好了最坏的打算：

万一出口被敌人封死了，那就组织部队一批又一批地舍命往外突，以几个甚至几百个人的牺牲，去换取一条通路。能突出去多少算多少。

走了两里多地，我们接近了沟顶。

关键时刻到了。

我放慢脚步，弓着腰一步一步地向前挪。突然，前面的人影停住了，便衣侦察班向我报告：

沟口外的山头上发现日本哨兵！

最危险的事终于发生了，我们被敌人堵住了。

说来也怪，在这紧急关头，我反倒一下子平静下来，匍匐着向沟口前进了几米，隐蔽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探头往沟外望。可不，透过薄薄的山雾，只见离我们三四百米

处的山岬口上，有一个头戴钢盔，身穿黄色日本军大衣的人在那里放哨。

“事到万难须放胆。”我突然想起在长征中带领红四团飞夺泸定桥时喊过的那句话。我对周自为、徐信和内卫班班长曾荣昌同志说：

“派几个人悄悄摸上去，设法把敌人哨兵捉住，了解一下敌情，以便突围。”

曾荣昌同志说：“司令员，我去吧！”

我点了点头。

曾荣昌同志马上叫出四五个人，隐蔽地向前爬了过去。

曾荣昌是江西瑞金人，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在多次险恶的战斗中，他大胆、心细，从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他已经当了多年警卫班长，他带出来的警卫班武艺高强，每个人都配有二十响驳壳枪和马刀。在这种关键的时候，把他们派出去，我想能捕获敌人哨兵。当然，我也准备好了另一个方案，要徐信同志告诉警卫连连长吴炎叫警卫连隐蔽好，万一敌哨兵没被捉住，敌人发现了我们，封住了梯子沟出口，那么，警卫连的这两百多人马上强攻，占领沟外两侧的山头，后面的侦察连和三连则不惜一切代价杀开一条血路，让冀中军区后勤部和“白校”的人员突向大平地。

一切都部署完了，我静静地隐蔽在石头后面，睁大眼睛注视着沟外的山头。雾气越来越浓，那个敌哨兵的钢盔

也看不清楚了。我不知道曾荣昌他们是从哪里摸上去的，此时，大概整个梯子沟的人都知道前面发现了敌情，大家都静静地隐蔽着。我望着沟口外那个被云雾慢慢罩住的山头，心急促地跳动着。

“扑通！”象一个装了重物的麻袋倒在地上，警卫班的战士把一个被塞住嘴巴的人掼到我跟前。捉到了！敌哨兵被抓到了！我一阵惊喜，顾不得向气喘吁吁的曾荣昌了解捉敌哨兵的经过，便马上叫来了懂点日语的同志，准备审问“舌头”。谁知，敌哨兵嘴里的布一被扯开，吐出的第一句话却使我们在场的人啼笑皆非：

“抓错了！你们……闹误会了！我是冀中军区后勤工厂的哨兵……”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抓了自家人！也怪这个冀中军区后勤工厂的哨兵，偏偏要把日本钢盔和军大衣穿戴起来，弄了一场这么大的虚惊！

“别人缴获敌人的……送给我，天冷，我就戴上了……”那人内疚地解释着。

我急忙向他询问前边的情况。他告诉我，冀中军区有一个工厂就在张家庄附近，有一百多人，是昨天转移到这里的。跟我们突围的冀中军区后勤部的同志也证实了这个情况。这下子，我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这可是几年来我们处境最危险，最紧张的一次突围啊！

大平地的情况仍然不明，那里情报站的人员都疏散了。我要便衣侦察班派出两名侦察员，立即出发，前往大平地摸清情况。此时，被堵在梯子沟里的两三千人，陆续出了沟。最苦的算是“白校”的女同志了。她们近半数是不满二十岁的姑娘，有的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身上背着沉重的背包、粮食和医学讲义，有的还背着枪。连续艰苦、紧张的突围，使她们的脸上、手上和军衣上都被泥土和青苔蹭得乱糟糟的，裤管被荆棘割破了，腿脚鲜血淋漓。有几位姑娘披头散发，脸色苍白，被同伴搀扶着，一拐一拐地走。战争年代的女同志，确实比我们男同志艰苦得多！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姑娘们能在暗夜里爬上陡峭险峻的花塔北山，能在敌人合围的危急关头跟着我们急行军，通过这狭长而又阴森的梯子沟。

最后从梯子沟里走出来的，是黄寿发参谋长和两个舍生忘死掩护我们突围的英雄连队。战士们满脸硝烟，衣冠不整，很多人身上带着血迹。在所有突出重围的同志敬佩、感激而又沉痛的目光中，他们搀扶着伤员，背着牺牲同志的遗体，迈着沉重而又坚定的步伐，缓缓地走来。我赶上前去，紧紧地握住黄寿发同志的手。他告诉我，敌人发现我们突围队伍进了沟之后，越发疯狂地向侦察连和三连猛扑。敌众我寡，两个连队打得异常艰苦，最后都被敌人压至离沟口仅一里处，伤亡也越来越大。但是他们死也不撤。直到高鹏同志通知他们，我方人员已全部进入沟里，他们

才边打边撤，把战友的遗体 and 重伤员抢了下来。敌人虽然伤亡惨重，但是他们不清楚有多少人进了梯子沟，更主要的是，他们的任务是合围花塔北山，所以没有追入沟内进行报复。

“两个连队一共伤亡了四五十人。胡尚义同志在战斗中非常英勇，负了重伤，仍然舍命顶住敌人。被背进沟里后，他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就牺牲了。”黄寿发参谋长用沙哑的声音报告说。

“胡尚义?! 小胡!”我心里一震，痛惜地喊出了声。

二十多具烈士的遗体，被并排放置在铺满落叶的小洼地里。人们望着他们，泪水都涌出了眼眶。“白校”的女同志不忍看，掩着脸哭出了声。我脱下军帽，依次在每位烈士的跟前伫立片刻。他们都那么年轻，不少人不足二十岁。仅仅一个小时前，他们还在厮杀，还在呐喊，可现在，就象一群劳累过度的兄弟，一动不动地依靠着躺在一起。他们伤口上的血迹还未干啊! 为了抗日，为了战友，他们把一腔热血洒在梯子沟。

一张熟悉的、清瘦苍白的脸出现在我面前——啊! 胡尚义，我的好同志，我在危急中给你下了死命令，然而我多么盼望你活着归来呀! 但你却双目紧闭，不能再看一眼你用生命掩护突围出来的战友，不能再看一眼你曾经战斗过的祖国大地了!

起风了。一阵阵秋风掠过梯子沟口，凋零的黄叶在秋

风里漫天打旋。我用手捧起一杯夹杂着落叶的黄土，轻轻地撒在胡尚义的胸口上。为了尽快掩埋烈士，同志们都飞快地用双手挖土，有的人十个指头都出了血……在最短的时间里，一排新坟出现在梯子沟外的山岬口上。

便衣侦察班的同志回来了，向我报告说，大平地没有发现敌人。我立即找来冀中军区后勤部和“白校”的负责同志，告诉他们，这里不是久留之地，我们准备到大平地村搞饭吃，然后连续行军一百多里，跳到狼牙山北面去，问他们是不是跟我们一起行动。王文波政委说：

“如果不是在花塔北山上巧遇你们，今天我们是别想突出来了。”

现在，他们准备南下，向完县方向分散转移，因为他们对狼牙山那一带不熟。

“白校”的俞忠良政委也对我说，他们女同志太多，实在走不动了，好在这一带没有敌人，准备休息一下，暂时不走了。我劝他们还是跟我们再走一段，哪怕走到水泉也好，免得敌人再来纠缠。他们听了，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可是看到那些疲惫已极，满地坐着、躺着、趴着的女学员，又犹豫了。最后，他们还是决定不到狼牙山去，而是慢慢向南边转移。我只好嘱咐几句，叫他们不要拖延，稍缓过劲来就赶紧离开这里。然后，我带着一分区的人员走了。与此同时，跟我们一起突围出来的乡亲们，也各自离去。

大平地是群峰之上的一个自然村，我们在崎岖的山径

上向它赶去。同志们已相当疲劳，但是看到我们分区领导同志走在队伍前头，便一个个紧跟着，谁也不愿落下。到达大平地，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了。我通过情报站一了解，水泉和狼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一团和几个游击支队从狼牙山突出去后，猛攻平汉路、狼牙山的敌人便都撤了。

我说：“休息一下吧。”

大家一听，一屁股就坐下了。我也跟着坐下，身子刚着地，一阵空落落的饥饿感猛地向我袭来。这下可不得了啦，头晕眼花，腰痛腿酸，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我想起从昨天下午四时一直跑到现在，已经近二十四小时，粒米未进，滴水未喝，便扭头向警卫员李旺仁说：

“小李，昨天你不是装了一盒饭吗？拿出来让大家都吃一点吧。”

“哎呀，没啦！”李旺仁同志苦笑着从挂包里掏出那个空饭盒，带着歉意说，“在花塔北山上，高副司令说把饭都拿出来，吃了好突围，我问你吃不吃，你摆了摆手，结果他们就把饭吃光了。”

我想起来了，在花塔北山时，李旺仁同志好象跟我讲了句什么，我只是摆了摆手，没答腔。当时我的思想很紧张，完全集中到怎样组织这么多人突围，哪还顾得上吃饭！奇怪的是，在一天一夜的突围过程中，一点也不觉得饿，不觉得疲劳，只是现在才觉得难受极了。大平地的老百姓都跑得光光的，什么吃的东西也找不到。我只好无可奈何

地笑笑：

“小李，找个桶，打桶井水上来，喝一点充充饥吧。”

井水打上来了，清亮清亮的。饥饿的人们一见，都围了过来，每人打了一瓷缸。正喝着，供给部长董永清从挂包里掏出个小瓶子，在手中晃了晃，得意地说：

“啊哈！我这儿还有半瓶味之素呢！”

“味之素”就是味精。用味之素调味的菜格外可口，那么，用它来调一调井水，肯定也挺有滋味。

“董部长，给我来一点！”

“咱也来点味之素，嘿嘿！开开洋荤。”

同志们乐不可支，争先恐后地把缸子递到董永清同志面前。我看得出，董永清同志心里很得意，可脸上却现出庄严的表情，双手捏着那个小瓶子，轻轻抖动着，象倒仙药似的给每个搪瓷缸都洒了一点。我喝了一口水，还不错，有些味道，于是一仰脖，把一缸子水叽哩咕噜全都喝了下去。

没想到，过了一会，我的肚子一阵阵发痛，那滋味真难受。看看周围，刚才喝了味之素拌井水的同志们，全都捂着肚子。我心里一惊，莫非井水被敌人下了毒？

大家紧张极了，董永清同志忍着痛，蹒跚着走到井边，趴在井口用鼻子一个劲地嗅着，好象这么一嗅，就能嗅出井水有没有毒。

敌人下毒的事，时有传闻。在我们一分区内，也发现

过敌人将毒药投入井内，企图毒死我抗日军民之类的事。这几天，日军到过太平地，是不是在井里下了毒，那是很难说的。我真后悔刚才太轻率，没有先叫有关人员检查一下井水。难道说，日军拉大网，筑“铁壁”，没能把我们消灭，而现在，我们却要毫无价值地死在这口下过毒的井边吗！？

事情很快就清楚了：水用不着化验，就知道是没有毒的——有几个喝了没有拌入味之素的井水的人，好好的。而我们的肚子也慢慢地不那么痛了。可见，问题就出在董永清同志的那瓶味之素上。

“对，味之素！”我恍然大悟，大声说，“咱们一天一夜没吃啥东西，肚子里本来就没有什么可消化的了，再来个凉水拌味之素，那肚里不是有戏唱了么？”

大家都笑了，你一言，我一语，拿味之素跟董永清同志开玩笑。这倒好，在说说笑笑中，不知不觉地又走了三十多里路。到了甘河净，我下令在两个小时内做饭、吃饭、休息完毕。时间一到，部队就出发。

乘着月色，我们一口气又跑了七十八里路，跳到了狼牙山北面的九莲山，远远地甩掉了敌人。这下可好了，可以安安稳稳地休息了。我一看，天已经亮了，当即就命令部队：派出警戒，休息三天！

同志们一片欢呼。有的忙着解背包，有的背包还背在身上，就一头倒了下去，顷刻之间便发出了鼾声。

曹凌同志不知从哪里搞到一点枣子酒，心满意足地小口呷着，咂了咂嘴，闭起眼睛，自言自语地说：

“香！香死我啦！”

周自为同志年轻，连续突围那么累，还不休息，这时候又与司号长张生荣、老干事胡安吉他们几个玩球的活跃分子在一块略为平整的山坡上打排球呢。我生气了，把他们轰回来，说：

“都回去睡觉！”

同志们都睡下了，我叫电话员接通大平地情报站，请他们派人去了解一下“白校”的情况，然后向我报告。

不一会，一团长邱蔚给我来了电话。他说，当日军从狼牙山撤走，急忙赶去救援平汉路时，一团和几个游击支队则虚晃一枪，又返回了狼牙山。

我问：“听说跳崖的五个同志中，有两个被挂在悬崖小树上，救下来了没有？牺牲了还是活着？另外三个同志呢？”

邱蔚同志声音沉重：“我们连夜派人去营救，没有找到。今天天不亮，他们又出发寻找去了。那地方山势太险峻，下到崖底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我们一定把他们找到……昨晚山风好大，呼呼地刮，估计挂在树上的两位同志也掉下去了。如果掉下去了的话，肯定也牺牲了。”

我沉默了。从那么高的悬崖绝壁上跳下来，是万难生还的。少顷，我痛惜地低声问道：

“七连六班的五位同志叫什么名字?”

“班长马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福才、胡德林。”

“他们是狼牙山上的五壮士!”我激动地说，“是我们全分区的光荣，是我们八路军的骄傲!”

打完电话，我又累又困，便昏昏沉沉睡了一觉。谁知醒来后，一个惨痛的消息，通过悬在空中的“飞线”，从大平地情报站报来了：

今天下午，白求恩军医学校被突然扑来的一千多名日军包围，经过一场抵挡，当时仅有五六十人突了出来。

原来，昨天合围花塔北山的敌人扑空之后，今天一个反包围，把道士观和张家庄一带全都围住了。日军把机枪架在山头上，对准正在吃饭的“白校”男女学员疯狂扫射。枪一响，学员们把碗一扔就跑散了。有的小女兵吓懵了，反而对着敌人机枪跑，一下子就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政委俞忠良和队长丁——一位年仅二十一岁的女干部，凭借着数量有限的枪支，赶紧组织学员们突围。躲在大石头缝里幸存下来的乡亲，亲眼看到了惨烈的战斗场面：

“白校”的男女同志互相呼唤着，互相搀扶着，在几支步枪的掩护下，冒着纷飞的弹雨，拼死拼活地冲开一条血路突围。有的女同志负了伤，实在跑不动了，怕拖累战友，便给了自己一枪。突不出去的男学员为了保护女同志，与敌人扭成一团，最后被敌人用刺刀捅穿了胸膛。更多的女

同志，则与扑上身来的日本侵略军作殊死的搏斗，她们用手抓，用脚踢，用牙咬……

听完了“白校”学员遭受惨重损失的报告，我痛心极了！这个血的教训告诉我们，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候，往往是最关键的时候，千万不能松劲！千万不要怕疲劳！他们若是咬咬牙坚持走下去，也不致如此啊！在沉痛哀悼遇难的“白校”战友时，我隐隐地有一种内疚感：我虽然曾经带着他们从虎口里突了出来，也劝说他们要跳得离敌人远一些，却未能说服他们随我们继续行动，我为此深感痛心。

我举起电话筒，布置大平地情报站的民兵，立即前去掩埋遇难同志的遗体。大平地的民兵完成任务后，如实地向我叙述了那块浸满烈士鲜血的土地上的惨状——山野里到处丢弃着被刺刀挑破的背包，乱纷纷的医学讲义，破碎的锅碗和女同志的头梳、发夹。遇难者的遗体，横七竖八地躺在石头间、草丛中。男同志的脑袋被敌人的大皮靴踩扁了。女同志被敌人野蛮地糟蹋后，胸部被刺刀割得乱七八糟，惨不忍睹！日本法西斯——披着人皮的野兽，又欠下了我们一笔血债！

负责掩埋遇难者遗体的民兵，全都哭了。大平地情报站的同志在向我汇报情况时，说着说着，也哭了。

我立即将梯子沟突围和“白校”学员的情况向军区作了汇报。并向聂司令员报告：狼牙山五位勇士与敌激战，

弹尽粮绝，舍身跳崖，壮烈殉国！

壮士一去兮

傍晚，一团长邱蔚忽然又从电话里报来一个惊人消息：挂在狼牙山悬崖古树上的两位战士——葛振林和宋学义，居然带着伤归队了！

“这真是奇迹啊！”我们异常激动。政治部主任罗元发立即让宣传科派人去一团采访。当天，宣传干事钱丹辉就背上背包出发了。他爬上狼牙山，在老君堂那里找到了邱蔚同志，然后又赶到桑岗卫生部，找到葛振林和宋学义同志，代表分区领导向他们俩表示慰问，让他们好好养伤，并仔细问了他们那个班的战斗经过。

钱丹辉同志回来后，很快就写出了报告。我一看，写得挺好，就叫机要科立即向军区发报。没想到，聂司令员连着收到我们的两个电报后，马上就报告八路军总部。很快，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传遍了各抗日根据地，延安电台还向全国作了广播，许多报纸也刊载了这则消息。我们一分区战线剧社的同志，还自编自演了歌颂狼牙山五壮士的节目。

历时六十六天的秋季反“扫荡”胜利结束了。我们司令部回到周庄，一团团部也重新驻进了北娄山。邱蔚同志把部队安顿好，就骑着马跑到我这里来了。

我给邱蔚同志倒了一杯水。他在炕上坐下来，刚一提起狼牙山突围和五壮士英勇跳崖的事，眼睛里便涌满了泪水……

九月二十三日凌晨，邱蔚同志接到我的电话，得知正在疯狂“扫荡”的敌人，对狼牙山周围可能有较大的行动，他便立即进行了部署。由于一团的主力奉命保卫军区机关去了，给邱蔚同志留下来的只是一个第七连和一些体弱有病者，邱蔚同志自己当时也正在闹病。七连原先驻扎在林泉，连长刘福山和指导员蔡展鹏接到团长要保卫狼牙山的命令，立即集合队伍出发了。

二排六班走在队伍最后，全班除去因病住院的同志外，只剩下五个人：班长马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和宋学义。宋学义是一九四〇年一团南下打朱怀冰时解放过来的，到部队才一年多的时间，进步很快。马保玉和葛振林是共产党员。其他同志都正在争取入党。

九月二十四日清晨，三千五百多名日军带领着伪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突然从四面八方狼牙山包抄。被合围在狼牙山上的地方党政机关和周围村庄的群众，竟达三四万人！如何掩护这么多人突出重围？邱蔚同志一次又一次地通过“飞线”向我告急。我定下“围魏救赵”的战斗方案，着手调动敌人时，邱蔚同志也开始作突围的准备工作了。他把担任后卫、掩护地方党政机关和乡亲们突围

的重任交给了七连。根据我的意见，他要七连等大家安全转移后，留下一个班拖住敌人，最后转移。

“指导员，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六班长马保玉听到消息，便跑来找蔡展鹏同志求战。

六班的战斗力很强，班长的战斗经验也比较丰富。蔡展鹏同志与连长刘福山一商量，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夜里，狼牙山上刮着寒风。山下的日军盲目地向山上打枪，那歪把子机枪的声音特别清脆，在狼牙山的山涧里回荡。

午夜，邱蔚同志接到了我的命令：

“敌人口子已开，马上突围。”

眨眼工夫，在清冷的月光里，三四万名地方干部和群众由部队掩护着，井然有序地顺着盘陀路，悄悄地向碾子台方向转移。

邱蔚同志临走时，特地看望了七连六班的同志，对他们说：

“突围的队伍和你们连队的主力能不能安全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全看你们能不能把敌人死死拖住。从现在起，你们一个人就要对付十个或几十个敌人了。如果你们能充分利用狼牙山的天险和改造过的地形，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那么你们一定能拖住敌人！”

“请团首长放心！”六班的同志异口同声地说。

天蒙蒙亮了。这是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夜色逝

去前，突围队伍已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狼牙山。敌人却认为我们的主力部队被他们围住了，天一亮，便象群狼一样恶狠狠地扑了过来。七连和留下来的一部分民兵密切协同，利用狼牙山的天险和改造过的地形，分兵把口，灵活御敌，在敌人必经之路埋下地雷，从各个方向朝敌人射击，造成漫天遍野都是八路军的假象。从东西水村往棋盘坨爬上来的日军，一路上伴随着地雷的爆炸，死了四五十。日军山地指挥官高见和叛徒赵玉昆，更是确信网住了一条“大鱼”，于是愈加疯狂地进攻。

在激烈的战斗中，连长刘福山负了重伤，他带领的二班和机枪班的同志大都牺牲了。情况危急，指导员蔡展鹏只好把刘福山同志抱到一人多高的草丛里，让一个战士守着。然后，他找到马保玉同志说：

“你们在山上掩护，争取让地方上的同志和群众走得更远一些，让连队主力安全地突出去。你们坚持到中午，然后看情况，能往哪儿撤就往哪儿撤，明天到规定地点集合。”

马保玉同志坚定地回答：“指导员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望着五位舍生忘死的战士，蔡展鹏同志的眼睛湿润了。他给六班补充了一些弹药，并留下了所有的地雷，接着就带着部队的主力向龙王庙子方向突围。这时，六班的同志赶紧在各个要道埋上了地雷。指导员蔡展鹏带人刚刚钻出

敌人的大网，就听见马保玉他们和敌人打响了。

六班那五位同志后来的详细情况，是我见到那两位幸存者——葛振林和宋学义同志以及后来重上狼牙山遇到棋盘坨的李老道时，他们亲口向我讲的。目击五壮士纵身飞下悬崖的情景，并亲手掩埋了三位烈士遗体的，还有狼牙山峡谷龙王庙子村的中年农民冉元同。我派去寻找烈士遗体的人员曾经访问过他。他把知道的一切，也告诉了我们。

那是在九月二十五日上午，冉元同发现日军扑向龙王庙子，就赶紧将他负责照看的一位八路军伤病员背进山洞隐蔽起来。当他回头想照顾家里亲人的时候，被日军发现、追赶，不得不跑上了狼牙山。在山上，他正巧遇上了这五位战士。在这之前，六班五同志就与敌人打响了。为了吸引敌人，他们站着举枪向敌人射击。五百多名日军和赵玉昆的伪军嗷嗷叫着，扑向他们。“轰！轰轰……”地雷连连爆炸，日伪军鬼哭狼嚎，尸体横飞，老死的敌人战战兢兢地挪动着脚步，仍是穷追不舍。马宝玉同志趴着身子悄声说：

“注意，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打枪。在这儿，每人最多只许打五颗手榴弹。准备吧！”

日军越来越近，战士们死死盯着那一张狰狞面孔。

突然，班长马保玉挺起半截身子，猛力摔出一颗手榴弹，大喊：

“打！”

手榴弹和子弹呼啸着飞向敌人，日本兵被炸得东倒西歪，退下去了。

六班把日军打退后，却招来一阵猛烈的炮火。山上的石头被炸得满天飞，硝烟把战士们笼罩着，他们啥也看不见。五个人都彼此担心战友遭到不幸……好不容易挨到敌人炮击停止，班长仔细一看，嗨，五个人都在，谁也没伤一根毫毛！

六班的同志一边用稀疏的枪声勾引敌人，一边往棋盘坨山峰上爬，忽然碰到冉元同，就赶紧喊：

“老乡！鬼子追来了，快找个地方藏起来吧！”

冉元同问：“同志们上哪儿？”

“上棋盘坨。”葛振林同志回答。

冉元同劝道：“别上那儿。附近就有山洞，鬼子找不着。跟我去吧！”

班长马保玉感激地笑笑：“不行啊，我们得把敌人引到棋盘坨去！”

这时，传来了日军的怪叫声，六班的同志赶紧往棋盘坨山峰上爬，谁知那里早上了敌人，机枪一个劲地朝他们打。他们只好转身攀上棋盘坨附近的一个山峰。

这个山峰叫牛角壶，异常险要。那凌空而起，伸出来象只牛角的悬崖，使人望而生畏。牛角壶三面是悬崖绝壁，只有一面有条崎岖险峻的小路，爬上牛角壶，等于走上了绝路！

冉元同远远地望着发呆了。日军发现了他，打了三枪。

他连忙藏进牛角壶附近的大莲花瓣山。

六班战士往牛角壶爬了一阵，停住了。他们知道，前面是一条绝路。这时他们仍可以沿着隐蔽的盘陀路摆脱敌人，但是，他们担心部队和群众还没走远，敌人会继续追击。

马保玉同志瞅着周围的地形说：“在这儿再顶一阵子吧！”

大家便卧倒，打开手榴弹盖，在面前摆了一溜。这里有小树，有半人多高的草，藏下百把十人完全没有问题。正因为如此，敌人摸不清虚实，不敢贸然行动。对六班来说，他们又为主力部队转移赢得了时间。

冉元同在大莲花瓣山，由于一心牵挂着五位八路军同志的安危，哪里高，哪里能看到他们，他就往哪里去，连山洞也不钻了。他看得很清楚，扑向五位同志的日军有几百名，头一回冲上去的七个日本兵，两个在前面，五个在后面，只听到“啪”的一声，一个端机枪的日本兵往后一仰，旁边那个赶紧扶住他，把他放到一块小平地上，用白纱布给他缠头，然后把他背了下去。有个敌人一摇小旗，下头又上去三十多个敌人，这时松树坨那里摆上了一门小炮，东西水那里安上了一挺重机枪，朝牛角壶猛烈射击。

一阵炮火过后，敌人又开始冲锋。六班接连打下敌人四次冲锋，五个人一个也没少。

“鬼子又上来了，打！”班长马保玉喊道。

宋学义同志抓起手榴弹就扔。副班长葛振林每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好象有使不完的劲。

半人深的山草，被炮弹打着了，火苗窜得好高，胡德林同志推了葛振林一把：

“班副，着了！”

葛振林同志一看，棉袄背上冒起了火，他连扣子也顾不得解，使劲一撕，脱下扔掉了。敌人的第五次冲锋又被击退。

太阳偏西了，亲人和战友早已远去，掩护突围的任务早已完成，现在该撤了。

可是已经走不脱了。山脚下又集结着新来的一百多名敌人。一个指挥官支使人把日本旗插在地上，将一块大红布铺开。六班战士看得莫名其妙，忽听空中一阵巨响，两架敌机恶狠狠地俯冲下来。马保玉他们刚卧倒，敌机便射出一串子弹，呼啸着掠过，弄得小树象醉汉似地直摇摆。紧接着，山下的敌指挥官把战刀一挥，敌人又往上冲了。

马保玉同志回头望了望崖顶，提枪从地上站起来，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和胡福才同志也都跟着爬起来，他们往悬崖顶上爬。敌人也紧跟着往上爬，可是不一会，就有七八个敌人不小心踩了个空，惨叫着滚了下去，直坠入深谷。

五位战士为了不让敌人跟得太紧，凡是到了能够射击的地方都向敌人射击。他们就这样牵着敌人的鼻子往山顶

上带。

太阳西斜时，他们登上险峰之巅，再也无路可走了。三面都是万丈悬崖，一面堵满了日本侵略军。

“八路的！跑不了的……”秋风送来日军得意的叫嚣。

“班副，还有手榴弹没有？”胡德林同志叫了一声。

葛振林同志一摸腰间，没有手榴弹，忙问班长，班长的手榴弹也打光了。这时宋学义、胡福才同志也没有手榴弹了。大家全急坏了！

“哎！”胡福才同志叫了一声，从地上捡起一颗手榴弹。他扬起手正要往下扔，班长马保玉飞快地把它夺过来，别在腰上了。大家明白，这是给自己留的。

枪炮声都停住了。站在大莲花瓣山上的冉元同，定睛一看，日军刚爬上那个几次都没上去的坎子，呀呀乱叫。八路军的五位同志也都站立起来，举着石头往下砸，有的石头大，一个人搬不动，就两个人抬。石头滚下去，砸得敌人乱叫。也正在这时，棋盘坨寺庙的李老道从松树坨的一个山洞里钻出来，见对面险峰上，八路军的五位战士正以狼牙山之石，与无数日本兵血战。李老道不禁潸然泪下。

敌人被马保玉他们用石头击退，不一会，敌人又猛扑上来。马保玉他们砸到最后，身边一块石头也没有了。

班长马保玉拔出仅有的一颗手榴弹，用一种异常严峻的目光挨个望了望。四位战友全都明白了，一齐靠向班长。

“八路的投降!”

“抓活的! 抓活的——”

班长马保玉扭头一看，吼了一声：

“去你娘的!”把那颗手榴弹甩向爬上来的敌人。

“轰”的一声，前头的几个日军被炸翻了。

“撤!”马保玉同志说。其实，这不过是他下意识地涌到嘴边的话，周围三面悬崖，从前崖到后崖只几十步，往哪里撤？

葛振林同志走在最后面，等他赶上去，班长带着三位同志已经站在崖边上了。他看见大家的脸色都很特殊。

班长马保玉伸手抓住了葛振林同志的肩臂，嘴巴张了几下，断断续续地说：

“老葛！我们牺牲了，有价值……光荣……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当俘虏！不能当俘虏！”

葛振林同志知道班长的话也是对大家说的。还有一层：他是副班长，五个人中又只有他和班长是共产党员，应该做出榜样。他说：

“人牺牲，枪也不能叫敌人得……”

话没说完，石崖后边已经有敌人的铜盔乱晃了。班长马保玉随手一抡，那支崭新的三八大盖飞到悬崖下面去了。葛振林同志举起手中的枪就往石头上摔，没摔烂，也随手甩下崖去了。宋学义、胡德林和胡福才同志噙着泪举起心爱的枪，狠狠地摔了几下。

敌人在疯狂地嚎叫。

马保玉他们昂起头来，一步一步地走上悬崖。狼牙山象巨人一样耸立着，易水河象条玉带飘向远方。在这座狼牙山上，他们学习、练兵，欢迎过新来的同志，不止一次地消灭过敌人。就在这座山下边，他们吃过乡亲们慰问时送来的柿子、核桃，听分区领导同志讲过古代壮士荆轲的故事，那“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歌，一直回旋在他们的心头。他们在易水河边洗过澡，做过饭，阻击过凶残的日本侵略军。如今，他们又在这座山上掩护战友和乡亲们突出了重围，并且消灭了一百多个敌人。任务完成了！他们可以无愧地与祖国的山河永别了！

敌人已经冲上来，想活捉他们。马保玉同志正了正军帽，象发起冲锋一样，大声喊道：

“同志们，跟我来！”

顿时，狼牙山的群峰峡谷中回荡着一阵气壮山河的口号声——

“共产党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同志们！乡亲们！永别啦——”

.....

在惊得目瞪口呆的日本侵略军面前，五位视死如归的八路军壮士，一个个纵身跳下悬崖！

隐藏在仙人洞里的李老道不禁大叫一声，跌坐在地，

泪眼滂沱。

冉元同看得真切：八路军的五位同志跳崖时，不是在同—个位置上往下跳，有两人是在另一个崖口跳的。

李老道刚刚抹去眼泪，忽然看见：

爬上高高崖头的日军，竟然整整齐齐地排成几列，面对五壮士跳崖处，随着指挥官口令，恭恭敬敬地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这群“皇军武士”，终于发现与其五百之众激战一天的八路军，仅仅只有五人。他们震惊之余，完全被我中华壮士捐躯殉国的牺牲精神折服了！

是啊，撼山易，撼八路军难！

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涌满李老道的心间。他朝五壮士飞落的地方望去，想不到有了意外的发现：

悬崖壁上伸出的树枝，竟摇摇欲坠地挂着两位跳崖的勇士！

此后的情况，葛振林、宋学义和李老道都向我谈到了：

葛振林和宋学义同志被悬崖壁上的树枝挂住，日军一点也没察觉。他俩当时晕过去了。醒来后，忍着伤痛爬到崖上。在战友、乡亲和李老道的援救下，两位壮士终于带着伤返回了连队。另外三位同志牺牲的情况，是采访冉元同的同志回来告诉我的：

当时，位于大莲花瓣的冉元同只看到五壮士跳下去，却没看到挂在树上的葛振林和宋学义。他认定五位同志都牺牲了，便摸黑回村，把情况告诉了乡亲们。第二天上午，

他带着两个人，钻进山去为烈士收尸。他们沿着一条羊肠小道下到崖底，仔细地找呀找，只找到三位烈士的遗体。

“把他们葬到一块儿吧！”冉元同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直往下掉。崖底石头多，没多少土。他们把三位烈士并排着放在一起，使劲地用镐刨来土，盖在烈士的身上，然后又搬些石块砌在上面，一直到象座坟为止。

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很快就传遍了一分区，飞遍了晋察冀，飞遍了抗日根据地。

聂荣臻司令员在军区的一次会议上，高度评价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行为。他说：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我们要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为了悼念为国捐躯的马保玉、胡德林和胡福才三位烈士，一分区隆重召开了追悼大会。葛振林和宋学义同志当时正在后方医院养伤，没有到会。我在追悼会上，宣读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发出的训令。训令要求在全区部队学习马保玉等狼牙山五壮士英勇坚决的斗争精神，并规定了四项纪念办法：

一、在每次战斗中高度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以战斗胜利纪念他们；

二、在勇士牺牲的地方建碑纪念；

三、授予马保玉、胡德林、胡福才三烈士为一团模范荣誉战士，每逢纪念日点名首先由荣誉战士点起；

四、对光荣负伤的葛振林、宋学义除传令嘉奖外，各赠“模范青年”奖章一枚。

追悼大会开完不久，葛振林和宋学义同志伤愈出院了，分区又在一团驻地北娄山举行了盛大的发奖大会。会上，我将军区颁发的“模范青年”奖章佩戴到葛振林和宋学义同志胸前。新任分区政委罗元发代表分区领导机关给两位壮士戴上了英雄花。七连荣获了一面“学习五勇士顽强的革命精神，发扬英勇果断的战斗作风”的锦旗。最后，我宣布了军区命令：送葛振林、宋学义入“抗大”二分校学习深造。

一九四二年，狼牙山的纪念碑开始动工修建了。

乡亲和战士们，满头大汗地挑着水和石灰艰难地、一步一步地向高耸入云的棋盘坨爬去。在他们身后，一群山羊背上绑着砖头，在放羊人的驱赶下，“咩咩”叫着，在乱石和荆棘中寻找着“路”，攀向棋盘坨。

狼牙山周围的乡亲们多好啊！他们勒紧裤带，冒着坠崖的危险，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壮士建纪念碑。

聂司令员除了为整座碑题写了碑名之外，还题了词：

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
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

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手录邓拓同志诗一首作为题词：

北岳狼牙耸，
边疆血火红。
捐躯全大节，
断后竟奇功。
畴昔农家子，
今朝八路雄。
五人三烈士，
战史壮高风！

我们分区领导和地委、专署的领导同志^①也都分别题了词。纪念碑的碑文，用精辟的语言，概括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壮举之后，写道：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呜呼三壮士已战死矣而生者犹继续为人民战斗望狼山巍巍之高峰谁不为之赞叹而高歌我军对民族之忠贞坚信我民族之不可战胜也

① 题词的是：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政委罗元发、副司令员高鹏、参谋长徐德操、专员李耕涛、专署人民武装部部长王道邦等。

纪念碑落成了！这整座碑是实心的，五丈高，巍然屹立在狼牙山峰上。天气晴朗的时候，一出保定城就可以远远望见。它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第 七 章

齐心合力渡难关

岁月多艰难

日军一九四一年秋季大“扫荡”刚过，饥饿、疾病和罕见的特大旱灾，便和一九四二年的初春一起降临到我们晋察冀边区。这时日军又加紧了对边区的封锁和“蚕食”。

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官发布《大陆命第五百七十五号》秘密文件，歇斯底里地叫嚷，要以“加强对敌封锁，摧垮敌方继续作战企图”为基本任务。

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为把华北变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对我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掠夺更加疯狂。不少青壮年被敌人抓走，大量牲畜、农具遭到破坏，许多土地荒芜，群众的吃、穿、住也都发生了严重困难。

① 狼牙山纪念碑于一九四三年反“扫荡”中被日本侵略军炸毁。一九五八年重修，聂荣臻同志重新题写了碑名，彭真、刘澜涛、杨成武等同志又题了词。

部队的生活日渐艰苦，粮食不足，油、盐、蔬菜缺乏，不得不以黑豆、麦麸等牲口饲料充饥。守在狼牙山上的战士们天天爬山，军装被荆棘划破了，由于缺盐吃，体力也明显下降。

一天，我策马而行。路上，扶老携幼出外讨饭的乡亲，三五成堆剥着树皮充饥的人们，面黄饥瘦、衣不遮体的儿童不时闯入我的眼帘，令人心酸。我勒住缰绳，跳下马来，迈着沉重的步伐，慢慢地从这些遭受天灾人祸的父老乡亲身边走过。

日近薄暮，在通往分区司令部的那条弯曲山路边的小山头上，出现了一个佝偻着身子的老大爷和一个挽着柳条筐的小姑娘。他们边往下走，边弯腰在地上拔着什么。啊，他们是在挖野菜。令人奇怪的是，村边的山坡上也有野菜，这一老一小为什么非得爬到那山头上挖呢？

“爷爷——”忽然，小姑娘惊叫了一声。我定睛一看，老大爷不见了！

“不好！”我说了一声，便飞快地向山头上跑去，警卫员也紧跟着我往山头上爬。可是，爬了一阵子，我和警卫员也都累得直喘粗气，双腿沉得象绑了铅块一样——唉，腹中饥饿，使我们的体力不支啊！

我们好不容易爬上山头，只见那位老大爷斜靠在陡坡上的一块大石头边，呼呼直喘。这不是我们司令部驻地的老乡吗？哦，刚才他为了挖一棵野菜，差点失足滚下山去，

幸好被这大石头挡住了。好在伤势不重，只碰破了一些皮肉，把脚脖子扭了。警卫员上去帮他擦去脸上和腿上的血迹，老大爷认出我来，叫了一声：

“杨师长——”刚想爬起来，就被我按住了。

我朝山下的饲养员招招手，要他把马牵上来。

老大爷明白了我的意思，抖动着胡须，说：“别，别——我老头子凭哪一桩，骑咱杨师长的马呀！”

“大爷，你年纪大，又伤着了，腿脚不方便，骑我的马有什么不可以。”我一边帮他搓揉着脚脖子，一边劝慰他。我问他，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的路来挖野菜。他想了想，说：

“我琢磨，山头上的野菜兴许嫩一点。”

我半信半疑，扭头注视那个有着一对忧郁的大眼睛、脸色腊黄的十来岁小姑娘，问道：

“真是这样吗？”

小姑娘躲闪着目光，轻轻地回答：

“爷爷说了，应该把靠近村子的野菜留给八路军叔叔挖。”

啊，是这样！我站起身来，向村子望去，只见那地头里，山坡上，到处散布着一群群挖野菜的乡亲，其中有不少身着军装的人。我知道，那大概是连队没有菜吃，出来挖野菜了。可挖野菜也有个与民争食的问题呀！真想不到，这位老人，佝偻着身子，领着孙女，舍近求远挖野菜，是

为了把方便让给子弟兵哩。

我和警卫员把老大爷扶上马，然后我们一起下山。

“杨师长，你快让我下来吧，我不该让你受累呀！”一路上，老大爷噙着眼泪，不住地念叨着。

我仰头望着马背上白发苍苍的老人，心里感到热乎乎的，不禁联想起前不久易县五回岭南山沟里，有位农民叫崔洛唐，负责照顾两名八路军重伤员。一天夜里，一阵枪声划破了山沟里的寂静，“扫荡”的日军来了，崔洛唐撇下一家老小，首先把两个重伤员背到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然后把年迈的母亲和生病的弟弟以及自己的孩子逐一背上山去。敌人搜山，他拖儿带女护送伤员到亲戚家去躲藏。亲戚家境贫困，他便带着儿女外出讨饭，把讨回来的稠的热给伤员吃，自己却以稀汤、野菜、树皮充饥，直到伤员痊愈重返抗日前线。我们的人民，就是这样关心、爱护和支持八路军的，作为人民子弟兵的我们，该怎样来对待他们呢？

回到分区，我把政治部的同志找来，要他们研究一下，给部队发个“通知”，要求各单位不在驻地附近挖野菜，不与民争食，把方便让给乡亲们。另外，机关和各部队还要订出节约粮食的计划。机关每人每天要节约二两粮食，作战部队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食，以支援群众，并分片包干，帮助群众搞生产。

分区政治部的“通知”很快就发出去了。也正在这时，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也下了个“训令”，要求部队所有的伙食单位都不要村庄附近采摘杨树和榆树叶，因为老百姓已经把这些树叶当成主食，我们军队宁可饿肚子，也不得侵犯群众的利益。

一个“训令”，一个“通知”，使我们一分区军民关系更加融洽。战士们纷纷把自己省下来的口粮送给父老乡亲。乡亲们含着泪，非要部队领导收回“训令”和“通知”不可。他们还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腌咸菜的水端给战士们，说是里面有盐分，喝了有劲。就连那位跑到山头上挖野菜的老大爷，也给我送来了一盆咸菜汤。我说：

“部队那样做是应该的，朱总司令都在节衣缩食救济灾民哩。”

他感动得掉泪了，抖动着花白的胡子说：

“从来没有见过你们这样好的军队呀！”

边区人民对我们子弟兵真是亲如一家。他们自己吃糠咽菜，打下麦子先交公粮。自家人打赤脚，也要给部队做新鞋。全家人宁愿挤在一条炕上，也要把房子腾出来让给部队住。他们为部队运物资，抬担架，站岗放哨。见子弟兵烧柴困难，就把柴集中起来送给部队。在艰苦岁月里，我们军民同舟共济，患难相依，抗日斗志愈加坚定。

在军队内部，我们对贪污、浪费等不良现象，也是斗争得很坚决的。不管是谁把一个旧信封或一块旧纱布随便丢掉，都要受到严厉批评。每个信封至少都要用两次，旧

纱布经过洗涤、消毒，都要反复使用。

有一个阶段，军区有关部门甚至规定：司务长凡是贪污五斤以上小米的，枪毙！由此可见，我们的粮食是多么缺乏！

有一天，我和机关的同志们一块到粮站背粮，刚刚回来喝了口水，忽然接到报告：有个姓李的司务长贪污小米五升，正够上枪毙的条件，也被抓起来了。

我对此人虽不熟悉，却也认得，他会演戏，鼓敲得很好。但是，在如此艰难的岁月里，他竟然贪污，实在令人愤恨！不过，我想军区有关部门的规定，目的是杜绝贪污现象，教育广大指战员爱惜每一粒粮食。要严加惩处的，只是极个别犯有严重贪污罪行而又执迷不悟的人。如果他本人经过教育，能认识错误，愿意改正，就应该挽救。

我叫人把他带来了。

“你见过装粮食的口袋上的血迹吗？”我的声音不大，但语气严肃。

他浑身一颤，惊恐地瞪大眼睛，茫然地摇了摇头——看来，他只知罪重，一时还不理解我那句话的含意。

我又说了一句：“到沟外去背粮食用的口袋。”

他终于弄懂了，羞愧而又痛苦地垂下头说：

“我见过……血染的……口袋！”

是的，我们分区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派出去搞粮食的部队，要通过敌人的封锁沟，出去一百多里，甚至要跑

到冀中平原去才能搞到。我们的运粮部队经常同敌人遭遇，每一粒粮食都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前不久，有一个连队去保定附近拉粮，返回时天还未亮，在一个小村子外面遇上了一群化装成老百姓的敌人。他们推着堆满麻袋的车子迎面而来，走到近前，忽然，把车上的麻袋一掀，露出了轻、重机枪，对准我们的运粮部队就打。我们的指战员在极不利的条件下，仍然坚持与敌人浴血奋战，护卫着粮食边打边撤，回到分区时，只剩下了数量不多的粮食，指导员和许多同志也都牺牲了。

“你贪污的粮食是怎么来的，想过没有？”我越说越气，“军区聂司令员在边区财政会议上讲起边区人民缺吃少穿，出外讨饭，仍然忘不了支援部队的情形时，流下了眼泪！可你，昧着良心，做出这样的事来。”

他号啕大哭地跪下，说：“司令员！我……我对不起同志们，对不起乡亲们！我罪有应得，枪毙我吧！”

他甘愿被处决，而我们却因为他的悔悟对他从宽处理了，要他用自己的血汗洗刷身上的污点，在粉碎敌人封锁的斗争中，去寻找生命的价值。

伤寒、痢疾等疾病在部队流行，每个部队都有不少人患夜盲症。我们分区机关也病倒十人。老秘书陈子端卧病不起。

分区医院的病房里，住满了病号。医务人员有的也病

倒了，人手少不说，药品缺乏，医疗器械不配套，设备简陋。

为了减少医院的压力，经我提议，分区建立了一个临时干部疗养所，专门收容患病的干部。疗养所仍由分区卫生所王所长负责。在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下午，我都抽空到疗养所去看望生病的同志们。

有一天，我看到机要科的译电员苏国柱躺在病床上发高烧，一打听，原来他得了回归热，病得很厉害。我对王所长说：

“这个小鬼看样子非常难受，你们要想办法尽力抢救！”说完，我又慎重地考虑了一下，然后掏出笔，批了个条，让供给处拿给苏国柱一些鸡蛋。

“不，司令员，这鸡蛋我不要！”苏国柱同志呜咽着说，“瞧瞧同志们都吃些啥呀！”

我俯下身子安慰说：“我同你讲，鸡蛋还是要吃的，这也是抗日的需要。如果你的身体彻底垮了，那么咱们队伍里不就少了一份抗日的力量吗？”

是啊，在这种困苦战争环境里，部队每天吃两顿饭，主食是麦麸和黑豆，一到开饭的时候，有些同志就开玩笑说：

“走呀，上槽去！”

“咱们是第二骑兵团——吃黑豆的！哈哈。”

然而，尽管生活艰苦，部队文化体育活动仍开展得很

好。每天晚饭后，太阳才偏西，是我们自由活动时间。同志们在操场上打篮球，打排球，跳木马，练双杠，玩得可高兴了。我是个排球迷，那些日子里，每天少不了两场排球。我还喜欢到连队去转一转，看一看战士们所收集的小纪念品。当然，物质条件这么差，战士们不可能有什么贵重东西，只是些炮弹皮、子弹壳、螺丝钉和缴获的日本风景照片等。战士们一人一个绿色的小瓷碗，用布袋子一装，套在皮带上，挺精神。一团有位同志叫董占林，他的筷子是枣木的，削得溜光，经过油一炸，挺漂亮的。在他眼里，那筷子宝贝得很，他不是小心地把它搁在挎包里，就是把它插在裹腿上。战士们军装虽然破旧，但却缝了又缝，补了又补，浆洗得干干净净，看上去朴素、大方。尽管生活困难，连队星期天还是要改善生活的。他们把难得的一点小米碾磨成面，压成一种叫饴饴的圆形面条吃。偶尔，还能吃上点豆腐或搞点花椒油品尝一下。

我们的困难是严重的，而且日甚一日。但是，在这一时期，党中央对敌后抗战连续发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在党中央、毛主席正确方针的指引下，一分区按上级的指示进行了精兵简政，减少了非战斗人员，同时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指出：敌后抗日根据地在

日军疯狂“扫荡”和步步“蚕食”、“封锁”的情况下，上下级联系增加了困难，地区性和游击性增大了。因此，各根据地必须实行一元化领导。一分区的领导人员也做了些调整：高鹏、罗元发两同志调去分任雁北指挥部司令、政委。三团政委王建中提拔到分区政治部任主任，我这个分区司令员、政委，此时又兼任了地委书记，抓起地方工作来了。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毛主席在延安发出了号召，并且推荐了张平凯同志写的敌后游击区也可以搞大生产的文章，我们一分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大地刚刚解冻，春耕生产就展开了。在一九三九年那场罕见的大水灾中，一分区范围内大量的良田被大水冲为沙地。现在，我们用锹将两三尺深的沙子挖去，让昔日的良田重见天日。真没想到，在这土地上种出的大白菜，长得特别好。

一次，我到军区开会时，聂司令员请我喝羊奶。原来，聂司令员除了参加集体组织的生产劳动外，还和警卫员、通信员一起养了一群羊。回来以后，我和副司令、参谋长、秘书、警卫员、马夫也养起了鸡和猪，还合伙种了一块地。那块地不小，种了蔬菜、小米、苞谷和山药蛋。当时那里的麻雀很多，常常一群一群地飞来吃小米。我们就轮流去赶，拿个破盆破罐敲着来回跑。部队每个生产组都规定有生产指标，都要完成上交任务，完不成任务的，允许另想

办法。我们这个组除把骡马弄去搞运输外，还搞起了手工生产。我学会了做肥皂、纺线，还参与了制作卷烟的工作。

我们一分区卷烟厂生产卷烟十多种，其中有取打蘑菇仗之意的“蘑菇”牌；有出自分区机关卫生员、理发员和司号员之手的“卫理司”牌，分区的中药店、白铁社、油漆铺、造纸厂、织布厂也办得红红火火。各部队还分片包干，按规定协助驻地附近的乡亲开荒、送肥、收割。徐水县大队也叫徐定支队，是出了名的。他们从平原向山区护送白布、药品和粮食，又从山区向平原护送干部，做出很大成绩。就连我们集中到“抗大”二分校一大队学习的连、排干部，也在大队长唐凯、政委龙道权和政治处主任沈图领导下，一边参加生产，一边坚持训练。

一分区的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先进典型。徐水二区区委书记张瑞，是个工农干部，工作很有创造性。他把生产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砍倒敌人的电线杆子，割下敌人的电线，再把卖得的钱用到生产上，还做豆腐、粉条，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延安《解放日报》两次发表社论，推广张瑞合作社的经验。

龙华县出了个著名的劳动英雄，名叫葛存。他在大生产运动中成绩非常突出，政府奖给他一头牛，并在报纸上刊登了《龙华县委关于开展葛存运动的决定》。龙华县是个巩固的根据地，自然条件好，奇峰岭高大，敌人过不来，

拒马河水终年不绝，土地肥沃。一九四二年以来，龙华县没有受到敌人的“扫荡”，大生产运动中，县长赵鹏飞带头务农，深入第一线，使农业生产搞得更加红火，真可谓“人丁兴旺，丰衣足食”。

我在地、县干部会议上，提出各县应该向徐水县和龙华县学习，领导人民开荒种地，精耕细作，修渠打井，植树造林，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大力发展畜牧业，争取做到平均“一户一猪，一人一鸡”。

为了发展经济，解决自给自足的问题，根据纸张缺乏的情况，我们鼓励一些县办起了造纸厂，他们用麦秸和稻草做原料，造出了纸。

由于敌人封锁，平原上的棉布不容易运进来，我们就要求各县在山区的一些小平地，广泛种植棉花，自己动手纺纱织布。羊毛运不出去，就做成羊皮大衣。火柴缺乏，就用小木棍沾上点黄磷，做成土造火柴。

过去，山里农民生产的核桃、柿子、花椒、杏仁、鸡蛋、羊毛等土特产，运到平原地区换回来米、油、盐。可是现在，由于敌人封锁，运不出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专区和县都建起了商店、工商管理局和税务所，各村由农民集资入股，建立了消费合作社。商店和合作社负责收购当地土特产品，然后利用与敌占区商人、敌伪官员的关系，到敌占区去推销并从那里采购我们所需物资。伪官员只想赚钱，因此，我们通过他们可以买到电池、汽油、机器，

甚至还可以买到枪支弹药。后来，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还和一些日本商人做上了买卖。

涞源县城东面的雁东山，有个小型的石棉矿。几年前，敌人在那里设了个据点，日本的随军商人一家什么“会社”在那里采矿，采出来的矿运往张家口。我们就经常去伏击敌人的运输部队。日本商人开始还想依靠日本皇军来回押运，后来看到皇军也不能保证他运输安全，转而到处找和八路军有关系的人来说合，于是我们就把分区直属队的民运股长胡敬一隐去身份，由人推荐去作居于两方中间的调停人。我们提出：你要采矿，得给我们送东西。敌人只好同意。于是，胡敬一同志藉日本商人的掩护住进了敌人矿区，搞到了敌人的不少情报。比如他搞清了商人存放开矿炸药的地点，就通知我们的龙华支队。我们一个袭击，便把炸药全部搞来了。自从胡敬一打入矿区后，那个商人每运走一批石棉，都得按照一定的比例给我们送来布匹、药品等各种物资。

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是紧密相连的。易县城北有个马家庄，全都是回民，专跑小买卖。村子的周围都有敌人的堡垒。县里去人对他们进行抗日爱国的政策教育，说，如果他们肯帮忙，从敌占区挑点盐或布来的话，我们可以给他们山货，让他们挑去卖。这个工作做成功了。接着，县里在每个村都组织了一支扁担队，在我们武装掩护下，相互接力，并买通伪军的哨卡，多次从敌占区运回粮食、布

匹、药材和盐，打破了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

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部队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解决了军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问题。晋察冀边区军民同舟共济，在最困难的一九四二年，没听说有饿死人的事。可是在与晋察冀边区毗邻的国民党统治下的河南省据说一九四二年大旱，全省饿死了三百万人！两者对比，清楚地说明，我们党创立的抗日根据地是全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

就在这一年里，我们配合了冀中“五一反扫荡”，将敌人进山部队拖在平汉路西，使其不得脱身。一分区军民还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到“敌后之敌后去”，予敌以不断的打击，取得不小胜利。

敌人为了打通涞易路，在紫荆关坡下村修了五座碉堡。坡下的游击小组天天晚上跑去偷割敌人的电话线，一年就割了一百多万斤。敌人常常用汽车把补给品运到坡下，围上铁丝网，叫据点里的伪军看守，然后叫民夫用骡子把物资驮运到紫荆关。夜里，坡下游击组就悄悄地把光绪年间的“二人抬”和自己造的柳木炮抬出来，对准炮楼，监视着敌人，然后割开铁丝网，发动村里的男男女女偷运敌人的白糖、牛肉干、罐头、白面、大米等，支援八路军。

日本“华北电业株式会社”，想在紫荆关修建一座水电站，打算从六郎石打个二千多米长的隧道，把拒马河的水

引来发电，以便进一步掠夺我们的资源。我接到县里的报告后，立即命令游击队，不能让敌人在紫荆关建电站，要设法破坏他们的施工计划！可是，敌人在紫荆关驻扎了一个日军大队和一个伪军中队，弄来了两三千民夫，开始动工了。

他们利用原先安的一千五百千瓦的火力发电站，从紫荆关到易县一线拉起电灯，昼夜施工。坡下游击组决定先破坏敌人的照明。于是，他们去割敌人的电线。不料，一个游击队员碰上高压线，触电了。没两天，他们俘虏到一个电工，问那是怎么回事，电工解释了一下，然后说：要破坏，很简单，只要把输出的高压线造成短路，就行了。不过人还得小心，千万不能触电。游击队员一试，果然，敌人的电灯全不亮了。

可是，敌人照样施工，不肯停下来。坡下游击组的队员们便混进他们的工棚，把锅碗瓢盆全部砸烂。第二天，几千个民夫吃不上饭，都去找日军大队部的军官与电业株式会社老板。敌人无奈；只好派汽车从易县运来锅碗瓢盆，可是没过几天，又被砸烂了。就这么连着几次，加上游击队员在民夫中做工作，那些民夫则以没饭吃为借口，说没有劲干活。最后，干脆跑掉了。从而，“电业株式会社”老板投资的紫荆关水电站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保定有个日本特务叫松冈太郎，是日本天皇的替僧。他以佛教作掩护，常在天津、北平、保定、石家庄一带活

动，掌握着庞大的特务组织，而且还控制着这一带的帮会、宗教等组织。保定日军最高指挥官几乎每星期都要去拜访他一次。可见算得上是个头面人物了。自然，这个家伙的存在，对我根据地十分不利。于是，我交待分区锄奸科长杨德才^①，尽快锄掉松冈太郎。

杨德才同志把任务交给了三团侦察连。侦察连指导员王栋和一排长刘贵带着八个武工队员，在一个雪夜里，越过三道封锁沟，进入保定城，勇敢、机智地消灭了这个大特务和他的警卫班，还从他住宅里搜出敌档案和潜伏特务名单。三天后，我武工队又潜入保定城，处决了西元寺日本特务头目十一人，使保定城的敌人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

就这样，在艰苦的岁月里，我们以军事斗争为主，配合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斗争更加勇猛地打击敌人，迎来了一九四三年的春天。

锄奸英雄宁亚川

初夏的一天，我忽然接到司令部通信科的紧急报告：分区电台区队长刘长生携带密码潜逃投敌！

刘长生对军区及我们全分区电台的呼号、频率、甚至

^① 即杨卓同志。

密码等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这样的机要人员投敌，在我们分区是从来没有过的，敌人得到这个败类，肯定会欣喜若狂。

我异常愤怒，当即命令通信科：立即更换全分区电台密码，并向军区报告。同时，迅速查明刘长生投敌的原因。

少顷，我又交待秘书陈子瑞：“赶快通知锄奸科长杨德才，叫他马上来见我！”

杨德才同志来了。

我劈头就问：“杨德才，你知道电台区队长刘长生出了问题吗？”

“不知道。”杨德才同志惊讶地摇摇头说。

“他叛变投敌，把电台密码拿走了！你们要立即想办法，通过内线了解刘长生现在的情况，采取措施！”

杨德才同志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急忙跑回去布置。

早在这以前，我就对杨德才和敌工科长刘原亮交待过：你们应该派些人打到敌人内部去了解情况。他们曾挑选了几个同志去执行这个特殊任务，有一位同志还打入保定皇协军的司令部，搞出来不少情报。此外，在敌人所占据的城镇内外，还有我们不少情报站。现在也都在协助进行这一工作。

很快，通信科就把刘长生投敌的原因查明了。

抗日战争进入艰苦岁月之后，我们队伍里也有个别目

光短浅的人，对抗战前途悲观，转而寻求个人的安乐去了。刘长生就是这样的人。他迷上了一个政治面目不清的年轻女人，组织上不批准他结婚，他怀恨在心，竟然背叛革命，和那个女人一起逃离分区，到保定城投敌。

几天后，杨德才同志把刘长生投敌后的情况摸清了：刘长生进保定后，敌人果然如获至宝，又是宴请，又是奖赏，还把他送到石家庄去会见日军特高课特务头子。喧闹一阵后，敌人便开始利用这条走狗。他们把刘长生派到易县城汉奸头子赵玉昆那里，让他来破坏我们的通讯联络。现在刘长生正协助敌人搞一个侦听电台，一星期内就可以使用。

“你们立即派人去，把刘长生给我抓回来！”我对杨德才同志说。

“把他干掉比较容易，活着弄回来有些困难。”杨德才同志说，“敌人对他可是严加保护的。”

我告诉杨德才同志，刘长生叛变投敌，已经造成极坏的影响。这种人不是一般的叛徒，是重要的机要人员，一定要千方百计把他活着弄回来，要枪毙也得等抓回来审判后再执行，这有利于消除恶劣影响，对叛徒、汉奸、特务们更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杨德才同志严肃地点了点头，说：

“司令员，就这么办！我回去和大家研究一下，一定想方设法完成任务。”

“要快。”

“是。”

下午，杨德才同志又来找我：

“司令员，我们准备派宁亚川去完成这个任务。”

“宁亚川？好！就派他去。”我马上想起一张粗犷、淳朴而又机警的笑脸。

我是在一个令人难堪的场合里和宁亚川同志认识的。那是一九三九年夏天的一个黄昏，我带着警卫员在驻地周围走着，忽然听到一家老乡的菜园里传来姑娘的叫声：

“没羞，真没羞，当八路军还拔人家的大葱！”

我吃了一惊，连忙赶去。在苍茫的暮色里，看见一个穿军装的高个子慌慌张张地把什么东西往地上一丢，就要跑。

“回来！”我声音不大，却很严厉。高个子收住脚步，转身低着头，象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慢慢吞吞地向我走来。

他就是分区工兵连的宁亚川同志。河北涞水县北郭村人，曾在杂牌军队里当过工兵，参加八路军后，一心抗日，作战勇敢，完成任务坚决，但也带有旧军队的习气：好喝酒，爱顺手从老乡地里拔个萝卜或者扯根大葱来下酒。为此，他也经常挨批评作检讨。不过，自从那次拔大葱被我撞见后，宁亚川同志确实是痛下决心，改正了错误，再也没听说他违犯群众纪律，酒也喝得少了。一九四〇年“五·卅运动大会”上，宁亚川同志参加了表演，他那出

色的工兵技术，使大家赞不绝口。不久，部队参加“百团大战”，我特地点名叫他去炸漕河铁桥。宁亚川同志高兴得很，背着炸药、导火索去了，把那座铁桥炸断不算，还叫日军的一列火车栽入河里。回来之后，宁亚川同志立了个功，胸前挂上用漂白布包着铜板做的奖章，兴奋极了。

半年前，我们准备过春节，宁亚川同志又接受了分区锄奸科交给的秘密任务，化装潜入日军设在徐水县大王店的反共宣抚班。

这个“反共班”，说来很简单，颇有些能量。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为了对付八路军，破坏我们根据地，在华北设立了各种各样的汉奸、特务班子。设在大王店的这个反共宣抚班，就是经日军训练过的“鹰犬”，专门从事策反、搜集情报等工作。有一个时期，我们队伍中逃跑、失踪的事件时有发生。一查，原来是设在我们根据地大门口的这个反共宣抚班作的祟。地方政府部门和人民群众也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写信，控诉这帮坏家伙网罗我们队伍中的叛徒、变节分子，残酷地搜捕、杀害我方人员和在敌占区里的抗属以及带领日军到根据地来“扫荡”等罪恶行径。他们要求我们端掉这个黑窝。

我们答应了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先派专人在地方干部配合下，把大王店敌据点的情况了解清楚，然后开会专门研究搞掉大王店反共宣抚班的问题。据调查，大王店据点中最坏、民愤最大的有那么十个人，他们是反共

宣抚班的骨干。接着，锄奸科又在大王店找到了两个“关系”，一个叫金老林，是维持会长，另一个叫刘宝仁，是开明绅士，打算派个人通过金老林和刘宝仁打进宣抚班，瞅准机会，用烈性炸药把那群坏家伙全炸掉。这样，我们就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但这需要有一个既懂工兵技术又胆大心细的同志。派谁去呢？锄奸科长杨德才和组织科长黄连秋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工兵连的宁亚川同志。

我和政治部主任罗元发亲自找宁亚川同志谈了话。我向宁亚川同志讲清了这个任务的危险性和艰巨性，并说明完成这一任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重要意义。罗元发主任对宁亚川同志说：

“我相信你是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但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司令员，罗主任，你们放心！不把这些坏蛋搞掉，我不回来见你们！”宁亚川同志高兴地接受了任务。

接着，锄奸科长杨德才与宁亚川同志又详细研究了打入大王店反共宣抚班的行动计划。他们商定：让宁亚川同志伪装投敌，设法将烈性炸药带进大王店据点。

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科长杨德才给了宁亚川同志一支崭新的三八大盖，说：

“投敌总得象个样儿，带上它吧。”

“可惜喽！缴这么一支枪不容易啊！”宁亚川同志叹息道，不过还是带上它了。此外，他还从敌占区弄来四个特

制的点心盒子，其中有一盒装着从日军手里缴来的烈性炸药，让锄奸科随后派万一和孙玖龄送往大王店金老林家存放备用，因为金家在大王店开着点心铺。

这时，锄奸科为了配合这次行动，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已经把大王店据点里的金老林和刘宝仁两人完全争取过来了。

那天，宁亚川同志背着三八大盖到据点里投了“诚”。宁亚川同志打进宣抚班之后，通过吃吃喝喝，很快与那十个坏家伙交上了朋友。每次打交道，钱都是由宁亚川同志掏。特务们还以为他是由于贪污而逃离八路军的，肯定身上带了不少钱，所以也乐得捞他些油水。

除夕那天，宁亚川同志更为慷慨，买了许多好酒好菜，连同那四个点心盒子一起提回了据点。当夜，大王店汉奸特务喝得烂醉如泥，躺在炕上呼呼大睡。宁亚川同志趁机把装着烈性炸药的点心盒子放到炕洞里，安好引爆装置，然后带着自己那支三八大盖溜出炮楼。“轰隆”一声巨响，反共宣抚班全部报销。宁亚川同志安全返回一分区，在大年初一的清晨，他向我报告了胜利的消息。

从那以后，宁亚川同志名义上是分区工兵连的排长，实际上已经秘密地调到了分区锄奸科工作。现在，冒险深入敌巢生擒叛徒的重任，又落到他肩上。

我深知，这次任务危险性更大，宁亚川同志要有牺牲的准备。我再次找他谈话。

宁亚川同志进来了。他听我说了刘长生投敌后的丑恶表演，恨得直咬牙，说：

“司令员，让我去把叛徒干掉！”

我说：“宁亚川同志，这次任务，比以往你完成的任何任务都艰巨、危险得多！我们要求你的，不是干掉他，而是在敌人的新电台未使用之前，把他活捉回来。这样，我们除了可以挽回不良影响，打击汉奸和投敌分子外，还可以从他口中了解到一些敌人的情况。希望你能圆满地完成这项任务。你有什么要求，家里有什么事要交待，请尽管讲”。

宁亚川同志目光坚定地注视着我，轻声地说：

“司令员！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家里很好，没什么事，只有一个请求：给我一支好手枪，关键时刻打得响就行！”

“好吧！给你一支好手枪。”我激动地说，“亚川同志，祝你胜利归来！当然，在困难重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安全脱身，也可以把叛徒干掉，我们会派人接应你”。

分区直属队党总支书记陈亚夫按我的指示，从总务科里取出一支八音子手枪，交给宁亚川同志。锄奸科长杨德才又与宁亚川同志详细研究了打入易县城的有关问题。

夜，月色朦胧，初夏的爽风送来一阵阵泥土的香味。宁亚川同志要出发了。我特地赶到政治部驻地岭东来为他送行。

宁亚川同志已经脱下了八路军军装，身着便衣，腰间

掖着八音子手枪。我和罗元发主任、杨德才科长依次与他握手道别。我叮嘱他：

“宁亚川同志，大胆，谨慎！”

他点点头，转身走了。

我望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当年的荆轲在此燕赵之地慷慨悲歌，告别易水的情景，心里不由感慨万千。我对杨德才同志说：

“万一宁亚川同志牺牲了，他的家庭由政治部特别抚恤。”

说完，我定睛一望，宁亚川同志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夜色之中。

送别宁亚川同志，我心潮难平，夜不成眠。我想，几年来，我们的斗争虽然取得很多胜利，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好的，立场坚定，作战勇敢，出现了许许多多象邓南风、胡尚义和宁亚川同志这样的英雄。但也有极个别败类，脱离革命阵营，甚至投敌叛变。这里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客观上，有敌人的策反、渗透、腐蚀，斗争艰苦，主观上，有的干部居功骄傲，或者思想意识不健康，或者对抗战胜利缺乏信心，又不认真学习，便动摇了，甚至走向了反面。除了刚刚发生的刘长生叛逃事件外，一九四〇年我们还发生过一个严重事件——分区侦察科长袁彪带人逃亡，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那一回，我们正在岭东开党代会。袁彪以外出“侦察”

为名，蒙骗了一支队参谋长、侦察股股长罗昭辉和支队侦察连连长，带着几个地方情报员，在雨夜里突然向保定方向窜去。

接到报告，我立即命令作战科长胡克仁采取紧急措施，通知在保定郊区活动的一团、三团、二十团的侦察连和保（定）满（城）支队全部换上便衣，马上封锁保定西关和保定外围及满城一带，非把袁彪等人截住不可。

四五天后，支队参谋长、罗昭辉和侦察连长忽然被保定附近一个情报站的同志及当地民兵五花大绑送回来了。袁彪当着我们的面“义愤填膺”地骂道：

“这三个家伙竟想叛变投敌，真是混蛋透顶，我把他们押回来了。”

袁彪等人都被隔离审查。事情的真相很快就查清了。

策划这个逃跑事件的正是袁彪自己。这个人思想意识很坏，闹名誉，闹地位，达不到目的，就暗中拉拢一些人，想脱离共产党、八路军，由他领头在保定附近搞一支独立武装。他利用其他三个干部对没有得到较快的提升有不满情绪，就煽动他们，说在这里横竖得不到重用，不如跑出去自己干。那三个人被说动了心，竟带上武器跟他走了。

他们跑到保定附近，看到我们派去的人把保定外围都控制住了，既进不了城，又难以招兵买马另立山头，就为出路问题发生争吵。支队参谋长和侦察连长发觉上了袁彪的当，后悔莫及，吵着要回分区。袁彪执意不回，罗昭辉

则极力支持他。袁彪早已暗地参加了“青帮”，此刻见势不妙，为了嫁祸于人，开脱自己，竟心生毒计，反将支队参谋长、罗昭辉和侦察连长三人绑送分区，岂料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一手不但没有骗过我们，反而加重了他的罪行。

我们把袁彪事件报告晋察冀军区，军区政治部认为袁彪等四人逃亡，属于叛变行为，应该处决。

我心情十分沉重，袁彪等四人都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他们由闹名誉、地位到聚众逃亡，虽然投敌未遂，但影响极为恶劣。在强调一心抗日的形势下，军区政治部要处决他们，也可以理解。我既痛恨他们的行为，又为他们深感惋惜：在艰苦的长征路上，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雪山草地等绝境，他们没有逃跑，也没有中弹倒下，而是和我们一起冲杀过来了。可是今天，他们却被个人主义思想胀昏了头，堕落到这个地步，以致于将要倒在我们自己的枪口下。

考虑到支队参谋长与侦察连长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在发现上了当之后能要求重返部队，而且他俩在过去的斗争中，都表现得很出色。支队参谋长是突破乌江金榜题名的英雄，侦察连长作战勇敢。所以，我向上级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不处决他俩，只撤消职务，开除党籍。至于袁彪与罗昭辉虽然罪重，但念其过去有一些功劳，似可免其一死，让他们在今后斗争中改造自己，立功赎罪。

后来，军区政治部同意不处决支队参谋长与侦察连长，

但为严肃党纪、军纪，仍将袁彪与罗昭辉审判、处决。

在党代会上，我就袁彪事件，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主要是对干部教育不够。我痛心地流下了眼泪。我希望我们的干部，特别是红军干部要以袁彪事件为戒，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向党伸手，不能闹名誉、地位，不能无组织无纪律，闹独立性；要警惕敌人的影响，要加强学习，站稳立场，革命到底。后来，那个参谋长和侦察连长吸取了教训，改造了自己，表现很好，在对敌斗争中，又重新入了党。

袁彪事件后，我们进行了政治整军，加强了对干部的政治教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可是，如今刘长生叛逃的事再一次告诉我：斗争道路是曲折的，不能指望进行一次或几次教育，就能一劳永逸，敌人无时不在对我们搞策反。我们的干部要时刻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关键时刻就会失足，甚至堕落成叛徒。

宁亚川同志已经走了四天，仍然音信全无。我暗自替他担忧。第五天，杨德才同志忧心忡忡地告诉我：据了解，宁亚川同志已经进了易县城，而且见到了汉奸头子赵玉昆，此后就失去踪迹，连我们的“内线”也不知他的去向。而叛徒刘长生却已经穿上伪军军官服装，在随从的护卫下，在易县城大摇大摆地出入。

莫非宁亚川同志被狡猾的赵玉昆识破，遭到了不幸？我们都很不安。我要杨德才同志赶紧考虑新的方案，准备派人进城营救宁亚川同志，如果宁亚川同志牺牲了，就设法把他的遗体弄回来。同时，对叛徒刘长生要尽快制裁。

没想到，第六天清晨，我忽然接到龙华支队的报告：叛徒刘长生已被宁亚川同志生擒，于凌晨四时左右押送到奇峰口，现在准备送往分区！

意外的喜讯，驱散了我们心上的阴云。本来，为了保密，分区机关里只有极少人知道宁亚川同志去执行这个任务。现在，宁亚川同志即将押送叛徒返回分区的惊人消息，象风一样地传开了。同志们啧啧赞叹：

“宁亚川，英雄啊！”

“咱们一分区可真出能人了！”

我按捺不住兴奋，对罗元发和杨德才同志说：

“宁亚川同志回来后，给他记一大功！”

宁亚川同志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分区。虽然他只出去了六天，可是却明显消瘦了，两眼布满血丝。只身深入虎穴，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回来，他却毫无炫耀之心，只是略带倦意，笑着与同志们握手。我搂住他的肩膀，把他拥进办公室。他喝了口水，简单地汇报了情况。

宁亚川同志过去在杂牌部队里当工兵时，曾随大流参加过封建会道门组织“青帮”。此次他进入易县城后，就是利用这个旧关系，以“贪污公款被追查而逃离一分区”为

名，千方百计与汉奸头子赵玉昆接上了头。在极短的时间里，宁亚川同志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干掉了与赵玉昆争权夺利的翟大牙和张麻子两个汉奸。赵玉昆喜出望外，立即与宁亚川同志拜上了把兄弟，对他深信不疑，准备予以重用。

在赵玉昆司令部里，宁亚川同志和刘长生相会了。刘长生只知宁亚川同志是分区工兵连的排长，却不知他暗中早已成了锄奸科干事，更没想到他此行是专来擒拿自己的，因为宁亚川同志已成了赵玉昆的“红人”把兄弟，这是谁都不敢得罪的。宁亚川同志又把“贪污”来的公款分了一些给刘长生，刘长生自然千恩万谢，自认为是“他乡遇故知”了。

就在宁亚川同志进城的第五天下午，宁亚川同志请赵玉昆来吃饭，特地把刘长生也请来。吃完饭，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赵玉昆告辞回家了。

初夏的天气，也开始热起来了。刘长生吃酒出了一身大汗，宁亚川同志便邀他去西关澡塘洗澡，洗完澡，已是黄昏时分，宁亚川同志故作亲热地与刘长生散步，互诉衷肠，将其诱到城外西北方向的店北车站。

刘长生看天色已黑，行人稀少，忽然想起这一带常有我军侦察员活动，心里害怕，猛地收住脚步不走了。

这时，宁亚川同志从腰间拔出八音子手枪，压低嗓子厉声说：

“伙计！司令员派我来请你回去！”

刘长生一下子吓呆了，颤抖着声音说：

“宁……宁兄！你可别……别开玩笑！”

“不开玩笑！老老实实跟我回去见司令员。不回去，我只好把你打死在这里了！”宁亚川同志说着，微微抬高了枪口，对准刘长生的胸脯。

刘长生险些瘫软在地。少顷，他绝望地叹了口气，声音微弱地说：

“我有罪，回去恐怕也活不了。”

宁亚川同志义正辞严地说：“只要你回去低头认罪，我在司令员面前保你留一条活命！”

刘长生听了，无可奈何地低下了头，但仍左看右看。

宁亚川同志心知夜长梦多，此地不可久留，说声：“走吧！”便一手提着枪，一手紧抓着刘长生的手腕，快步来到城外一个秘密联络点。

那里的同志协助宁亚川将刘长生弄上了一辆马车，星夜送往龙华支队，然后再押送回分区。

听完宁亚川同志的汇报，我命令将叛徒刘长生押来见我。

刘长生进来了。当他被揭去蒙眼布，见到我时，惊恐万状，浑身颤抖。我厉声道：

“刘长生！你背叛了党，背叛了革命，背叛了人民，认贼作父，叛逃投敌，按你的罪行，我们完全可以枪毙你！”

刘长生一阵颤抖，跌坐在地上。我接着说：

“不过，只要你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我们可以考虑免你一死，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宁亚川同志曾答应过你，如果你能回来，可以给你留一条活路。我们是说到做到的！”

刘长生呆住了。

我们确实没有枪毙刘长生，只是在对他进行了彻底的审问之后，派人把他押送到军区。后来听说，军区又把他押送到延安去了。分区将宁亚川同志的事迹和刘长生的罪行向全区干部战士公开宣布，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宁亚川同志立了大功，那支八音子手枪，经我批准，奖给他使用。

可是事隔不久，宁亚川同志却犯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几乎招来杀身之祸。

那是在敌人对我一分区疯狂“扫荡”的时候，锄奸科长杨德才带着宁亚川等同志随三团行动。有一天，他们中途休息，忽然遭到敌机猛烈轰炸。有一颗炸弹从空中落下，正巧落在三团团长肖应棠、政委王平民和杨德才、宁亚川的附近。所幸那炸弹插入藏粮食的松软的土坑里，居然没有爆炸。宁亚川同志对杨德才说：

“科长，我去看看，想办法把它起出来，说不定还能用。”

杨德才同志点点头，要他小心谨慎。

宁亚川同志爬过去，凭借自己熟练的工兵技术，将炸弹起出来，进行了改装。

同志们欢天喜地，都说应该把这枚炸弹送回到日军那里，让敌人尝尝自己制造的杀人武器的滋味。

宁亚川同志便将这颗重二十来斤的炸弹背在身上，在反“扫荡”中跑了三天，最后因为背在身上太沉，行动不便，才挖了个坑，将炸弹埋藏起来了。不久，反“扫荡”结束，他又把炸弹挖出来，带回了分区，准备设法去炸保定日军弹药库，并开始了积极的活动。

不料有一天，杨德才同志却神色惊慌地来找我，说：

“司令员，宁亚川出事了，他把一个姑娘杀了！”

我吃了一惊，连忙询问根由。

原来，锄奸科通过各种途径，在地方上找到了一个“关系”有个姑娘，其父在保定城里当汉奸，与日军弹药库的人熟悉。宁亚川同志根据科长的指示，与这个姑娘进行过多次接触，做通了她的工作，姑娘答应通过自己当伪军的哥哥，把宁亚川同志带去炸弹药库。可是两天后，姑娘突然变了卦，不干了。宁亚川同志又气又急，说：

“我们把什么秘密都告诉你了，你又不干了，我可饶不了你！”

姑娘与他争吵起来，并要跑，宁亚川同志怕她张扬出去，就把她杀了。

事后，宁亚川同志自知闯下大祸，懊悔莫及，连忙跑

来找杨德才自首，说：

“科长，请你报告司令员，我犯了严重错误！我杀了那个女的，我怕她暴露秘密，所以才……”说着，知罪地把他那支八音子手枪放在桌上。

杨德才同志一听，急忙向我报告。

想不到宁亚川这个胆大心细的英雄，竟也有鲁莽从事不讲政策的时候。我把他叫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自然，宁亚川同志是噙着眼泪，要求给予严厉处分的。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地方上有人告了状，群众也反映强烈，分区内部也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宁亚川犯了群众纪律，应该给予严厉处分；有的主张，杀人偿命，应该枪毙！……

我下令将宁亚川禁闭，一方面向军区聂司令员报告，一方面向地方有关方面赔礼道歉，还派人到死者家里做善后工作。

在宁亚川犯错误的情况下，还要不要按原先的计划，炸毁保定日军的弹药库呢？我对杨德才同志说：

“该炸还是要炸。保定日军疯狂得很，炸它一下很有必要。宁亚川不能去了，可以叫他把炸弹搞好，另外派人送去，目标也不一定局限在弹药库。”

杨德才同志决定炸保定日军的电影院或戏院。他从地方上找到了一位叫刘长贵的侦察员，又叫正在反省的宁亚川将那颗炸弹安上可以引爆的装置。刘长贵同志也胆大得

出奇，他买好三瓶老白干，连同那颗炸弹一起装进褡裢里，扮作赶集的农民，背起褡裢进了保定城。随后，通过保定戏院里的内部关系，他买到了一张主要供日军观看的戏票，巧妙地把褡裢带进了戏院，乘人不多的时候，放到了“军警席”的座位底下，然后悄悄地溜了出来。他刚走到西关，就听戏院里轰然一声巨响，惊叫声、跑步声响成一片。正在看戏的日军被炸得死的死，伤的伤。保定日军最高指挥官十分震惊，可又捉拿不到爆破者，他们便怀疑是下面几个汉奸干的。因为这几个汉奸，都是从根据地逃过去的叛徒，他们并不十分信任。最后，这几个叛徒全都被砍了头，脑袋挂在城门上示众。想不到宁亚川同志捡来的这颗炸弹不但还给了日军，炸得他们血肉横飞，而且还除掉了好几个叛徒，实在是一举两得，大快人心。

几天后，聂司令员对宁亚川的事作了批复。聂司令员指出，宁亚川曾立有大功，这一回，事出有因，不能杀，但要对他进行教育、处分，并且向地方同志和群众作解释、说服工作。我们按聂司令员的指示办，很顺利地处理好了这个问题。宁亚川受到了留党察看处分。后来，他吸取了教训，进步很快，担任了营长，指挥部队打了许多漂亮仗^①。

① 后来，宁亚川同志负伤转到地方工作，在十年动乱中，反被诬蔑为“汉奸”、“特务”，惨遭迫害至死。粉碎“四人帮”后，宁亚川同志得到平反昭雪。

血洒燕赵地

一九四三年春天，对晋察冀根据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边区参议会，在阜平县温塘村召开了。

我以边区参议员的身份，参加了这个盛会。会上，聂荣臻司令员代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向大会作了关于晋察冀边区抗战的总结报告，迄今为止，边区子弟兵作战已达一万四千三百九十多次，毙伤俘日伪二十一万三千六百多人。边区政府主任委员宋劭文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刘澜涛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向大会提出了审议晋察冀边区施政纲领的提案。参议员们纷纷表示：认真贯彻党的十大政策^①，坚决完成中央赋予边区的“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和准备战后建国”的任务。

会议期间，举行了雄壮的阅兵式。分区一团被选拔到军区来接受检阅。阅兵后，聂司令员代表军区宴请全体代表，衷心感谢他们对子弟兵的有力支持。宴会上，不少人兴奋得喝醉了酒。聂司令员喜悦地为大会题了词：

① 即有关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的政策。

我们屹立在太行山、五台山、恒山、燕山，
旌旗指向长白山；

我们驰骋在滹沱河、永定河、漕河、滦河，
凯歌高奏鸭绿江。

边区参议会刚结束，我立即赶回分区，向干部传达了边区参议会的精神。因为我还兼任地委书记，所以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与地委的同志研究地方工作问题。记得先后在一分区地委工作过的同志，有王国权、刘达、赵凡、牛树材、杨士杰、张献金、白文治、曹裕民、梁正中、靳昭宇、王烟等，以后刘达和赵凡同志调到雁北地委工作去了。先后在一分区当过专员的有张苏、王斐然、李耕涛、陈一凡、宋裕和等同志。当时，边区参议会大大鼓舞了军民斗志，刚刚从一九四二年艰难岁月里走出来的人们，决心迎接新的斗争，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然而，敌人也更加疯狂了。从四月二十三日开始，三千五百多名日军带领着伪军在飞机、大炮配合下，“扫荡”狼牙山地区。我在转移途中，接到在狼牙山上牵制敌人的吴炎从一团打来的电话。他报告说，敌人已经攻上了狼牙山，山上的地方干部和为数不多的我军人员，被迫退到棋盘坨，子弹不多了，手榴弹也剩不多了，小米也快吃完了，眼看就要弹尽粮绝，他们准备集体突围，如果突围失败，

就效法狼牙山五壮士跳崖。

我要吴炎同志立即选择突围路线，并与他商量救援与接应的办法，话未说完，电话中断了。过了不久，狼牙山附近的情报站报告：敌人向棋盘坨发起了总攻，飞机一个劲地俯冲、扫射，现在，枪炮声平息了，敌人已经占领棋盘坨。

“吴炎没突出来！”我叹道。同志们也都紧张起来。

吴炎同志勇敢、灵活，曾给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记得一九三九年的七八月间，一分区军民与“扫荡”的敌人展开了艰苦的雨季战斗。连续七天七夜的倾盆大雨，使得山洪暴发，不但冲毁了无数良田和庄稼，而且把素有“小天津”美称的大良岗和干河、毛儿崖、管头等村镇都冲毁了。雨夜里，被洪水从山上冲下来的大石头互相撞击，居然冒出火花，老年人说那是王八精在水底提灯作怪。暴雨和洪水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灾难，部队没饭吃，同志们淋得象落汤鸡，一连十几天身上没一根干纱，不少人的衣服已破烂不堪，疟疾、伤寒横行。乡亲们更是苦不堪言。日本侵略军却突然在雨夜里从保定出来袭击我们，一下子就扑到南管头附近。

敌人从大良岗以东西渡易水河时，橡皮舟翻了，死了一些人，但并没有停止奔袭。天刚亮，敌人就向天津沟进击，三团长纪亭榭带部队在山上顶着。一团在东西水的处境更危险，敌人正张开大网朝他们撒去。

我要他们迅速转到狼牙山去。可是无线电和电话都不通，我们又被阻在大棚河边，面前河水暴涨，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根本无法渡河，信也送不过去。我在河边急得心如火燎，正在这时，司令部管理员吴炎——一位从孟阁臣部队过来的山东大汉，走到我跟前，自告奋勇地说，他能游过去。我不敢让他下水，因为那太危险了，日军坐着橡皮舟还掉进水里喂王八呢！但他坚持要去送信，他说一定能游过河，还说他在黄河上能游几个来回。我看他说得有把握，又考虑到一团处境危险，便同意了。我急忙给一团写了封简短的信，抄成几份，塞进芦苇筒里，拴在吴炎同志脖子上、头上，以防信被水冲走。

吴炎同志跃入湍急的河水，向对岸泅去。刚到河心，他就被急流卷走，一连两次，也都未成功。眼看过河无望，我只好准备另想办法。没想到，吴炎铁青着脸望定河心的漩涡，一声不吭地又扑进了河里，终于穿越洪峰恶浪，把捆扎在他身上的芦苇管子交给了一团，使一团赶在敌人大网收拢之前，安全地跳了出去。

一团在险境中不受损失，吴炎同志是有功劳的。雨季战斗结束后，我说：

“吴炎可以到分区警卫连去。他会成为一个不错的连长。”

果然，他担任了警卫连连长之后和指导员徐信密切配合，把二百多号人、一色日本武器装备的分区警卫连带得

如同蛟龙猛虎，多次出色地完成了战斗警卫任务。这次，部队在狼牙山上牵制敌人，不料陷入了绝境。几个小时后，我突然接到吴炎同志的电话，他们脱险了。原来他们与我们失去联系后，马上组织突围。他们把两名被炮弹炸伤的战士隐蔽在棋盘坨上，又撕了几条棉被，把水壶、刺刀、铁锅等可能发出响声的东西都捆扎好，然后与棋盘坨的李老道一起，悄悄地从天险“阎王鼻子”的山崖上放下又粗又长的绳子，攀绳而下。一枪没放，就从敌人的网眼里钻了出来。

日军以决战之势，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棋盘坨发起总攻，但是一无所获，仅把我们建在棋盘坨上的五壮士纪念碑炸毁了，把棋盘坨寺庙烧毁了。

李老道遥望着自己凄风冷雪居住了一二十年的存身之处化为灰烬时，不禁捶胸顿足，老泪纵横。这位身在道门却效力于伟大民族战争的可敬的“抗日老道”从此离开狼牙山，不知去向。后来，我曾寻过他几次，皆无下落。

狼牙山上的姑姑坨寺庙，也被日军毁于一炬。在烧毁姑姑坨寺庙前，那些脖颈上挂着小佛爷的日本兵竟连寺庙里出家的年轻尼姑也不放过，野蛮地进行奸污。

敌人这次“扫荡”狼牙山地区，其凶残是空前的。日本官兵和赵玉昆的伪军在狼牙山沟谷里的每一个村庄，都疯狂地进行屠杀，不到四天，就残杀了村民五百多人。在

东西水村，两位老太太领着两个小孙子碰到了敌人，敌人就在地上划了一条线，让两个小孩在前，两位老太太在后，站在一条线上，然后他们用一颗罪恶的子弹穿透了四个人的身躯！

面对敌人的暴行，乡亲们以刻骨的仇恨进行英勇反抗。北独乐的妇女卢国运在敌人淫笑着就要抓住她时，象五壮士一样英勇地跳下了山崖，但她没有摔死，敌人走后，她带着创伤走回村里。菜园村的蔡秀珍在日本兵强迫她脱衣服时，毫无畏惧地用手抓住敌人的刺刀破口大骂，直到最后一口气。许多妇女咬牙切齿地发誓：“鬼子、汉奸再来时，我要咬死他！用刀子、剪子扎死他！”

在狼牙山地区反“扫荡”斗争中，我们的子弟兵和民兵在每个山头英勇地打击敌人，毙伤日伪五百多人。敌人撤退之后，专署和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发表了《为狼牙山周围七十余村被敌寇烧杀抢掠奸淫之灾难同胞控诉书》，用血泪控诉了日本法西斯和汉奸、伪军的滔天罪行。我命令全区部队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医疗队到各村治伤看病，发动干部、战士帮助群众安葬死者，修建房子，组织募捐，救济灾民。我们的人民虽然遭此大劫，但仍然充满信心：日本帝国主义快完蛋了，我们再坚持一下，最后胜利就一定是我们的！

这一天，我正在吃早饭，准备饭后去慰问几户损失最大的乡亲。忽然，从满城方向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不一

会，我便接到了报告：数月前失踪的分区警卫连战士陈永福，杀了满城日本宪兵队的日军和汉奸，跑回来了。

想不到，陈永福这个从未骑过自行车的小鬼，竟是骑着自行车从虎口里闯出来的。他浑身泥土，满脸花糟糟的，一双乌黑的大眼睛闪着兴奋的光，推着自行车，在同志们簇拥下朝司令部走来。

陈永福年仅十六岁，几个月前，他到游击区割电线时被满城日本宪兵队抓去了。敌人看他年纪小，又听他说是八路军的炊事员，能炒一手好菜，就盘问了一番，把他留在宪兵队当伙夫了。

陈永福表面上装得很温顺，很听话，干活勤快，有几次日本宪兵队出去“讨伐”，据点只剩几个人，陈永福仍然老老实实地买菜、做饭，没有任何反常举动，敌人也就慢慢放松了警惕，不再注意他。

昨天，日本宪兵队又出动了，家里只剩下日本宪兵队长金山等几个人。陈永福一看，这正是为边区人民报仇，为自己洗刷被俘的耻辱的好机会，就利用做晚饭的机会，弄了不少酒，炒了十几个菜。金山和一帮日本特务、汉奸乐得心花怒放，大吃大喝一通之后，纷纷入睡。

夜深人静的时候，陈永福提着磨得异常锋利的杀猪刀，悄悄摸进了金山队长的住房，奋力朝他的咽喉猛砍几刀，金山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死了。陈永福用毛毯把金山的尸体

盖好，从墙上取下日本指挥刀，走出房间，把房门反锁好。就这样，他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杀，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锁好门，先后用一把杀猪刀和两把日本指挥刀，象切西瓜、杀鸡一样，把金山等日本特务和汉奸全砍死了。

天快亮了，陈永福赶紧脱下溅满血迹的衣服，换上日本军服，一摸口袋，里面还有一张金山的相片哩。这时，他背上两支驳壳枪、两支手枪、一支盒子枪，以金山的名义给城门守敌挂了个电话，说宪兵队有人有紧急任务要出城，赚开了城门，然后推着自行车，装作气势汹汹的样子出了城。

陈永福一出城，就跳上了车子，没命地踩着向前跑。可他从来没骑过自行车，连连摔倒，他也不管，跳上去又骑，因为骑车子总比跑路快呀。他正跌跌撞撞地踩着车，身后忽然响起枪声，原来是敌人发觉宪兵队长等人被杀，追来了。陈永福急得满头大汗，一个劲地猛蹬车子，在危急之中，自行车竟在麦田中的路上歪歪扭扭地跑着。

活动在满城县外围的三团侦察连和游击队听到枪声，连忙赶来截击敌人。

敌人在追捕中，发现又有两个伪军乘机携带枪枝弹药，向八路军反正，十分气恼，加上遭到截击，只好灰溜溜地撤入城内，向城外开炮泄怒。

陈永福说完，掏出日本宪兵队长金山的相片给我们看。我们很高兴，当即表扬了他，批准给他记功。几天后，陈

永福被提为干部，借调到锄奸科帮助工作。

不久，锄奸科与司令部的侦察科、专区的公安局都受领了消灭赵玉昆的任务，三家分头行动，各自派人执行任务。但是，自从宁亚川同志利用与赵玉昆拜把兄弟的关系，捕回刘长生之后，赵玉昆防范也更严了，要接触到他，相当不易。不过，有一次赵玉昆正在易县城开会时，被我们公安局派去的侦察员出其不意地打了一枪，可惜只把帽子打飞了，赵玉昆在手下喽罗的掩护下逃脱，我们的侦察员只好遗憾地返回。

锄奸科把除掉赵玉昆的重任交给了陈永福和特派干事吴恒志、三团原电话班长郭元章。这个郭元章曾在破坏敌人电线时被俘，后又带着一支枪跑回来了。

陈永福接受任务后，曾碰到我一次。我告诉他，赵玉昆已经不敢在易县城呆着，现在跑到保定去了，要搞掉他，得学习宁亚川，既要有智谋，又要勇敢，不怕牺牲。陈永福说：

“赵玉昆这个魔鬼杀了我们多少人！我要能用一条命去拼掉他，那就好了！”

陈永福等三人进了保定郊区的掩蔽点后，通过保定谍报组组长刘贵，接上了一个“内线”关系——日本驻保定领事馆翻译马金宝。我听杨德才同志说，他们在保定附近潜伏下来之后，曾经抓获过一个伪宪兵司令，在保定西关秘密处决了，后来还生擒过一个日本特务，找人送了回

来。但是他们始终未找到机会除掉赵玉昆^①，只好仍潜伏在那里。

转眼之间，秋天到了。军区聂司令员在赴延安参加“七大”的途中，经过同蒲路，发现沿线日军屯积了很多粮食，在四处征集民夫、骡马。他判断，敌人正在准备秋季大“扫荡”，时间恐怕要比以往长，便马上发电报给军区代司令员肖克、代政委程子华，要他们通知全区准备反“扫荡”，保卫秋收。

在敌人秋季大“扫荡”即将开始时，冀中九分区在任邱的北曹口村设伏，击毁敌汽车二辆，缴获了日军第六十三师团“扫荡”我一、三分区的作战命令一份。这样，敌人“扫荡”的企图、时间、步骤大体上都被我们掌握了。

这次反“扫荡”，是我们准备得最充分的一次。我们是按照一九四一年敌人进行大“扫荡”的规模和我们反“扫荡”的经验教训进行准备的。在党政军民中都进行了深入动员，每个人都攒着一股劲，准备同敌人斗。我们按军区的指示给各个团、各个区队划分了活动地区，以便他们避敌锋芒，与其兜圈子。部队按照被划定的区域，看地形，修路，筑工事，在制高点上安上水缸，作好节节抗击敌人

^① 赵玉昆一直顽固地与人民为敌，日本投降后，他又在国民党反动派羽翼下存身。直到北平解放，他过去的一个卫士认出他来了，报了案，公安部门才把他逮住。听说，他为了隐藏自己，把面部都烫变了样，可是仍未逃出法网。公安部门把他押回易县交家乡人民公审，因他血债累累，当地群众处决了他。这就是汉奸头子的可耻下场。

的准备。连队还组织了飞行射击组和飞行爆破组。大量地雷已发到民兵手中。分区机关干部纷纷下到各情报站和电话站，加强那里的工作。群众进行了坚壁清野和秋收秋耕的各种准备。

就这样，我们一分区军民刚把反“扫荡”的准备工作做好，敌人“肃正作战”的枪声就打响了。

我率很精干的司令部从周庄出发，和敌人兜圈子。就在这次“扫荡”中，日军在一分区寨坨制造了一个大惨案——

一天凌晨，日军突然扑向易县城以西的寨坨和杏树台两村，搜捕出抗日干部、游击队员和群众一百多人。日军还在甘河净包围了分区后方医院，抓来了七名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关在寨坨村的一所大房子里。

上午十点钟，敌人在寨坨的村南、村西和村北挖了九个大深坑，坑边站满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十几个挥舞大刀的日本骑兵绕着村庄巡逻。敌人把被捕的军民用铁丝穿上锁子骨，双手反绑，押了出来。

游击队员陈云堂被推到坑沿上。一个日本军官拿着一把指挥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三个日本兵把刺刀对准他的胸脯，要他说出谁是八路，谁是共产党，哪里是八路军的供应站。陈云堂怒目圆睁，只字不说。日本兵向陈云堂连刺三刀后，将他踢进杀人坑，紧接着又推下一块大磨盘石压

在他身上。陈云堂同志壮烈牺牲了。

日军又拖出杏树台村抗日干部赵老景的妻子崔兰女，兽性大发地把她的衣服扒光，一顿毒打，一连打断了三根木棍。崔兰女被打昏在地，可是她一醒过来，就挣扎着爬起来，大骂敌人。敌人气急败坏，把崔兰女按倒在地，残暴地用铁丝穿上两个乳房，又连上锁子骨，然后连刺几刀，崔兰女浑身浸满鲜血，可是她却拼尽全力高呼抗日口号，一直到停止呼吸为止。

一二十个抗日军民又被日军押了出来，站在土坑边。曾在战斗中负过伤的战士小刘被敌人用铁鞭打得皮开肉绽，四次昏倒过去，仍然坚贞不屈。敌人要他说出部队与供应站的下落，小刘只是怒声叫骂。敌人要活埋他们，他和乡亲们一道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用脚踢，用头顶，用牙咬。但是敌人几十把刺刀一齐戳了过来，把他和乡亲们刺倒后，全部扔进了深坑里。

傍晚，十几个村的游击组接到命令，火速赶来营救。敌人闻讯后，急忙退去。可这时两个村庄被烧得只剩下半间房，就在那半间房子的墙角下，还躺着一个不足两个月、浑身是血的婴儿。显然，这是被敌人挑在刺刀尖上甩到墙上弄死的。婴儿的母亲身上被捅了十几刀，躺在地上。她十个手指被割断六个。看得出，她曾与准备挑死婴儿的日本兵进行过殊死的搏斗，那手显然是夺枪时去握刺刀造成的。

一个已经怀孕七个月的年轻妇女被压在路边的一块大石板下面，她是被灭绝人性的日本兵奸污后，用石板压死的。

当时，九个大坑边上的土已被抗日军民的鲜血浸泡成红色的了，那里成了一片泥泞地。后来，人们把受难者的尸体从土坑里一个一个地刨出来时，其景象惨不忍睹：有的被砍掉了头颅，有的被敲光了牙齿，有的被挖去了眼睛，有的被割去了乳房，还有的被开了膛、挖了心。在这次大惨案中，七名部队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壮烈牺牲，十五名抗日干部和游击队员英勇就义，一百一十五名群众惨遭杀害！

寨坨惨案使我们全分区为之震怒，日本侵略军的暴行更加激发了中华儿女抗战到底的决心。

根据这一阶段敌人“扫荡”我一分区的战术和手段，以及我们反“扫荡”的情况，我们分区进行了分析、研究，向军区发了一份电报，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们认为在这次反“扫荡”中，主力部队大都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没有攥成拳头打击敌人。因此，敌人带着《讨伐要则》和《扫荡剔抉共军根据地的参考》等小册子，竟敢在清剿时分散成小股，甚至只有五六十人就敢在根据地村庄乱窜，肆意烧杀抢掠，进行破坏。而在这次反“扫荡”中，我们只强调广泛开展游击战，没有注意在有利条件下适当集中兵力打击敌人，以致根据地和群众遭受到一些不应有的损失，这很使人痛心。

我们的电报发走后，听说军区也陆续收到了各方面的反映。军区首长非常重视，及时地作了研究，很快就下达了命令：

各分区除了一部分部队活动于中心区及沟外交通线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以外，应适当集结主力，坚决打击敌三百至五百以下的小股部队，迫使敌人缩小“清剿”范围和缩短“扫荡”时间！

军区的命令下得太好了，这等于给窜入根据地的日本侵略军发放了死亡通行证！

十月八日，一股敌人头脑发昏，竟以一百三十多人的兵力，企图在我一分区的银坊长期“驻剿”。

八日和九日，我二十团乘敌人立足未稳，予敌以连续袭击。“驻剿”的敌人伤亡惨重，呆不住了。十日，敌人不得不由川里调来一百多人接替，撤走的敌人在通往走马驿的路上，又遭我部队伏击，到走马驿只剩下五六十人。十二日晚，二十团又强袭银坊，毙伤敌人七十多人。十三日，敌人再从川里调来一百多人，换回第二次受创之敌。十三、十四日二十团又两次袭击银坊。敌人连续挨打，难以立足，终于在十五日全部退回川里。

在二十团三战银坊之敌的同时，二十五团也奋起抗敌，攻克紫荆关以南的上陈驿据点，全歼了据守的日军。

主力部队的积极行动，对振奋人心、鼓舞士气和支援民兵广泛开展游击战，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易县地区，地

方游击队和区小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大摆地雷阵，仅九月十七日至十月中旬，就炸毁敌人汽车三十多辆，炸死日军七百六十多人。一位叫安全福的同志率领六个人在狼牙山下采取“麻雀战”的战术，抗击了一千五百多敌人一整天。

九月二十三日，我一团、三团和二十五团在管头、大良岗地区阻击独乐、松山的来犯之敌，经过三次战斗，毙伤敌八百多人，还袭入敌人坡下电灯公司，将机器全部捣毁，并连续袭入蔚县上庄和涞源煤矿以及石门店据点，将敌人打了个人仰马翻。

在日军欠下累累血债的寨坨，游击组日夜等待时机，报仇雪恨。日军曾两次经过这里，都遭到痛击。一次是小兰据点的日军出来“扫荡”，被游击组打了个伏击，死伤二十多名。游击组夺回了敌人抢劫的猪、羊好几十头。另一次，二百多名日军外出“扫荡”，途经寨坨，被游击组用土枪上炮和土地雷打得晕头转向，死伤三十多人。民兵游击组的同志们用一具具敌尸，祭奠了在寨坨惨案中牺牲的烈士。保满支队的战士们则化装成民夫，抬着被地雷炸伤的“皇军”，不费一粒子弹便巧夺了沈庄碉堡。

就这样，在一九四三年秋季反“扫荡”中，我抗日军民每日每时都在同野蛮的敌人作不屈不挠的殊死斗争。在燃烧着抗日烽火的燕赵之地既洒下了无数抗日军民殷红的热血，也埋葬了无数日军发臭的尸体。

一天，我们司令部转移到一个小山村，我忽然得知一个沉痛的消息：陈永福等同志壮烈牺牲，人头被敌人割下悬挂在保定城门上！

陈永福、吴恒志及“内线”马金宝同志，是被叛徒郭元章出卖而遇难的。陈永福、吴恒志和郭元章潜伏在保定城外的谢庄时，郭元章中了敌人的“美人计”，竟叛变投敌，出卖了同志。敌人于凌晨突然包围了谢庄，陈永福与吴恒志同志赶紧向村西北突围，在子弹打光、无法脱身的情况下，他俩把枪支藏在一个菜园里，毅然跳入一口井中准备以身殉国。可是井水不深，两人均被敌人抓去，马金宝同志也被敌人从日本领事馆里抓了出来。敌人对他们三人严刑拷打，这三位同志宁死不屈，最后惨遭杀害，头被割下，分挂在保定城的大西门、小西门和南门。遗体则被扔在东关校场，其状惨不忍睹，后被东关的乡亲们冒险掩埋。几天后，三位烈士的头颅，也被我们派人想方设法取下，合葬于一个棺材之内了。

陈永福等同志的事迹催人泪下，一分区许多军民闻知后都哭了。一个共同的誓言在军民们心头升起：烈士的血不能白流，血债要用血来还！

五峰寨遇险

在长时间紧张、艰苦的反“扫荡”中，我突然得了疟疾，发起了高烧，手脚哆嗦，牙齿打战，头晕眼花，全身无力。卫生部副部长卢星文极为焦虑，因为眼下敌人正在“扫荡”，连片奎宁都没有啊！

为了让我有个较为安定的环境，静心治病，参谋长黄寿发和政治部主任王建中劝我暂时离开司令部，到狼牙山老君堂去隐蔽一下，说那里眼下没有敌情，老君堂的石海中老道对我们的抗日工作也很支持。于是，在卢星文和几位警卫员的陪同下，我骑着骡子，上了狼牙山。

到了老君堂后，“摆子”还是照样打。不过，发起病来，在这云雾山中却有另一种感觉：白云从门隙里一团一团地漫进屋里，我卧在病榻上，如入仙境。银须飘飘的石海中老人守护在我身边，不是仙翁却胜似仙翁。每次发病过后，卢星文总是赶紧给我轻拭额上的汗水，石海中老人随之端来一碗煎好的草药，勤务员韩振亭同志则进进出出忙个不停。一天，我喝过汤药之后，忽然想起一件事，便对卢星文同志说：

“老卢，你还记得几年前我们分区干部进行体格检查时，你说过的话吗？”

卢星文同志想了想，回答：“记得。当时我说过，全分

区团以上干部中，就数你和邱蔚身体最好。”

我苦笑着摇头，一九四一年秋季反“扫荡”中，邱蔚同志病得一塌糊涂，只好藏在狼牙山的老君堂和姑姑坨里。而我呢，虽然熬过了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极其艰苦的岁月，但是身体素质却大大下降了。记得红四团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我和王开湘团长都得了伤寒病。王开湘团长在发高烧中抓响了放在枕头底下的手枪，不幸逝世了，而我这个政委在医生和警卫员精心护理下，终于痊愈。使我深感内疚的是，我好了，却把疾病传给了日夜照看我的警卫员钟学林同志，害得他也很长时间卧床不起。

我虽然住在老君堂里，但是通过“飞线”，对全分区的反“扫荡”情况仍然一清二楚，尤其是中央关于减租减息、生产、拥政爱民和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也及时接到了。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和战后建国。我在病中经常考虑的一件事，就是反“扫荡”结束之后，怎样组织领导一分区的党政军民在废墟上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贯彻执行好中央的各项政策。

在狼牙山上刚刚安稳地住了几天，我忽然接到黄寿发参谋长的电话，说敌人可能在近日内上狼牙山、九莲山、水泉山等地进行“扫荡”，“剔抉”，建议我赶快转移到五峰寨去。我考虑了一下，同意了。于是，我们怀着难分难舍的心情，告别了石海中老人。谁料，这一分手，却成了永

诀。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这位令人敬重的抗日老道了。

一条小路，在陡峭的群山中蜿蜒伸展，连结着狼牙山和五峰寨。我骑在骡子上不时感到眼前山影乱晃，有时甚至觉得那高峻的崖头正在慢慢地向后倾倒。饲养员白敬仁同志牵着骡子在前面不紧不慢地走着，卢星文和小韩同志紧跟在我的身后，离我百步左右便是曾荣昌同志领着的田双喜、徐国顺、李旺仁和刘善德等几个精明强干的警卫员。他们在执行警卫任务。一路上，我们并未遇到敌情，只是偶尔碰到个把老乡擦肩而过。

五峰寨是一座比狼牙山还高的山，那里的不老庵便是我们的目的地。以前看地形的时候，我去过。那里只有一户人家，三四间房屋，地形隐蔽，虽离敌人的金坡据点只二十来里，但在它南面的牛岗住着二十五团团部，其东面朴岗一带住着二十五团的一个侦察连，敌人是不敢轻易来的。我们曾把它戏称为“不老庵格勒”。

想不到，当我们到达不老庵时，我的爱人赵志珍带着四岁的女儿易生，碰巧也从金坡敌人的鼻子底下转移到这里来了。我们的房东是一对兄弟，哥哥叫金生，年过三十，又黑又瘦，尚未娶亲，弟弟已经娶了媳妇。这两兄弟憨厚、朴实，是地地道道的庄稼汉。他们待我们象亲人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病又发作了，卢星文同志赶紧把我安置在炕上。曾荣昌同志把随身带来的电话机架好，接

上“飞线”，与分区司令部沟通了联络。驻牛岗的二十五团也得知我来到了五峰寨。他们除了通知杜岗的侦察连注意警戒外，又将一个步兵连调到不老庵东面的一溜小山村里，以防万一。

在不老庵养了两天病，第三天我正靠在炕上吃早饭，忽然“通”的一声，门被撞开了。曾荣昌同志领着二十五团的一个侦察员冲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司令员……敌人来了！”话音刚落，便隐隐听到枪声。

“司令员，快走吧！”曾荣昌同志催促道。

我放下饭碗，问了一句：“怎么回事？”

那个侦察员说，敌人大概是嗅到了什么气味，今日凌晨从金坡据点经小径直朝这里扑来。现在，敌人已经和我们的连队交上火了。

我要曾荣昌同志立即派人上东山梁去了解一下敌情，看看二十五团的那个部队能不能顶住敌人。

枪声越响越激烈，听声音，日军掷弹筒也用上了。不一会，到东山梁看情况的田双喜同志和一位指导员跑来了。田双喜同志边跑边喊：

“司令员，快走快走！”

那位指导员跑到我跟前，催促着说：

“看样子是冲着你来的！人数不少，你赶紧走哇！”说完，他又跑回去了。

卢星文和曾荣昌他们全都催我快走，我也意识到，很

可能我们这次行动，被敌人发现了。这时，天空中传来飞机俯冲的呼啸声，不一会，东山梁上白光一闪，敌机投下的炸弹爆炸了。旁边的金生大哥也火急火燎地说：“你赶紧走吧！剩下的人，有我们呢！”

日军已经冲上东山梁，离这里只有几百米了。敌机已经开始进行第二次俯冲。

“走！”我大吼一声，也不知是哪里来的一股劲，一个箭步便扑到了门外。这时我看到，东山梁上满是头戴钢盔的日军，正朝我们这里射击，子弹啾啾地打在屋顶上，敌机扔下的炸弹也在附近“啵啵”爆炸。卢星文同志和警卫员连推带扶地把我往西山梁领，幸好我的疟疾没有发作。

我们刚登上西山梁，敌人已经从东山梁上追下来了。我们又赶紧翻过西山梁，前面是条山沟和小河，我们什么也顾不得了，过了山沟，直往河中趟。

幸好那冰冷刺骨的水不深，我们都过来了。面前又是一片开阔地，只有穿过它，才能进入对面的大山。也就在这个时候，敌人象群恶狗似的扑上了西山梁。他们凭借着有利地形，架起机枪朝我们扫射。

子弹在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我们跑得更快了。当我们一口气爬到天津沟的山头上时，才算摆脱了敌人。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情不自禁地举起望远镜朝不老庵方向望去，只见那三四间房子正在燃着大火，周围黄蜡蜡一片，全是敌人。

这天晚上，我们就隐蔽在天津沟的山梁上。

天蒙蒙亮了，曾荣昌同志找到了“飞线”的接头处，将带出来的电话机装好，与二十五团侦察连联系上了。二十五团的两个连队向我报告说，敌人已经退了，还说昨天分区其他领导同志及二十五团的领导听说我们在五峰寨遇险，都非常紧张，不知我们是安是危，正在派人寻找我们。

于是，我们从天津沟的山梁上下来，向不老庵方向走去。我在卢星文和曾荣昌同志的搀扶下，登上西山梁，往洼地里一望，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烧焦的废墟。我的心跳得更厉害了，呼吸也急促起来。下了山梁，刚拐了个弯，忽听有人大声喊道：

“杨师长，你回来啦？”

我定睛一看，惊喜地叫了声：“金生大哥！”便向他扑去。

“你们怎么样？”我迫不及待地问。

“什么事也没有！”金生大哥舒心地一笑。

原来，当敌人离不老庵几百米的时候，金生一家把我的爱人和女儿隐蔽在一个山洞之后，他们自己也很快地藏起来了。敌人到达不老庵后，见房子已经烧了，我们也跑远了，也就没有认真搜山。后来，我们终于弄清，当我们转移到五峰寨时，被敌探发现了，所以日军才派飞机掩护步兵前来奔袭不老庵。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北岳区长达三个月的反“扫荡”终于胜利结束了。这次反“扫荡”，粉碎了敌人“毁灭”

我根据地的企图，打了许多胜仗，还完成了秋收、秋耕和征收工作。但是，日本侵略军在这个历时最长的“扫荡”中的烧杀破坏是史无前例的。边区人民所受的损失，比一九四一年敌人的“扫荡”还大。反“扫荡”一结束，我就返回分区和地委机关，着手组织和领导全区军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迎接一九四四年的新任务去了。

第八章

攻势作战 日军投降

告别一分区

一九四三年反“扫荡”后，照例是各种疾病、瘟疫流行，军民生活的确很苦。不过苦的只是物质生活。如果有人以为我们成天都在愁眉苦脸地坚持抗战，那就大错特错了。无论物质条件怎样差，我们都是乐呵呵、豪情满怀地坚持工作和战斗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除了有共同的革命目标之外，军民非常团结，军政非常团结，官兵非常团结。在这一年，党中央将我们在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包括减租减息、“三三制”政权、整风运动、拥军爱民等，归纳为“十大政策”。一九四四年是我们贯彻党的“十大政策”最活跃的一年。

反“扫荡”胜利结束后，分区机关和战线剧社分散到各部队的人员陆续在慈家台集中。我与同志们重逢，觉得格外兴奋与亲切，大家在一块激动地谈论着三个月来各自

的惊险经历，一想起再也见不着的牺牲的战友时心里就难过。战线剧社创作组的同志我都熟悉，可是这回反“扫荡”后只见到了鲁易、史坦和田垒三位同志。原来，创作组的雪天同志调到一团工作后，在狼牙山被日军用刺刀挑了；鲁丁同志被俘，后在狱中因坚持绝食斗争而牺牲。剧社还牺牲了一位叫陈慕沙的同志，他是福建人，是被炮弹炸死的。

在慈家台，我们召开了军民“祝捷、控诉、复仇大会”。高鹏同志致开幕词后，我讲了话，分析了越来越有利的国内外形势，总结了分区党政军民一年来取得的成绩，控诉了日军一九四三年毁灭性“扫荡”中在我一分区犯下的种种罪行，最后号召分区全体军民在即将到来的一九四四年进一步加强团结，进行拥政爱民活动，开展大生产运动。随后，专员宋致和、分区政治部主任王建中和日本“在华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的中西同志以及“华北朝鲜独立同盟边区分盟”、“朝鲜义勇队”的代表金范俊等也都讲了话。会议一致通过《为寨坨、北城子惨案向全世界控诉日寇残忍暴行的控诉书》，并作出将此控诉书呈边区最高法院备案的决议，还作出了慰问寨坨、北城子遇难者家属和在寨坨建立烈士碑的决定。

会后，战线剧社登台演出，戏剧队队长苏友林同志表演了他现编的大鼓书：

一不说南唐，
二不说北宋，
三不说秦英征西白袍征东，
四不说登台打擂的呼延庆，
.....

单说那，反共卖国助纣为虐，
伙同日寇‘扫荡’边区的凶神恶煞庞炳勋和孙殿
英.....

苏友林同志的大鼓书说得好！战士和乡亲们在三个月的反“扫荡”中，深受日伪军之害，一个个切齿痛骂国民党反动派。但是，大家却不知道此次领着日军来进犯边区的是谁。战线剧社这么一演出，把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揭露无遗，宣传效果很好。演完戏我又走上台，表扬苏友林他们能及时地运用文艺武器，鼓舞军民团结抗日，与敌人作斗争。

春节之前，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和边区各界抗日救国会，分别公布了《晋察冀人民子弟兵拥政爱民公约》和《晋察冀人民拥军公约》。我们一分区部队，为掀起一个拥政爱民和尊干爱兵的热潮，干部学习了古田会议决议，战士学习了拥政爱民公约。通过讨论，大家结合抗战以来我们军政、军民关系的实际，进一步总结了这方面的成绩和不足之处。

的确，我们的同志在艰难的岁月里，艰苦奋斗，连续几天不吃饭，也不愿意违犯群众纪律，去老乡地里拔一个萝卜吃；有些同志为了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同敌人作斗争，流了血，甚至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最突出的例子是，我们有一个战士在战斗中由于负伤被敌人抓住，敌人押着他，想带回去审问，途经一片果园，敌人见树上的梨子长得特别大，便一窝蜂似地涌上去，大肆糟塌。一个日本士兵大口嚼着梨，看到我们这个负伤的战士嘴唇都干裂了，就丢了一个梨叫他吃。谁知我们这位战士不但不接，反而严正地说：

“八路军不侵犯群众利益，饿死渴死我也不吃这梨！”

这位战士的表现在日军中引起强烈震动。后来我们在缴获的日军内部文件中见到，他们谈到这件事时惊叹道：

“在共军方面，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对军纪的要求极为严格。”由此可见，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战士遵守群众纪律是高度自觉的。

然而，干部、战士对照“拥政爱民公约”，检查自己有哪些违犯群众纪律的行为时，也发现了不少问题。如有的同志在反“扫荡”中饿了，就跑到老乡的地里拔几个萝卜吃，也没留下钱。有的在部队宿营时借了老百姓的门板，睡到半夜部队紧急集合，来不及还，就走了。有的同志不体谅地方上的难处，家里有困难，总是埋怨村干部照顾不

够，甚至耍态度等等。为此，他们不仅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订出了克服缺点和纠正错误的方法。分区也相应地建立了检查组，分别到各部队驻地，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执行情况。发现问题，立即通知该单位负责人，把当事人带去，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为了不留死角，分区检查组还派人到封锁沟外，检查秘密工作人员的群众纪律。

在我们一分区，曾经出过这样的事：

我们有个连队驻在一个村子里，有位年轻姑娘爱上了连队一位姓黄的指导员。当时由于部队有规定，连级干部不准谈恋爱。所以这个指导员总躲着她。妇救会主任怕这个姑娘破坏部队的纪律，便召集全村妇女开会。正当妇救会主任斥责她，逼她作检讨，要她宣布不再与那个指导员来往时，她居然大步走上台，脸不红，心不跳，理直气壮地说：

“我是个清白的女孩子，黄同志是八路军，是指导员，我不爱八路军爱谁？咱们妇救会不是宣传婚姻自主吗？我就喜欢黄指导员，他好！是我追他，又不是你追他，关你什么事？！”

台下哄堂大笑，妇救会主任面红耳赤。姑娘说完，一转身走了，会没开完也就散了。

后来他们把这事反映到我这里，我说：

“谁叫开这个会的？不妥嘛，闹不好要出事的！当然，

妇救会主任的出发点是好的，要肯定。问题是方法简单了些，还是应该个别做思想工作。对那位姑娘也不要有片面的看法。作为一个根据地的姑娘，爱上了我们八路军的一员，这并不是坏事，这说明我们的干部、战士确实有许多可爱之处，也说明人民群众对我们八路军有着一片深情嘛！但是，要耐心地说服这位姑娘，讲清楚部队的规定是为了我们担负起繁重的战斗任务，为了抗战的最后胜利。至于那位指导员，你们也应该找他谈一谈，正确对待和处理好这件事。”

由于工作做得通情达理，后来，这位姑娘把爱深深埋在心底，积极参加支前工作，我们这位姓黄的同志为人民英勇战斗，直至担任了团政委，他俩才结婚。不幸的是，婚后不久，黄政委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了。

春节快到了，部队按照惯例，帮助驻地群众贴对联、剪窗花、垫猪圈、清烟囱、打扫场院、挑水，做到了家家户户缸满院净。村干部组织妇女和儿童给抗属送粮、扫院烧灶、推磨，给部队伤病员拆洗被褥、衣服等。

除夕，机关和部队分别请来县、区、乡干部开座谈会，征求他们对部队的意见，听取他们的批评，请他们一道陪抗属会餐。

大年初一，我们早早起来，准备去向慈家台的父老们拜年，儿童团员们却抢先打着霸王鞭，涌进我们屋来祝贺新春佳节了。

不一会，村子里响起热烈的锣鼓声，部队各级领导开始给抗属、房东和村干部拜年，地方政府人员带着秧歌队给部队和军属拜年，全村一片欢腾。

春节刚过，按照中央和分局、军区的指示，我们进行整风，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我为委员会主任。这时，地委和分区联合开办了一个整风训练班，组成一个党支部，由我兼任党支部书记。这个班的具体负责人是分区宣传科长彭彭。我们在整风中强调以自我教育为主，互相帮助，进行思想分析。参加学习的同志，人人心情舒畅，思想水平都有所提高。个人写的材料我都看过，有些同志向党交待了隐瞒多年的历史问题，感到有说不出的轻松愉快。

这次办整风训练班，除了部队的同志以外，还调了许多在地方基层工作的同志。其中许多人是我这个地委书记在读地方报告或听汇报时早就熟悉了他们的名字而未见其人的，有些是我久仰的对象。他们有的是名扬一区，有的是誉满一县，也有全国闻名的。比如徐水的张瑞同志，他就是以办合作社扬名全国的。还有在我们边区也数得着的老党员白殿章同志，阜平人，他在一九三〇年左右就到上海地下党受过训，至今还在基层担任区委书记，他从整风训练班毕业不久就牺牲在察南了。有些是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新秀，那时得以“小”字相称，名字反而记不得

了。

这次整风训练班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但是也有的同志给自己乱扣“帽子”，说有这个“主义”那个“残余”，还有的说自己参加过国民党外围组织，实际上一了解，不是那么回事，我就告诉他们不要这样，而应当一是一，二是二，材料按规定是要装档案的，不合适的地方，拿回去改。如妇女干部、龙华县县议员崔月英同志在检讨材料上，给自己扣了顶“命令主义”的帽子，叫人百思不解。一问，原来，她觉得自己实在没什么大的问题可检查，想来想去，忽然想到指挥妇女们抬担架中，命令来命令去，不正是“命令主义”吗？我对她说：

“小崔，你为了抗战，做了你应该做的工作，这是很好的，不是什么命令主义，你写的这一段，划掉吧。”

崔月英同志高兴得笑了。就这样，在整风中，我们端正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克服了主观主义，加强了党性，教育和保护了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干部。

就在二月间，晋察冀军区奉总部命令，调出六个团到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光荣任务。总部指名要调我们分区的一团。

一团是我们分区的主力，是个老红军团队，能征善战，立过许多战功。现在，这个团要去执行光荣而又重要的任务，我和分区的同志们感到既高兴又有些舍不得。考虑到延安生活艰苦，他们要执行繁重的战斗任务，还要参加大

生产运动，我们不仅给他们配足了武器弹药，而且多给他们配备了一些牲口和其他物资。他们走的那天早晨，我们分区的几位领导同志还专门从慈家台赶到一团驻地刘家台，为他们送行。

春寒料峭，部队静静地集中在刘家台的河滩上。一团长邱蔚激动地扯着嗓子，向全团喊道：

“同志们，我们就要奔赴延安了，分区首长特地赶来送行。现在，请司令员给我们讲话。”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我对一团的同志们说：

“同志们，你们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你们是代表我们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我们全分区军民感激你们，相信你们一定能胜利完成任务！你们虽然走了，但是一分区的军民将会永远记住你们的，希望你们保持和发扬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

战士们激昂地呼起了口号：

“决不辜负分区首长和同志们的期望！”

“发扬红军光荣传统！”

“坚决完成战斗任务！”

……

部队要出发了，邱蔚同志噙着眼泪，依依不舍地拉着我的手，哽咽地说：

“司令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听到你……给我们下达战斗命令……”

我的眼睛热辣辣的。多年来，我和邱蔚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从感情上来说，真舍不得让他们走啊。我拍了拍邱蔚同志的肩膀，说：

“你们一路多保重，等到胜利的那天，我们再相见！”

“嗯！”邱蔚同志昂起头，庄重的敬了个军礼，便转身率领队伍出发了。

“司令员，再见！”

“再见了，司令员！”

战士们背着背包，扛着枪向我们道别，我们目送着他们，一直到队伍越来越远，消失在山背后。

一团走后，我们考虑到岭东方向部队少，慈家台离敌人和交通要道都比较近，就将分区司令部转移到了小兰村，小兰村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是我们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好地方。不料，到小兰村不几天，日军的飞机就来了，又轰炸又扫射，幸好我们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敌机飞走后，徐信同志带着警卫连的战士们爬上村边最高的一个山头，在上面挖了许多对空射击掩体，架上歪把子机枪，日夜警戒着。说来也怪，从那天以后，敌机再也不来了。

我们在小兰村住下后，一方面抓对敌斗争，一方面搞大生产，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没想到，八月初，我却接到了调离一分区的命令。命令说：

中央来电决定，恢复冀中军区、冀中区党委和冀中行署。杨成武同志调冀中军区任司令员，林铁同志任政治委员兼区党委书记，罗玉川同志任行署主任。赋予的任务是：恢复、巩固和发展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积极准备战略大反攻。

这是在中央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由分局领导同志宣布的。

我一阵激动和兴奋，不禁回忆起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间，中央曾命令我到冀中三纵队当政委，那时三纵队的司令员是吕正操同志。不曾想我正准备出发，中央和军区又来了电报，说：为了更好地巩固已经开辟的察南、雁北、平西和保定以西的冀西山区抗日根据地，杨成武暂时不动。眼下六年过去了！晋察冀边区分为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四个区，中央再次决定我到冀中，这说明我们的力量壮大了！抗日战争出现了新的局面，胜利在望了！

我知道，任务是繁重的，冀中的斗争是复杂的，尽管人生地不熟，但有八百二十万冀中军民做靠山，是能够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

可是，一想起我就要离开战斗了多年的一分区，就要同一分区军民分别时，心里就难受。在雁北、察南、平西、冀西，长城内外的恒山、小五台山、狼牙山、百花山、白石岭、五峰寨、易水河、拒马河、桑干河……都有我的足迹。一分区的乡亲们待我亲如兄弟。我们的部队从

一个独立团发展为一个独立师的六七个团和许多游击支队、县大队、区小队，变化多大啊！特别是部队涌现了那么多威震敌胆的英雄！这一切，都与一分区军民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与上级的正确领导分不开，也都使我更加留连。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这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和牺牲的战友以及继续战斗着的同志们。

重建的冀中军区机关由李志民同志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沙克同志担任参谋长，黄寿发同志任副参谋长，王奇才同志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长，梁玉正同志任后勤部长，顾正均同志任卫生部长^②，王恩厚同志任卫生部副部长。晋察冀军区首长要我尽快移交好一分区的工作，极早奔赴冀中。高干会议一结束，我就立即离开阜平，带着两个警卫员以及从一分区文印股借到高干会议刻蜡板的赵宝华同志，急如星火地返回了一分区。

“司令员要调走了！”

我一回来，这个消息就象风一样，吹遍了分区和地委。跑来看我的干部、战士特别多，有含着眼泪叙说离情别意的，有恳切要求跟我到冀中去的。那些天，我睡得很少，交待工作，找人谈话，忙得不可开交。我还把一些家在冀中的同志的家庭地址记下了，准备将来有机会去看望他们的父母兄弟。五万分之一的冀中地图挂在房间的墙壁上，

① 因独立第一师先成立，一分区后成立。故前后称呼不一。

② 后来卫生部长由游胜华同志接替。

我看了又看，整整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这才从地图上初步熟悉了冀中的地形。

新的分区和地委领导人的名单公布了：肖应棠同志接任分区司令员，杨士杰同志接任地委书记兼政委，马辉同志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龙道权同志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考虑到重建冀中军区的需要，根据上级指示，原一分区一些分区、团和营的干部除一部分到冀东军区外，其他同志随我到冀中去工作。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的确，这些同志后来起了很好的作用。

离我动身的日期越来越近了。这些天，高鹏副司令员跟我更是形影不离。我离开一分区之后，他也要到分局党校学习去了。他感慨地对我说：

“光阴似箭，我们已经共处六年啦！”

我深有感触地点了点头，与他一起回忆了许多往事。高鹏同志摘下眼镜，掏出手绢轻轻地擦拭着镜片，深情地说：

“参加革命前，我对八路军不了解，还以为和其他军队没有什么区别呢！后来当我自己也成了这支队伍中的一员，我才逐渐体会到，这是一支了不起的队伍，不愧是正义之师啊！……我这人毛病很多，你都知道，可是，组织上依然器重我，对我倍加爱护，同时也严肃地给我提出注意事项。我深深地感激你们。我不想当着你的面说多少好话，但是，你要走了，有一句话我不能不说：要不

是聂司令员让你带着我，那么，我这辈子怎么样，很难讲。”

说到这里，他竟落下泪来。他那副刚擦拭好戴上去的眼镜，又被眼泪打湿了。

我也动了感情，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

“老高，多保重！”

这天，我和新任分区司令员肖应棠漫步在小兰村外的一条土路上，边走边谈，已经很长时间了，可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肖应棠同志原是我们红一师的参谋，一分区成立后，他在部队当营长，后来又在新三团当副团长。这回，他是由团长直接提拔起来当司令员的。记得在塘湖战斗中，他打得性起，离开指挥位置，端起机枪跑到前头跟敌人干开了，结果负了伤。事后，我批评了他：

“肖应棠，谁叫你随便离开指挥位置的？勇敢是好的，身先士卒，也是应该的。但是，塘湖战斗还没有发展到非要你营长亲自去拼杀不可的程度。你说，是当一个营长的作用大呢？还是当一名机枪射手的作用大呢？”

肖应棠同志痛痛快快地认了错。这以后，他很注意研究战术，当团长后，指挥部队打过不少漂亮仗。如今，他征求我的意见，让我谈谈今后分区的工作应该怎么抓，有什么经验。我则毫无保留地把这些年来工作上的体会和教训告诉了他，谈了今后工作的设想，还对他说了不少鼓励和充满期望的话。肖应棠同志用深邃而又坚毅的目光望着

我，说：

“司令员，我一定尽全力完成好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肖应棠同志走后，我踏着月色，来到马厩里，牵出那匹心爱的大白马——它，还是宋学飞同志送给我的哩。这些年来，无论行军，还是作战，它都伴随着我，确实给我带来了许多方便。可我到冀中去，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不能带它呀！算是最后一次遛马吧，我牵着它慢慢地走啊走，在村外一条水溪旁停住了。这时，警卫员和饲养员走了过来，轻声地说：

“司令员，天有些凉，回去吧。”

“好。”我说，“明天，你们拿上我的津贴费，给马买点好吃的。”

欢送大会在村边树林里召开。新任宣传科长钱丹辉在会上致词。我接着讲了话，感谢一分区党政军民多年来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希望到了冀中后，能时常听到这里的捷报。最后，我说：

“战友们，同志们！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将在平原上与你们并肩作战，让我们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努力吧！”

热烈的掌声，惊得树林里的鸟直飞。

告别的时刻到了，来送行的人真多啊！分区、地委的领导同志和干部们，驻小兰村一带部队的指战员，小兰村

和附近村庄的乡亲，夹道欢送我们。很多人淌着泪，和我们握手，说知心话。我与黄寿发、王道邦、杜文达、张如三、宫呈祥、张英辉、徐信、李德才、魏巍、周自为、陈子端、阎佐三、张行忠、马青山、沙宝朗、翟林、刘广信等同志离开小兰村，首先赶到慈家台，经过数日的准备，便向冀中挺进。

东 进 冀 中

东进，东进！我们这支全部换上便衣、肩负特殊使命的队伍，迎着飞舞的雪花，走下山岗，准备乘敌人到管头“扫荡”、山外空虚之机，跳过封锁沟，穿越平汉路，奔向敌后的敌后——冀中大平原。

铁流两万五千里，
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
苦斗十年，
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一旦强虏寇边疆，
慷慨悲歌奔战场……

这首雄浑豪壮的《八路军军歌》，正好道出了我此时的心境。置身于挺进冀中的行列中，我不禁在心里轻轻地哼

唱起它来。

我们是昨天——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离开慈家台的。为在慈家台等待过路的有利时机，一直等了一个多月。这期间，我曾到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请示汇报了工作。程子华、刘澜涛等领导同志与我谈了冀中军事斗争的指导问题，整风与审查干部问题，保卫工作问题，领导方法问题以及配备干部的问题。

战斗中的生离死别固然常见，可是意外的重逢却也时常有之。在慈家台，我竟与在红四团和红一师时一起工作的老战友耿飏同志重逢了。

我们俩的惊喜与激动是难以形容的。自陕北分手后，我们已经八年没有见面了。这回，他从延安来，担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正巧来到慈家台。我们促膝倾谈，激动地回顾了我们率领红四团血战湘江、突破乌江和红一师东征、“红大”学习所结下的深厚战斗友谊，又叙说了八年来各自的经历，甚为感概。当谈到这次我到冀中去的主要任务是和冀中广大群众并肩战斗，恢复、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时，他深情地说：

“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啊！”

接着，我们谈起了前不久，在收复河南夏邑八里庄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的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同志，两人都沉浸在深深的哀痛中。是啊，彭雪枫同志领兵驰骋在抗日疆场上，无数次地重创日伪军，敌人对他胆战心惊！我还

清楚地记得：红军在哈达铺改编后，我们的一连长——强渡乌江、突破天险腊子口的英雄毛振华，在河连湾攻打敌人的土围子中弹牺牲，担任二纵队司令员的彭雪枫同志特地赶到烈士墓前脱帽致哀。当我向彭司令员报告毛振华连长的牺牲经过时，他的沉痛之情溢于言表。

在“红大”，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工作，过着紧张而又愉快的生活。在同彭雪枫同志的接触中，我深深感到他和蔼可亲，才华出众，不愧是我党的一位优秀军事家。没想到，现在他竟离开了我们！

“烈士未竟的事业，靠我们以加倍的工作和战斗去完成！”耿飚同志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小兰村去了，这是他的临别赠言。

关于冀中的情况，上级向我介绍过。这块平原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开创与冀中地方党的武装斗争以及吕正操同志领导的人民自卫军的北上是分不开的。长期以来，吕正操、程子华、黄敬等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领导同志，在冀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九三九年，贺龙、关向应同志率一二〇师主力到达冀中河间，又打了胜仗，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冀中根据地。

如今冀中平原地广粮丰，人力雄厚，文化较发达，群众觉悟高。它和冀西互为依托。对此，早在“五一反扫荡”前，我就深有感受。那时，我们在冀西，吃的粮食和身上穿的布都是从冀中背过来的，兵源也主要靠冀中来补充。

我们一分区的部队和冀中部队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情同手足。他们反“扫荡”或者整训，也经常转移到我们这里来。记得聂司令员视察一分区时，冀中的二十七团、二十九团正好在易县整训。我特地请他们营以上的干部去见聂司令员。在北娄山柿子林大操场上，聂司令员站在土台上接见了他们。接见之后，我们还请这两个团的干部吃了一餐饭，吃的是馒头和粉条、豆腐、猪肉。我看他们吃得挺有滋味，心里舒服极了，因为我知道，当时冀中遭灾，部队生活也较困难。

冀中，即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沧州之间，是日伪统治华北的腹心地带。如果敌人不能控制这个地区，它占领的平、津、保、石、沧等大中城市都会不得安宁，更谈不上侵占冀西和其它地区了。由于冀中周围有平汉、平津、津浦、德石四条铁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对敌人的交通命脉构成致命的威胁，而且敌人要想确保华北占领区也是不可能的。日伪因而在华北驻屯了庞大的武装力量，从一九三八年不断调集重兵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围攻、“扫荡”、分割、封锁、“蚕食”，而冀中平原则成为“扫荡”的重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急欲变华北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企图首先确保冀中，于是派冈村宁茨纠集了五万多兵力，从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起对冀中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敌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

光”政策使冀中部队和人民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此后，冀中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敌人为了达到其总的战略目的，进一步强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位一体的“总力战”，极力采取点、线、沟、墙相结合的堡垒政策，在冀中八千多个城镇、六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了一千七百多个据点，修筑了七千五百多公里的公路，挖了四千多公里封锁沟。据点周围碉堡成群，铁路、公路沿线岗楼密布，点、碉、路、沟互相连接，密如蛛网，把我冀中根据地分割为二千多块，每一块都置于严密火网封锁之下，然后逐区逐块进行清剿、“剔抉”。此外，还村村建立伪政权，加强特务组织，扩编伪军，大肆掠夺，实行奴化教育。从而，冀中平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冒狼烟”的恐怖世界。

冀中军民经历了千辛万苦创立的冀中平原根据地基本上变质了，但是冀中军民并没有在腥风血雨中屈服，他们改变了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经过一九四三年以来的积极斗争又部分地恢复，重新建立了隐蔽根据地，至今仍在为坚持平原抗日根据地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可是就在敌人“五一大扫荡”中，八分区的司令员常德善和政委王远音同志英勇牺牲了。

在敌人极其疯狂的“扫荡”下，我冀中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转移到了山区，只留下少数部队，依靠广大群众坚持冀中平原的抗日战争。他们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

终于奇迹般地坚持下来了。多么可敬的战友，多么可敬的人民！我为自己能挺进冀中，与他们并肩进行新的战斗而感到自豪！

昨天早晨，我们乘夜袭管头的敌人返回刘家台之机，即换上便衣，经高士庄向岭西走去。遍地大雪，白得耀眼，沿途群众远远地望见我们，以为是敌人的便衣队，便乱放信号，骇然大跑。待我们走到西沟底时，这一带的村庄早已空无一人，所有的食物也都坚壁了。我们想了解一下封锁沟外的情况，也找不到人，只好苦笑着离去。

今天上午，我们因沟外情况不明，不敢贸然行动。午后两点钟，我们才离开西沟底，继续向东走去。黄昏时，满天流霞，给皑皑白雪镀上了一层绚丽的色彩。我们无心赏景，只是一意赶路，行至岭西、北台鱼附近，忽然一阵清脆的枪声响起，撕破了黄昏时的宁静，负责护送我们的三团的同志气喘吁吁地跑来说：

“司令员，有敌情！”

情况紧急，如与“扫荡”的敌人遭遇，势必有一场血战。我们不能与之纠缠，必须尽快甩掉他们。

于是，我决定立即改变路线，绕道而行。在急行军中，夜色不知不觉地落入山谷，把我们保护起来了。我们连夜急行了一百多里路，到了马家庄，这才歇了脚。这个村的村长是我们“两面政权”中的地下党员，他特地叫人烙了饼，炖了猪肉来招待我们。这可是难得的佳肴哟！同志们

都很感激。村长笑咪咪地说：

“吃好，吃饱，过封锁沟时才有劲呀！”

我脱下那双刚穿两天的布鞋，一看，天！两只脚起了六个泡，有四个脚指甲已经变成黑色的了。不看则罢，一看，痛得钻心。

夜深了，我掏出日记本子，记下白天行军的情况，写罢，把笔一扔，就睡着了。

天刚蒙蒙亮，我们继续前进。为了避免敌人把我们一网打尽，我与林铁、李志民等同志分头行动。林铁同志的爱人弓彤轩同志和我们一起过路。

这天下午，向导——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汉子领着我们前进。我们要通过的是满城县山地和平原交界的封锁线。满城县在一分区范围内，这里紧挨保定，情况复杂，但是我们的情报工作却做得很好。走了一段路，忽然，前面村庄响起了一阵狗叫声。

“不好！可能有敌人！”向导说罢，领着我们东拐西拐，来到了一座尼姑庵前。我抬头一看，那油漆斑驳脱落的庵门上方，隐约可见“月峰庵”三字。

“烧香哎，还愿罗——”

向导低低地叫了一声，轻轻地敲敲庵门，庵门开了一道缝，露出一双明净的眼睛，探询地望着向导，也把我们打量了一番。

“慧如，他们都是自己人。”向导轻声说。

那位尼姑赶紧把连着门框和庵门的铁链子取下来，打开庵门。我们便一个个飞快地闪身进去。随即，她走出门外，察看了一番，才返身关了门。她似乎还不放心，又唤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尼姑，贴着门缝“望风”。接着，她又搬来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方凳，贴在院墙根下。我的警卫员马上就明白了她的意思，于是主动站上去，将脑袋微探出墙头，观察四周动静，执行着警戒任务。

向导告诉我，月峰庵是我们的一个地下交通站，慧如是个共产党员，为了抗日，削发为尼的。

我惊喜而又敬佩地打量着这位穿着出家人衣袍，忙着我们沏茶的慧如，不禁感慨万千，为我们党有这样的抗日女战士而自豪。我不由地又想起了棋盘坨的李老道，想起了老君堂的石海中……他们虽不是共产党人，仅仅是一些“看破红尘”的出家人，却又都是不甘当亡国奴的爱国者，连出家人都如此舍命抗敌，何愁贼寇不灭？！

庵外村庄里的狗早已不叫了，可是情况不明，我们不能贸然出去，又不便在庵内久留。怎么办呢？我正思索着，却见慧如把向导叫到一旁，轻轻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和另外一个尼姑戴着白帽罩，挎着篮子，打开庵门出去了。向导这才告诉我，慧如是他的表姐，来月峰庵已多年了，现在是这个庵的师父。长期以来，她以化斋为名，为我们八路军搜集情报，现在到村里为我们探听虚实去了。

我一听，很受感动，也真为慧如她们捏着一把汗，万

一慧如她们出点什么事可怎么办呢？

过了一阵子，那个陪慧如一起去的尼姑回来了。她说：眼下村子里还不太安全，刚才来了几个汉奸找“两面村长”派粮派款，折腾一阵子，走了。现在慧如师父正在路口上等着，打算掩护我们通过这一带村庄。

恭敬不如从命。我们便远远地跟在两位尼姑后头前进了。一路上，这两位尼姑犹如我们的尖兵，冒着风险为我们开道，凡有情况都及时地用暗号通知我们。我们在她俩的带领下，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穿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终于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

临别时，她俩闪在路旁，低垂眼皮，虔诚地双手合十。我们也都装作不认识，不敢交谈，更不敢逗留，只是擦身而过。在这一刹那，我瞅了她俩一眼，只觉得她俩向神佛顶礼膜拜的无声动作胜似千言万语，可不，那就是在向我们招手告别，那就是在为我们祝福啊！

夜，寒星闪烁，冷风刺骨。我们排成一字队形，准备通过敌人沿着平汉铁路设置的那条极难逾越的重点封锁线。

这条封锁线上不仅有日军的装甲车来回巡逻，而且在铁路两侧分别筑有又高又厚的封锁墙，墙上有碉堡，墙外又都有一道又深又宽的封锁沟，沟边还敷设有地雷。听说，敌人凡是抓住过沟的人，轻则关押拷打，重则砍头开膛，

弃尸沟旁，目的是给偷越封锁沟的人看，杀一儆百，切断冀中和冀西的联系。

敌人的封锁沟，对我们形成了一道障碍，使我们的活动极为不便。对此，我们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四二年以来，我们在军区统一组织下，曾经搞过多次声势浩大的“破交战”。当时，仅在易县到满城这条线上，每晚在主力部队、县大队和游击队掩护下参加“破交”的老百姓就多达七八万人，不但打下了一些碉堡，捣毁了一些封锁墙，填了一些封锁沟，还使一些铁轨翻了身。

过沟前，我们把应付各种情况的办法都研究好了。大家很快穿过了一片坟地和敌人的雷区，趴在陞阳驿附近的一条封锁沟旁。

我们趴在那里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护送我们的部队和武工队才向我报告说：这一带现在没有异常情况，可以过沟了，只是要大家注意别发出响声，以免惊动碉堡里的敌哨兵。

我们通过的这段封锁沟和封锁墙，正好在敌人两个大碉堡之间。抬头望去，只见犹如两头黑色巨兽的碉堡，阴森森地蹲在距我们不远的地方，好象随时准备扑过来似的。战士和武工队员们把一支支枪口都对准那两座魔鬼盘踞的堡垒。只要敌人稍稍一动，一颗颗子弹就会划破夜空，飞进那怪兽的眼睛里。

穿过又深又宽的封锁沟和高高的封锁墙，正要跨过铁

路，远处忽然响起了敌人装甲车的声音，一道明亮刺眼的探照灯光，在前方拐弯处出现了，它劈开了夜幕，在铁路沿线晃来晃去。

我们立即又卧倒在地。这时，护送我们的同志虽没过沟，但他们比我们更紧张，一下子就展开了队形，散伏在各个坟堆后面，准备与敌激战。

装甲车轰隆轰隆地嗥叫着开了过来，贼亮贼亮的探照灯东摇西晃地照着，敌人离我们越来越近，我和同志们都攥紧了手中的枪。

敌人的装甲车顺着铁轨开到我们跟前，车身一顿，停了下来。

怎么，发现我们啦？可为什么不开枪，只把探照灯四下里照着？我们清楚地听到装甲车上的鬼子叽哩咕噜的说话声了。大家都明白，现在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过了铁路，那边同样还有一道高墙和封锁沟，沟外还埋有地雷，硬冲，是冲不过去的，退吗，也不行。

看样子，非拼不可了！护送和接应我们的同志们就分别卧在铁路的两边，只要装甲车上敌人的枪一响，马上就会有多几倍的子弹回敬他们。

说来也怪，敌人的装甲车停了几分钟，便开走了。看来，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

午夜时分，我们胜利地穿过了平汉路，与接到电报前来接应的清苑支队会合了。我们连夜渡过唐河，绕过高阳

敌据点，来到高阳与旧城之间的一个村子里。

天亮了。我放眼一看，平平坦坦、一望无边的冀中大平原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冀西，我们有大山作屏障，有秘洞藏身，敌人来了，可以不慌不忙地与之周旋。要么开上几枪，放倒他几个，要么就在沟谷里伏兵千百，派出个“狼诱子”，把敌人引进“口袋”里，一网打尽。可眼前大平原一望千里，无险可据，敌人有坦克和汽车，有东洋大马，有汉奸自行车队，还有那可以掠过屋顶树梢、根本用不着担心撞山的飞机……我们将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我奔赴冀中之前，曾反复分析过冀中的形势。我想，有党中央、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抗的战争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有久经考验的冀中人民，只要把冀中军区、冀中区党委、冀中行署重新组建起来，利用青纱帐，利用各种地道，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用不着再过多久，日本侵略者就得乖乖地从这块大平原上夹起尾巴滚蛋！

想到这里，一种豪壮之感溢满心头，我再望望面前的冀中大平原，只觉得她莽莽苍苍，异常开阔。

“司令员，上车吧！”化装成车把式的九分区的同志笑呵呵地对我说。

“坐牛车？”我觉得又新鲜又好笑。大概是平时骑惯了

快马，只觉得乘坐这慢吞吞的牛车多急人呀！可是，我的脚已经走坏了，不坐也不行。再说，我们这是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活动，牛车是冀中平原上一种普遍的交通工具，从“入乡随俗”这点来讲，还是该坐的。我头上包着白毛巾，身上穿着紫花布褂子，完全是一副冀中老乡打扮了。

我和去冀中军区当作战科副科长的周自为，作战参谋阎佐三、警卫员李旺仁、勤务员小韩坐上了牛车。赶车的同志拿着根光秃秃的柳条往牛背上轻轻一抽，牛便缓缓走动了。担任警卫任务的战士们在我们附近步行着，他们全化装成出远门的冀中老百姓了。

牛车走得很慢，我们每天只能前进三四十里。有时候早饭后出发，有时候黄昏才动身，视情况而定。当年正好三十岁的我，就是这样穿着土布褂子，坐着牛车，警惕着随时可能出现的敌人，去当冀中军区司令的。这是我历年来任职中，别开生面的一次。

初到白洋淀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日傍晚，我们乘坐牛车到达白洋淀附近，又走了几十里的薄冰才走到白洋淀堤上的小刘庄村。

夜来天寒，我躺在庄户人家的炕上，听得一阵阵声响，以为是白洋淀的浪涛声。一问，方知淀里大部分水面皆已

结冰，那响声，是风的呼啸和风击冰面引起冰块相撞的破裂声。我久久不能入睡，总觉得这轰鸣之声动人心魄，令人振奋。

早在一分区时，我就经常听家在冀中的同志说，白洋淀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春天，红嫩嫩的苇芽从一簇簇枯萎的芦苇棵里钻出来，无边无垠的淀水泛起一层层淡绿色的涟漪，人们捕鱼，挟罟、放鹰，满淀是如梭的船只和悠扬的渔歌；夏日，茫茫水淀成了荷叶的世界，荷花一开，叫人看得心醉；深秋，白雪般的苇絮四处飞飘，人们或是割苇织席，或是架着排子船在淀里猎取大雁、野鸭和野鹅；到了寒冬，整个白洋淀全给冰冻住了，人们划着冰床子^①，载着劳动果实，飞掠过水晶般的冰面，去赶集、探亲、访友。

自从一九三八年以来，日军在白洋淀畔的赵北口、同口等大村镇安上了据点，特别是“五一大扫荡”后，敌人的汽艇在淀上横冲直撞，烧杀掳掠，这片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就成了人间地狱。

群众靠挖“地梨”，捞水草充饥度日。他们纷纷奋起与敌抗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利用水淀的有利地形，开展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光是一九四三年的上半年，白洋淀一带的抗日军民就端掉了敌人三十多个岗楼和据点。

① 一种用木板和刀片做成的冰上交通工具，可载数人。

曾经凶暴一时的日伪军，眼下也只好缩在几个大据点里。白洋淀的群众，如今又可以比较自由地在淀里打鱼捞虾，采菱割苇了。敌人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也在作垂死挣扎。他们一方面竭尽全力保住已占领的地盘，一方面经常不断地向我游击区的抗日军民进行奔袭合击，反复“清剿”。

白洋淀上敌我斗争，仍然十分激烈，十分残酷。我们这次来，要重新组建冀中军区，组建冀中区党委，组建冀中行署，任务艰巨。想到这里，我更是难以入眠。

次日，我们直奔九分区司令部。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脚下全是冰。原来这是堤南的一条水道，全给冻住了。我感到惊讶的是，脚下的冰并不是白色的，而是淡绿色的，尤其是在冰块下，淡绿色的淀水和嬉游的鱼虾竟隐约可见！

一路上，我们战战兢兢，生怕把冰踩破，掉下去。向导象是看出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

“塌是塌不下去的，只是得小心，别滑倒喽！”

“唉哟！”女同志弓彤轩忽然叫了一声，只见她手扶着肚子，摔倒在冰上，半天没爬起来。弓彤轩已怀孕几个月了。可是她为了抗日，为了打开冀中工作的新局面，什么也不顾，一再要求和我们一起东进冀中。一路上，她劳累已极，现在又重重地摔了一跤，真叫人担心。等我赶过去，她已经被同志们扶起来了。

“小弓，怎么样？”我关切地问。

弓彤轩倔强地扬起头，绯红着脸回答：

“还好，我能走！”

我关照她走的时候留神，同时又找了两个同志照顾她。

在冰上，我们走了五里多路之后，就离开冰路，踏上堤岸了。听说，这堤是由大沙河、潞龙河、拒马河、唐河经白洋淀、大清河，一直通向天津的一条长堤，老乡们叫它为千里堤。

我们的向导，是雁翎队的一位老队员。他手指着茫茫大淀，给我们讲起了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一位撑船的老大爷，在一个夏日炎炎的正午，撑着小船，剥着清香的莲蓬，把几个正在洗澡的日本兵引到了布放鱼钩子的水域。忽然，一个个日本兵杀猪般地惨叫起来，原来他们被鱼钩子勾住了。老大爷笑眯眯地举起竹篙，狠狠地砸着敌人的脑袋，砸一下，骂一声，就象敲打木鱼一样，一会就把那几个家伙敲掉了。

也就在这年的冬天，有个叫水娃的孩子，在一个大雾天里，被迫撑着冰床子送一个汉奸和两个日本兵去敌人据点。途中，水娃隐约望见前面有个冰窟窿，便对准它使劲猛划，快靠近时，他突然从冰床上往下一跳，那三个敌人连同冰床子噗通一声，就掉进冰窟窿喂了鱼虾。

向导接着又介绍说，白洋淀、大清河是保定至天津的水上交通线，敌人掠夺粮食和物资，大都经过这条水路运往天津。夏日里，雁翎队的队员们驾着捕鱼的鹰排子，人

人头顶一片大荷叶，埋伏在荷花淀里，等敌船一驶近，几十副“大抬杠”^①便突然吼叫起来，刹时火光映红淀水，霰弹暴雨般倾泻到敌船上，打得敌人满身窟窿，直往水里栽。当敌人汽艇赶来时，雁翎队的队员们早已把“大抬杠”沉入水底，头戴荷叶，背着步枪游向荷塘深处了。

白洋淀上游击战的故事，我们听了既感到新鲜又感到激动。

顺着千里堤朝前走，只见破旧的民房一间接一间，挤得象蜂巢，路窄处人只能侧身而过。家家院落里，扔着破鱼网，堆着鱼篮和虾篓。有的院落里，还专设有碾苇和编席的棚架，可惜我们忙着赶路，不可能细看。

“歇歇腿，喝口水吧！”向导说，“这个堤上村庄有二十多里长哩！”

我们也觉得有点累了，便停下脚步，歇了一会。

九分区司令员魏洪亮和政委兼地委书记陈鹏、参谋长李健、政治部主任刘光裕等同志听说我们到了，十分高兴，连忙出来迎接。魏洪亮一把握住我的手，说：

“司令员，你们来得正是时候啊！”

魏洪亮曾在红一师工作过。他请我们吃冀中的酥面饼、大米粥、沾酱大葱和白洋淀的鲜鱼。大家高兴极了，说说

①：即大型猎鸭枪。

笑笑地吃着饭菜，好奇地问这问那，全然忘记了行军的疲劳。到这里来担任九分区政委的王道邦，一来就变成了主人，笑着为我们夹菜，显得特别轻松愉快。只是小弓同志因为在冰上摔了那一跤，流产了。我们紧接着又去看望了她。

由于重建的冀中军区司令部一时没找到合适的驻地，我便决定与九分区司令部暂住一起，利用他们的通信工具指挥整个冀中区的武装斗争。我打算先了解情况，看看地形，等林铁、罗玉川、金城、李志民等同志到齐后，再与他们一起研究如何开展敌后斗争，打开新局面的问题。

当晚，我和九分区的领导同志开了个会，先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对恢复、巩固和发展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有关指示，然后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

呼呼的大北风连续刮了好几天，一出房子，就冻得面红耳赤，要是忘了戴手套，那手就象挨鞭子抽似的痛。我们几个南方人，一时不太适应，可又忍不住要跑到室外去看看。堤南的冰已经结得很厚了，孩子们就象花喜鹊似的飞到这里滑冰，撑冰床子。还有些乡亲冒着严寒在冰上捕鱼，他们在冰上凿了个大窟窿，然后放下鱼网，不一会就拉上来数十尾活蹦乱跳的大鲤鱼。我是头一回见，感到新鲜极了。

十二月十二日，我们在九分区司令员魏洪亮和分区宣传科长王功学等同志陪同下，头戴毡帽，身穿紫花布袄，

腰间插把手枪，分乘几个冰床子，到白洋淀看地形。撑冰床子的同志都是雁翎队的队员。他们待我们坐好，便象青蛙跳上荷叶一样，轻盈地分别跳上各个冰床子，再用冰钎子朝冰面上一点，冰床子就象离弦的箭，飞射出去，晨雾慢慢飘散，冰床子犁起的冰屑，象一串盛开的白花，在后面铺散开来。

“加油！加油！”

雁翎队员们见晨雾散尽，太阳升起，便吆喝着搞起竞赛来了。冰床子在金光闪闪的冰面上疾驰如飞，我们几个头一回坐冰床子的南方人又紧张，又新奇，又爽快，几乎忘记脚已被冻得又痠又麻了。

“注意！”忽听撑冰床子的同志叫了一声。我定睛一看，只见前面有一条窄窄的冰沟。我抓紧了冰床子。说时迟，那时快，飞驰的冰床子已经冲到水沟跟前，只见撑冰床的人不慌不忙，两脚使劲一蹬，冰床子就象一匹受惊的小马，猛地昂起头来，跃起身子腾空而起。

“哎呀！”好几个同志惊叫着，对雁翎队队员的绝技，赞叹不已。

白洋淀里的小村子星罗棋布，一个一个地从我们身边闪过，王功学同志告诉我，白洋淀里村子多，有人怕村名记不住，就把那名字编成了串：辛杨二马刘，堤李三田梁……我听了挺感兴趣。可以想象得出，当敌人进淀“扫荡”，我们的同志与其捉迷藏，冷不防给他们一枪时，他们肯定

是晕头转向，狼狈不堪。

驰过茫茫大淀，穿过马庄、李庄、刘庄和尚未完全封冻的马棚淀，我们这几只冰床子直向白洋淀西边重镇同口飞去。

同口镇到了。码头边的大场上，矗立着一座座苇垛。他们告诉我，每年秋后，几百顷芦苇收割完捆成捆，用船运到这里垛起来，一部分运到外地，一部分慢慢地织成席子。可是有一回，三个日本兵为追老百姓一只鸡，一直追到这里，鸡猛地飞到一个大苇垛顶上。一个日本兵上去没抓到鸡，倒发现那里藏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高兴极了，连忙扑过去，不料被那姑娘用力一推，从那苇垛顶上仰面朝天地跌了下来。下面的日本兵刚刚围拢过去，从苇垛顶上掉下来的一颗手榴弹爆炸了，三个日本兵上了西天。街上的日军闻声赶来，架起机枪朝苇垛扫，打得苇垛着了火，从早晨一直烧到天黑。可是那位姑娘早就跑到淀里去了。

在同口镇，我们看完地形，还察看了被敌人焚烧了的同口中学以及被乡亲们拆毁的日军据点，并专程拜访了在一分区工作的几位同志的父母。

第二天早晨，我们又坐上冰床子，到达了吴城。从望远镜里，我清楚地看到了安新城和新安城的敌据点。我对魏洪亮他们说：

“敌人的据点已被孤立，你们的业绩很大呀！现在，

我们应该在广大乡村里进一步发动群众，特别是在游击区里继续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战果，加强瓦解敌军的工作，使敌特活动受到最大的限制。这样，据点里的敌人就会变为聋子、瞎子，最终被我们逼退或消灭。”

随之，我们来到端村。端村在白洋淀是个有名的地方，三面是水，顺水而下可去天津，逆水而上直通好几条河路。北面一条大堤通到旱地上的大村镇。王功学同志是端村人，他带我们到了他家，稍事休息后，又领我们上集镇去看了看。嗨，这可是个热闹的地方啊！街上熙熙攘攘，一派繁荣景象。那些挑着鱼筐、搂着苇席的村民，虽然头戴破毡帽，身穿油脂麻花的破夹袄，但是脸上的表情是平静的。转了一圈，我发现这个盛产土靛的地方，竟然几乎见不着土靛，满街卖的都是洋靛；街上行人打扮入时，还有不少满身脂粉气的妇女。

中午，王功学同志请我们上馆子尝尝鱼鲜。我们挑了个无人的桌子坐下，跑堂的随即端上两盘炒得香喷喷的葵花籽。我们边谈边嗑，王功学同志介绍说，这里虽是鱼米之乡，可是日军和汉奸刚被赶走，人民的生活还很苦。渔民们在冰天雪地打捞的鱼送到市场，被鱼商垄断，渔民所得无几。农民精耕细作，也难谋生。所种的苇子多系大地主、大军阀所有。洋靛倾销，土靛无出路，稻田地又被洪水淹没。加之风俗不纯，一些人好奢侈，在他们看来，

“保定太土，北平太俗，还是天津的好”，因此一个劲追求

天津的生活方式，以致镇上一些妇女斗华竞丽之风十分盛行，还有一些人则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日早饭无”。

听到这些情况，我感到肩上担子更重了。因为，我们来到冀中要进行的不仅仅是个军事斗争，还要注重改变民风，对敌开展经济、金融的斗争，取缔奸商，贯彻减租减息的政策，依靠基本群众使减租减息工作象在北岳区一样逐年深入，等等。这里的统战工作、群众工作、敌军工作都很复杂，需要认真地去，否则是难以开创冀中的新局面的。

菜一盘盘地端上来了。王功学同志介绍说，花鲫鱼是白洋淀的名产，吃起来特别香，只是抓的时候要小心，千万别让那鱼翅刺着，否则会痛得钻心。

饭罢，谢过王功学同志的盛情款待，我们又到别处察看去了。

看完白洋淀一带的地形，我深深感到这里确实是个理想的湖泊根据地，不仅物产丰富而且是一个商品的集散地。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我意识到，只要遵照毛主席关于“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去做，是一定能够完成上级党委交给我们的任务的。

从白洋淀回到大于村的第二天，我又步行到任邱县的南北芦庄，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军人大会。到会的部队有二十四团、三十八区队、四十二区队，有任邱、高阳、安新、

文安四县的县大队及津南支队，约六千多人。冀中军区参谋长沙克、九分区司令员魏洪亮、政委王道邦等也出席了大会。魏洪亮同志和我们一起在白洋淀坐冰床子看地形时冻伤了脚，这次来到会场，已经明显看出，他有点拐了。可是他的情绪非常好。自从一九四二年“五一反扫荡”以来，部队无法集中，都是分散独立作战，现在形势好转了，大家第一次扬眉吐气地参加这样的盛会，心情自然十分激动。会前，身着便服、手持武器的战士们坐在背包上，时而唱着《八路军军歌》，时而唱着《解放区的天》，其中，还有这么一首歌：

一九四三年哪，
环境大改变，
白洋淀的岗楼，
端了多半边……

会上，我讲了话——这也是与冀中广大指战员的头一次见面。我首先向他们表示慰问，赞扬他们自一九四二年“五一反扫荡”以来，在冀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接着，我传达了中央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关于开创冀中工作新局面的有关指示，并讲了国内外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号召全体同志立即行动起来，为完成党和上级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而战斗。

当晚，战士们和群众看了由九分区剧社演出的《血泪仇》。那阶级苦、民族恨，不仅激发了大家的抗战热情，还把人们感动得直流眼泪，我也动了感情。

想不到演出结束后，津南支队的一个战士，跑到他们指导员那里，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号啕大哭地说：

“指导员！我坦白，我，我……我是敌人派来的特务！”

顿时，指导员惊呆了。四周人群涌了上去。那战士没等指导员和大家问话，又说：

“我家里也有一笔血泪仇哇！可我鬼迷了心窍，让敌人给招去训练成特务，反过来破坏抗日，坑害咱们的部队和乡亲，为仇人卖命……我不是人！指导员，把我枪毙了吧！”

指导员一切都明白了。他深情地伸出双手，轻轻地扶起那个战士，说：

“不，不！我们欢迎你的坦白……”

人 民 —— 母 亲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下旬，一千五百多名敌人踏过王官淀的厚冰，以于村、石务吉和八方村为目标，分三路向我们驻地突袭。

为了避免与敌人打消耗战，我们分散转移了。

我带着侦察科长原星、作战科长高存信和副科长周自

为，还有几个参谋，一个警卫班，一共十儿人，每人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了距敌炮楼林立的任邱城仅十二里地的半边店。

这是一个很可靠的村子，曾以支援和掩护八路军而闻名于冀中，被称为抗日模范村。村东头有敌人的一个碉堡，可是村里却有我们建立的“两面政权”。村长是“白皮红心”，表面上听命于敌，实际上却是我们的抗日工作人员。

在冀中，由于斗争环境特殊，象这样的“两面政权”很多，也非常必要，否则，难于坚持斗争。别人曾跟我谈过这样一件事：

蠡县县大队政委曹步墀在十八团工作时，正逢日军疯狂地进行“铁壁合围”，他们连队转移到一个村庄。这个村的村长看到一支队伍向村里开来，以为是“皇军”，赶紧领着老百姓，打着日本小旗子出来迎接。

战士们一瞅，以为碰上了汉奸，正想摸枪，不料村长高兴地把小旗一扔，叫着：

“唉！是八路军呀！是同志们哪！快进村歇歇脚，吃点东西……”

然而，我们今天来到半边店，事情却并不顺利。

我们骑着车子进了村，向乡亲们说明我们是八路军，要找村长，要找地道隐蔽。乡亲们却惶惶不安地互相推托，不管我们怎么说，村长也不露面。我们非常奇怪，不知道这里出了什么事情，只好再三解释：我们是军区的，敌人

正在追捕我们，请带我们下地道藏一藏。

过了很久，走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冰淡地看了看我们，迈着蹒跚的步子，把我们领到一个墙角前，弯腰挪开几块破砖，又掀开一块木板，露出一个洞口。他用手一指说：

“地道在这儿，你们进吧。”掉转身，就走开了。

这个地道实在差劲，里头黑乎乎的，又窄又小，没有其它出口，那个进口也很蹩脚，很不安全。我们蹲在洞里，又饿又冻，可是再也没有乡亲们来过问。在漆黑的洞子里，我听到身边战士埋怨说：

“这个村根本不象人家说的那么好，准是敌人的‘清剿’把那个‘两面村长’吓住了。要不，怎么不敢接待我们？”

我也有些不安，为防备万一，便交待大家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有情况就冲出去，绝不能让敌人把我们堵在洞里。

前些日子，我连续在几个分区了解斗争情况，每到一村，住的都是堡垒户，不是村支部书记家就是副书记、委员家，最起码是党小组长家。他们不仅政治上可靠，而且备有较好的地道。我们一进村，群众随即就把自行车轮印扫掉，从村头一直扫到公路远处，以防敌人跟踪袭击。我们一般睡在房子里，屋顶上有用秫秸搭的一个棚，警卫员在棚里放哨。他从棚里拉条绳子通到屋里，拴一个小铃铛，

作为报警器。事先规定好：拉一响是发现异常情况，拉两响是敌人进村了，连续拉响就是通知赶紧钻地道。

住在堡垒户里，我们就象住在自己家里一样，要是我们半夜才到，大爷大娘便把热炕让给我们，他们自己有的跑到屋外去为我们“望风”，有的忙着为我们煮红枣汤驱寒。白天，他们叫儿子到村外地里“干活”，或者打发媳妇坐在家门口“做针线”，实际上都是在为我们放哨。要走了，他们又摸黑把我们护送出去。我们所到之处，碰到过多少好乡亲啊！

同志们都知道，在这无险可据的平原上，我们唯一的靠山是群众，如果没有群众，我们就无立足之地，寸步难行，更谈不上开展斗争了。

尤其是十分区司令员刘秉彦、政委旷伏兆同志所在的地区，正处在（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斗争更为艰苦，和群众的关系更为密切。敌人也看出了这一点，便采取“淘水捉鱼”的办法，派出大量“清剿队”、“剔抉队”，逐村逐院逐屋地搜索我党政军人员，只要发现一点踪迹，便抄斩全家，血洗全村。他们每到一村，还狡猾地宣布：

“出来参加集会的是老百姓，藏在家里的是八路军！”

当村民们集中后，他们随便叫出一个人，问他谁是八路军，谁是抗日干部。如果回答“不知道”，他们就残暴地给这个群众灌冷水，然后往他肚子上踩，一直到把他踩

死为止，以此来杀一儆百。他们借口“凡藏有八路军的东西均得交出”，向村民大肆敲榨勒索，抢劫财物，还强迫村民集中开会，乘机捕捉青年去当劳工。他们不但要钱要粮，要酒要肉，还要“花姑娘”供他们淫乐，就连十二三岁的小女孩，也不放过。

然而，饱受日本侵略者奴役之苦的冀中人民，把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的身上。他们没有在敌人的屠刀下屈服，而是更隐蔽更勇敢地与敌人作斗争。他们坚持为我军放哨、警戒、侦察敌情、传递情报，甚至以身家生命保护子弟兵。

例如，藁无县南白皮村六十二岁的刘洛仁在地里拾柴时被敌人抓去，敌人给他一把锨，要他填掉八路军活动的交通沟。刘老汉说：

“我要给你们填一锨土，就算是个汉奸！”

敌人打了他两个耳光，他举起铁锨朝着敌人的脑袋就砍。敌人一枪把他打倒在地。老汉临死的时候还怒目圆睁，痛骂敌人。

又如，武强县十三岁的少年温三郁家里挖了个地道，把八路军藏在里头。包围村子的敌人进了他家，问这里有没有八路。他说：

“没有。”

敌人不信，一刺刀把温三郁的母亲刺倒在地，当即带走了他的父亲和哥哥。敌人瞅他小，先是威胁利诱，继而

又拷问他，强迫他交出八路军。他一口咬定：

“不知道什么是八路！”

敌人在屋里屋外乱搜一气，突然发现了地道口。这时，洞里的同志开了火，随着枪声，敌人倒下了好几个。敌人不敢往里冲，便拿温三郁出气，用刺刀剝掉他好几个手指头，还朝他肚子上打了一枪。恰巧这时，游击支队赶到，在村外袭扰敌人，敌人这才仓惶撤走了。不一会，地道里的同志钻出来，把温三郁抢救醒，他却自豪地说：

“叔叔，我什么也没给敌人说！”说完，又痛昏了过去。

又一次，日军为了捕捉隐蔽在深南县王家铺村的八路军，抓了村里二十七个群众，用刺刀顶着他们的胸口，以杀头相威胁，要他们说出八路军的隐蔽地点，二十七个人无一人开口。敌人杀了一个，他们不说，杀了两个，他们还是不说。日军暴跳如雷，兽性大发，一连杀了十四个。可是，剩下的群众仍然只字未吐。

日军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坚贞不屈的冀中人民难以对付，光用刺刀是不可能征服他们的。于是，敌人变换了手法，开展起“新国民运动”，推行“反共誓约”，组织伪联庄，颁布“民众归顺”、“干部皈顺”条令，以确保其侵占的地盘。从去年十月起，他们就出动大批人马，在任邱、高阳地区作“突击示范”，一下子把群众圈进去三万多人。随后召开“反共誓约大会”，用狗咬、活埋、投井、挖心、背碌

礮、炭火烙、挂人头、不准吃喝等残忍手段，威逼群众，妄想将群众变成“效忠皇军”的“新国民”。在任邱，敌人还把一万多老百姓圈进“大饿狱”，逼着他们供出八路军隐藏的武器、粮食、各村的地道、干部名单和八路军的各种文件。说：

“交出来了，你们就出去，要不就饿着！”

一天、两天、三天……一直过了七天，每天都要抬出一些死尸。但是，活着的人仍然没有屈服，敌人仍然没得到一点有关八路军的情报。最后，“大饿狱”里一共活活饿死了一百多人，两千多名青年被日军捆绑着不知运到什么地方去了。

紧接着，敌人又在任邱至高阳长达三十公里的公路上，搞起一条“人电线”，每隔十步就派一个所谓“新国民”站岗，强迫他们昼夜不停地传递情况。敌人企图用这种方法监视、封锁八路军的行动，不让我们过路。

我们呢，在确实掌握敌人突击行动的规律后，深夜横穿“人电线”，插至敌人的“突击示范村”西良淀潜伏。当乡亲们看到子弟兵时，喜出望外，“人电线”上，“平安无事！平安无事……”的声浪越来越大，直传向敌人据点。第二天下午，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两个中队大摇大摆地从百尺村“突击”回来，经西良淀村渡口。我军放过伪军，待日军全部进村，拉响地雷和手榴弹，随着一片爆炸声，机枪和步枪一齐开火，歼灭日军过半。这时，乘船过河的

伪军刚刚上岸，我埋伏下的部队一起冲杀，他们便吓得全部缴了枪。战斗结束后，我军刚要转移，一位老太娘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边跑边喊：

“同志，快回来，我家还有一个鬼子呢！”

有的战士着急地嚷道：“为什么不早说，叫他跑了怎么办？”

大娘笑呵呵地答道：“他跑不了啦，我已经把他锁在柜子里了！”

原来，那个日本兵没被炸死，闯进她家，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对她说：

“新国民的！藏一藏我，优待优待的有！”

大娘点了点头，挥手叫他钻进柜子里，再加上一把锁，这个鬼子便成了瓮中之鳖。

奇怪的是，我们在半边店这个村子里，却受到了冷遇，是因为这里离敌人太近，“两面村长”和群众在敌人的高压政策下不敢跟我军人员接触，还是他们对我们有疑虑？我们到半边店之前，曾经请地方上的同志给这里的“两面政权”下过通知，莫非这个通知还没送到？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两面村长”变质，完全倒向敌人一边。那么，我们将面临着极大的危险！

我紧张地思索着，分析、判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同志们也在黑暗中握着枪，一言不发，地道里只听到一阵粗重的呼吸声。

黄昏时，我决定带领同志们离开半边店，转移到其它地方去。刚出地道，迎面碰上一位中年人。

“唉呀，司令员，实在对不起你们！”他非常抱歉地对我们说。“两面村长”终于露面了。

原来，也在黄昏时，从任邱城西关匆匆赶来一位姓郝的同志，他正是来给半边店下通知的人，由于途中被敌人缠住，迟到了。这下子，“两面村长”急忙赶来了，那位领我们进地道的老大爷和几位乡亲们也来了，他们都挺内疚，一再道歉。郝同志解释说：

“他们这里离鬼子据点近，特务常化装成八路军便衣人员，到这儿来欺骗乡亲们。村里有位老大爷曾经受骗，去接待他们，领他们钻地道，结果人被抓进据点整死了，地道也暴露了！”

“两面村长”接着说：“下午你们来了，虽说也穿紫花布袍子，头扎毛巾，象咱冀中的庄户人家，可是讲话却是外地口音，一个个也都面生得很。大家不摸底细，才把你们领到专门用来对付敌人的地道里去了！”

“可不是么！”那位脚步蹒跚的老大爷笑呵呵地说，“前些日子，一群特务冒充八路，掌灯时分蹿到村里来，嚷嚷着下地道躲一躲，也是我，把他们领到那个蹩脚的地道里一丢了事。那帮龟孙子在里头冻得够呛，没人理睬，半夜里实在抗不住了，只好爬出来，灰溜溜地滚蛋了。”

“哈哈……”听到这里，我们都忍不住压低嗓子相

视而笑。

“两面村长”边笑边说：“这回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我代表大伙儿向同志们道歉，请你们莫怪，莫怪呀！”

“村长同志！”我赶紧说，“你们没有错，用不着道歉。你们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惕，才能坚持斗争啊。你们做得对，半边店不愧是个模范村，你们不愧是防奸模范。”

听到我这么说，“两面村长”和几个乡亲都挺高兴。他们小声地嘀咕了几句，好象在争抢着要把我们领到自己家里。很快，我们便被领到三户紧挨着的堡垒户家里，每一家都安排了几个人。一位年约二十七八岁的人把我和几个警卫员领进他家里。一进门，他就轻轻地叫了一声：

“娘，来同志啦！”

屋里炕上，盘腿坐着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娘，她颤巍巍地举起放在土炕小桌上的油灯，仔细地瞅了瞅我们，然后亲切地说：

“孩子，快，上炕来暖暖手脚！”

“大娘！”我敬重地叫了一声，上炕坐在大娘身边。

她赶紧把腿脚捂热的被子扯过来，盖住我冰冷的双脚，又对她的儿子说：

“快到隔壁家把你妹子叫来。”

不一会，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位年轻姑娘。她见到我们，羞涩地一笑。大娘指着那位姑娘，对我说：

“你叫她妹子。”

指着姑娘的哥哥说：“你叫他弟。”

又指着我对他俩说：“他是你们大哥。”

末了，大娘笑咪咪地说：“你就唤我‘娘’好罗。万一鬼子来了，咱们这一家人好支应那些两条腿的狼！”

这是半边店群众的斗争方式之一。每当家里来了八路军同志，全家人立刻聚到一起，规定好相互关系、称呼，以便应付敌人的突然搜查。

我感动极了。我们和人民群众，确实是一家人啊。我亲昵地叫了一声：

“娘！”

大娘高兴地应了一声，慈祥地笑了。姑娘忙着为我们升火做饭。那位好兄弟则冒着严寒出门，和几位乡亲到村外扫我们的自行车轮印去了。大娘和我拉起了家常。说着说着，她伤心地掉下泪来。我再三追问，她才告诉我，原来，郝同志说的那位受特务欺骗，错把他们当八路接待而被整死的老大爷，就是她的老伴！

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这就是我们的母亲！当她的亲人为了支援和保护我军指战员而误中奸计，惨死敌手之后，她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仍然这样真诚地掩护我们，这需要多么坚定的信念和多么大的勇气啊！作为我们，怎能又来连累老人家呢？谁知，我刚流露出想另住一家的意思，大娘马上觉察出来，并且生起气来了。她说，日军和汉奸杀掉她老伴，为的就是不让老百姓掩护八路军。老百姓哪能

因为亲人被害，就扔掉自己的子弟兵不管呢？那不正合敌人心意么？她还说，老伴死了，原先的地道也暴露了，她叫儿子再挖个更好的地道，儿子和几个乡亲连着干了好长时间，这才挖成了全村最好的地道。所以，她有理由把八路军请到家里来住。

在这样的母亲面前，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在大娘家住了两天，大娘把家里唯一的一只正在下蛋的老母鸡也杀了，炖给我们吃。我说什么也不吃。大娘象哄孩子似的说：

“吃吧，吃吧，别呕气了。吃得壮壮的，多打几个鬼子，娘心里才高兴呢！要不，让鬼子抢去杀了吃，那才憋气呢！”

当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大娘一家时，大娘叮嘱我说：

“过年一定再来，大娘给你包饺子吃。啊？”

我使劲地点了点头，说：

“娘，您老人家多保重！”

我们在暮色中骑上自行车走了，骑了一段路，我回过头来，还看见大娘和她的儿女久久站在家门口。

在半边店闹了误会以后，我就吸取了教训，每到一地，尽量不说话，以免露出我那南方口音。我还调了三个人随我行动，一个是保定附近的人，一个是天津附近的人，还有一个是饶阳人，每到一地，由他们用家乡话和群众联系。

这天，我们宿在一个村子里，忽然，民兵跑来报告，说村里来了几个汉奸，为首的人镶着金牙，操外地口音，

暗地打听我们的行踪，已经被扣住了。

“这个‘大金牙’顽固得很，被逮住后还死不承认自己是汉奸，硬说他是八路军，是军区派来的。”一个民兵愤愤地说。

我很奇怪，就叫他们把那个“大金牙”押来让我看看。当“大金牙”被带进来时，我不禁失声大笑起来，这哪里是汉奸呀，他是我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长王奇才！

王奇才同志原是九分区政委，他到冀中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后，分区政委的职务由一分区的王道邦同志接任。王奇才同志是闽西人，他的爱人叫丁一，也就是随同我在梯子沟一起突围的那位勇敢的白求恩学校二队指导员。王奇才同志因为牙齿掉了，才镶了颗金牙。可当时有些汉奸、特务认为镶金牙好看、体面，不管牙齿坏不坏，都喜欢镶上一两颗金牙。难怪民兵们一看王奇才同志那副样子，就把他当汉奸逮住了。

王奇才同志一看见我，便啼笑皆非地说：“司令员，多谢这几位民兵把我抓来，要不，我还找不到你呢！”

满屋民兵都愣了。我向他们介绍王奇才同志的身份，话还没有讲完，民兵们就不好意思地跑了。

袭击我们的敌人扑了个空，灰溜溜地缩回据点。我在肃宁县城南边的张岗，与林铁、李志民、罗玉川、金城等同志会合。一路上，林铁、李志民同志他们也遇到不少和我们类似的惊险而有趣的事情。

我们会合之后，便把肃宁县张岗确定为军区的驻地。因为肃宁县城解放半年多了，这一带已成了比较巩固的地区，敌人轻易不敢到这里来。

我与林铁等同志相互交换了情况，谈起敌人“五一大扫荡”之后冀中人民艰苦斗争的事迹，也都激动不已。我们也谈到冀中的各级领导干部为恢复、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所付出的代价和牺牲。斗争最艰苦、干部牺牲最多的要算蠡县了。一个县长上任不久就牺牲了，另一个接职，不久也牺牲了。第三位同志再接过这副重担的时候，他的一个亲戚伤心地问他：

“你不怕吗？”

他说：“怕个甚？怕又有甚用？和鬼子干到底！”

后来，他又英勇地牺牲了。这些人民的好儿子，就是这样前仆后继地进行斗争的。

为了完成党中央和晋察冀军区赋予的任务，我们再一次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聂司令员关于冀中工作的指示。聂司令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针对冀中地区严酷的斗争形势，曾提出：

我们在冀中有了五年的工作基础，有政治上的绝对优势，有广大的山地作依托，目前日军在冀中的军事优势是相对的，今后只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到敌后之敌后去，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转变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冀中平原的斗争是完全能够坚持的。

接着，我们又根据东进冀中后所了解的实际情况，进一步研究和确定了冀中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斗争方针：

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平原游击战争。

把武装斗争与党的日伪军政策、革命的两面政策相结合。

继续开展冀中平原地道斗争。

组织“拳头”，准备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化，巩固、发展、扩大根据地，变游击区为巩固的根据地，积极为战略大反攻作准备。

在上述四项工作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即发动战役，开始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斗争。

一九四五年到来了。

元旦这天，天气晴朗无风，我们的心情格外舒畅。在军区驻地，同志们会了餐。席间，大家频频举杯，互相祝贺在新的一年里多打胜仗，做英雄，当模范。今年是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一年，是大反攻的一年。冀中行署在我们驻地的广场上召开了“迎接一九四五年”的万人大会。为了防止敌机轰炸，大会是在黄昏时开始的。乡亲们穿着新衣裳，举着小纸旗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掌声、口号声如春雷轰鸣。当我们走上主席台，望着那万头攒动的会场时，我异常激动——这是我到冀中后第一次参加群众集会。我看到了人民战争的火海，看到了人民的抗日热情和力量的所在！

由于新年期间甚忙，我无法去任邱的半边店看望那位房东大娘。过了些日子，我途经那里，特地去看望她老人家。谁知，一个意外的消息把我惊住了：大娘在前些天得了急病，已经逝世了！临终前，大娘指着晾在秫秸杆排子上的饺子，要儿子和闺女把它好好放着，等我来的时候煮了吃。

儿子和闺女便照看着那些饺子，一直等着我。

抚摸着那一个个早已风干冻硬的饺子，我鼻子一酸，眼睛湿润了。

“娘！”我在心里深情地呼唤着她，“我来看您老人家了。”

在大娘的儿子、闺女引导下，我默默地走向她的墓地。

地 道 奇 观

一九四五年新年伊始，我们冀中军区来了一位特殊人物。此人身材肥大，蓝眼珠，高鼻子，头扎白毛巾，身穿冀中老百姓的上布褂子，看上去显得很滑稽，也很气派。他挺胸走到我的面前，用夹带异腔的中国话说：

“将军！见到你，我感到十分荣幸！”随即“啪”的一声，两脚一并，行了个举手礼。

“盟军观察员艾斯·杜伦中尉。”翻译向我介绍说。

实际上，在这位美国军官来到之前，上级已经把他的

有关情况通知给我们了：盟军观察组是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从延安到达晋察冀军区的。在那以前，他们到过重庆、西安等地，“观察”过大后方的蒋介石的军队。现在，盟军观察组把杜伦中尉派到冀中，来“观察”在敌后作战的八路军。杜伦中尉原是美军陈纳德部队的，在我国杭州度过童年，因此，会讲一些中国话。他奉命来了解冀中的敌我斗争情况，说是为将来盟军在中国对日作战作准备。按照晋察冀军区的要求，我们尽可能地为他的考察工作提供方便，找来了一位名叫马振武的同志给他做翻译。杜伦在平汉路西化装成冀中百姓的模样，由那里的部队派人护送，过路后，又由我们冀中部队派人用牛车把他接来。

我握住他的手，笑道：

“欢迎你，杜伦先生！我们这里，条件可不好噢！来，洗把脸，休息休息。”

杜伦把头上的毛巾抹去，露出黄头发，洗完脸之后，坐了下来，刚呷口茶，就放下茶碗，朝我翘起大拇指，说：

“将军，想不到你们八路军的指挥员都这么年轻！顶好！顶好！”

听得出，杜伦的语调里既有惊叹和恭维，也有轻视和怀疑。我笑问：

“杜伦先生此次来，有什么要求吗？”

杜伦掏出一块白手绢，使劲抹着下颌和脖子，声音很响地说：

“日本不行了，我们美国有力量，我们要在中国的渤海岸登陆，要在冀中实施空降，把日本人赶下海去！将军，我想看看你们的部队，了解你们在平原上是怎样和日本作战的。我还想到保定飞机场，到天津杨柳青铁桥看一看，以便叫我们的B 25轰炸机来轰炸。总之，我要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冒冒险！”

杜伦说到美国的轰炸机时，大概是因为激动，情不自禁地把一只手高高举起，食指伸出，指向屋顶，颇为自豪。

我告诉他，欢迎他去参观冀中军区的部队，如感兴趣的话，还可以钻钻冀中平原的地道。但是，保定机场和杨柳青铁桥那里是日军占领区的腹地，也是他们重兵驻守的目标。去那里，一旦被日伪发现，那就难保平安。要相信日军对于生俘一个美国军人是非常感兴趣的。也许，日本人的耳目已经侦知他的到来了。

“喔？”杜伦一惊，喃喃地说，“对的，对的。还是不去好，不去好！”少顷，他用英语向翻译叽哩咕噜地说了一通。他说得很快，有时还把两手摊开，肩头一耸，做出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

翻译把他的意思告诉了我：杜伦认为，日本陆军的攻击能力是世界一流的，只是稍次于美军而已。在这样的大平原上，装备简陋的八路军不但能站住脚，而且还能不断歼灭日军，实在不可思议。在重庆时，蒋介石的将军们曾说：八路军就是那么几个人，那么几支枪，打几下就跑，

没多大战斗力。对这类说法，杜伦半信半疑。他说，美国的军火武器有的是，问我们想不想要美国军援。杜伦还说，他来冀中后，每到一村，总有许多老百姓好奇地围观他，有的人还叫他“洋鬼子”。对此，他很有意见。

我要翻译告诉他，我可以和他谈谈敌后抗战的情况。至于八路军的战斗力如何，请他亲眼看一看，就会得出自己的结论的。我们的武器，主要靠缴获，自己也生产一些，但不多。我们不反对外援，也不把希望寄托在外援上。要不要盟军的军火，最好是跟我们毛主席、朱总司令去商量。关于当地老百姓叫他“洋鬼子”，这要请他谅解，因为冀中这个地方，清末年间遭受过八国联军的祸害，当地百姓恨透了外国侵略者。这一点，希望他能理解。现在我们延安和美国是友好的，有着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他作为盟军派来的观察员，理应受到尊重。我们会告诉当地群众，不要再叫他“洋鬼子”。今晚，我们将召开一个欢迎会来欢迎他。在我们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里，一切真心实意帮助我们抗战的国际友人，都会受到最诚挚、最热情的款待。我还特地列举了白求恩、巴苏华、柯棣华、傅莱、班威廉、唐儒和林迈可等国际友人在冀西一分区时的情况。

杜伦听了不住地点头，连声说：

“顶好！顶好！我佩服他们。”

当天，在大官厅村，由我出面宴请了杜伦。杜伦看到

那满桌的鸡、鸭、鱼、蛋、虾及酒时，不禁目瞪口呆，站在那里激动地对翻译咕哝了半天。原来，在重庆时国民党军政人员告诉他，前方的八路军一天两顿小米汤，粮弹极缺。他以为到冀中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没想到我们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还能盛情地款待他。因此，他被感动了。

饭后，夕阳西沉，我们召开了“欢迎杜伦中尉晚会”。当我把杜伦中尉介绍给出席欢迎晚会的军民们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杜伦激动地挥起胳膊，不停地大声喊：

“哦——谢谢！谢谢！共产党、八路军是顶好顶好的朋友！”他那美式中国话，引起会场上一片善意的笑声和更加热烈的掌声。

第二次见到杜伦的时候，我向他介绍了我们坚持敌后抗战的一些情况和体会。杜伦对此挺感兴趣。我说，我们将毛主席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作为我们敌后斗争的指导思想。不管在山地、平原、湖泊、河流，我们都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我们以游击战为主。但不放过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目的是歼灭敌人。同时在敌后牵制住日军力量，不让他们向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进攻。我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他谈了八路军在黄土岭战斗中诱敌深入，击毙敌酋阿部中将，震动了侵华日军和日本国内的情况，说明我们的游击战是既“游”又“击”。“游”是手段，“击”是目的。我告诉他，从表面上看，日军占领了

华北，实际上只占了部分点和线，广大乡村仍在我们控制中。我们进行的是一场人民战争，我们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正如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所说：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野牛！哈哈，野牛！比喻得顶好。”杜伦开怀畅笑。

我谈到敌人“五一大扫荡”以来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情况时说：我军既敢于在敌重兵围困之下坚决打击敌人，又讲究斗争的艺术，坚持积小胜为大胜的原则，首先打击对群众危害最大的日军和铁杆汉奸。为此，冀中军民创造了“挑帘战”“院落伏击”、“捕捉战”等多种战法。

我军还利用日军修碉堡要木匠的机会，化装成木工，带着锋利的斧头进入敌堡。敌堡内的日军由于夜里不敢睡觉，白天都在休息。我军便抓住这个机会，挥斧入室，把敌人砍成肉泥。

六分区的指战员侦知敌据点里的日军每天早操时都不带武器，低头默诵“天皇圣训”，便化装成挑担、送粮的百姓和骑车送情报的“顺民”一涌而上，全歼敌人。

我军还利用日伪军的矛盾，化装日军袭击伪军，化装伪军袭击日军，化装一部分日伪军袭击另一部分日伪军，

并利用伪军、伪组织中的内线关系，对孤立、分散和内部动摇的敌人据点实行围困，里外夹击。

我军指战员时而化装成出殡的模样，在特制的棺材里藏着机枪，待接近敌人时突然一阵猛打，将敌全歼，时而巧扮花红，化装娶亲，诱敌出碉堡来抢亲，出其不意地打它个落花流水。对少数最大恶极的敌军头目及“铁杆汉奸”，则采取“单打一”、“掏老窝”的办法，坚决除掉。

“哈哈……”杜伦忍不住又笑。他两眼生光，脸颊泛红，不断地竖起大拇指。

我又谈了我们在冀中平原开展地道战的情况。杜伦对此感到很神秘。大概是想得点感性知识吧，他跃跃欲试地说：

“将军，我想去钻钻地道，如果您许可的话。”

我笑道：“当然可以。”

我把周自为同志找来，让他陪同杜伦中尉去钻几个地道。后来我听说，杜伦钻地道时倒还能吃苦，那么个大高个子憋在低矮的地道里，始终不退缩。他好提问，地道里的一切设施他都要问问。钻出地道口，看到挂着的高粱穗子，他都感到好奇，问那是何物。过了几天，他再次见到我时，大谈观后感，一方面称赞这种地道修建得巧妙，另一方面却对这样的“土地道”能否抵挡得住日军重火器的攻击，持怀疑态度。

这时，我们正好准备在饶阳城南边的小堤举行一次大

规模的军事检阅，以此振奋士气和民心，推动部队和民兵的训练。我特意邀杜伦去看检阅。我和林铁、金城等同志，经饶阳城东七里处到了滹沱河南边。饶阳城是全县剩下的唯一的一个日军据点了。敌人把碉堡建在城墙上，昼夜提心吊胆，生怕我们攻城。我们从城东、城北两面已经限制住敌人的活动。距城七里的诗钦村，人们已经可以放心地跳秧歌舞了。

杜伦是由我们的同志护送，乘着牛车从饶阳城和安平城中间穿过来的。碰巧，那天晚上我们七分区的所属部队袭击敌人据点安平城，骤然间，枪炮齐鸣，弹火纷飞。不一会，城楼的东北角燃起了熊熊大火，乡亲们远远望着，高兴得直喝彩：

“东北城楼被攻占了！”

“八路军这是第三次打入安平了！”

“安平迟早要被咱们全部占领！”

杜伦亲眼看到此情景，很是激动，嚷嚷着要跟进城去看看。当然，我们没同意，因为安平城还未最后占领。

在小堤村举行的检阅开始了。杜伦看到通过检阅台的一队队八路军，雄纠纠，气昂昂，一式日军装备，以及他们和民兵精湛的射击、投弹、刺杀表演，佩服地对我说：

“将军！我在重庆看过国民党的军队，他们每个连队都不满员，他们搞假的，临时凑起来的。你们是真的，兵源是无穷的。共产党有办法！”

说到这里，杜伦转眼看了看周围，压低嗓门，意味深长地对我说：

“将军，咱们是朋友，朋友之间说的话，最好不要传到第三方那里去，好吗？”说罢，他肩一耸，两手一摊，作出无可奈何的表情，笑了。

看来，杜伦虽然是位美国军官，受“唯武器论”的影响颇深，但他还是有些正义感和分析力的，为人也坦率。

检阅完，杜伦一个劲地说，冀中这个地方有很多东西可以考察，他要到下面去看看，回延安好向他们的上级汇报。随后，我安排他到七分区和八分区去了一趟。七分区的领导同志和八分区的司令员兼政委周彪都接待了他。他参观了那两个分区，很兴奋，说收获很大，还想到九分区去看看。我考虑到那一带靠近平汉线，据点不少，怕不安全，就劝他别去。可杜伦正在兴头上，根本听不进我的意见，一个劲地要走，还幽默地说：

“从祖先开始，我们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军人，就富有冒险精神！”

我只好同意了。我给九分区司令员魏洪亮打了个电话，通知他要保证杜伦的安全，还交待说：

“你们要热情接待，可以让他看看附近的部队，协助他了解一下情况。”

一月十五日，杜伦在我们派去的作战科长高存信、参谋吴英民及两名警卫员护送下，出发到九分区新驻地——

任邱县边关村。

杜伦到达九分区后，由于魏洪亮同志跟我到白洋淀看地形时冻伤了脚，感染了，正发着高烧，便由作战科长雷溪接待杜伦。过了三天，魏洪亮同志打了几针之后，病情有所好转，便坐在炕上和政委王道邦一起接见了杜伦。后来我听说，杜伦对这两位年轻的分区领导很赞赏，而魏洪亮和王道邦同志对杜伦的接待也是很热情，很有分寸的。

为了研究春季反“扫荡”准备工作，检查练兵进展情况，讨论军火生产、供给与地道斗争等问题，一月十七日，我们在军区召开了为期九天的分区以上干部会议。这是我到冀中后召开的第一个高级干部会议。长期以来，因为斗争形势和环境的关系，冀中各军分区大体上都是各自为战，缺乏统一领导。有一些领导同志和我在这次会上还是第一次见面呢！不料，会议结束后，从九分区传来了一个消息——

昨晚，河间敌快速部队及任邱、高阳之敌共两千多人，突然向边关村奔袭，九分区司令部匆忙转移到附近的皮里村，魏洪亮和王道邦同志带着杜伦下了地道。敌人在今天拂晓时分，把边关和皮里两个村铁桶般地围住了。现在，魏洪亮和王道邦他们已经与敌人激战了五六个小时，具体情况不明。

我想，日军可能得知有一名盟军观察员到冀中来了，这次突然奔袭边关村，除发现我们九分区司令部外，也很

可能与发现盟军观察员有关。

于是，我立即命令八分区的两个区队和九分区的二十四团、四十二区队出动，在外围袭击敌人，为九分区司令部和杜伦中尉解围。魏洪亮和王道邦同志面临的情况很严重，九分区的战斗部队都不在他俩身边，他俩只能带着分区机关干部和民兵坚守地道，在我外围部队的配合下，与凶恶的敌人进行地道战。

地道战，是英雄的冀中人民在粉碎日军“驻屯清剿”斗争中广泛开展起来的，他们有了许多新的创造。

“五一大扫荡”前，冀中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就挖了许多土洞和地窖，以防日军杀人抢劫、凌辱妇女。

“五一大扫荡”后，随着斗争的日益残酷，我党领导人民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发展成各家相通、环绕全村的地道，然后又发展成村村相连的地道网。冀中全区到底有多少地道，没有仔细统计过。只晓得一九四四年下半年以后所挖的地道就有一万多里长了。在战争最残酷的岁月里。冀中人民以英勇的战斗精神和无穷智慧筑起一道“地下长城”，化无险可守的平原为抗敌要塞。

但是，当时地道还存在不少问题，关键是只能隐蔽自己不能攻击敌人。另外，如何对付敌人的火攻、水攻、烟攻、毒攻、挖掘，以及我们的照明、防病和吃喝拉撒睡，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此，军区对地道进行了考察，我带周自为和阎佐三

等同志先后去过任邱、蠡县、大城、饶阳、安平等县，冀中平原最好的地道和最差的地道我都钻过，了解到大量情况。

考察后，我写了一本两三万字的小册子，题名《冀中平原的地道斗争》。在这本小册子里，总结了各地的经验，强调要把隐蔽性地道和战斗性地道结合起来，成为一座既能保存自己，又能消灭敌人的地下堡垒。

这本小册子还探讨了地道战的战术问题，集中群众智慧，列举了解决在地道中生存、战斗的许多巧妙办法。阎佐三同志为这本小册子画了地道构筑图。林铁、金城、罗玉川等同志补充了许多好意见。《冀中平原的地道斗争》作为秘密文件油印下发了。

后来，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人民群众把发展地道与改造地形，改造村落结合起来，形成了“天地人”（房顶、地面、地下）三通，沿村、街道、院内各三层的纵横交叉火网，再以野外地道为纽带，把村庄、野外的地道组成一个连环作战阵地。既可打村落战又可野外出击，既利于小分队活动也利于大部队集结，可防可攻，还可以依托四通八达的地道，封锁敌人的岗楼和据点。

如今，日军以重兵突袭皮里村。那里的地道能不能经受住考验呢？杜伦中尉不相信我们“土地道”能对付日本人的进攻。现在，这位有“冒险精神”的美国军人已经身陷其中了，他情绪如何，是安是危？

事后，我才知道详细情况：敌人突然奔袭边关村，魏洪亮和王道邦同志决定趁夜转移到边关附近的皮里村去。可是杜伦不赞成，他对九分区作战科科长雷溪说：

“请告诉司令，对这个决定我很有意见！既然转移就应该转移到大炮射程以外。皮里村离这里只有几里，大家的生命安全仍然没有保障。”

魏洪亮同志仍在发烧，两脚肿痛，不能骑马，只好坐在担架上指挥转移。他要雷溪同志向杜伦解释：日军的伎俩，我们早已摸透，突然奔袭不足为奇。皮里村的地道是双层的，安全可靠，叫他尽管放心。

“喔，上帝！那种土地道。”杜伦连连摇头，背起自己的卡宾枪和左轮手枪，嘟哝着跟他们走了。

到达皮里村已是后半夜。高存信和马振武同志陪同杜伦来到卢大娘家里。卢大娘见来了八路军和盟军朋友，高兴地捧出花生、柿饼招待客人，把热炕让给杜伦睡，杜伦的情绪才好了一些。他握着大娘的手，连声说：

“谢谢！谢谢！”

拂晓时分。六七百日军忽然把皮里村团团围住了。原来，日军确实得到了盟军观察员到达九分区的情报。辛中驿据点的敌人赶到边关，挨家挨户一搜，没见美国人和八路军，河间的敌人则直扑皮里村来了！

魏洪亮和王道邦同志立即决定让杜伦下地道。高存信同志急忙把正在呼呼大睡的杜伦叫醒。杜伦一听有情况，

睁开惺忪的睡眼，“嗷”的一声蹦下地，慌里慌张地就要往外跑。警卫员赶紧拉住他，告诉说村外都是敌人，要赶紧下地道。接着，他们按卢大娘指的方向，往壁画后面夹皮墙上的地道口钻。不想杜伦身子肥大，下到一半就卡住了。正在这时，村里响起了枪声，可杜伦的身子把洞口堵得死死的，上半截还露在外边，急得他“上帝、上帝”直叫唤。高存信他们一急，推的推，拽的拽，硬是把他送进了地道。

刚把杜伦送入地道，院子南房顶上就传来了哗啦啦的声音，卢大娘惊叫一声：

“鬼子上房了！”

“大娘，快下地道！”高存信同志举起手枪，向南房顶上开了几枪，敌人在上面惨叫着，随即“啪！啪！啪！……”往下连打了六枪。卢大娘把高存信他们死命地往洞口推，用变了声调的沙哑嗓子喊着：

“他们要抓你们，快！你们先下！我不要紧。”

高存信他们刚进入地道，日军就冲进院子里，把卢大娘捉住了。

在魏洪亮和王道邦同志的住处，敌人上了东屋房顶，正要对准他们住的北屋射击，警卫员张建祥——一位白洋淀打水鸭的神枪手，疾速地操起枪从窗眼向房顶打去，两个日本兵连人带枪栽了下来。魏洪亮、王道邦和雷溪同志便乘机钻进了夹墙里的地道。敌人涌进东屋，一串子弹打得他们鬼哭狼嚎，这是东屋的同志从“翻眼地道”的射孔

里打的枪。这种地道挖下去又翻上来，成为凹字形，墙角或其它隐蔽处都有枪眼，既能向外射击，又不怕敌人用水灌。敌人转而扑向北屋，这时北屋的同志也从“翻眼地道”里向他们射击。就这样，东屋和北屋的交叉火力，打得敌人在院子里团团乱转，纷纷倒地。

这时，分区机关和直属队一百多人以及全村一百多户群众，全都下了地道。敌人在村里伤亡不少，却又找不到一个八路军，大为恼怒。他们到处放火烧房，寻找地道口。

在卢大娘家的院子里，敌人发现了一个洞口，可是谁也不敢下去，硬逼卢大娘说出八路军的下落以及地道里的情况。卢大娘一言不发。日本军官勃然大怒，用战刀剁去卢大娘四个手指头。

日本军官的嗥叫，卢大娘令人心碎的呻吟，雷溪他们都听到了。他们再也忍受不下去了。蓦地，他们从地道口猛虎般跃出来，冷不防地开枪，把日本兵撩倒了好几个。剩下的日本兵见势不妙，掉头就跑。雷溪同志趁机扑到炕边，抱起卢大娘。等大群敌人重新扑来时，雷溪他们已经带着卢大娘钻进了地道，在地道里为她老人家包扎伤口。

由于皮里村的一个奸细告密，日军一下子发现了四个地道口：一个是杜伦钻的那个地道口，一个是魏洪亮和王道邦同志钻的地道口，两个是分区侦察科和侦察排同志钻的地道口。于是，他们便不择手段地破坏地道：烟熏、水灌、挖掘、施放毒气。

杜伦在地道里紧张极了。终于，他坐不住了，要雷溪同志领他去见司令员魏洪亮同志，说是有话要当面跟司令说。好在地道是相通的，雷溪同志答应了，并递给他一根照明用的蜡绳。这是用艾草搓成的，曾在融化的黄蜡里浸泡过，耗氧少，点着后不容易灭，只要一摇晃就能把周围照亮。当然，若是地道里用蜡烛或手电照明，效果会更好，可这些东西太贵，加上敌人的封锁，就是有钱也难买到。点油灯的话，烟太大，耗氧厉害，也不如蜡绳经济。我曾在地道战的小册子里写道：

“这种蜡绳家家都可以准备。部队人人都要有一把。”

想不到，现在连美国人也用上了它。

魏洪亮同志脚坏了，站不住，正在地道里爬来爬去，指挥大家与敌人来回地争夺地道口。日军逼着一个伪军下地道，被我们的战士王景芳一枪打死了，那家伙又被拖了上去。紧接着，敌人心生毒计，用绳子捆住一个村民，强逼他到地道里来侦察。可这人一下来，就被我们的同志认出是卢洛为大伯，马上给解救了，敌人拉回的只是一根轻飘飘的绳子。日军发狂了，便施放毒气。当冒着浓烟和火星的瓦斯筒扔进来时，警卫员陈学曾一声喊：

“同志们，往里去！”

他自己扑上去，抱着瓦斯筒冲到洞口，奋力扔出洞外，吓得院子里的日伪军，捂着鼻子乱跑。几乎是同时，皮里村的党支部书记从另一条地道钻过来，马上把洞里的防毒

帘放下来，接着又把晕倒的陈学曾同志背到通风的地方。地道里又暂时平静下来。

杜伦见到魏洪亮同志，想尽量装得镇静一些，但是那声音仍然有些发抖：

“司令，情况怎么样？”

“不要紧。”魏洪亮同志坐了起来，亲切地安慰说，“我们司令部还在。”

“司令！”杜伦把肥胖的身子挪近魏洪亮同志，试探地说，“你不会把我交给日本人吗，那样，他们马上就撤退了，你们也就没有危险了。”

魏洪亮同志一听，正色道：“杜伦先生，你想错了！我们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凡是同情和支持我们的，都是朋友。共产党、八路军光明正大，不会做出卖朋友的缺德事。有我们在，就有你在。我们可以保证，你不久就会回到延安的！”

杜伦听了，既感动又尴尬，赶紧改口问：

“你们伤亡怎么样？”

魏洪亮同志回答说：“这种地道战，往往是我们伤亡很小，日本人伤亡很多。”

“噢！顶好！顶好！”杜伦象吃了颗定心丸，又返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上去了。

日过正午，战斗仍在进行。来突袭的两千多名敌人，

一部分正在外围与八、九分区的部队作战，一部分仍在皮里村里四处挖掘，寻找新的地道口。

在另一处地道里，隐蔽着魏洪亮同志的爱人肖哲和她那八个多月的男孩。她听到头顶上“通”的一声，便知道房门被踢开，敌人进了屋，正在翻箱倒柜地寻找地道口。沉重的皮鞋和杂乱的响动声传下来，把肖哲怀里的孩子吓着了。孩子咧嘴要哭。肖哲一看不好，赶紧用乳头堵住他的小嘴巴——只要一发出哭声，藏在这里的许多人和一部电台就会被敌人发觉。

那本地道战的小册子，曾谈到，为了防止婴儿在地道里啼哭，可给孩子灌几口酒，让他醉过去睡着，否则有奶他也不一定吃，难免还是要哭，一哭就会暴露目标。可是日军这次突袭皮里村，人们在睡梦中惊醒，仓促下地道，谁也没顾得上带酒。

可怜的孩子被憋得脸涨紫了，小手小脚乱舞乱蹬，肖哲却横下一条心，含着眼泪死死地堵住他的嘴。敌人没找到洞口，出去了。头顶上平静下来，肖哲连忙放松孩子，轻轻拍打他。谁知孩子已经被活活憋死在怀里了。

这一切，杜伦并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的肚子饿了，便向雷溪同志指指嘴和肚子。大家都在紧张地战斗着，谁还顾得上吃东西呢？但是雷溪同志还是向地道里的老乡要了一块玉米面饼，递给了他。杜伦接过硬梆梆的玉米饼子，连说了两声“谢谢”，便蹲在一边吃起来。吃完，他用手绢

擦着嘴巴，这才听说司令的孩子被闷死的事，他吃一惊，似乎有些内疚。

“司令，听说你的孩子为我们牺牲了，我感到万分难过！”杜伦再次找到魏洪亮同志，用一种哀伤的口吻说。

魏洪亮同志虽然悲痛，但仍在镇静地指挥战斗。他派侦察员陈学忠从一个通往村外的秘密洞口突出去，给万震西率领的四十二区队送信，要他组织力量合击皮里村敌人。又派警卫员告诉同志们：一定要有信心，万一敌人破坏了上一层地道，我们就到第二层去坚持战斗。天黑后，我们的大部队就会出动，那时候，我们就来个里外夹攻，打一个漂亮仗。此刻，听到杜伦的慰问，魏洪亮同志说：

“谢谢你的关心！为了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我们已经牺牲了无数战士和老百姓，日本鬼子欠下的血债。我们会向他们讨还的。现在，我们正从高房工事上，从磨盘底下，从墙根后面，从庙台背后，狠狠地打击敌人，你可以看一看。”

一位同志把杜伦带到了望孔旁边，让他看看地面上的情况。他吃惊地望着日军被不知从哪个方向射来的枪弹打翻，被不时爆炸的地雷炸得缩头缩脑，兴奋地大叫：

“顶好！顶好！”

黄昏时，日军想溜，可魏洪亮、王道邦他们把敌人死死拖住。四十二区队接到出击命令，战士们把棉衣脱了，从很远的地方跑步赶来。这个区队最善于拼刺刀，一冲进

皮里村，就与日军刺刀见红，杀得敌人鬼哭狼嚎。几个县的游击大队和区小队在地委书记陈鹏的指挥下，也赶到皮里村外，四处打枪。边关村的民兵和扛着锄头铁叉的群众也来了，敲锣打鼓，把敌人搞得草木皆兵。敌人抵挡不住，狼狈地向河间方向逃窜。杨栋梁率领的三十四区队派了一个连，躲在半路上打伏击，又打得日军丢盔弃甲，扔下不少死尸，剩下的敌人这才逃回了据点。

皮里村地道战胜利结束了。敌人伤亡了几百人。我们只伤亡了一老一小：房东卢大娘和魏洪亮同志的男孩。杜伦钻出地道，亲眼看见村里横七竖八的敌人尸体，惊叹不已。王道邦同志让杜伦稍事休息，吃点东西，然后派人把他连夜送回军区。那个向日军告密的奸细也被魏洪亮、王道邦同志和地委书记陈鹏查明抓来枪毙了。

杜伦穿着在地道里蹭得脏乱不堪的衣服回到张岗。他见到我，头一句话就说：

“将军，好险啊！”

我说：“杜伦先生！我本来不让你去那里的……”

杜伦说：“冀中的地道是万能的，冀中的老百姓顶好顶好，中国一定胜利！我回延安一定好好向我们的将军报告。就凭这个，他们也得给我晋级。”

杜伦离开冀中军区时，把他带来的轻型卡宾枪送给我作纪念了。我也送给了他一些纪念品。

杜伦走了。听说，他一路上总是念念不忘地道。每到

一村，首先要问这个村有没有地道，他住的房子有没有地道口，直到听说有地道，他才放心住下。

平 原 流 火

艾斯·杜伦中尉离开冀中军区不几天，我和罗玉川同志扔下自行车，骑上高头大马，带着作战参谋阎佐三、警卫员王志平和小魏以及护送我们的小分队，在寒风呼啸的月夜里，沿着滹沱河和大沙河之间的道路，昼伏夜行，前往冀察晋分局和军区去参加重要会议。第四天夜晚，我们来到了平汉路边。

这次穿越平汉路封锁线，与去年我们来冀中时的情况大不同了。那一回，我们是冒着风险闯过来的，而这一次，我们却提前通知沿线的伪军哨卡：今天夜间十一点钟左右，八路军要过路，请你们监视日军活动，保证过路人员的安全。因为经过一年来的工作，我们已经逐渐把一部分伪军和伪政权控制在手里了。

为了慎重起见，阎佐三同志带着尖兵班先到前面侦察了一番，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于是，我们策马顺利地通过了封锁线。

越过平汉路，我又见到了熟悉的群山，见到了熟悉的村庄和父老乡亲，心情异常激动，感到格外的亲切。

在分局和军区召开的重要会议上，传达讨论了毛主席

关于扩大根据地、准备大反攻的指示精神。一九四五年初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接近最后胜利。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于是，在我国闽浙沿海增防，并进攻广东海岸，企图抗击美军登陆；在华北则采取战略守势，继续收缩兵力。这时，各地的伪军越来越动摇，偷偷找我们接头，以便留条后路。日军则越来越孤立，厌战、反战者与日俱增。毛主席谈到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时，指出要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中央晋察冀分局和军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晋察冀的实际，确定我们扩大解放区的主要任务就是开辟雁北、察南、绥东、热河、子牙河和津浦路以东等地区。

在讨论斗争方案时，我和罗玉川同志提出：我们冀中区准备在挤退敌人点碉的基础上，迅速扩大战果，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扩大解放区的战役。

会议期间，恰逢一九四五年春节，同志们喜气洋洋地相聚会餐。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边区政府、联络处、公安处、报社都来了人。席间，大家频频举杯，彼此预祝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胜利。会议一结束，我立即策马驰向唐县、完县交界处的清醒、神南镇，去检查我们冀中军区组织的“拳头”的练兵情况。

自从华北的敌人被迫转为守势以来，冀中军区就注意强调集中作战和建设主力部队。这种集中作战在当时不只是形势发展的可能，而且是形势发展所必须。当然这种集

中作战和开展普遍的群众性的游击战是并行不悖的。毛主席讲：“在长期奋斗中，游击队和游击战争应不停止于原来的地位，而应向高级阶段发展……”当然，这时发展到太高级自然也不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是提高了的游击战”。而且集中作战必须有拳头、有主力。可是，一九四二年“五一一大扫荡”之后，冀中的主力团都走了。有的到晋西北，有的到北岳区，有的到冀鲁豫，剩下的只有一个团，即二十四团，还是一个小团。现在，要扩大解放区，进行大反攻，组织“拳头”自然就成了刻不容缓的重要问题。军区和区党员决定：成立军区练兵团，由六分区的三十一区队^①、七分区的三十二区队^②、八分区的三十七区队^③和九分区的二十四团^④组成。练兵团团长、政委由我兼任，黄寿发和王奇才同志分别兼任副团长和副政委，具体工作主要由他们两人负责。为了统一作战思想，加强战术训练，培养战斗作风，我们又把各分区的教导大队集中起来，组织了一个以马青山为团长、宫呈祥为政委的教导团，在西专门路轮训班长和排、连干部。

战马“哐哐”地叫着跑进练兵团的驻地，我望见黄寿发和王奇才同志站在团部门口，他俩已从电话上得知我要

① 由原三十一、四十四区队各二个连组成。区队长徐信，政委李克忠。

② 区队长谢宏恩，政委贺明。

③ 区队长刘绛亭，政委龚友元。

④ 团长张英辉，政委先为梅成章，后为王功学

来。下马后，我随他俩走向村外山野。

好一个练兵场！真是龙腾虎跃，有擒拿格斗的，有飞越障碍的，有匍匐前进的。一位叫朱彪的连长和其他练刺杀的同志穿着从日军那里缴来的防具对刺、攻防，杀声喊得地动山摇。投弹场上，教练弹如满天流星，弹着点都在四十公尺以外。进行射击预习的同志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枪口对着一个个靶牌。靶牌上还画着日军头像：戴着圆框眼镜，仁丹胡下是一张血红的大嘴。显而易见，我们的战士是怀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肩负着民族的希望来练兵的。

黄寿发同志汇报了整训中存在的问题，如：练兵团里新兵多，老兵中间不少也是刚从地方武装转来的，游击习气甚浓等。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应该立即解决。”我说，“那就是如何加强干部的战术训练，以适应运动战，你们看呢？”

“对对！”黄寿发和王奇才同志异口同声地答道。

在练兵团干部大会上，我对大家说，我们要打开新局面，就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贯彻军区会议精神。我们能集中兵力在这里练兵，全靠地方党、政、民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八分区、九分区、十分区，在冀中区党委、军区和行署的统一领导下，我们兵马未到，他们工作先行，发动群众，除奸肃特，建党建政，减租减息，互助互救，发展地道，扩大民兵，壮大部队，做了不少工作，使主力部队得以轮番整训，交替出击。所以，同志们更要争分夺

秒地苦练杀敌本领，以形成一个真正的“拳头”。到时，上级一声令下，就把“拳头”挥出去，将敌人砸个粉身碎骨。

会上，同志们的情绪就象一把火丢在油海里，“轰”的一声全烧着了。那几天，我们在练兵团里还搞了大会操、大比武，清醒、神南镇一带的老百姓为了看会操和比赛，站得满山遍野都是，真是热闹极了。

检查完练兵团的工作，返回冀中的途中，我听到了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的消息，不禁大喜。希特勒垮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日本帝国主义眼看也要完蛋，我们应该加速准备大反攻。过（保）定、博（野）路时，正是夕阳西下，天红似火。我们从冯村和门东村的两个大碉堡中间穿过，敌人哨兵发现了我们，也无可奈何。一位护送我们的同志说：

“不要紧，他没有机枪和掷弹筒。只要他敢出来，我们就收拾他！”

护送我们的武委会主任，一边走一边还讲故事，讲他们是怎样活捉公路上的伪军，又是怎样巧斗碉堡守敌的。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之后，我回头一望，日薄西山，奄奄一息。我想，眼下日本侵略者的境地不也正是这样吗？

回到冀中军区，我们又召开了作战会议，决定打几个大的战役，扫除敌人残留在腹地的城镇据点，以扩大解放

区。此时，分布在冀中地区的日军是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旅团长是野宪三郎少将。另外，还有从东北调来的关东军和伪满军一部，以及原驻冀中的大批伪军，在保定仍驻着桑木的一一〇师团。

我方呢，遵照毛主席由执行游击战的游击部队化为执行运动战的正规部队，须具备数量扩大和质量提高两个条件的指示，在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当中不断扩大队伍，并将各区队陆续扩编为主力团，各分区的游击队也按照军区的指示扩编为分区主力，县游击队扩编为区队，区游击小队扩编为县游击大队。除此之外，还采取了游击队向正规军转化的一系列措施，各分区还广泛地开展练兵运动，针对日伪军在城镇设防的情况，举办坑道爆破训练班，开设黑色炸药工厂，为攻坚作准备。对于各级指挥员，我们还特别要求他们注意运用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指挥作战，敢于超越地区作战、敢于打大仗，敢于整个营、整个团的吃掉敌人，以夺取更大的胜利。

我们制定的战役方针是：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经济封锁相结合的办法，先由西向东，从白洋淀扫向渤海边；尔后由南向北，席卷平南、津西，歼灭盘踞之敌；进而穿过永定河、子牙河，切断北宁路、津浦路，协同冀东、冀察的八路军夹击平、津。

整个战役分为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两个阶段。

四月十三日，我九分区的三十八区队、四十二区队以

及任邱大队等部队，突然将河间、任邱之间的敌核心据点辛中驿铁桶般地围住。就此揭开了春季攻势的序幕。

对辛中驿的情况，我是了解的。那个据点有高达十多丈的母碉两个，还有子碉、暗碉、外壕、铁丝网、鹿砦等。在外壕和铁丝网周围，还敷设了地雷。镇上驻有任邱县伪警备军二大队约一百六十多人，配有机枪、小炮等武器。伪大队长田文明是个铁杆汉奸，无恶不作，民愤极大。

辛中驿的战斗一打响，战况就不断地报到我这里来了。

为攻下辛中驿，九分区派部队在金桥伏击了由大城派出来抢粮的日伪军，击毙击伤敌人数十名，带队的日军小队长当场绝望地剖腹自杀。驻大城的日军山田大队遭此伏击后，感到自身难保，再也不敢轻举妄动，紧闭城门，不肯发兵增援田文明。辛中驿的敌人成了瓮中之鳖。

经过五昼夜的强攻与政治攻势，辛中驿的敌人基本上垮了。这天天黑时，我军攻入纵深，围住了敌人最大的母碉。可是，铁杆汉奸田文明在母碉上摆了一个大油锅，插上十几根粗大灯蕊，点燃之后，照得四周如同白昼。田文明本人则赤着胳膊，背着大刀，在碉堡上走来走去，疯狂地叫喊着：“谁要是投降，老子就砍谁的头！”妄图顽抗到底。

我们几次发起攻击，均未奏效，战斗呈胶着状。

午夜时分，我四十二区队又发起了一次强攻，虽未攻下母碉，但是铁杆汉奸田文明和伪连长、小队长等敌头目

都被我们的特等射手李小陆和神炮手王文九打成重伤，此外还有十多名伪军送了命。

两天后，敌人弹尽粮绝，不得不出来谈判。不料，正当九分区特派员王宪周与田文明谈判时，河间的敌人突然赶来增援，枪声一响，田文明又强硬起来了。情况千变万化，我们的战士灵机一动，把辛中驿附近的大草垛点着了。增援的敌人被迷惑了，以为辛中驿母碛已被焚毁，便垂头丧气地退了回去。

第二天上午，辛中驿守敌全部投降。捷报传来，我对林铁同志说：

“这个头开得不错。”

林铁同志说：“越往后会越好。”

一望无际的冀中大平原上，春季攻势的任（邱）河（间）战役、文（安）新（镇）战役和饶（阳）安（平）战役相继展开。

任邱城六百多名日伪军被我军和以土枪土炮助战的民兵队伍团团围住了。任邱守敌惊恐万状，向大城的日伪军告急。大城的敌人刚出来增援，我军又佯攻大城，吓得他们连忙回窜。任邱之敌见大势已去，被迫弃城突围，逃向河间城，一路上被我歼灭大半。

任邱城解放后，八分区的部队随即扫除了河间城周围的十几个据点，然后紧逼河间城的四关。河间城里的日军一见大势不妙，便丢下伪军，仓皇窜到沧县去了。这时，河

间城也收复了。

正当三十三区队攻打河间与沧县之间的日军据点时，我带着原星、魏巍和阎佐三等同志来到了火线——沙河桥。三十三区队的营、团干部看见我们来到敌人的外壕，他们干脆跃到紧挨敌据点的内壕指挥作战。

我见到了“反战同盟”的三位日本同志，他们是来做瓦解敌军工作的。我握了握他们的手，说：

“你们辛苦啦！可要注意安全啊！”

“谢谢，谢谢司令员的关照！”日本同志兴奋而又感激地回答。说完，他们转身拿起铁皮卷成的大喇叭，“叽哩咕噜”地对碉堡上的日军喊起话来。这些日本同志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挺身而出，多么令人敬佩啊！他们的行为证明，日本军国主义者不得人心，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是友好的，是渴望结束战争、返回家园的。我不禁想起冀中军区敌工科的干事宫本信雄。他是日本人，日日夜夜为“反战”而工作着，成绩很大，尤其是在日本士兵当中颇有影响。后来，不知谁回到了日本，对他家里的人说，宫本已经到中国的八路军那里工作去了，家人就给他写了一封支持他的信，信封上仅写着“中国八路军宫本信雄收”几个字。这封信，居然奇迹般地送到了宫本的手中。他读信时，激动得热泪盈眶，说：

“我在日军时，收不到家信。在八路军里，却能收到家信。”

可见，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感情，并没有被战火烧毁。

部队正在向伸入到敌堡下面的坑道里装炸药，魏巍和阎佐三同志也跟着钻进坑道看去了。“反战同盟”的日本同志开始喊话，向敌堡交待了八路军宽大俘虏的政策，同时又告诉敌人，我们已经把炸药装到碉堡底下了，希望他们放下武器，不要当法西斯的殉葬品。

过了一会，碉堡上的枪声逐渐稀落下来了。我隐约听到，碉堡里一阵骚动。突然，传来一阵歇斯底里的嘶喊声，接着又响起了一声沉闷的枪声。”反战同盟”的日本同志告诉我，这是顽固的军官在枪杀自己士兵！同志们气坏了，嚷嚷着：

“干掉他！”

碉堡上敌人的机枪又响起来，子弹“噗噗噗”地落在壕沟边，震得壕壁的泥土簌簌往下掉。我想，敌人如此顽固不化，那就只好请他们上西天！于是，我立即下达端炮楼的命令。

刹那间，只见火光一闪，“轰隆”一声，碉堡被炸塌了，敌人全部丧了命。

任邱战役尚未结束，就传来消息：九分区和十分区的部队相继攻下了新镇、文安两个县城，还击伤了一架前来相战的敌机，缴获了敌人一艘装甲汽艇。遗憾的是，大城的六百多名日伪军赶来增援文安，本来已经被我军放进城

里包围起来了，可是夜间突然下起大雨，敌人乘我方警戒疏忽，冲出包围圈逃跑了。我方失去了一次全歼敌人的机会。我要求他们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

文新战役展开两天后，为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我们又令七分区主力与八分区的一部分部队相配合，迅速发起安（平）饶（阳）战役。在这之前，六分区司令员王相臣和政委张逢时、魏震他们多次找我求战。

我说：“别急嘛。这次打安饶战役，你们分区虽然没有主攻任务，但还是有很重要的配合任务呢！”

“司令员，你说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王相臣同志说。

我告诉他：“为了声东击西，迷惑敌人，六分区的部队要大破深（县）磨（头）路，不断地袭扰辛集、深县等城镇，并以精悍武装潜入石家庄市，袭击敌华北公务总署，以造成敌人的错觉和恐慌。”

安平和饶阳的战斗打响后，敌人果然猝不及防，乱作一团。

五月十一日夜，七分区副司令员杜文达^①和政委张庆春向我报告：白天，深县的日伪军拼凑了六百多人，带大车六百辆进到安平城。下午，又从安平城钻出来五百多名日伪军，带着三百辆大车径直往饶阳奔去。他们估计敌人要逃窜，因此，准备在韩村铺设伏。我同意了他们的作战

① 七分区司令员于权申同志因病休息了，所以由杜文达同志指挥。

方案。

两天之后，敌人由饶阳撤往安平途中，中我埋伏，被歼的日伪军竟达六百多名。此时，饶阳城宣告解放。安平和武强的敌人弃城逃跑。紧接着，深泽城和新安镇也被我七分区和九分区分别攻克了。当我主力部队围攻内线城镇敌人时，活动在外线的游击队也积极配合行动。津南支队依靠群众支持，攻克了日军十七个据点，在碱河以南，捷地碱河以北，东临渤海岸，西至津浦路约一万平方里的土地上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五月十三日，春季攻势已接近尾声，这天下午，我们一些军区干部在饶阳县五公村开完碰头会议，我对林铁他们说：

“我们去看看打下来的城镇，了解一下敌情和部队情况怎么样？”

“好哇！”

林铁、李志民、罗玉川、金城同志也都兴致勃勃。

说着笑着，我们不知不觉走出二十多里，来到了滹沱河边。这里，空气中散发着一股强烈的硝烟味。饶阳城内有几团浓烟直上天空，显然，敌人放的火还没有被完全扑灭。民兵们正在捣毁敌人的碉堡。我们仔细地观看和研究了敌人修建的碉堡，随即登上一个制高点，了望全城。啊，未被敌人烧毁的房屋所剩无几，到处是一片废墟。

进到城里，我走遍大街小巷，只见到两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她俩哭得象泪人似的，你一言我一语地向我们诉说着敌人的暴行。从城西边回来的一个侦察员报告说，韩村铺的敌人正在缴枪。老人一听，挥动着瘦骨棱棱的拳头，连声说：

“你们给我作主，打死这帮野兽！”

第二天，我们经窝北菓子洼来到河间城。这城拿下来才两天，可城墙和岗楼已被拆除得干干净净。原来，乡亲们听说要捣毁这些设施，没有动员，就来了两千多人，大家一齐动手干的呀！眼下六千多辆大车正拉着战利品和砖石、木料行驶在公路上。想不到的是，这里有所小学已经开课，学生竟达八百多名，我们可以听到琅琅的读书声，实在令人陶醉。没有这场激战，就不会有这种和平景象，不赶走日本侵略者，人民就不得安宁。战斗虽然胜利了，城内民兵还在挖地道，听说他们昼夜加班，七天之内便可完工。我们又察看了这里的教堂、剧院以及敌人修建的兵营，出席了有一两万群众参加的祝捷大会。

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有少数战士复仇心理非常严重，凡是敌人用过的东西，见了就砸，把一些我们可以利用的物资，也都捣毁了；还有些农民到城里来抓汉奸，报仇雪恨，一旦打听到谁在日伪组织中干过事，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当场打死。我们立即向各级指挥员指出：要赶紧教育干部、战士和农民群众，注意政策，分

清敌我，认识到城镇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不仅要解放它，而且还要建设它，迅速纠正这种混乱现象。

我们来到了任邱城。听说攻城时，炮楼上的敌人发现我们八路军中有一个人枪法特别准，就在炮楼眼上放了一块砖。结果，不一会，“叭”的一声，那块砖头就被我们的特等射手谢大水一枪打碎了。这时，敌人大声喊道：

“你们也放一块砖试试！”

我们的一位战士便好奇地摆了一块砖，结果，没多久，他们也一枪把砖打掉了，可见敌人也有特等射手。

然而，就在敌人打完这一枪，鼓噪不已的时候，我们就用各种火器把炮楼的枪眼全部封锁住，他们再也伸不出枪来了。接着，我们很快端掉了他们的炮楼。任邱城和辛中驿据点一样，都是靠坑道作业和爆破来解决问题的。我特地看了敌人的炮楼旧址和我方挖掘的坑道，了解坑道挖掘的深度和长度、装填炸药的数量，还通过审问俘虏，了解炸药爆炸时他在炮楼里的感觉，以此总结经验，向全军推广。

离开任邱城，我们乘船沿着赵五河、大清河东下。沿河风景秀丽，苇子象一团团、一簇簇绿色的云，缓缓地移动着。河里的船只往返不绝，渔民们敲锣打鼓，赶鱼入网，犹如南方端午节赛龙船一样，热闹异常。这种独特的捕鱼方式，真叫人赞叹不已。

“司令员，你看！”一个同志指着岸边说，“到了。”

原来是我们要去的新镇城到了。这里号称小保定，商业繁荣，地理位置也很重要。敌文安、新镇、大城“剿共总司令”柴恩波就是在这里被我们击伤的。拿下它之后，九分区和十分区就连成了一片。可是距此二十五里的霸县仍在敌人盘踞之下。我们又赶到前沿，视察了一番。

随后，我们又来到炮火纷飞的文安城外。看了看九分区指战员们的围城战斗，检查了他们的战斗方案。五月二十四日夜，九分区部队便拿下了文安城。这时，九分区司令员魏洪亮由于脚被冻伤后感染了，开了刀，正在白洋淀里休养，我们决定专程去看一看他。

傍晚时分，我们坐上小船，向白洋淀里划去。白洋淀里的村庄很多，我几乎都去过，这次来，可谓“旧地重游”了。的确，黄昏时的白洋淀，景色尤为迷人。漫天红霞映在淀水中，使我们的船只就象遨游在霞云璀璨的天上一样，就在夕阳西沉的一瞬间，我们突然看到远方的天空里露出了那熟悉的狼牙山。大家又惊又喜，有的说：

“真是不容易呀，在冀中也能看到狼牙山啊！”

有的叫了起来：“那不是雪颡岭吗？那不是‘通天顶’吗？……”

李志民同志深情地说：“都是和我们有深厚感情的山峰啊！”

明月东升的时候，我们的船只在淀里的一个小村子靠了岸。不一会，我们就在月光下见到了拄着拐棍练走路的

魏洪亮同志。

“司令员!”魏洪亮同志惊喜地叫了一声,两手将拐棍一甩,就向我们扑来。我赶紧上去,一把将他扶住。我告诉魏洪亮同志,我们的春季攻势,已经胜利结束了。三个战役共击毙、击伤和俘虏日伪军近四千名,收复八座县城,解放五百多个村镇,拔除敌人碉堡三百多个,如今大清河以南、沧石路以北、子牙河以西、平汉路以东的根据地,都连成一片了!

当晚,我们就在魏洪亮养伤的这个村庄住下了。半夜里,忽然电闪雷鸣,紧接着,大雨从天而降。我被惊醒了。我觉得,那雷声雨声象千军万马在奔腾,正象征着我们即将开始的夏季攻势。

六月八日,我们发起了夏季攻势。在路西整训的练兵团,奉命编成四个大团,开回了冀中,沿途受到冀中人民的热烈欢迎。烈日下,身着便衣的部队指战员正沿着公路,浩浩荡荡地开进。我带着司令部的参谋人员,骑着自行车,夹杂在行军队伍之中。天气酷热,战士们大汗淋漓,浑身尘土,那一张张古铜色的脸上,泛着兴奋的红光。六月十日,我们在暴风雨之夜,乘船通过文安洼五十里的水面,一举袭入子牙镇内。大城县、献县及子牙河岸的三十七个日伪据点相继被拔除。七月九日,我们在石务吉召开了作战会议,决定按计划乘胜打响大清河北战役。我们集中了几个分区的主力部队,形成“拳头”担任主攻。其他各种

武装力量则负责配合，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打击敌人的突出部、结合部、侧翼以及重要的据点和要害部门，箝制敌人，迷惑敌人，以保证主攻部队行动的突然性。这时，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正在部队传达，毛主席在延安发出应向一切被日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的号召，象一团火似的燃烧着冀中军民的心。

我们沿着大清河东进。乡亲们热情地摇着船来支前。

“有病的同志，走不动的同志，都上船来吧！”摇船的老乡笑盈盈地朝我们喊着。不一会，船越来越多，乡亲们纷纷喊道，“同志们，上船来吧！”

于是，我们一部分同志改乘船了。有些战士是头一回坐船，感到新鲜极了。他们用新奇的目光，望着东流的碧水，望着绿得令人心醉的芦苇，望着惊飞而起的水鸭，望着白云似的风帆……

“好地方呀！有鱼有水有船。到了陕甘宁边区啦！”靠近我们的一条小船上，传来了一位年轻战士感慨的喝彩声。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我们的年轻战士只知道天下的好地方是陕甘宁边区，却不知道那里是另一种风景哩！

不几天，日军据点胜芳镇被我们突然包围，经过里应外合，一番激战，七月十四日那天，胜芳镇被我们解放了。

“南有苏杭，北有胜芳”，一点不假，我们走进胜芳镇，仿佛到了江南水乡。这个镇子周围是一片绿色的苇塘，环境显得格外幽静。镇上的房屋建筑古色古香，都是用砖砌

的。妇女们穿着旗袍，集市上摆满了藕、莲蓬、活蹦乱跳的鱼虾和螃蟹等水产品。据了解，全镇有七千六百多户人家，可是在日伪统治时期，民不聊生，贫民百姓一直在痛苦中熬煎，只有日军和少数汉奸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现在，胜芳回到了人民手中，乡亲们一个个扬眉吐气，高兴得又是唱又是笑，都说这下可好了，有共产党给我们撑腰了。在天津西面的几个大据点堂二里、信安和王庆坨的伪第七集团军司令部及十七团全部被我们消灭了。在霸县城、独流镇等地的一些“钉子”，也都被我们拔掉了。

为了配合主攻部队作战，涿（县）、良（乡）、宛（平）大队、大兴支队和津南支队在平津近郊大闹敌据点。六分区的部队在司令员王相臣同志的带领下，向赵县、宁晋附近的敌人发起频繁的进攻，迫使敌人放弃了七个据点。不幸的是，分区司令员王相臣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

噩耗传来，我心情异常沉痛：王相臣同志是抗战以来所牺牲的我的战友中职务最高的一位。我站在大清河畔，面向王相臣同志牺牲的方向默哀。此刻，王相臣同志的音容笑貌，和前不久他在高干会议上求战的情景，又出现在我的眼前。相臣同志，你是在这夏季攻势大获全胜的时候，在抗日战争已经接近最后胜利的时刻倒下的，你虽然倒下了，却永远活在我们的行列中！

然而，我们冀中军区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大清河北战役又以我们的胜利宣告结束了。我们冀中军区捏成“拳

头”，连续打了五个战役，共歼灭日伪军一万一千多人，解放县城十一座，游击区扩大到北抵北平、南越沧石、东达渤海边、西至平汉线。整个冀中已有近九百万人口的地区，获得了解放。

时值一九四五年夏末，我军扩大解放区的攻势方兴未艾，国际局势的变化异常急剧，八月八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八月十日，我们进行的安（国）、博（野）、蠡（县）战役就要打响，参战部队已经展开。是夜，我刚刚入睡，秘书陈子端跑来把我叫醒，激动地喊叫着：

“司令员！司令员！刚才电台广播，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了！”

我连忙爬起来，问道：“确实吗？”

陈子端连声回答：“确实，确实！我连着听了两遍，不会错，日本投降了！”

“立即通知部队，就地待命！”我兴奋地对闻声进来的参谋人员说。话音刚落，整个司令部就欢腾起来了。

反攻进行曲

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的消息一传开，司令部驻地附近的乡亲们就立即沸腾起来了。他们纷纷涌到街头，有的敲锣，有的打鼓，有的燃放鞭炮，还有的干脆扭起秧歌来了。战士们也都欢喜若狂，敲打着脸盆、牙缸，喊起胜利

口号。尤其是那些家在东北的同志更是激动万分，他们不停地喊着“打回老家去”，兴奋得端起整碗整碗的酒就喝，结果醉得象滩泥。还有的同志高兴地流下泪来，泣不成声。政治部的同志用最快速度印出“号外”，亲自送往各部队。

冀中所有部队都接到通知：原地待命。没多久，朱总司令就下达了大反攻的命令，命令各解放区的部队，立即向敌占区和交通要道进发。冀中军区立即在肃宁县的大官厅召集团以上干部开紧急会议。我在会上指出，我们已胜利地完成了恢复、巩固和发展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艰巨的任务。现在，我们暂不进行原定的安博蠡战役了，要马上脱下便衣，换上军装，执行毛主席发出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命令，开始总反攻！

会场里气氛异常热烈，同志们一个个都象年轻了几岁似的，满面红光。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心中实在是太激动了。

多么艰苦卓绝的八年！在这八年里，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领导我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许多国际友人和爱国人士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许多曾与我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的同志，倒在血泊之中；无数英雄业绩，将载入抗日战争的光辉史册！的确，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

“一切为了前线胜利！”

冀中区党委和冀中行署提出这个口号之后，行署主任罗玉川同志亲自动员人民群众为子弟兵赶做军服。结果，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冀中部队全都换上了用高阳布做的灰色新军装。此时，我们冀中的部队已由“五一大扫荡”之后的一个小团，发展为二十六个团。这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党中央、晋察冀分局、晋察冀军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的结果，是冀中广大军民英勇奋斗的结果。为了适应全国大反攻的需要，根据中央指示，凡是在冀中工作的东北同志，都抽调出来到东北去。沙克同志带领东北籍干部和冀中的两个团，挺进东北了。延安电台广播了让我们冀中部队接收天津的命令。朱总司令任命我为天津警备司令。

我们在胜芳召集部队开了一个万人誓师大会。会上，我向大家宣布：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已经根据朱总司令的命令，向日本侵略者华北派遣军司令官下村定发出了最后通牒，饬令其在我军区管辖内的日军交出全部武器、物资，依照所规定的地点分头集中，听候处理。凡投降的，不论官兵，保证其生命安全，并予以宽待；拒绝投降者，将其歼灭！我宣读了进军天津的命令，几位指战员代表也分别上台表示了战斗决心。

八月十二日午后，我与林铁、李志民同志率领部队分路直趋天津，去接受日军的投降。沿途我们受到乡亲们的

热烈欢迎。他们用树枝和鲜花搭起“胜利门”欢迎我们，有的双手捧着鸡蛋、水果往我们战士口袋里塞，有的端着茶水，大声招呼：“同志，喝一杯茶，解解暑吧，多缴几支日本枪呀！”还有的在路旁手舞足蹈地唱着：

哪一个真正干，
哪个是草鸡蛋，
不要自己吹，
大家来看一看；
共产党抗日最积极，
八路军才是真心干……

唱着唱着，有些小伙子竟不由自主地钻进支前队伍里去了。我心里热呼呼的，我们在欢声动地的热浪中向天津进发。

主力部队开抵天津市郊，另一部逼近大沽，其他部队和广大民兵也把安国、博野、蠡县、雄县、霸县等县城团团围住了。

在史各庄，我们向天津日伪军发出了通牒，散发了延安总部的命令、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的宣言和告日军书，敦促日伪军尽快投降。

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次日，朱总司令电令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茨，要他立即

通知被我军包围的日军向我军投降，并宣布在华北的日军要按照聂荣臻司令员的命令办理投降事宜。

可是，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明目张胆地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竟然也发出了“命令”，要我军“原地驻防待命”，同时又命令日伪军就地“维持治安”，等待“国军”前来受降！

我们在天津城的地下党和地下军很快又送来情报：日本投降了，但天津城里的汉奸不但没有受到通缉、法办，反而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庇护。蒋介石还给他们加官、晋级、改编，伪军摇身一变，成了中央军。至于日军，蒋介石则请求他们“坚守阵地”，意图很明显，就是不让我们八路军去受降。

情况很严重。在关键时候，晋察冀军区给我们发来了电报，及时地传达了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毛主席针对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反革命方针，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革命方针。毛主席说：

“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

“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

毛主席的话指出了我们前进的道路，鼓舞了人民的信心和勇气。

八月十九日晚，我们按预定计划，以十三个团的兵力，向杨村至唐官屯一线城镇的日伪军发动了进攻，政治部的文艺工作者崔嵬深入火线体验生活，正赶上唐官屯战斗。二十四团的同志考虑到他的安全，要他在后面呆着，可他看见战士们打得那么勇猛，深受感染，也一跃而起，跟着战士们向前冲去了。

二十三日上午，我决定亲自带领部队攻打天津外围的杨柳墅和杨柳青据点。十点钟，集合号响了，部队要立即出发。我对警卫员说了声：

“走！”就蹬上自行车集合队伍去了。

攻打杨柳墅和杨柳青的战斗比较激烈，但时间不长，我们就歼灭了大部分守敌，并且攻占了杨村车站、北仓车站和飞机场，切断了平津、津浦之间的铁路交通线，还占领了灰堆、大沽、岐口等地。

我走进硝烟弥漫的杨村。二十八团和三十八团的部分指战员一度攻进天津西站，同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由于天津市内驻有日军第三装甲师团、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指挥机关和三个大队，加上伪军，共有一万多人，他们占据了有利地形，凭借坚固工事顽抗。我们攻进去的部队较少，寡不敌众，只好撤至外围，调动部队，进行新的部署。但是我们在天津的地下军袭入伪建设公署，截获敌人十六辆汽车的粮食，并夺得一些枪支。与此同时，二十三团和六十七团攻入静海县城，六十六团占领了陈官屯。十分区一

部配合冀热辽军区和冀察军区的部队，从南面逼进北平城下。冀中军区另一部，打下了保定周围的北大冉、张登等据点。三十三团夜袭保定西关伪军绥靖军第六集团司令部，毙伤日伪军六百多人，俘日伪军五百多人。还有一部分队伍，配合冀晋军区的部队，拔除了石家庄外围据点，围住了两千多日伪军。六分区的七十一团和七十二团打下束鹿县城和磨头、王家井、贡家台等十六个据点，歼灭全部守敌。

我军大反攻的声威，使得日伪大为震惊。八月二十二日，天津南郊伪自卫团四百多人，由团长率领向我军投城。同日，驻献县崔尔庄的伪军联队长张洪烈率七百多人，全副武装宣布起义。八月二十三日，冀察部队解放了日本侵略军在察哈尔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张家口，取得了晋察冀军区反攻作战中的一个重大胜利。

捷报频传，我们越来越紧地围困天津之敌。这天上午，天空突然传来“嗡嗡”的响声，我抬头一看，一架又一架美国军用飞机从我们上空掠过，朝北平方向飞去。没多久，上级来了通报，说这是美帝国主义者帮助蒋介石往北平运兵呢！据守天津的日伪军见天上飞机一批接一批，似乎明白了什么，便得意起来，腰也粗了，气也壮了，抵抗也越发疯狂了。形势急剧变化着。美、蒋合作了，蒋、日、伪合流了，内战危机空前严重起来！

党中央为了避免内战的爆发，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避免内战的紧急措施。同时，鉴于形势恶化，我军继续夺取大中城市困难增多，党中央及时地改变了军事斗争方针，指示我们：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集结必要的兵力，尽量广占乡村和夺取小城市，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注意训练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

晋察冀军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立即调整了部署：除挺进东北、热河和察哈尔的部队，仍按原来计划行动以外，各区主力从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唐山、太原等大、中城市周围迅速转移，立即回师内地和解放区边缘，攻夺日伪占据的城镇。

我带领冀中部队主力奉命从天津周围转移，将矛头指向大清河北。这时，大清河北的日军已经龟缩到平津去了，留在城镇据点里的汉奸和伪军仗着有蒋介石撑腰，气焰十分嚣张。不料，我们杀个回马枪，将其据点扫得一干二净，紧接着又收复这一带的许多城镇。

九月二日，日本侵略者正式签字投降。然而国民党反动派不仅不解除日本侵略军的武装，反而把华北的日军改编成“志愿军”，令其掩护胡宗南八个师的“国军”火速进到平津，还命令傅作义利用日伪军的接应，迅速往归绥、集宁、丰镇、大同集结。于是，傅作义部很快就在这一带纠集了四万三千多人，并向张家口进袭。这样一来，在我

晋察冀解放区就出现了国民党军可能从东西两面夹击察哈尔的形势。因此，保卫察哈尔，保卫张家口就成为晋察冀军民的当务之急。

晋察冀军区当即决定，迅速往察哈尔省的平绥线上调集兵力。早已从延安飞抵涞源的聂荣臻司令员，命令我率领冀中七、八、九分区的主力 and 六、十分区一部共十一个团，组成冀中纵队，由我任司令员，林铁同志任政委，李志民同志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火速开往张家口，奔向平绥线。